

- 中国问题的研究专著
- 美国记者的采访实录

苦海沉浮

——挣脱10年浩劫的中国

(美) 弗克斯·巴特菲尔德 著
张久安 等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这本书——是西方人对文化大革命 10 年浩劫的“全景透视”

这本书——畅销欧美，被誉为“中国社会大全”

这本书——是美国新闻界注视中国的“第一双眼睛”，获美国普利策新闻大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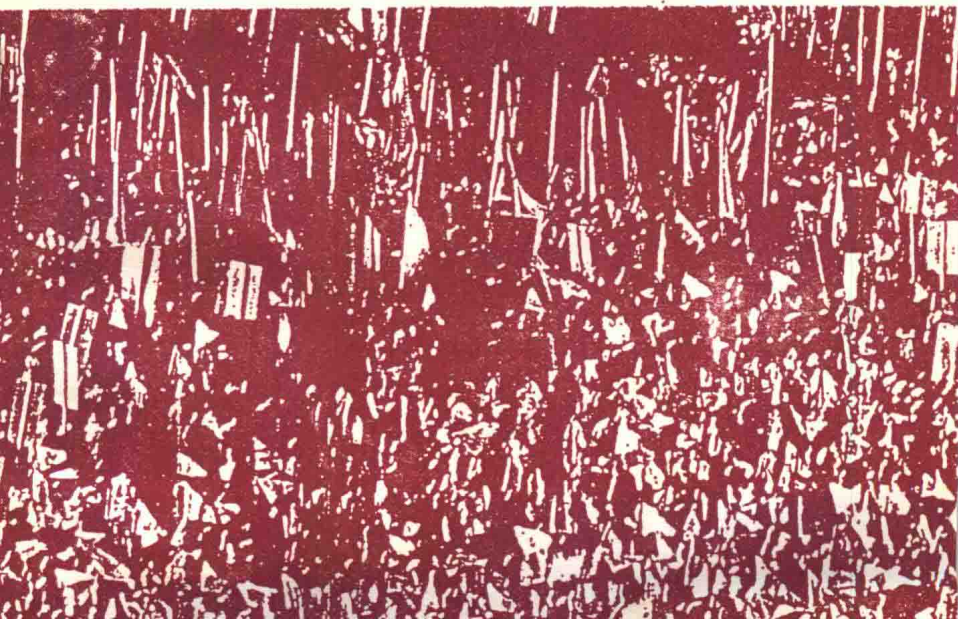
这本书——风靡了半个地球，译作法、日、德多种文字。现据 1986 年新版译为中文，献给您——千千万万中国读者。

《纽约时报》特派驻北京记者、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弗克斯·巴特菲尔德，曾于 1979 年在美国陪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问，并在中国采访过宋庆龄、邓颖超、赵紫阳、方毅、巴金等著名人士；他的足迹遍及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采访过上上下下各届大士，广泛接触了中国政治、经济、科技、外交、新闻、文艺、教育以及中华文化、道德伦理、自然风光、人际交往等各个领域，终于写成这部洋洋 40 万言的研究专著。它回首 10 年浩劫，记录和剖析了今日中国举步维艰的诸般现象和人心思变的复杂心态。将文学描绘和新闻综述融为一体，将历史与现实合成一炉，东方与西方相互参照，全书充满了直率、坦诚，兴叹忧患之后又寄予殷殷期待，同时不乏切肤灼骨的独到见解，足以令中国读者震动、惊讶、掩卷沉思……

苦海沉浮

——挣脱十年浩劫的中国

美) 弗克斯·巴特菲尔德 著 张久安 朱欣民 译
文楚安 唐明



译者序

本书系美国研究中国问题专家兼著名记者弗克斯·巴特菲尔德关于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专著，重点放在他经10年浩劫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巴氏50年代后期进入哈佛大学攻读中国史，60年代初到台湾从事博士论文考察和进修汉语，以后10年先后任《纽约时报》驻台湾临时记者、驻越南和香港特派记者，其间曾发表有关白宫与越战内幕的专著，获1978年普利策新闻大奖。他自1979年初至1980年末任该报驻北京首席记者，在此期间，足迹遍及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采访了工农兵学商各界人士，对我国遭受文革浩劫后的百废待兴局面感触尤深。离任回国后历时一年有余著成此书，于1982年在美国问世，随后风靡欧美，倍受西方读者欢迎，对一般群众的影响也较大。此书汉译本根据1986年10月伦敦第三版译出。

通观全书，本书有如下特点：

一、集中展示中国一般群众的社会生活，所涉及的人有儿童、青年、中年和老年不同年龄层次，包括工、农、

兵、学、商各行各业，涉及家庭、婚姻、工作、收入、教育、理想各种问题，从人际关系、社会安排、工作状况到政治心态等等。

二、利用社会批评方法，坚持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分析态度，在肯定我国改革、开放政策所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下，揭露和分析文化大革命在思想、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诸方面酿成的恶果，比较客观地揭示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三、由于作者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具有二重性，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人民的勤奋精神和现任领导的开明政策表示衷心的钦佩、颂扬和赞赏的同时，也暴露出对我们长远的理想和实践的某种不理解；用以佐证其观点的有些资料也不免有以偏概全甚至道听途说之嫌，虽是西方作家的通病，译订时仍作了处理，或有不尽，请读者在阅读中加以明辨。

对本书作一全面周到的结论尚为时过早，也是译者力所不能及的，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将此书介绍给我国普通读者可能具有如下三方面的作用：

一、有助于了解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析 and 评价。作者因为是汉学家，谙熟中国语言和儒家伦理，从传统文化角度分析社会生活，较能揭示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与西方文化传统和生活实践的区别，可以作为我们正确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借鉴。

二、有助于了解西方人对中国文化革命的分析 and 认识。作者撷取资料的背景是我国文革中的满目疮痍和文革后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这有利于我们清楚认识10年浩劫

给国家和人民酿成的巨大灾难,认识党的改革、开放方针的正确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当人们在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伟大成果的今天再来读这本书,只能使人倍感亲切、倍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一系列改革成就来之不易,从而加深当今中国人对改革必行、改革必胜的正确信念。

三、有助于了解西方人对我国对外交往的评价和看法。作者在书中大量引用直接和间接的实例,展示了中外人民、政府机构和事业团体的相互交往,并根据西方惯例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较多地指明了我们工作中的不足和缺点,不失为外事、外经、外贸和其它涉外部门对外交往的有益参考材料,也利于我们在改革开放、宏观调控上进一步改进工作。

有鉴于此,我们翻译了这部有关中国社会生活的专著,希望能向日常工作繁忙、无暇光顾原著的各涉外部门和人员提供工作参考,也希望有利于普通读者了解中西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差异。因时间仓促,本书由集体分译、专人校对和统稿,并对书中内容和目录顺序做了适当删减、编排,望读者鉴谅。书中若发现误译之处,当属译者之责,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1988年8月

前 言

按中国人的说法，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这本书的渊源也可追溯到1958年的金门、马祖两岛危机那些使人的记忆已经逐渐淡漠的岁月。那年8月，毛泽东命令炮击由中国国民党人占据的这两个前沿岛屿，人们于是深感担忧，害怕艾森豪威尔行政当局会出于美台之间的共同安全条约义务卷入同北京的战争。我当时正在哈佛大学上本科二年级，受到“前沿岛屿”之争的影响，也去选修了著名的费正清教授的课程。费正清教授个子细高、性情乖戾、睿智过人，满怀激情地终生致力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他教导自己的学生们，中国拥有8亿人口，而且历史悠久，因此应该受到严肃认真地对待。

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论题，然而一经费正清道明，我就开始喜欢上这个地球上历史最为悠久、人口最为众多的民族。但除此而外，我对她竟一无所知，于是又选修哈佛大学社会科学类第111号课程，即中国、日本和东南亚历史概论，由费正清和埃德温·赖肖尔两位教

授合讲（3年后，赖肖尔教授由肯尼迪总统提名当了驻日大使）。以后20年的历史证明，那就是我与中国问题结下不解之缘的开端，从此之后，我一心迷恋着中国。初时，我虽然还不能正确拼读中国人的姓名，但一读到埃德加·斯诺所著的描写共产党人30年代史诗般的长征业绩的《西行漫记》，就情不自禁地受到毛泽东及其同事们的深深吸引，为他们向饱受国民党时期的苦难和腐败折磨的中国指明的希望和理想所吸引。

到了第二年春天，该是递交学年考卷的时候了。我按照哈佛大学的传统，将一张署上自己姓名、地址并加盖私章的名信片附在试卷上交了上去。不久，名信片即寄了回来，上边附有召我去费正清教授办公室的简言。我顿时感到大惑不解，不知论文出了什么毛病。虽是按照指定时间前往维登纳图书馆，一路上却满腹狐疑。

“你的考试论文写得非常漂亮，”费正清教授此话一出，我心中一块石头顿时落地。“你是否考虑过今后终生从事中国问题研究？你应该着手研究中国人的语言。”

我当时倍感受宠若惊，哪知费正清教授是位劝人皈依的行家，但凡遇上对他的研究领域抱有奇思怪想的学生，都要打破工作常规，热情周到地给以鼓励和辅导。那年夏天，我就此开始学习汉语了。然而在当时，汉语是一门非常偏僻的冷门，以至于次年秋天我去哈佛大学语言实验室借汉语磁带时，办公桌后坐着的一位家庭主妇般的管理员，越过眼镜上沿射来两道疑惑不解的目光，似乎是在打量我这个闯错了庙门的年轻人。她嘴里一阵叽哩咕噜：“汉语，你说是汉语？汉语不是已经废弃不用了吗？”

然而，每选修一门课程，我对中国的兴趣就增进一分。到了本科四年级，我的毕业论文选定了一个被人忽视的论题，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群美国传教士在华北如何受到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改革政策吸引，从而与他们携手合作的史实。1961年毕业以后，我获得了富布赖特奖学金前往台湾，以提高汉语口语能力。在那儿，我与一户中国人同住，由此发现了中国菜的美妙，也开始体会到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同我们的天壤之别。后来再度返回哈佛大学，花了5年时间完成研究生学业，主攻仍然是中国史。到了1967年，又重返台湾，从事博士论文的研究工作。

然而，那时正是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高峰时期，整天躲进图书馆的故纸堆里自得其乐，似乎与生活现实不大合拍。我非常渴望前往中国大陆，以便亲身体验中国的社会生活。因而，当《纽约时报》聘请我为驻台湾临时记者时，我欢欣鼓舞地接受了这份工作。到了台湾，我更是日以继夜地梦寐以求成为1949年以来驻北京的第一位美国记者。

这样的美梦一做就是整整10年。其间，我不得不接受指令，回《纽约时报》总部学习两年的新闻业务，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委派，先后充任驻越南、日本和香港的记者。但是，我仍然耐心地等待着中国向美国新闻机构打开大门。1978年12月终于到来了，吉米·卡特政府到底实现了美中关系的正常化。而那时，我已在香港整装待发，恨不得立刻就到达北京。尽管这意味着我将痛苦地离别正在怀孕的妻子巴巴拉，撇下年仅3岁的儿子埃桑，我也在所不惜。当时北京全城正面临着严重的住房紧张局面，政府有

关部门告诉我，他们尽了最大努力，也只能从下年开始向我提供旅馆中一个单间。既要作家人居室，又要作我的办公室，一个单间显然是不够的。

中国作为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给新闻记者造成了许多特殊问题。我所耳闻目睹的不少真知灼见和奇闻轶事，都借助于那些我不能道出其姓名或描绘其细节的人们，原因是害怕给他们招来麻烦。然而只要情况许可，我将竭力指名道姓，而书中只要出现有三个音节的中国人姓名，如雕塑家王克平，那即是真名实姓。但凡有我认为必须加以遮掩之处，要么隐姓埋名，要么造姓化名，如第五章中的年轻请愿者力华，或第十章中的兵等。在某些时候，我对朋友们的生活细节做了些微小调整，抑或变换了他们的居住城镇名称，抑或改变了他们的工作职业，目的当然是出于爱护，也许我上边的考虑是多余的。然而，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考虑正说明我所转述的他们的见解和述评的真实可靠，没有经过任何人为的揉合加工。

本书旨在供普通读者阅读，但愿这方面的专家能够谅解我为使普通读者易于理解而采用的一些传统作法。诸如对于中国教育体制的术语，我并没采纳中国的初中和高中两种称谓，而是分别译为西方人较为熟悉的初级高中和高级高中。对于中国人的姓名，也按照《纽约时报》的办法，采纳共产党人的汉语拼音方案拼写，只是个别人胜地除外。这样，中国首都就仍用Peking，而不是汉语拼音Beijing。同样，按照《纽约时报》的规矩，对于中国大陆以外的人名地名，我仍沿用旧式拼写法，如香港拼成Hong Kong，而不是汉语拼音Xiang Gang，余此类

推。

我本人当对书中的观点负有毫无旁贷之责，但此书之能问世，全仗下列诸位的帮助提携，我愿借此机会深表谢意（致谢名单略——译者注）。

弗克斯·巴特菲尔德 于马萨诸塞州威斯利

1982年2月1日

目 录

引 子	第一印象	1
第 1 章	人们叫我“洋鬼子”	27
第 2 章	大家生活在单位里	47
第 3 章	级别后面是什么	82
第 4 章	关系、后门——铺天盖地	111
第 5 章	一本难念的经	145
第 6 章	男男女女这样相爱	166
第 7 章	妇女顶了半边天	210
第 8 章	啊，两亿青少年	232
第 9 章	听话，乖孩子	264
第 10 章	他的爸爸是将军	291
第 11 章	固守家园的亿万农民	308
第 12 章	工人捧着铁饭碗	339
第 13 章	古话说：衙门八字开	369

第14章	卫东的彷徨	400
第15章	有一位雕刻家	415
第16章	情报·交流·小道消息	432
第17章	密不可宣的种种机密	463
第18章	西部劳改营	491
第19章	人们盼望法制	519
第20章	必然要走下去	534

引子

第一印象

这是1980年元月，一个天气寒冷、阴云密布的白日，我抵达千疮百孔的上海火车站，等候夜班快车前往北京。在我即将登上的车厢门边，站着一位身着蓝色制服的女乘务员，一根粗短的辫子从头上戴着的圆帽后高高地翘出。我的车票是头一天在国营旅游机构中旅社办事处买的。那场交易颇像是一种例行公事，我仅出示中国警方——公安局签发的绿色通行证，再交付车票费，柜台后坐着的中年妇女眼皮没抬、二话没说就递给我车票。这对于我无疑是个天大的吉兆。我之所以不坐飞机，而要坐20个小时的列车前往北京，是因为盼望能在车上结交一些不顾官方规定，愿意同外国人交谈的中国人。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列车上也是避开邻人和同事耳目的极好场所。乘车旅行是常住中国的西方人为接触中国百姓不时采用的策略，且成功的可能性极大。

然而，一当我走近那列蓝绿色的列车旁，那位女乘务员宽阔的面庞上立刻绽开了笑容，“欢迎您乘坐我们的列车，”她的口气显得过于殷勤，“您是美国记者，是吧？”

这与其说是在询问，不如说是在公布。我手里提着公文包，顿时瞠目结舌、呆若木鸡，恨不得有条地缝能钻进去藏身。身份一暴露，我的希望就难以实现了，而这位乘务员接下来的举动更进一步摧毁了我的希望。她约莫二十好几，身材矮胖，加上制服里穿了几件毛衣和衬领，体形更显得臃肿。她领着我走进车厢，进了卧间。于是靠着卧间门边裂缝，只听她在走道中对旅客们高声宣布：

“我们车上有位外国人，是美国记者，会说汉语，而且讲得很流利。”我琢磨，她这是在告诉众人对我保持戒备。

随后，她又转身来关照我：“要有什么事，请随时告诉我，我姓丁。”丁的谐音在中文里是钉，意为坚硬之物，如铁钉。因而我似乎觉得，她既像海军陆战队中那种钉是钉、铆是铆的军士级教练员，又像情绪欢畅、熬更受累的列车乘务员。

不过，我仍然鼓足剩余的勇气，询问丁为何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

“对每位乘客的情况，有关负责同志都会通知我们，以便让我们做好接待准备，”她这样回答说。

丁的接待准备包括了确保我一人享用拥有4个卧铺的单间。这虽然舒适，却违背我的旅行愿望，令人倍感失望。但我还不至于完全绝望，以为在餐车里能与人相交，于是又请教什么时间可以用餐。

“等其他乘客吃了饭，我会叫您。这样您会感到方便

些，餐车不会那么拥挤，”她轻快地回答说。

情况的确如此。等她最终叫我时，餐车中只剩下两位中国乘客，正在喝汤，那是中餐的最后一道饮食。他俩一看见我，急忙几口吞下残汤离席而去。我孤坐在那儿，自感如瘟神一般，邻人唯恐躲避不及。列车穿行在长江流域的肥沃田野之间，冬日的午后天色昏黄、空气干涩，这趟长途旅行看来是误入歧途了。

几个小时以后，列车抵达南京，在这座国民党人的昔日都城，我踱步下车，活动筋骨。只见那位姓丁的列车员早已站在月台上，又提水桶又拿抹布，准备擦洗车厢，她堪称遵守工作纪律的模范。旁边站着一位乘客，早已谢顶，但仍依稀可见一缕银丝飘在顶下；看那样子已到古稀之年，也在活动着僵直的四肢。我想出一句尽可能平淡无奇的招呼话语，凑上前问他是否也去北京。

结果，竟得到干净利落的英语答复：“对呀，你也进京？”这真让我喜出望外，于是壮着胆子又问：“您在哪儿学得这么好的英语啊？”

“哈佛大学，我上的是哈佛大学医学院，住在坎布里奇。那是1949年解放以前的事了。”听陌生人这一解释，我可算是有缘了！我也是哈佛毕业的，而坎布里奇就是我的故乡。当大家再度登车时，这位医生已主动要来陪我闲坐了。

医生身着长袖高领的传统衣服，领高用以御寒，袖长可以护手，他双手深深插入两只袖管内，作出一副中国老年人常见的姿势。“自从1949年以来，我这是第一次和美国人谈话。就在不久以前，我要是和你说话，还怕别人看

见呢。可现在好了，我觉得可能没事了。”这样聊着，天色渐渐到了黄昏，他的话题也转向了过去30年的经历——

他和其他许多曾在海外求学的朋友们一样，于1949年返回了中国大陆，因为他自己觉得应该爱国，应该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医生解释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敬佩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旧中国太落后、太贫穷、太腐败，每天都少不了乞丐饿死街头。”50年代初期是充满了乐观情绪的年代，在共产党领导下，现代工厂大批涌现，农村实现了集体化，中国通过在朝鲜抵抗美国的战争，向世人展示了自己的力量。

然而，医生的生活到1957年却发生了根本改观。在大鸣大放的运动中，毛泽东鼓励更大程度的言论自由，邀请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批评党的缺点，因为毛泽东确信，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已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我完全相信了毛泽东的话，我觉得他是真诚的，”医生这样回忆说。因而当上海市政府邀请他去参加大会并发表意见时，他提出建议说，国家的医院中的书记大多是由上级安排的军队干部担任，这些人参加革命前是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的农民，难以领导好医院工作。因而，共产党应将他们撤换，或者送他们去学习深造，他进而敦促应将各级医院交给职业医生负责。但是，几周之后毛泽东改变了他的政策，发动了反右运动。

“他们照自己的说法，给我戴上了帽子，我那帽子就是右派分子。”医生于是被弄去批斗，那是一种群众集会，挨批斗者遭受众人咆哮、辱骂，甚至毒打，直到受不了折磨最终承认了自己的所谓罪行才能罢休。“他们把这

叫做自我帮助会议，意思是帮助我转变态度，”医生继续讲着，没有丝毫的添油加醋，更没半点对自己的怜悯同情。在遭受这种待遇一个月之后，他被逮捕入狱，最后又被送往山区的某个劳改营，那儿离上海有好几天的汽车路程。他在劳改营中干的是采石场砸石块的活儿。

他从劳改营中放出来时刚好遇上文化革命的风暴。这场冒险运动，既是为了清除党内官僚体系中的反对派，也是为了防止国家不再堕入1949年以前那种民心涣散、政治腐败的境地，当然，这纯属伟大舵手的担心。于是，医生又再次被捕，原因是右派分子帽子使他很轻易地成为医院里造反派们的瓮中之鳖。他被监禁在医院手术大楼的地下室里，每日遭受木条抽打，持续数月。而且这一次，他的家人也倍受牵连，当医生的妻子被剥夺了替人治病的权利，下放到卫生所打扫环境卫生和厕所清洁；正在上卫生学校的儿子已经以全国优异成绩考上大学，眼看前景光明灿烂，却被下放到东北地区的边远山村当了干体力活的农民；至于正在上初中的女儿，也因为他这个反革命父亲而被迫辍学，分配去汽车修理厂当了工人。

随着“四人帮”倒台、包括那凶悍的遗孀江青的倒台，医生于是恢复工作，再度担任医院领导。然而，他仍然生活在过去折磨他的人之中，为了工作，他不得不天天和他们打交道。“实在令人可笑，他们有些人现在一遇到政治学习就厌烦，就打瞌睡。对我们大家说来，革命已经完结了。唯一的结果是大家都学会了玩世不恭，这对于中国太惨痛了！”

列车上的这段插曲在我的中国经历中十分常见。人们

似乎可以感受到，中国存在着两个社会，一是官方的描绘，诸如那位乘务员似的面孔，常出现在党的机关报上，人们笑逐颜开、公而忘私、全心全意地献身于革命事业。另一个社会则是半掩饰着的10亿人民的内心世界，它经历了长达30年的演变，其间不乏精神面貌的焕然一新，但更多的是医生遭受过的那种心灵创伤，这是由于肉体摧残、时间浪费和人格侮辱所造酿成的。从5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开始，百花齐放运动、大跃进热潮以及随之而来的食物短缺、6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持续到70年代的派别武斗，这些悲剧性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留下了后遗症，导致了人们的情绪冷漠和希望幻灭。随之而去的是美好的理想，是革命的干劲，是宗教般的狂热——而这些却是共产党人早年的根本特征。

我曾阅读过西方游客在中国逗留数周后所写的各种观感，虽然描述细微，表现的却是官方社会。这些外国人按照官方指定的旅行路线，造访经过明显筛选的几十个城市和农村公社，回国后即向世人保证，中国确已消除了犯罪现象、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有些美国人甚至说，在中国旅行的外国人若将用废的剃须刀片和圆珠笔扔进废纸篓，哪怕次日已离该地，也会令人惊异地送还“失主”；中国城镇的成百上千万中学毕业生也心情愉快地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积极奔赴农村，将后半辈子献身于农业。1979年美中关系正常化和美国新闻机构在北京开设办事处之前，我曾常驻香港4年，专门报道中国消息。记得美国青年国际党领袖杰里·鲁宾曾在游览中国几周之后造访我的驻港办公室。据他说，他为“全体人民之间的真诚敬爱精神”感

到欢欣鼓舞，“你可以从他们眼神中看出这种精神，他们不像贪图物质享受的美国人那样，为金钱忙忙碌碌、忧心忡忡。”我询问过他，是否对自己的耳闻目睹发生过疑虑？他承认的确如此，曾有过短暂的怀疑，“有一天坐在公共汽车上，我突然想到，这些人要么是在说真话，要么是在愚弄我。但后来我逐步确信，他们说的是真话。”

美国人在剖析苏联时，是不大可能这样保留他们的苛刻批评和敏锐判断的，因为他们已经知晓斯大林的为人，已经读过索尔任尼琴的著作。而对于中国，他们在疑虑的同时，又不乏偏爱。我似乎觉得，这是中国在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身上施展的某种魔法产生了效用。这种魔法其实也并不新鲜。早在18世纪，法国的哲学家们就曾设想，中国古代圣人孔子亲创了一套非常完美和谐的政府制度，而中国人一直将其沿用至今。到了19世纪末期，伴随着传教热潮涌入美国的大小教堂和各个校园，美国人充满了梦想，要让中国皈依基督教，要借助那一代人“拯救”中国。后来进入本世纪初，倍受所谓生产过剩幽灵困扰的美国人又陡然新奇地发现，中国是一个宏大的市场，四万万消费者将会买光用尽美国厂商的剩余产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同日本战斗，寄希望于蒋介石，以为他是英勇的民主斗士，会率领中国加入自由世界。所有这些有关中国的印象，与其说是冷静观察现实的结果，不如说是我们一厢情愿的盲目幻想。之所以产生这些印象，的确是由于我们文化方面某种程度的自高自大，不情愿从中国人看问题的角度来观察客观事物。

然而，我在北京居住越久，对问题的另一方面就看得

越清，我看到了中国日常生活的艰辛、人们行为的荒唐和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在那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与若干中国人逐步建立起真挚的友谊，他们促使我认识到了中国人的真正智商，即如何发明各种办法来漠视、逃避、反抗或挫败强加在他们头上的“革命”。简言之，即如何求生。

在这个过程中，我不得不陆续更改以前对于中国实情的许多认识。我曾以为，共产党的3,800万党员肯定是这场革命的中流砥柱，因而绝没想到会遇上那么一位精力充沛、性格开朗的中年党员，她还是政府的基层机构街道办事处的女支部书记。某日黄昏，当我爬上五楼造访她的家庭时，竟发现她在阅读《圣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共产党内部自有规定，是信仰无神论的。我当即问她是否担心招致麻烦。她解释说，最近有个45岁的男人前来登门拜访她，宣称是她熟知的某位妇女的朋友。闲谈之中，那男人问这位党支部书记是否信奉上帝和读过《圣经》。虽然这是一种危险之举，党支部书记还是深为他的虔诚信仰和坦率言词所触动、所吸引。他为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饱尝了10年铁窗滋味，现在出来仍然无法就业。

党支部书记故意问他：“要是上帝真的存在，他难道会眼睁睁地看着你受那么多苦吗？”

“这你无法明白，”他回答完这一句，居然马上宣称自己已足够幸运的，“上帝赐予了我一个了不起的妻子。我入狱以后，公安人员要她同我离婚，以划清思想界限，但她说什么也不干。眼下我找不到活干，她虽然在厂里当工人，却一人挣钱供养我俩。”

最后，这位党支书收下了他主动送给的中文版《圣经》，那是由香港印刷出版、再偷运进大陆的。据我的观察，党支书当时正读得津津有味。她告诉我：“你还不知道呀？基督教眼下在中国很时兴呢。”如果她是政治上的持不同政见者，我当会怀疑她这些话的真实性，但她是街道党的负责人，就不能不令人信服了。

我以前也曾以为，鉴于毛泽东终生对革命事业的执著追求，中国肯定已能提供较大的社会流动机会，提供人们施展才能的天地。但是我在中国发现，与美国、日本和西欧相比，中国的思想更为保守，等级更为森严。中国的年轻人中能进入大专院校的只占3%，而这是人的事业得以成功的少数途径之一。相形之下，美国的比例是35%。中国人也无力挑选自己的工作，他们只能等待国家的安排；而一旦安排了工作，也就很难再调换职业。至于中国的农民，逃避繁重的劳动枷锁的机会或许会少于他们1949年以前的祖辈、父辈，原因是户口制度有严格规定，不许农民随便离开乡村。

某位在外贸公司工作的年轻官员近日初次访美归来，他显得浑身是劲、说话急促，谈到美国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居然说是机会均等的观念。

“就是开电梯的，只要拼命干活，攒足了钱，也能独自开业，当上百万富翁。”年轻官员的这番述评是在北京饭店的一次午餐上道出的，我当时刚到中国，正栖身在那家饭店。

我为了开玩笑，就说中国可以发生逆向过程，即以前

的百万巨商现在变成了开电梯的。一听我这话，他双眼直瞪着我默不作声，我顿时担心他会将我的话视为往中国脸上抹黑。

他终于开口了：“不，他们决不会让百万富翁去开电梯。那活得留给某个替公安部服务的人干，好让他监视都有谁进出过大楼。百万富翁得被弄去打扫厕所。”

毛泽东本人是非常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的。因而我就不能不吃惊地发现，共产党内部竟分为若干等级，而且在这个所谓的无阶级社会中，那些1949年被划为地主分子的儿孙们，仍然要为父辈祖辈的污名耻辱受过，被排斥在参军入党、乃至乡村的合作医疗保险之外。我还惊异地发现，自己结交上的某些中国朋友家中居然雇有佣人，却又攀亲附戚地委婉称之为“阿姨”。我以前的确不知道，党政官员们拥有专属的市场、书店、医院和休养设施，为自己提供食品和服务，这是“人民群众”望尘莫及的。这些特权大多经过官方的精心保密加以掩饰起来，以维护表面上的平等。我也只是在自己中国之行的末期，才得以发现当时的共产党主席华国锋的住所。我结交的某位朋友是人民解放军中一位将军的儿子，他主动陪我驱车前去。结果发现，华的住所位于首都西北部，是一座占地宽敞、筑有围墙、禁人通行的院落。院子长近400米，宽近300米，为7.5米高的灰色钢筋混凝土墙所围，墙头筑有射击孔。中国人将这院子称为“8号楼”，据他们说是因为工程造价为800万元人民币，当时合530万美元。对中国而言，这够得上一笔惊人的款项。（我这是按北京官方1981年规定的1美元兑1.50人民币计算。但绝大多数西方商人和外交人士

均估计人民币实际只值其一半。北京似乎对此已间接承认，因为它允许中国拥有产品出口的工厂降低人民币汇率做价，否则，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售价将会过高。为简便起见，我仅沿用官方汇率）。

中国的工业生产自1950年以来，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这是我时常阅读北京发表的统计报告知晓的，但也不时为报告中提到的工厂的粗制滥造和经济管理部门的瞎指挥所惊讶。新华社1981年披露，石油部为铺设一条从天然气产地四川省到长江中下游工业地带，横跨中国大地的输油管道，竟浪费国家资金达好几十亿美元。该部的高级官员们为了争得铺设管道的投资，有意夸大四川的天然气储量，极力置基层技术人员的不同意见于不顾。结果，当最后弄清天然气储量的确不够时，这项工程被迫半途而废。

北京依靠庞大的公安部门和复杂的诸如街道居委会那样的机构来实施对全国的治安和管理，这对外界已不是什么秘密。但就我个人而言，却是通过亲身遭遇才领略到警方的无处不在的。一天傍晚，我走出北京饭店，想到外边散会儿步，一眼看见前面阴暗处有个瘦削的女人身影。那是寒冷的2月天气，她穿着一件黑色大衣，围着黄色围巾，脸上蒙着手术用的大口罩（北京人常喜欢戴上它预防冷空气和灰尘）。当我超过她后，下意识地感到她在跟着我。这样只走了十来步，她就赶到了我身边。

“你到哪儿去？”她这样问我，对于一个中国人，这可谓出人意外的大胆之举。

“散散步，”我答道。

“我可以陪你走走吗？”

“当然可以。但难道你不害怕被人看见和外国人在一块吗？”我问她。

她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怕。随后，她透过那只大口罩一口气讲出了自己的遭遇。我只见两道细眼在闪动，只能听懂她所说的一半。她那副样子，既像是神经紧张，又像是正发高烧，我难以辨清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

据她讲，她今年23岁，初中毕业后曾上山下乡，那是将城市青年变成农民而实施的乌托邦计划。她下乡那儿的生活实在艰难，最后决定非法潜回北京。可家中父亲已经退休，经济来源很少。由于她在城里没有合法证明文件，所以找不到工作。走着走着，她居然凑过来挽住了我的手，这更是中国人的一种不凡之举。我开始担心她可能是拉客妓女。也就在那一瞬间，我注意到有人在跟踪我们，像是个穿绿色上装的年轻人，一头短发，还戴着太阳镜。虽然夜光昏暗，借助微弱的路灯却仍可看清。那年轻人有意落在后面几步之遥，继而大步赶过我俩，再放慢步子掉到后面。最后，他径自走到前面，在人行道上挡住了我们的去路。他们难道是一伙的？我难道是被诱入了中国人的抢劫团伙之中？这种念头猛然闪现在我的脑际。

“你干吗的？”他逼视着我。

“你干吗的？”我针锋相对。

“你和她在一块儿干什么？你们是什么关系？”他没有道明自己的身份，反而继续逼问我。我告诉他，我俩是朋友。也就在那时，另外两个年龄大约有40多岁的男人也走了过来。其中一个身着公安人员当时穿的蓝色制服，头上还戴着栽绒帽。我害怕被劫的担心立刻烟消云散，但取

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恐惧。

那穿警服的男人出手抓住我这位新相识的手臂，拉扯到路旁商店的墙边，开始审问起来。“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你是哪个单位的？”随后，相继从黑暗中走出六、七个警察，有穿制服的，也有穿便衣的，将我团团围住命令道：“你回家去，快离开这儿！”

作为一个普通美国人，我强烈地感到自己有义务保护这个女人，不论她是干什么的；而作为新闻记者，我更迫切想弄清楚她的真实身份。因而，当警察们押着她折身朝北京饭店方向走时，我紧跟其后，想看个究竟，这可招来两个警察回身将我揪在墙边。

我质问他们：“我们究竟干了什么错事？难道不准外国人和中国人说话？”

他们最初只是眼睁睁地盯着我，或许是对外国人过问他们的事感到迷惑不解。最后还是两人当中年轻的那一位开了口。他约莫20来岁，一说话就喷来一股大蒜味，口吻也是模棱两可的官腔：“要在白天，这样谈话是可以的，但夜晚不行。”他说话这当儿，那女人已被带过拐角，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我于是不能不承认自己的努力失败了。

尽管警方的存在到处可见，我却获知他们的疏忽也的确不少。在位于华北平原上的河南省会郑州，一伙手持AK—47型冲锋枪的歹徒强占了当地人民银行的主要办公楼，杀害一名卫兵，劫走价值15万美元的资金。这是某个与来自河南省的中国妇女结婚的美国人告诉我的，他还说，就因为强盗们的这一壮举，他们简直成了当地的绿林好

又。这些人漠视警方的加紧侦破，在全城各地贴出海报，上面写着：“你就是将河南全省挖地三尺，也休想找到我们！”

在文革后期，中国的白领犯罪也不断增多，党内各级干部贪污腐化现象时有发生。中国东北某县煤建公司48岁的女出纳员王守信，据报章揭露曾秘密勾结一伙党政官员，贪污金额约值32万美元。据说王本人曾以高档裘衣、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电风扇及鸭绒被贿赂200多人，以求为她的阴谋开绿灯。

考虑到中国警察机器的庞大和共产党公而忘私的盛名，我当时难以理解为什么会存在刑事犯罪和贪污盗窃这样的异常情况。然而，我所认识的一位研究生朋友却尽情嘲笑了我的天真幼稚。她告诉我，她本人常常“白日做梦”，这也正是她能学会说一口优美英语的原因。由于其父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她上到小学六年级就被迫辍学在家。

“但我找到了一本英语教材，花两个月硬啃了一遍。”这是我俩驱车在北京闲逛时她告诉我的。我驾驶着《纽约时报》驻京办事处的黄色本田牌公车，这是与中国人摆谈的极好方法，不会受到监视。“那时，我没别的事情可干，只能白日做梦，独自一人梦想和人用英语对话。”终于在“四人帮”倒台不久的1978年，她父亲恢复了工作，她也利用自己的英语能力考入了一所研究生院。

这种由人生需求所推动的玩弄小聪明的嗜好，已将中国经济冲开一大缺口，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走后门”。人们用走后门方式来打破行政部门的繁文缛节和中央计划经

济的过份限制。新华社的一个年轻记者穿着一身整洁的毛式服装，向我详细解释了走后门是怎么一回事。他举例说，附近市场上买不到豆腐时，家里父母总是让妹妹出门想办法。因为妹妹以前的同班同学中有在菜市场工作的，他们往往在柜台下藏有存货，那就是妹妹的后门。这位年轻记者本人高中毕业后也本应该响应号召上山下乡，但由于父亲是军队将领，而与父亲一起在战争年代患难与共的某位老战友当时正在新华社负责。于是，这位老战友就主动在自己的单位里为这年轻人安排了一份工作；而事过不久，老将军也在军队中为战友的女儿寻到了一个舒适的空缺，以作为交换。我的另一个朋友某次抬起他的手腕，向我展示中国新产的一种手表。这是某手表厂以试制品为名送给他父亲试戴的，而实际上，这是下级为了讨好上级或亲朋而以紧俏商品进行的贿赂。他家里还接受了其它的试制品，诸如电视机和电冰箱，这算得上是中国的奢侈品了。他接着说，这种试制品搞法在中国太普遍了，以至于有些人开玩笑说，也许将来火葬场也要搞出“试烧品”，原因是中国的各火葬场焚化任务重，排队登记的客户太多。我这个朋友正在申请出国护照和签证，以便到美国留学。他不认为自己会遇上什么麻烦，因为他在公安部有后门，那就是他叔父。

这种对中国存在着两个社会的看法，即正规的社会制度和不正当的、时常被掩盖着的个人生活并存的想法，与我在《纽约时报》的同事赫德里克·史密斯常驻苏联时所发现的一样，他后来写了《俄国人》一书，对其观点加以极精彩的叙述。上述那位在火车上相遇的从上海来的医生

认为，两者的一致并非偶然巧合，他读过《俄国人》一书的中文译本。北京曾在党政官员内部阅读的机密刊物上加以连载，但官员们却私自将刊物传递给了亲朋好友。政府之所以要译出内部传阅，大概是为了说明苏联的糟糕状况。但医生本人却不这样看。他说，实际上，对中国的情况也可以写一本这种书，遍读《俄国人》全书，没有使他感到惊异之处。中苏两国均由强有力的行政部门所管理，而管得太多太死，窒息了个人的创造精神，妨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但他也指出，中苏两国毕竟有着重要区别，两国人民的历史是迥然不同的。在像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和罗马这样的世界上伟大的早期文明古国中，中国是唯一的幸存者。这使中国拥有了具有两千多年历史延续的语言、文化和国家结构，这也同样使中国的历史成了一种有形的力量，而并不仅是中小学教材上的文字记述。毛泽东本人喜欢将自己比作秦始皇，因秦始皇曾于公元前221年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还修筑长城、焚书坑儒。尽管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也把他的政府办事风格比作艾森豪威尔的行政当局，但美国人决不至于退回到凯撒大帝或汉尼拔将军的时代去寻找灵感。中国是一个充满了历史气息的字眼，也是中国人为之感到骄傲的字眼，它的中文本意为“中央之国”，即已知文明世界之中心。

历经两千余年养成的这种风俗习惯，是不那么容易为从西方介绍进来的共产主义所淡化的。我和医生没有理会乘务员那满脸的不快神情，径自来到餐车吃晚饭。在餐桌上，他发现了中西之间的一种简单然而深刻的区别：我照着菜谱各取所需地点着自己的菜肴，各从自己的分餐碗

盘中取用食物。中国人吃饭通常是大伙一块儿点菜，然后共用盘碗中食物。菜肴置于餐桌中央，众人围坐四周，各自使用筷子从盘碗中夹取食物。我们西方人倾向于照顾个人，尽可能地使个人心满意足，尽可能地适应个人的口味嗜好，我们认为这种作法理所当然。但中国人行为的立足重心则在集体或家庭。中国一科学家访美时和一美国人家同住，回国后同我谈到感想时说，当发现美国家庭的小孩各自都有自己的卧室时，他真的大吃了一惊。他在自己家里习惯于和家人同吃同住，到了美国，孑然一身、独居一室，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无法想象，许多独居院落的美国人是如何生活过来的。

群体意识在中国人观念中占压倒优势，这也许具有政治性作用。这种意识使人更易于适应循规蹈矩，也使人更易于接受领导的权威，因为中国人俗话爱说“树大招风”。当然，我也发现许多中国人试图开拓自己的个人生活境界，少受各种束缚。对于接吻和跳舞这样的活动，政府都感到忐忑不安，态度极为拘谨。然而我认识的大多数年轻人都私下里承认，他们与配偶在结婚之前早已共度良宵。我曾听一位护士说过，她工作的那家医院赚钱，主要是靠了秘而不宣地为未婚女子人工流产，因为诊所做这种手术一般要通知病员单位，那会毁了女子们的终生名誉。在这方面，中国人同样面临着许多美国人那样的生活难题。一位年仅十几岁的女孩在我面前大发牢骚，说父母一点儿也不能理解她，她大概是过早成熟了。一位30岁的妇女抱怨说，她丈夫整天只知道工作，对她一点也不动情。晚上下班回家，一要吃饭，二要与她作爱，三就是睡觉。她

想要学习知识、充实生活、发掘自己，如果可能，还要出门旅游，还要进研究生院。这与西赫的著名小说《岁月流逝》中描写的30年代美国妇女的志趣极为相似。最后，这位妇女终于依恋上了另外的男人。

中国人强调群体，忽视个人的观念或许来源于国家的经济历史和状况。多少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就一直在水田中种植稻谷。这种高度集约化的耕作方式需要大量的人力，同时也产出较多的收成，足以供养密集的人口。直到上个世纪末，西方的农业在这方面简直难望项背。这种耕作方式的结果在中国到处可见，就在我们乘坐的列车穿行于南京北面的乡村大地上时，完全可以看清每过不到一公里就有一个大村落，村中的房舍全由土墙砌成。经过同样远的距离，顶多能看到为一团树林所包围的独户农家。中国大地上人口的密集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微妙地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观念。

地理环境和历史因素也促成了中国今天所面临的严峻局面。就国土面积而言，中国仅略大于美国（分别为370万平方英里和360万平方英里）。中国本土，西自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沿岸，约2,500英里；北起阿穆尔河，南到中越边界，约2,000英里。但这片土地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周边地区，多为荒无人烟的高原和沙漠，诸如海拔3,000多公尺高的青藏高原和世界上最为荒凉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实际上，可耕地仅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0%，即人均不足1.5亩；中国要用这点土地来养育10亿人口，而10亿人口几乎是全世界的四分之一，比美、苏、西欧的全部人口还多！

这样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的地理和人口状况，难以使人真实地感受到其拥挤程度。作为一个西方人，只有亲临其境，才能体验到中国人口众多、无处不有的意味，共产党人将这一简单事实用“人民大众”概而谓之。相形之下，到过美国的中国人势必得到相反的印象。一位中国记者对我说：“我最先注意到纽约的是，大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无论是谁来管理中国，都会为这样庞大的人口伤透脑筋，感到无从管理。

在历史上，中国人一直局限于定居在以华东、华中地区为中心的一块正方形地带，其面积约相当于美国本土的一半。而这一地带的外围地区多稀疏地定居着许多少数民族，他们今天已经处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治理之下。在东北有满族人，往西是蒙古人，在新疆是穆斯林维吾尔族人，往南有藏族人，正南方向有壮族和傣族人，后者系泰国土著的血亲。从气候条件看，中国的最大地理区别是寒冷干燥的产麦北方和温暖潮湿的产稻南方，二者分界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中点，即北纬33度线。如果要加以比较，则可以说中国所处北纬地区低于美国和欧洲。位于华北的北京刚好圈于长城之内，与美国费城和西班牙马德里处于同一纬度线上；而位于中国南北中点的上海则与美国的新奥尔良和埃及的苏伊士处于同一纬度；至于华南的广州，位置恰好与古巴的哈瓦那和印度的加尔各答相当。

自1949年以来，共产党人加强领导、艰苦奋斗，终于使粮食产量翻了一番，但由于处于和平环境，加上医疗卫生工作的成效，人口在这段时间内也几乎翻了一番。中国人口增长到5亿之众，曾经花了4,000年有文字记载的历

史，而从5亿增长到10亿，却只用了30年时间。在50年代和60年代鼓励生育的时候，毛泽东曾拒绝接受人口过剩会带来危机的警告，认为是资产阶级蛊惑人心的宣传，还清洗了力主控制人口增长的最著名经济学者。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条，强调人口越多，生产的价值越大。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这种失算恐怕是共产党人酿成的最具有灾难性的错误。因为西方学者最近的研究表明，中国目前人均食物消费量只及50年代中期的水平，与二次大战时期相比没有多大增加，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讶。这些研究还说，中国人均卡路里日平均摄取量只有2,000到2,100大卡。前者为印度的水准，后者是巴基斯坦的指标，而美国人的日摄取量是3,240大卡。使中国的情况更为严峻的是，其膳食中四分之三的蛋白质和六分之五的卡路里均取自谷物类食物，如大米、小麦和玉米，而不是营养成分含量高的鲜肉、鱼类、鸡蛋、蔬菜和白糖。在亚洲国家中，也只有孟加拉国和老挝的膳食接近这种比例。而分配的不均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食物短缺。1978年我正驻香港时，一份香港出版的刊物披露，接受粮食配给的2亿中国农民年均每人所获不足150公斤。该刊物说：“这意味着，他们处于半饥饿状态。”

还有一种令人费解的现象，应该说是一种矛盾。鉴于中国已经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也爆炸了氢弹；鉴于中国拥有优美典雅的艺术和丰富多彩的文学，人们就很容易忘记中国仍是一个贫穷之国，在许多方面还属于第三世界，不属于超级大国范畴。我本人不时为中国发展的这两种明显的差距所不安。按目前的工业能力，中国年产电视机200万

台；然而在西南部的四川省，我亲眼目睹了四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像老黄牛一样地拖拉着板车，载着重达好几百公斤的钢筋混凝土条，十分艰难地爬着陡坡。我也曾经和一位中国飞行员一起吃过饭。他已接受完毕充任宇航员的训练，然而他的全家却仍住在既无厕所、又无自来水的房舍中。他们只能使用公共厕所，除了一个坑，就只有坑旁两块供人蹲着的脚踏石，且厕所离房舍足有30多公尺远。那种熏人的恶臭我有所领教，不能不令人掩鼻。北京大学身为中国最有名望的两所高等学府之一，却因为教育投资吃紧，学生饭堂既无桌椅，也无碗筷。学生们只好自带餐具，打上饭回寝室吃，这种状况已不时招来校园内的抱怨之声。

但是，最大的差别还在于大城市和乡村之间。中国的乡村居住着8亿农民，占了全世界农民的三分之一，许多乡村仍处于上一个世纪的状况。一位中国教授在文革后被派往华中地区的安徽省，那儿离我们在列车上看见的用土墙修成的村落不太遥远。教授对我谈了安徽的生活情况。他回忆说，农民家里的什么东西都是用泥土做的：土墙、土地、土坑，甚至坐的凳子也由泥土垒成。附近的山林早已被伐光，村民们没有燃灶之薪，只得由老婆孩子外出拾掇荒草麦秸，结果将所有沃土之物一扫而光。教授在那儿呆了一整年，没有沾过荤腥。他借住的那户农民，竟连火柴和肥皂也买不起，大半年里锅中不见菜油。那是中国人膳食的最基本物品。某一日，邻里一个75岁的老太婆仰着满是皱纹的脸不无羡慕地对他说：“就连你脚上的汗毛也比我们的头发长得粗壮。”

共产党人基本上消除了1949年以前一直折磨着中国的

极端贫困和饥饿状况，这是一桩了不起的伟大的业绩。最清楚明了的指标就是，人均寿命从1949年解放前的32岁提高到了目前的62岁，这样的创举在发展中世界只有极个别国家才能做到。然而，中国仍然存在着很大的贫富差距，而这种差距又时常为居住在相对舒适的北京的外国人所忽视。

我妻子巴巴拉有次同她的澳大利亚朋友苏·沃尔克前往西安访问，就发现了这一点。西安位于北京西南约1,000公里处，曾是中国历史上汉、唐两朝的古都，时称长安。她俩在那儿接受中旅社导游的建议，前去该城有名的五一餐厅吃饭。她俩一在餐桌旁的短凳上坐下来，就觉得周围气氛令人难受：餐桌上杯盘狼藉，夹杂着残羹剩饭、流汤滴水；桌上方苍蝇嗡嗡，脚底下碎骨铺路，显然是前一轮吃客自己清理餐桌，只图方便，随意抹骨下桌所致。一个身着肮脏罩衫、戴着白色变黑工作帽的服务员不客气地向她们宣布，餐厅可供之物只剩包子一样。那是一种内含白菜和肉末的蒸熟面团。她们只好坐等食物上桌，不想一下子围上来八个穿着已经发白的蓝色工作服的食客，还各自挪来凳子在他们对面坐成个半圆形，等待着观看她们如何进食，其中有人甚至在剔着牙齿。“我们当时只觉得自己成了别人饭后消遣的景物”，巴巴拉回北京后这样对我说。

食物终于上桌了，还伴随有一大碗鸡汤，上面漂浮着几片茼蒿菜，这也是该餐厅能端出的唯一饮料。两个妇女尽量吃了一些，刚想起身离去，“一只肮脏起皱的手忽然摊在餐桌上，还没等我们看清这只手属于一个头发蓬松、

衣衫褴褛的老年乞丐，服务员就发现了她，随即吆喝她出去。她朝外走了几步，折转身靠壁蹲下，寻找着另外的机会。”

机会立刻来了。巴巴拉的朋友觉得最好还是马上离开，起身将中国丝制上衣搭在凳上，径自去售票处付费了。那老年乞丐见机立刻跨到桌前，与此同时，另一个同样穿戴破烂肮脏的乞丐也出现在餐桌对面。

“他们竟为争夺我们剩下的食物打起架来，那老年乞丐抢到三个包子，紧紧地捏住不放，弄得汁水顺着袖子往下流；另一个抢到那碗剩汤，倾倒了許多在苏·沃尔克的上衣上。他俩不停地争吵冲撞。最后，还是服务员和几个顾客将他们拉开，但各自仍然抓住自己的收获不放。”巴巴拉事后回忆说。

餐厅服务员们怕这样闹下去不好看，极力劝巴巴拉和她的朋友趁早离开，可就在那时，她俩又看见两个乞丐为一个中国人刚吃剩的食物争夺起来。

然而，她俩的这种经历并没有深深地打动我。真正使我感触很深的，是中国朋友叙述的他们在过去30年的各次政治运动中所遭受的折磨，尤其是在最为混乱的文革时期所遭受的苦难。一位年轻姑娘诉说过，她的全家如何被从北京赶到深山村落，她如何眼睁睁地看着母亲被人用乱棍打死，父亲被人打得昏迷不醒，其原因仅仅因为被打成了“反革命”。另一位20多岁的妇女回忆了她感受到的痛苦心情。1966年那会儿她才十几岁，却在群众大会上当着父母的面主动揭发父亲是反革命，而她当时坚信，那是热爱毛主席的实际行动。还有一位中国外科医生对我说，因为被

打成“美国特务”，他那当总工程师的父亲和母亲双双被折磨至死，而他也被发配到西北部的新疆——那是中国类似西伯利亚的地方。

中国官方新闻机构勾划出了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的轮廓。据《人民日报》说，从1966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之时，有一亿人遭受到政治骚乱的折磨。

由于狂热的红卫兵们到处抄家，以寻找“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文化遗迹，我认识的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说，他们被迫扔弃了各种珍贵书籍、历史文献和古玩名画。中国最有名望的作家、音乐家和艺术家们被捕入狱的不少，而歇笔10年的则几乎是全部；至于更不幸者，就是被折磨至死。伟大的作家老舍以他那辛辣的笔调所写的《骆驼祥子》，为西方读者十分熟悉；他描绘了1949年以前北京街头一个拉洋车小伙子的悲惨生活，自己却含冤屈死，悲惨地结束了生命。

廖沫沙是一位年愈古稀之年的著名党员作家，文革中被红卫兵打掉牙齿，还被监禁达13年之久。他在1981年回忆文革时写到：“我们这些老同志一聚到一块儿，就时常谈起那些我们失去的书籍；那些遭禁的书，被毁的书，图书馆精心收集但又被窃的书，那些失踪的书。‘文化大革命’就是葬送文化的大革命！”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文化革命也带来了红卫兵们的自身灾难。他们都是些从15岁到35岁的年轻人，由于全国大专院校关门停学，中学也缩短学制、精简课时，他们走出校门即无所事事。而学校取消考试制度，教育质量无以衡量，所学东西当然不多。随着另一次实验，占城市人口十

分之一的总共约1,800万青少年学生被送到了乡村地区。据政府估计,这些变革总共影响到一亿多年轻人。由于轻视专业知识,年轻人们学业荒废,文化不足,没有受过专业训练,难以胜任后来的工作。北京长安街西端有幢电讯大楼,底部系苏联人喜欢的臃肿式样,顶端是尖细的塔型,从大街上望去,好象看不到正门。一位中国建筑学家心情沉痛地给我解释了原因:大楼设计方案是由一群没有实践经验的建筑系学生搞出的,大门被设计到了背对大街的一面。因为,当时技术过硬的专家正在经受政治运动的冲击,不能重用。我还听一位外科大夫发过脾气,说他手下的年轻大夫们简直连动脉和静脉都分不清,怎么能让人信任!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个初年级学生,也揭过她的英语教师的老底,说他的英语知识还不如她自己,原来那教师是教育革命登峰造极的1976年毕业的。乌托邦冒险尝试的后遗症,是整整一代人的迷惘和挫折。

然而,文化大革命所伤害最重的是共产党本身。中国朋友们一再向我保证说,在50年代,人民群众对共产党人充满了真挚的感谢和热爱。他们消除了通货膨胀和贪污腐化,而且,在中国100多年的屈辱历史中,用毛泽东的话说是使中国“站了起来!”但这种感情现在已渐渐淡薄。一位正方脸庞、精力充沛的中年党员回忆说,他20岁入党,当时满怀激情地多次向组织写信,志愿到边远的海南岛工作。那是南中国海中一个非常落后、满是丛林的大岛。

“我盼望到最艰苦、最贫穷的地区去建设新中国,而且朋友们都有我那样的志向。但是眼下,没有人再愿意写那种信了。”

我听到的最令人寒心的话出自一个年仅16岁的高中学生之口。她是一位聪明活泼的女孩，课外时间喜欢化妆打扮，穿时髦衣服。我是在北海公园散步时遇上她的，中国的皇帝皇后们早年均爱到那地方悠闲散步。

“50年代的中国人非常天真，就像我妈妈一样，他们坚信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经她解释，我知道她母亲是在一所高中任教的老师。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妈妈被人关了整整一年半，就因为外祖父是知名学者，当时被打成了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学校的红卫兵们将我妈妈揪出来，当着全校学生的面跪碎玻璃渣。对于知识分子说来，这种侮辱是人生最大的不幸。她的希望破灭了。”

像列车上的医生和上面说的教师那样的许多人，无一不受到迫害、逮捕、折磨乃至杀害，仅是因为他们的阶级出身，因为他们被人扣的帽子，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且，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生命损失、学业荒废、文物失散、艺术衰败、生产倒退，以及由于人口增长失控所浪费的国家资财，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令西方人难以想象！然而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一切最初均出自一个崇高的目的：毛泽东发起运动是为了消除人民贫困、官僚主义和阶级差别。但他盲目地相信了自己的直觉，相信了他的伟大理想，而实际并非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结果，看不到人民的真正需求，看不到人民群众是在被迫执行他的指示。

第1章

人们叫我“洋鬼子”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论语·学而篇》

一个狂风骤起的秋日下午，我领着四岁的儿子埃桑在北京饭店外面的长安街上散步。忽然，我注意到一个50多岁的老人，戴着昏花的眼镜，穿着破旧的灰色大衣，两眼直盯盯地瞪着我们。对于中国人这种凝视外国人的习惯，我早已司空见惯，在我驻中国的头一年所住的北京饭店门前，他们常常聚在一起，一见西方人就给团团围住。这种举动总是非常友好的，只是出于好奇心，没有任何恶念。而埃桑那样子尤其引人注目：一头金发修剪得像尊雕像，活蹦乱跳又像个小巧的足球后卫，当然也就会触发人们的好奇心。

但那老人的兴趣是如此浓厚，竟不由自主地紧随我们身后，在我们左边保持着几步距离，两眼仍旧目不转睛；由于只顾盯着我俩，不料却一头撞到一棵树上。只听身后一声响，他那塑胶框的眼镜在鼻梁上一折为二，两块镜片掉

到人行道上摔得粉碎。他被撞晕乎了，倒退几步，跌坐地上，前额上现出一道口子，渗出涓涓血流。我急忙折转身去搀扶他，然而却看到他仰头望着我微笑开了。要是美国人，早就气急败坏地大声咒骂，而他却满面笑容。

我在中国居住的20个月中，还有过类似的悲喜遭遇。这充分说明，在中国人眼里，外国人是多么的离奇古怪，多么的具有异国风情，多么的令人好奇不已。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头发都是直溜漆黑的，而我们外国人却顶着桔黄色、棕黄色，乃至深红色的鬃发，很容易被人看成中国古代的守门神。我们外国人躯体肥大，浑身茸毛密布，像野兽一样令人恐惧；相形之下，中国人皮肤细腻，光滑无毛。在中国这样的传统影响举足重轻的国家，我们外国人劲头十足、东窜西跳、匆忙行事，大概是因为摄入的热量过高、养份过多，可以尽情地消耗精力；而中国人却习惯于不慌不忙、按部就班地行事。如果把我们的行动的节奏比喻成快板，那中国人生活的步调则是柔板。我们外国人过于心直口快，既会在公众场合互相吵闹，也能在事后握手言和，丝毫不觉得有伤面子或八方树敌。

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鸿沟几乎难以弥合。我每周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坐在《纽约时报》的驻京办事处，和中国助手一块儿办公。办事处仅是一间普通的旅馆客房，只是多了三个资料盒、一只书柜和一台打字机。助手吴瘦削细长的身材，戴着瓶底般的高度近视眼镜，一络头发桀骜不驯地老是高高翘着。这位助手是由外交人员服务局给我分配的，该局属政府机构，专事向外国记者和外交人员提供住房、佣人和司机之类服务。尽管我和助手天天打交道，

相互之间已有一定程度的亲热气氛，但他和中国人说话或打电话，仍然把我叫做“外国人”。我当研究生时曾在台湾呆了三年，后来又在那儿为《纽约时报》当临时记者，每当我进出寓所，邻里的小孩们见了总要高声齐呼：“洋鬼子！”

中国本世纪最伟大的作家鲁迅曾说过：多少年来，中国人只用两种方法看待外国人，要么捧为优越种族，要么贬为野蛮部落。从不能以友相待，从不能视之如自己一样的人。

这种思想上的区别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在长达400⁰年的历史中，中国人在自己的版图内生活得无忧无虑。中华帝国无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中央王国”，其疆域扩展之处，都伴随着文明的普及，而疆域之外，则是野蛮之地。中国的皇帝历来被称为“天子”，系上天指派的大地主宰。中国发明了造纸、火药和指南针，其诗词艺术几达尽善尽美的境地，其安邦治国之法靠了循规蹈矩的高级文官的努力，发展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即使饥荒、洪水，甚至游牧民族的征服都未能破坏中国的安宁。自盘古开天地以来的中国民间传说，从没提到过历史上有任何伟人率领中国人来到这片土地。因而只能说，中国人滋生于中国大地。

所有这一切在中国人心中唤起的自豪和骄傲，是西方人无法体会和理解的。这种自豪和骄傲决非用“民族主义”一词就可一言以蔽之。在中国人看来，中国意味着一个包括人民、国土、语言、历史、艺术、哲学等内容的综合体。这与其说是在指一个民族国家，不如说像是一种宗教

体系。到了20世纪，中国人的仇外心理成了有利于共产党人夺取胜利的潜在力量。因为许许多多历尽艰辛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饥肠辘辘的农民们深信：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赶走日本人，才能建成强大的中国。

如果说民族主义已在今日欧美的许多人中间失去了市场，那么中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我和妻子巴巴拉曾应邀去人民大会堂东侧大厅参加过一次盛大宴会，作东的是泛美航空公司，内容是庆祝纽约至北京的首航。到会的中国官员中，有几位正在谈论刚好听说的约翰·伦朗在纽约遇刺的消息，显得兴趣盎然。当晚的菜谱十分丰富：蟹肉鱼翅汤、梅汁烤鹅、银耳蜜饯和麻辣对虾片。泛美航空公司为增加大家的兴致，特意赠给每个来宾一个石英闹钟，至少在我们那桌就座的中国人，还没见过这种新鲜玩意儿。然而，这些均不足以转移他们对伦朗的兴趣。一位身着黑色中山服、满脸正色的官员问道：伦朗是不是那个著名歌星？他是不是投身到英国的某个音乐团体了吗？旁边一位急忙答道，对，就是他。由于对英国有贡献，还受到女王的嘉奖呢！他遭到枪杀太悲惨了。听得出这一位语气中充满了惋惜之情。

“伦朗肯定为美国挣了很多外汇！”这或许就是中国人给约翰·伦朗写的墓志铭。他们没有评价伦朗如何当壳虫乐队队员，如何探索新的歌唱风格，如何高举和平主义旗帜，而是谈论他如何为国、爱国。

历史赋予中国人一种独特的自豪感，也赋予他们一种不寻常的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方式。几千年来，外国人大凡

抵达中国，都被纳入朝拜礼仪，只要给皇上贡上献礼以表臣服之意，均能获得在远离北京的口岸的有限居住和通商权利。到了近代，随着欧美人增加进口中国的茶叶和丝绸，同时出口白银和鸦片，其他的野蛮民族相继加入这一行列，有日本人和越南人，有马来半岛、乃至印度沿海的商人。英美商人的活动被局限在广州城外的13个场地，长不过400米，宽不过200米。在这块狭窄的土地上，他们的活动所受限制不少，不得携妻室同住，不得坐轿乘船，也不得擅入广州。

1793年，扩张欲望极强的英国政府为此倍感恼火，任命马卡特尼伯爵为全权代表，前往北京求见乾隆皇帝。伯爵的使命是获取恩准，开放其它港口以便通商，得到一岛作为转运货物和修理船舶之地。当然，他也带去不少礼物，计有600箱物品经由广州城内，用90辆马车和200匹好马，外加40辆手推车和3,000名苦力往北运去。清廷自然把这些东西视为贡礼，视为英国人的臣服心意，但皇上无意改变祖宗规矩。他传下圣旨感谢英王乔治三世的“可敬之臣服精神”，但又指出，“本天国英名宏威远扬四海，无数番邦首领海行陆走前来贡献奇珍异宝，故如汝使所见，朕万物皆不稀缺，无意积蓄更多的奇异灵巧之物，亦不需汝邦之制造品。”

最后，英国人终于在1839—1842年期间发动鸦片战争来摧毁了所受局限，其炮舰和军队迫使软弱无力的清政府接受了英属印度的鸦片出口，同时开放一系列条约规定的港口供外国人通商。随后的百年间，中国国力虚弱、政府腐败、人民受辱。然而到1949年，共产党人终于重新在中

国建立起强有力的政府。

我住在北京，遥望着明、清两朝皇帝们所居宫殿对面的人民大会堂，总爱琢磨，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们究竟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来接待那些纷至沓来的来访外宾。这种接待几乎成了每日必行的神圣礼仪。从早到晚客人川流不息，有非洲的上校，有法国的银行家，有日本的产业巨头，也有美国的国会议员，还有各国共产党分裂派别的领袖……他们前来北京，走进大理石铺成的堂皇会客厅，晋见年岁已高的中国领导人。所有被接见者都要进行录像，然后出现在当晚的电视新闻上。而在西方国家，绝大多数这样的来访者均无新闻价值，而且在西方国家的首都，也没有哪国高级官员能这样耗费时间来逐一接待外国人，不论他希望通过何种低姿态。然而在中国，这样做是在给人民一种信号：中国已再次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成为各国贵宾们争相向往的强国。

自孔子以来，中国人一直非常重视对客人的接待。以便给人良好印象。他们甚至已将如何当好东道主发展为一门精湛的艺术。这是中国社会最令人欢欣鼓舞的方面之一，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人对中苏两国看法相去甚远的原因，尽管两国的共产主义制度是一致的。

在中国居住期间，我受到人民的热情关心和照顾，不仅感到受宠若惊，而且觉得心情愉快。公共汽车总是拥挤不堪的，而我一上车，中国男女们总要主动为我让坐，仅仅因为我是外宾。最初我还试图谢绝，但只能招来浑身不自在，因为中国乘客们纷纷站起来，不等我就座，他们就执意不坐下。还记得，一次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去一百货公

司，已是下午7点，商店该打烊了。随我同行的是政府所派助手老吴，这种老字号称呼法是中国的传统，共产党人接了过来。因老吴年方42，长我一岁，故称老，若小我，则该称小吴了。我们当时需要购买中国人购货常用的编织袋，用来装刚买到的6个哈密瓜。瓜很香甜，古时候常有中亚野蛮部落用骆驼队载进京城贡给皇上。然而我们遇到了麻烦，柜台后的女售货员阴沉着脸，指着手表，口气却有几分得意洋洋地说：

“太晚了，7点了，该关门了。”

但老吴却非常果断，立刻摊出在中国行之有效的王牌：“这是位外宾，他要买个编织袋。”售货员迅速注视了我一下，叽哩咕噜两声，就躬身拿来了我们所需的袋子。

另一次经历是在西北部的兰州，由于每日一班的进京客机订票已满，我和老吴似乎要滞留几日了。但当地外办派来的导游却非常自信地说：“问题不大。”就是她这样一个穿戴整洁、身材苗条的二十几岁姑娘，居然说话算数，只一会儿功夫就传来了她搞票成功的消息。

她后来回忆说：“我让他们拉下两个国内乘客，先让外宾走。但那位负责干部不情愿，原因是他已经拉下两个国内乘客，把座让给了一个外国技师和他的翻译。于是我只好对他说，这位外宾是记者，他这才最后同意了。接待外宾，我们这样做是常事。”这是导游的结论。

精心准备和作出假象也是接待外国游客时常有的事。我初访中国是1979年6月，记得当时是到西南地区海拔1,000多公尺的云南，参观昆明郊区一个叫依柳的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公社中，也许就数该公社拥有自己的停车场

了，不仅场地宽阔，而且地面铺过，场边即为公社办公楼。当地农民大多安步当车或套赶马车，停车场自然是为来访者所修，这是我抵达时的私下猜疑。我是随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约瑟夫·卡利法诺的由30辆轿车组成的长蛇车队前去的。这种参观不论对外国个人游客还是官方显贵，都是一种义务停留，因为花一个小时周游公社，可以看到解放以来如何搞好农业。卡利法诺是个精明强干的人，早年受的是律师职业训练，马上就询问该公社是否在中国具有普遍性？当地官员回答说是的。他担心这可能是展览橱窗，又紧追着问是否有其他外国客人来访过？但官员们回答，没有，他是来访的第一位外国人。

但有些迹象说明该公社并不具有普遍性。卡利法诺受欢迎仪式和听取情况介绍的大楼显然才粉刷过，因为灰浆溅到地板上还没来得及擦洗。而厕所门上的男女头部剪影既是高鼻子，又是鬃头发，完全不像中国人。我们接下来前往的一个村庄，道路刚扫过不久，扫帚划过的痕迹依稀可见。路旁公共厕所的门边，抛洒了大量的石灰，可知是刚撒上以吸潮除臭的。田里长着没膝的水稻，妇女们头戴斗笠站成行队，正在弯腰除草，就像是在施以中国古代的鞠躬礼。但美国人若要接近她们，却要走过长长的田埂，而埂上已站着身穿蓝色服装的年轻干部们，大概是为了预防不测。很容易辨清他们不是农民，因为左上衣袋中都插着自来水笔，那是党员干部的特殊标志。

卡利法诺肯定对所看到的一切表示过怀疑，因为当日下午乘车回昆明路经一村子时，他迅即请求身为东道主的云南省一副省长同意停车。他们乘坐的那辆红旗牌轿车，

在长蛇车队之首来了个紧急刹车。令中国人倍感惊愕的是，卡利法诺径自下了车，到村中闲走起来。但这儿没有干部们提前安排，村民们面对不速之客，惊慌失措，四散奔走，以致卡利法诺无法找到人来交谈。

当我后来将这段经历讲给一位在北京某外交机构工作的朋友听时，她直率地嘲笑了我的天真无知。她说，中国人总是小心翼翼、十分周全地做好各种安排，以款待、讨好、蒙蔽，甚至左右外国人。这姑娘生性活泼，闪动着两只大眼睛，留着一头标准的短发，她的工作就是陪同来访的官方客人游览北京。东北角上的朝阳商场是她经常带领外宾们去的地方，目的是让人看看中国人吃食之丰富。她告诉我，一旦安排某位要人前往，就会给商场下达“来访任务”。于是当日清晨，就会有卡车载着额外的活鸡冻鱼前来商场，这两样东西当时在北京乃是稀有之物。于是，来访者就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他们哪里知道中国顾客买不到货架上的食品，因为每人月定量只有一斤，而鱼又特别大，结果只是望鱼兴叹。

接待外国政治家、文化名人和其他显贵的另一重要方式，是前往机场举行欢迎仪式，由几百名少年儿童描眉化妆、载歌载舞。然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豪华的欢迎宴会，为双方友谊不停地豪饮茅台烈酒。东道主的这种精心安排像一副强有力的镇静剂，足以平息许多头脑清醒、处事精明的人们的心中疑窦。我记得，平常机警镇静、自信心很强的纽约市长埃德·科奇，竟从西安市的党政首脑那儿接过一支香烟点上，使他的助手倍感吃惊。因为科奇从不抽烟，也讨厌别人当着他抽烟。

科奇事后解释说：“我不想让他们不快，他们待我们太好了。那是20年来我抽的第一支烟，今后20年我不会再抽另一支。”

还值得一提的，为1979年邓小平访美在白宫举行宴会，有雪莉·麦克莱恩参加。鉴于她是1971年乒乓外交之后首批访华的美国人之一，且写了一本名为《由此至彼》的书，拍摄了一部盛赞文化大革命运动为繁荣富强的中国带来好处的电影，卡特总统邀请她入上席，坐在自己和邓小平之间。在这次宴会上，麦克莱恩女士兴致勃勃地对邓回忆起她曾见过的一位中国核物理学家。虽然被下放到公社去种土豆，科学家却向麦女士保证，在农村干活比在实验室更令人愉快、更有生产成效。听到这儿，邓马上打断她的话说：“他那是在说假话，那是因为当时环境所迫！”麦女士次日即出现在电视节目中，将自己的这一亲身经历告诉了观众。

但中国人所实践的东道主礼仪也有不那么和谐而使人不快的一面。伴随着恢复昔日帝国所拥有的接待外宾的宏大场面，人们也重新实施起对外国人加以环境限制的传统措施。一则防止局外人接触中国生活中那些令人不快的现实，二则减少资产阶级病毒对中国的侵蚀。外国人如同在大清帝国时代被局限在某些狭小的区域一样，今天也只能住在特定的某些住宅区：外交官和新闻记者聚居在北京东北角的高楼大厦中，楼下由三面墙围住，由军人站岗警卫；外籍教师住在西北角的友谊宾馆，该馆早年为苏联专家所修，远离闹市、陈设凌乱。至于外国学生，则分散在各大专院校，汇于各院特定宿舍。

无论哪位中国人，如若想要拜访我在北京饭店的办公室，都须在入门柜台处的公安部警卫那儿登记姓名和工作单位，而次日该单位则会接到通知，点明某人某时曾与外国人有过接触。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一位心直口快的北京某电视台女记者曾坚持要进门来见我，后来证明这种做法有些愚蠢。女记者觉得见见外国人没什么不对，谁知几天后，三名警察登门拜访单位书记，书记遂传她到场。警察们询问她：“你为啥去见巴特菲尔德？给了他些什么消息？”接下来是她不得不写检查，并不得再来见我。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她时得知的。

她十分沮丧地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相信人民群众，究竟有啥东西那么秘密，不能和外国人谈？”后来有好几次记者招待会，我都遇到了她，但她却小心翼翼地避开，以免同我正面相遇。

有位在大学教英语的教师说，在单位里的一次政治学习时，领导宣读了一项指示，规定中国人没有工作单位的允许，不得擅自会见外国人；会见之后，要将所谈内容完整无缺地向上报告。这件事我还听其他几个中国人说过。这种规定让那位教师感到恼火，出于不满，她坚持邀请我于某个星期六下午前去她家作客。我竭力谢绝，但她说如果不去，就是粗暴地对待了她的一片好心。我于是只得按照指点，开着《纽约时报》的公车前去位于校园内的她家楼前。外国人的轿车牌照具有明显的特征，数字中的头两位31代表北京，却是喷成红色的。

她略微矮胖、长相平淡，对生活的抱负就是出国留学，进一步提高业已十分流利的英语水平，眼下同已经退

休的父母住在一起。父亲个子较高，有些弯腰曲背，头上已经谢顶，以前是政府机关办事员。他显然为我的来访感到十分不安，也许是深明所面临的风险，而又不觉得从中有什么收获。他把女儿叫进卧室斥责道：“你不该让他到这儿来！”声音之大，足以让隔着单薄墙壁的我完全听清。

我觉得应该马上离去，然而她母亲却热情地堵住门户，这位老人满脸和蔼，一头短发梳洗光洁、被发夹紧紧地别在头上：“没事儿，你得呆着，你看我正做着晚饭呢！”她的语气之亲切，令我感到左右为难。假如一走了之，那实在有失中国人传统的礼貌；若硬坐下来，那又有违中国人的政治规矩。还是她母亲把我拉到一张红色人造革面料的扶椅中坐下，还安慰我说：“就坐在这儿，我那边饭要好了。”

然而很不幸的是，次日即有两位邻居前往她家拜访。二人均是学院的行政人员，一见面就批评她：“我们见你昨天在家接待了外国人，这很不好。”几天以后，她参加了学校为青年教师安排的英语考试，以决定谁能用公费到美国进修一年。据她讲，所获分数最高，但囿于“政治原因”落选了。

她接着说：“中国人要是和外国人交朋友，就像俗话说的，是作茧自缚。”我顿时感到自惭形秽，只觉得自己就像辐射源，沾上谁，谁就倒霉。这些限制和北京饭店走廊墙上用中英文写着的粗体红字，形成表里不一的鲜明对照。我一天要经过那标语几次，上面堂堂正正地写着“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难道中外友好只意味着，对人民共和

国深抱好感的国外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按严格规定的路线旅行？就是为了获得特权，去中国人无法涉足的友谊商店购买货物？难道中外友好不能包括与中国人民个人之间的密切交往？

许多中国人都怨恨那些不准他们涉足外国人所住旅馆和友谊商店的规定，认为这些规定是对自己人民的歧视。上海的一位医生回忆起1949年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的外国人在外滩某公园门前挂上一块小牌，上面写着侮辱中国人的话：“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人们时常将这一事件用作揭露帝国主义恶劣行径的例子。然而正是那位医生，当要进入上海锦江饭店来面见我时，却受到阻挠，不登记不准进。他事后不无气愤地说：“眼下狗都能进这旅馆了，中国人还不行！”

人们特别敏感的是中国人的涉外风流韵事，认为有伤民族体面。一名高中女生曾对我谈到，她和来北大的一个欧洲交流计划学生约会后，有人随即找到她父母：

“你们女儿和那外国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她为啥要去见那外国人？你们应该管教好，别让她和外国人一起外出，那有损中国的声誉。要是你们的女儿热爱祖国，就该断绝那种关系！”这番话弄得老两口不知所措。

这女孩是在民族文化宫举办的一次舞会上遇到那欧洲男生的。该宫本是剧场和政府办公楼，1979年后每周开办三次喧闹的舞会，配以闪光灯和国产啤酒、汽水，显得不是那么和谐。据某位官员对我说，这是要逐步开放的内容，“以便满足外国朋友们的需要”，因为外国人周末夜晚通常无以消遣。一般说来，对舞会加以严格的区别，外

国人概外国人的，但偶尔也有些大胆的中国人溜进去，这女孩就是其中之一。当然是要穿上紧身裤，还须抹得唇红眼蓝，才能从警卫那儿蒙混过关。据她告诉我，西方人大多不知道，除了底楼和地下室专为外国人开设迪斯科舞会之外，二楼上却同时开设着向中国人提供的舞会，但外国人不得入场。

不过，中外之间的某些罗曼史却最终获得了幸福美满的结局。来自哈佛大学的研究生苏珊·威尔芙，长着一头金黄色的鬈发和一副诱人的身条，几经努力后终于成为文革以来第一个与中国人结婚的美国姑娘。男方姓陈，长相十分标致，在某乐团拉手风琴，因托人找老师辅导英语，结识了苏珊。按规定，两人结婚需要各自工作单位同意，苏珊的单位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她在那儿当教师，但却不知道能否得到批准。这对情人互赠订婚戒指，是亏了苏珊对友谊商店的门卫撒谎，说陈已是她丈夫，才获准进去买到的。一则中国人不准进入这种商店，二则当时北京只有友谊商店才出售细软首饰。他俩耐心地等待了六周，终于被告知婚事已为国务院批准，那是中国的内阁，而六周时间也确系此类情况中的最短期限。

两人的婚礼由夫妻双双向近百位来宾四鞠躬开始，四方宾客各领一鞠躬，这是中国的风俗。接下来，就当着众人的面一口气接吻达30秒钟，而在公众场合接吻过去被人们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婚礼角落里坐着一名16岁的姑娘，扎着羊角辫，满脸红润，说话的口气中却颇含哲理：“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外国人喜欢接吻是自然的，而中国人一般只是握

握手。”她这样小声对我说。

到70年代末期，随着外国学生、教师和游客的蜂拥而至，政府也采取了某些步骤来限制中外通婚。据我所知，1978年中美关系正常化时，中国还没有美国留学生，而1980年已达到300人；1978年中国初开门户时接待了外国游客12.5万人，超过1949年以来的总和，到1980年增到21.8万人。也就是1980年，北京明确规定四类中国人不能与外通婚：现役军人、党的组织部门工作人员、掌握国家机密的工作人员和涉外工作人员（包括外交官，中旅社导游及译员），我的助手也在其列。

这最后一类从事涉外工作的中国人，需经过特殊挑选和严格的纪律约束。在居住北京的20个月中，我逐步对我的助手萌生了极大的好感。尽管一和他讨论政治问题，总见他默不作声，但他在办公室孜孜不倦的工作精神令人十分感动。他整天将中国报刊的新闻翻译成英文，并替我去同各行政部门商讨、联系，没有一句怨言。但某位将军的儿子仍要我小心，别和助手搞得关系过分密切。

将军儿子私下里对我说：“你知道吗，每个星期六下午，他和司机都得去外交人员服务局参加政治学习，得将你一周的言行原原本本地向上报告。”原来，将军儿子有个朋友在某欧洲国家驻华使馆当译员，由此得知此种内情：“他们得把你的情况讲清楚，却并不让你知道。注意你的言行是他们的份内工作。”

一听说这事，我这心情就无法平静。有时我也尽量打消这种念头，只当它是耸人听闻之言。不料有个星期五下午却印证了我的不安。那天助手出去跑公差了，外交

人员服务局刚好来电话找他，于是我的另一名助手汪小姐代他接电话。汪小姐是加拿大籍华人，其父在蒙特利尔开餐馆，她70年代初期就来北大留学了。我特雇汪小姐来协助我采访，有时也靠她帮忙扩展我和中国老百姓的接触。这是她的拿手好戏，而且干得非常出色，让我逐渐觉得没她真不行。汪小姐圆脸大眼，一脸孩子气，再加上扎着羊角辫，穿着朴实的蓝工装，和她北大的同学没有区别。她那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说起来听不到丝毫的洋腔怪调，故而被人视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那天下午她接电话时，外交人员服务局那边的一位妇女就把她误解为中国人，只听她在电话中说：

“告诉他，明天别报告了，会议取消了。”

1980年9月，政府为我安排了一套公寓，于是接来了妻儿，没料到外交人员服务局随后介绍来的王阿姨又使我遇到类似麻烦。来当保姆的王阿姨三十几岁，显得略微矮胖，脸上挂着笑容，却整天沉默寡言，连无足轻重的个人琐事都守口如瓶。我妻子有次问她丈夫是干什么的，她的回答只有四个字：“他在工作。”由于在中国无法打电话找女孩来临时看护小孩，有几次我们请求王阿姨下班后久呆一会儿，以便照看小孩。我们回家后，担心天色已晚她回家不方便，需得骑半个小时自行车，而且天寒地冻的，我就主动建议用轿车送她。然而每次都遭到了她的拒绝。要是她乘坐《纽约时报》的公车出现在邻里，我想可能会有人注意她，接下来会受到批评，说和我们过从甚密。《墨尔本纪事报》驻京记者汤尼·沃尔克倒真和他家的阿姨有了友好交往，阿姨在儿子结婚之前，曾主动邀请沃尔克夫妇

参加婚礼。两人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荣誉，但几天后却大失所望。阿姨十分尴尬地向他们道歉，原来有人得知了对他们的邀请，命令阿姨撤销请柬。

在所有管理和区别对待外国人的措施中，最使西方人感到恼火的是双轨价格制度，对外国人收费较高，对中国人收费较低。例如，有一次我和助手同机前往四川省会成都，我的机票费200元人民币，助手则只付85元；在成都住宿、膳食和用车，我每天付费100元，老吴则只付40元。因为我是老吴的雇主，得替他付帐单，故能清楚地看到价差，而中国方面也并无掩饰。

实施这套价格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创收中国迫切需要的外汇，以便进口更多的美国谷物、西德采煤技术和日本的炼钢设施。大概这种理论认为，资本家有的是钱，不怕付不起，但我似乎觉得，只有在像中国这样具有传统优越感的国家，政府才能大胆地过高收费，才能置公平交易原则而不顾。有天晚上，我邀请一位编辑去新疆餐厅品尝烤羊肉串和油炸面包，这种中亚风味的中国食物很受人喜爱。编辑认识餐厅经理，为了不让我跑路，主动前去预订。两人用完之后，我到柜台付帐，收款员一见是我，脸上顿时显出疑惑和不高兴的表情。

“要是你付，我们得按不同标准收费。因为是中国人来订的菜，那帐单上是按对中国人的标准计的费。”听她宣布后我仍然坚持自己付费，她于是细心地划去帐单上的数字，填上新的数字，是原有的两倍多。

有时候，人们实施这种双重收费标准时就显得有些贪

婁了。美国公共电视系统（PBS）代表团前来北京商谈拍摄一部有关中国的7集连续纪录片，中国同行提出协助费需150万美元。事后一位纽约制片人对我说，几乎是在它国所需费用的10倍，也是美国人准备付出的10倍。

然而中国人针锋相对：“日本人来拍黄河纪录片，付了400万美元。”

公共电视系统的代表们从侧面打听，知晓了某国电视摄制组在中国拍摄历史纪录片的付费情况。该摄制组需拍摄些有关古代兵将的场面，中方首先要求为道具服装付费，这合情合理；接着又要求为兵将的战骑付费，这也显得公平；再就是要求为跨上战马的演员付费，摄制组也给了。但摄完全景，又提出新的要求：为定于当晚拍摄组已取消了的戏剧演出付费。

公共电视系统的代表们还听说，日本一长江风光摄制组需租一条木船用几天，但中国人要求他们租用整月。日本人拍摄完毕，中方又递来新的帐单：为该月因船只租出而无法过渡的所有乘客赔付损失。

然而，我听说的最离奇古怪的价格歧视事例发生在一个美国妇女身上。她嫁给美籍华人，随丈夫来北京讲学。两人坐火车去中部地区的洛阳时，她所付车费是丈夫的两倍，因其丈夫被视为海外侨胞。而住旅馆时，两人同睡一张双人床，她付费是丈夫的三倍。

尽管中国人具有自信心和某种程度的仇外心理，对于中国如何与西方及其技术经济优势打交道，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意见。这个问题自中国遭受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一

直左右着中国人的谈话中心。100多年来，在究竟如何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的问题上，中国各届政府想方设法，努力为之。像毛泽东那样的政治家主张用土办法搞自力更生，对外关上大门；而像邓小平这样曾经在法国勤工俭学多年的政治家则主张，拯救办法在于获取西方科学的秘诀，打开大门扩展中国的对外贸易。邓小平1979年划时代的美国之行，旨在强调其宏伟规划的正确无误，但也刺激起了某些中国人对资本主义世界丰富物质的向往。因为随访的中国电视摄制组带回了美国人郊区生活的情景：高级的农场住宅，车房中停着的两辆轿车，每间卧室中都安放着的彩色电视机等。结果年轻人们蓄起了长头发，跳开了迪斯科，更有甚者，日胜一日地要求言论自由。于是人们感到了不安。随后，新闻机构开始用不利字眼来描绘西方，说美国工人尽管吃肉多、挣薪水高，美国社会却充满了通货膨胀、失业犯罪、种族冲突和家庭破裂。

我尤其记得某教授的一次讲话。他身为类似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某大学副校长，是二次世界大战前曾在美国留学的水电专家，最近刚访美两月归来。教授告诫自己的听众，不要被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繁荣所迷惑，要看社会制度的本质。

“我们的革命导师们都说过，资本主义一定要崩溃，社会主义一定要取代资本主义。”他指责说，美国的财富是建立在长期的剥削历史基础上的，有对印第安人的剥削，对黑人的剥削，对华人劳工的剥削，对整个拉丁美洲的剥削；美国已将拉丁美洲变为自己的殖民地。最近几年来，即使像日本、德国和英国这样的第二世界国家，也受

到美国的欺凌。

“美国并没有参加两次世界大战，让你在那儿打，打完了他们就挤进来了。他们不在自己国土上打仗，主要的战场在欧洲和亚洲。结果呢，他们掠夺了很多资源，很多东西。这是个帝国主义国家。”他继续说，“二战以后，美国搞到了不少德国科学家。因此，它的全部科技人员都是外国人。”

他说，“我们抗战胜利后，美国人就来了。美国士兵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强奸妇女。他们真是坏事干尽。当时，我们国家很穷，生产力很低，街上摆的啥东西都是美国货，连手纸和奶粉也是美国产的。”教授争辩说，这就是美国富裕、中国贫穷的原因。年轻人也应该了解美国人日常生活遇到的麻烦。

“美国人整天担心受怕没有钱花。我的生活水平是很低，但我不用操心。在美国，儿子去母亲家吃了顿饭，得交钱。反过来，当母亲的要去儿子家吃了饭，也得交钱。我这一点也不是说笑话。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有家人请我去吃饭，全家四口都请了我，饭后却当着我的面掏出计算器，一一算出谁欠谁多少。”

然而，也许最能说明共产党人对待西方的矛盾心理的，是1979年以来高级官员们的子弟竞相去美留学的热潮，这是苏联的党政官员们做不到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种去美留学是一种有形投资，既可以从美国学到有用的东西，又能持续改善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

第2章

大家生活在单位里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论语·子路篇》

北京饭店新楼是一座极为美观的17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各房间都镶了落地玻璃窗，具有典型国际流行风格的大厦。这种建筑在芝加哥、内罗毕、乃至伊斯坦布尔均属上流之列。大楼正面内附着一排排阳台，楼顶的式样与传统的中国琉璃瓦屋脊有着天壤之别。车道正处是自动开启的玻璃门和金属格栅，进得门来是铺着大理石的总服务台，顺着高大宽阔和铺着红地毯的走廊进去，是一幅控制着两厢8架电梯的电子仪表图，不停地闪烁着红、黄、蓝色灯光，颇像大型计算机的仪表板。走廊一侧是餐厅，另一侧是简易商店，出售东西有明信片 and 首都地图，也有壮阳补虚药酒和鹿茸人参补剂。我于1979年6月初到北京建立办事处时，只把这些东西当作东方的精美之物，没想到其作

用非常之大。

我朝着用英文写着“接待中心”的服务台走去，台后坐着一位身穿宽大的黄灰色工作服、谢顶躬腰的办事员。

“还有房间吗？”我尽力使出自己的最佳汉语问。

他抬起头，细细地打量了我一番，张口回答道：“你哪儿的？”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重问了一遍，但听到他的回答仍旧是：“你哪儿的？”

最后，他也许是看出了我的困惑，于是多了一句：“我们只给单位安排房间，不对个人。”单位，我知道是指人们的工作场所，办公室，工厂。学校和公社都是单位。哦，原来“你哪儿的”的意思是“你哪个单位的？”但我是刚到中国的美国记者，没有单位呀！

办事员语气坚定地说：“在中国，每人都有单位，你得找你的单位，要不无法给你安排房间。”

于是，就开始了我在中国要完成的第一件任务，去找我的单位。给我签发入境签证的新闻司宣布说不该由他们负责；中旅社也怪我是住户而不是游客，不愿接待我；负责为在京的外国人安排住房的外交人员服务局也把我拒之门外，说是只安排公寓，不负责旅馆客房，而眼下手上也没有公寓了。连美国驻华使馆也不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因为美国政府历来和新闻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好厚着脸皮向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呼吁，他随即向中国外长致函，建议由部长所辖之部负责代管我，当我的单位。

这番周折给我上了有益的一课，我很快发现，单位是

中国社会的高楼大厦的砖瓦，几乎是中国人仅次于国籍的身份证。一个中国人初到全国各地，人们会先问他的单位，而不是姓名。中国人打电话，头一句就是：“你哪儿的？”而不是“你哪位？”我有一次到偏远的东北工业城市齐齐哈尔，找旅馆宿一夜需填登记表，而登记表上头一栏则是“来客单位”，第二栏才是“来客姓名”。

在北京饭店入门处，公安局派了两名便衣搞治安保卫。出于好奇，到北京不久的一天下午我就出门站在外边，注视他俩如何执行公务。对于外国人、熟知的饭店雇员和坐着轿车来来往往的党政官员，他们不问一句，只管放行。但若遇普通中国人，他们均会走上前问：“你哪儿的，同志？”有一次，来中国从事学术交流的密执安大学社会学者马丁·金·怀特邀请北京市一位副市长来饭店共进午餐。客人是已有74岁高龄的著名社会学家，早年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虽然并非党员，最近却被任命为副市长。由于她没像高级干部们那样坐着豪华轿车前来，警卫没有认出她的身份：“你哪儿的？”她随即说明自己是北京市副市长，没料到竟招来嘲笑，还被要求到治安柜台前验明工作证。验完之后，警卫们才自知闯祸。这位女士事后指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你北京饭店实际上是北京市政府的下属单位。

中国人如此重视单位的作用，原因在于单位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场所。四机部是专门生产军用电子设备而属于半保密的单位，该单位的一位35岁妇女解释了单位如何发挥作用。她居住在部里所辖的一个拥有多幢五层楼房的大院中，院中所有邻居均为四机部雇员。进出大院，需经过门

岗；若有客人来访，得在门岗警卫处登记。这座大院内，既有她10岁儿子上学的学校，又有采购杂货的商店，还有看病治疗的诊所。单位不仅分配她一套住房，而且发给粮票、油票、布票以及中国人所称之的“工业品票”，用于购买收音机、手表、缝纫机和自行车。

有一天下午我们驱车在她那大院外转悠，她为我无法通过岗哨去她家看看感得抱歉。按她的说法，单位领导所管事务远不止这些。十多年前申请结婚时，她必须先向单位领导提出申请，这是规定。单位领导遂向她未婚夫单位发函，只有双方单位同意后，他俩才能办理结婚登记并举行婚礼。要是她想调到另一个单位，也需现有单位同意。她补充说，最近一位老年邻居逝世，也全仗单位出面安排追悼会和尸体火化。像和我这样的外国人谈话，她也得事先请示单位同意，事后向单位报告谈话内容。

然而，中国的单位并非都能提供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人生所需。有的单位缺乏住房，也有的单位太小，不能拥有学校和医院。但单位作为一个健全的体系，不仅发挥着社会和经济功能，而且发挥着治安作用。我有时想到，如果说欧洲和日本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的要害在于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之上，那么，中国目前的单位体系的核心则是将个人拴在单位，这类似工业化时期的封建主义。

严格说来，中国的传统中并无单位之类的东西。以前各朝代倒是建立过一种相互保障的组织形式，称做保甲制度，即百十户人家组成一团体，互相对他人的行为负责。但这种做法的真实动因，极有可能是中国人喜欢将个人纳入群体之中。中国人过群体生活比过个人生活更感到自然

和舒适。我们西方人爱说“每人”，轮到中国人表达这一概念，则说“大家”，原词系“庞大家庭”之意。中国人席上喝酒，从不自行其便，而往往是先举酒杯，环顾左右，邀约邻座品尝，众人同时动嘴。在他们看来，兀自先喝既显自私，又不礼貌。

我到北京的第一个复活节是星期日，我受命报道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代表团访华之行，到了上海的锦江饭店下榻。该店系30年代一批华人富商和欧洲侨民集资兴建的哥特式建筑群，遗风犹存，桃花心木地板和黄铜所镶门框仍然每日擦得发亮。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中国之行即住过这里，在其中一套间中签署了历史性的美中联合公报，从而结束了二十多年的两国宿怨。饭店的侍应生们穿着整洁的制服，似乎深明这些大楼的传统。因而，当天晚上我发完给纽约的电讯稿，于凌晨两点上床睡觉时，自信能不受打扰地酣睡一夜。

哪知刚好7点整，就被一侍应生惊醒，他送来一大瓶开水，放在我床头柜上。多少年来我都不穿睡衣就寝，只得迷迷糊糊地拉来被子裹上。

“天色还早，你能否出去，好让我睡一下？”我鼓起勇气，略带愠怒地对他说，“你至少可以先敲敲门。”

但我这番话既没让他尴尬，也没使他受惊。他脸上泛出微笑：“不要紧，请继续睡吧。”

他的公务忙完，我想这下该能睡好了，不料脚步声又至，这次拿的是一瓶凉水。5分钟后，他第三次到来，为的是换毛巾。

这种经历我在中国体验得实在太多，其他外国人也

少不了，侍应生居然漠视门上挂的“不得打扰”的牌子，进来之前也不先敲敲门。中国人历来是不承认隐私的，的确，在汉语的五万个方块字中，找不到隐私的对应汉字。中国人口众多，生活拥挤，声音嘈杂，除了极特殊的情况，一般不可能维护个人隐私。

即使在医生的诊断室，病人们静静地等待医生同别的病人谈话，丝毫没有避开之意。有一次，我到北京中医院去看一位按摩师，请他治疗我打网球拉伤的手臂，而和我共同坐在按摩师房间，以及一起治疗的，还有另外6个中国人，可见房间之拥挤。来自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戴维·埃森伯格是首次获准进入中国的医院工作的美国人，他对我回忆起所见一病例说，病人已到癌症晚期，医生耐心诊断，旁边坐着的其他病人也耐心倾听。

汉语中也没有恰当的词汇来表达“亲近”之意。就在尼克松总统中国之行不久的1972年夏天，《纽约时报》将我派往越南召回，以便接待新华社首次访美代表团。我的任务是导游和翻译。我们用两周时间，乘着租来的轿车穿过宾夕法尼亚、西弗吉尼亚、俄亥俄、密执安、威斯康星、伊利诺斯、纽约和马萨诸塞各州，参观了煤矿、福特汽车装配厂、奶牛场、以及尼亚加拉大瀑布。有时，我安排中国记者们和美国人家同住，有时又联系路旁度假村中的流动旅馆过夜。这些流动旅馆的用餐环境都具有相同的特点：气氛柔和，光线昏暗，甚至桌上摆放着用电灯做的假蜡烛，充满了郊外生活气息。然而这一切，却使中国记者们倍感不安。

“美国人怎么会喜欢黑灯瞎火地吃东西？那不连菜单

都看不清吗？”一位记者个子矮小瘦削，头脑机敏，不解地问。

他的问题很难回答，原因是中国人对隐私和亲近具有刚好相反的观念，即“热闹”，这无论在英语或其它欧洲语言中均无相应的表达。从字义上讲，热闹即“热乎乎”和“闹哄哄”，而真正的词义内涵则指一大群亲朋好友、三亲四戚坐在一块儿会餐，灯光明亮、人声鼎沸，从而给人一种的一种快活和激动。作为美国人，如果还不明白热闹之意，可去任何一条唐人街看看，便知一斑。随着客人们大声吆喝着点这要那，一双双筷子竞相前伸后缩、吱吱作响；堂倌们兴高采烈地东奔西跑，口呼名称、手托菜肴，直到客人们酒醉饭饱；或许在内堂中还摆着麻将游戏，象牙砖块被和洗搓擦得哗哗作响，犹如悬崖峭壁下的浪涛之声。

但中国强调群体活动，并非对群体不加任何区别，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合群。在北京的大街上行走，人群之拥挤就如在纽约和东京的地铁之中，不撞上人是不可能的。我最初一遇到这种情况，仍免不了摆出美国人的习惯，连声道出“对不起”。

然而中国朋友们嘲笑了我的无知，既然不认识对方，为何要向他道歉？还记得1961年当研究生时在台湾见到的一件事。那天上完汉语课，我骑着自行车回住所，见一辆三轮车压过一刚学走路的一岁小孩身上，不免大惊失色。那小孩满脸是血、大声哭闹，三轮车夫却熟视无睹，一个劲地踏着车扬长而去，而街上那么多行人也无一上前于涉扶助。我急得上前去哄着小孩，直等到他母亲到来。后来，

当我把这件事讲给借宿的那家主人听时，他显然没有我那么气愤。

这个例子可能过于极端，但我就此开始感兴趣地注意中国人如何不同于我们的方法来组织自己的内心世界。我们习惯于将人们看成个人。当然，我们对熟人和生人也有某些区别，但只要是人，我们与之相处的行为方式却是基本一样的。然而中国人却不同，他们本能地将人们分为两类，而划分的标准则是看自己是否已经建立有和对方的固定交往与联系，中国人将其称为“关系”。这种关系就像一张看不见的网，将一人同其他许多人联结起来，从而发挥西方人交际中的纯友谊难以匹敌的重要作用。关系形成了一种社会磁场，中国人在其中活动，头脑中清楚明白自己与谁有联系，与谁又没有联系。关系是可以解释中国人对理查德·尼克松的态度，因为他帮助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僵局，共产党领导人感谢他。水门事件和尼克松下台并不影响他们的感情，照样派出专机接他访华，而这一切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如果将视线扩大些，关系足以能解释一个拥有10亿人口的民族如何将自己紧密地结合为一体。这里边有利有害，有情谊，充满了中国的儒道。

这里仅举我和一户北京居民的友好往来以资说明。这家的丈夫姓李，是工厂的工程师，身材高大、前额突出、蓄长头发、不善言词，颇具绅士风度。妻子小苗，五官端正、神情动人、聪明贤淑，是一位钢琴教师。我们在一位中国朋友的婚礼上相识，我给了自己的名片，他俩保证日后将多加联系。但我十分清楚，和自己谈过一次话的中国人，十之八九不再敢同我接触。

然而令人喜出望外的是，几个月之后，却接到了李给
我打来的电话，那时我妻子和小孩均已来到北京。李问我
还记得他不？当然记得。又问我是否愿意到他家赴宴？那
是当然，我没加考虑就脱口回答。为避人耳目之嫌，我俩
商定在电报局相见，那儿中外顾客都很多，然后驱车去他
家。他家在小苗工作的学院里。学院大门有人站岗，但没有
上前盘查我们，让我松了一口气。进门后经过一座毛泽东
的全身塑像，像塑得高大，站在那儿目视着前方，身上的
长大衣被微风略为掀开。

抵达他家之时，天色已经黑了，没有路灯，宿舍楼前
也没有照明灯光。中国还很贫穷，舍不得在公共场所浪费
电力。一片黑暗之中，李抱起我四岁的儿子埃桑，摸索着
向四楼上他们的套间走去。我听见埃桑在低声呻吟，他才
来中国几周，不习惯一片漆黑。我要他别作声，以免让邻
居知道这楼道里来了外国人，从而为李家夫妇招来麻烦。
巴巴拉抱着一岁的女儿萨拉，我在后边拿着萨拉的坐椅和
食品袋。我模糊看清楼道中堆着越冬的大白菜，这是还
没有家用冰箱的缘故，另就是堆放着的自行车。

到了四楼，套间房门一下开了，李家10岁的女儿园园
跑出来迎接我们：“叔叔、阿姨，欢迎你们！”随即又拉
起埃桑的手牵进门去，将一个约有5磅重的玩具熊猫塞给
他，这是送给他的礼物中的第一件。当她发现埃桑有些诧
生时，又极力到他胸前搔痒，接着逗他在两间狭窄的居
室中追逐起来。埃桑虽然仅能说几句不连贯的汉语，却能
理解这种挑逗，只一会儿就欢喜雀跃了。

我满怀钦佩之情注视着园园。她只有10岁，却已能大

方得体地当好主人，这方面的天性之完美，令人羡慕不已。她蓄得齐额的短发，罩在头上像顶圆帽，两道细细的眼睛，活象日本的洋娃娃，这是她父亲说的。她穿着一件崭新的白色罩衫，下身是精心制做的粉红色宽脚裤。

按西方的标准，李家的套间具有斯巴达式的清贫简朴，但完全符合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准。园园个人占据一间卧室，约有2米长、2米宽。全家人利用另一间卧室吃饭、起居、睡觉，一张双人床占了房间的一角，床上整齐地叠着绿、黄、蓝、红四床被子。我们被让到一张绿色人造革的沙发上坐下，面前摆放着刚安上的折叠桌。与床相对的角落里是一张小书桌，桌上的玻板下压着周恩来总理的画像，几乎人人都这样把周总理尊为受人爱戴的英雄人物。桌上方墙壁上挂着日本航空公司赠的挂历，均是些乘坐过该公司航班的各国美女浴图。李家另有一小小的蹲式厕所间，不带浴缸，却挤着一陶罐大米。套间地板没铺地毯，完全是水泥地面，混凝土墙也该刷灰浆了。

中餐佳作均是先上凉菜，李家也是这样：海蜇丝、拌黄瓜、油炸鹌鹑、豆腐细丝、松花皮蛋、糖汁苹果和中国香肠。园园直往埃桑碗里送油炸鹌鹑和糖汁苹果，我真担心碗盛不下掉出来，但她仍不顾埃桑的推辞之声。

接下来上热菜，先是几十张春卷，接着是宫爆肉丁、京酱肉丝、土豆炒蛋、糖醋芋子。小苗既要忙着端菜上桌，又要回到厨房做下一道菜。厨房太小，难以转身，而她所有的炊具仅是一口小铁锅，置于煤火上烧热。厨房内有一条小水槽，一根冷水管。我哪里知道，为了请我们吃这顿饭，夫妇俩忙了一整天，外出采购、在家蒸煮，仅做那

几十张春卷就花去了全家一个月的花生油定量。饭后我们准备离去，他们又塞来许多个大色鲜的苹果，这在市场上很难买到。还送我们几瓶国产葡萄酒。

我和巴巴拉精疲力竭地回到家中，心中充满了欣喜之情，尽管中国人和我们接触还有不少障碍，我们却到底建立起了友谊。下一周，我俩邀请李苗夫妇来参观我们乔迁的新居，座落在新建大楼的第11层上，是专为外交人员和驻华记者安排的。在我们看来，这套公寓还略嫌拥挤，只有55个平方米，两间卧室放了床，所剩空间就不多了；起居和用餐共用一间房，另有带淋浴的厕所间。然而厨房却特别宽敞，几乎占了整个面积的一半，大概是西方人抱怨厨房太小而特地这样设计的。在看了李家的住房情况，特别是他们如何充分利用空间之后，我们满足了，意识到自己居住的条件够得上奢华。各间房都全铺了地毯，美国产的冰箱、电炉和洗衣机，全是从香港进口的。

在1976年以前，中国人是无法到我们这种禁地来的，但到1980年放宽了限制，有勇气的中国人都能随便进出了。住宅外围的门边，由人民解放军士兵站岗，当我用汽车把李家接来时，李佯装揉眼，用手把脸遮住，以免门岗看清。但接下来乘电梯，不能不被开电梯的中年妇女看见，她是会报告的，这对于李家，无疑是种风险。因而我老揣摩他们的动机，也许是与外国人接触新鲜好奇，带点秘密性才觉得有刺激，着眼于某些实惠，以及为了建立真正的友谊等因素在综合发挥作用。

那天小苗穿着旗袍，她说是在文革中精心藏匿，才躲过了红卫兵的搜寻。“我好多年都没穿了，是太吓人，不

敢穿。打扮得时髦漂亮会让人说是资产阶级，那会招来很多麻烦，”她透露说。

苗还打开一个中国漆盒，亮出里边的几副玉石耳环和玉石带扣，一并赠给了巴巴拉。这真是既华贵又令人欢欣的礼物，因为巴巴拉酷爱中国传统首饰，所受教育又是女子服饰设计。李苗夫妻俩还赠我一只清代的蓝白两色花瓶。

当我们带他们参观居室时，小苗请求看看巴巴拉的衣橱，那也是从香港运来的。看到几件低领长裙，她不由得格格笑出声来，对角落里附有宽领带的大红宽松裙倒显得兴趣盎然，她请巴巴拉试穿一下。

巴巴拉穿完又脱下之后，小苗发表了观感：“你不像那些外国人，他们那样子多吓人，又高又胖，鼻子伸得老长。你那么娇小玲珑。”这够得上高度赞扬了。

接着，小苗想自己试穿长裙，但出于中国人的害羞，仅仅套在她衣服外面。幸好巴巴拉收集有好些杂志，全是《哈帕市场：时装集》和《纽约时报》的时装增刊，还有几套法国童装，都赠给了小苗母女。这种交往和互赠礼物使友谊出乎我们意料地加深起来，以至我们不得不考虑这种友谊是否会带来某些义务，虽然西方人之间的交往和友谊不会存在这类问题。下一周，我们又接受邀请到李家吃饭，这一次小苗开始小心翼翼地，炸春卷花了全家全月的配给食油，能否去友谊商店替他们买点菜油？当我点头后，她当即拿出一个塑料箱，足有我们用来盛汽油的那么大，可能得装5公斤。这使我们觉得不那么顺心。小苗接着又拿出一个塑料瓶，请代买2公斤芝麻油，因为他们全家每月

的配给只有0.1公斤。这时，李也问是否能在友谊商店替他们买一台电视机。日本原装13英寸黑白电视机在友谊商店价格是200美元，而在一般中国商店则高达700美元，且需要各单位的分配指标和单位表示同意的介绍信。有了这些条件，还得有很长时间的待货。李苗夫妇提出的这些请求，我们全都同意了，但心里觉得受到了一种在西方交朋友没有的压力，巴巴拉形容为“幽闭恐怖”，我感到还要重些。在中国的友谊使我们获得了在美国已经失去的自信心和亲近感，同时，也使中国人获得了我们所失去的物质好处和心理享受。我们的确感到和李家的关系亲近了。但作为西方人，持续不断的礼尚往来和承担义务也让我们感到不自在。

就在回国前几周，我们两家一起到餐馆吃了顿饭。埃桑和园园在饭桌下捉开了迷藏，李建议我们将园园带回美国安排吃住，以便有机会学习英语和受到良好教育。他们夫妻竟能相信一个外国人，并把女儿的教育托付给他，这令人震惊。

李解释说：“我们现在感到你们是真正的朋友，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不再把你们看成是外国人了。”

经过与李家和其他中国人的结交，我们明白了，关系为中国的日常生活提供着润滑剂。在一个几千年来缺乏我们所知的公法来实施不偏不倚的公正的社会，人们依赖于各自的关系，特别是自己与权势的关系来办成各种事情。这是一种社会交际投资。因而，培养、发展和扩张各自的关系成为普通百姓的当务之急。即使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结果，中国人已将个

人交往艺术发展成为一门精打细算的科学。有些人甚至完全依靠他们的关系，或按中国人的说法关系簿过日子。这是一位中国朋友告诉我的。他在美国某大学的研究生院攻读了政治科学，于1950年返回中国。由于所学专业，尽管是怀着爱国热情回去的，也立即受到共产党人的怀疑，无法找到工作。然而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丝毫不识英文的一些高干渴望了解外国人对他们有些什么看法和著作，而这位朋友的英文恰恰非常好，且广泛地阅读过西方有关中国的著述。另外，中国共产党人担心党内宗派主义可能唯我所用地利用历史文献，因而将其封存起来，使得高干们不得不寻求新的途径来重温过去的辉煌生涯。于是，这一切因素推动了我那位朋友各种关系的形成。凡有所请，他都前往为人读书翻译，而主人均是有权有势的人物。作为所付出劳动的交换，他搞到了一套住房，而且时常借了身份证进出于专为高干服务的特供商店，最后还利用这些关系办成了前往香港定居的手续。到了香港，他又极力说服了一批商人，声称自己在北京上层拥有许多熟人。我最后一次见他返回中国大陆，所持的仍然是中国护照，但却是香港一大公司集团的代表。

中国人重视将人们分为与己有关和与己无关两类人，这充分反映在汉语的语言风格中。他们强调内外有别，在语言上也分别用“内、外”两字造词，如外国人、外地、外行、外祖父和内行、内部等等。

家庭是中国社会交往的基础，也是如何恰当地利用关系的培训场所。中国传统家庭的功能，是如何养育孝顺儿子，以便使之能够忠君。在中国的古代家庭中，父亲具有

至高无上的权力，甚至可以出售儿女为奴。而在中国社会里，人的地位为三重准则所规定，即著名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中国传统房舍均修有高墙围住，墙上常栽玻璃，用以强化与周围邻人的距离。但在墙内家中，一大家人同吃同住，并无西方人那种个人思想意识和活动空间。

有天晚上我开车送小苗回家时，她告诉我：“我们是在非常复杂的环境中长大的，很小就明白自己处在什么位置。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隔壁还住着祖父和三个姑母、叔父。”

中国人的语言把这种三亲四戚关系点得清楚具体，叔父和舅父、姑父和姨父各有具体称谓，不像西方语言统为一个词。而在这四父之中，又以自己父母的年龄作标准去衡量，得出不同的称谓，如叔父中长父母者称伯伯，小父母者则称叔叔，这更是西方语言望尘莫及的。仅一个表亲，就可以分出好几种称谓来，将各种姻缘和血缘关系点得清楚无误。

西方人可能很难赞赏中国家庭的这些长处，不过，我倒是有幸亲身耳闻目睹中国人自己如何认识这些长处。1979年，精力旺盛的邓小平副主席访美时，想在休斯顿停留，以便参观美国的航天指挥部约翰逊空间中心，也想同各采油公司谈谈。不料当地要以得克萨斯风格来欢迎他，在小镇西蒙顿安排了一场西部牧人的竞技表演。西蒙顿地方小，除了酒库、邮局、商店、胡桃储仓，就数那座庞大的室内竞技场了。当邓出乎意料之外地坐着旧式公共马车巡视场内时，我正巧坐在两名中国记者身后，他俩是新华

社派出随访的，手中拿着大块烤牛肉不知从哪儿下嘴。中国人吃肉，习惯于切成精巧的小片，非常易于入口。如此大块使人想起蒙古人的饮食方法，当然会被认为有些野蛮和不开化。

就在那会儿，一位高个子金发女郎将一头瀑布梳得溜光、垂在两耳边，兀自走来坐在中国人身旁。她穿着紧细的牛仔裤，脚上蹬的是高筒皮靴，满脸涂脂抹粉，像是要去拍电影；那股脂粉浓味，也许旁边的中国人一辈子都没闻到过。

她突然扭过脸跟中国人打招呼：“你好，访问得怎么样？”她自我介绍叫琼·谢泼德，说是放弃了星期五夜晚的约会，应白宫某位不太清楚姓名的男人邀请，特地来接洽中国人的。

中国记者犹豫了一会儿，才不好意思地问：“你是学生？”

“不是，”她回答。

“那你和家人住在一起了？”中国记者按中国的习惯，认为年轻女人若没结婚肯定和父母同住。

“不，我一个人独居。”她一出口，记者的脸色变了样，换上一副同情神态说：“噢，实在抱歉。”他肯定以为，要么是金发女郎的父母早亡，要么是美国的社会制度迫使她离家谋生，这才感到抱歉。然而金发女郎却解释说，她是因为要寻求自由才离家外出的，这使记者大惑不解。

有位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27岁妇女所回忆的她在天津百货公司的遭遇，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在家庭问题

上不同于西方人的看法。她和丈夫正在买东西，一个约有20来岁的小伙子突然凑上来，要他们交出10元钱。商店里人多拥挤，其他人没有察觉小伙子已从工作服中掏出一把匕首来。她丈夫非常气愤，执意不给钱，10元钱是他月薪的四分之一。但妻子却吓坏了，掏出钱递了过去。

这下抢劫犯倒不好意思地道起歉来：“实在对不起。”他说话声音压得很低，头垂到胸前，满面愧色，“我在家待业，再没脸问父母要钱了。”

有些访问过中国的外国人，特别是那些在大跃进吃公共食堂的年代访问中国的外国人，曾得出结论说，那是要摧毁家庭。然而，现实与他们的结论恰好相反。一位颧骨很高、具有北方人面部特征的27岁教师，她给我讲解了自己家庭的离合悲欢。她父亲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十几岁就参加了红军，最后当了高级将领，但却于1960年过早逝世了。文化大革命一到，她家就开始东分西散：她本人被送到了天寒地冻的黑龙江农垦农场；她姐姐随同所在的军工厂，出于国防原因搬去了四川省的山沟里；妹妹上山下乡去了山东省农村；哥哥被安排在山西省工厂当工人。她说，一家人这样分散，眼看是毫无团聚的希望了。没想到她因为被评为农场的先进工人，获准迁回北京，妹妹最近也转回北京，母女三人合住在一套公寓里。姐姐是无法迁回首都了，但她把6岁的女儿送了回来，让妹妹照顾她接受城市教育。她从自己每月43元的薪水抽出10元，寄给月薪只有23元的哥哥，因为她说：“那还不够他的伙食费呢。”显然，家庭仍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

我问过这姑娘是否打算过结婚。她心肠好，笑容可掬，

长相也不错，据她的伙伴们说，她那长相，“男人见了准醉。”

但姑娘却自认为几乎没有结婚的希望：“我首先得对母亲、哥哥和姐妹们负责，另外也无法申请和搞到住房。要结婚，那肯定和丈夫没住处。”

有天晚上我们邀请李苗夫妇来家吃饭时，李因为单位上有文娱活动，晚来两小时，我们已经吃过了。我随即对他说，鉴于你这是在美国人家里，你得入乡随俗（这是句中国俗语）。我接着说，美国人的习惯是心直口快，要想吃东西，得明确说，要是给你东西你谢绝，那我就以为你真的不需要。我这样讲话，是因为深明中国人训练有素，你给他食物和礼物，不论心里多么渴望接受，嘴上总要说，这是一种良好的礼俗。当下李答应按我说的办。

于是我就问他：“你肚子饿不饿？”那会儿已经8点半了，他演出期间肯定没法吃东西。然而他仍然满脸庄重地回答：“不，谢谢，我一点不饿。”

我猜想，他仍一点没改中国人的味，只好到厨房里拿来半边烤鸡，一块巴巴拉自烤的面包，和做好的土豆、洋葱、辣椒、胡萝卜这些家常菜肴，还有一份桔汁烤饼。果然他坐下一会儿，就一扫而光。

李这样待人处事，依据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准则。如像人的关系网把整个社会紧密结合起来一样，儒家的伦理道德将中国人的性格融为一体，并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在公众场合活动的身份、面具和伪装外表，使它与外界打交道时尽可能地避免人际摩擦。总之，儒家哲学是一种规范

中国人与他人交往的修身养性准则。孔丘本人系一位诲人不倦的师长和君子，倍受徒子徒孙们的尊重爱戴。他所总结出的一套完善无瑕的交际礼仪，广为当时封建诸侯各宫廷所采纳。他生于公元前551年，先于印度的如来佛整整一代人；卒于公元前479年，希腊的苏格拉底在此之后10年才降生。

从根本上说，孔丘的目的是要使诸侯列君变成品格高尚的正人君子。在他看来，善恶必须分明，好坏必须分清；作为君子，必须身体力行地实践这套交际礼仪。即所谓“礼”，我译为英语只好解释成礼俗礼仪。这套深奥的礼仪最初或许产生于原始的“万物有灵论”。那时，人们以为大地、风云和水火等均在自己的生活中发挥着有灵有魂的支配作用。到了孔丘的时代，这些迷信逐渐汇成于一种信仰，认为人类行为不当将会致使整个世界越出正轨，失去和谐。若能正确地遵从这套礼仪，整个社会将会秩序井然、尽善尽美；若要滥用这套礼仪，将会产生社会腐败、天地沦丧。孔丘特别强调，忽视这套礼仪的各种外在形式，将是败坏它所表达的内在真谛，即道德规范。

在我们西方人看来，礼似乎是一种拘谨的形式：面君之时该站何处，待客之时该让何座，送客之时应走多远等。中国主人现在仍彬彬有礼，不仅将客人送到大门之外，还要送到车前挥手致意，直到客人消失在远方。因而对于早已习惯于这套优美的待人方式的我来说，有几次拜访西方人后离去，主人只指明门在何处，却并不挪步，使我倍感委屈伤心，觉得是受骗上当了。礼还规定人们之间授受不亲，因而中国人以前不是互相握手，而是拱手致意。现

在的中国官员要握你伸出的手，也并不是那么落落大方。尽管眼下美国人访问北京时总爱坚持，要和中国主人并肩搂腰地留照，但切记注意，拍人肩、背都是十分无礼之举。礼也规定不得动辄大发激情。访问北京的西方音乐家、演员、运动员，经常为他们的表演没能获得观众的积极反应大惑不解。奥林匹克运动会花样滑冰冠军弗莱明，曾在首都体育馆作了一场精彩表演。馆内拥挤观众达一万多人，可掌声寥寥无几、七零八落。这位美国名星一下子被搞得十分伤心，她事后问我：“怎么中国人就一点不喜欢我呢？我到底有什么没做对？”我竭力向她解释，在中国，那已是仅次于英雄凯旋式的小凯旋欢呼了。孔丘倡导不要大发激情的目的，是要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沉着镇静。不过，他的金玉良言却是从反面道出的真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西方人表达这一意思，则是“他人之名不可败”。这种表达法肯定会让孔丘大为不安。

这种按照正确的方式行事的礼仪，现在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1977年党的重要代表大会上，驻京外交官和新闻记者荣幸地获准观看选举党的高层领导过程，这后来也首次在中国的电视上报道过。在宏伟的人民大会堂内，高级干部们排成单行向投票箱走去，先后顺序完全如后来所宣布的选举结果。当时华国锋走在最前面，紧跟着是第一副主席叶剑英，随后是资格从高到低的副主席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汪东兴。这种出场顺序，完全和激烈争夺总统和副总统职位提名的民主党或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一样。各候选人依照各自在传统竞选地区所获胜利的多少，从多到少一一走上讲坛，接受各州代表的投票。我好奇地问中国

记者，党的领导人为啥一定要按选举结果的先后顺序出场投票？他却坚持说，这是非常自然的。他接着又说，党的领导人当然会按职位的高低出场投票，不过，真正发挥重要作用的，却是新出现的年轻领导人，而不是逐步隐退的老一代。

我以为，这套礼仪的最完善尽美之处，都是体现在为来访的达官显贵举行的国家级大型宴会的持续祝酒活动中。绝大多数的外国人，深为不断端来的12道、乃至15道色鲜味美、精巧玲珑和富丽华贵的中国佳肴惊喜万分，赞叹不已，而忽视了祝酒活动中的排场讲究和高超技艺，没有看到东道主使出炉火纯青的技巧，一面尽力酿成热情洋溢的友好气氛，一面却极力掩住自己的私人感情。在这种场合，东道主要是诉诸个人感情，那就违反了礼的规定。我在下面摘录一段一位副市长在迎宾宴会上的讲话，以便说明这个问题。虽是为款待美国参院外委会的弗兰克·邱奇所说，在其它类似场合也可能听到。下面是我当时的记录。

“我非常高兴能在这儿欢迎您，”副市长先生开始讲话，通过译员译成英语。邱奇参议员只听英语，并不知道他所说的汉语原话是句陈词老调，确凿用词是“我有十分的愉快”。这句话在我驻华期间每参加的一次祝酒会都听到过。

“您不远万里，渡过重洋来到中国，我们深为您的到来而高兴，”这句话也是从标准的辞书中摘来的，“您旅途辛苦了。”

西方人常常为如何结束同中国人的聚会感到偏促不

安、手足无措，但礼对此却有明确规定。当上完最后一道菜、众人品尝之后，副市长先生站起来再次讲话。

“请原谅我们没有招待好。你们在我市逗留的时间太短了，下次来一定要多住些时候。”作为西方人，肯定以为他这句话是在邀请你重访中国，而实际上只是中国人表示礼貌的一句客套话。

“明天一大早您就要动身，”副市长先生转过身对邱奇参议员说，“现在，大家该去好好休息了。”

听到这句话，宴会上的中国人全都知道筵席散了，纷纷起身朝门外走去，却把美国人丢在那里，老半天不知所措。

从西方人的角度看，中国人对礼仪的酷爱有时会变成某种在公开场合的故作姿态。中国人几乎像是在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手法为生，演员的台词和动作尽力模仿正确的外在语言和姿势，同时抑制自己的内心感受。我想，也许正是这种性格，使得倍感沮丧的外国人觉得中国人城府很深、难以捉摸。有那么一次经历，几乎弄得我中风。

那是我们一行西方和日本记者欢天喜地访问拉萨归来，在四川省会成都遇到的麻烦事。我们是1949年以来获准进入西藏的首批外国记者团之一，因而大家都急不可待地向自己所属的报社和电台发回电讯稿。鉴于拉萨到外界只有唯一的一条电报线，日常电话又难以拨通，众记者私下商定只准回北京后才各自发出电讯稿。一般说来，总有人不信守诺言，会稍稍走私他的稿件，但因为大家到西藏都充满了喜悦，也就没人打破情面揭人老底。

到了离藏的那一天，我们清晨6点出发，去搭乘位于海拔3,000多公尺的高原机场停着的航机，飞越“世界屋脊”，返回充满人情味的四川省。这趟4个小时的旅行所见，全是连绵不绝的山峰，即使盛夏之际仍覆盖在冰天雪地之中。到了成都平原上空，脚下却是一片片绿油油的地毯式稻田，在阳光的照耀下，像是火炉上煨着的菜汤。就在那会儿，新闻司派出的陪同人员解释说，在成都着陆后，大家用一小时吃饭，好让我们乘坐的中国空军的四引擎涡轮式苏制伊尔-18客机加油，也让飞行员们吃午饭，然后再飞往北京。这位先生身材修长、神态严肃，操一口英国中产阶级那种惯于吞音的英语，为该机机长曾于上一年送华国锋到拉萨倍感自豪。按计划，我们将于12点半从成都起飞前往北京。

刚好吃完饭，这位先生就来到我们桌前，极力说着圆场话：“我非常抱歉，北京正有雷阵雨，我们不能飞了，得等一下。”

这种延误起飞在中国已司空见惯，因为不少客机和机场都还没安装先进的雷达导航和起落指挥系统，而中国人又特别小心谨慎，稍有风险就会推迟起飞。

然而只坐了一会儿，就听广播中宣布说，前往北京的622次例行航班开始登机了，那是一架属于中国民航的英制三叉戟客机。这下好了，我们转过脸来望着这位先生，他那张脸绷得更紧了。目送着三叉戟登机完毕和起飞之后，我们要求对这一切给以解释。

“你们别着急，那三叉戟肯定会折回来。”这位先生向我们保证说，还建议我们就这样坐在候机室里等待。那会

几，空气中的温度和湿度都已接近100度(温度为华氏——译者注)，能安心坐得下来吗？于是，人们开始纷纷揣测，政府出于什么样的政治原因不要我们进北京，或者说不让我们发出有关西藏的报道；有人甚至担心发生了军事政变。

三个小时之后，这位先生经过和机场控制塔及空军机组讨论，再次出现在我们中间。他这一次说，北京的天气太坏，当天所有飞往首都的航班都取消了。

“这样，你们就得先进成都找旅馆住一晚，看明天会不会放晴。”

作为外国人，不是粗俗无礼之辈，是决不会去验证他的这种说法的。很明显，这位先生是在竭力保持体面和遵从礼仪，然而，我们最终还是当了粗俗无礼之辈。

进城找到旅馆，只见是座苏式庞然大物，布满走不到尽头的过道，却又缺电缺水。有的记者立即给在北京的妻子挂电话，通话后马上宣布，北京天气特别晴朗，几天来这是头一次放晴，从成都去的622航班已经安全抵达。然而记者们的妻子却在几分钟之前接到新闻司某代表的电话说，成都正在下特大暴雨，以致我们乘坐的飞机无法起飞……

吃晚饭时，我们找到这位先生论理，告诉他北京没有雷阵雨，这一点我们十分确信，成都也没有大暴雨。既然如此，为啥要将我们当作人质拘在成都这家热得人心烦意乱的旅馆中？

但这位先生早有思想准备：“实际上，我已经核对过了，雷阵雨正处在北京和成都之间，在石家庄。”这样解

释或许也就将事情了结了，但坐车进城时我曾看到，当地的气象台就在我们住的旅馆前不远。于是，众人争相前去核对，结果发现那天全国都没有大的雷阵雨。

对于我们主人的解释，只要把它看成是一种故意作假，也就顺利地了结了这场纠葛。我当时出于气愤，也确实是这样想、这样做的。但忽视了非常重要的区别。后来我才明白，这位先生老说假话，并非出于别有用心，至少从他的角度应该这样看。当时要么是发生了飞机机械故障，要么是某个机组成员发生了麻烦，但中国人羞于对我们道出实情，而是编造出一套有关雷阵雨的礼貌谎言。要是换了中国旅客，他们会知而不同地欣然接受这种谎言。

这种作假的习气集中体现在中国的戏剧传统中，如演员戴上插有飞禽尾羽的头巾，即假设为将军，手中挥动鞭子，则假想为骑着快马；而在台上踱步转圈，当假定为出门旅行。这种作假的习气还明显地表现在许多俗话、谚语和历史事件中。公元前三世纪，秦朝宫廷中一阴谋篡权的丞相为辨明同僚中谁真心效忠于自己，命人牵来进贡的野鹿，指着说是匹好马。事后，众臣中坚持认为是鹿者均遭斩首。在近代，英法两国在同中国连续三次战争之后，获准派出大使面见大清皇帝。两国大使均认为这是本国的伟大胜利，殊不知却被引进接待属国首领和部落酋长的寓所歇息下来，以备皇上召见。这使中国仍旧保持了精神上的满足：欧洲人照样是效忠自己的属民。

美国研究中国佛学的著名专家霍尔姆斯·韦尔奇曾经指出，中国人死了，棺材上要贴一个大大的“寿”字，那并非用来纪念死者享有高寿，因为年轻人死了也照贴不

误，而是用来强调死者尸魂不朽。汉语语言本身就充满了相当多的委婉词语，以规避生活中的难堪现实。穷人家因为女孩不会带来收益，一出生就给淹死，汉语叫“溺婴”，意即为婴儿洗澡。在现代通讯手段及其创始人马歇尔·麦克鲁汉诞生之前两千年，中国人早已发现其真谛：媒介就是信息。

中国人所使用的表意文字体系，或许对其重视词语的力量发挥了作用。汉字本身并不附带读音，但由于是从象形转化而来，每个字都有其转化历史，生命力极高，造词功能极强，整个书面语言受人尊重之程度就如宗教教义。孔丘当推终生重视词语之大师，他反复强调“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反过来，只要名称和形式正确，事情就会水到渠成。中国人这种对语言具有力量的信仰，足以解释人们对标语口号的偏爱。随便走到什么办公室，总会看到墙上用红字写着“为人民服务”。中国朋友们对我说，文革期间，只要见人说“你好，抓革命，促生产”，那就什么事也没有，当然也可以引用毛泽东其他语录。这并不是什么当代发明，清代的皇帝们就曾命令各地官员遍布皇上圣旨，以规劝训导乡村农民。台湾的国民党人也极力将官方的情绪诉诸墙壁，不过，台北街头的标语却通常是“反攻大陆”。

西方人一般认为，作假仅是儿童的游戏。但中国人作假决非是在做儿童游戏，靠了正确的用语，他们像耍魔术似地把幻想变成现实。1949年，蒋介石兵败如山倒，逃到台湾躲起来，却仍喋喋不休地宣称他是“自由中国”的领袖，因而台北当属中华民国的“首都”。他是明显地虚构作

假，但竟被华盛顿和联合国听信不疑达20多年。与此同时，真正拥有中国代表权的共产党人倒被排斥在一边。

这种对词语具有力量的信仰，也支配着中国人为子女所取的名字。在传统上，中国人爱为女孩选取颇富想象力的双字名，如“静娴”，意为文静和娴淑，或“玉霜”，意为玉洁冰霜。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人姓在前，名在后，因而若某妇女姓李，又常为家人称作玉霜，那她的姓名就叫李玉霜。一般说来，妇女取名多意味着飞鸟的优雅、花卉的艳丽，或者妇女本身的某种气质。而男孩的取名，则多着眼于促成意志和勇气。

然而1949年之后，中国的父母们开始显示出对新中国政府的忠诚，为子女选取的名字也发生了变化。无论对男孩或女孩，中选率最高的字要算“红”。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就叫王小红，另一位则叫王要红，还有一位叫王永红。不少的父母偏爱“卫东”，意即保卫毛泽东。在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之时，有人取名为“小林”的，意为从小学习斯大林。我遇到一位教高中的男教师，名为“抗美”，意即抵抗美国，因为他出生在朝鲜战争时期。

随着政治权力的变换，某些名字给人带来了悲剧。某位中国外交官的女儿回忆说，她高中时期有一姓李的女同学，家中有三姊妹。其父系老红军，当上将军，爱国热情更增。他为家中三个女儿分别取名为“爱国”、“爱民”和“爱党”。到了文革时期，有些幼稚的红卫兵发现，若将三人姓名按纵行排列，那就成了“爱国民党”，于是犯了弥天大罪，立刻抓起来关进监狱。

文革期间，红卫兵们也把北京的原外国公使馆驻地改

误，而是用来强调死者尸魂不朽。汉语语言本身就充满了相当多的委婉词语，以规避生活中的难堪现实。穷人家因为女孩不会带来收益，一出生就给淹死，汉语叫“溺婴”，意即为婴儿洗澡。在现代通讯手段及其创始人马歇尔·麦克鲁汉诞生之前两千年，中国人早已发现其真谛：媒介就是信息。

中国人所使用的表意文字体系，或许对其重视词语的力量发挥了作用。汉字本身并不附带读音，但既然是从象形转化而来，每个字都有其转化历史，生命力极高，造词功能极强，整个书面语言受人尊重之程度就如宗教教义。孔丘当推终生重视词语之大师，他反复强调“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反过来，只要名称和形式正确，事情就会水到渠成。中国人这种对语言具有力量的信仰，足以解释人们对标语口号的偏爱。随便走到什么办公室，总会看到墙上用红字写着“为人民服务”。中国朋友们对我说，文革期间，只要见人说“你好，抓革命，促生产”，那就什么事也没有，当然也可以引用毛泽东其他语录。这并不是什么当代发明，清代的皇帝们就曾命令各地官员遍布皇上圣旨，以规劝训导乡村农民。台湾的国民党人也极力将官方的情绪诉诸墙壁，不过，台北街头的标语却通常是“反攻大陆”。

西方人一般认为，作假仅是儿童的游戏。但中国人作假决非是在做儿童游戏，靠了正确的用语，他们像耍魔术似地把幻想变成现实。1949年，蒋介石兵败如山倒，逃到台湾躲起来，却仍喋喋不休地宣称他是“自由中国”的领袖，因而台北当属中华民国的“首都”。他是明显地虚构作

按照1950年颁布的法律，地主分子如果经过5年劳动改造确已改过自新，可以摘去帽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份划分凝固僵化，变成永无止境的社会歧视。我认识一位小个子青年，其祖父被划为富农，全家为此受到极大拖累。他回忆说，祖父以前拥有45亩麦地，另有一辆大车、一匹马和一座房舍，家住靠近北京的河北省。祖父自种部分耕地，余者向外出租。解放后，贫下中农分了祖父的财产。他本人出生于1955年，已是全家丧失产业以后好几年，却仍被戴上富农的帽子。不论填写什么官方表格，遇到成份栏，总得写上受人歧视的“富农”。就因为这成份，虽然是当地小学中的最优秀学生之一，却只上到五年级就辍学了。他申请参加村里的共青团，没被批准；他志愿报名参加军队，也受到了拒绝；全家人要参加公社的合作医疗保险，仍然未被通过。这就致使他母亲因患肾结石做手术付了全部医疗费，计45元，相当于他一年的收入。而出身好的邻居所交全年医疗保险费，仅相当于一人的月收入。

我是在这青年到北京探望亲戚时遇上他的，他抱怨说，父亲和兄长与其他农民干一样活，却得不到一样的报酬。由于出身不好，他们必须在田间参加“义务劳动”，到了年终分配，算出全年收成和各户所得之后，他家的收入要减半，以充“义务劳动”。

“剩下的东西就不够全家人吃了，”他指责说，全家年年都欠生产队的债，而生产队又属于全公社最穷的。由于出身和穷困，兄长33岁了仍讨不了老婆，没人愿嫁给他。

1979年，共产党人公开宣布将取消阶级成份，但他抱怨说，村里的干部仍然置北京的指示于不顾。“要是给我们摘了帽子，有人还会再去揪出个剥削阶级来，好有个批判斗争的靶子。”

从中国西北部的兰州市到附近的苦水人民公社的公路两旁，全是层层叠叠的小块土地，看得出是丘林地区人们精心垒砌的结果；而地中又无一不是干旱的棕黄色土壤，举目望去，漫山遍野见不到一棵树木。整个大地如沙漠般的干燥，谁也不会想到，竟有几百万农民依赖这种土地为生。就在我沉思于农民的生活艰辛之时，所坐的上海牌轿车碰到了一对同骑一辆自行车的农民夫妇。他俩穿着已经褪色发旧的农人衣服，妻子怀中抱着一大捆新鲜的白菜。作丈夫的显然很少见汽车开到这条乡间公路上来，一个劲地骑着车在路中间跑。幸好司机转弯时眼明手快，一下子将刹车踏到尽头，车停到了公路外边。夫妇俩惊吓得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大白菜全抛到了公路上。

当我将目光从窗外收回时，夫妇俩正从地上爬起来，先是微笑，接着又大笑不止。我这位从兰州外办雇来的司机一见这情景，也笑得合不拢嘴。要在美国或者欧洲，一旦有这种情况发生，双方早已咒骂开了，甚至可能大打出手。死神毕竟就在眼前。然而，中国人面对逆境和灾难却是一笑置之，这种性格真让外国人百思不解！

也许这里涉及到两方面的“脸面”问题。如果双方大动肝火，就会撕破老脸，有违礼的规定。中国人极为敏感自己的个人尊严，而脸面则是个人尊严的外在集中表现，

个人的任何交往都备受脸面的影响。乔治·凯兹所著《发福的岁月》细致地描述了他30年代在北京的生活见闻。据他在书中说，稍不留意，就会伤害中国人的自尊心，而一旦伤了自尊心，伤口却非常难以愈合，就像是患了“精神上的血友病”。

中国人初次与人交往，一般需要中间人从中撮合。回到美国不久，我邀请了一位著名的中国编辑来家吃饭。他当时已来哈佛大学深造，操着一口无可挑剔的英语，各方面看上去都已完全西化。恰好那天我的老师费正清教授也携夫人韦尔玛来闲坐，与中国编辑算是初次相识了。几天后，编辑打电话给我，对宴请他表示感谢，还邀请我到他的寓所吃顿便饭。当我表示同意后，他又询问我是否可给费正清教授挂电话，约他一块儿去。像他这样已经习惯于西方生活方式的中国人，仍怕名教授会不赏脸使他难堪，故而一定要借助我这个中间人去从中接洽，真让人不好理解。

这种对脸面的敏感已在中国人身上形成一种习惯性的条件反射，一种竭力逃避有失面子场合的本能。中国谚语说得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我在北京工作时的助手，无时无刻都以他的言行提醒我这种敏感的重要，他不愧是逃避尴尬处境的专家。我俩初次相见，为了尽量活跃谈话的气氛，我精心选择了自认为对中国人是无关痛痒的问题，轻描淡写地问他：你有几个孩子？

他抬头望了我一会儿，才回答说：“有一、两个。”我一下子就意识到，他属于那种城府很深、不苟言笑的男

人。那天我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他以前在南斯拉夫驻华使馆工作，任英语译员。

经过相当时间的接触，我逐步开始赞赏他那种被中国古代称道的儒生品格了。每天早晨9点，他总是准时到达，从不拖拉迟到；他总能沉得住气，即使我火冒三丈，也不翻脸作色。实在难以容忍，他也只是给予规劝，说大动肝火无助于解决问题。凡是我有所求，他总是竭尽全力尽量给以满足，或是向新闻司请示批准我外出旅行，或是与行政部门联系安排我的采访活动，甚至前往餐馆预订午饭，都由他一一包干。然而，要是我求他去极力通融行政官员的不妥协态度，他就会缩手缩脚，使尽浑身解数委婉推辞。而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我与北京饭店的反复交涉之时。我觉得该饭店的规定不尽合乎情理，其中一条是不准我擅自留人在《纽约时报》办事处过夜。两间房均是我们包租的，作办公室那间白天由助手守着，因为饭店不准搬动家俱，两张单人床仍摆在其中。另一间用作我的卧室，直到1980年9月安排到公寓，我才搬出。有一次，《纽约时报》驻东京特派记者亨利·斯多克前往北朝鲜途经北京，需要暂住一夜。我请助手去报告饭店，说报社的另一名雇员需利用办公室一夜。他没费功夫就回来对我说：饭店不答应，斯多克不能在办公室过夜，他脸上显出一副敷衍塞责的神情。我于是要他再去请求一番，没料到他望着我说：“你这是让我夹在当中。”

接下来又听他嘀咕说，“太麻烦。”这是中国人的俗话，字面意思是害怕找麻烦，而内在含义则是避免卷入纠葛，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多少个世纪以来在这方面的聪慧睿

智。

那些粗心大意的外国人，稍不注意就会丢失面子，然而也有令人欣喜的例外。倘若同中国人说话，他总爱贬低自己的能力乃至姓氏，从而抬高你的地位和身份。中国人若是询问我的姓名，一开口总是问：“您贵姓？”我的正确回答当是：“敝人姓……”相应的，则有“你贵国是……？”和“敝国是……。”这只是客套话，中国人心目中决不因为这样问人而贬低自己国家的威望。按照礼的规定，若遇中国人赞扬你的长相，或说汉语的能力，你必须立刻否认他的褒奖：“不，我说得一点不好。”这才更能使谈话接近事实。参加各种宴会，中国主人在让你饱餐10多样佳肴美味之后，老离不了深感抱歉地说：“请诸位原谅，今晚没准备什么菜，没让你们吃好。”

在今日之中国是更具有中国特色，还是更具有共产主义特点的问题上，西方的社会学家们总爱争论不休。在我看来，这种争论无异于多少天使能站在针尖上跳舞那样的思辩。整个问题所涉及的因素太多，不可能得出一个明确答案。然而，我在中国居住越久，感受越深：中国即使不是完全类似她的过去，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她的过去。党的指挥中心设在昔日作为紫禁城的一部分的中南海并非偶然；官员们宣称的党的领导是包括自己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正确理论的领导也并非巧合，这就如同过去满族人要统治中国，必须精通儒家学说一样。我初到北京，助手劝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刻一枚公章，将《纽约时报》驻京办事处及我本人的头衔和姓名刻在上面。以后，每逢我

书写信函、支付费用和向政府提出申请，均在相应的文件上盖上公章，以表明我的信誉和权力。这种习惯源于昔日宫廷中办公行文的传统。朋友们告诉我，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批斗他们所谓的走资派，不掠其公章决不罢休，而一旦公章得手，则标志着对手的权力丧失和自己的大获全胜。

但是，我觉得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最深刻的影响，还在于日常生活中个人的交往方式上，在于人们对关系的重视、对礼所要求的名称和脸面的强调。虽然经历了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创伤，却并未能动摇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及其影响的独特意识和信念。美国学者约翰·多尔芬娶的是华裔妻子，我曾听他讲过一次不平凡的经历。据他说，有一年去中国河南省看望岳母大人，多亏地方政府破例接待，才让他这个外国人到了岳母所在的远离旅游路线的贫困山村。有天下午，一群村里的长辈聚拢到岳母的土墙房舍，和他聊开了天。多尔芬身材高大、面和心善，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不禁好奇地问村民们：以前是否见过外国人？

有几人抬起饱经风霜和日晒雨淋的苍老面庞回答，见过。多尔芬以为是中苏两国友好的50年代，有些苏联专家碰巧从该地经过，就再问他们：是俄国人？

“不是，”村民们只管摇头。那一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侵华的日本军队？“也不是。”一个爱讲话的村民解释说，日本人倒是离这儿不远了。“他们进了旁边一个村庄，急得村里各家都拼命藏东西。可日本鬼子到底没上这儿来，大伙儿也没见过日本人是啥模样。”

多尔芬于是只得以为是上世纪末或本世纪初到中国的

西方传教士，但再问之后，得到的仍然是村民们的摇头。村民们说，抗战前是有个传教士到了这儿，不过只宿了一夜就被赶跑了，大伙儿说他是奸细。

于是，多尔芬再也想不出会有什么外国人来过村里，只好默不作声。

这下该轮到一位满面银须的老汉开口了：“那是元朝，蒙古人的兵将开到了村里。”一般西方人不知，这元朝是蒙古人忽必烈·汗所建的统治中国的王朝，时间当在公元1264年到1368年。

第3章

级别后面是什么

钱买不到的，权力可以得到。

——中国俗语

在 昔日的中国皇帝们栖身理政的紫禁城西面高墙掩映之下，座落着一个宽敞的中国式庭院。由于为灰色的砖墙所遮，人们从大街上经过，难以看到院中情景，只能看到斜形的瓦脊屋顶。然而，有天下午我驱车同一位中国研究生由此经过，她却告诉我里边住的是位人民解放军的副总长，享受着中国人非常珍视的宽敞的住房。在这座拥挤着几百万人口的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不到4个平米，绝大多数家庭栖身在单间或狭窄的双间住房，而将军一家，却占有整座院落，内含两排居室、一个花园和一座小小的夏季游泳池。

将军全家有4间卧室，另有一间起居室，摆放着钢琴和进口大彩电，还有一间宽敞的厨房，内有美国产的电冰箱。将军家与一般中国人家舍毫无装饰的水泥地板不同，

各间卧室都装修了光滑美观的木地板。盥洗间布置得十分现代化，抽水马桶、浴缸、热水无一欠缺。这些虽被西方人视为生活必需，但一般中国百姓却只能幻想。中国人太多仍使用公共厕所，即使家有盥洗槽，水也是凉的。将军家的住房和房中陈设均由部队免费提供。那研究生之所以知道得如此清楚，是因为她认识将军的儿子，经常进出他家。

研究生告诉我，将军的随从也相当可观，同样是军队提供的免费服务。负责厨房炊事的有阿姨，负责开车接送的有司机，负责卫生和公差的有通信员。另有两位贴身警卫，凡遇将军外出，必须紧随左右。这些人挤住在较小的那排房舍，厨师偶尔也上市场采购，但大多是由军队管理部门派车送来粮、肉、菜、果。研究生说，在这个食物匮乏、每天得花两小时采买食品的社会，这种服务真够令人羡慕不已。

然而将军家也不是没有麻烦。尽管有高墙阻隔，门上也不留姓名号码，有些普通百姓还是发现了这儿住着高级干部。他们按中国的传统行事，纷纷登门讨好将军。将军本人不无气愤，引用中国人的古话说：“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那位研究生朋友回忆说，有一次，某位妇女做了眼科手术，留下难看的疤痕，居然也找到将军这里，不断从门缝中塞进信来，请求帮助获得更好的治疗。那位妇女有二十多岁，因为面容有了缺陷，十分担心自己找不到可心的丈夫。

她在信中哀求说：“请为我想点办法吧，要不然我就

只能去自杀。”她并不知道这儿住着谁，更不知道将军的姓名，只得在信上写着：“致住在这儿的人，我明白您是一位重要人物。”

还有一次，一个小伙子在门外放了一包名牌好烟和精美食品，还留下张便条，要娶将军的女儿为妻。几天后，另一名求婚者则塞进300元人民币，相当于当时中国人半年的收入，也附有求婚信件说：“如果您不让我和你女儿结婚，我就去自杀！”

这位经过30年代长征的老将军被搞得十分不安，他只有两个儿子，并无什么女儿。看来写信人只是瞎猜，一点不了解实情，只知道这儿住着高干，就千方百计地前来讨好。将军把钱和信件都交给了警方，不过，并没能搞得水落石出。

将军家庭生活的舒适和中国百姓对他们的敬畏使我感到惊讶。外国人长期以来都坚信，毛泽东毕生致力于建立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这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根本目标。访华归来的西方游客大多宣布说，中国已经成功地扫除了国民党时期的贪赃枉法，而旧社会的乞丐成群、吸毒成风、土豪作恶和军阀混战的现象早已不复存在。这自然是有目共睹的伟大事实；但平均主义的社会并没有建成。西方游客倾向于只看中国人服饰的一致，只见几百万中国人都同骑着自行车上班逛街，也只听中旅社导游介绍房租低廉、看病免费，就相信了有关平均主义的说法。但透过这个无阶级社会的表面，我逐步认识到，仍然存在相当大的不平等。

有位70年代初期曾陪同亨利·基辛格访华的美国外交官回忆说，初次知悉中国人如何精心表现自己的内部区别，真让他大吃一惊！作为负责礼宾的外交官员，他的任务是设法安排一场答谢宴会，好让基辛格能为初到中国时所受到的欢宴款待向东道主表示谢意。因为欢迎宴会由中国外长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基辛格也应回邀外长参加答谢宴会。中国人备宴规格，不以每盘菜论价，而是按人头定出标准。这位美国外交官依照这种习俗，拟定每人标准10元，前去征求中国同行的意见。

美国人以为，每人10元一顿的宴席在当时的中国已算可观了，不料中国同行听说之后却面有难色，认为标准太低。美国人别忘了是中国外长要来赴宴，而你们对此也特别高兴。既然如此，宴席标准应该定得高些。可那位美国人偏偏不无幽默地问：“我还以为你们中国已经取消了阶级呢！”

中国人立刻回答他：“是的，我们取消了阶级，但并没取消级别。”

对于级别，我认识的一位搞激光研究的中国专家有他独特的看法：“中国人看上去都差不多，但实际上差别大。外人看不出差别的地方，我们却深有感受，而且影响极大。”我是在春光明媚的季节游览座落在长城以内的十三陵时遇上他的，科学家穿一身做工精细的衣服，脱下的毛式上装质地却不大好。

他接着说：“你可以把中国设想为一座庞大的阶梯，每步梯子上都站着些人。而各人都只看到自己这一梯，谁也不知道从下到上究竟有多少梯，这阶梯太庞大了。”

这部阶梯就是将职务和级别组成的一套复杂体系。首先，将全国两千万干部分为24种不同工资级别。这里需要对“干部”一词稍做解释。该词有时指担任领导职务的任何中国人，从最高领导人到最低的生产队长均可称为干部。但中国人有时也用干部来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括行政部门的白领工人，如办事员和会计等，他们并无领导地位。干部可能是党员，也可能是非党员，据北京公布，全国的党员数量是3,800万。干部的最低一级为日常办事员，工资属行政24级；往上是科长，行政18级；处长14级，司、厅、局长13级，副部长8级，省长6或7级，内阁部长4级或5级。处于金字塔顶部的只有已故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元帅，均属行政1级。中国朋友们说不准现任最高领导的级别。他们解释了其中原因，说是自从50年代定级以来，党的高层领导较为保守，整个干部级别趋向于冻结，而一般人的职务提升也很慢。

朋友们还解释说，要确定某官员的资格和职务，需要根据他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时间和地点。是否参加过红军？是否经历过长征？是否服务于延安？还是只在白区工作，只当党的文官？这些标志就如西方社会的门第和文凭，就如家族徽章和学业成就，决定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职别级别。

中国官方的新闻报道从未提到这套职别级别体系，大概是为了掩饰不平均的现象，我不仅对此有所了解。而且逐步知悉了其它行业的等级体系。中国的大学将教员分为12级，月薪最低的是56元，最高的是360元，差幅为1比6。而在中国文艺界，各种演员和音乐家也有工资等级，高低差

额为16比1。艺术家和作家也按不同标准分有级别，除了领取固定月薪，还根据作品的价值和每千字的类别付给额外报酬。在四川省成都市的一所烹饪学校，我发现中国的厨师们被分为4级，最高级称“一级大师”。

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则属另一套等级体系，共分18级，高低薪差是10比1；而工人却只分8级，最低者月工资34元，最高者110元。这种3比1的工资差幅与美国和西欧的工业行业大体类似。人们实行这种差幅工资的目的与资本家并无区别，即奖勤罚懒、刺激工作热情。不过，北京在宣传上则是利用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说是“按劳分配”。实践证明，这套精心创立的职务等级和工资级别自从50年代确立以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更，即使在文革中受到相当大的冲击，仍照行其旧。科学家回忆他在那段喧闹时期的经历说，为了接受当地农民的“教育”，他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两年，干的是栽秧打谷和拉车运货的活计，却照样领他280元的月薪。不过科学家又说，他受命不得向农民们泄露自己的薪水数额，因为当时附近农民的年均收入按人头算只有40元，还说其他被下放到农村的干部也照样拿着原工资。

我还听这位科学家讲过一件事，足以说明中国人如何墨守这套等级制度的陈规。有次在北京召开研究激光的国际学术会议，科学家本人是组委会成员，被安排到具有一到四级教授头衔的中国科学家和与会外国学者就座的前排。前排座上的诸位面前都沏有热气腾腾的中国茶，盛在洁白的瓷缸中。有天早晨，他因为行政事务缠身，晚来了一会儿，就坐到资格较低的教授们所在的后排。后排座上仍然摆着

洁白的瓷缸，但揭开一看，只有白开水，并无一片茶叶，说是为了节约经费。要是他不坐到后排，或后排的学者不走到前排去，没人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别待遇，表面上的平等就会得到精心维护。

中国人对等级制度的嗜好根源于自己的历史，至少自孔丘时代就有了这种传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他的信条。他还有句名言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儒家的伦理用“三纲”将人的地位固定下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些关系体现的都是上下之间的依从关系，并无平等之说。结果，每个中国人都陷入一种高度集权的宗族大家庭里，上有父兄，下有弟妹。还有姨父姨母、伯父伯母，并用各种专门称谓将这种亲缘关系点得清清楚楚，难以在英语或其它欧洲语言中对应译出。每种亲戚关系都附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在家庭中，就得行使权利和提供义务。由于家庭情况如此，中国人自然养成了一种对政府权威和等级制度的遵从习惯。这种习惯使人了解自己的社会地位，使人明确如何行事才会安全稳妥。各人只管按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行事，用不着为他人的不轨之举操心。

当然，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及其以后，都在致力于扫除中国的这些历史陈迹。他们称其为“封建等级制度”，是致使像中国这样一个发明了火药、指南针和造纸术的古代先进国家在近代工业革命后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早在游击战争时代，共产党人就抛弃了旧时代的礼俗称谓，用“同志”取代了“先生”、“太太”、“小姐”之类。共产党人宣称，这是给了封建主义猛烈一击。为了

消除门第观念，他们还沿用农民百姓的称呼方法，依据对方比自己年龄的高低，简称为“老王”或“小冯”。

不知怎么的，现在人们又开始改变他们的称谓，有点回复到传统上去了。我初到北京，曾小心翼翼注意别脱口道出在哈佛大学和台湾学到的汉语称谓，而是呼人们为“同志”。但我注意到，中国人互相几乎都不这么叫，而是像台湾的国民党人那样，称人的官职或头衔，如吴副科长、马校长，直到最高一级的党主席。而他们称我，也是巴特菲尔德记者，或巴特菲尔德先生。

中国人解释说，不能仅用薪水收入来衡量中国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标准，那是西方社会的办法。在中国，要获得较好的住房、专车、避暑住宅及随便购买机票车票等，都需要有相应的政治地位。

一位个子高高、理着平头、约莫30多岁的军队高干儿子对我说：“眼下中国人想要的，不是金钱，而是权力。用钱能买到的东西相当有限，有了钱，还要有关系和级别。”有个7月的上午，天气热到华氏90度，他带我去参观了一些设施，说是专为所谓享有特权的人们供货的机构。据他介绍，特殊待遇自1949年以来就一直存在，但由于文革期间党的机构瘫痪，人们的道德意识淡漠，搞特权成了一股风，有的人甚至无所顾忌。长期的政治运动折磨，加上70年代以来的经济灾难，败坏了人民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助长了营私舞弊之风。

我们驱车先到了紫禁城东面的东华门大街××号，只见是一座五层楼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底楼镶嵌着大块的玻璃窗，窗帘遮得严严实实，外人难以看清内情。唯一能使

人了解这座建筑物功能的，是车道旁的木桩上钉有一块小匾，上面写着“北京市食品供应点”。

但这儿并不同于常见的菜市场，看不到排着长蛇阵的家庭主妇，更没人拿着编织袋抢购新鲜蔬菜和上市鱼肉。在这儿能见到的，是一大群车辆，横七竖八地停在里边，还靠了几辆在门外的人行道上。车中有上海牌轿车，有北京吉普，还有一辆看上去是新进口的日本冷冻车，再就是一辆三轮摩托。几个司机无精打彩地蹲在洋槐树下聊天。从三辆车敞开的尾部，我看清里边堆着十几只鸡、两扇猪肉、一篓子黄花鱼，每条都大得足够一桌12人吃，另外就是包装好的渤海湾冰冻对虾。看到那么多的猪肉，那么大的黄花鱼，这位中国熟人大吃一惊，说他从未见过。那么多、那么好的对虾，一般老百姓只在过春节时才能买到。

他向我解释，这个供应点只面对中国最高官员，一是党的中央委员，二是11个大军区的首脑，三是少数民主党派领袖。除此而外，某些老资格的党政领导人也持有“特别购货卡”前来这儿采购，另外能进出的就是首都某些高级餐馆和供外国人住宿的宾馆。

我俩再往东走几个街区，到了一幢棕黄色的公寓楼，楼下有一商店，门牌号码是朝阳门大街××号，商店窗户也用红色木板遮掩起来。门边坐着一位矮胖的中年妇女，理着圆帽般的短发，我踏步往里走去，她立刻瞪起双眼问：“你的卡片呢？”我只好问她：“这是啥地方？”她马上回敬道：“你找错地方啦。”我再问一遍，她仍是如此作答。店里摆着屏风，挡住了我的视线，能见到的只是一幅毛主席画像。

2
3
1
2
3
1
2
3
1
2
3



据这位中国熟人介绍，该店是只为高干服务的专供书店，他偶尔也借来父亲的特别购货卡光顾一番。这儿不像一般书店那样顾客拥挤不堪，为了招呼态度不佳的售货员，时常长呼短叫。这儿摆着许多舒适的椅子，好让高干们坐下来细心挑选所需的书籍。这儿的书大多印有“内部”二字，既有官员们认为不适宜老百姓阅读的翻译小说，如《爱情故事》，也有西方政治家的回忆录，如《尼克松回忆录》和他早年所著的《我的六次危机》。这位熟人解释说，这家书店最重要的特点是拥有书籍。鉴于传统上中国人一直非常重视书面语言和教育的作用，眼下中国人仍然酷爱阅读。但由于人口众多、森林资源缺乏，全国纸张奇缺，再加上文革期间印制大量的传单和红卫兵们奉为“圣经”的小红书，纸张供应更是岌岌可危。因而中国出版的书籍，一般只印一至两万册，这就远不能满足10亿人民的需要。像十分抢手的英语教材和英汉词典，一上市几小时就可能销售一空。然而，这一切不会发生在特供书店，因为它拥有充足的存货。这位熟人私下对我说，该书店最为抢手的书要算最近影印的《金瓶梅》了，那是一部16世纪问世的中国淫秽书画精粹。

我们驱车继续往前，到了紫禁城的北墙外，只见大街右边有座中国殿堂似的建筑，青砖黄瓦红柱头，三道正门外的车道两边松树成行，由站得笔直的军人哨兵守卫。熟人指着建筑说，那叫三门剧场，高干们带到此观看不能公映的美国、欧洲和日本影片。从1966年到1972年，江青控制着中国的文化战线，全国连一部故事片也没有拍摄出来。从1972年到“四人帮”倒台的1976年，只拍了10部影

片。即使到1979年，中国电影业仍受折磨，竭力避开性问题和政治敏感情节，拘泥于陈腐手法和夸夸其谈。因而，观看外国电影就成为拥有政治头衔的幸运者们的莫大享受。

我这位熟人尤其感到自豪的是，他能向我指明某位领导人在城中的住宅。因为在中国，知晓国家最高领导人住宅的仅限于少数高级干部。最高领导人住所系国家机密。他很难相信，美国人不仅知悉总统的住所，而且可以去游览参观。中国人如此重视保密，部分根源于共产党人游击战争时期工作的秘密性，但也与昔日的帝国传统不无关系。那时的达官贵人们总爱和公众保持相当的距离，以示地位尊贵和权力威望。与人民的距离保持越远，其威望就越高。毛泽东本人晚年时期几乎从未在公共场合出现过，唯一的例外是文革中接见声势浩大的红卫兵集会，即便那会儿，他也只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并不与下面的成千上万的崇拜者们保持面对面的接触。

我获悉，级别稍低的官员们也各自分有固定的住宅。在北京西城，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下榻的国宾馆街对面，有一片文革中被人叫做“复辟楼”的住宅区，原因是当时的住户多被当成走资派受到清洗，但现在已经平反和恢复工作。住宅区实际上是由一条车道分开的两行公寓楼，其中一行为三层楼红砖建筑，窗户宽大，阳台广阔，楼下长着松柏树丛，在这座尘土飞扬、空气干燥的城市，这也算是稀有之物了。这排住房专门安排8级以上高干。但听许多中国人讲解之后，我明白了其中实情，其建筑规格和陈设只相当于美国城市中的中下层阶级住宅。

车道另一边是稍微现代化的六层钢筋混凝土公寓大楼，其中住户有不少声名显赫的人物子女，以及一些著名的电影演员和以画毛驴闻名的大画家黄胄。按中国的标准，这些住房的空间也是够大的。我所认识的一位高级学者的住宅就在其中，他家有二间卧室，一间起居室，一间厨房，另有带浴缸的盥洗间。还安有一般中国人无法企及的电话。

我在京期间，终于设法拜访了一位中国高层人士的家庭，她就是孙逸仙夫人。孙夫人名叫宋庆龄，系蒋介石夫人的胞姐，当时身体状况已经不佳，在我离华不久的1981年5月因患白血病逝世。她在北京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象征着她丈夫事业的继续和民主党派的合作。然而，她的生活方式却非常像美国的百万富翁，所住的宅院系19世纪末期修建的满族亲王府，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就出生在其中。这所宅院座落在北海北面的一条僻静街道上，由近5公尺高的红砖墙所围。

我按照孙夫人私人秘书所送请柬的要求，于下午6点20分准时驱车抵达，3名身穿绿军装的人民解放军哨兵检验了我的身份证，遂打开一扇高大的铁门，让我入内。我之所以能获得邀请，一则靠了我自己的口舌，二则利用了《纽约时报》的名声，因为应孙夫人请求，报社多年来一直邮给《纽约时报》的星期日副刊。

进门之后，驱车行驶在宽阔的车道上，只见两旁是好几英亩大的一片松树和柳树林，外加一口池塘和几座小花园。绕了一个大圈，才看见住宅，系一幢分脊行瓦式的中国建筑。但内部设计较有西方风格，楼层空间高阔，地板上全铺着厚实的地毯。

孙夫人正坐在屋里等候，她身材小巧，高龄92，圆脸大眼，一头青丝挽成发髻盘在脑后。她身上穿的是朴素大方的蓝色丝织外衣，拥有满族服饰的高领和汉族服饰的系带。共进晚餐时，一个女助手和一名继女上前扶着她。

餐厅具有典型的中国皇室别墅风格，室内呈长方形，一面墙上贴着领袖画像，另一面墙上贴着毛泽东的亲笔手书，是赠给孙夫人的礼物。桌上摆着中国古典式的蓝白两色陶瓷碗盏，另有白铁刀叉和中国筷子。穿着白色制服的服务人员端来食物，既有中菜，又有西餐，反映了孙夫人所受的混合教养，是北京的大小餐馆中难以找寻的。孙夫人生于一个富商之家，却在美国乔治亚州的梅肯接受教育，而且说得一口漂亮的美国腔英语。

最先上的是道中国菜，称酸辣汤，由豆腐加肉丝，再放入辣椒和醋烹成。接着上的是上海烤鸭，肉嫩味鲜，是为凉菜。再后是西餐中的白油鱼块、咖喱牛肉和红烧黄瓜。最后是孙夫人称为的“看家菜”：美国风味的奶油通心粉。不过，作为正餐结束，还上了一盘中国古典风味的杏仁羹，系用石块碰压取出。她坚持说，餐馆里做杏仁羹早已不使用货真价实的杏仁了。她这种生活远远超出了一般中国人的水准。

晚餐之后，孙夫人的私人保健医生进得门来，跟私人秘书使了个眼色。私人秘书遂暗示坐在孙夫人旁边的女助手，助手马上宣布说：“您该休息了。”

众人扶着她上楼休息，我乘此机会将住宅巡视了一番，其中还有她的私人影院。那是间长形房间，天花板很高，玻璃窗很大，面向屋外的花坛。室内摆着十来行座

椅，上面分别铺着棕黄色和灰色椅套，正前方垂着银幕，正后方安着两部放映机。据说孙夫人身体健康之时，非常喜欢观看美国的近期影片，有时一看就是两部，甚至三部。整个放映会持续到凌晨，而未收场就独自离去据说有失礼貌。这种特殊待遇，据中国人讲，只有政治局委员才可享受。

在孙夫人住宅外的车道上，还停着一辆唯有达官贵人才能坐的红旗牌豪华轿车。中国不准私人拥有车辆，所有轿车均由国家指派，并配有司机。一般说来，这些车辆的所有权属于派出单位，如国家机关、学校或工厂，不为任何官员私人所有。报纸时常告诫人们，不要挪用公车以送妻子购货或送子女上学。然而只要随便看一下北京的各大百货商店和一流餐馆，均可发现一排排的公车停在周围，从中钻出前呼后拥的亲眷友人。

上海的一位满头白发的工程师对我说：“我时常为妻子利用公车感到不安。车是属于人民的。但我一和她谈起，就老听她说，我也是人民。真没法和她争吵。”他谈着，竟情不自禁地笑起来，而爱说这种笑话的也的确不少。

在一个绝大多数人必须以自行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国家，红旗牌轿车称得上是一种莫大荣华。该车系50年代初自行设计、手工制做的豪华车，后来仿照梅塞德斯改进了发动机系统，又仿照凯迪拉克改进了车尾部分。车内镶嵌了光滑照人的木板，安有活动折椅以便超员启用，这类似凯迪拉克救护车型。后排座全由沙发套铺盖，棕色窗帘可遮住全部玻窗，以避人窥视。该车由长春一工厂生产，年

产仅200辆，故只能分配到高干。

我亲眼见过，驾驶红旗车可以不受限制地到处进出。有天下午，我正和一位澳大利亚外交官在国际俱乐部打网球，只见驶来一辆一眼便能认出的长车身的“红旗”，下来一位年事已高、满头白发、穿着空军制服的老人。一名随员手中拿着两只网球拍，系美国所产，每只价值200美元，另一名随员提着水瓶，捧着茶杯。国际俱乐部据说是只供外国人进出的，于是我向随员们询问他们首长的身份，两人均摇头说：“不清楚。”后来还是看守场地的中国服务人员告诉我，来者系空军中的一位将军。

当我把这段见闻讲给那位带我参观高干住宅和特供设施外景的将军儿子听时，他点头表示认识，并说：

“中国的实权掌握在军队手中，”他说话的口气不无自豪和骄傲之感。还解释说，军队是中国的国中之国，他父亲的级别相当于中将，月薪400元。但钱并不能说明一切，他父亲也有免费的住房、小车和军队提供的食品。除此之外，他父亲还能通过位于北京西郊的全国军工供应部门买到廉价消费品。他和朋友们的摩托车就是从那儿买的，这在当时中国的一般商店还无法见到。

不仅军队高干享有特殊照顾，中国450万武装部队中的普通干部也比同级文职人员的日子好过。军队干部转业后将被安置在工厂或公社的重要领导岗位。一般说来，乡村的年终结算会额外照顾军人家属。文革期间，曾号召军队接管备受派性武斗折磨的大学和工厂，据说后来于70年代初期又相继撤回兵营，然而也有的部队觉得占据的环境太舒适，以致置国务院的三令五申于不顾，不愿撤走。我驻

京期间曾听教育部报告说，部队仍占着2,000万平方米的校园，比好几年内政府能投资修建的还多。1979年，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就曾示威游行，抗议某部队司令部继续占据该校三分之二的校园。由于部队的驻扎，学生们缺乏教室和饭堂，但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后来竟被驱逐出校。

然而在我看来，军队生活中最令人吃惊的特点，却是军官都拥有自己的勤杂人员。朋友们告诉我，连长以上军官都配备有通信员，而通信员则要干各种勤杂活计。有位朋友说，他父亲的通信员要负责擦皮鞋、扫房间，甚至打漱口水和挤牙膏。后来我还听说，所有8级以上文职人员，即副部长以上高干，每月都可以拿到50元补助以雇家庭佣人。北京的不少此类佣人来自华中地区较为贫困的安徽省，该省类似美国的阿巴拉契山区。他们来到北京寻求较好生活，由于为人所雇，没有各种必要的合法证明也能想方设法住下来。

当然，尽管中国存在着级别体系、特殊照顾和各种特权，共产党人却做出了巨大努力来减小上下之间的差距。而中国人行事的重要特点可以看成是，不得张扬这些差别，只能加以淡化。身居高位的人们有权获得自己的享受，但不得大肆张扬。

这种令人奇怪的酸甜并举手法和在平均主义与特殊照顾之间左右为难的心理，集中体现在中国如何对待司机的问题上。一方面，官员们用不着自己动手劳动，就能享受司机的接送；另一方面，只要一看到司机，就能使人意识

到自己的所做所为并非是在实践社会主义的人人平等。因而，当官员们外出赴宴时，就达成了一种实在的妥协方法来解决这种难堪。我初次邀请新华社的一群中国记者吃饭时，满以为已经周全地考虑到了各种细节，如打电话给餐馆预定酒席、商谈好每人标准、报清赴宴人数和赴宴时间。谁料那天餐馆的值班人员一句话就问得我不知所措：

“那司机们的标准怎么定？”

我转念一想才明白，我还得为送记者们赴宴的司机买份饭菜。因为他们只能靠司机开车送来，而众人进餐，司机在旁等候，不吃饭情理上不合。

不过，餐馆的服务员告诉我，为司机买饭用不着花每个客人那么多钱。据他说，我为记者的破费标准是人均20元，在司机身上5元就足够了，啤酒和香烟已包括在内。

中国人用以掩饰人们之间差别的最明显办法，是众人穿戴相同的服饰。人们穿上蓝工装和黑衣服，衣裤肥大、无棱无角，有助于逃避邻人耳目，以免被指责为个人富裕、追求时髦，从而被视为过着资产阶级生活。而衣服的新旧、款式的好坏和色彩的鲜淡又随政治气候发生变化。

一位教英语的老师回忆说：“有什么大的运动一来，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我们把家里的陈谷子烂糠衣裤全翻捣出来穿上。我家里还放着那些补疤衣裤，破得像农民穿的，全压在箱子底。”

但随着1976年“四人帮”的倒台，中国人精神上开始活跃起来，对衣服款式的追求意识又重新萌发了。这在干部的服饰上体现为衣裤质地的提高，中国人现在大多认为，可以根据所穿中山装质地的坏好来辨别干部的级别和

社会地位。一般说来，质地越好、做工越细、裤腿越直，地位就越高。干部们仍拥有定做衣裤的服装店，在北京是靠近昔日公使馆区的“鸿宾馆”（音），在上海则是南京路上的“培乐蒙”。有次到上海，我禁不住为该店橱窗中的小礼服所吸引，驻脚观望之时，上来一位满头白发的推销员。他向我保证说，该店所有产品都是手工缝制而成，“我们专为高干定做衣服，他们很看得起我们的手艺。”

北京为了减少军队中的不平等，曾于1965年取消了军衔制，这在外国人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的中国武装部队人员并不佩戴肩章、绶带和勋章，但表面上的差别仍然存在。新兵不可能一下当上将军，上下也不可能照拿一样的薪饷。实际上，新兵们也能认出谁是上级，照样需要敬礼致意；连长虽不被称为上尉，却仍被视为连队指挥官；大家虽然都穿着肥大的绿军装，军官的衣袋却是四个，义务兵只有两个。

政府也采取了若干实际措施来尽力平衡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差别。在一个拥有10亿人口而资源相对缺乏的大国，为了保证人人都能得到食物和消费品供应，共产党人对诸如粮食、菜油和布匹之类的基本物品实行严格的配给制。中国的住房尤其紧张，按西方人的标准只能算陋室简居。政府为了保证人人都有栖身之处，尽量将房租降低到每月3至4元的水平，使全体居民都有能力支付。工资水平的确很低，城市工人月薪只有60多元，但用不着交所得税，且国民总产值的四分之一用到了扩大再生产投资，这有利于全民的未来利益。虽然工业在投资中所占份额较大，但北京却全力以赴地发展教育和医疗卫生，这也同样有利于全民

的利益。各行各业固然有其各自的级别体系和相应的工资水平，但全国的级别体系和工资水平是完全统一的，各行业内并无大的差别。为了补偿边远地区物品稀缺造成的价格高昂，也为了补偿特大城市中日常生活费用支出过多，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一套完整的11类区生活费用补贴办法。根据这套办法，安徽的小城镇因为肉食和蔬菜便宜，被定为4类区；而省会合肥当属5类区；依此类推，北京6类区，上海8类区，西藏居全国之冠，为11类区。根据各人所居住的城市消费品物价的高低，政府的所有雇员将在工资收入之外，获得数额不大的补贴。据我所知，在这套办法之下，中国人无论居住何处，都不会因为住地原因而减少收入。4类区为全国消费品物价最低地区。

北京试图淡化差别的努力集中表现在对运动员的政策规定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弄清中国是如何培养造就体育明星的。我只是粗略地知道，中国人模仿苏联，采用国家财政支持的办法搞体育，由设在北京的内阁部级机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统管。局外人都清楚，中国各地遍布所谓的业余体校、业余体操队和业余游泳队等，用以接收和培训有希望成才的青少年。而且，国家各体育运动队队员领取政府所发薪金，已是公开的秘密。但即使是我最好的中国朋友，包括一位在国家体委工作、家住体育大街国家队员宿舍的朋友，也拒绝谈论中国的体育体制。

“有人说，中国运动员全是职业运动员属于一种秘密。”他这样说的意思是，宁肯谈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失望，也不愿谈论运动员的培养。这种遮遮掩掩的保密气氛很容易使人以为，中国像俄国和东德一样，国家采取大规

模的财政支持计划来培养和奖励运动员，使之一旦成名就有可能变为富翁。

终于还是一位熟人打破沉默，向我道出了实情。她说起话来无精打彩，没有那种为当游泳运动员的女儿感到骄傲的神情。她女儿5岁就开始学游泳，后来为附近的业余体校教练所发现，接收到学校游泳池，每日从事四、五个小时的训练。到了11岁那年，又被选拔到北京队进行全日制训练，当母亲的亲自送她到所谓的“训练营地”。这样，女儿就只能在每天上午上学，而且课程已经减少，只上数学、汉语和政治三门中国的必修课。“于是，她每天下午和晚上都去训练，像在池中游圈，在岸上跑步，举重和活动关节等。”她女儿目前只是星期日下午才回家探望。

多亏了这套系统的训练，女儿获得了自由泳的全国冠军，并被光荣地提名为一级运动员。这种名誉在中国仅次于声誉最高的运动健将，最低者系三级运动员。

然而以美国或苏联的标准衡量，所获奖金相当有限。实际上，当母亲的则深为女儿的前途担忧，因为中国运动员在年满17岁之前是拿不到政府的薪金的。到了17岁，才能领取相当于工厂新工人工资的每月40元，而中国的晋级加薪又十分缓慢。即使像中国的前世界乒乓球冠军庄则栋，虽然受到江青提拔，当了国家体委主任，也只拿百元左右月薪。在文革前相当一段时期，中国运动员若能在国际比赛中获得前三名，将领取100元奖金，但就连这一条在文革中也取消了，原因是太资产阶级化。那位母亲指出，而且，女儿一旦高中毕业，将会没有着落，因为学业已经荒废，考不上大学了。她可能被安排到工厂当工人，如果

运气好，也可能被提名当教练。

当母亲的也承认，女儿的确受到了补贴，也正因为如此才总是和自己分开。女儿每月获得60元的生活补助，虽然高于一般工人月薪，却是交给训练队添补营养品的。女儿穿衣也不用花钱，全由国家包干；要是当上运动健将，每月还能领到6元钱的奖金；其它的好处就是时常到全国各地旅行。在中国这样的交通设施不足、购买车票困难的国家，出外旅行的确是一种特别照顾。当母亲的还发现，“当运动员好玩。”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平淡无奇，哪怕是一点细微差别，人们也会使用放大镜来观察。

诸如此类的细微差别，在局外人看来无足轻重，对中国人却举足轻重，这些差别也运用到了其它行业。北京的支持者们时常请人们注意，中国不同于苏联，不会让那些为国家的威望做出极大贡献的著名作家、影星或核专家变成百万富翁。然而实际上，这些人士大多生活得相当舒适，只是谨小慎微，不那么惹人注目而已。也许中国作家之首富当推巴金。作为左翼小说家，他那半自传体式的三部曲《家》《春》、《秋》，曾风靡中国，使他成为全国最受欢迎的作家。现在，他仍居住在50年代自己花钱购买的一座西式住宅中，宅外大门紧闭、车道漫长。他没拿国家薪金，据他接受采访时说，他用不着。文革中红卫兵散发的传单估计，他的所有财产约合20万元人民币，全都来自稿酬收入。如同其他文化界名人一样，他受到了红卫兵的攻击，财产遭到没收。不过，现在已经平反，住宅也已经归还。

拥有适当级别和身份的人们可用许多办法来对付生活的艰辛而又不过分张扬。如果身体患病，可以安排住进特别医院。在首都的新侨饭店附近，就座落着这样一所绿树掩映的现代化设施，人称北京医院。周恩来总理在1976年逝世以前，一直住在该院治病。一位前去探望高干亲戚的中国科学家深为所发现的该院拥有的美国、日本和西欧的先进医疗器械吃惊。他将该院设备与住家附近的诊所进行比较，说那家诊所连台X光线透视机也没有。在云南省的昆明市，一位医生告诉我，他在高干病房工作，如果条件许可，高干们能得到外国药物治疗。在文革期间，他因为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受到批斗，被弄去打扫厕所。但遇高干病人前来就诊，仍要把他找来诊断。

干部们和普通中国人一样领取配给票证，但他们拥有额外的享受和补贴。朋友们告诉我，干部们经常参加各种会议，多者达每月20天，吃喝费用多由国家报销。

某些特殊消费品只向极少部分人供应。用进口烟叶生产的熊猫牌过滤嘴香烟无法在任何商店中买到，只能见到若干领导人手中有吸的。我是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位领导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才看到熊猫牌香烟的。在他桌前的一个本子和一支铅笔旁，放着一盒这种香烟，因为盒上图案清晰，易于辨认。

北京饭店有严格限制，一般中国人难以涉足，但凡穿灰制服的警卫不认为你是饭店工作人员，就会上前严厉盘问。但我在一个秋天下午却满怀兴致地看到，一辆红旗车径直开来停在入口处，身着军装的通信员急忙跳出车来前去为乘客打开后门。随即下来一位年逾古稀、头发花白的长

者，后面跟着他的妻子。门边警卫一言不发，看着他们慢步进来，再目送他们上了电梯，前往二楼的饭店理发厅。我后来得知，内阁部长、军队将领及其子女们是饭店的男女理发厅的常客，虽然理论上是只供外国人所用。某位高级将领的女儿现在已是一名军官，据她说，自从当小姑娘以来她就一直来这儿理发。

同样，只有拥有相当级别的干部、军官和地位特殊的其他人，才能买到航班稀少而求购者众多的机票和列车软座票。所谓软座，即全国铁路客运一等座，备有松软垫椅、遮光窗帘，一人一座、过道清静。与此相对的硬座则是次等座，通常为木椅或硬胶面椅，乘客数量往往多于座位。

持有软座或软卧车票的乘客通常经由特殊门径进站，特殊门径大多安排在候车大厅旁边。在曾是中国南宋都城的湖畔城市杭州，车站的头等候车室设在一道铁门之内，进去还要走一段沙砾车道，室内摆放着软椅，地上铺有小块地毯。乘客们从这儿进入站台，可以避免大候车室那种人流拥挤，而大候车室中也只有硬木座椅。因为头等候车室也为外国人开放，使我见了不少，情况大多类似。

中国不像苏联，私人可拥有乡间别墅，只要对国家有较高贡献，可以在其中尽情享受。但中国有种“招待所”，干部出差可以歇息其间。在安徽合肥，我偶然看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生活讲究。当时，我正陪同马里兰州长哈里·休斯访问安徽，以便签署与该省结为姊妹州省的协议。休斯被安置在1958年为毛泽东的巡视修建的一座郊外宅第中下榻，整座宅第座落在一片浅丘园林之中，分为多套独立

的客房，且正前方面临湖畔。毛泽东曾下榻的那座客房是稍带现代风格的砖石玻璃结构，但被装点成了菜绿色，大概是为了保持与周围松树的色彩协调。旁边建有电站房，以确保客人住进时有电力供应，这反映了合肥市供电不稳定。电站旁边有一小屋，专供电工居住。据说毛泽东巡视到此正值6月天热，他在砖石玻璃平房顶上安好椅子坐下，观望周围的景致。下边的客房门大开，可以看到室内的卧榻和天花板上的金属网罩。

通向这座平房的过道长约十几公尺，全由红色地毯铺就；平房共有客房8间，均镶嵌着黑色板壁，这在木材稀缺的中国极为少见。主卧间树立着一面大穿衣镜，一只多层衣橱和一张黑檀木双人床，床上挂着蚊帐，各扇窗户均为黄色丝帘遮盖。主卧间带有一小小的会客室，一套大型沙发几乎占据三面墙壁。旁边两间卧室也放有双人床，各自带有会客室。起居与用餐合用的那间房中摆有三张大沙发，另有几个陶瓷大花瓶和一台彩电。

用中国人的生活标准看，客房中最豪华的要算宽敞的盥洗间，间内的浴缸成L形，高约一公尺半，铺有几级石梯上去，梯旁竖有栏杆，以为老年浴者扶握之需。间内有一西式抽水马桶，另有一中式蹲坑和一道尿槽；浴缸旁还有一张铺有皮革的躺椅，以便洗浴完毕能接受按摩。这座宅第总共有20名服务人员。

在其他地方也建有此类招待所和旅馆，如北戴河休养地、黄山、杭州西湖及青岛疗养所等。美国商人罗伯特·皮卡斯回忆过他曾在青岛海滨疗养地找人的困难。到青岛去之前，皮卡斯曾与一丹麦建筑承包商约定去后再见。到

了青岛，皮卡斯被安置在一家普通旅馆住下，而那位承包商却因为正与该市谈判港口改造方案，被安排到特定的宾馆住下。皮卡斯费了不少周折，仍难以找到丹麦人，不料最后竟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解释不见踪影的原因。

“我说不清我这是在哪儿，因为管理这家宾馆的人都不知道这儿的名称和地址，”皮卡斯听得出丹麦人正极力压抑着笑声，“我也不知道你该如何给我挂电话，那些人

说他们也不知道电话号码。”

尽管人们能以这种保密形式掩盖许多特权现象，普通中国人仍然明白自己的地位并不平等，并不时喷有烦言。热情提倡革命性的平均主义，给城市和乡村的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这些人并没能为这种革命理想树立典范。

复旦大学是中国最有声望的三所大学之一，一名美国与该校交换进修的学生对我说，最近，该校新闻专业的学生对公众舆论做了番调查。调查题目是询问其他学生，中国当前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什么？舆论调查者们进入学校图书馆，关上凡能进出的大门，向在场学生散发询问表。在作出回答的几百名学生中，有40%的人填上的答案是“权利”。

有的领导人也不时遇到政治麻烦，原因是超越了正常的干部照顾权限。某大报曾经在它的版面上评论道：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建国初期顺利地清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从而树立起崭新的社会风尚？主要原因之一在于，那时的社会风气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间享有崇高威望。

该报接着说，然而现在，党员和党的干部“不仅为自

已争特权，而且为子女争特权。他们想方设法让子女入党、从农村转回城市、安排进大学，甚至安排出国。他们把子女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干部中的这些行为极大地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该报将这种革命理想的淡漠和利己主义的抬头归咎于“四人帮”的影响，而中国人大多明白，应该怪整个文化大革命的10年。

首都人爱谈的另一个热门话题是孙逸仙夫人的继女晴兰达（音）。我初次见到她是在北京饭店的餐厅，她穿着一条短小紧身的羊毛裙，上身是浅黄色罩衫，脚上是棕黄色高靴。晴兰达25岁左右，体形苗条，个子特高，一脸抹得胭脂红眼蓝，长相算不上漂亮，却神情傲慢、惹人眼目、富有女性美。她那副样子颇像来自台湾或香港的影星。

后来互相熟了，我问她是干什么的。“当电影演员。”她回答得干脆，还说刚应部队电影制片厂之邀到湖南拍片回来。此后经常见到她，要么是上北京饭店的美容厅，要么是坐着红旗车去国际俱乐部。我应邀去孙夫人家吃饭那天，曾问过她晴兰达的身世。孙夫人解释说，晴是自己贴身警卫的女儿，由于警卫酗酒过多，四肢瘫痪，才把她收养过来。

在一次向中国著名演员颁发每年一度的艺术奖的仪式上，我看到晴兰达坐在最佳男演员奖获得者李仁堂的身边。这场仪式在北京饭店的舞厅举行，并通过电视向全国作了报道。晴兰达穿着一件大红丝绸罩衫，套着大红的绣花短裙，坐在一群衣着朴实的人们中间显得分外惹人注目。她还要吸烟，这在中国年轻妇女中非常少见。当发觉一名加拿大电视摄影师注视到她时，她忙从手提袋中掏出

一个连镜小粉盒，照看鼻子是否能够反光。我注意到，她那手提袋中有一盒万宝路香烟，系外国货，在当时的中国商店还很少见到。某位在电影业工作且知晓唷兰达的妇女说：孙夫人一死，她那电影明星就当不成了，那就全都完了。”就在孙夫人于1981年逝世前不久，她嫁给了一位长相俊美的男演员。我时常为她未来的命运感到好奇。

然而，并非所有的高干子弟都这样放荡不羁。我认识几位党政干部和军队将领的女儿，他们虽然也从父母的地位中获得好处，待人处事却十分小心。一位年龄28岁、长着翘鼻子的女孩，她承认，高中毕业下乡后，曾利用父亲任某省第一把手的关系，设法回到城里。她父母亲都生在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十几岁就跑出来参加红军，国民党因此杀害了祖母祖父。这种鲜红的阶级出身有助于她调出农村，并于文革末期进入北大学习。毕业后，父亲为她联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舒适工作，她的业务是审查西方影片。据她说，半数同事都是干部子弟。但她穿着一身蓝、灰色衣裤，并不吹嘘父亲的官职。

对她说来似乎并不傲然于自己的出身，也没有考虑过世袭的问题。

一位早年在美国接受教育的思想深邃的经济学家就此发表评论说：“这个问题很使他们伤脑筋，他们肯定在家人中讨论过。老年人最多能够做到让儿女们受好教育，得到个好工作，就得安息了。这很大程度上是事实。我发现，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政治局委员们的子女并没跃上什么党政和军队高位。与此相反，他们要么是自己选择，要么是组织安排，投身到其他行业。有搞自然科学的，有当电影

明星的，也有当中旅社导游的，还有当医院医生的。这也是较为安全的办法。当然，也可能是由于年轻一代受到舒适生活娇惯，已经缺乏老一辈那种雄心抱负。中国的情况和欧洲有差别，中国历史上从没有一个世袭贵族能延续几十代而不衰败的。

据这位经济学家解释说，他所认识的一位中央委员逝世之后，其遗孀和子女就被要求搬出原来的面积大、采光条件好的四合院。当然，其间有半年的宽限期，而且新分套间也相当不错。待到遗孀逝世，子女们又得搬家，这次是搬到较窄的住房了。所有这一切，均由党组织出面安排，用这种办法，使其地位逐步下降。

某些支持中国的人们争辩说，北京经过几十年努力，已经建立起一个模范的革命化社会，已经迈出了相当的步伐来消除社会不平等。的确，在艰苦的延安窑洞时代，在解放后的50年代初期，情况大多如此。但过去30年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再加上食物、消费品、住房和就业机会短缺，已经极大地损伤了革命肌体。一些干部变得保护自己及其家人的既得地位，贪婪地寻求个人的物质享受。

如果只从货币数量上看，这些干部的确仍维持着他们昔日的平均主义面目，人们的工资数额相当有限。但货币数量并非良好的衡量手段，真正的区别在于伴随着政治地位而来的照顾和补贴、舒适的住房和配有司机的轿车，以及特殊食品供应和免费旅行的机会。在我看来，中国人对官职的迷恋程度不亚于纽约社交界对金钱的崇拜。

中国人对官职的重视并不因为寿终而结束。在安葬着

许多领导人的北京八宝山公墓，有供哀悼者们集会的多处追悼会场，也有供安放骨灰的多间陈列室。根据法律规定，城市人死亡之后必须实行火葬，以便为农业生产节省用地。若死亡者为国家雇员，工作单位则负责支付20元火葬费。然而陈列空位毕竟有限。若将骨灰堂一室及副室留给地位最高的干部，骨灰堂二室留给地位次之的干部，再如此类推下来，那么，结果将是人们为争夺空位而苦恼。这是一位送母亲前去火化的中国人告诉我的。

在过去，骨灰一经安放，将永远留存。但随着中国人口的迅速增加，现在普通中国人骨灰最多只能陈列5年了。限期一到，亲属们得前去移往它处。作为例外，高干们的骨灰可以无限期陈列。

第4章

关系、后门——铺天盖地

“我们的思想靠左，钱包却靠右。”

——当代中国俗话

我到中国后，还一直没接到过莫名其妙的电话。哪知就在我准备离开北京回国之前，却忽然来了这样一个电话。我立刻揣测，要么是朋友在开我的玩笑，要么是某个中国人找错了人。打电话的人自称是北京展览馆餐厅的雇员，问我是否就是美国记者包德福。那是好几年以前在台湾时，一位教师为我取的中文姓名，大概模仿了我的英文家姓巴特菲尔德的谐音，同时选择出有一定意义的汉语单字拼合而成。

对方在电话中质问我：昨晚为啥不来吃你早已预订、餐厅完全备好的宴席？

这句话让我一下子摸不着头脑，如坠雾里云中。我从没去过那家餐厅，更没预订过宴席，也许是对方把姓名搞错了吧？

但对方并没搞错，他坚持说：“你是前天来的，拿着名片，订了40人吃的宴席。你必须付款！”听得出，对方声音中不乏焦急愤怒。

预订宴席是中国高级餐馆的惯例，而对于外国人更需如此。因为这样一来，你可以被引进后堂或楼上的特别保留餐桌前就坐，收费也得增加到两倍、三倍，乃至四倍。宴席收费是按人头标准算，而不象西方餐馆按每份菜价算。如果有客人未到，出席宴席的不足订餐人数，你也得按订餐人数付给全额。我在北京呆了这么久，对这些规矩早已熟知，于是小心谨慎地问对方，我当时订餐的人头标准是多少？他立即回答，是40元。那就是说我总共该付1,600元人民币。

这使我确信，对方肯定是搞错了人。于是，我砰然挂上了电话。

哪知次日又接到这种电话，这一次对方声称是东来顺餐馆的，该餐馆在北京以蒙古人的火锅涮羊肉闻名。对方问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头天晚上为啥不来进餐？为啥不为预订宴席付款？我极力辩解，他听得烦了，像是要鼓励我坦白，就揭出老底：“是你让自己的秘书到这儿订的餐嘛！”

我的秘书？我压根就没什么秘书！我随即追问，是女的吗？只听对方回答，是女的，还拿着你的名片。这就对了，肯定是有人打着幌子冒充我。于是我又问，那女人像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方回答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在接下来的那两周中，几乎每天都接到这样的电话。北京素餐馆宣称，我去订了一场60人的宴席，人头标准60

元，外加12个司机，每人标准5元，一共该付3660元。一家大百货公司来电话说，我要的200公斤羊毛线已准备好，请前去提货。最令人奇怪的是，所预订的宴会和百货，既无人去吃，也无人去取。

终于有天早晨，我接到了警方来的电话。公安局的一位官员开始以例行公事的态度询问：你是否就是姓包的美国记者？当我承认后，他随即说：“我们想和你核对一下昨天你来派出所报的案。你不是报案说中央交响乐团一个姓陈的人在生意中诈骗了你吗？”我一听这话，急得直想申辩，压根就没这回事，我会做什么生意？但我立刻意识到，尽量让他多讲些，会有助于了解实情。据那位官员讲，“乐团那位姓陈的要我在友谊商店为他买自行车和名烟好酒，当然是用我的外汇去买。而一旦买给了他，并没付我人民币就携货潜逃了。因此，我昨天到派出所报案，请求警方将陈抓获归案。”

真是天大的谎话！不过我也从中看到了冒充我的那人已经狗胆包天，敢于伪造身份闯进派出所了。我想，要向警方证明这一切并不是我干的还不是那么困难，就问对方，昨天到派出所报案的是不是中国人？“是中国人，”他回答。

“但我不是中国人呀！”我试着将对话引向自己的思路。

“但你说的也是中国话呀，”对方回答得很精。

如此看来，是我低估局势的严重性了。眼下，我唯一的办法就是亲自去公安局，让他们验明正身，我确非中国人。

只听对方又说：“那我们要如何才知道你不是中国人

呢？”我顿时倍感受宠若惊，因为对方无法在电话上判断我是不是中国人，说明我的汉语口语已经过关了。但一想到眼前的严重局势，我的沾沾自喜不免烟消云散，迫不及待地想到公安局去。

最后，我终于说服电话中的警官同意我亲自上公安局外事处一趟。外事处是专门处理涉外事务的，座落在一家非常美观的中国传统四合院内，进去之前得经过一道圆形的月亮门。我猜想，这四合院以前一定属于某位巨富。外事处门廊矗立着粉红色的木柱，斜形屋脊上铺盖着蓝绿色的琉璃瓦。一进门，只见屋中坐着五位警官在等我，包括长着一头灰发的高个子男性，五官非常俊美，还有一位女速记员，听我讲述事情经过，她禁不住哈哈大笑；另外就是一位蓄着平头、长得精瘦的男子，面部表情严肃，几乎看不到任何笑容。他是我在中国见到的唯一还佩戴毛泽东像章的中国人。我不明白他为啥要保留那个时代的纪念品，就好像美国人至今还佩戴着支持尼克松参加大选的徽章，于是十分好奇地向他请教。“我热爱毛主席，”他简单地回答说。他还问我，是否能向他们提供一份我的中国朋友名单，以便从中查出罪犯。我十分有礼貌地拒绝了，那显然是一种借口。

不久，警方果然抓获了冒名的罪犯。罪犯是北京某工厂工人，现年23岁。化名苏丽娜，冒充香港女商人，拿着名片经常进出于宾馆和商店。我最初也是这样认识她的。有天晚上，我到北京电报大楼去发份电讯稿，见一位女人站在柜台前与服务员争辩，大概是为了收报地址问题。她想发到香港九龙贸易公司，但除了这个商号名称，却并无

商号地址。服务员当然拒绝接收电报稿。

我注意到她的穿戴完全像地道的北京人，身上裹着宽大的短黑棉衣，头上罩着羊毛围巾。但她说话却带有广州口音，显得南腔北调。最后她只好站到一边去了，服务员接下来阅读我的电讯稿。她于是转过身问我是干什么的，我按照驻京外国记者的通常习惯，给了她一张名片。这犹如垂钓者一样，放出长线，希望钓住大鱼，认识新朋友，获得新消息。只听她自我介绍说，是九龙贸易公司雇员，住在北京的华侨饭店。只是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她的口音和身份都是假装伪造的。

这件事让我倍感兴趣，但也大惑不解。她冒充我的秘书四处活动，实际上只有一次获取了物质上的好处。那就是她在东来顺餐馆，经理眼见订餐如此之巨，兴奋之余，邀请她共进午餐。然而，中国朋友们对这件事似乎觉得很自然，他们向我解释了她的奇怪行为。多少年来，中国行政部门思想僵化，办事效率差，致使出现全国性的食品、住房和消费品持续匮乏。许多干部能够通过权利克服这个难题，他们能获得特殊的食品、消费品供应，能安排到住房和旅行的便利。但作为普通群众，却缺少这些途径，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打通各种关系来搞到所需的物品。这就形成了一种私下交换活动，或称“地下黑市”，既与正常的国家计划经济并存，又促其发挥作用。这种交换活动被中国人称为“走后门”。

这种走后门活动的最惊人之举，是冒充高干子弟或外国人，以通过一般中国人缺乏的途径获取物质好处，因为只有高干和外国人才能接触到平常人梦寐以求的奢侈品。我

听人讲过若干冒充案件。上海的报纸曾详细报道过一位由乞丐变王子的诈骗犯的经历。他是年仅25岁的农民，长相平平，冒充某位副总长的儿子到了上海，想看正在上演的莎翁名剧《无事生非》，却发觉戏票全分给了各单位。于是灵机一动，以上海市委下属某部的名义跟剧院挂电话，以命令的口气说，自己有位朋友是某某副总参谋长的儿子，想来观看你们的演出。这边接电话的是剧院经理，顿时受宠若惊。后来，这人不仅搞到了戏票，而且被介绍给一位年轻美貌的女演员，并借所谓他父亲的高官厚禄，轻易地获得了女演员的好感。一次骗局得手必然会导致另一次骗局。这人不久就获得了人们主动送来的大量礼物，有高档衣裤、进口手表、时髦住房，还有某大学党委书记借给的轿车。这人的诈骗活动之所以结束，是因为受到了住所附近的街道办事处的怀疑。他为了让新认识的女朋友进入一个颇有名望的剧团，要求办事处出具证明。办事处干部讨厌这种高干子弟的走后门作风，不同意办理手续，还对其背景进行了调查，就此揭出了他的真面目。

相形之下，冒充我和我秘书的那个女人的运气就更糟了，她从未再次去同一地方取货或吃饭。她可能是一场阴谋诈骗活动中的小角色，但更可能是一个恶作剧制造者，只是简单地想看看盗用外国人的名义招摇撞骗会闹出什么样的社会后果，会带来什么样的心理满足。有些时候，人们的发疯表现正是现实生活的精确反映。

走后门所涉及的大多是日常生活琐事。个人、工厂、公社和机关采用这种办法来对付中央计划经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培植关系、骗取信任，意在获取物品和服务。

这些物品和服务有可能是经由正常渠道无法获得的，也可能是需要旷日持久的等待的。物品中有可能包括结婚宴席上的山珍海味，也可能包括受人羡慕的工作职位。至于服务，则可能是民航机票，因为当时空中旅行还仅限于政府官员。

记得有天下午，我正抓紧时间为《纽约时报》写篇稿件，一位北京的女记者突然打电话来约我去看电影。我问这位老熟人片名叫什么，她却回答说还不清楚。女记者唯一能说清的是，票是她朋友送的，说是一部美国电影。这当然是中国人称之为的“内部放映”，不会放给大庭广众看。北京当时还很少上映外国影片，要有这样的门票当然是众目所望，先搞到再说，管它叫什么片名。

放映室座落在一大片红砖办公楼之中，整个内部空间不大，门外也没有任何电影广告的字画。我注意到，这间放映室完全不同于北京的一般商业性影院，室内摆放着软和的座椅，上面罩着灰色的椅套，而脚下则是豪华的蓝色地毯。商业性影院多是硬木活动椅和光秃秃的水泥地。为了避免别人看见中国人和外国人一块行走，我俩商定各自前往放映地点。但入场后灯还没熄，女记者就居然大胆地坐到了我的身旁，这显然是对官方规定的挑战。而且，她还为自己的举动沾沾自喜，也许是这样违禁给她带来了快意。她向我低声耳语说，观众中有几人她认识，我们前排坐着的是某位副外长的妻子，她也是外交部官员；我们后排坐着的是某政治局委员的儿子。到电影开始，一看是《巴顿将军》，我顿时感到茫然若失，心中责怪安排者不该选这部影片。谁知女记者和其他观众却看得津津有味，深为

巴顿身上表现出的赤裸裸的爱国主义叫好，还特别为最后的美苏两国军队庆祝战胜德国人的聚会时巴顿怠慢俄国将军们感到高兴。

这个人约有30来岁，做事大大咧咧，很有主见，最近还上美容店烫了一头卷发。电影完后，我问她是如何搞到的门票。“当然是走后门，”她回答得十分干脆。她接着解释，一位在北京电视台工作的熟人迫切想调换住房，因为上班地方离家太远，骑车得50分钟，于是，她就将这位熟人引见给自己在市房管局的亲戚。作为回报，熟人每逢遇有内部电影，总要给她送来门票。她回忆说，有天晚上竟看了部法国电影，叫《红色的婚配》，说着还情不自禁地格格笑起来。我知道，那是法国的一部半淫秽片。她后来听人说那部片子是从一位称为专家的法国外交官手中借来的，那法国人和中国政府签有合同，正在北京教法语。片子一经借到手，就在各单位之间转来转去，最后竟弄到北京展览馆放给一大批观众看，使得其中的高干们不知所措，倍感难堪。

女记者这样搞电影门票算是典型的走后门。据中国朋友们讲，走后门就是人们之间的好处交换，但一般不涉及金钱，否则会被视为行贿受贿，那是违法的。走后门主要依靠各人的传统关系，即在亲朋好友、同事同学之间培植起来的密切交往和裙带联系。我在北京呆的时间越久，就越能体会到几乎所有事情都得靠走后门才能办成。北京的一位护士回忆说，文革期间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她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留在身边，决定请人教他学门特别的手艺，以躲避下乡。于是，她请求住在附近的某位著名钢琴家来

教儿子，而钢琴家考虑到邻居之间的长期交往，也一口答应。后来，当钢琴家的母亲患病需要住院治疗时，护士当然责无旁贷，安排让她住进了一家设备良好的医院。而钢琴家所教授的课程也发挥了预期的作用，护士的儿子躲过下乡留在了北京。

护士对我说：“这种交换并没有钱财转手，是靠的友谊互相帮助。就是党员，你也不能只抓阶级斗争，不要友谊。”

但我仍无法理解的是，钢琴家为什么不能靠自己的努力送母亲住院呢？既然自1949年以来已经大力发展了医疗卫生事业，而且，人们看病吃药大多是免费的，既有如此巨大的成就，为啥竟不能送母亲住院治病？听了我的这番话，护士直晃脑袋，嘲笑我的天真无知。她承认，的确，你说的都是事实，但每天到各家医院看病的人太多、太拥挤。我想，这是因为医疗费用太低的缘故。结果，每个医生一般每小时要诊断10到15个病人，就像是工厂里的流水线作业，加上国家计划考虑时不太重视，药物经常短缺。

一位接受过美国传教士教育、头已谢顶而性格开朗的内科医生说：“我们医院的病人要排三次长队，首先是要排队挂号，其次是要排队候诊，最后还要排队划价拿药。就这么排队，一上午时间就给你耗完了。

“医生们大多忙于应付病人，稍稍了解病情，就开了处方。开的药也多半没什么效，病人心里都明白。

“于是，不少的病人都想办法走后门。你要是认得医生，那就不用不着排长队，径直走进他门诊室只管看病，而且他还看得特别仔细。

“要是和医生的关系更密切，那就干脆下班后上他家，那才算最好的看病呢！当然，你得礼尚往来，得给医生送些东西。像过元旦、春节的，可送些肉呀、鱼呀、水果什么的。大家都爱说中国的医生是肥缺。俗话说，医生、司机和售货员共称‘三宝’嘛！原因是他们通过走后门，搞到的东西多。”

这位谢顶的老先生承认，王府井大街上的高级缝纫店师傅和自己很熟，要做套像样的制服易如反掌。而一般的顾客要么受到拒绝，要么等到猴年马月。老先生还能轻易地在东来顺吃上火锅，用不着像其他人那样提前预订或先买牌子。原因同样简单，餐馆经理是他的病人。

我逐步发现，中国实际没有私人的机动车辆，结果，各种货车、客车和轿车的司机们就必须经常开车出差，在全国各地飞跑。这就致使他们的身价倍增。有一次，我进了一家关门较晚的餐馆，发现里面喧闹哄哄，原来是司机们老爱上门光顾。我对面早已坐着一位皮肤黝黑的40多岁男人，他自我介绍说，是山东省某农业机械厂的司机。我俩随即互相敬了几杯啤酒和廉价的老白干，刺得我喉咙发痒心发烧。见我那副窘样，他吹嘘起了自己的非凡经历。听他说话的意思，好像厂里经常短缺原料和电力，于是劳动纪律放得很松，个人自由时间很多。每到这种时候，他总要开着卡车到邻近省份去拉煤，所获收入由他和工厂党支部书记平分。不幸的是，他有天夜晚开车打瞌睡，卡车撞上了别的车辆，弄得全报废了。

讲到这儿，司机露出一脸的愁苦相，又往我俩的杯子中灌入啤酒，接着说：“真是太他妈的糟糕，要不，每到

星期天我都能开车接送女朋友，还可以送朋友们去郊外野餐。”

另有一次，我和一位大学生熟人一起到一家拥挤不堪的小餐馆吃四川风味的麻婆豆腐。只见全部餐桌旁都坐满了人，我俩只好抓住两张圆凳挤着坐了下来。靠近的桌上横七竖八堆着食客们用过的碗筷，还有一堆啃得干干净净的鸡骨头。我这位朋友经常光顾这家小餐馆，说是最喜欢吃“家乡风味”的麻婆豆腐。我后来看清，所谓麻婆豆腐，实际上是豆腐加了大红辣椒酱和辣椒粉红烧而成，再放些花椒面。

但女服务员过来时，却告诉我们豆腐卖完了。朋友随即不慌不忙地掏出一盒国产香烟，大概是很名贵的牌子，放到桌子角落上。要是我不坐得那么近，简直看不到她会那么从容不迫将香烟连同桌上的鸡骨堆一起，赶进左手端着的拾掇盘内。我这位性情活泼的朋友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这场交易对他来说的确不错。他老爱和我来往，目的也是十分明确，借我来训练他的英语口语。原来服务员是他初中同学，为了应付昔日同窗们的所求，她多半留有豆腐待用。果然，只一会儿她就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金黄色佳肴出来了。

在业已僵化的中国现行国家分配工作的制度下，个人的职业由不关其痛痒的政府机构决定，这就促使个人要尽花招、穷尽后门，以求获得优越的工作，或调换优越的工作。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位大学生有个姐姐，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运动中，下到了边远的西藏。她已在那儿呆了10年，成了30岁的大龄女子。这在家人看来是一大不吉，

原因之一是大龄女子不好找丈夫成家，因为中国妇女多半在29岁之前就应完婚；原因之二是有可能被永远遗忘在那片海拔3,000多公尺高的遥远、落后的高原，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惧怕在那儿长住。于是，全家人决定，应该采取紧急救援措施。

“我父母接着就开始到处找人缘，他们明白，男人们大多不想要30多岁的女人。后来还是父亲发现，他办公室有个27岁的办事员，人很有往上爬的雄心抱负。于是托了中间人去向他讲明，如果愿意同我姐姐结婚，并在婚后利用他的北京户口申请调我姐姐回来解决两地分居，我父亲就给他换个好工作，并转为干部。具体说来，就是调到外贸的进出口公司当干部，那地方很热门，和外国人谈生意的时候很多。我父亲有个红军时代的老战友在那家公司当头，这全靠关系。”

随着人们开始将拓展对外贸易作为他们现代化方案的一部分，外国客商蜂涌而至，这就为走后门提供了新的机会。一个专门从事石油钻探设备买卖的得克萨斯人说，在某部举行的一次招待宴会上，他的东道主说话口气大得很。

“你们美国人压根就不懂怎样做生意，”负责接待的中国官员对他说，“你看到了我们部里那些梅塞德斯轿车吗？你以为那是从哪儿搞到的？”说到这儿，官员放声大笑起来，还不停地挥着手，“全是我们的西德好朋友送的”。

这得克萨斯人长得矮胖，在中国跑了许多地方，知道的情况不少。他告诉我，另一次和某公司谈判销售美国的钻井设备，事情进行得十分顺利，已到最后阶段。不料一

位官员告诉他：

“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办，总共算起来也不过这笔生意的2%。你要是同意，就将款子存入我们在瑞士银行的帐户。帐户号码我明天给你。”

这可把得克萨斯人搞懵了，这种情况他在印尼和菲律宾见过，却压根没想到会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遇到。但无论如何，得克萨斯人还是和中国同行们继续往下谈。他被告之，这笔款子并非为哪位个人所有，而是归这家公司。原来，公司作为国家机构，所创外汇必须上交政府，而用这种办法偷漏外汇，就能存上一笔活动资金供该公司自由支配，就能不受国家计划限制，购进那些财政预算中无法批准的设备。但这样做仍然是违法的。

这种营私舞弊活动并不令人惊奇，任何国家都免不了贪污腐化现象。而中国的令人惊奇之处在于，不仅个人，而且工厂和公社都要经常性地依靠走后门活动，才能进行正常生产。报纸上发表的一封江西某县的读者来信揭露，该地区各公社所需化肥的60%至70%得靠走后门才能买到，因为按国家计划调拨的化肥远不够农业生产所需。这就迫使各公社与附近化肥厂私下签订合同，而为了达成这些合同，农民们不得不奉送自己所产的猪肉、花生、大豆、瓜籽和木材。除此之外，公社干部还得设宴款待化肥厂的头头和司机，敬烟敬酒，忙得不亦乐乎。

中国的工厂都养有一帮叫采购员的人，相当于西方的买主或代理商，以便在工厂生产难以为继时，靠他们组织货源、燃料。尽管中国人叫他们采购员，实际作用却相当于“行贿员”。据报纸估计，各工厂每天派往北京和上海

跑公差的采购员约有五至六万。

我就认识这样一个采购员，他有30多岁，嗓音沙哑，圆脸大眼、精力旺盛。他靠了自己的各种关系，从一个贫农孤儿逐步当上了政府机关中某高干的私人采买。他出身于所谓“贫农”家庭，就借助这种优越出身走出农村，到北京一家电子元件厂找到了工作。进厂不久，由于头脑机敏，被提拔当了工厂的采购员。但随后又当上工宣队，下放到农村五·七干校去了。也是他有缘，在五·七干校认识了正参加劳动改造的一位副市长。副市长看出在他身上有种特殊的气质，官复原位后即安排他到北京新成立的、拥有相当大自主权的一家外贸公司当采购员。

到我认识他时，他已将自己的办公室移到北京饭店的客房里，而一般中国人能住进这家饭店的极少，更何况租房办公。他倒的确对周围住的客商很有帮助。北京饭店经常客满，要是某外商前来投宿无法接待，他保证能为你想到办法。到东京和广州的机票不好买，如果你急着需要，他会尽力关照。饭店要进口一批日本彩电，无人懂得报关手续，他应声而出，一手操办。至于是否有人打着饭店的招牌来做这笔生意，进口彩电最终又落到何人手里，以及是否会被用来搞后门交易，那就只有他和极少数人才知道了。

一天我上他办公室闲坐，发现他正拿着一只精工石英表，那是最近香港和东京之行的收获，是满怀感激之情的外商们送给的礼物。

刚好电话铃响，原来是朋友告诉他，本饭店的经理因病住院了。于是，他从桌上拿起一只日本计算器，心情焦

急地要去医院看望病人。

后来，他的各种关系带来了进一步的好处，居然到美国去逛了一圈。这件事之所以了不起，是因为要有相当的关系才能在外交部和公安局办妥所需的手续。访美回来，他穿上了一身蓝色条纹西装，去时还印了不少名片，打的头衔是在纽约新成立的一家美中贸易进出口公司的总裁。

我发现，即便警察也参与了后门活动。到1980年秋天，我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够想办法进入友谊商店了。要在友谊商店买东西，外国人需得付出美元、马克或日元，换取特别的支票，才能提货。而要进入友谊商店，需要通过由身穿灰色中山服的公安警卫看守的大理石入口。他们懒洋洋地站在门边，见到顾客是外国人长相就放进，见到中国人就盘问。

有天上午，我坐在停于门外的车中，等候巴巴拉买完东西出来。这时，只见一位长相特别漂亮的女孩在商店外来回踱步。她脸色红润，一头黑发松散地搭在肩上，神态却不无焦虑。几分钟后，出来一位年轻的警卫和她打招呼，我还以为是要盘问她为啥在这儿踱步，没想到他俩竟相视而笑，随后就男的拉着女的手，进了商店。入门之时，其他的警卫们以慈爱的眼神盯住他俩，这是明显的一对嘛！

巴巴拉出来后对我说，她看到里边有一大家子在急急忙忙地抢购，父亲、母亲和两个子女，全是中国人。他们先买的是三只手提箱，接着急忙就买些东西装进去，那种匆忙样子就好像时间不够用、或者害怕这样走后门购货会被人发现似的。当巴巴拉站在羊毛织品柜台旁时，看到他们过来一气买了半打围巾、五件开士米衫、一打短袜和十双

手套。据巴巴拉说，他们买东西质量都比一般中国商店的好。

另有一次，我在友谊商店偶遇一位中国朋友，我感到十分好奇，他如何能够进得来？

“这很简单，你只要在单位开张介绍信，说本单位因公需要某某物品就行。”他这样向我解释。很明显，这是干部们为了购买特殊商品使出的伎俩。

他说了老实话，介绍信先由他自己写好，再找能搞到公章的朋友悄悄盖上印，那看上去就丝毫不假了。而他的外汇支付单，则是在人民银行工作的一位朋友帮忙搞的。既然有了这些精心准备，他就顺利地买到了三台电视机，不过，两位朋友各有一台。

中国人在其长期的历史中形成了一种不起眼的方式，即从任何一笔交易中获取一点额外收入，或从交易额中拨出一小笔款子。西方也有这种东西，我们外国人叫它“非法榨油”。但1949年以来，人们一直自豪地宣布中国已经杜绝了这种营私活动，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共产党人的功绩。然而，由于国家经济的性质及其缺乏效益的特点，致使消费物品短缺、产品质量低劣以及永无休止的购货排队。而经济中的这些现象又促使“非法榨油”以新的隐蔽形式出现，这就是走后门。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国人口在1957年时是6亿，而当时全国拥有杂货店、自行车修理店、洗衣店、理发店和补鞋店共计100万家；到了1981年，人口已经增涨到10亿，净增人数4亿已接近美国和西欧人口之和，各类服务店的总数反而收缩到19万家。余者因共产党人讨厌自由企业、强调中央计划控制而受到了淘汰。北京

各餐馆的数量从1949年的1.02万家缩减到1981年的679家。

“为人民服务”这条标语贴满了成千上万的办公室和商店。然而，服务行业人员占中国城市劳动力总数不到10%。相比之下，美国服务行业人员占到48%，法国和日本也占到42%。中国采用的是苏联的模式，为了实现工业化，将发展重点放在诸如钢铁之类的重工业上，而农业、消费品和住房则受到相对轻视。这种模式的结果则是在统计数据上显出国民总产值的猛增势头，从而加深了领导人的意识，认为中国正在成为现代工业强国。然而，这种模式不能适应迅速增长的庞大人口的需求，所以是代价巨大的发展重点失误。诸如日本、南朝鲜及台湾这样的地区，则避免走上了这条弯路。

为了对付由此造成的物品短缺，共产党人实行了一整套配给制度，其东方特有的复杂性之浓厚，令许多中国人都难以理解。一位语调柔和、面容苍老、牙齿外突的北京女工对我说，北京人共有七、八种不同的票证和供应本。首先是你的粮本，为红塑料皮，要有合法居住身份和北京户籍，附近的粮店才每月给你供粮。并根据个人工作所耗体力的多少来决定供粮标准。这位女工是乐器厂工人，每月定量35斤；而她那当干部的父亲因为体力劳动少，每月定量31斤；当建筑工人的弟弟体力消耗大，每月定量40斤。按她的说法，粮食供应标准的差幅是，新生婴儿6斤，最高可到炼钢工人60斤。由于中国北方人喜食面条和馒头胜于大米，每月供粮中可购50%的面粉、20%的大米，余下30%换成粮票，以备上餐馆时买米饭或面条之用。我初次和中国人外出吃饭，见服务员问他们要粮票，而且不给粮

票不供饭，感到十分吃惊。当然，我是外国人，就免了。要是中国的干部出差，还得带上一种较为特殊的全国通用粮票，才好在家乡以外的各地吃饭。

实际上，这种办法意味着：无论啥时候肚子饿了，要想吃饭，身上光有现钞还不行，还得带有粮票。美国某外交官的夫人朱迪·麦克卡希尔有一次上北京的首都医院分娩，正躺在手术台上，却听一位医生突然叫肚子饿了。

“我们是不是去买点油饼来？”某护士建议说。

“我没粮票呀，”那位医生回答。

“那好办，”另一位护士插进来说，“办公室抽屉里有。”

除了粮票，还有一些与此互不相干的票证，如菜油票，北京人每月供应一斤，但云南却只有二两；布票，北京人均年供应一丈五尺；另有煤票、煤气票等。自1979年以来，北京的猪肉供应已不再实行配给，但有些省份还实行定量供应，每月人均约一至二斤。

另有一种配给票证，由住地附近的国营商业部门所发，用以购买每月定量的肥皂、白糖、豆腐、淀粉、某些鱼以及芝麻酱和粉条这样的中国土产。

女工解释说，最后还有一种工业品票，每年元月由她厂里发给，用以购买轻工消费品。用两、三张工业品票可买毛线打件毛衣；用半张可买些茶叶；要买辆自行车得花10张，那是个人两年半的定量。但自行车于中国人就如轿车于20世纪的美国人，须臾不可缺，还不能不买。然而光有工业品票还不行，要买辆自行车，还得有特殊的自行车分配指标。厂里近100名职工，每年分配指标只有两辆，可见

其之珍贵。

“我们把买辆自行车的机会看得太重要了，新工人一进厂，首先就是找到管生活福利的干部登记买车。有的工人早已买了自行车，一生了儿女又去登记，说是儿女长到十几岁该骑车的时候，登记的号码也该排到了。”

“要是工业品票丢了，那就麻烦了。”说到这儿，女工脸上现出一副难受痛苦的神情，“我有个同事，有一回把全家的票证装在信封里，他老婆不知道，给扔了。当年政府是不能补发了，但是中国人具有相互帮助的传统，朋友和同事们都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将自己家的票证分给他。这种慷慨解囊的动人场面我亲眼见过好几次。

配给制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买新灯泡得拿旧灯泡去调换。中国制造的灯泡上都盖有序号，工厂用的与家庭用的序号不同，北京用的与外地用的序号有别。用这种区别办法，就能防止人们以欺骗手段拿工厂或外地灯泡去换新。如果家里的灯泡的确被盗了，得到公安局开证明，才能买到新的换上。

在中国这样的拥有10亿人口的大国，为了限制人们之间的不平等差距，实行一定范围和程度的配给制完全是必要的，我认识的许多中国朋友都持这种态度。然而这位女工却从中看出政府的某种意图。她评论说：“你要没有户口，就领不到票证；要是没有票证，你就无法活下去。”

随着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日益深入，北京开始承认将发展重点放在重工业上是一种战略性失误。报纸报道说，从1949年到1980年，重工业实际增长90倍，而生产布匹、鞋

类、自行车、收音机和电视机之类日常生活用品的轻工业只增长了19倍。邓小平和他讲求实效的同事们看得清楚，多少个世纪以来基本生活物品的匮乏，已在中国人身上养成一种对生活物资的强烈渴望，而最近十几年人口急增、供应相对不足的状况，更加剧了这种渴望。我也有这样的感受。中国朋友们来我家作客，总爱各回房看看，询问电视机的价格、电冰箱和家俱的花费等。乘电梯是能听到中国人随意摆谈的场合，我常听到他们说的是，某某人买了什么，又花了多少钱等等。1972年，中国派出首批记者团访问美国，我受命陪同他们到各地周游。在参观福特汽车公司时，有中国记者当着其他雇员的面问公司一副总裁，你的年薪多少？弄得副总裁十分尴尬。对中国人来说，提这样的问题就如同问人姓名或小孩在哪儿上学一样普遍。

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盼望提高生活水准的愿望，推行改革的政府20年来第一次给中国人加了薪，也恢复了因被视为资本主义方法而遭到禁止的奖金制度。政府还重整经济，指示工厂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允许他们在电视上和大街旁做广告。我记得有个寒冷干燥的元月下午，我路过东单，看到约有二十多人围在一幢老式发旧的红砖楼房入口处。褪色的红漆木门仍然紧闭着，但人们却耐心地等在外面，一边跺着脚防冷，一边热烈地摆谈着。最后门开了，挤出一位幸运者，和等在门外的妻子又折身进去拎出一台日本产的12英寸索尼黑白电视机。两人将电视机捆在自行车后座上，高高兴兴地推着车回家了。

我弄不明白这是在做什么，就门旁边站着的一位中年妇女。她身穿蓝色大衣，浑身上下已看不出一点线条。她

说，电视机不够，买的人太多，指标分到各单位让人们抽签，抽中者就可带上工业品票到这儿来买。为了防止拥挤，商店每次只放进一位顾客，而且顾客进去之后，先交钱后取货，不得打开包装箱自由选择。据她说，每台电视机价格600元，那相当于一般工人10个月的工资收入。要是美国人，见了这价格准发火，因为600元的官方汇率是400美元，那意味着产品税100%。但这位中年妇女觉得无所谓，她说自己好多年都没买过高档商品了，因而已存了不少钱。这次买电视机全取了出来，又向丈夫的兄弟们借点，就足够了。

她听说我是外国记者后，说话更大方了：“买这种东西我们很高兴，管它什么价。你得告诉外国人，让他们多给咱运点来！”

但是我仍有疑虑，政府一经鼓励起这种新的消费热，是否有能力给以完全满足？我的这种想法一说出来，中国朋友就建议我不妨亲自去菜市场看看，以便实实在在地了解中国的日常生活，因为菜市场是中国货物最缺、服务态度最差的地方。于是，在一个寒风凛冽、尘土飞扬的冬日上午，我随中国朋友李苗夫妇去了崇文门菜市场。那是一座破旧的建筑，屋顶呈圆柱状，日光从顶上泄下来，活象一座庞大的机库。据说是北京最大且货源最充足的市场。我们去的那天，市场内拥挤着几千人。西方的超级市场是顾客自己进去挑选货物，出来在门口结算。中国的市场情况不同，顾客们得依所购物品的种类，分别排成长队购买蔬菜、水果、猪肉、肉鸡、鱼、豆腐和罐装食品。看来当时中国的物品短缺现象仍然严重，这是一时仍难以改变的

问题。

中国人喜欢买活鸡来即时屠宰，我们也站到了这行队伍中。我数了一下，前面有27人，几乎花了半个小时才排到服务员面前。服务员忙着从金属笼中给每位顾客抓出活鸡来。李苗夫妇大致算了一下，要象这样排队买够一天所消费的食品，得花两个小时，这与我从别处得到的印象大致相似。鉴于当时的中国只有高于家庭才有电冰箱，一般人的日常采买就意味着一周七天，天天付出两小时。小苗告诉我，为了节省时间，她和同事们通常商量好，各人排队买一样，但要多买些，买完后再来分。蔬菜是这样，有时买鸡、鱼、肉也如此。

中国人把售货员叫“服务员”，他们大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男女，穿着又长又大的白色工作服和高筒雨靴，原因是要不时用桶提水冲洗黄色大理石地面，以保持环境清洁。菜市场的墙壁上写着大幅标语，一幅“提高服务质量”，另一幅“辛勤为人民服务”。但要是顾客过于挑剔，服务员也不依。

轮到矮个子男人买鸡时，他怪服务员给他的是公鸡，而不是母鸡：“这鸡光骨头，太瘦了。另外拿只肥点的吧。”

服务员听到这话，只当不懂，径自走到旁边的柜台去了。那儿也站着一行人，等着将买来的活鸡屠宰拔毛。小个子连喊几声让她回来，服务员却装作没听见。最后，他只得两手空空地快快而去。

李向我解释，中国的服务员薪水很低，在公费医疗和退休金方面的福利待遇也比工厂工人差。国家都这样把重工业视为社会主义，把商业视为资本主义，服务行业必然

被人看不起。因而服务员们的愤懑就只会发泄到顾客身上，让他们也尝尝不好过的滋味。有一次，我同李苗夫妇上一家餐馆吃饭，服务员上了一半菜，就忘了另一半。我竭力向她作手势，以提醒她注意我们这桌。然而李苗夫妇却用惊诧的眼光看着我，那样子像是以为我发疯了。

李说：“我们还是尽量对服务员有礼貌些，态度缓和些。常常是他们喝斥顾客，而不是顾客喝斥他们。”

我们最后到了卖鱼的柜台，只见排着一溜长队，约有40人，而正在出售的仅是一种白皮大嘴的小鱼。鱼冻得很硬，是从北朝鲜进口的，李苗夫妇从没见过，自然叫不上名字。两名服务员正从包装袋中取出鱼块来，摔在地上，又用粗木棒拼命地敲打，以便让冰块解体。李告诉我，文革前的50和60年代，居民很好买鱼，可现在却困难重重。北京人最喜爱的黄花鱼早已在市场上绝迹。我注意到报纸上载文说，自从50年代以来，中国的捕鱼量一直处于徘徊局面。伴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淡水捕鱼量却从20年前的60万吨下降到目前的30万吨，原因是竭泽而渔、放水种稻和环境污染。

出了市场，我们见门边有一绿色的金属台，上面标明“请留下宝贵意见”字样，大概是为了收集顾客的“评语”。但不知谁却将意见簿拿跑了。在另一边，则是一座蓝色的木台，标有“公平秤”字样，看样子也是特地安置来供顾客验秤用的，以便使其获得并没受骗的感觉。遗憾的是，公平秤也不见了踪迹。意见簿和公平秤的不翼而飞使人顿生异样，由此充分看出毛号召的“为人民服务”与现实生活中对顾客的漠视之间的差距。

顺着那条大街向前走几个街区，我们看到人行道上蹲着几个乡下的农民在出售自己的产品。可以看清他们卖的东西是：中国居民那种黑色塑料网兜中装着的活鸡，几袋晒干的西瓜籽，还有些个大色红的苹果。在他们旁边，又围着一大群人，吸引我们急忙挤进去观看。只见一个穿着破旧蓝色大衣的中年男人手中摊着些油印纸张，我看不出其中名堂，李却大笑起来。原来是出售高考复习资料，全是数学类。旁边站着位小伙子，蓄着小胡子，留着长头发，显示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脚下摆着一溜各式女鞋。李苗夫妇向我解释说，小伙子极有可能是在国营商店套购的，再拿到这儿倒手，可获得20%的利润。从1966年到1976年，所有的这种私人经营活动都被斥为“资本主义尾巴”而遭到了取缔。然而，现在已经明确指出，中国仍然需要某种自由市场以补充国家计划经济。但我觉得其中也有麻烦，即政府从来没有明确说清多大程度上允许私人商业存在。因而，像卖鸡卖鞋这样的活动就不无风险，就仍然是一种半合法的走后门。

李苗夫妇和其他的中国朋友都说，走后门活动产生于50年代，那会儿规模也小。但随着文革中政府的权威被摧毁，后门之风就如燎原烈火在全国煽起来。李苗夫妇说，开后门风气之浓，以致逗得人们编出许多笑话来。北京人最爱说这样一个笑话：某老太婆到市场买鱼，排队老半天后毫无所获，不免心情沮丧。忽见几位穿戴体面的人手中捧着菜篮子，篮中盛有大鲜鱼，遂上前打听：

“喂，同志，您在哪儿买的鱼呀？”

“通过后门买的，”他们回答说。

老太婆急忙围着市场转了一圈，找到了后门，门却上了锁。

一位旁观老人不忍心看着老太婆瞎忙，就实话相告：“后门是有的，不过对你和我却是上了锁的。”

但是，李苗夫妇就如同其他中国人一样，从没觉得这样浪费周折地购买食品是一件趣事。从历史上看，丰衣足食对中国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到了现在，中国人见面打招呼，不是说：“哈罗，日子过得如何？”而是问：“吃饭没有？”中国人计算人数，不是像西方人那样点人头，而是论“口”，如家有几口人。中国人统计人数习惯称为“人口”，意即人和嘴。我发现，中国人要表达敬意，不是奉送鲜花，那意味着生命短暂，应留给亡者故人；而是赠送水果，让人有可食之物。招待客人，中国人不是举行鸡尾酒会，而是大摆宴席。花去好几个月工资收入也在所不惜。而一旦膳后客人离去，留下的话题不是席间客人说了什么，而是吃了什么。

还记得，我曾在四川重庆九龙坡的一个不起眼的小餐馆饱尝了一桌九道菜的佳肴美味。重庆是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的陪都，四川人把烹调视为严肃的大事，自传奇性的三国时代以来，已有两千年的烹饪历史。餐馆的主人名叫张开迟（音），为全市600万人口中所评选出的8个特级厨师之一。张工作的厨房有一扇黑的烟囱，连接着一排6个炭火小灶。张解释说，川菜之根本在于麻、辣、烫。所谓麻味，来自一种四川所产的花椒，我尝了顿觉嘴唇发麻。张的拿手菜叫“水煮肉片”，即肉片与蔬菜共煮，具有麻、辣、烫之特色。在美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开张的川菜馆中，

我从没在菜谱上见到这个名称。其中原因，只有当这道菜端上桌时我才明白。只见一只深底大碗中盛着仍然翻滚着的浓汁，表面的红黄色佐料铺了近一英寸厚，鲜红的辣椒块和压碎的花椒面随着沸汁翻滚，底层才掩盖着菜餚的真实内容：肉片和蔬菜。尽管对川菜久慕大名、馋涎欲滴，眼见这一奇观，我却举起筷子犹豫不决，不敢贸然下手。众人呼请再三，方才下得筷去。夹出肉来，送入嘴中，顿觉鲜嫩无比。然而，麻辣却使人热烫得受不了。旁边站着服务员，见了我的窘样，急忙送上毛巾。

接下来上的菜是樟茶鸭、凉拌鸡和鱼丸汤。还没吃遍，又端上鸡糜，也是四川名菜，将鸡胸肉细捣成糊状，加蛋清均搅蒸熟，伴以新鲜磨菇、竹笋和菠菜而成。这道菜只略微掺了辣椒，聊作引子。最后上来的是鱼香肉丝，张解释说，这道菜并不用鱼，只取其香。所谓香，即是四川人做鱼常用的姜、蒜、葱、醋、椒。

中国人对膳食的浓厚兴趣根源于国家的历史和现状。三千年来，尽管中国人发现了香料的食用奥秘，成百上千万的人民却吃了上顿无下顿。共产党人结束了这一切历史上的饥荒悲剧，创造了伟大的业绩，并且自1949年以来又使中国的粮食产量翻了一番。但让我仍然感到惊讶的是，许多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仍然是那么单调乏味。据报道，中国人均年猪肉消费量只有14斤，水果13斤，鱼类12斤。中国人均白糖消费量仅世界平均水平的10%，日均摄入2,000至2,100大卡热量，远低于美国的3,200大卡。因而，中国人的绝大多数蛋白和热量来自大米、小麦、玉米等谷物，这就使人的日常活动能量显得不足。

在工业城市沈阳，我遇到一位留着平头的27岁大学生，他的英文名取为约翰。约翰个子高大、充满自信、性格开朗，入大学前曾在工厂干了5年活，按中国现行规定，上学期间仍照拿每月40元的全工资。据他说，自己真算幸运，几乎全部工资都花到学校食堂中的伙食上，才确保了有足够的精力来继续学业。

“但那些响应校长号召、清早起来锻炼的同学却不行了，他们上课老打瞌睡，一副无精打彩的样子。”约翰解释说，同学们的伙食全靠国家每月补助19元，因而早餐就只能吃馒头就咸菜；午饭吃蔬菜炒肥肉，光这份菜就得花5角，一个月就是15元；晚餐也是馒头就蔬菜。每到星期日，饭堂只开两顿饭，上午10点和下午3点。约翰说：“哪个星期天我们都饿得肚子呱呱叫。”

最初我还以为，他谈的是个别情况，作为普遍情况，则不足以为信。但后来我发现，中国各地的大专院校都或多或少存在这种情况。美国人伊丽莎白·布兹在西南部的云南大学教英语，她向我说，学生们每周只能吃上三次肉，而且通常是肥肉。即便如此，食品部门的每月库存仍有不敷供应之险，学生们于是多将肉票及早用光。女生个子小些，吃得也比男生少些，当然也就发挥中国人的互助友爱精神，和男生们共享自己的剩余粮食。一些在北大学习的美国交换计划学生说，在学校食堂吃几天，就会感到精力下降。于是，只好到校外餐馆加餐。

有位彬彬有礼的考古学家对我说：“因为食物经常缺乏，中国人的精力老不放在工作上。一般的人们也总是在精打细算，看看下一顿能弄些什么吃的。这是中国人干事

没有效率的原因之一”。

“干部们不了解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并没有这种切身感受。他们家有保姆去一手操办，或者有特供证，可以上特供商店采购。还有就是，他们开后门买东西的机会也比其他人多。”

“但这个问题会影响大家的工作态度。在我那个办公室，说是早上8点上班，许多人老是8点半或更晚才来。他们去买菜了。”

“到了10点钟，大家可以休息10分钟，但有些人要去半个小时、甚至40分钟才来，还不是买菜去了！到吃午饭前，11点半大家都跑了，去食堂打有肉的菜去了，而正常规定是12点下班。”

中国人这种在11点半提前下班的习惯，常使外国人感到困惑和沮丧，使他们错误地以为中国人是在偷懒取巧。我到中国不久，前美国广播公司电视记者约翰·里奇因新任美国无线电公司驻亚洲代表，随一批该公司专家住进北京饭店。专家们此行是要在北京举办学术讲座，向中国人讲解卫星通讯技术。专家们全是自费来华，以为向中国人讲解最先进的通讯技术，会使他们兴致倍增。但就在讲座开办的第一天，美国人正讲到兴致高昂之处，就被中国主人打断，要求休会，下午再接着讲。里奇说，时间才11点半，在场的中国科学家全都相继退场吃午饭去了。这使美国人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就不可以等几分钟吃午饭吗？哦，不行，中国官员一边回答，一边往外走。

如果说中国人常迷恋于弄到足够的吃食，那么，已被

西方人视为日常生活必需的购置家俱、找到住房、享受洗浴等在中国人看来，仍需竭尽全力、利用关系、试碰运气才能达成。我的加籍华人秘书汪小姐和她丈夫诺曼·舒尔曼准备买傢俱布置房间，但他俩迅速发现，要购得双人床、折叠桌和梳妆台这三件基本物品，需要为新婚夫妇特别颁发的配给证。为了防止有人作假，还要出示结婚证，让家俱店在上面盖上已供货之类的字样。

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批评文章也说，全国都存在木材严重短缺现象。1957年全国人口为6亿时，国家计划调拨了400万立方米木材用于傢俱制做，共产4,000万件傢俱。但到1979年，全国人口已接近10亿，而由于忽视消费者需要，只计划了200万立方米木材于傢俱制做，共产傢俱2,000万件，是22年前产量的一半，而且产量中的一半又为政府机构所购买。

诺曼是自1965年以来一直住在中国的美国纽约人，在科学院搞计算机工作。他调查了专门出售新家俱的国营商店后得知，遇到商店到货那天，得清晨6点去排队。到货后几小时就会一售而空，于是商店会关门大吉，只在门外黑板上写明下次到货日期。有一个后门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找来失业青年，付给一笔款子，让他们清晨3点就去为你排队。

我得知，因为有这些困难存在，许多中国人开始当上了业余木匠。到北京后不久，我去一位中国朋友家拜访，其父系解放军的一位将军。坐在他家里，老听着楼上传来一阵阵敲击声，震得房间嗡嗡作响，给相互交谈增加了不少困难。

“他们在建设四个现代化呢！”，那位朋友解释说，口气中不乏讥讽嘲笑之意，“早晨7点起床就干，下午下班回来又接着干，老做他们的家俱。”

他妻子身材苗条、长发披肩、鼻廓线优美，被丈夫的牢骚逗得哈哈大笑。她指着我说沙发说，这东西也是他们自己做的，钢丝弹簧是从商店里买来的，小块木材则是在附近建筑工地上顺手拣回来的。我听其他中国人说过，由于木材和其它建材非常紧张，小偷小摸已是司空见惯。我自己也注意到，为了节省能源，夜晚行车可以不开大灯，大街小巷可以不开路灯，但建筑工地却经常灯火通明，看来意在提防。

汪小姐初为我工作时，住在一幢公寓楼，但住房没有配各家自有的盥洗间，她只好和邻居主妇共用一个淋浴间。每到夏季，淋浴间每周供三次热水；冬季每周供两次热水，每次供水均为一小时。供水时间安排在下午5至6点，刚好在人们下班之前，于是只好提前下班去洗澡，不洗澡者也照样溜出去买菜。中国人对各单位这样安排洗澡时间很有意见，老爱谈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师生员工每周可以洗两次澡，澡堂从中午一直开到下午6点。但这两个下午却是星期三和星期四，据某教师讲，原因在于澡堂工人只想连续干两天活，其余时间就溜了。“学生和教师对此都提出了不少批评，但只能说，拿他们没办法。”那位教师说。

洗澡时间安排得短暂也可能是因为政府号召节约能源，但我遇到的中国人都把这看成了使人生活不便的严重问题，因为人们非常讲究身体清洁，有的人甚至达到十分

苛求的地步。于是，人们为了克服生活不便，又动开脑子想出不少办法。比如我们住的北京饭店一天24小时供应热水，汪小姐就干脆在办公室洗了澡回去。我的助手家里和楼里都没有热水和浴缸，据他说，有时是下班顺路到外交人员服务局洗，有时也就在这儿的办公室洗。

另一个使人生活十分不便的问题是，不论室外温度如何，各大楼都只能在11月15日开始供应暖气，这是政府的严格规定。我到北京的第一年，冬季来得较早，11月的头几天，紫禁城后面的北海公园的湖水就已经冰冻了，从西伯利亚的戈壁滩上刮来干燥刺骨的寒风，温度降到摄氏零下10度。然而，无论住公寓还是守办公室的中国人，仍然得眼巴巴地等到11月15日的来临，才能获得暖气供应。这样一来，唯一的解救办法就只能是多穿几件厚衣服，多者达到四、五件，下面是毛裤、上面是毛衣，至使一个个走路来做出企鹅的优美姿态。美国人习惯于在华氏65度、甚至68度就开始供暖，他们无法想象，在中国的情况下，不开暖气简直就如生活在冰窟窿之中。北京二外的有些教室甚至根本没安暖气设备，有的教室还没有窗户玻璃，那是10年文革斗殴的结果。学生们上课时就只好拼命跺脚，也有的戴上手套，以防冻伤。这是那位二外教师告诉我的。

有一天下午，我到北京老城区闲逛，忽然看见小胡同的青砖墙上贴有各种手写告示。好奇心促使我走近细看，附近电桩上也贴有，有的是黄纸写红字，有的就是小学生作业纸。黄纸红字分外耀眼，白纸黑字者也能认清，全都说的住房。有张告示上写着：“调换住房 现有安定门大街125号住房一套，两间共11.8平米，愿调换前门附近或接近

7路电车站住房。”接下来，姓黄的作者语气激昂、简明扼要地解释了原因，说是为了离上班地点近些，找人换房已经找了两年了。

美国和欧洲一般是在报上分栏登载此类广告，或找房地产经纪人帮忙找房。而在中国，绝大多数人只有依靠单位分房。中国城市的私房只及总住房的10%，其余90%要么是由房管部门分配，要么是由工厂、机关、学校分配的。

在政府的智囊团社会科学院工作的一位翻译说：“要申请住房，首先需要衡量你的现有住房情况。如果现有住房人均面积超过3平方，那就没你的事了，决不会考虑你的。于是，你得自己想办法，要么是走后门，要么是贴启事，贴完再耐心等待。”翻译本人已经结婚三年，还和丈夫一起住在公婆家。公婆家中仍有丈夫的弟弟，一大家人挤住在中国传统的四合院中。而四合院低矮无楼，这么多人只有三间住房，其中一间还是她和丈夫自己修的。房间不大，只能放下双人床和大衣柜。至于厨房和厕所，那是四合院中的人家合用，这院子以前属于一位富商。

很显然，他们一家是目前中国房源紧张的直接受害者。共产党人爱说自己实行的是房租低廉、人人住得起的政策。我所认识的中国人的确大多每月只付两、三元房租，这和纽约或东京每月的1,000美元房租相比，和洛杉矶买套住房得支出的50万美元相比，确实只能算九牛一毛。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6平方米，只够一张大型餐桌那么大。这比苏联的人均住房面积还少，而苏联本身也有严重的住房紧张的问题。我注意到报纸报道说，中国35%的城市家庭面临住房问题，“其中5—6%的

家庭根本谈不上有适当的住房。”我认识一位45岁的中学教师，就属于这种没有适当住房的人。他夜晚睡在教室的课桌上，原因是在文革中，他被打成走资派，去了五·七干校，住房被人占了，政府至今还没为他找到适当的住所。

住房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模仿斯太林的作法，把住房视为消费项目，在国家吃紧的资源分配方面自然处于比修建工厂和办公楼更低的位置。这也是人们最近承认的又一个战略性失误，他们正竭尽全力加以更正。70年代末以来，已经实施了一大批住房建设计划；仅1979年，政府就出资修建了1.18亿平方米住房，占1949年以来所建住房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当然，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差距仍然很大。美国1979年新建住房面积是2.67亿平方米，且人口只及中国四分之一，现有住房条件也优越得多。

人们分到住房之后，麻烦未必就已了结。科学院曾通知汪小姐和诺曼，很快就会分给他们一套高级住房。那是准备用来安排院领导、老科学家、以及自愿回国参加建设的华侨学者的。他们耐心地等待，一年之后终于如愿以偿。搬进新居之余，他们才打听到为什么会耽误如此之久。原因之一，是建筑工人认为规格太豪华，太资产阶级化，不愿进行内部装修。水磨石地面和毛玻璃隔窗在当时的北京住户中还不多见，所以工人们要罢工。

他俩搬进新房，就发现工人干活粗糙，内部装修余下不少麻烦。天花板上时常剥落石灰，浴缸破成了两半，衣橱门大，关合不拢，厨房中则堆着一团石灰泥，已冻成冰团。

石灰剥落之后，诺曼的同事和支书主动前来帮忙修补，但又发现了新的麻烦：电话公司不愿来装电话，附近粮店不愿代供粮食。

后来才知道，这些麻烦不是针对他们的，而是针对诺曼的单位，要从中开后门。“我们最初感到不好理解，后来才听朋友们说，电话公司正在和科学院商谈，要安电话，先得让出几间房给他们。这不是全搞歪了吗？”汪小姐对我这样诉说。

然而无论如何，她还是认为自己够幸运的了。报纸上说，有的供电和供水部门也因为要打建房单位的主意，迟迟不愿为新建住房供应水、电。汪小姐的姨妈是天津一位著名知识分子，最近分到一套高干住房，却遇到邮政部门使用相同伎俩。信件不送到新建住房，也不承认新建住房，于是，她姨妈就只好每天穿街走巷，回原住所去取信件。

第5章

一本难念的经

“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中国谚语

这一切发生在她年仅6岁时。

在突变发生之前，力华与家中三个兄弟、一个妹妹、当科学家的父亲和当护士的母亲一同住在北京一套宽敞的住房里。全家人深为自己是祖国历史传统的继承人——知识分子家庭感到骄傲和自豪。母亲时常给孩子们讲外公的轶事，说他如何在本世纪初通过了清朝政府的殿试，如何在北京的皇宫里担任闲职。

然而他们的邻居中，却有一位红眼吃醋之徒，他身为党员，又是工人，还有一种中国人所说的好出身。但是他既是酒徒，又为烟鬼，老婆没有工作，要养活5个孩子、2个大人，也够他受累的。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街道大院就匆忙组织起激进的造反派组织来捍卫毛泽东的事业。他当上了组织的头儿，这使他有机会秘密地调看力

华父亲的档案材料；而他也兴奋地发现，力华父亲解放前上大学时曾短期加入过国民党。这就足以给他治罪了，于是组织召开了群众大会，批斗力华父亲这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接下来，就是将他从教学课堂上赶出去，不准再教书。

力华辛酸地回忆说：“红卫兵来抄我们家，把什么全没收了。他们拿走了父亲的书籍，抢去了母亲的首饰和全家的纪念相册，还撬走了我们的家俱。接着，那些人又在屋外的院子中烧起一堆大火，把看不上东西烧得精光”。

力华悲伤地说：“我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童年时代”。

以后，全家人接到命令，被迫迁往北京南面1,200多公里的湖南省深山村落去。据说这是为了惩罚她父亲过去犯下的所谓“罪恶”。那个叫金山村的地方的确是她父亲的出生地，但父母早已出来生活几十年，压根就不懂如何种庄稼。然而，力华全家还是由6名十几岁的红卫兵押着，坐了3天的火车前往老家。

“我们一到村里，当地干部就把家里仅剩的破烂东西全拿去了，抢走了旧衣服，也抬走了烂床，就只有我们身上穿的没剥去。”力华一家被安置在村里小学的一间教室，近乎屋漏墙破玻窗全无；文化大革命一到学校就关门了，校长被打成反革命，也被抓了起来。

力华回忆说：“有好几个星期，农民和干部们天天押着我父母去公社游街。他们给爸爸挂上块黑牌，按他跪在地下低头认罪。他们还用铁棍毒打爸爸和媽媽。”

“人是肉做的，谁受得了老是毒打？打久了人会被打死。”没出一个月，她母亲就给折磨死了，父亲也双耳失

聪，右臂残废。

“我没上过学，嘴笨不会说话。刚才讲的只是几件事实。”

力华的这些话是在1979年9月我初次遇到她时讲的，当时，我们正站在北京市委灰色的钢筋混凝土办公大楼前。我之所以到那儿去，是因为听说有些从乡下来的上访者正聚集在市委门前，向政府官员诉说他们的冤屈。那时候，中国的领导人们正逐步放宽自己的控制。但有些工人和学生则利用这种政治放宽的有利时机，张贴大字报和私人印刷物，批评政府的政策，当然其中也不乏无根据的攻击。而我们许多外国人也把他们的行动称为“民主运动”。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人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向领导人交上自己的申诉材料，请求为自己的冤假错案平反。中国人把这种活动称为“上访”，意即请求高层领导给予帮助，力华就是其中之一。

最初我并没注意到她，当时，我正在同一个年仅18岁的小伙子谈话。他穿着一条已经褪色的宽大黄军裤，说是文革期间他的全家被赶出北京，父亲后来生活没有着落，把他当儿子的给卖了，换了一头猪。这时，力华已经来到我身后，悄悄地听着我和小伙子讲话，似乎是在等待我问完他的问题，好和我交谈。力华的打扮不像个上访者，上身穿着浅黄色的棉春秋衫，里面衬一件蓝白线条相间的衬衣。她的一头长发梳成两条光滑的辫子，垂到了腰前；她的皮肤呈润滑的淡黄色，与在田间终年劳作、日晒雨淋的农民所具有的古铜色皮肤大相径庭；她的牙齿长得整齐有致、洁白如玉。而且，她脸上显得轻松愉快，挂满了微笑。

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不顺心、值得大动肝火的迹象。她说起话来语气平静、没有感情冲动，就好像这一切不是发生在她身上，而是发生在不相识的其他人身上似的。然而她的经历很不平常，没讲一会儿就引来一大群围观的听众。

母亲逝世和父亲瘫痪之后，由于村里的干部翻出历史老帐，将她全家划为“地主”，既不准哥哥去集体的田地干活，又不分给她家聊以种菜的自留地，年仅6岁的力华就被迫出来想办法供养全家。她想到的办法之一，是钻进村子周围的山林里砍柴，然后卖给大队开办的砖瓦窑。

“每天早晨太阳一出来，我就出门进山，回家天已擦黑，天天都得走30里路。有时回家，背着一大捆柴禾，相当于我体重的两倍。我人太小，没经验，刀常砍在手上。”她一边说着，一边伸出左手，我看清手背上有好几道伤痕，有道伤痕顺着中指指甲，一直延伸到第一关节。“当时家里太穷，根本没钱找医生包扎。”她向我解释说。村子属于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已经实行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但是不准地主家庭参加。

“就在到农村的头一年，全家人的衣服都穿得破碎不堪了。我只好学着缝补，将实在不能穿的旧衣服拆了，用来补身上穿的旧衣裤。”

“我生在新中国，”她接着说，使用的是1949年胜利后常用的表达方法，“长在红旗下，那时压根就无法理解、为什么生活会发生这种变化。后来才慢慢明白，像我这样的遭遇，中国有好多人。”

“我们也是人，应该有做人的权利，应该有参加工作和受教育的权利。但是那些干部总把我们不当人对待。”

说到这儿，她仍然是一副心平气和、就事论事的口气，而面对的听众，早已不仅是我一人，还有一大堆中国人。

就到这儿，我不让她说了。一则因为那天我只有一上午的闲暇，二是见到围上来的中国听众有上百人之多，心情不免感到十分紧张。当时已近中午，有些党的干部正从办公大楼陆续出来，只见一位官员50有余，顶着一头灰白色的银发，身穿一件裁剪合身的中山装，正信步走下石级，往有司机守候的一辆黑色梅塞德斯走去。这位干部并没住脚和上访者们交谈。我当时身边还站着汪小姐，她一身北京大学生打扮，丝毫不引人怀疑。她急速写下《纽约时报》驻京办事处电话号码，然后递给力华。后者答应以后设法再和我们相见。

力华的身世让我心情十分难受，但一想到还能再次见到她，又觉得欢欣鼓舞。我大多住在北京，很难有机会遇到来自边远农村的中国人。我所认识的中国人大多是城市人，我曾申请前往乡村暂住，哪怕住几天也好。但是，新闻司驳回了我的申请。然而我深深地知道，中国10亿人口的五分之四是农民，他们居住在各地农村，大约其中2亿人还居住在贫困地区，其生活状况就如政府所说，是处于贫困边缘。而力华家住的那个山村恰好属于最边远、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即井冈山地区，位于江西和湖南两省交界之处，是一个山峦起伏、森林茂密的长形地带。1927年，毛泽东曾利用其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特点，在那一带建立起第一个游击队根据地。与力华下次见面的时候，我问她是否能讲讲金山村人们的生活状况。这是我对她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以后相互见面，都是由她想到哪儿就讲到

哪儿。她天生一副好记性，往事回忆得井井有条，叙述起来侃侃而谈，其表达能力不亚于民间那种专讲英雄奇迹和王子落难故事的说书人。

从方华的摆谈可以发现，自从毛泽东1927年率领红军在井冈山开辟根据地以来，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从她家所在的金山村到最近的公路，要走半天的路程。村里没有供电，也没有自来水，农民们洗衣服要到池塘或灌溉渠中。金山村共有居民700人，计100余户，这显得比中国一般村落大。原因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将周围4个小村庄硬性合并而成。按官方的说法，金山村为一生产队，属于人民公社三级组织中的最低一级。但实际上，若按人口规模算，金山村相当于第二级，即生产大队。

“我们村以前被人们说成是鱼米之乡，土地肥沃，雨量充足。田中种水稻，农民们一年只干半年活，就足够吃了。”

但到了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这一切就全变了。有人认为，如果农民们都在田间辛勤劳动，再加上大办小型的乡村工业，中国就能迅速地由贫穷的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工业强国。金山村的干部们竭尽全力来实现这种奇迹，北京有些高级领导认为金山村周围山区蕴藏着原煤，于是农民们就被要求拿起锄头到山地田间乱挖。这样一搞，田里种着的稻谷和地里成熟的红薯就没人去收割了，白白烂在田间地里。到头来，粮食没收着，煤也没发现。于是，有的行政部门又主观臆断，要农民们砍树烧荒，将灰烬遍撒在田间地里，说这样能增加土壤肥力，增加粮食生产，度过饿肚子的难关。这样一来，农民们就再也没有烧茶做饭

的燃料了。

好几年后力华全家才来到金山村，但全村仍没能从过去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他们全家时常缺粮，“我们不得不到其他村民那儿去借，有时甚至是讨点大米和红薯来饱肚子。哥哥不会做饭，我只好学着做。我常常只在锅里放几撮米，加上好些水熬稀粥；到快熬好了，加进些能找到的菜叶，像白菜、大葱什么的；有时也能找到些萝卜、野菜或山里长的蘑菇。农民们都说，只有人穷，没有山穷的。山林是砍不绝、伐不完的。”

但力华在山里找点吃的并非总是有所收获。“那会儿我还小，不懂啥东西可以吃，啥东西不能吃。有次吃了摘回家的野菜中了毒，满脸发紫、不住地呕吐，昏迷不醒说胡话。一位邻居老太婆把自己的草药让我吃了，救了我一条命。”

“有时，我们家几乎完全断粮了，只得想法吃谷糠。我时常用谷糠做面饼，但还是很难咽下去。饿得不行了，我才嚼两个。”

“有好几年我们全家都没见过菜油，”她指的是中国人家常便饭常用的花生油或菜籽油，“因为没有沾过油，我家那口铁锅都锈坏了。”

力华说，她现在身体不好就怪那会儿吃得太糟。早晨梳头时，她常常梳掉许多头发；一看书眼就发疼，整天老觉得软弱无力、头脑发晕。和她一块儿吃饭时，我注意到她只能咽下两、三口米饭，再多就是喝点鸡汤。她自己说是一点也没胃口。在我们接触的三个月中，相见过几十次，从没见过她象正常人那么吃过一顿饭。

力华家欠缺的还不仅是粮食，他们买不起肥皂和火柴。按规定，每户农民一年供应有1,000根火柴，约合一包。但金山村的干部夺走了力华兄妹的定量，说是地主家用不了那么多火柴。“没办法，我们只好扎草把到邻居家借火，农民们都很可怜我们。至于肥皂，压根就没用过。”

金山村的农民一年只能吃上五、六次肉，力华说一般是在传统的节日吃，象春节之类。1949年以前农民也没什么肉吃，但现在没肉吃却是人为的，干部们要限制各家养猪喂鸡的数量。有人担心，农民家喂养家禽牲畜过多会变成资本主义。因而按力华的说法，金山村的每家每户只限喂养一头猪和两只鸡，而且要由国家低价收购，不得私自出卖。

“要是你家里私自把猪杀了，干部们就会拿走一大块。有一年春节，他们甚至要我们交出整头猪。他们要说得好听些，就是‘上边下来了某某干部，我们需要点钱来招待，这事就派给你家了’。有时候，他们只写张条子给生产队，就把集体帐户上的钱取了出来，拿去吃光花光了，到年终却是我家欠生产队的债。”力华毛算了一下，就是这种交鸡交猪和交钱，她家损失了约600元。

“我们都说生产队长是土皇帝，他管着全队人的生杀大权。”

她全家初到金山村时，村里的生产队长是个老红军，又随中国军队去过朝鲜参战，立有战功，名声很高，不久就退下去了，由他儿子接替当队长。尽管中国的官方政策是，生产队长必须经由农民选举产生，力华却说她在村里从没听说过选队长。据她所知，干部们都是上级任命的。

生产队长也面临麻烦，那就是要将金山村的产量指标

摘上去。当时，金山村每年收获完毕，上交公粮统购，进行年终结算分配，每个壮劳力的口粮只仅550磅，还是谷物和红薯的相应折算形式。如果算成净粮，只相当于380磅大米。力华讲叙的时候，帮助我口译的汪小姐感到十分震惊。她粗略一算，就得出自己在北京每年已吃粮350磅的结论，而且这并不包括每天消耗的大量猪肉、鱼和蔬菜。中国政府发表的数据暗示，年均消费330磅大米属于半饥饿指标，两相对照，可见力华生产队分粮确实不够吃。力华还说，每年年终分配，生产队都拿不出现钱，因为没搞副业，像种桔子树、养蚕或办小工厂等，当然就没有现金收入。

有一年，干部们听说有一种矮秆高产品种，就决心全面种植来增加产量。但栽良种需要化肥，生产队想不到办法；很快又发现高产品种容易染上虫灾。为了打虫，买了不少农药；施用不当，农药又将田间和池塘里的鱼给毒死了。到年终，全队大大减产，稻谷几乎颗粒无收，不得不向邻队借粮度日。即便田间剩下的矮秆稻草，也不如原来种的高秆引火好烧，更让农民们烧水做饭成了问题。

然而，生产队干部居然向上级领导报告说已经增产，而既然增产，那就得向国家多卖余粮。力华说：“队长为了蒙骗领导，要大家用麻袋和土罐装粮食。哪是什么粮食？底层放稻草，中间放石块，只有上边那么一点稻谷。”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让我们所受的教育。

“以前，农民们都很老实，”她用的是中国人常说的俗语，译过来相当于诚实与正直，“文革后，人们都学坏了。农民们开始互相偷东西，偷别人家自留地种的东西。”

得整天盯着你喂养的鸡和猪，不小心就会被人抓去。好多人打的过一天、算一天的主意，整天闷闷不乐、唉声叹气的。”

力华就是在那些年月里长大的。每年小春和大春作物收获季节，她都徒步去60里外的国营农场打短工，活计是扛100斤重的大米包。每干活一天，可以得到4角5分钱，外加8斤大米。

“一年下来，就看到农场干活挣得多。我整天整夜地干，直累得无法直起腰来。那就干脆躺到地上，爬着去拾谷穗。战争年代，战士们经常一边走路一边睡觉，而我是一边干活一边睡觉。我太累了。”

农场有些年轻工人是从上海下乡来的知识青年，他们是在文革中响应号召，到农村安家落户的1,800万中学毕业生中的一部分。力华回忆到他们的生活时说：“他们初进山来的时候，满脑子装的是美好理想，把农村想成了好地方。他们听信了别人讲的农村土地肥沃，贫下中农觉悟很高。”但一当发现了生活的现实，这些人就发生了改变。许多城市青年干活卖命，以图养活自己，到头来，不免仍靠城里的父母寄钱度日。有些人学会了身带棍棒刀叉、成群结队地四处闲逛。

力华回忆说，她13岁那年的一天下午，她拿着家里母鸡生的蛋到乡场上去卖。鸡生了蛋，全家人都舍不得吃，要拿去换钱。她走过一片齐人高的甘蔗林，又跨过一条山河沟，突然撞见面前站着一个人20多岁的男人。他手上戴着手表，脸上戴着眼镜，一身衣裤干干净净，丝毫不像农民打扮。他要力华坐下来和他一块儿谈谈。

“我吓坏了，连心跳都加快了，”力华对我说。接着，那男人就从身上摸出把刀子，指着力华，要她脱去衣裤。

“不知怎么的，我竟想了一下，然后对他说，你得先脱了自己的衣服。”

那男人点点头，还有点不好意思地转过身，将背对着力华，慢慢地脱下自己的长裤。刀子被他扔到了路旁的草地上。

“我一见，立即冲过去抓起地上的刀子，朝着他身上使劲刺去，鲜血一下子就喷了出来。他倒在地上，我仍不放心，抽出刀又是一阵乱刺，直到我以为他死了才罢手。事后我晕倒了，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的情景。”

当她醒来时，天已经黑了。在河沟边洗了身上的血迹，她就蹒跚着朝家走去。不知怎么的，她竟来到了埋葬母亲的一片乱坟岗子。“我两手深深地插进妈妈的坟头，恨不得钻进去和她作伴。”就这样，她又昏了过去。第二天清早，一位进山的老人由此经过时发现了她，回去告诉了她的哥哥。哥哥立刻赶了来。

“他以为我是劳累过度了，我没把发生的事告诉他。”这件事以后，她觉得自己就像死去活来一样。“我想死，但是我还有责任要负。那时妹妹才9岁，爸爸又体弱多病。我有责任要照料他们。我下定决心一辈子不结婚，一辈子守着他们过日子。男人都是坏东西。”

据力华讲，这件事从没有人调查过。在当时当地，成群结队、打架斗殴的知识青年太多，发生暴力流血事件确实不足为奇。仅她们村就发生过好几起互相斗殴和图谋杀人的事件。

就在力华这种十几岁年龄，她开始听到其他农妇们摆鬼谈神，自己将信将疑。“我闹不清为啥我们的生活这样艰难、这样残酷。有时干了一天活下来，家里又没晚饭吃，我只好拿着脏衣服去河沟边洗。抬头望见天上的月亮，我打心眼里盼望有位仙人能够下凡来拯救我们。我开始学着烧香，心里觉得有罪，杀了人要受报应。走在大路上，我都似乎觉得周围的庄稼和树木在咒骂我，咒骂我要遭报应。”

从前，村里有一座佛庙，庙里还有位和尚念经。可文革一到，红卫兵就把它砸了。“农民们都说，砸了庙就是败了风水，这下该挨穷受苦了。”然而没有庙，许多农民照样在家里供神烧香。供的是灶王爷，每月初一和十五，都要摆上一碗米饭，点上几柱香。力华说：“本来敬神是该供熟肉和水果的，但农民们太穷，没办法。”

听力华这一讲，我才真正明白中国农村仍然存在着民间宗教活动。从理论上说，中国宪法保证了人们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在实践上，共产党人一般将宗教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采取各种严格措施来限制人们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因此，力华所说不能不使人感到奇怪。出于好奇，我顺便说了句，遭到人们批评和取缔的各种传统封建迷信活动是否仍然存在？她回答是肯定的。

“村里有个巫婆，当官的拿她还真没办法，因为老百姓要保护她。”力华所说的“老百姓”，是中国的俗语，实际意思是一般人。“村里的巫婆和其他村的巫婆全都一个样，装疯迷窍的，干部们也不拿她们当社员。她们不到田里干活，可人们会给她们送吃的。她们会帮人干些事，像

看病什么的。有一回，她们在老庙的供台上放了一碗清水，让那个病人晚上把它喝了，说是水放在那儿，神仙已经在里面边放了妙药仙丹。”

金山村的农民们还会搞一套类似于伏都教咒法的活动。力华是这样说的：“要是你仇恨的某人得了病，你心里巴不得他死去，为了让他快死，你得查访到他的出生年、月、时辰。等到他生日那天，你得学念几句咒语、做个木头小人，刺上7根别针。到了晚上，再把小人烧了，那人不到天亮就会死去。”

然而无论如何，那些年里力华还是靠自己的努力学了些知识。在被迫从北京迁出之前，她连小学一年级都没上完。“但我非常想学点知识，字典就是我的老师，遇到有啥不懂的，见人就问。有一次，我搞到一本《三字经》，虽然说是腐朽没落的东西，我却感到其中有好些东西值得学习。”力华所说的《三字经》是一册包含儒家伦理道德和古汉语语法知识的私塾学生教材，多少代中国儿童的启蒙都是从这本教材开始。《三字经》中的伦理说教是以三个字为一组的形式出现，读起来很有节奏感，易于上口和记忆，如其中所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等看来这些东西对力华也有吸引力。

力华的一个哥哥也想尽办法多学点知识。当全家被从北京驱逐出来时，他保存下一本英语词典和一本俄语词典。到金山村不久，队干部同意了他可以下田干活，于是就带着词典去，休息时拿出来翻翻。

“农民又不懂外语，压根不知道他在叽哩咕噜地说些什么，只好说他是和外国勾结，充当美国特务。”力华回

忆到这儿竟哈哈大笑，两只大眼往上翻，几乎全隐在了厚实的眼睑里。但这种事在当时却没这么好笑。“农民们把他弄去开批斗会，还打了他一顿，把全部笔记都拿走了。但到处找遍了，也找不到人来帮他们看看，笔记上到底写的什么。”从此以后，她哥哥就再也不想学了。

力华讲到这儿的时候，我们正每两、三周见一次面。常常是我先写信和她约定时间，到时她的身影就会出现在北京饭店对面的书摊前。中国人历来是十分守时的，他们把这一点看成是尊重对方的表示。但力华却老是迟到，几乎是我认识的中国人中最不守时的，比我还不时。这其中原因我后来才逐步明白。她住在北京郊外，到我这儿要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坐一个多小时，其间还要倒三次车。每次来都得冒些风险，因为她没钱买车票。遇到售票员盘问，她就说自己是到北京的上访者，请求免票。另外，力华也没有手表，无法掌握时间。发现这一点之后，下次到香港休假看望家人，我就为她买了只廉价的日本手表。

每次我们相见，都要换着餐馆吃午饭，意在避免嫌疑。常常是力华主动开口，如果能找到个无人的角落，我就一边听她讲，一边做下速记。为了防备服务员的窥视，我总是把记录本垫在怀里。但有时候，我只能用大脑把要点记住，回办公室后再一一回忆出来。力华并不在意我发表她的经历，事实上，她准备让我看所写的日记的，要是没被她父亲烧毁的话。他父亲看到她的日记后，怕招来更大的生活不幸，只好忍痛付之一炬。相形之下，我觉得力华人虽小，却很有志气和胆量。她能千里迢迢来到北京上访，本身就是一大冒险。她又亲口对我说，得把她的经历发表

出来：“我想让中国以外的人们知道，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中国人经历了些什么。”她这话是在我们有次一块儿吃午饭时说的。

我对她很好奇的是，她是如何想尽办法从那山村又回到北京的。她告诉我，最初是她父亲带的头，那是迁出北京之后才过3年的1969年。他给原来教书的那个学院写了封信，请求领导重新考虑对他的处理。但学院领导竟将他的信转回生产队，干部们于是拉他游街，还打了一顿。从此以后，他就不再抱会被平反的希望了。

力华评论她父亲说：“他们这种人肚子里有墨水，有许多知识，但是没有勇气和胆量。”

在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力华自己写了封申诉信，但她发现，父亲原来工作的那个学院早已改成了一家工厂。在文革期间，中国的学校遇到这样的命运并不少见。那家工厂的领导想不起曾经处理过她父亲这件案子，但他们考虑得很周到，特地派了两人奔赴金山村搞调查。几个月之后她得到了工厂领导的答复，说力华的父亲确属受了冤枉，这起错案将会平反。但鉴于父亲已经年迈体弱（当时58岁），离正常退休已只有两年，所以将考虑安排提前退休。这样处理可领到一小笔退休金，但对过去10年的一切经济损失将不给予补偿。工厂也不同意让力华全家再迁返北京，主要原因是她家庭成员过多，因为政府的政策是要在整体上控制城市规模。这样，力华的主要企求就将落空，她最盼望的是户口迁移。所谓户口，即居住登记证明，这是中国人表明身份的最重要文件；户口上首先载明，某住户是属于城市居民还是乡村居民；若属于城市居民，则清楚说

明住在哪个城市；农民没有城市户口，既不能在城市申请工作，又不能申请住房；有了城市户口，才发给各种配给票证，才能买到粮食、菜油、布匹等。对于力华说来，北京户口就如一件具有魔力的护身符。她自己评论说：“户口就像旧社会看相人手中的卡片，你的命运全攥在他手中。”

到1979年夏天，力华已经年满20岁，感到有些迫不及待了。当她听人说好些上访者上了北京后，就毅然决定自己也去试试。她的大哥当时33岁，由于是在文革前上山下乡的，没和全家一块到湖南农村，眼下他已经想办法办回首都。他回来后安排在一家建筑公司干活，住在一间狭窄的宿舍里。力华来到北京后就暂时住在大哥那儿，但这会冒风险，邻居有可能报告警察。于是，她就不能不想办法和邻居搞好关系，一发现邻居们喜欢做的衣裤（原因是商店出售的成衣常不合身，而北京的缝衣店不多，每天生意兴隆、忙不过来），她就利用自己学到的缝补和裁剪知识帮他们干活，自然也就赢得了大家的欢心。

力华说：“眼下，你得帮人干事，才能换来别人的同情。”

住下来以后，她就开始跑遍全城，凡是认为会有所帮助政府机关都去。父亲的单位已经又变成了教学机构，她去过了，连市公安局、国务院、高等法院、北京市委也都过去了。我就是在北京市委门前和她相遇的。我担心地问她，是否害怕被人当作闹事者抓起来？

她回答说：“不怕。”

到了她父亲以前那个学院，一个负责上访的官员邀请她谈话。他们就这样每天上午谈两小时，一直谈了好几个

星期，一边喝茶一边讨论冤案的细节。然而，那位官员虽答应了却并没有立案处理这件错案。

有天跑上访时，她遇到了一个妇女，也是跑上访的。那女人有个邻居的亲戚认得公安局的人，“这关系转了好几道圈，但我就此开始朝公安局跑。我发现那些民警也喜欢童衣，就想办法替他们做。当然得他们出布料，我没钱买呀！”

力华做衣服遇到一大困难，那就是她自己没有缝纫机。到这个时候，我和汪小姐都深为她的经历和精神所感动，就一块儿上商店为她买了台中国仿造早期西格牌的缝纫机。

她遇到第一位警察4个月以后，那警察也觉得有些愧意，就让她写了份申诉，代她向上级转交，以供考虑。

几天后她来对我说：“我写申诉非常谨慎，只叙述我妈妈是怎么死的，不发牢骚怪别人。但我心里知道有些人该负责任。尽管还没人帮过我什么，我还得写上十分感谢党的关怀和帮助。”说到这里，她脸上又露出一副小姑娘似的天真笑容。我体会到，她身上显现出一种远非20岁女孩所具有的坚韧不拔毅力和足智多谋的干练。她算得上是精干的外交家，她所凭借的唯一力量就是她能从人们心底里激起的同情。有一次她解释说：“我真讨厌那些人，但我从来不表现出来。”

那时候，北京的冬天已经来临了。我有一次直接跑到她家去看望，只见一间7平方米的房间拥挤着她大哥两口子、她父亲、妹妹和力华自己，一共5人。父亲和妹妹是最近才从金山村接来的，为的是让妹妹能受到较好的教育。但因为沒有北京户口，力华到处跑关系，想方设法让她入

了学。由于父亲瘫痪，往往是力华去参加家长会。他们住的那间屋面向北方，这是北京人住房的一大忌，光挨冷风吹，却少见阳光。屋里还放了一只炉灶，大概是为了取暖，但为了节省钱却并没生火，我只觉得发冷，有些喘不过气来。屋里的温度大概有华氏40度。看样子力华最近给屋子刷了灰浆，光光的混凝土地板也显得干净发亮，这在饱受戈壁沙漠上的风暴刮来的尘土之害的北京实非易事。

屋里的全部家俱就是两张大木板，支在几根木架上，上面铺着棉絮，大概就算是全家人的床了。房间里还牵着一根细铁丝，越过炉子上边，让新洗的几件衣裤压得往下垂。窗台上放着十几个药瓶，表明力华正在治疗自己的慢性病。

力华做了一天的衣服，从木板下掏出根矮凳，在桌上铺上一张报纸，就伏在上边学习起来。她正在学英语。

后来，终于到第二年七月，也就是她初次上北京一年之后，警方给她发来通知，允许她全家迁入北京上户口。但办理时效只限3个星期，在此期间必须拥有证据说明：全家在北京已有永久性住所。这简直就是一个圈套：没有城市户口，你就无法申请住房；而没有住房，你又无法申请城市户口。

第二天力华对我说：“我简直都急得快发疯了，真是太没希望了。”她当时穿着夏季时装，上身是洁白的棉衬衫，下边是黄花短裙，看样子都是她自己做的。1976年以后，这种违反正统的蓝一色习惯而喜好花哨的衣着已被允许。冬天只看到她穿一套衣服，夏天她又天天穿着这一身，这是她的最大自足能力。

她刚去了大哥上班的建筑公司，请求开一张证明，说她和她父亲有权居住公司住房。但私下里，她保证一俟找到住处就搬出去。然而却遭到了公司的拒绝，那些人担心她会赖着不搬，北京大有这种人在。我后来听说，她又去了父亲单位，开到了证明说该单位将在两月内为她父亲安排住房。这虽然不那么好兑现，但却使建筑公司同意向警方出具证明，说明他们在北京已有永久性居所。

这可把力华乐坏了，但她的传奇故事并没就此结束。金山村的干部扣着她的两个兄弟不让走，宣称力华一家还欠队上300元。但据力华说，那简直是一种讹诈。因为她家长期被定为地主，每年在生产队田里所挣工分的一半被算成了“义务劳动”，结果每年年终分配，她家的分粮也只是一般社员家的一半，这就被迫借钱度日。她的两个兄弟还被迫为干部家的自留地干活，也是被说成义务劳动。力华推测，干部们扣着人不让走，为的是自己有好使唤的农奴。

她抱怨说：“他们简直拿我们一家当犯人看待，”1979年的北京，在邓小平拨乱反正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后，大胆地冲破一些禁区，已经宣布为地主分子摘帽子，但她那生产队就是压着不办。她说，干部们为的是好随意整治她家。有一次她曾给两个兄弟寄了些衣服裤子去，但他俩却压根没收到。当力华后来回村时，发现她做的衣服竟然穿在生产队干部身上！

眼下局势看来已毫无希望：三个星期的限期快到了，两个兄弟还呆在金山村。他俩要不在7月底赶到北京，就永远别想在北京安家落户了。力华走投无路，带着绝望的

神情去找父亲单位，终于让单位领导同意派出一位官员坐三天的火车去金山村同干部们洽商。最后终于达成协议，干部们同意延长还债时间，可以先放人，再让力华家从北京寄钱来。两兄弟于六月的最后一天赶到了北京。

以后我还见过力华几次，她正忙于学习。她从广告上看到北京专为失业青年办了一所学校，招收的学生毕业后分配当小学教师。虽然入校条件是高中毕业文凭，但力华将自己的不平常经历对校长一说，他就同意考考力华，看是否有真才实学。结果力华通过了考试。

我妻子搬来北京居住后，有一天请力华来吃午饭。这意味着她要被开电梯的那两位妇女看见，然而她丝毫不感到有什么担心。当她乘电梯上11楼时，见那女人盯着她（可能是想把她的长相看个仔细，好去汇报），就相视一笑，还十分礼貌地问了句：“您吃了么？”

她为我们的小女儿萨拉做了一双十分可爱的棉鞋，还为巴巴拉做了一条花边。

很快我注意到，她手上并没戴着 I 送她的手表。她解释说，现在弟兄姐妹已经团圆，她怕戴着那么贵重的东西，惹得兄弟们眼红，从而伤了和气。因此给藏起来了。她这样说着，脸上显得十分难堪。“我不想造成家庭矛盾，那么艰难的日子一家人都过来了。我不想伤了大家的和气。”

在她内心深处，充满了中国人十分赞扬的传统优良品德，即把自己无私地贡献给家人。同时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和欲望；全心全意地辛勤工作，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与此同时，她又十分精于拉拢人们、利用关系，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些本事若出现在其他人身上，可能

是一种对别人的利用和操纵，但表现在力华身上，却是由绝望之中产生出来的生存本能，增加了她的美貌和魅力。在我看来，她是中国人中的精英，是儒家之道并没有销声匿迹的活生生见证。

然而，她身上还表现出中国人的另一种气质，这就是义愤填膺。孔丘教导人们要固守中庸之道，决不能大动肝火、怒形于色。然而中国的道德传统中并没有打你这面耳光、还得凑上那面脸颊的说教。最后一次相见时，我问力华，既然她的全家已经安全地抵达北京，对那些干部们的不愉快心情是否有所淡漠。“没有，”她直接了当地回答。

“人们都说，现在我办到了城市户口，该心满意足了。但我到死也不会心满意足。我一生没过上一天好日子，妈妈给人打死，爸爸给人打瘫，到现在办啥事我都还得到处求人。”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恶果，这损失没办法弥补，我心上的伤痕永远不会愈合。”

第6章

男男女女这样相爱

……为情场失意轻生是毫无意义的。你应该投身到火热的生产斗争中去，唯有这样，你所受的爱情创伤才能慢慢得以愈合。

——摘自《中国青年报》编辑致
某位被女朋友抛弃的男青年

李莉是一位长相特别好看的少女，她肌肤平滑白净、浓发乌黑发亮、身段线条优美。其父系解放军高级将领，因此，家庭生活无不舒适惬意，且不说居室宽敞，还雇了小保姆做家务，她上的学校也是专为高干子弟创办的。然而文化大革命发展到1967年，她那当将军的父亲就被人指责为走资派遭到逮捕，先是弄去接受批斗，倍受群众的吼叫、侮辱和唾弃。然后又被投入狱中，几经折磨，终于不幸身亡。李莉的母亲出身于地主家庭，舒适惯了，难熬艰辛，结果精神病发作，也命归黄泉。由于父亲被内

定为叛徒，住房家产遂被没收一空，正在上高中的李莉也被学校除名，她虽年仅17岁，却必须开始承担养活自己和12岁妹妹的重任。

李莉的女友在谈到她当时的艰难困苦时说，她变卖了仅有的衣物、丝被和心爱的大提琴，换作食品充饥。即便如此，仍然没有别的出路，只能沿街乞讨。幸而姐妹俩居住的杭州市，菜市场上不乏烂白菜，可拾来煮熟充饥。但妹妹染病，极有可能是食了烂白菜所致。当时，李莉的确陷入了人生绝境。

正在这个时候，她俩开始每月收到一个大信封，上边没留下任何发信人的姓名地址，却内装50元人民币（当时合33美元）。按那时收入的水准，这笔钱多于人均月薪。李莉初时满腹狐疑，只得将钱束之高阁。她回忆说，但当后来发现根本没人上门追问时，我就决定为了妹妹将这些钱花出去。这种按月汇款一直持续了整整两年，直到李莉入伍才停止。由于她长相非凡，兼有音乐天赋，被一部队歌舞团挑中。该团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只是某次随团演出到了北京，她才打听到了那位神秘的恩人。他是父亲的老战友，也是将军官衔。这位将军多方打听，寻到李莉的地址，就按月寄来了钱。李莉自然深感他对自己恩重如山，每次随团前往北京，必然挤出时间去拜望他。

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没有问题。将军生有一子，也是部队军官，当时驻扎在西南部的四川。将军为儿子的婚事十分着急，殷切盼望李莉能和他儿子结成良缘。他曾多次对李莉提起此事，后者由于从未同那青年军官见过面，总是借口年龄太小还不想结婚，将老人的话题和葛

地引开。而事实上，李莉非常讨厌包办婚姻这种老式方法。早在1950年颁布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婚姻法》中就明确宣布，包办婚姻系违法之举。但是，将军一味固执己见，急着将儿子从四川调回北京工作，这只会加剧业已出现的麻烦。见面之后，李莉一点也不喜欢他儿子，觉得他头脑空虚、不务正业、只求自己快活。

接着，将军染病住院，李莉特地在单位请了事假，前往北京的医院照顾他。将军临终前，百般恳求李莉和他儿子成亲，好让他死而无憾。李莉感到心情痛苦、左右为难，她不仅深感自己欠了将军一大笔人情，而且意识到，在中国这种传统的婚姻交道中，她一个孤儿没有任何亲戚能站出来牵线搭桥或抵制反对。结果，她终于狠下心认可了这门亲事，与将军的儿子商定尽快结婚。

一当将军撒手西去，其子就“跑遍北京全城”，通告亲朋好友他和李莉订婚了。李莉不爱理他，却受到他施加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他认为李莉要背弃誓言，就会让自己丢尽面子，扬言要自杀殒命。接着，将军的遗孀又亲自赶到李莉所在单位，找了党委书记谈话，指责她行为不轨，已经同意结婚，又要毁约退婚。党委书记遂叫来李莉了解一番，然后“劝”她不可食言，应该尽快结婚。这种劝说

在部队里实际上相当于命令。

将军的儿子觉得这种解决办法令人欢欣，说是“我在这事上丢的面子该到此为止了”。随之到附近的街道办事处登记结婚，这是目前中国人婚配必须履行的官方手续。然而就在登记那天晚上，他强行闯入她的居室，把她强奸了，这是她的说法，因为自己不情愿。还说：“我在他肩

上咬了好大一块疤。”

李莉那位女友告诉我这场悲剧，用意不在于聊作饭局谈资，她是在针对中国目前最隐秘的性生活和性观念发表自己深邃的见解。北京每年都要公布象征丰硕成果的统计数据，囊括范围从猪肉手表产量到新增发电能力无奇不有。而毛泽东逝世后，又授命新闻出版部门报道犯罪活动和党内贪污腐化的调查情况，甚至还公布了官方认可的国防开支占国家财政预算比重。然而，性爱问题仍被置若罔闻，就如压根不存在一样。实际上，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十几年中，爱情一直被斥之为骄奢淫逸、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观念，禁止在大庭广众间议论。在一个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政治挂帅”的国家中，政治也渗透到爱情和性爱之中，互相纠缠不清。由于政府通过掌握工作机会和住房分配深深地涉入个人生活，加上有意限制人口流动，将芸芸众生编入各种单位管理，因而北京有效地推动了现今几万万中国人性生活方式的形成。无论谈情说爱、婚姻生活，还是生育数目、离婚纠纷，甚至性生活都或多或少要接受指导。其结果，就是我们的祖父一辈较为熟知的那种矛盾现象。表面上，中国显得特别纯朴端庄、风尚纯洁，即西方人所说维多利亚时代那种道貌岸然、风化优雅。然而在这幅图景背后，却掩盖着严重的性爱沮丧和心情压抑。

外国游客为之着迷和赞叹的正是这副纯朴端庄的外表。妇女们不习惯于打扮化妆，即使“四人帮”倒台初期，她们仍身着宽松的外衣，套上宽松的长裤，这就足够年轻小伙子们扫兴的了。夏天穿衬衫，无论男女，均连领

口一齐扣上。我初到北京，在西方染上的那种壮汉服饰习气一下子还改不过来，常将衬衫的头一颗扣子敞开。结果惹得下榻的北京饭店的一名男侍应生不时提醒我，需将领口扣上。他以为我粗心大意给忘了，还担心我发现这种疏忽后会感到难堪。在中国，妇女们如果在夏天将上衣解开，哪怕只动一颗纽扣，也会被人认为是妖媚风骚。据中国人讲，在某些城市，如果女子稍有娇揉造作，人们就会斥之为淫荡之举。

冬天来临，妇女们在公共场合大多穿卡克式外衣。我的助手汪小姐回忆说，她在北大上学时，只要一听到有人敲门，哪怕已经身着毛衣，寝室里的女生们仍要匆忙套上外衣才敢开门。

然而，当中国的女人们聚在一起时，只要周围没有男人，就不会像西方女人那样对自己的身子感到羞涩害臊。由于缺乏完备的热水供应系统，中国人大多必须利用公共浴池。汪小姐回忆她初次上公共浴池的情景时说，女人们全都赤裸着身子，三三两两围成小团，互相用肥皂和毛巾在对方身上搓擦，样子不无愉快。男人们实际上也是如此，约上一、两个朋友上公共浴池不乏乐趣。而所有这些，丝毫不具有同性恋意味。

就如同美国的上一、两辈人当学生时那样，中国的高中和大专学生们通常实行男女生分坐。要是问问女生是否已有男朋友，她们会满脸通红、嗤嗤发笑，能够主动承认的极少。中国人时常使用隐语问人：“有朋友了吗？”这就不带任何浪漫色彩，避免他人感到尴尬难堪。我曾造访过位于昆明的云南大学英语专业学生，当时千方百计诱哄

他们承认有时也会想恋爱异性成员。不料他们竟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我们情愿用这些时间抓紧学习。”

那次与我同行的还有专栏作家阿特·布赫瓦尔德，他处心积虑地要深入探寻这个问题，紧接着就追问他们：

“那你们总得有些什么梦想吧？”学生们只是格格发笑。

二十好几的大姑娘和小伙子从没与人幽会过，这是常事，至于没有确定恋爱关系的就更多了。有一次在上海，我有意想测验一下身边的导游。她姓杨，27岁，头上甩着根又粗又短的小辫子，语言够活泼辛辣的。我问她对未来的丈夫有什么要求。“我还没想过呢，”她一边回答，一边用手将嘴给掩上，这是一种中国传统的怕羞姿势。“我这个人思想有些保守，还没和小伙子单独外出过，也不喜欢看电影电视。有些年轻人太迷恋这些东西，结果把学习和工作都耽误了。我喜欢睡觉前呆在家读点书，提高个人修养。每天早晨起床都是六点半，然后散散步。”至于每个星期日，身为党员的杨女士坚持说，只是呆在家里陪伴父母。

中国人大多认为，男人亲吻女人是一种求婚表示，至少是一种会导致婚姻的举止。有位外国妇女嫁给中国人，已在中国生活多年。据她回忆，家里28岁的大姑娘居然为接吻之事在她面前痛苦不堪。她女儿深恋上了一个中国小伙子，已经准备下周举行婚礼，不料未婚夫极力要提前吻她，而她却觉得“那实在令人恶心”。她在母亲面前大吵大闹，要求退婚，母亲没法子，只得耐心细致地给讲解生活的真谛。“当今中国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子们对性爱了解之贫乏，和我们的祖辈100年前相差无几，”那位母亲后

来这样对我说。

按中国新闻媒介的说法，接吻不仅道德情趣令人可疑，而且健康水准也大受影响。报纸载文告诫说，接吻会传播乙型肝炎病菌，而该种病菌潜伏在总人口的百分之六至十中，即使健康人也不能幸免。文章叮嘱说：“这个数字是令人可怕的。鉴于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将病菌传染给自己的恋人，人们自然会认为他们会危及他人健康。”这种病菌常含在人的唾液里，会通过一定渠道进入血液系统。“因而接吻确系一种危害健康的举止，无论成年人还是儿童，都应该戒除接吻习惯，”这是报纸的结论。

在公共场合，是不准拿性问题拐弯抹角开玩笑的。有那么一次，位于台湾海峡一侧的某省副省长设宴款待来访的外国记者团，某位南斯拉夫记者不知怎么的谈到了中国对美国的需求问题。他一边举起盛着茅台酒的杯子，一边说，美国业已开始输出其技术革命，“而现在，美国人或许还会竭力争取输出其性革命。”听着这句话，那位年过中旬、性情温和、精通英语的官方译员突然默不作声地望着我。

“我想，要是你不介意，我最好别把他的这句话译过去。”他对我说的是英语。

来自我们那个对性爱过分着迷的社会中的外国人，经常喜欢称赞中国人的纯朴端庄，认为中国人漠视性爱情趣是一种心理健康的表现，如电视上没有任何性爱画面，服饰制做也不故意突出人体曲线。有些西方游客甚至以为，中国人这样清扫性爱镜头，再加上整天思考毛主席的卓越思想，已经克服掉自己的性欲。有位哈佛大学本科生利用

暑假来中国农村实地考察，后来谈起这段生活经历，觉得受益匪浅，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他亲口对我说：“回到坎布里奇后，我几乎对性爱着了迷，时刻想和某个姑娘共享一番。”因为在中国的公社考察期间，妇女们衣着压根就没突出性感和魅力，说话也从不接触儿女私情。“我不得不抛弃对性爱的幻想，原因是，在她们中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性爱。”

毫无疑问，中国人和现今的西方人相比，性观念更加正统，不管谈论性问题还是从事性活动，都小心翼翼、循规蹈矩。我们西方人的祖辈，甚至父辈也莫不如此。然而，中国人也并非泥塑之躯，只是由于严格的家庭教养形成了他们这种压抑性欲且不遗后患的习惯。这是外国人的一般看法。

就某种程度而言，中国人对性问题持有的这种过分拘谨的态度是儒家思想传下来的一笔遗产。在中国历史上，富有浪漫情调的爱情从未受到过敬重。汉语中用以形容男女倾心的词叫“恋爱”，仅是近代语言学的创造，用以表达西方的相应语义。在古汉语中，“恋爱”分属于两个字，意思分别为眷恋和爱慕，二者合起来却意味着皇上与臣民之间、父与子之间的效忠。西方那种情人幽会、翩跹起舞、亲昵爱抚和当众示爱方式，在中国人看来纯属放荡不羁。中国妇女决不会像她们的欧美姐妹那样，以爱慕倾心为名替作爱性交辩护。男女关系自古以来就具有十分严肃的目的，即走向结婚。而婚姻又意味着双方家庭的精心安排，以保证新郎新娘家私富足、儿孙满堂。既是如此百年大计，岂容少男少女我行我素？因此，儿女私情应让位于父

母意愿，更不能操之过急。通常的情况是，只有到了婚宴之际，新娘被带到新郎家中拜见公婆，小两口才蒙头盖脸地初次会面。这一套繁文缛节是整个社会的要求，个人生活的重心。与其说倚在自我需要，不如说立足于社会关系，即首先不自觉地考虑上下左右的情绪。

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人又并无西方人那种认为性行为是邪恶堕落的思想重负。中国人的观念中毫无基督教宣扬的圣灵怀胎或圣灵感孕之说，也没感受到《圣经》规定的那么多禁忌。而西方人则不然，即便吉米·卡特也小心翼翼，怕招惹是非。他初次参加大选时曾说过：“但我得对你们讲，只要色迷迷地盯住女人，内心深处已经犯下通奸罪。”与此相反，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伟大阐述者孟子也曾说过，行房无非是一种自然需求，就如饮食、睡觉和解便一样，因而在适当的时间地点加以议论尚属情理之中。中国人作爱，只要对象恰当，决无内疚负罪心情。

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可资说明中国人对爱情和性爱的这种传统观念。鉴于谈情说爱历来没在中国人生活和思想中发挥明显作用，中国古典小说不像西方作品那样严重依赖这一永恒主题。但是，淫秽书画却有相当的发展，且自成一个流派。尽管儒家的文人学士不屑一顾，芸芸众生私下里与娼妾或娼妓们翻阅起来，却是津津有味，丝毫不感到难为情。《金瓶梅》系中国小说创作的最伟大成果之一，1949年前曾广为翻印出版，书中细腻地描述了劣绅大贾西门庆与各房妻妾、家庭女仆、邻人堂客乃至烟花娼妓之间的花天酒地和淫荡举止。该书为十六世纪一匿名作者所著，曾使西方传教士们大伤脑筋，竭尽诋毁抨击之能事。

不过，中国人自己却认为其中不乏艺术感染力。这是中国古籍中首批描写中产阶级私生活现实的作品之一，又是将女子作为独立个性来处理的开创性作品。喜欢猎奇的西方作家们只是到了最近几年，才开始坦诚公正地来看待这部作品。

潘金莲是故事的女主角之一，后来当上西门庆的爱妾，两人初次相会，作者就描绘出如下一番情景——

昔日陪张大户行阴阳之交，金莲无不伤心落泪。大户年衰力竭，精力萎靡不振，屡试无获，让金莲讨不得自在。大户作古，随了武大，区区侏儒，身矮物微，房中之事好不叫人顿足晦气。幸而今番撞上西门大官人，但见欲火之盛，无以复加。再则官人早已于女辈之中练就一身好本事，体物优雅、手足灵巧，不乏炉火纯青技艺。

两人对坐纵饮，顷刻即热及全身，不免欲火阵发。西门庆早已按捺不住，径自宽带解衣，亮出光腩下身中之宝物，又拉金莲纤丽细指抚触之。金莲细观之，阳物已举多时，挺腰昂首，不无灵光豪气；可谓黑林密布、怒发冲冠。金莲遂心中大喜，暗叹今得一壮士也。

金莲亦急不可待，匆忙宽衣解裙。但见大官人如饥似渴，大手胡摸乱搅，遍及体身。两人缠作一处，慌乱中乃卧于室内，以防窗外耳目。西门庆只觉金莲体香扑鼻、肌肤润手，美貌之躯柔丽之至，好不令人神魂颠倒、情欲盛旺。大官人

今番既已坠入其中，唯有一鼓作气，岂虑他哉？

（克莱门·埃格顿译《金瓶梅》，

伦敦1939年版卷一第67页）

以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看，妇女卖淫和蓄养妾室均属自然之列，不会受人道德方面的谴责。即便在今日的台湾，还偶尔有此类观念和存在。我居住台北时，有一次替我借住那户人家去当地警察所作每年一度的安全住户注册复查，那是官方的一种户口检查制度。在大家排队的前头，有两位妇女：一位年近40，体态风韵，穿一身衣服却难以名状，另一位最少要年轻10岁，身材苗条、讲究穿戴。警察一问，两位妇女均说自己丈夫姓黄，且给出的街道和门牌号码完全一致。

这可把那警察搞糊涂了，当即不同意复查后登记：“怎么会一家人钻开两个黄太太来呢？”就在这时，排队的人中有人大声解释道：“前一个是老婆，后一个是小老婆嘛！”一听这话，人群里顿时响起一阵格格笑声。然而，两位妇女脸上显出来并不在意，丝毫看不出有什么难堪的神情。只见那警察也若无其事地照例行事，将两人的姓名写在户籍登记上，尽管台湾在法律上也规定，蓄养妾室是不合法的。

对于这套传统的对待性爱的观念和方法，大陆解放后，人们取其前半部为己所用，即社会的需要应该高于个人的爱情。与此同时，他们却拒绝和排斥了这套传统的性爱观念和办法的后半部，即性行为本身并不淫秽堕落。因而，他们为了加强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就大力提倡起一种新

型而僵化的清教徒主义，结果自然会导致人们对性行为的内疚心理和压抑感受。可以从当代中国人的词汇术语中看出北京的这种观点。西方的“作爱”一词虽然已被台湾和香港适当转化为中文，但在中国大陆却不大能看到对性行为的这种较为优雅的表现法。中国大陆的官方新闻媒介若需表达性交的概念，大多赋予其淫荡越轨之意，或说“男女之间的不正当关系”，或说“乱搞男女关系”。即便人们常用的“发生关系”这样的俗语，在中国人看来也含有肮脏污秽之意。当然在私下里，男人们也会使用一些粗俗的习语来表示性行为，如常在街头巷尾听见的“爆她一火”，即类似西方人说的“下钻”。中国古汉字中也有一表意字类似英文的 To fuck，为两部分组成，上为入，下为肉，但禽字现已不常用。

我曾写出这个字让一位中国朋友认认，看她有什么反应。不料她竟脱口而出：“别说这种事，太肮脏了！”

朋友虽已40岁，却个子高大、身段苗条、翘着短小的鼻子、剪着男孩子的短发，脸上光润洁白，双颊线条优美，看上去要年轻得多。她在体委系统工作，每天早晨5点30起床，围着运动场跑上大约6公里，才保持住这身体态。作为记者，她的任务是为英文杂志采访稿件。后来我还听说，她也是党员，还在文革期间昙花一现地当过几天领导干部，原因是在体委掌权的激进派，需要推出妇女来。

这位女士出生在广州附近某地的中学教师家庭，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和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她就主动放弃了小学学业。据她解释，“那是革命高潮时期，我非常年轻、单

苑，党叫干啥就干啥。因为是积极分子，12岁就参加了革命。”如果对她这话加以解释，那就是说，她参加了工作，在广州市委当办事员。每天晚上，她仍坚持自学，也去市游泳队参加训练，她还是当地的仰泳冠军。即使到了现在，她走起路来仍具有运动员的优美姿势，两腿不像走路，而是在弹跳。

她16岁那年就被批准入党了，这种荣誉来得的确太早。她那时已经有了男朋友，“他是市足球队的队长。”她告诉我这些情况时不无骄傲自豪之感，当时我们刚认识不久，又在友谊商店遇上。她正带着一群来访的澳大利亚教练员到商店购物。

有那么一年的时间，她常常和她的男朋友上广州的一个公园散步。公园通常是中国的年轻情侣们能够静下心来谈情说爱的地方，原因是人们一无外出兜风的轿车，二无专门备好的结婚用住房。她回忆说：“我俩那会儿态度都很认真，简直就像快结婚了。两人都爱得很深，拼命地接吻。但仅此而已，决不会还干其它什么的。”她男朋友住在当地体委宿舍，膳食住宿由国家包干。“他每天都要训练，不训练就是去比赛。只要有时间，我都去看他训练或赛球。晚上参加球赛前，运动员们也可以到训练场外闲逛。”

然而接下来，两人就遇到了麻烦。她继续说：“他的家庭出身很不好，父亲在国民党里当过军官。他哥哥在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虽然这些对我影响不大，他却很着急。他觉得我是党员，是积极分子，他配不上。他说为了不影晌我的前途，一定要分手。我俩就这样吹了，我一生

只爱过他一个人。”

事后不久，她的领导决定送她去北京上大学，而实际上她只上过5年正规小学。到了大学，她发现同学们大多是北京的党政和军队高干的子女，每逢星期天都要回家，只剩下少数男生困守校园。

“星期天最糟糕，男生们总爱来挑逗我。我只得把自己关在寝室里，但他们仍千方百计地想闯进来。”她这种不随和态度激怒了追求者们，于是被斥为“对同志不友好”。对于她这样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年轻党员，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种很严厉的批评。那时，党员都被号召争当思想端正、性格开朗和联系群众的模范。

“有个男生追我特紧。他公开对我说，他就要爱我，要不和他结婚，就自杀来让我看看。那会儿刚好有个同学跳楼自杀了。他的话吓得我不轻。”

一天，班上的党支书找她谈话。她把这位支书看成是位好人，没想到后来他竟在自己档案中凑了一份材料。支书当时劝她对男生们要大方些，还说，要是那个追她的男生决意要和她结婚，她应该答应下来。那男生已在部队晋升为军官，这样的小两口很配对。就如前面提到的李莉那样，她接受了党支书的关心，即对她的最隐秘的私生活的关心。

“我怕招来更多的麻烦。后来那男生再一追我，我也就答应了。但我提出了一个条件，婚后大家各睡各的，他不得来找我的麻烦。这就是说，我们不得睡到一块儿。我历来受的教育是，做那种事很肮脏，课堂上和报刊上都这么讲。”

这种过份的忸怩作态为后来多少年的生活不幸种下了祸根。在我和她逐步加深认识的几个月中，她小心翼翼地向我展开了她的生活经历，每一次谈话都剥去一层她用以掩盖自己内心活动的保护面纱。我曾十分好奇，她这样坚持会见一个外国记者并主动讲述自己的私生活经历，难道不知道在冒很大的风险吗？然而她总是很主动地打电话给我约定会面时间和地点，要么是在附近的街角，要么是在就近的书店。“我的生活经历，从没告诉过任何朋友，也没对任何同事讲过。对他们讲太危险。就是现在不向上汇报，谁知啥时候运动一来，有人就会禁不住讲出去。在一般人看来，既有现在的工作，又有当军官的丈夫，我是够幸福的了。”因而，她就令人不解地自以为，向一个外国人透露她不敢向朋友和同事启齿的秘密，也许没什么风险。

当然，她和我交朋友还有另一个原因。她曾经是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满怀热情地为党的事业辛勤工作。到了文革中，由于群众派别之间的争斗，她忽儿升官荣耀，忽儿坠地痛苦，于是热情和认识都发生了变化。现在，她突然发现与外国朋友相交不无快乐，一是违反政府禁令带来的内心惊喜，二是和外国人谈话可以练习英语口语。从她有时的穿戴，可以看出她对西方服饰的爱好。她曾托香港亲戚搞来布料，仿照西方款式做了紧身裤穿上。也许正由于这几方面的原因，她最后竟对我讲出了自己生活经历的核心内容。

她坚持认为，她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不幸的结合。尽管夫妻俩婚后不久已生有一女孩，遇到丈夫所求，

她总要加以拒绝。

“我们为此常常大吵不闹。一年之中，他大多不在家，军人得分居。他一年回来探家一次，大约有一个月。一回家就老看着我，我知道他想干什么。真烦死人了。他经常缠着我动手动脚，要摸身上，要摸乳房。我决不准他乱动，连摸手也不行，真让人恶心！”

这样一来，丈夫就不得不使用强力制服她：“每次都疼得难受，我身子不发湿，他要进去就得忍受痛苦。这样不仅让我受疼，他也照样疼痛难忍。”

到后来，她居然自己摸索出一个较好的防御机制。

“他以后再来的时候，再要和我作爱，我就吓得像发了心肌梗塞那样，胸部绷得紧紧的，呼吸显得十分微弱和困难。接着，我禁不住放声大哭起来。一见这阵势，他就会赶忙躲开。”她说，有时性交以后，她不得不奔到厕所里去呕吐一番。

有一天我同她在紫禁城散步，她告诉我：“我上医生那儿去检查过好几次身体，老担心是得了心脏病。医生给我检查得很仔细，还做过心电图，还在什么仪器上跑了一阵。有啥病呢？压根就没有。我当过运动员，现在还坚持每天早晨跑上一个钟头呢。”

我接着问她，是否把造成症状的真实原因告诉过医生？“没有，我怎么能对医生讲呢？那太丢人了。”可惜她说她从没听说过弗洛伊德其人，否则，这位维也纳精神分析学家就会断出她的病因。其诊断之容易，就如他诊断19世纪那些歇斯底里的欧洲妇女那样。

我又问她，是否经历过性高潮？一听这词，她的眉头

皱成一团，似乎大惑不解。于是，我为了让她清楚了，就借助台湾、香港和某些中国人常用的一个口语词“高潮”，再问了她一遍。她一听仍然不解。“你说的是啥意思？”很显然，她从没经历过这种性情感受。她只知道，性交就那么三、四分钟，丈夫一泄气，也就完事了。

我于是问她是否试过口交。她的反应是：“那是什么意思？亲吻？”

这就迫使我不得不十分尴尬地向她解释。这番话真令她难以置信：“外国人凭什么要那么干？实在让人恶心！”我接下来为她举了个例，讲叙了电影《深喉》中的一个镜头。她立即认为，“中国人决不会去看这种不要脸的肮脏电影！”

尽管我们之间有过这些谈话，她本人并不觉得她性生活中欠缺了什么。“我身体很健壮，从没想过这种花花点子，更没想过自己会去体验一番。我们不像你们西方人。你们亲了人家女孩，一阵风就变卦了。”女士到了这样的年龄，仍不乏浪漫幻想。她说自己看过美国电影《我们的昔日相处》后深受感动。那是由罗伯特·雷德福特和巴巴拉·斯特莱姆合演的爱情故事片，由于在中国并没公映，她是靠一个朋友偷偷送票才进入朋友单位的小礼堂观看的。她甚至还能哼出电影的主题曲来，只是声音沙哑，听起来不那么入味。据她讲，“有时也能不知不觉地进入电影梦境，如夜晚醒来，禁不住会幻想某个男人会真心爱我，让我愉快幸福。但细细琢磨，又觉得那根本不可能。”

当我有意暗示，女士的病因在于心态失衡造成的性冷淡时，她十分怀疑我这种说法。于是又告诉她，在美国，

有像阿尔福雷德·金西和马斯特斯及约翰逊小组这样的性医学权威，他们毕生致力于研究人类的性行为反应，并著成若干相当畅销的书籍。谁知她听了竟放声大笑：“那些医生真是没事干，白费功夫。”

就这样同她交往，使我越来越感到有些神经紧张，原因是我们接触太频繁，已到了每周一次的程度，而且总是她主动打电话到北京饭店约我。我于是暗示，公安局迟早会有所注意，要是过几周再相见，也许会安全些。但对我的建议，她似乎不屑一顾，她坚持认为可以相见。“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我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朋友。”这以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她挂电话来说已被安排陪同一些领导去沈阳，说是去检查那儿的一些体育运动设施，大概要一、两周后才能回来。她还说，对这样命令她出差很感意外，毕竟不属于她的本职工作。但口气中丝毫没有露出疑虑或预感不祥的痕迹。

足有一个月，我都没听到她的消息，心中不免着急。于是决定找个公用电话给她办公室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个男声，没说她到那儿去了，反而问我：“你哪儿？”我顿时觉得不妙，急忙将电话挂上。接下来，我又让汪小姐再给她办公室打电话，谎称是从广州来的亲戚，想见她。这一次回话的仍是那个男音：“她出差去了。”那她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对方的回答是：“得好长时间呢。”汪小姐不满足，又加紧问，究竟什么时间能回来？对方的声音立即变得不耐烦起来：“我不知道。”于是，汪小姐也同意我的看法：事情不妙。

后来我始终没能再见到她。我回忆到我曾为《纽约时

报》的专辑写过一篇报道，专门论述中国的性爱问题。报道中涉及到体委系统几桩不幸婚姻，虽然没有指名道姓，说不定给她惹出了麻烦。

中国至今仍没发表过任何有关女子性冷淡发生率或性高潮感受比例的统计数据，因而在这方面作出任何结论都是主观片面的。然而，同中国人摆谈越多，我就越感到上述那位女士的性生活经历在中国并不少见。可以这样说，许多中国妇女没能从性爱中获得欢悦，她们甚至从没感到应该获得欢悦；中国有若干男子不懂如何才能使自己的性爱对象心满意足；在中国广泛存在着对性行为 and 性满足的无知。

哈佛大学来的研究生苏珊·威尔芙嫁给了中国人并在北京教授英语，她回忆起学校一位中国教师听到萨默女士唱的《呀，爱上加爱》歌曲磁带时的惶惑神情，不免哈哈大笑。那位教师是已到不惑之年的两个孩子的父亲，苏珊说他长得英俊，可一点也听不懂歌曲是唱些什么。特别是其中那首《迪斯科女王》里，有萨默女士模仿女子感受性高潮时发出的低语、呻吟和气喘声。那位老师听不明白，直问苏珊：“这是在干什么呀？是生孩子不是？”

我到北京不久，就看到一件事，其中含义足以说明为什么人们觉得必须将自己的性观念掩饰起来。那天是到王府井大街去买点西药，我正站在柜台前，身旁来了位40出头的家庭妇女，问女售货员要一盒避孕丸。因为政府立下雄心壮志，决心到2000年将人口增长率降到零，所以，无论在商店还是在街道居委会，避孕药物都是免费提供。

因而，眼前这场交易本来应该是非常自然、简单的。

不料，那位20出头、手戴玉镯、身穿白色卫生服的售货员竟抬头将中年妇女细细打量了一番，于是扬起眉毛，许是看出了顾客年纪不轻。

“是你要？”她双眼瞪着面前的中年妇女，可以看清后者一头短发梳理整洁、紧别在头上，但发色已呈灰白。

“哦，不，是我女儿要，”顾客慌忙答道。

可以看出她是在明显地撒谎。因为她年龄不过40出头，女儿极有可能还不到结婚年纪。按法律规定，城市女青年得年满25周岁、城市男青年得年满27周岁，才能批准结婚。当然，各地区还有些细微差别。这种晚婚要求也是出自计划生育总体规划，因为年轻人结婚越晚，所剩具有生育能力的时间就越短，可能的生育数量也就越少。晚婚甚至如个人的其他权利和义务一样，为1978年颁布的中国宪法所确认。由此可以推断，药店里那位中年妇女可能是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和丈夫仍在作爱。

某位嫁给中国人的美国妇女对我说：“我认识的中国女人大多把性爱看成是一种义务。一遇到丈夫要求过多，她们就会埋怨、发牢骚。一般说来，年满40之后，她们就觉得义务已经尽完了，双方都该歇气了。”她丈夫年长10岁，刚满50，可一到单位领取每月分发的避孕套就遭到同事们的戏谑嘲笑。因为人们觉得到了老两口那种年龄，“无论丈夫还是我，都不该还有兴趣。”

我还认识一位妇女，她身为中学教师，对丈夫却牢骚满腹。有一次和她在香山附近的卧佛寺相遇，我们一边散步，一边听她讲自己和丈夫的离婚经过。她说起话来发音

急促、用词生硬，不像我认识的其他中国人。她年仅36岁，长得端庄秀美，性格却与年龄和长相不大协调，大概是因为由祖母严厉管教、一手拖大的缘故。据说就因为邻里有位小男孩，祖母甚至不让年仅6岁的她去邻居家玩。

“祖母老觉得小女孩不该和男孩来往，一来往就是犯禁。她这个老封建，地道的满清老太婆。”

她是这样解释她的生活困境的：“我从没拒绝过丈夫要干事的要求，结婚以前也没同男人睡过，啥也不懂。但他有病，刚接触就完事了，接着，马上就呼呼大睡。结婚才过了一年，我就得了失眠症，可我丈夫他倒好，一躺下准睡得打鼾。最初我睡不着，就干脆躺着胡思乱想吧。后后慢慢地伤心、哭泣，最后变得来放声大哭。我就这样过了12年了。”

上述两位女士都说过，她们既没在学校接受过任何性教育，也没听到过朋友们的指教劝说。说她们接受的最有益的教育，就是单位上举办的节育讲座。但当时认为“太肮脏”，并没注意听讲。她们的这种经历很普遍。我询问过所认识的许多中国人，他们全都承认，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医生的诊断室，从没讲解和实践过什么性心理咨询疗法。

这种对性问题的无知和官方的清教禁欲主义在苏联也大多存在。两国或许都认为，爱情与性爱是下贱的勾当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一种群体乱交，是非革命的行为，不值得鼓励和提倡，以避免人们思想走神、行为不轨，从而妨碍建设新型社会主义国家的努力。人们不仅从苏联照搬了意识形态、党政机器和上述性伦理观念，而且拥有自

已特殊的革命传统。这就是：身为革命者，应该做到为革命全心全意、清心寡欲；而任何个人性爱都是淫荡闹剧，会消极地影响到发展经济的伟大任务和党的纪律的严格执行。中国的新闻媒介偶尔也会提供性问题咨询，但通常是敦促人们消除不恰当的情感，升华革命精神，以便为国为民从事建设性的工作或学习。下面所摘某高中学生与某青年报纸的**思想交流**就属此列。

编辑同志：

我已经爱上了一个女生，但我没有勇气向她讲明这种关系。我应该怎么办呢？

陶杰

报上发表的回信，由一位自称是高中教师的人所写，兹引其中主要段落。

.....

“你们两人既已相爱，要分开的确不那么容易。但你们必须作出决定。高中是一个人朝气蓬勃的时期，如果现在就谈上恋爱，那会丧失宝贵的青春年华。你们这一代将在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因而应该把精力集中到如何将自己培养成为有益于祖国的人。像你这个年龄，谈恋爱还太早，另外，还会荒废学业。改掉不良习惯需要毅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也需要毅力。你可以和那位女同学保持友谊，但要避免

亲密。可以多花些时间和班上其他同学交往。”

北京认为适当的思想可以克服人的生理需求的见解，还反映在另一名年轻读者和某青年报纸就手淫问题进行的一场精心对话中。须得说明的是，“手淫”的汉译法不尽符合英文原意。

编辑同志：

我真不好意思开口向你谈这个问题。我已经染上手淫习惯一年多了，虽然一心想戒除掉，实际上却做不到。我近来觉得浑身无力，想去医院看病，又怕人嘲笑。我实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

河南 小李

由北京医学院某教授所写的回信如下：

读了你的来信，我觉得有必要谈谈某些生理卫生知识。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有些年轻人只是出于好奇才借助手淫来满足自己的性欲需求。但没想到，日子一长就养成了一种恶习。年轻人处于生长发育时期，如果缺乏对性问题的正确了解，或者受到黄色读物的影响，都会导致手淫现象。若是久而一次，对人的身体健康不会有任何影响，倘若养成定期的习惯性动作，则会刺激性感神

经，以致感到疲劳头晕和无精打彩，以及记忆力衰退等症状，这会影响到日常的学习和工作。如果发展下去，将会造成精神崩溃，而婚后生活不协调以及过早射精等也与手淫有关。

其次，我想谈谈你该如何对待手淫。我可以满怀信心地告诉你，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完全克服，并且不留什么消极后果。你必须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学习和工作上，并安排好业余时间参加体育活动，以便使你的生活恢复正常。

晚上睡觉之前，应当适当跑步，然后用热水洗脚，争取一躺到床上就能入睡。早晨醒来，别留恋热被窝。千万注意，睡觉时不宜俯卧，也别盖得太厚。不要穿紧身衣裤，还应保持阴茎的清洁。

手淫是否会影响婚后生活呢？如果你的身体健康，这并不成其为问题。如果身体状况不佳又坚持手淫，那就可能产生某些消极影响。

有人说，一滴精液贵如十滴血液，这毫无科学根据。精液主要由蛋白质合成，丧失越多，体内会合成越多。不过，这也会造成身体的损耗。因此，你们已婚青年应该在性行为方面有所节制。

另有一名教师著有一种袖珍本的《性知识》，这是我在中国所见的唯一性知识手册。但该书采取更加拘谨的态度来说明限制性交频率的必要性。“新婚夫妇一结婚，多

会房事十分频繁，即每隔3到7天一次。”这是两位学者的预计。他们又接着说，随着激情的消失，新婚夫妇大致可以降到较为正常的频率，“即每一至两周房事一次。”作者又建议，个人可根据自己性交次日清晨的感觉，来选择房事的频繁程度。该书一问世，在北京饭店附近的新华书店只摆出几个小时，就被抢购一空。

该书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如果房事频率适当，人们次日不会感到疲劳。实际情况却恰好相反，人们会发觉浑身轻松、精力充沛和心情愉快。”

同时，两位学者又警告说，过分纵欲的确切标志是夫妇双方感到“头晕脑胀、双腿酸软、心跳加快、气喘吁吁或食欲减退。”

几位学者如此坚持性行为会导致体力衰弱，因而应该适度行事，似乎与19世纪时人们对通奸邪恶的诋毁方式如出一辙。然而，学者们的议论并不能消除中国青年目前在这方面的迷惘心理。如果女青年未满25周岁、男青年未满27或28周岁不能批准结婚，而且婚前性生活即使不算非法，也算是禁忌的话，那青年们只能干什么才好呢？汪小姐上北大时，同校有位男生长得十分英俊潇洒，毕业后考上了工科某专业的研究生。但开学后仅几周，校方就接到三位不同姓名的妇女来信，均宣称该生曾以结婚许诺“骗取”女方信任，以致同他共寝。三位妇女都指责说，决不能让这种流氓得逞，不能让他上研究生院。研究生在中国确系令人瞩目的，当时10亿人口中每年仅招生8,000名。校方只得同意开除该生学籍，这当然是对他终生事业的致命一击。

《纽约时报》总编罗森塞尔1981年访华时，曾被安排去参观了上海的一所工读学校。当他走进女生车间时，看到12个少女正在做纸盒。他询问其中一位因什么原因来此工读，对方立刻站起来，两眼直瞪着他，心情痛苦地回答：“我今年18岁。到这儿是因为我和男孩们发生关系。”罗森塞尔走进另一车间，见到的则是一群少女在踩缝纫机，随便一问，得到的是同样答复。后来听校长介绍，上这所学校参加工读的女生大多是因为和男孩们发生关系。她们的行为并非卖淫，但构成了触犯伦理道德规则的性犯罪。

如果手淫有害于身体健康，而作爱又必须等到结婚以后，那么，同性恋在中国就确如一片未曾开垦的处女地。我从没在中国的新闻媒介上看到有关同性恋的报道，大概是越轨太甚，难以启齿。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早已包含若干同性恋情人的例子，不过今天的中国人大多对其含义不甚明了。一位28岁的男青年工作中有机会接触到外国报刊，也读过一些有关美国的“解放快活运动”的文章，但他仍好奇地问我，两个男人交媾究竟是怎么回事？看他那副样子，倒的确是一无所知。老资格的美联社特派记者约翰·罗德里克于1979年初到北京开办办事处，不久即同政府安排来的译员混得很熟。谈到同性恋问题，他竟被那译员吓了一大跳。“你知道我们中国怎样对付同性恋吗？”译员问罗德里克，待到后者回答没听说过时，译员又悄悄透露：“把他们枪毙掉！”当然了，也许这是开玩笑。

然而另一方面，中国人也和其他亚洲人一样，把西方人认为的某些同性恋动作视为人之常情，如男人们手拉着手在街上行走，或者在公共浴池内互相搓擦。我在台湾学

习汉语时，花了好长时间，才对一位中国同学老爱牵着我的手上街的习惯感到自然些。但后来坐出租车外出时，另一位同学一直将他的手放在我大腿上老不抽开，也仍然让我吃惊不小。但对中国人说来，这只是朋友之间关系密切的表示。

但无论如何，中国确是存在着极为稀少的那么些同性恋分子，只不过深藏于阴暗之处。他们面临着社会排斥的真正威胁。一位中年知识分子对我讲了他所闻的一件事。北京某工厂有位老工人是同性恋者，他秘知车间里有个年轻工人隐瞒了自己一位近亲的地主成份。于是，老工人就用这件事要挟年轻工人搞同性恋。后来，那位年轻工人权衡再三，认为二者对自己的影响中数同性恋为害大，于是向上作了汇报。结果，老少二人均在工厂大会上受到了严厉批判。

汪小姐有位朋友也讲了一个自己远房亲戚的同性恋经历。那亲戚和她的同性恋伙伴都是医院护士，二人自40年代以来就一直同住同吃。她们同住是同一张床睡，而且对这种关系并不在乎向外人透露。邻居们均耳闻目睹，但从未加以干涉，一则两个女人并没惹事生非，二则大家以为，她俩同居是因为找不到各自合适的男人。在中国，无论男女都受到各自家庭的巨大压力，要求寻偶订婚，以便门庭光彩。所谓“大龄青年”的比例其实占得不大。

不过到了文化大革命，两位女同性恋者确实遇到了倒霉的麻烦。在此之间，她们曾过嗣了一个女儿，是二人之一的亲戚。这继女生长在如此不寻常的家庭环境中，自然产生出一种憎恶情绪。文革风一吹到，她就参加了红卫

兵，还把自己那伙造反派带到家里，揭发两位母亲的勾当，找出她们藏在地板下的存折。汪小姐的朋友以为，在中国的现在条件下，要结成这种女同性恋关系是不可能的。“你不能像新婚夫妻那样去申请住房，那同性恋活动该上哪儿搞？”她一边解释，一边放声大笑，脸上充满了惊喜之情。照中国目前住房紧张情况看，就是行为正常的新婚夫妇都要申请好几年后，才能分到住房。

随着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教育、工业生产和党的纪律的破坏和侵蚀，北京所坚持的拘谨的伦理道德观念也有所松懈。在号召青年红卫兵们到全国各地大串联时，他们经常不顾性别差异，在火车上、军营中或其他可能的住所男女同寝，这就动摇了人们对人际亲密的保守态度。后来又要求将成千上万的中学毕业生送到农村，本来是号召他们锻炼革命意志，却反而为他们提供了逃避父母管束、生活上自得其乐的机会。公社领导为了图方便也常将他们集体安住，更让男女知青们感到，在家中未曾体验到的过从甚密是排解农村艰难生活的唯一安慰。

结果我发现，尽管许多青年男子仍把处女视为寻求妻子的首要条件，真正的处女却不多了。我在一家小餐馆吃饭时曾遇到一位雷达技师。他后来对我说，他仍是一个童男呢。但又接着解释：“恐怕在一群朋友中，就数我洁身自好了。”我难以判断，他这是在自吹自擂还是大发牢骚。

他说：“我最怕和女人发生关系。要是发生了关系又不喜欢对方，不愿同对方结婚，那她就要告我强奸她。”

这正是汪小姐所讲的北大那位同学遇到的麻烦。从眼前这位雷达技师的说话看，女人们对他感兴趣，大多不是爱他本人，而是看中他的家庭地位。

北京机床厂一位个子高大、长相标致的车床手说，过去几年来，他的哥儿们越来越喜欢过婚前性生活。据他观察：“结婚前睡觉的习惯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会儿没有法治。但现在政府仍要我们等到28岁才批准结婚，这是眼下的问题所在。谁能等到那种年龄才发生关系？”车床手也责怪了中国目前的住房紧张状况。“我那年28岁，我女朋友也已经25岁了，可我俩仍没法分房。据说还得等上3年。我俩都担心，要是房子等到了再发生关系，人早已老了。”于是，他就同那位也是工友的女朋友在父母家同居了。据他说，北京人对这种生活安排还专门编出一个词，叫“住里”。他的哥儿们几乎全都在婚前“住里”了。“这事父母十分清楚，我只是不告诉单位。”到我见到他时，已经33岁，婚后很幸福，小两口所生女孩也两岁了。

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变化的另一表现是，虽然各方面施加了不少压力，妇女，甚至是十几岁少女的未婚怀孕现象有所增加。哈佛医学院来的研究生戴维·埃森伯格曾在北京中医学院实习一年，他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说，学校有位欧洲来的医生很难进入妇科病房，但他本人却在两周内看到12名未婚怀孕的女子来做人工流产。女孩们的年龄是17到24岁，其中有位22岁的，已是第二次上医院堕胎，尽管有男朋友陪着，仍不停地哭泣。

乡村地区的管教更松一些，虽然人们都以为乡下人思

想更保守，但婚前性爱仍比城市容易。美籍华人妇女麦莫西女士曾陪她那位社会学家丈夫到广东故乡作过调查采访，一年之后回京说，被采访年轻女子的70%都承认有过婚前怀孕，而且她们的年龄均在30岁以下。这显然是一种新的发展趋势，说明年轻一代不顾官方政策限制、我行我素地对待生活的风气正在蔓延。

麦莫西女士回忆起这样一件事：她故乡的某邻居已经身怀六甲，当公婆用自行车来接她去新家时（中国人结婚已不再用大红轿子，而是时兴自行车后座搭人），“真让人好笑死了，她坐在后座上挺着大肚子，样子显得十分神气。”

在过去几年中，已有不少个城市妇女抱怨，公共汽车一拥挤，就有男人抓捏自己的臀部，或将手伸进自己的衣裤。12月的某天下午，我乘上一路公共汽车沿着长安街过去。刚到西单附近，就看见车上一位年近30岁的美貌妇女在责骂直往自己身上挤的一名男子。尽管当时天寒地冻，那妇女已穿上厚实的棉裤，那男子仍悄悄把自己的手插进她两腿之间。

“你要再动我，我就不客气要动手打了啊！”妇女故意抬高声音警告说，让全车乘客都听得清清楚楚，不由得睁大眼睛盯住他俩。不一会儿，她果然说话算数，故意用胳膊肘朝那男子胸口撞去。到了天安门广场下车时，她一边朝车门旁移动，一边仍不住地骂骂咧咧。

不雅之徒还不时骚扰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女生宿舍。该院一名美国女生回忆说，某夜正在寝室中看书，冷不防窜进一个常在校园内闲逛的20出头的年轻男子。这小子穿

一件束腰的西式夹克，当着这美国女生二话没说，就直扒自己的裤子。吓得她尖声大叫，才把小伙子赶跑。据她猜测，那小伙子并非学生，而是校外工人，但却会想尽办法进入女生宿舍，而且已不止一次。

诸如此类的恶作剧在纽约或东京更是司空见惯，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人完全一样，都是食人间烟火的人，都有自己的性欲需求。只不过人们还没有最终让性欲需求完全合法化，因而极少数人就易于利用人群拥挤之机违反道德规则。在家里或单位，因其不轨行为容易被人发现，故对环境压力表现得规规矩矩、服服帖帖。而一旦在外有机可乘，这极少数人就会难于自控，尽情地在街头巷尾追逐女孩。这种城市中发生的现象是最近一、两年才有所与闻的。

北京电台的一位女翻译，长着一对美丽的杏眼，但鼻梁直线稍微欠佳。据她说，有好几次骑车进城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最令人吃惊的是，那些小伙子都显得很有文化修养，衣服穿戴得大方整洁，根本不是社会上那种蓄小胡子、戴太阳镜的阿飞。”

“有天我正骑着车，突然听到身后有人打招呼：‘喂，小姐，看电影去好吗？我搞到的票不少呢！’”

“我想他是在提醒我，他能搞到那么多票，是高干的儿子。得让他打消这种念头。于是我对他说，我年龄不小了，早已经结婚。但他听后却哈哈大笑地说：‘你看上去好像才在上小学六年级呢！’”

“最后，我们一同骑到了北京饭店，我对他说自己要进去办公事。”这句话能给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它意味

着女翻译的工作很重要，因与外国人保持着必不可少的联系。“但他听后却反驳说：‘用不着那么急着去办。这有啥大不了的？我经常到这儿吃饭呢。’”到她推着车去饭店停车场时，小伙子却并没跟来，而是快快自去。

一般中国人都认为，这种追逐女孩现象的逐步增多充分说明，文化大革命导致了人们从权威和伦理的自觉性普遍下降。中国人不像我们西方人，他们交朋友不习惯于在公务往来、车上偶遇或餐席相聚这种场合，原因是在这种场合与人初次相交，他们老感到局促不安。而相形之下，坐等朋友和亲戚从中牵线介绍倒是令人十分愉快的传统结交方式。中国人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像西方那样或则出自奇遇邂逅，或则出自心血来潮，而是久经培育、逐步形成。美国人生活喜欢单打一和唱独角戏，中国人交友喜欢大家热闹和中间人介绍。

我家的中国朋友小苗就爱当婚姻介绍人。有天晚饭时她告诉我，她认识的男女青年不少，托不下双方家人面子，只得深深地涉入儿女情场。按她的解释，作媒的第一步是要研究各位候选人的分类背景细节，如家庭收入状况、所受教育程度、及个人身材长相等。干部爱找干部，工人喜欢工人，知识分子寻觅知识分子。

她注意到的另一大特点是，“小伙子苛求姑娘要人材美貌，姑娘们要求小伙子要工作优越、收入丰裕。”

她继续介绍说，最近几年来，年轻女子选择丈夫的标准已经主要看钱财多少。“这实在糟糕，但人们都这样，”小苗说到这儿不无惋惜心情。据她观察，这仍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因为人们“批判爱情是庸俗、下贱的资产阶

级生活方式，结果搞乱了大家的思想。既然追求爱情是不革命的，那就追求物质享受吧，这对年轻女子们还实惠得多。真是令人可笑。”

据小苗回忆，各地城市中都留传着不少俗话，说是要当新郎官，必备十大件。它们是：一套家俱；二老不在；三件齐转（意指手表、缝纫机和自行车）；四季服装；五官端正；六亲不认；七十工钱；八面玲珑；九（酒）烟不沾；十分听话。

共产党人早已在1950年通过的进步的《婚姻法》中取缔了旧时的结婚彩礼习俗。然而据新华社承认，1980年中结婚的北京青年男女平均每对花费1,554元人民币，其中绝大部分出自新郎腰包和家庭支持。这个数目超出小两口全年的工薪收入。

小苗介绍说，一旦为某一青年男女确定了合适对象，她将安排适当时间让双方见面。地点则大多选在离双方父母家路程相同的某处。这样做，即使双方或单方看不上对方，无意与之婚配，也不会丢失面子。至于见面时间的选择，小苗说她家里珍藏有旧时的中国黄历，得认真翻读以后才能确定。

这番讲解令我大开眼界，也惊喜万分，必欲目睹其实践过程为快。于是，在一个吉祥如意、秋高气爽的9月某星期日下午，我随小苗和作为她委托人的一位小伙子一同来到了紫禁城旁边的中山公园。公园里遍布着小花坛，园丁们正辛勤地浇灌修剪着花木。脚下是石块铺成的小道，两旁是青翠的松枝和苍劲的柏树。园内四周还座落着不少华美的楼阁，其光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它作为皇城的组成

部分的古代。小苗所挑中的年轻女子露面了，她身穿熨烫平整、洁白大方的春秋衫和灰色便裤，拖着两条长长的辫子。小苗即约她坐在长凳上交谈了15分钟，与此同时，小伙子也坐到长凳的另一头，不时小心谨慎地膘着那姑娘，也适当凑上几句话。后来我听小伙子对小苗说，总的说来，他对姑娘表示满意，只是觉得她脖子太短、皮肤太黑。中国男人如此把白皙皮肤视为美的第一象征和性感所在，大概是受了封建传统的影响。那会儿，达官贵人家的小姐妻妾整日厮守闺房和庭院，养得一身白皙肌肤，免受了农人女儿的日晒雨淋。既然富贵人家唯白美哉，余人何不仿效？最后我听小苗说，为这桩姻缘，她收到了如下一些赠礼：一匹衣料、若干粮票和一辆半新自行车。

小苗承认，她的牵线搭桥并非诸事如意，而且某次竟难于找到婚配对象，差点失了信誉。女方是年满30的大龄青年，因毕业分配在离京有好几小时汽车路程的山村学校任教，误了青春年华，错过了恋爱机会。当然，其中原因也有她自视大学毕业，知识分子看不上当地百姓。再者，“她还非得强求男方的长相不可”，小苗眨着眼睛补充道。像她这样的大龄女青年很难受到中国男子们的青睐，原因是30周岁是人生一大门槛。这道门槛发挥着神奇的身水岭作用：门内者属恋爱完婚的挑选对象，门外者系孑然一身的老年处女。然而，小苗终于历尽艰难，成全了她人之美。在会见24名候选人后，她发现了一位已知天命的科学家。他曾留学美国，并因此被划为右派，这顶政治帽子妨碍了他寻找妻子的努力。但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

并非所有的夫妇都得经由媒人牵线搭桥，李苗两口就

是在部队里自由恋爱的。李那会儿是部队文工团的名角，到苗的连队来演出时被后者看上。小苗认识文工团中某位演员，大胆地请她演出后从中介绍。李回忆起来不无男子汉的自豪：“就是她老来追我，要么约我看电影，要么陪我逛公园。”尽管小苗在一旁大声抗议，李照样大声宣称，她还主动来亲我呢！而且还准确地记得亲吻发生的地方是在她的军营里。当时，同寝室的战友们都不动声色地避了出去，留下二人单独呆在其中几个小时，这是在那种条件下唯一能避人隐私的场合。然而这件好事在李身上却浪费了整整4年时间，他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该不该爱她。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面临复员回乡参加体力劳动的命运时，李才打定主意爱苗。婚礼进行得十分简朴：两人先去当地民政部门办理了结婚手续，再在小小的居室中用啤酒和茅台款待一群战友。李的长官到场发表讲话，敦促夫妇俩为文化大革命做出贡献。再接下来，新婚伉俪面向墙上的毛主席画像行三鞠躬。但婚后没有蜜月旅行。就如许多中国人那样，他俩既无外出资金，也无休假证明。

中国人性观念方面发生的最令人吃惊的变化在于，小规模卖淫活动有所抬头。这对于北京无疑是个敏感问题。因为，在革命激情鼎盛的50年代，他们使用激烈手段清除了世界上的这一肮脏职业，将其斥之为封建社会的垃圾。烟花柳巷被勒令关闭，明妓暗娼受到改造，这是人们经常引以为自豪的伟大成就。

还在驻香港报道中国新闻时，我就听人谣传说，中国大陆有些城市里已复活起街头拉客勾当。偷渡到香港的广

州一位建筑工人宣称，他在城中心珠江附近的繁华街道上，用两元人民币买到了一个女子的服务。据他说，这种人被叫做“路边鸡”，取自一道广州菜名。如果懂得她们的特殊标志，一眼即能认出。她们中有些人是故意敞开女衫的上两颗纽扣，有的则将手绢留出半段在衣袋外，还有的将头发梳盖住一只眼，留下另一只暗送秋波。

这些谣传不能不令我满腹狐疑。多少年以来，许多访华归国的西方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中国早已彻底清除卖淫现象，而且这些说法已受到世人的公认。因此，当我初次在北京和平咖啡馆偶遇这种现象时，仍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从北京饭店到和平咖啡馆需步行约10分钟，从王府井大街边的美国梧桐树下走过，再经过有名的王府井百货大楼。到了装饰着西方模特儿的四联发廊，就向右拐进入金鱼胡同。满胡同都是争相进出的骑车人，人们因为路灯不明、胡同昏暗，只顾各自按得车铃响。和平咖啡馆外是一对石狮，守护着中式红漆大门，大门属于一座不可名状的灰砖建筑。入门处是某醉汉的呕吐之物。入门后只见房间里日光灯煞白，一群人坐那儿吞云吐雾，很容易嗅出周围散发着一股陈啤酒味。咖啡店由两间屋构成，均有一群顾客坐在折叠椅上，围住铺盖着不那么干净的塑料布的圆桌。门边有一小小的鱼池，几条黄色金鱼在其中懒洋洋地游动。然而就是这个缺乏装饰的场所，在1979年遭到警方取缔以前的半年中，成了北京时髦青年们的碰头中心。这儿的常客有工厂工人、待业青年。他们到这儿来，大多是为了品尝啤酒和该店特有的奶油巧克力冰淇淋，或者说来图个热闹。但也有少数人图的是地下勾当。

我初次进去，见门边坐着四个年轻小伙子，围着一台双喇叭的大录音机，津津有味地听着香港某歌星的流行歌曲。录音机旁还堆着不少磁带，盒上的图案十分醒目：港台女歌星的矫揉造作相。拥有这样的磁带表明了他们的关系网发达，因为没有海外关系是难以将这种违禁物品搞到手的。

相邻的桌旁坐着一名二十几岁的女子，穿一件浅蓝色毛衣，脖子上套一根金属链，下身则是绷得紧梆梆的蓝裤子。一看到有位男子进来，她就跳起身扑进来人怀里。她那嘴唇抹得过分鲜艳，头发烫成乱糟糟的一团。也许是因为当时中国的理发店仍使用着弗兰肯斯坦因执导的影片中那种老式吹风，所烫效果不佳。当然，这些人所求的与其说是美容效果，不如说是虚荣心理：乱糟糟的头发足以展示自己的时髦。我亲眼看见，那女子与来人双双坐下之后，男人的手伸进她下身抚摸起来。

走出咖啡馆准备回家，我被后面赶上来的一名个子矮小、理着平头的小伙子叫住。

他说：“你要愿意，我给你搞个女孩来。她今年14岁，人很漂亮。你可以把她带回家。不过，人叫来了你得来啊！前天我为一个老外叫了一个，到时他竟不打照面，让那女孩好骂。”

我拿不准他是否说话算数，他究竟是拉皮条的，还是吹牛皮的？为了试探真相，我当下答应了，决定约作家奥维勒·谢尔一同来。他是我在哈佛的老同学，刚好到北京旅游。

第二天傍晚一进咖啡馆，只见小伙子早已坐在一角落

里。旁边还有三个20多岁的女子，哪才是他向我保证的14岁？这种人被北京的土话称作“野鸡”。一听小伙子问要不要带她们出去，我就仔细打量了三人。第一位据说23岁，肩宽腰粗、人很结实，上穿灰卡克，下穿工作裤，很符合她自称的首都钢铁公司工人的白日职业。她也抹了口红，头发理成中式洋娃娃的圆盖形，几乎快遮住了双眼。不过在外国人看来，她打扮不打扮都显不出什么区别。她还抽着烟，这足以显出她一心想有别于一般的中国年轻妇女。

“怎么样啊？”小伙子追问我俩。我和谢尔磋商了一番，认为要看看这出戏怎么唱下去，需要和这些女子们互相交谈，而要交谈就得带她们出去。于是我们决定出去谈，小伙子跟了出来，但不知从哪里弄来雨衣和破毡帽穿戴上。我们站在胡同的一阴暗处，头上是一堵石墙，路灯和车灯都照不过来。不过，附近公共厕所中却飘来一大股气味，令人心烦不安。这幅情景完全像中国电影里出现的黑社会分子活动的场面。

当我们问小伙子的要价时，他一下提出要200至300元人民币。我俩不禁哈哈大笑。我回敬他说，我知道一般市价是4元。这是我从其他中国人那里听来的。于是他把价钱降到30元，最后经过讨价还价，双方同意我和谢尔共出20元。中国人爱向外国人要高价，无论餐馆、博物馆，还是地下刊物或卖淫活动，都是如此。

待我们付了钱，小伙子从中拿出一份给其中一位姑娘，也就算选中她跟我们走了。我俩立刻向她说明，只想同她谈谈。她立刻感到困惑，大概是觉得已经收钱，得想办法立

刻完事溜掉。

“我得回家，”她主动说，两手叉在宽大的臀部，一双眼睛盯着我们。她也抹得唇红眼黑的，但样子一点不可爱。她厉声告诉我俩：“爸妈把我管得很紧，他们让我每晚9点回家。”那么你怎么能来到和平咖啡馆呢？“我骗他们，说我上朋友家玩会儿。”

听她讲，她是护士，每月挣22元，不及北京官方公布的人均工资收入的一半，17岁上高中时就开始与人作爱了。她还说：“这种事现在在学校很普遍。”我们以为找地方困难，就问她学生们到哪儿去谈情作爱。“没什么难的，别人家的爸妈弟妹上班去了，可以借他家嘛。”

她曾与相当多人睡过，包括海外华人、巴基斯坦人和美国人，而且她并不认为这有多大风险。“需要的话可以去人工流产。走后门嘛，给医生点钱就没事了。”

就在我们仍站在那儿谈话的时候，过来了一群男人。她说其中有她哥，父母正在找她，得回家了。

那几个月中，不少外国记者都报道过和平咖啡馆的情况。就在和我们谈话两、三个月之后，姑娘被逮捕了。报纸上的文章指责像她和拉皮条的小伙子这种人“败坏中国的名声和往祖国的脸上抹黑。”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无意识地促成了人们的性生活观念的改变。那么人们过去却是有意地加强了对人们婚姻的管制。自1949年以来，任何申请结婚者都必须首先得到本单位的同意，只有这样，才能接着去办理合法的结婚手续。这套规章对那些家庭出身“清白”的人来说，纯属一

种例行公事，用不着费丝毫周折。但对于党员和军队干部，因其担负着特殊的职责，则需要认真调查其配偶的政治表现。据中国人说，干部的级别越高，调查得越仔细。

若发现配偶方面存在什么政治问题，则很难批准双方结婚，目的很明显：为了维护公共安全。广州某医院办事员就是这样的例子。他想娶医院的一位漂亮护士为妻，但她生于资产阶级家庭，于是结婚申请遭到了拒绝。

办事员长得个子矮小、头发蓬松、门牙不齐，看样子已近不惑之年。他告诉我说：“他们并不向我说明原因，只有两个字：不准。”

“我一直闹不清错在哪儿。但后来我们凑了凑情况。从各种迹象看，肯定是文革中有人说她是特务，因为她姐姐在美国，还有些亲戚在香港。有人就把这种材料放进了她的档案。不过，我们从没看过档案，只是觉得完全有可能。当然，没人出面证实这一点。”

尽管婚姻不成，办事员仍照样同那位护士来往。后来又被他责成不准去见她，但他依然执迷不悟、情深意长，终于激怒领导，被遣送到边远山区的农场去参加劳动锻炼。6年以后，林彪倒台，医院也改组了领导班子，他的宿愿才终于得以实现。

中国并不发表全国性的犯罪统计报告，因而无从得知每年的强奸案发率。不过，我曾造访上海的一座大监狱，对此稍有见闻。那是一群钢筋混凝土建筑，天长日久已经蒙上一层灰色。据管理监狱的政委介绍，那儿在押最多的是抢劫犯，其次就是强奸犯。的确，在我参观的那间牢房中共有三名囚犯，其一为抢劫入狱，其二为强奸治罪，其

三系国民党特务。

也有其它的证据说明，强奸已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我驻中国期间曾在各地看到不少法院贴出的布告，上面详细讲述了罪犯们的犯罪事实，强奸案在其中占很大比重。另就是前面说到的年轻清愿者力华，她不仅亲手杀死了企图强奸她的知青，还告诉我邻里发生的一件强奸案。在她暂住的大哥单位宿舍楼中，有个16岁的高中女学生，由于学习很吃力，不得不到处找人辅导。她父母都是建筑工人，识字不多，帮助不大。全家经过努力，找到了附近一位30岁的技术员，因为是党员，就十分相信他帮助女儿复习功课。日子一久，女学生和技术员的来往就变得十分密切，还叫后者为“叔叔”。不料有天当母亲的发现，女儿回家时显得衣冠不整，乍一问，只见放声大哭，就是不说原因。气得母亲拿起厨房里的菜刀威吓她，女儿这才坦白：“叔叔把我强奸了。”自然，技术员很快就被公安局逮捕了。

美国精神病学者一般认为，与其说强奸是出自人们对性欲满足的强烈需求而从事的性犯罪，不如说是由遏制不住的敌对情绪、发育不良的自我感觉和追求权势的热烈欲望共同推动的性行为。如强奸研究专家卡罗尔·纳德尔逊医生，在《强奸犯与受害者》一文中就是这样说的。这种发现是否也能适应中国的情况尚不得而知，因为我从没听中国朋友们提到过中国有人搞强奸研究。事实上，他们甚至根本不懂该如何安慰被奸者。强奸有增加的势头，但问题太敏感，令中国人难以启齿。

然而无论如何，在我驻中国期间，却见到了强奸与权

欲、性爱与政治之间互相联系的证据，这就是在杭州发生的“二熊事件”。二熊系杭州驻军某将军的双胞胎，时年27岁，分别叫熊倍平和熊志平。二熊从小臭名昭著，上学逃课，受到七旬老校长的批评后竟动手伤人。入伍期间不服管教，不参加体育训练；复员以后分配到工厂干活，不打照面。他们家住宽敞住房，外有围墙与街相隔，内有花草树木，被报纸叫做“安乐窝”。他们就从这窝中频繁出击，勾引年轻女子，以晚会门票、电视节目或恋爱结婚相诱惑，带到家来强行奸污。从1974年到1978年的4年间，二熊伙同绰号叫“烂茄子”、“大头”和“尼姑”的地痞流氓共强奸妇女106名。两兄弟还在家私设公堂，审讯、迫害被诱入的女子。对于这些劣迹，邻居和警方早有所闻，只是奈何他们不得。

二熊的妹妹某日邀请一女同学来家过夜，不料被熊倍平深夜破门而入，以刀子相威逼肆意强奸。他们的母亲听见女生的哭叫仍无动于衷，次日早晨还告诫女生：“别对外人说。说了也没人信你的话。”

按中国新闻媒介的说法，二熊之所以能如此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是因为他俩的父亲拥有“领导地位”。事实上，驻京的外交官们经过认真翻阅有关材料后得出结论，二熊之父原来只是少将和省军区司令员。两兄弟最后受到逮捕法办，一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枪决情景曾在全国电视上转播；另一个在法庭上有悔改之意，判处缓期两年执行的死刑，以观后效。中国报刊并没点明，二熊之父虽拥有地位，那已是几年前的黄历。作为林彪的追随者，熊将军早已于1971年受到清洗，而二熊的犯罪则是3

年以后的事情。

尽管实行拘谨的清教主义，通奸行为也略有所闻，只是不如欧洲和美国那样普遍。汪小姐向我谈了某出版社发生的一起三角恋爱。这家出版社担负外文书籍的出版和外文杂志的编印任务。三角恋爱中的二男一女均为该社雇员。汪小姐称该女为萍，身段苗条、富有魅力，时年32岁，喜欢时髦衣裙，穿着格外引人注目。她曾下放到位于农村的五·七干校，文革后回到北京就爱上了同社的陈，与此同时，她丈夫宋仍滞留在五·七干校。陈长相很帅，皮肤黝黑、体格健壮，是摄影师，年龄小萍几岁。他早已娶有一工厂女工，且生有一子，婚后生活与萍、宋一家没有多大差别。萍与陈之间的风流韵事被宋察觉后，他非但没有采取阻止措施，还时常和萍、陈二人在出版社饭堂一起就餐，或一起外出看电影。

汪小姐后来才听人说起其中原因，说是陈只有一半华人血统，而另一半是外国血统，由此得以涉足专为外国人服务的友谊商店。于是，陈利用自己的这一优势，买来可望而不可及的好肉好菜、高档香烟、家用电器等，供三人分享。

有的中国朋友曾在乡下呆过，听他们说，农民之间偶尔还有乱交现象。一位早年就读于哈佛的大学教授曾于1964年到陕西农村参加了一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据他回忆，村里的党员干部当时十分痛心地说，一到傍晚就无法叫出社员们来参加学习。

“社员们就知道和相好们乱搞，还好意思说是在家藏

猫猫，”村干部十分气愤地对教授说。那些相好有的是单身女子，也有的是已婚主妇，通常是迫于经济条件限制，向村里光景好的男子卖弄风骚，讨些实惠。据教授讲，放羊信干活辛苦，但也挣钱，他一人就同时拥有10个相好。

但从政府的角度看，通奸行为就正如婚前怀孕一样，有损于社会安定，因而属于犯罪。我认识北京某宾馆的一位男侍应生，因与同一单位的一女侍应生通奸被判处3年徒刑。

有人也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体委系统一位倍受人们尊重的中层干部，已有妻室儿女，表面上显得婚姻美满、家庭幸福。但有一天竟被人发现，他和本单位一名已婚妇女床上寻欢。在同事们看来，事情既然已经发生，最好能够息事宁人，而双方的配偶也已表示同意离婚。然而在中国，性爱并不仅是个人之间的私事，人们把它看成单位有权干涉和管理的职责范围。因此，要离婚，首先得有单位的许可。当单位拒绝了那位中层干部的申请后，他面临无法借助法律来摆脱困境的痛苦，为了不使家人进一步难堪，就偷跑到办公大楼后面的铁路去卧轨，以图自杀了事。

虽然他最终自杀未遂，单位仍按纪律办事，专门为他的不轨之举拟文下发，供有关单位传阅，以便吸取教训。他那位情人又被弄去参加群众大会，接受了几个小时的批评教育。为了增强教育效果，她的丈夫也被迫前来参加会议。

第7章

妇女顶了半边天

“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中国古代谚语

北京第一传染病医院是一座行人望而却步的灰砖建筑物，极不协调地座落在古代的地坛公园遗址上。明、清两朝时期，皇帝们每逢夏至都要来此向地王贡献祭品。太阳从禁欲堂前出现前一小时，皇帝们就得动身，献上黄牛肉、黄酒和丝绸，再九叩其首。现在这家医院里，主要住的是结核病和肝炎病患者，加上医院又远离正常的旅行线路，倘若不是妻子巴巴拉患病的话，我绝无机会到此一游。巴巴拉闹了一场大病，被诊断为杆菌性病疾，病势非常严重，体温高达华氏104度，上吐下泻不止。首都医院是专门诊治外国人的地方，那儿的大夫见状已束手无策，要我立即送巴巴拉前往传染病医院隔离。

我心急火燎地驱车到了传染病医院，才懂得了“隔离”一词的含义。院门是一副绿色的高大钢板，被一只大

锁牢牢拴住。好不容易才叫来门卫，开门放得我们进去。到了准备安置巴巴拉的二楼病房，只见里外都已上锁。我们在门上猛敲了好一阵，一矮个子护士才珊珊而来。她脸上蒙着大口罩，神情羞怯地将我们引入一大房间。房间内设厕所，地板是无铺无垫的混凝土。我们坐在那儿正忧心忡忡，只见另一名护士却拿来一个大苹果，要巴巴拉吃下。我们在亚洲呆了10年，至少已经懂得肠胃犯病首先得饮食清淡，水果是不能吃的，因此，护士的举动不能不令人惶恐不安。而更令人恐惧的是，一会儿又搬来一套静脉输液器，一只陈旧的玻璃瓶吊在上面大张着嘴，嘴塞却悬挂在一边，捆绑这些东西是一团毛茸茸的棉带。紧接着，护士又拿来一瓶闹不清名字的溶液，注入张嘴瓶中，于是就顺着胶管滴入了巴巴拉的静脉。巴巴拉感到极度的疲惫虚弱，无力向她们解释美国人希望的消毒办法。我们其他人来到病房外，看见病人们都穿着蓝白两色相间的条纹睡衣或棕色长袍，正在用劲清嗓，将唾沫口痰不停地吐在下面的院中。大家面面相觑，心想他们一定是患了肺结核。

大夫终于来了。她四十多岁，说话直率大方、样子和蔼可亲、待人温存厚道，显得沉着而自信。一头平展的乌发剪得短浅精细，完全像典型的无产阶级打扮。尽管初见时我对她的医术有过疑虑，但仅用一周，她就使巴巴拉完全恢复了健康。更令巴巴拉惊异的是，全院上下200多名医生护士竟全是妇女。她住院一星期，从没见过男性医护人员。连心急如火般地赶来看望自己这位外国人的院长，也是位女性。

这一女性世界引起了我的莫大兴趣。像在中国旅行的其他外国人那样，我也曾结识过许多名声卓著的中国妇女，她们中有某潜艇制造厂厂长，有身居高位的女律师等。我问大夫，她作为妇女是否感受到歧视？她立刻笑起来，露出两排好看的白牙。

“不，我为啥要受歧视呢？”她介绍说，自己是从北京医学院毕业的。该院是北京的名牌学府，1949年前称北京协和医学院，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于本世纪初创办。她还说自己的丈夫也是大夫，两人收入不相上下。

“我读过一些材料，上面说有些来中国访问的美国妇女团体很感失望，因为她们遇到的中国妇女都说自己一切如意。”她又笑了笑，“难道你也认为我讲的不是实话？”

像王大夫和传染病医院的其他医护人员们，确非精心安排出来供人参观的模范。她们终年辛勤工作、默默无闻，是我在中国耳闻目睹的在妇女尊严大道上大踏步前进的榜样，她们集中体现了自1949年以来中国妇女解放所取得的伟大进步。在中国的历史上，女子是丈夫的附属品，得为丈夫辛勤操劳。《女儿经》说，妻不事夫，则礼崩乐坏。中国人从小到大，都将“女子无才便是德”和“女人应作贤妻良母”之类的格言记得滚瓜烂熟。在家中父母看来，女儿是“外人”，因为她最终得嫁出去，不会给家庭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好处。正如俗话所说，她们是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而一旦嫁到丈夫家，又得忍受公婆的专断蛮横。若是嫁了有钱人家又无力生儿育女，则极有可能被当成偏旁女佣，一辈子丢人现眼。丈夫在世时面临被遗弃噩运，丈夫身亡后仍难得寡妇再醮。

中国人传统上要求女子固守闺房，不得出家门一步，俗语中称妻子为内人。古书《礼记》就说过，男人不谈家中之事，女人不聊屋外之情。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其中的“安”字形为女人居于屋顶之下，意即和睦与安宁。按照这一传统习俗，女人安于家中活计，足不出户就并无收入，足不出户也目不识丁，当然更谈不上继承财产。

中国古人还从宇宙形成的哲学高度进行阐述，赋予这套男尊女卑的思想传统以正统的合法性。他们认为世界由两个相互作用的部分组成，一为阴，代表所有的雌性事物，其特点是阴暗、虚弱和被动；二为阳，代表一切雄性事物，其特点是光明、强壮和主动。直到20世纪，中国女人还实行裹足，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这使女人变得更加低人一等。一般说来，为了获得一对“三寸金莲”，女孩必须从5岁到15岁将双脚紧紧缠起来，弄得脚背上拱、脚趾偏弯。正是付出了这种极大的痛苦代价，女人们才能修得一双小脚，于是获得男人的敏感，激起男人的兴趣，讨得男人的喜欢。即便在今天的大街上，仍偶尔能见到老太太踮着一双粗短的小脚，步履蹒跚地横过马路，尽力躲避着汹涌的自行车流。这一切苦命女人们都该忍受，就如俗话说，要“听天由命”。

当共产党人开始起来闹革命的时候，他们很自然地把妇女视为中国社会最大的被剥夺集团，用毛泽东的话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于是，共产党人迅速实施有利于妇女解放的政策，为革命挖掘这一潜力。他们最初采取的主要办法，是摧毁阻止妇女参加工作的一切社会障碍。自恩格斯开始，马克思主义就一直认为，造成妇女的依附地位的根

本原因，在于她们脱离市场。列宁说过，要保证妇女获得彻底解放并与男子平起平坐，妇女必须参加共同的生产劳动。列宁的这种论述常常为同我谈话的中国妇女所引用。

当今中国妇女用这种理论所获取的胜利远大于她们的美国姐妹。在美国妇女仍积极斗争，以便在美国宪法中加入妇女平等权利修正条款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3条早已庄严地写上：“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诸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此外，中国宪法还规定人人都有工作的权利，这实际上意味着妇女必须参加工作，她们在个人事业与家务劳动之间不再拥有选择自由。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是1950年的《婚姻法》，它十分开明地规定实行婚姻自由，消除纳妾陋习，还明确宣布妇女有权拥有财产、有权使用自己的姓名、有权单方面提请离婚。近年来，还实行合法堕胎，鼓励妇女自由堕胎，并规定，城市妇女拥有至少56天的产假；如果承诺只生一个小孩，产假可放宽到6个月。政府已建立起幼托网点，妇女也可以上大学念书。因此，在中国科研及工程技术人员中，妇女已占三分之一。

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中国仍然是一个男人的世界；中国妇女也许获得了解放，但在一些方面仍未受到平等待遇。我每次乘坐中国民航班机，都见到机上乘客几乎全是男人，唯一的例外是空中小姐们。我曾在中国南方城市广州附近的小城佛山停留，为吃顿午餐找到一幢难以名状的混凝土三层楼房，谓之曰餐馆。只见几百名男性食客正狼吞虎咽地吃着油饼面条、猪肉芥菜，还大口地吞咽着肉汁菜汤。食客们要么是年轻工人，要么是老年农民，前

者身穿紧身汗衫，后者裹着黑色长袍。整个餐馆上下，除了女服务员，不见一位女性食客。我对导游说起这一现象，她回答说：“男人不干家务事。”导游是位面颊红润、年近三十、讨人喜欢的女子。助手汪小姐曾对我说过，她外出坐软卧，常常引起别人疑心。因为软卧间乘客都是男人，谁也不认为一个如此年轻的女人会拥有坐软卧的级别待遇。她听旁人说，男人们大多是公务旅行，用中国人的话说则叫“出公差”。

我注意到，农村的妇女们现在已经下田干活，唯有这样经济上才能赢得独立。这对于年轻的妻子们特别重要，原因是可以向公公、婆婆证明，自己在生儿育女之前是有能力丰衣足食的。在过去，当妻子的能否生儿育女，从而为家族传宗接代，是自己面临的人生重要考验。在那种观念支配下，女人的唯一作用就是为丈夫家繁衍后嗣。而现在，妇女们则通常被分配于最繁杂的活计，如插秧摘豆之类，男人们却在外开拖拉机或当干部。美国社会学家史蒂文·巴特勒曾在华北平原上的河北省呆过，他作过计算，妇女实际上承担着80%的田间劳动。从理论上讲，男女应该同工同酬，但据我对10几个公社的访问调查，男子一个劳动日得10个工分，妇女干同样活计却只获7、8个工分。工分制系中国农村公社核算报酬的办法。农民劳动一天记上一定数值的工分，年终大收后进行结算分配，是将全部社员所挣工分总计起来，去除总产量价值，得出每个工分值；再以个人工分总数乘以工分值，则得该年报酬。有公社干部解释说，男女日劳动所定工分不同，在于两者之间的体力差别。男子体力较强，劳动负荷大，当然所挣

工分多。在工业方面情况也大致如此，妇女多被安排在轻工部门，如纺织、电子及街道工艺品厂等，生产刺绣、漆器、纸盒、玩具和绸花之类。这些活计重复性动作较强，工薪较低，其他待遇也较差。

在教育方面，据教育部所作全国性调查称，小学入学人数中女生占50%，到中学后降为40%，到大学更缩减到30%。据新华社报道，北京市1980年高考录取学生中，女生只占23%。康克清是一位年近九旬的妇女，担任官方妇女组织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她在某次会议上抱怨说，现在中国的文盲中，妇女所占比例高达80%。她还异常坦率地说，毕业后待业的城镇青年中，女子占了60—70%。她指责说，无论工厂招工还是大学招生，对女子的要求都被任意拔高。这是我听说的唯一一次中国领导人承认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

进行这种统计的原因之一，大概是想说明，男尊女卑旧习的存在并没能使男女共同就业成为马克思主义期望的那种解决妇女问题的灵丹妙药。有天晚上，中国朋友小苗谈到我的儿子与她女儿之间的天生差别时，说出一番话来令我不胜惊讶。

她一边吃饭一边说：“男孩爱搞剧烈的体育活动，人也要调皮些。因此，让他们学数学、学理工科会效果好些。女孩最听话，偏爱音乐和舞蹈之类。所以在学校语文学得好，这也是天生的。”

在教育水平低下的农村，这种旧思想更为严重。我的朋友力华回忆说，她那村里的农民压根不让女孩上学，因为父母都觉得女儿是“外人”。送女儿上学实际上是为他

人做嫁妆。一到出嫁，全都给带走了。村民们把女孩叫做“千金”，而男孩则叫“万金”。

北大的某位女生曾送我一一份文件副本，翻开一看，是某调研组于1980年专为全国妇联准备的内部文件，主要论及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婚姻状况。文件披露说，某些陈规陋习依然存在。调查组在山西省一公社发现，5岁以下的订婚女孩竟有146名，占了这个年龄组女孩总数的43%；而在5岁至10岁组中，订婚者比例居然高到81%。调查组还发现，在东南沿海的福建省某小县，父母出卖女儿为童养媳、父母干涉子女婚姻、公婆虐待新娘之事屡有发生，仅1980年头5个月就酿成四起服毒自杀案、四人神经分裂症、两人谋杀未遂案。在该县东方公社，有妇女三人和男子一人由于婚姻问题离家出走，当了和尚尼姑。文件将这些麻烦问题斥为“封建残余”。

文件还透露出一个由现代化促成的新问题，即“弃妻现象日益严重”。这种情况多发生两类男子身上，一是受提拔当上干部和调往城市工作的人，二是初上大学的青年男生。调查组举出了位于西南部贵州省一位大学教师的例子以兹说明问题。这位教师的原配系一农村妇女，当上教员后即同农妇离婚，娶了一位小学教师。然而事过不久，他又恋上本校一名女生。麻烦的是，他的小教妻子已经怀孕，不得已迫其做了两次人工流产。在这种情况下，他既不想与现行配偶离婚，又约上女生去登记结婚，自然是触犯了重婚罪。

调查人员还提出了妇女受折磨的证据。撰写文件的人员认为，“虐待妻子的主要原因是大男子主义和迫使妻子

离婚的欲望。”妇女联合会1979年收到的关于婚姻问题的2128封信件中，有20%计436封涉及到发信人遭受身心摧残的情况。显而易见，发信人是走投无路才向妇联申诉的。文件还列举了一个可怕的例子：华中河南省一个从农村入伍的士兵，入伍前同当地一位农民女子订了婚。后来他脸部大面积严重烧伤，未婚妻仍照样同他完婚。但他在烧伤治愈后，又同另一位女人有了来往，遂迫使妻子离婚。她拒绝了，双方的争吵随之激化。1980年1月3日，他用刀向她发起了进攻，砍下她的双臂，挖掉她的双眼。然后又把眼球踩在脚下。乡亲们听见声音，赶忙前来搭救，但她已奄奄一息。”

中国妇女在争取政治权力方面，与美国妇女相比，或许还逊色几分。中国2000万干部中，妇女达470万，占总数的24%。这一点不容置疑。但是在做出重要决策的执政机构政治局里，二十四名委员中却只有1名妇女。她就是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邓女士本人虽被认为是具有圣洁般感情的人，但当选这个职务也只是在丈夫逝世以后，这说明只是出于对邓女士的尊敬。在主持党的日常工作的权力机构书记处里，11个成员中没有一位妇女。而在美国，有几位妇女在自己的州里当选州长，相形之下，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和行政一把手中却没有一位妇女。陈慕华是一位身材高大强健的妇女，从前学工程的，现已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掌管政府各机构的十多名副部长中，她是唯一的一名妇女。

美国总统和宇宙航行员的妻子们一般要陪伴自己的丈

夫出国旅行或登上讲台，以发挥通常的礼仪作用。而中国领导人的妻子们却不这样，其原因恐怕是囿于妇女避免卷入家外之事的传统。

如果说领导人的夫人们在丈夫名声大震之时能分享荣光的话，那么在丈夫声败名裂之后，也难幸免。前国家元首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深谙世故、表达力强、富有魅力。文革中由于丈夫被宣布为“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又于1966年死于狱中，她在群众大会上被人揪斗，然后又身陷囹圄，长达十年。文革后刘少奇恢复了名誉，她才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得到一份新的工作。

农村的情况也是这样。妇女进入就业市场并未转变成巨大的政治力量。我每次到公社参观访问，都要具体询问当地干部中有多少是妇女。在西北地区甘肃的苦水公社，我得到的答复具有典型意义。在这个公社及其生产大队和小队里，33名干部中，仅有两位妇女。其一是邓梅生（音），系公社副主任，身体高大而灵活，头发短直，鼻梁扁平，酷似美国的印地安人。在一幢农民的干打垒房子里，我同公社干部交谈，她坐在屋角的一条矮凳上。我注意到她的穿着并不像农民，外面是常见的蓝色棉质干部服，里面是棕黄色的羊毛开衫和淡蓝色印花衫，圆领很高。我问她负责什么工作，公社主任替她作了回答说，她负责妇女、青年、计划生育、公共卫生、教育和文化工作。换句话说，就是除了农业生产和经济管理而外的一切工作。而农业生产和经济管理才是对农民至关重要的两件大事。在我所到过的那些公社里，见到的妇女干部几乎总是负责中国人所说的：“妇女工作”，意即计划生育和鼓励妇女下田劳动，

而非西方女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种提高觉悟的活动。

为什么妇女下田劳动的人数增加了，却并未产生共产党人和一些美国妇女团体所期望的效果呢？原因有几个。其一，工分报酬按传统的中国方式，在岁末交给身为一家之长的男人，而并不是分到个人手里，因为这笔收入被看作是全家的收入。其二，妇女婚后必须迁居丈夫家，不可能建立起当选领导职务所必需的关系网。同样重要的是，人们一如既往地希望妇女干家务杂活。这样，她们做干部工作的时间就比男人少。

在家务需求和事业需求发生冲突时，她们得动脑子玩弄戏法，平息冲突。这是一个令人厌烦的双重负担，极其沉重地压在当今妇女的身上，不管是住在城市，还是住在乡村的所有中国妇女都无法躲避。许多美国妇女为参加工作折磨得精疲力竭、心境不安，而中国妇女则别无选择，按法律规定，她们必须工作。当我们去李家吃晚餐时，小苗就得上街采买，下厨房做饭。李是待人有礼的户主，一直陪伴我们，要么为我们斟啤酒，要么往我们碗里盛上刚起锅的热菜。再就是忙着从小厨房里端出热菜。而小苗却跳动在厨房的冷水槽和煤炭炉旁，待她烹调已毕，晚餐也已吃完，这才进来坐下自个儿吃饭。巴巴拉指出说，举行晚宴对一位中国妻子来说尤其艰难，因为任何食品都不能提前烹饪，每样菜都是单独做，还得起锅后立即上桌。像大多数中国人那样，李家也没有冰箱，一星期七天小苗都得上街采买。我们同李、苗夫妇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看上去完全是对愉快的夫妻。但有一次我开车送李一人回家，却听他抱怨说妻子太专注于工作，太劳累，晚上老是喜怒

无常。另一方面，苗也私下表白说，她像《人到中年》里的主人公。《人到中年》是新出的一篇很受欢迎的小说，描写了一位勤劳、艰辛的中年眼科大夫在医院一天的工作，其中描写到几次手术下来，大夫倍感精疲力竭的动人情景。后来，主人公意识到自己忽略了对丈夫和孩子的照顾。

既有孩子又有工作的美国妇女可能对小苗的困窘处境表示同情。但是，在中国生活，就连精力最旺盛的西方妇女也会感到束手无策。因为，中国缺乏她认为理所当然应该拥有的节省劳力的各种设备。中国工人对这些设备十分生疏。以至于我那位《洛杉矶时报》的同事迈克尔·帕克斯搬进寓所时，竟发现派来替他作帮手的电工把美制洗衣机与水槽相连，让水流进去，但他又未把洗衣机后面的软管放进水槽，以便向外排水。帕克斯有礼貌地暗示电工，那样做会使洗衣机无法工作。他却向帕克斯拍胸口说，他为外交人员安装洗衣机都是采用那种办法。一些出得起钱的中国人把衣服送进洗衣店，其余的中国人则在家里把衣服放入水桶里洗，通常都是使用冷水。美国商业电视广告打出的任何洗涤剂都能使衣物“白上加白”，而中国有些厂家的肥皂却无此能耐，会使衣物变灰。

中国目前尚未开发出一种妇女用的卫生杯。中国妇女月经期间一般是用灰色的粗糙手纸折叠起来，弄成一卷凑合使用。如果有钱的话，就买上一些棉布把纸叠包起来。所有这些东西都放入一条带子。带子的一面是用浅红色的橡胶做成，另一面是花布。农村妇女则用洗了一次又一次的碎布片。朋友告诉我，这是因为在农村不可能买到纸或

布。在70年代末期大批游客涌入之前，一位海关官员没收了一位美国妇女携带的一盒卫生杯。这位美国妇女打算在北京长时期逗留。海关官员不相信她对这些东西的用途所作的解释，而且明显地认为它们是新式的走私器具。子宫每月流血一次，正规的汉语是“月经”，而口头术语则是“倒霉”。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

既当工人又当妻子的双重负担对一个怀抱婴孩的母亲来说，尤其沉重。虽然中国每年出生的婴孩比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多，却没有一次性使用的尿布，只有些旧布片。这些旧布片必须用手洗，然后挂在小公寓里晾干。一个时期中国工业没有生产听装婴儿食品，甚至连孕妇穿的服装也没有。

当然，中国仍是个发展中国家，在物质享受方面指望它达到美国、日本或是西欧的同等水平，那也不切实际。毛泽东曾告诉法国作家安德鲁·马尔罗说，“解放妇女不是生产缝纫机。”主席用他那种隐晦莫测的方法暗示，把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真正途径在于提供集体性质的社会服务，诸如日托中心、公社食堂。尽管中国人向外国访问者展示自己的托儿所，但1980年中国入托的婴幼儿人数只有28%，而上幼儿园的人数比例还略低一些。绝大多数作母亲的，虽然有工作，仍得自己照料自己。相比较而言，1980年在美国，进入某种类型的日托中心，托儿所、幼儿园的3岁、4岁、5岁的孩子人数已达53%。

我的中国助手说，对中国家庭来说，最常见的解决办法则是把祖母接到家来，一直住到小孩达到入学年龄。他

已把自己的母亲从家乡福建接来。福建在北京的南边，其距离与迈阿密到纽约相等，坐火车要用4天时间。一些父母由于住房太小，不能住下接来的亲戚，便把小孩寄养在农村的祖父母家里。我所认识的外交部某位妇女就是这样。但是，她那4岁的女儿在农村呆了一年后，却拒绝叫她“妈妈”。而那些出得起钱的人，如高级干部、一些军官和收入可观的技术员则聘请保姆。

持家以及就业，这一切都使中国妇女付出了代价。

“女人的日子要比男人过得艰难，”北京大学一名精明的女教员说。她本人已婚。“你注意到了吗？”她问我，“怎么中国妇女要比男人老得快？30岁刚出头，看起来就像40岁的样子，发了体，长了双下巴，脸上皱纹满布。当丈夫的却要苗条些，模样更年轻。”她35岁，早已留意起自己的饮食，并正使自己腰身和臀部减肥。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中国，妇女必须工作的准则在受过教育的妇女心中产生出一种很强的反妇女解放的逆反心理。同样是这部分受过良好教育和家庭富裕的妇女，在美国却是最积极的女权主义者。对她们来说，事业就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美国人正在反对被迫充当家庭主妇，而中国妇女却不乐意被迫去当挣面包的主力。干事业，一旦它成为一种必须，就可能从一种实现自我价值和独立能力的手段转变成令人乏味的机械行动。

北京大学的这位教员埋怨说，她真正想做的事情是呆在家里，养育自己的儿女。儿女们住在政府办的幼儿园里，从星期一早晨开始，要到星期六父母下班后才来接回家。父母同孩子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唯有星期日。

“如果让我选择，”她说，“我就会把时间用来教养儿子，确保他能进入最好的学校。”令人惊奇的是，她对女儿的教育却关心较少。“必须干事业的是我们的儿子，”这位教员作的这番解释反映出传统观念依然如故。

妇女在离婚方面经常遇到的困难比其他一切都更能说明中国妇女早已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状况，即挣脱一些旧的枷锁，却并未彻底地平等。就理论而言，离婚在中国不应是难事。《婚姻法》经过1980年的修正已变得特别进步。该法规定：“在相互感情彻底破裂，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应准予离婚。”文字简洁明了。但实际上我见到的许多中国妇女，对离婚问题的埋怨比对其他一切都要厉害。

有位妇女，她是一家电池厂工人，身段苗条，性情活泼，小眼睛，短辫子。她回忆说，她和当工人的丈夫结婚仅几个月，就开始因钱的问题发生口角。她花钱购买衣物，而他则把钱用在香烟和酒上。她说，没多长时间，他变得凶恶起来。于是她搬回工厂宿舍她原先的斗室里。分居三年后，特别是丈夫又寻上新欢后，她感到申请离婚满有希望。但当她前去工厂党委时，他们告诉她要按正规手续办事，得先调查调查再说。6个月后，她询问结果。别人对她说，她的申请早已转交保卫科。最后，也就是一年以后，她得到通知：申请被否决了。

“党委书记说，我们最好还是重归于好。”这是在北京饭店旁边的一个小餐馆里吃饭时这位女工告诉我的，“他不愿说出我遭到拒绝的原因，但我个人认为这是个面子问题。领导人很封建。他们想让外人觉得人人都婚姻幸福，认为离婚仍然是不道德的。”

随后，女工还引述一句俗话说：“好马不受两鞍，好妻不嫁二夫。”

我很纳闷，为什么她不直接向法院提出申请呢？

“如果本单位不同意，那就毫无希望，”她解释说，“在调查案子之前，法院总是要来询问本单位。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嘛。”

中国人对待离婚问题究竟多大程度上会慎重行事？我利用一次难得的机会，在上海参加了一桩离婚案审判，才得到了答案。这桩案子内容大概类似一本中国古典小说。原告系妻子，她指控说，与丈夫“矛盾”的起因是他对自己的母亲太孝顺。她圆脸、一副执拗模样，年龄35岁，在一家气象仪器厂当工人。她作证说，丈夫坚持要让他母亲和祖父母同他们住在一起。而后来她生下第一个小孩时，姻亲们很不高兴。因为生下的是女孩，不是男孩。

“他们思想很封建，”在权且充作审判室的居委会主任魏回忆说。这座房屋是古老的中式结构，拥有斜形屋脊，屋里黄色的高墙上唯一的装饰是领袖的彩色像。

“我出院后回到家里，婆婆按老风俗把一个小男孩抱在怀里，意思是说下一次她想要孙儿。”

“一看见她那模样，我心里很不高兴。丈夫的婆婆已80岁。她对我说，‘花已经有了，下次就该结果子。’”

据她说，后来她又同婆婆发生争吵，起因是婆婆怪她鸡蛋吃得太多；丈夫一家全都认为她是在浪费钱财。她不愿冒险生出第二个女儿，未征求家庭意见，便作了堕胎手术。这样，事情就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最后，她带着女儿搬到自己的一个小房间，但这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

所有的购粮证都由丈夫掌管着。

当她讲述自己的经历时，现已5岁的女儿正在拥挤的房间里四处走动，看上去对家庭的悲剧毫不以为然。但母亲讲完证词时，她突然走过来，将一顶系着红带子的草编太阳帽戴在母亲头上，接着又爬上母亲的膝盖。

分居的丈夫现年39岁，个子高而纤细，表情严肃，在一个机械出口部门当干部。他讲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宣称：妻子出院时，他的侄儿碰巧在家里玩，母亲把他侄儿抱在手上，以便让他看看新生的婴儿。他认为，矛盾的原因是妻子对他母亲毫不尊重；她经常大发脾气，弄坏许多家俱。一天，她在街上遇见丈夫，竟撕破他的衣服。她去丈夫的办公室达140多次，埋怨他的行为，使他极为难堪。

“由于她那种泼妇性格，不可能和陆相处，”丈夫证实说，“但在女儿的问题上，我感到心里很矛盾，不想离婚。”

我的中国导游是个天真可爱的女子，头发微微发灰，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工作。她会意地看着我，并低声说，大多数男人反对离婚，所以现在多数离婚案都是女人起诉，这说明她们有所进步。过去，男人可以抛弃自己的妻子，而妇女实际上却没有权利要求离婚。不过，我的导游暗示说，她已知法庭将要作出什么样的裁决。组成法庭的是一位男性法官和两个所谓的陪审，一个是男方单位的，另一位则是女方单位的。

“我们的责任是教育人民，而不是打击人民，”法官开始说，“你们俩应耐心点。我们的国家需要安定团

结，家庭也需要安定团结嘛。”这是关于社会和睦的孔夫子式的说教。然后，法官劝告女方，说她应该撤回她的离婚起诉。他还暗示，离婚将造成经济上的浪费。一对夫妻占用两套住房，两套购粮证，会使一个拥挤的城市难以承受。

两位陪审员的发言使法官的意见又增加了社会压力的份量，这种压力在中国总是很强的。“我看为了这么点事情，没必要离婚，”来自男方办公室的一位中年男性工人插话说，“这只是老婆婆封建残余思想的问题。”

他又转向女方说：“你应该告诉婆婆，今天我们的社会里有女飞行员，就像男人一样。女孩子因此并不比男孩子差。你和你丈夫都应该多做她的思想工作，对她进行再教育。”孔夫子思想又冒了出来，这是一种人民天生的听人劝思想，它已渗入到共产党人的具体工作中。

女方工厂来的是位女工，宽宽的圆脸，穿着束腰外衣。她也对原告进行责备。“你应该知道，离婚并不会会有好结果，不仅要考虑你自己的幸福，还得为孩子想想。我看，作妻子的应该对老一辈多多尊敬才是。否则在将来，如果小孩不尊敬你，你又作何想呢？”

这绝不是姐妹间的团结问题，但其压力之重，令女方承受不起。因此她同意和解。当她离开法庭时，还说这是他们第六次上这儿来。

然而，中国新闻媒介经常报道说，离婚率正在日益增长，这与正经历现代化的其它国家所发生的情况一样。一些文章对这一势头表示欢呼，称它是妇女解放的标志；另一些文章则声讨它堕落到了资产阶级的放荡不羁地步。为

妇女联合会准备的那份关于婚姻状况的秘密调查报告指责说，“在资产阶级恋爱婚姻观的影响下，伦理道德观念正在逐渐淡漠。有些年轻妇女认为，妇女解放就是性自由。”

“有些年轻人把结婚视为儿戏，草草结婚又轻率离婚。他们选择配偶只看家庭背景，看工作好坏，看长相如何。结果性情不合，又急急地吵着要求离婚。”

调查报告说，在华中的武汉，最近一年内的离婚案有110件，其中5件系结婚后不足六个月者，60%不足三年。调查人员说，北京甚至有这么一个案子：一对男女上午登记结婚，下午上街买家具，发生争吵，稍后又回到政府办事处设法取消他们的婚姻关系。

我见过的一位妇女，相貌平常，在一所学校教书，她成功地离了婚。她感到同丈夫达不到性的满足。她说，离婚实际上是她丈夫的主意，而现在她却视离婚为一场灾难。

“我的朋友和学校的人们把我当成奇怪的动物来对待。”她伤心地说，“在学校，他们背后议论我，当着面，他们又假装不知道我离了婚。就像我干了一桩什么邪恶的事情。”

她变得情绪低落。头天，她会兴致勃勃地打电话给我，却仅仅是为了打一声招呼。第二天，她又会脾气很坏地责备我没有经常邀请她到家来。我害怕接她的电话，因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要是我佯称工作太忙，不能谈话，又感到十分内疚。

她处境尴尬。她与前夫在同一所学校任教，相互碰面的时候极多。两人都未能办理调动，也未分家。最后，他

搬了出去，睡在教室里。

从该校另一位教师那里，我了解到女教师对风言风语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位教师没意识到我和她是朋友，有天谈到离婚一事，恰似在谈学校里的丑闻一般。她说女教师“穿着时髦，喜欢唱歌跳舞。”这是在有礼貌的谈话中说的，其意指某人淫逸放荡。

虽然女教师生活中遇到了这么多麻烦，有一次我问她是否认为中国妇女已经获得了平等，她却看着我，就像我在说傻话一般。“那还用说，解放以来，已为妇女做了许多工作。”她的答复具有典型意义。在美国，困扰女权主义者的问题是平等报酬、晋升晋级、从政无门和性别歧视等，这些在大多数中国妇女看来似乎值不得关心。

一天，汪小姐生气地走进办公室，说她看见她所住单位的告示栏内贴出通知，说公共浴室夏季开放时间改为妇女一星期三小时，男人九小时。还说她当时用一支很粗的红笔在上面潦草地写下了一句挖苦话：“这究竟是那家的男女平等？”翌日晨，有人反驳：“这是科学安排。”还有人写道：“这就是平等。”汪小姐未能带动起大楼里其他妇女起来抗议，虽然如她指出的那样，她们在数量上与男人相等。

最初，这种缺乏女性意识的情况使我困惑不解。但是北京大学那位希望呆在家里教育儿女的女教师帮我解开了这个谜。她说，在她的学校，如果男女双方都在同一个系教书，又同时面临升工资的话，那么是男方先升。她和她丈夫的情况亦是如此。

“你也许会说这不公平。这确实不公平，但无关紧要。只要我们两人中有一个能升工资，究竟谁升都没有关系。”

她又继续解释，因为“在中国，我们的所做所为还是以家庭制度为基础。一切东西仍要归于家庭。对我来说，重要的是看见孩子们得到适当的照料，看见他们取得进步。”她并不把妇女看成是一个单一的部类。

另一位妇女，苗条而雅致，是出生在中国的美籍华人建筑师。她的一席话道出了这一问题的症结。“部分原因是中国妇女真正取得了进步，”她说，“但必须记住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中国妇女不可能主动地对女权问题发生兴趣。她们只能顾及对自己有重要的事情，诸如争取搞到一套带厕所的体面住房，购买杂货，考虑工作时谁来照顾孩子等等。她们还未投身到工作或事业上去。能在家里同其他成员呆在一起，她们就感到心满意足。”

只是在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帮助我意识到，中国的男子和妇女还未全面考虑西方女权主义者提出的论点。随行的庞大记者代表团中，有一位女电视摄影师，个子矮而结实，易冲动又爱寻衅。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她猛然从记者群中穿出，又跨越美国联邦经济情报局警卫人员的警戒线，以靠近邓小平和卡特总统。后来，在白宫举行的一次国宴上，她又连推带挤地走过联邦经济情报局划定的界线。但她第三次这样做的时候，一位特工人员在她肩上狠狠地打了一巴掌，把她推回记者线内。这位特工人员个子高大，肥胖，肌肉发达，蓄着小胡子，身穿黄色的三件套西服。

这位小姐被激怒了。她泪水汪汪地向身为领导的中央电视台官员诉说委屈。因此，官员便要求美国政府作出正式道歉。

“这事发生在男人身上倒还没什么，但她是位妇女，”那位中国官员对美国外交人员严肃地说，“这是缺乏礼貌的表现。”于是，众人都十分担心这一插曲可能损害邓小平的访问。

联邦经济情报局特工人员听到她的不满后，却回答说，“在中国你们可以那样想，但是在美国，不管男女，现在一视同仁。我的职责就是保护总统。”

后来在旅行中，这位小姐变得从容起来。在一位美国译员的指教下，她特地为那位特工人员唱了一首《开始认识你》。而特工人员则弯腰亲吻她的前额。

第 8 章

啊，两亿青少年

“青年人必须接受考验。”

——摘自毛泽东1965年文革之初同安德鲁·马尔罗的谈话

“书别读得太多，读多了害人。”

——摘自1965年毛泽东同侄女王海容的谈话

老三个子瘦高，梳在脑后的头发光滑平整，模样英俊匀称。如同出生于干部家庭的许多孩子，他也颇为自信、善于交际。朋友还说他是个乐天派。别人都穿着满是皱纹的蓝色服装，他却另有一番打扮。下装总是裁剪精细、熨烫平展。我最后一次看见老三的那天晚上，他身穿一套深灰色毛涤西装，在当时的北京不免显得穷奢极侈，胆大妄为，矫揉造作。老三约27岁，系一家英文杂志记

者，那晚被派参加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在北京饭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会上，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颁布了援助中国拯救大熊猫的计划。他当时的行为毫无离奇之处：坐在野生动物基金会主席彼德·斯科特爵士身旁，作着笔记。招待会结束后，一辆机关小车送他回家。他妻子长得苗条漂亮，加上一个一周岁半的儿子，三人共同住在一处单间公寓里。

在和煦的春风中，两名公安局的便衣警察守候在外，准备逮捕他。当晚，警察对他家进行搜查，发现五部被盗的磁带录音机和一架打字机。而这些只不过是他近几年来在办公室里所盗赃物的一部分。经查明，老三以前在学校的十多年时间里，一直就是一个青少年偷窃团伙的头目。

他的经历经整理编排，使我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他第一次偷窃被抓时，才十来岁。当时，他父亲系杂志社的一位官员。父亲的职位，使他的区区小罪受到遮掩，使他能够加入共产党，然后又被“群众推荐”，以所谓的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大学。那时正值文革期间，中国废除了正规的入学考试，代之以候选人的政治背景为依据的推荐入学，认为入学考试制度歧视工农。在大学里，老三再次因盗窃受到指控。他公开作了自我批评。父亲的朋友又绞尽脑汁把他的污点从档案中一笔勾销。这是不无风险的把戏。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杂志社工作，从此，办公室的物品开始不翼而飞。第一次，是一位同志的几本《全国地理》杂志，当时外文杂志属禁运品，很珍贵。第二次是一台打字机。然后是一部英汉词典（书店无此书出售）。办

公室有一辆公用自行车，供校对人员去印刷厂使用。但多数人都是中年妇女，懒懒散散，只想打毛线和采购杂货，自行车放在那里无人问津。老三发现后，问这车是否能让它保管，骑着上班用。钥匙交给他不久，他便报告说车链被偷。办公室无可奈何，只得拿钱给他再买一条安上。没过几天，他又宣称车胎被人取走。

然而，老三的作案把柄却未被人抓住，而且，政府的政策是设法“改造”那些犯有错误的党员，比如他。所以没有对他加以逮捕。此外，他还颇有用处。单位经常在自己的礼堂放映“内部”片子。虽然不张贴广告，隔壁的青年人仍不可避免地会嗅出动静。如不让他们进来，则要猛冲大门。领导幸而发现只有老三才能控制局势。只要他走到前门说一声：“哼，难道不认识我吧？”那伙年轻人立即肃然起敬。“哦，原来是你，老三。”

一次，他破门进入一位同事的住房，没料到却倒了大霉。那位同事的男友刚从日本归来，为她带回一部高档立体声收录机。他把收录机装进提包，走到办公室才发现大厅过道里正在开会。人人都注意到他肩上的大包。上午工间休息时，天气仍很冷，他把提包放在取暖器上，同一位朋友在办公桌上打乒乓球。那知失主偶然回家，发现窗户被人打坏，屋内一团糟。干部们瞬间即怀疑是老三干的。趁他玩得正尽兴的当儿，往他的包里窥视。然而，该不该在现场逮捕他，干部们举棋不定，唯恐他有同谋。

他被拘留不久，我请助手去采访他妻子。她头发烫过，享有时髦人物的美名。最后一次行窃的那天，她身穿人造豹皮大衣，在一家集体性质的咖啡馆引起轰动。

“我是个非常爱面子的人，”她告诉我的助手，“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感到无脸见人。”她注意到水池里泡有脏衣服，小炉灶上面杯盘狼藉，还有一盆垃圾放在地上。

“是社会迫使他干的，”妻子埋怨说。据她说，他父亲一直是负责干部，经常带领代表团出国。他母亲也是党员。但在文革中，他父母双双受到批斗，被关进监狱。

“反对他父母的大字报就贴在他家前门外。从此，他的幻想破灭了，”她叹息说，“一些人说文革期间老干部受了害，实际上整个年轻一代都受到影响。”

他妻子还痛斥了过去30年的历次运动，鞭挞了政治路线上的一些变化。

“一天，我们的老大哥苏联成了修正主义敌人。然后一夜之间，我们忠实可靠的同盟者阿尔巴尼亚又犯了错误，而且总是犯错误。还有唇齿相依的邻邦越南，是它向我们发动了攻击。我们应该相信什么呢？”

“50年代，课堂上讲授道德。这是种新型的共产主义道德，具有很明显的正确与错误的区别界线。现在，正确与错误的划分完全是靠路线区别。谁掌权，谁就对。因此，人们只顾自己获得好处。”

无论对她的指责赞成与否，在我看来，老三确属文革的受害者，即外国人称为“垮掉的一代”中的一个。人们历来把青年视为新社会的开创者。正是年轻人促使了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这一运动重新燃起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精神，导致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毛泽东参加党的第一次会议时，也只有28岁。但文革却使中国的青

年一代变成一个社会和经济的问题，而且尤其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国人口的65%属于30岁以下青少年，即6.5亿人。10多岁的少年超过两亿，约为美国人口的总和。

要对美国青年作出一般性概括是不可能的，同样，对中国青年作出概括也办不到。某部长的儿子，才华横溢，获得哈佛大学奖学金，和一伙吸大麻的朋友同住一个宿舍。在人情世故与生活方式方面，他与北京工厂的青工相比，真有天差地别。至于四川的青年农民则更不待言。四川气候炎热，青年农民学着祖先的样子跟在水牛后面，耕田犁地。而在此以前，他们也许只读过五年小学。

但是，在我居住北京的1979年至1981年的三年期间，青年人们的心情状态主要是玩世不恭、冷漠淡然。北京大学的一位27岁毕业生向我讲述了一个故事，算是我在中国听到的第一个政治玩笑。

“你知不知道有个故事？说的是一位儿子问他的父亲，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模样？”他问我。然后又自问自答地说：

“哦，儿子‘父亲解释说，共产主义就像地平线。你越靠近它，它就退得越远。’”

我在北京的第一个冬天，报纸义愤填膺地报道了一则消息。一个小男孩滑冰时坠入北京的一个湖泊。三位士兵意欲救他，而一群年轻人却站立一旁大声嘲笑：“当兵的，快跑啊，你们想入党嘛。”据说他们就这样高呼，其含义十分明显，是在挖苦挺身而出的积极分子。

我在南方港口城市厦门住旅馆，透过窗口好奇地目睹街对面一个小少年，将一辆草绿色卡车车胎里的气放掉。

每次蹲下放气时，他都要小心谨慎地四处瞧瞧，看看是否被人盯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后面的墙上有一条红笔写成的标语，赞扬中国青年学习模范战士雷锋的先进事迹。雷锋于1962年在一次寻常的车祸中丧生，很久以来一直被树立成公而忘私的典范。那天早些时候，我还在当地一所学校里听到孩子们背诵一首关于雷锋的小调。其大意如下：

“冬天，雷锋不顾寒冷修理汽车。雷锋步行一千里，做下好事一万件。他为党为人民而工作，他一颗红心永不变。”

然而，人们对雷锋事迹的赞不绝口早已淡然，那男孩把军车车胎里的气给放掉即是证明。年轻人现在的玩世不恭与诚挚的理想主义和革命热情形成鲜明对照。一切有关上山下乡的影片都展现出一种童子军似的热情：天真烂漫，面色红润的城市小青年，如中国新闻媒介所乐于报道的那样，“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农村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其中有些也许是欺人之谈。但是作为一个阅读官方宣传、倾听游客讲述多年的外国人来说，看见这些上山下乡的青年，也不由得为之一震。

她可能一直就是个宣传的样板。生得一副漂亮而和蔼的圆脸，高高的颧骨、快活的微笑和面颊上永不消失的粉红颜色。乌黑发亮的头发左右两边和后面都剪得很短，刘海遮住双眼。她30岁，是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很小，”她一边吃锅贴，一边

告诉我。锅贴是一种夹有白菜和猪肉馅的烤面团子。“我和学校的同学们是北京首批当上红卫兵的，我们都深深地敬仰毛主席。《毛主席语录》不仅往前背，还是往后背，我都能全部背诵。我们花很多时间朝着老师高呼口号。”

她特别记得冬季的一天，气温已到零度以下，她和她那个红卫兵小分队戴上红袖章，把中学的三位教师抓起来跪在外面地上。这三位教师没穿大衣，也未戴手套。“我们到他们家进行调查、抄家，发现一套英文书籍。也许仅仅是些课本，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他们崇洋媚外，充当洋人奴隶的证据。我们点起大火，把发现的東西统统烧光了。”

她回忆说，那以后，身为小分队队长的是个具有迷人外貌的18岁高个男孩，他的绰号叫“老狗”。他命令大家鞭打教师。还拿出一些木板，要学生们在教师背上猛抽。“我们不停地抽，直到一位教师吐出鲜血来，”她说，“这时，老狗才叫我们住手。我们对自己感到非常自豪。这似乎很革命。”

姑娘继续说，两年以后，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她是首批自愿报名者之一。

“人们把我送上开往东北的火车。车上还有2400名其他中学的学生。我们不停地旅行了4天，不知远去何方。后来，在靠近苏联边境的一个国营农场，他们才让我们下了车。当时，我洋溢着爱国主义思想，希望保卫祖国。”

“然后，人们把我们送进干打垒宿舍，全是泥土墙壁，泥土地。”她又说，“一间房屋里，60个人睡在两张

炕上。炕是用泥土、草和牲畜粪堆成的。夜间，如果回来晚了，就能看见一条狭窄的通道旁边，60个脑袋伸在被盖外面。”

姑娘说，她擦洗身子的唯一用具就是一个很小的搪瓷盆。在农场所呆的整个八年期间，她从未洗过一次澡。

但最糟糕的问题莫过于枯燥乏味。离得最近的城镇也得走3小时。要看电影的话，就得上那儿去。在农场的头五年，她只去看过三部影片，而这三部都是她从前在北京看过的。没有图书杂志出售，她的许多朋友们也没随身携带点来。

“不过，早上五点起床后就下田干活。晚上的时候累得要命，根本不想看书。因此，一些年轻人把怎样读书写字都忘了。”

然而，姑娘挺幸运。其父是干部，最终通过后门，把她调回了北京。

“我花了8年时间煽起革命火焰，那是蹉跎岁月。现在我想为祖国作出贡献，但我拥有什么呢？我连中学也没毕业。就像我朋友说的那样，那时中国人民不是在生活，只是在生存。”

被送往农村的城市青年有1800万，几乎每10个城市居民中便有1个，姑娘是其中之一。上海的下乡青年高达100多万，北京62万，这是历史上声势最为浩大的一次人口迁徙。当时的目标有三个：缩小城市与乡村差别、复兴新一代日益衰退的革命精神和缓解城市人口过多的压力。但这些主观上定得很高的目标对青年人本身并不发挥作用。他们所看到的乡村生活是艰难枯燥和无精打彩的，他

们的革命热情由此受到了冷却。

小伙子姓宋，是个结实的大力士，也是嗜烟如命的人。他说，最初叫他去担粪便，然后用手施在田里时，他感到十分恶心。粪便是村庄周围公共厕所里蓄存的。宋是南方人，家住广州，被送到海南岛。当时，这里是边远落后地区，被丛林覆盖，居住着少数民族。

他说，然而更糟的是，他挣的钱根本不足以养活自己。当地男性农民习惯于艰苦劳动，一天赚10个工分，妇女挣8个。但他最多能挣6到7个工分。“因此，我们总是挨饿，饿极了就到田里偷东西，找甜薯、菜根或野草。总之找到什么吃什么。”

“领导说，我们应该向农民学习，但农民根本不愿同我们打交道。他们的土话我们听不懂。还说我们懒惰，骂我们不干活光吃他们的粮食。”

他又说，“男孩们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找不到女朋友，因为农民都想找一个好工人，能挣很多钱。有一次，三位朋友把头剃得精光。干部们很生气，问是何原因。“我们不妨作作和尚，”他们回答。

最后，他和一些朋友伪造旅行文件，择路到了广州。在那里，他非法居住了六个月。没有户口，没有粮票。他参加了一个由一群与他类似的青年组成的地下集团。其中一些人在市场、电影院四周晃荡扒窃。有几位女孩则当上了妓女。一遇机会，他便在公园里练习游泳。试过两次以后，他游泳3小时，渡过海湾，逃到了香港。然而许多难民游渡海湾不是被淹死，就是被鲨鱼吃掉。到1980年，设法逃到香港的非法难民人数达到一个晚间500人之多。

我同小伙子谈话的地方便是这块英国殖民地。他仍在阅读国内报纸，而且注意到1976年以后，政府基本上放弃了上山下乡计划。虽然1800万上山下乡的青年中，还有500万呆在乡下，但其余的人们则合法或非法地返回了家乡，这又增加了对城市的压力。他仍旧喜欢背诵毛主席语录。他想知道我是否也清楚地记得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谈话：

“怎样判断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呢？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他是否愿意真正地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

有时，看起来似乎人们是在故意颠倒理想主义的价值观念，创造自己的反主流文化。我注意到，人们相互称“师傅”，这是对熟练的手工艺人或专家的传统称呼，以此取代了时髦称呼“同志”。在金鱼胡同，有一家既作饭店又是酒吧的和平咖啡馆，这是我碰见过妓女的地方。其中一个嫖客个儿很高，20多岁，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气；他上身穿一件西式夹克，大翻领，高臂膀；下身着一条灰色的上瘦下肥的裤子，即中国人所称的“喇叭裤”。他的头发往上梳得很高，又抹了油。

“我像中国人吗？”他自豪地问。“能这样穿着的中国人不多，但我能。”我对他说，他像一个香港华人，这时，他微笑起来。

“我当孩子的时候，非常调皮捣蛋，”他继续说，其谈吐与风度都很拙劣。“你知道我喜欢干什么吗？打架斗殴。每天我都要用拳头打架。根本不是一人对一人，而是一伙人对另一伙人，一次20人。我是头霸王。”他竖起

大拇指比划，意指他是最棒的。他还指着自己的鼻梁。看起来就像是已被打破过十多次。

“在学校，我是学俄文的。但我什么也没学，只能写一个字母R。汉字我也学得不多。我确实是个很差劲的学生。”

他要走了。他说同女人有点事。我急于想从他那里知道更多的情况，便请他留下地址。他不知如何是好。开初我还以为他对一个外国人访问他家感到神经紧张。殊不知，另一位朋友解释说，“他确实写不好。”他潦草地写下地址，其书法之糟，足以同我所写的奇形怪状的汉字媲美。

中国青年不像俄国青年那样，对摇滚乐曲或爵士音乐毫无兴趣，也许是这两种音乐韵味太重和尖声刺耳的缘故。我在北京逗留期间，青少年们无不狂热追求软绵绵的、寄托悲哀情思的港台爱情歌曲。其中多数歌曲都是由夏威夷占它和电子琴伴奏。在西方人听来，这些歌曲都老掉了牙，犹如《安德鲁斯姐妹》40年代的中文版本。但对中国人来说，这些歌曲却很新颖，在感情上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因为多年来，他们能听到的仅仅是些由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的打击乐曲。70年代末期，中国人开始出国旅行和海外华人归来探亲访友，带入大量盒式磁带。随之，港台乐曲迅速风靡各大城市。我发现能赠送给中国青年朋友的最宝贵礼物之一，就是几盒香港磁带；每次我旅行归来，北京饭店的年轻服务员总要迎上来，看看我究竟带回哪些新磁带。

一位大名鼎鼎的中国记者咧嘴苦笑着告诉我，官方的

中国音乐家协会于1980年春发起了一次竞赛活动，以挑选15首最流行歌曲。哪知此事竟使该协会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这样的竞赛活动是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协会收到的信函达100多万件。问题是，来信以压倒多数一致赞成邓丽君和李谷一两人。邓丽君是位富有魅力、温文尔雅的台湾女歌手，从未到过大陆。而李谷一则是位有争论的次高音女歌手，她模仿的是台湾流行歌曲的唱法。她同丈夫离了婚，然后嫁给别人。这使共产党领导集团为之一震。正当中国音乐家协会煞费苦心寻找对比赛结果的处理办法之时，中国新闻媒介向资产阶级颓废歌曲发起了谴责。天津一家报纸声称，邓丽君的歌曲“痛苦伤感，应该坚决予以抵制。她的歌曲只能损害我们的身心健康，消磨我们的革命意志。”最后，音乐家协会决定自己列表，排出15首优秀歌曲。这些歌曲都被政府称之为“战歌”，其中有《再见吧！妈妈》，描写一位士兵出发参加1979年中越边境之战的心情，以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是一首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歌曲。

然而，就在官方的结果公布几星期后，文艺家联盟举行盛大晚会，庆祝联盟成立50周年。该联盟解放前夕在上海成立。歌唱演员中包括李谷一。她表演完毕，观众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这在中国极不寻常。但是，记者后来说，她未出来再唱一首，原因是部队合唱团早已跟随上台。这时，与会者中达半数的人们退场。这次晚会由电视作了实况转播，麦克风里还传出高呼声：“如果李谷一不再唱一首，我们就回家去。”局面之所以令人难堪的另一原因是，与会者中有党的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此人多年来

一直是共产党内主管文化的重要人物。

盒式录音机不仅促进了香港音乐热的传播，而且燃起了一种新的对跳舞的强烈爱好。文革前，星期六晚上，一些党的首脑人物常在北京饭店举行庄严的舞会；但从1966年到1979年的十多年时间里，跳舞被视为颓废的资产阶级娱乐方式而遭到禁止。所以，有天晚上发生的一件事情使我和巴巴拉都感到措手不及。当时，我们在朋友李苗夫妇家晚餐。餐后，他们把桌子折叠起来靠在一个角落里，然后打开一台新的日本录音机。这台录音机是香港的一位亲戚赠送的。第一首歌曲由唐娜·萨默演唱。苗和李两人拍起手来，要求巴巴拉和我为他们表演迪斯科。我们两都不善长跳舞，但别无选择，我们只得跳。很快，我们发现在这间狭小的卧室里，大家都跳了起来，我们的舞伴中不仅有李苗一家，还有几位隔壁邻居和亲戚。他们对时髦洋人的到来，总是很快就了如指掌。不知什么原因，李苗一家学跳迪斯科，模仿得尽管很像，却不够灵活。他们仍未忘记文革前学会的狐步舞、华尔兹和探戈舞。

“中国人生活枯燥，太枯燥！”小苗说，“难怪年轻人要惹事生非。”这句话我常常听到人们说。

另一位朋友有20多岁，在北京电视台工作。一天晚上，他打电话来说，他有人民大会堂的舞会票。真是难以置信。我总是把人民大会堂看作是圣灵所在，在我心中，它那大理石台阶擦得闪闪发亮，会议厅庄严肃穆，手持刺刀枪的士兵，呈立正姿势守卫门前。周恩来晚年宴请理查德·尼克松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但在1980年政府前所未有地强调利润以刺激经济发展之时，为了与这一政策保持一

致，党开始将大会堂的一些会议厅出租，以获取商业上的好处。那晚的舞会早在6点半就开始了，地点是三楼上一个宽敞的会议室，内有巨大的房柱和绿色的大理石地砖。两支乐队演奏集成曲，都是获得了批准的曲子，包括几首西方歌曲：《红河谷》、《美好的往日》和电影《音乐之声》插曲《多、莱、咪》。看来西方音乐也成了中国音乐的一部分。灯光一直亮着，要想亲热一下是不可能的。不过，这并不能使跳舞者感到为难。他们是来跳舞的，不是来手挽手地在黑暗中拥抱的。有男人同男人跳，女人同女人跳的，甚至也有位母亲和自己的小女儿试跳新步子的。好几次，有人在广播里警告：“禁止跳摇滚舞。”不过，许多对男女却扭摆到一块高大的土漆屏风后面。这些违禁的舞客们都戴着太阳镜，上面仍贴有价目和香港制造的标签。这种玩意儿很神奇，能保证他们新颖入时。一位妇女随着节奏摇摆，一头齐腰的散发未像平常那样系着辫子，她在中国人里算是高个，身穿着毛皮大衣和红色的紧身毛衣，外加一条喇叭裤，把臀部绷得紧紧的。

“一位高干的女儿，”朋友指着她说，“只有干部家的孩子才能从小吃到牛奶和肉。”

一到9时半，就有人宣布舞会结束。客人们立即俯首帖耳地鱼贯而出，没人想耽误一会。美国人在这种情况下保准会迟迟不肯离去，指望再跳一场。然而在这里，我一边和主人谈话，一边面对天安门步下雄伟的台阶。

“表面上我们也许唯命是从，”这朋友回答说，“我们习惯于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正如乔治·奥维尔所著的一本书所描写的那样。”他还说最近他读过此书。“这本书

对文革描写得很真实。我喜欢这本书。但是文革中发生的有些事情，奥维尔却未预见到，那就是许多人理想的破灭。”我所遇见的中国青年中，多数人持有这一观点。

他本人在一个公社呆了三年，干种稻谷的活。这以后，身为干部的父亲通过后门关系，他被农民“推荐”上了大学。“根本不是什么农民推选，而是公社党委书记。”我的朋友回忆说，“推选一个人，主要看他的政治背景。其实，我父亲也是穷苦农民出身，早年投奔了红军。祖父祖母都被国民党杀害了。所以我的成份非常好。”这种推荐法也是人们未曾料到的。

毕业以后，父亲再次施加影响，使他分配到了电视台，得到一份既体面又轻松的工作。但连这位想来是很走运的青年现在仍然不满足。因为，那些在1970年至1976年“推荐”制度生效期间进入大学的中国人统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他们必须通过考试才能进入大学。其中多数人在被推选之前，只受过几年初小教育。所以他们在大学期间，各个教室都是乱哄哄的，一团糟。他念大学的时候，从没有参加任何考试。因而1976年以后几次全国性调工资都没有他们的份，把他们单独划归成一类，不属正规的工资等级。他的工资每月只有43元，低于工厂工人每月58元的平均工资。

“我们并不都是傻瓜。那些日子里，我们什么也没学到，这不是我们的过错。”他痛苦地说。

从某种角度上说，工农兵学员是文革最确实的成效。几乎有100多万人分布在全国各地。有的在科学院所属的研究室，有的还自愿奔赴遥远的西藏。

*现在人们处处都在歧视我们，把我们看作是文革的产物，差一点就同四人帮一道被人打翻在地。”

尽管工农兵学员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他们的情况却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另一批人数更多的年轻人。我到达中国以后，他们才逐渐显露出来。中国人称他们为“待业青年”，即“等待工作者”之意。这是失业的委婉说法。五十年代，共产党的伟大的成就之一，是在这个贫穷而人口拥挤的国家，使人人都有了一份工作。无疑，大多数中国人从此便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终身的保障。这一劳动就业制度由劳动部门专门管理。它们的职责是在各工厂、学校、街道的招工中进行协调工作。学生毕业后，没必要自己去寻找工作，而是等待劳动部门分配。到1979年，政府才突然发现失业问题相当严重。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几年来堆积起来的，其根源在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安定团结局面恢复以后，婴儿出生率迅猛上升，但它却一直被上山下乡计划所掩盖。这个计划把大批的城市青年推向了农村。后来成百上千万的不满青年如潮水般地涌回家园，一些是合法的，一些则是未经允许的。1979年新年伊始，领导人方才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当时，返回上海与家人共度节日的青年迟迟不肯离去，对继续让他们呆在农村表示抗议。在该城的西方人报道说，上万的上山下乡青年抢劫商店，堵塞火车站，抢占列车，还在上海滩一带的市委办公大楼门前列队行进。据估计，每年有400万中国学生毕业进入各大城市的就业市场，使得就业问题愈发不可收拾。政府官员披露说，有一至二千万年轻人在各大城市“等待工作”。对于一个拥有10亿人口的国家来说，这

听起来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但就整个人数来说，它的含义是什么呢？一篇文章对此作了回答。文章称城市青年的70.4%有工作。反之，从该文中也可看出还有29.6%没有工作。这一失业率几乎同美国黑人青年的失业率一样高。

由于在国营工厂这一令人垂涎的经济部门里，政府未能迅速地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所以鼓励青年到集体和私人企业里工作。过去曾将私营和集体企业蔑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但实际上，一些企业证明是颇有成效的。我访问过一群待业青年创办的一家小型旅馆，内有110张床位，设在首都的地下人防工事里。另外还访问了一家只有3张餐桌的餐馆，它设在一家人的住房里。然而，这种类型的企业并不能解决大规模的失业问题。

秋高气爽的11月里，有一天我遇见一位21岁的女子。她得到一个新的、但似乎是免为其难的工作，在紫禁城附近一个小型的自行车停车场当服务员。当时正值北京地区一年中的最佳季节，树上的柿子已经成熟，那桔红色的树叶在空中蓬开，遮掩着皇室旧宅内树木的灰黑色枝干。蔚蓝色的高空，整天万里无云。她说，她两年前从中学毕业，但只是在上个月才第一次分到看守自行车的工作。她梳着两条短辫，睁着两只圆眼说：“这总比呆在家啥事不干好。”她妹妹上年7月高中毕业，现仍没分到工作。到明年春末，小弟弟又该毕业了。她的工资只有24元，比一个工厂工人平均工资的一半还少，而且还享受不到中国一般的经济待遇，如奖金、免费医疗、住宅、以及退休金等。

“我们这些年轻人，没出路。”她说的这句口头禅，我不知听过多少遍。姑娘微笑着补充说。中国人遇到严酷的命运总是这样微笑，但她的话却是清楚道出了自己的命运。五十年代系共产党刚取得胜利不久，乐观主义的波涛席卷全国，人们希望国家从此改变贫穷与落后的面貌。但现在，悲观主义情绪又重新出现了。这种情绪一方面是对坐失良机的抱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度里贫穷问题难以驾驭。

不久前，我遇见一位瘦高个青年，戴着一副有角质边的眼镜，正在兜售被称为《火炬》的报纸。该报有四版，每日公布当时正在进行的全国运动会的比赛结果。他把报纸装在一个挂包里，挂在脖子上。别的报童都在大声叫喊头条新闻，以便招徕顾客，他却不一样。

“我不想骗人，”他解释说，“让他们自个儿掏钱来买，那真是太糟糕，因为报纸里空洞无物，我才不愿怂恿他们来买呢。”

他说，几天前居委会才分给他这份工作，运动会一完，工作也就完了。然后，他又得等待另一次分配。突然，他把手中的报纸塞进挂包里，拔腿便跑。“警察！”他低声说。

“你卖报纸不合法吗？”我提高声音问他，心想这份工作居委会一定是经警察批准的。

“不在这地方，”他大声回答，其意模棱两可。随后就跑得不见了人影。

他是否违反了法律，我无从得知。但我在北京逗留期间，确实听说青年的犯罪已成为中国的一个严重问题。中

国人喜欢自夸彻底消除了犯罪。这是一种老生常谈。然而，东北工业重镇长春的一家广播电台报告的一事件，听上去就像电影《混乱的黑板堆》里的一幕。广播指控说，一位教师由于惩罚一名同学而冒犯了两个“流氓学生”。他们冲进教师的房间，用木棍和石头凶狠地打他。

“当那位教师跑向二楼的教师办公室时，”广播继续说，其中一个学生“从后面抓住教师，并用自制小手枪向他射击，一颗钉子击中了他的后背。”

广州一家报纸曾报道说，一个21岁的农村青年在广东全省进行了一次为时13天的偷盗汽车的冒险活动。在这次活动中，他共盗窃自行车两辆、轿车两辆、卡车四辆，还打死打伤两名骑自行车者。经过精心寻找，他发现当地一家卷烟厂的卡车车门未锁，于是将自己所骑的自行车放在车厢里，起动汽车。该报说，“因他只学过拖拉机驾驶，卡车像野马一样奔跑。不出两百米远，就撞坏一辆马车，一排竹栅栏和一家自行车修理店。”为了逃避追捕，他急忙穿过广州机场，游过珠江，最后在偷一个剧团的服装时被抓获。该剧团当时正在一个公园里演出。报纸不满地说，他的父亲从小就对他管教不严。

类似抢车和枪击教师的那些人，被中国人称为“流氓”。这一古老的词语原意指流浪汉，但早已被移用来指行凶的年轻无赖。我认识的许多中国人都表示说，他们担心在街上遇到流氓。这就如同纽约人害怕在地铁里遭到行凶抢劫一般。一天傍晚，我邀请一位中国教师去工人俱乐部观看演出。该俱乐部距离市中心很远。到达剧场时，她那种惶恐不安的心态显而易见，因为怕惹人疑心，她独自一人骑

车而来。演出看了一半，她便小声说想在人群涌出之前早早离开。我不明白究竟什么事使她为难。直到第二天，她才在电话上作了解释。

“那地方很糟糕，”她说，“你不应该叫我去那儿。街道又黑，流氓又多。谁知道会出什么事？”

如何辨别流氓呢？“他们留着长发和胡须，在街上大肆抽烟。有时，他们在餐馆里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又倒在地上。真是太可耻了，文革前很少有这种事。”她的话听起来像是一位美国母亲在描述五十年代末期的嬉皮士。

像北京的其他记者和外交人员一样，我也感到纳闷：究竟是青少年犯罪确实增加了呢？还是由于中国新闻媒介更加公开，由于1976年以后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接触更加自由，以至于我们对正在出现的事情有了更多的了解呢？两种解释也许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中国官员坚持说增长是巨大的。人民法院发言人说，1980年的青少年犯罪事件比六十年代初期高出10倍。这一比例几乎和美国相同。根据联邦调查局公布的材料，1980年被捕的人当中，25周岁以下的美国青少年占57%。香港的一家左翼杂志《东乡》报导说，1978年上海的一个区里，注册的小偷和窃贼共计1042人，其中87%是青年。遵照一项新的国家政策，该地区后来建起一所工读学校，对青少年罪犯进行“再教育”。开校的第一年已接纳104名学生。

一些年轻人走上邪路使老一辈中国人困惑不解。我多次听到党的干部说，他们弄不明白，为啥年轻人不对新中国感恩戴德。不过，他们却忘记了绝大多数人是在1949年以后出生的，而且对旧社会的苦难日子究竟是什么滋味

有切肤之感。生活状况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改善发生在五十年代：食品供应更加公平和有保障，新的就业保险、教育和医疗的效益大大提高。所有这一切变化令人难以忘怀。然而，现在的年轻人却把这些令人难以忘怀的业绩看成是理所当然。而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的成就则相形见绌。30岁以下的青年人生活中发生的主要事件则是文化大革命。

为年轻人的生活态度感到迷惑不解的人们错误地认为那是恶魔所致。所谓“恶魔”，按他们的意思即是资本主义。报纸在一篇社论中谴责说：“少数青年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暂时繁荣所蒙蔽，他们看见资本主义国家繁荣和技术上先进，看见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落后，便得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的结论。这是一个使他们误入歧途的观点，是一个大错而特错的观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究竟是什么使青年人不安？一位工作认真而勤劳的中学教师主动作了一番解释。她的解释更加微妙却没有什么新内容。“目前的情况是，政府提出要向西方学习。意思是学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法制。”

“但当青年人发现模仿西方很时髦的时候，他们所模仿的却全是些表面上的东西。如像戴太阳镜、蓄长发、穿喇叭裤及在中学谈情说爱等等。”

她说这话时，我和她、她那位搞科研的丈夫、以及16岁的女儿一块儿在北京西北郊明十三陵野餐。我们坐在草地上，周围都是松树林，前面一个三道拱的大门。这时，只听一英里外的广播里播出女歌唱家的节目，歌声飘过广阔而绿色如茵的山谷传向耳际。唱歌的是最为流行的歌星李谷一。

“说起都不好意思，总之，现在的学生不如文革前的。”那位教师继续说，她的下装是男式，用方格花纹衣料做成。她谈吐从容而激烈，具有正义感。我发现中国人大多具有正义感。

“当然，好的学生还是有，但多数学生都没有勤奋学习的习惯。更糟的是，不管对他们讲什么，他们都不信。一切事情他们都要同你辩论。在党的路线发生变化以后，他们把一切都看穿了。”她使用年轻人自己的口头话来说，“看透了。”

她女儿玲玲只有十多岁，“我都快17了，”她为自己辩护，然后又说，“从小我就得学习。我们受文革冲击的时候，我才3岁。父母都遭到批判，给押走了。他们说我的母亲是国民党特务。待她回到家来的时候，头发全都变白了。”

玲玲身段苗条，椭圆形脸蛋很美，却是一副难为情的样子。她说她长粉刺，所以戴上了口罩。我们相见的第一天，她身穿一件很普通的蓝色工作服，但上衣第一颗纽扣却未扣上，这是一种勇敢的表现。工作服里边是青绿色紧身T恤衫，脖子上的围巾也是青绿色的。蓝色粗纹棉布下装，臀部处裁剪得很紧。这是中式牛仔褲。为了与全身服装相配，她脚上还穿了双开口鞋，鞋跟有两英寸高，这在中国算是很高的了。从鞋上可以看出她还穿着黑色图案的长统袜。这些全是他父亲从中国的时髦中心上海买来的。当我赞扬说她的穿戴在中国已算好得出奇时，她愉快地笑起来。

“很多人喜欢肥大的裤子，真是丑得要命，不过他们

“怕别人瞧。”

玲玲曾想把紧身裤穿到学校去。哪知班主任教师站在教室门口，手拿尺子，丈量学生们的裤子，看其臀部是否过小，裤脚是否太窄。她回忆说，还有一次，她正在学校里午睡，一下子听见了广播里播出了通知。

“播的是新规定，学生不得戴外国太阳镜，男生不得蓄长发，女生不能烫头和用化妆品，还有就是不准收听香港爱情歌曲。”

“在学校该穿什么，我当然得小心谨慎。但在家里，我想怎么穿就怎么穿。中国生活就像演一场大戏，我们都是演员。”她顿了顿又说，“不过，我才不愿多想这些事呢。要生活，就得有一定的理想嘛。”

玲玲尽管有这种愤世嫉俗的思想，却仍不失为一位聪明而勤奋的青年。她决心取得好成绩，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大学入学考试于1977年恢复。从这点上看，她像其他许多中国青年那样，虽然他们的理想破灭了，然而，一旦给予争取进步的机会，仍能发奋学习和工作。改革招生制度对北京来说，在于向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希望，以使他们在中国社会那些倍受限制、思想保守的领域内取得进展。有一次，玲玲翻出她学校的笔记本，我看见封面背页写着作息时间表：每天5点30分起床，锻炼半小时，早饭15分钟，上课前预习1小时。一天的每一刻时间都作了安排，直到夜间10点熄灯。

玲玲的母亲通过关系使她进入了一所较好的中学，然而从她们的住处到学校要乘一个多小时的汽车，经过申请和批准，母女俩得以在晚间住进教师办公室。这样，玲玲

就不会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往返交通上。晚上，母亲教她汉语。汉语是她母亲的专业。还请来别的教师为她补习数学。玲玲的父亲则一星期都独自呆在家里，自己做饭。

“我才不在乎个人生活呢，”我们野餐时当父亲的说，“我们只希望玲玲能够通过考试，将来能出国学习。”进入大学，最终留洋深造的梦想是青年人的最深刻动机。使他们免于坠入冷漠淡然的心境。而国家干部、工厂工人和低能青年则早已陷入这种境地。

甚至在文革期间大学关闭的时候，中国那种传统的学习热情也未冷却。在华中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有位物理研究人员，瘦高个子，三十刚出头，他回忆了1968年学校关门以后，被分配到中国边远地区一个小火车站当电工的情景。

“没有什么活可干，”他回忆说，手指摸着自己的一撮胡须。“也许一天只干两个或两个半小时。火车也不多，都因两派武斗中断了运行。”

然而一次去省城的路途上，他发现了1947年版的 not 大英百科全书。此书放在铁路局的书架上，积满尘土。是一位老雇员遗留下来的，但无人知道此书究竟是什么。他提出要购买此书。

“起初他们说不卖，然后又说可以借给我。”

他的女朋友是列车乘务员，所服务的列车要经过他那孤独的小站。在她的帮助下，陈平开始读书。每次她都为他带一卷来，直到他读完全书24卷。按当时的情形，他早该招惹来政治麻烦。不过，他的同事们却很宽容。

“他们只是问，为什么不每天在你读的东西中选一个

故事讲给我们听听？”

文革后，陈回到大学当教师，他早就掌握了英语。而且还与他那位列车乘务员结了婚。

孔丘时代就已存在的尊重教育的思想，使毛泽东对学校制度的改革成为中国最有争论的问题之一。如像六十年代某些美国教育家那样，人们也认为学校的贵族思想严重，入学门槛太高；学校当局歧视学习条件差的人家（如农民）的子女。因此命令简化了学校课程，鼓励学生批评教师。而且，为了使教育实践化，还号召学习与田间和工厂劳动相结合。

然而1976年以来，大多数中国人都一致认为文革的实验已经以降低教育水准而告终。报纸在一篇引起轰动的报告中说，中国现有一亿四千万文盲，其中一亿两千万在45岁以下。一篇文章中说，中国儿童中有95%确实上了小学，如政府历来所宣布的那样。然而，“实际上，仅有60%念完五年小学。据说，只有30%达到五年小学的水平。”问题的根源是，农村学校教育质量太差，政府提供的办学经费严重短缺，以及许多农民中存在有陈旧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儿童到地里干活比上学更有用。结果，中国学校教育就如同许多美国学校一样，造就了一批功能文盲。

在中国，教育仍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因为它与入党、部队提干并列，是谋取优越社会地位的三大途径之一。生存竞争始于小学。共产党人已经迅速地扩大了小学的数量，现今入学人数是2亿1千万。但念完小学的人数中，12%不能升入初中，而念完初中的学生中，则有50%因校舍缺乏不能进入高中。在这金字塔之巔，仅3%的大

学适龄男女，即约100万名学生能上大学。相比较，在美国，18岁至21岁之间的人口中，35%能上大学。在苏联是23%，甚至在总人口达4000万的菲律宾，已有127万名大学生，超过中国大学生的总数。《光明日报》抱怨说，在全世界141个国家中，若按受过高中教育的青年所占同龄人比例由高到低排列，中国的位置是第113位。

这一数字令人惊愕，由此也可看出中国人对办教育的重视程度。其主要原因是钱的问题。北京没有公布过教育开支的确切数据，但一些粗略的计算是可以作出的。1980年用于教育、文化、卫生和科学的全国预算为148亿元（98.7亿美元），即人均10美元，其中一半以上花在科研上。实际总数可能会略高一些，因为北京要求各村庄自筹资金办学，不列入地方开支范围。但报纸在另一篇文章中披露说，在“四人帮”倒台后的七十年代末，政府对教育的投资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2%，这使得中国在联合国教育开支名单上排列到第110位，位于如下国家之后：占2.7%的索马里；占1.7%的危地马拉和占1.2%的孟加拉。美国将国民生产总值的6.4%投资于教育，苏联是7.6%。中国朋友认为，北京如此小气的比例，根源是毛泽东对专家学者的蔑视，以及共产党人未能懂得科技在当今世界上的作用。毛把知识分子嘲笑为“臭老九”，排在地主、资本家及诸如此类的坏分子之后。而且他的观点成了全国性政策。报纸于1980年载文说：“很久以来，一些人把教育看成是消费性项目，与生产无关。他们发展生产时，只想到建工厂，购买机器，修建排灌系统。对培训人员的问题，则很少考虑，甚至干脆不考虑。”

对于那些上大学的少数幸运儿来说，获得的好处是巨大的。他们有保障得到中国最体面的工作，如当科学家、工程师、中国旅行社译员等等。而另一些年轻人则不一样，他们仅念完初中或高中，得等待一两年才能被分配到街道合作社，至多是一个工厂。“入学是一张终身饭票，”上海复旦大学一位和蔼可亲的教师说，他曾在美国接受教育。“你得知道在我们这个制度下，学生一迈进学校的大门，基本上就没有退学的。教师们根本不会让学生不及格。让学生退学的作法有悖于职务终身制的想法。”

1976年以来，已经成功地改革全国高等院校入学考试制度，学生考试六门科目，计12.5个小时，持续3天。1989年，上预选线后参加高考的330万中学生中，仅有28.5万人录取进大学。大部分是17岁、18岁或19岁三个年龄的高中生，少数人为20多岁。他们不是因文革而中断学业，就是因前几次高考未及格。美国人对高考的苦辣味十分谙熟，倍感竞争紧张、准备匆忙、担惊受怕。然而中国的考试使人更加紧张。汉语“考试”一词使人感到非常庄重，令人想起旧时的科举制度。在那一制度下，曾苦读儒家经典多年的众多考生被锁在方格小间里，一呆就是几天。成功者能在朝中谋得一百半职。考试之于中国人，好似宗教礼仪，令僧人道士顶礼膜拜，使黎民百姓趋之若鹜。

每次高考，都要选出一批教师拟定考题。他们被禁闭在秘密的山间别墅为时两个月，直到7月考试为止。他们不得打电话、写信、发电报，以免作弊。不仅孩子要准备考试，父母也要卷入其中。一个10多岁的熟人告诉我，考试前一个月，父母不让他请朋友到家来玩，还不让他干家

务活。整整有那么一年，他除了做好通常的家庭作业而外，每天还得学习6小时，研究以往的考题。考试通过后，他父亲大摆宴席，耗资达几个月的薪水之和。为了庆祝这一时刻，他买来一本影集，辅导教师在上面写道：“从此你将一帆风顺，前途无量。”

要求成功的压力非常之大。每年夏天，中国新闻媒介均要报道几桩高考失败学生的自杀案。许多名落孙山的学生不甘于自己的失败，翌年再试身手。教育部曾安排我到北京第35中学参观访问，据说该校被定为试点学校。我采访了刚结束三天考试的14名学生。我问他们如果考试不及格，以后干什么。他们都说要痛整1年，明年再考。

我认识在北京一家工厂当车工的某年轻妇女，她因文革中断了初中学业。她回忆自己自学考试的情形时说，已应考两次。我问，为什么当工人她不满意？

“建国初期，很多人十分乐意当工人，”她回答，抬起她那浓黑的眼睫毛。“收入很可观，福利有保障，而且还能有一个好成份，”意即政治上很安全。“但是现在人们想当知识分子。科学家的声望高。这也许是工人的国家，但工人的地位太差。”

正规考试制度恢复的结果导致了精英阶层的公开产生。在美国亦如此，生活水准较高，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出生的那些孩子，有上大学的优越条件。北京大学1979年2000名入校生中，39%出生于干部和军人家庭。然而这两组人在全国总人口中仅占2.2%。新生中，知识分子的后代占11%，而知识分子在总人口中约占2.5%。

政府还恢复了1966年以前的“重点学校”制度。在这

种制度下，政府能将有限的资金集中于那些具有最大智能潜力的个人，以便用最快速度，最有效的方式向经济输送人才。东南沿海的福州第一中学校便是一所倍受优待的学校。校长高个儿，腰身挺直，前额很宽，待人有礼。他说，去年夏天，他校高中班学生37%上大学。而文革前，该校所获得最令人惊讶的记录，是将90%的毕业生送入大学。看得出来，他对自己的工作很感自豪。文革期间，他挨过一些学生的殴打，并被撵到一家工厂劳动。作为重点学校，福州一中向每个学生发放市政府提供的额外津贴。只有经过考试才能入校，这点和上大学一样。

我走过该校那天天花板很高，刷得很白的走廊时，为它那与美国中学迥然不同之处惊叹不已。中国人总是埋怨青少年难以管教。然而，福州第一中学的学生看来却严肃认真，遵守纪律，积极好学，如同我的青年朋友玲玲。这些小青年清楚自己有机会接受这个制度的欢迎，也盼望从中获取好处。所以，过道上没人奔跑，课堂上无人讲话，教师进教室，学生则起立。教师阅读课文时，学生把手放在背后，然后齐声背诵。死记硬背仍是一种主要的教学方法，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学校没有豪华的派头，既无视听设备，也无学生私车，更无吸毒现象。在这样的学校里，我祖父肯定倍感舒适惬意。本世纪初，祖父执教于纽约州北部地区一个只有单间教室的乡村学校。

中国的学校制度是用来灌输专门技术的，而不是教育学生如何思考问题，如何开发自己的创造力，这两点恰好是美国文科教育的目标。福州第一中学的课程设置，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主要由北京决定。选修课很少，没有音

乐和美术欣赏课，没有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课程。这些课程被看成是极端琐屑无聊和政治敏感性太强。中国历史课程的内容也受到很严重的限制。甚至在大学攻读历史的学生所接触的教材也只讲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截止。关于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到1949年这段历史，仅有一种权威教科书。至于1949年以后这段历史的课本则没有。由于政治运动连续不断，党的路线变化无常，如何正确地描述历史，人们感到束手无策。文革前的国家元首刘少奇被打成走资派，身陷囹圄，死后才得以平反昭雪，其原因何在？这些问题如不进行极端审慎的检查，则有破坏整个国家结构的威胁。大中学生都接受政治教育。政治是大学入学考试六个科目之一（六个科目中，汉语、数学和外文是必考科目。报考理科的学生要考物理和化学两门，报考文科的则考历史和地理两门）。但政治课程并不涉及那些敏感问题，学生们说，其内容包括党的现行路线，全是些条条款款，枯燥乏味。1980年政治考试有一道大题，在试卷100分总分中占了20分，即“为什么我们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在一道填空题中，学生们被问道：“资本主义危机不可避免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北京一家工厂的车工告诉我，正确答案是财产私有制。政治考试对她来说毫不困难，因为所有的问题和答案都在复习提纲上罗列着。早在几个月前她就从就读的那所夜校买来这份复习提纲。

教育部承认，为了保证一致性，它采取的另一措施是将学生的政治态度与所获得的考分综合加以考虑，然后定出录取人选。

“这意思是说，要想更顺利地上大学，就得加入中国青年团，”玲玲说。中国青年团是效仿苏联共青团的模式，为党培养党员的组织。“老师和母亲坚持要我参加。他们说，如果申请入学，两位学生的分数一致，那么团员就会得到优先考虑。”

“因此，母亲替我写了一份申请书。我不知道该写些什么。母亲写的文章很绝，里面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

“接着，宣誓的日子到了。很走运的是那天我生了病。我还不知能不能板着面孔朗读誓词哩。”

全班学生中仅有20%至30%是团员，玲玲计算说。这与建国初期相比下降，当时的团员人数一般都要超过50%。团员的主要活动是星期六下午留在学校（大多数人星期六一般只上半天学），不是进行额外的政治学习，就是做义务劳动，如种树或在校园里挖地。

“当团员进行劳动的时候，其余的学生则笑着对我们说，“再见啦，我们要回家去。”玲玲最后说。

这种情绪使我们难以揣摸当今的中国青年。共产党是建立在理想主义和勇于自我牺牲精神基础之上的。党对自己事业的坚信不移使老一代人能在革命时期，以至60年代忍受艰难困苦和严格的政治控制。然而在文革，某种东西突然坍塌了。要统治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公众的信任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过去，公众的信任来自想象中的天国命令。它是一种传统准则，为中国皇帝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今天，中国如要达到建成现代化工业强国的

目标，需要的是有生产技能的工人和有创造性的科学家，而不需要半文盲的不满分子和失意的愤世嫉俗者。当我看到连第一流的高等院校也存在着理想破灭的问题时，不禁为之一震。因为第一流的高等院校是学生们容易从这个制度那里捞到好处的地方。在上海的复旦大学，一群新闻专业的学生决定做一次民意测验，调查同事们究竟相信什么。一天下午，他们走到图书馆，将门锁起来，把调查表大胆地散发起来。其中仅有三分之一的人回答相信马克思主义，几乎四分之一的人回答说命运，少数人说基督教，有25%的人回答：“一切都不信。”这次调查情况是该校一个毕业生告诉我的。

在北京大学，看到新生上政治课的情景，我深切地感到异化现象极其严重。在教室前面的讲台上，站着一位神情紧张不安的女教师。她在解释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五条基本原理。尔后，她审视了一行学生名单，叫其中一位来重复那些基本原理。哪知该生却不在场。

女教师又点出另一学生的名字，依然无人应声。这次，那间宽敞而明亮的教室里爆发出一阵令人难堪的格格笑声。这也许是有美国人在座的缘故吧。

最后，点到第六个姓名，女教师才找到一位确实坐在座的学生。“行吗？”她问。

“不知道，”学生回答。

一方面，女教师未能激发起学生们回答共产党视为十分神圣的论题；另一方面，又有那么多学生不上必修课。这两件事使我意识到人们目前面临的难题：中国已成为一个存在权威危机的集权国家。

第9章

听话，乖孩子……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人生的最后旅途我们不愿走下去，更谈不上对它抱有任何希望。然而中国人却截然相反，那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天伦之年，也是他们人生智慧的结晶岁月。”……

——乔治·凯兹《发福的岁月》

这里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屋子，地板是光秃秃的混凝土，十个一岁多的幼儿互相挨着挤在一起，背靠墙壁坐在一条很小的木凳上。好一会儿，他们都一动不动地坐着，没有哭叫，也无人推拉。

然后，一位留着椒盐色短发的中年女保育员从盒子里掏出一个上发条的玩具小鸡，转动发条，放在地上让金属小鸡大摇大摆地走动起来，沿着孩子们的脚边走过。哪知仍没有一个婴儿移动或是试着去抓玩具。要是我的两个孩

子在这儿，一定会伸手去抓。但这里的孩子却只用双眼注视小鸡。

一个男孩身穿红色夹克，下着绿色棉裤，头发一簇一簇的呈直立状。他终于忍不住了，蹒跚走来，伸手猛抓小鸡。那位身罩白色卫生服的保育员一见此景，便轻轻将小孩抱起，又放回其他小孩坐着的长凳上。

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我正对这所托儿所兼幼儿园进行参观访问。这里是四层楼的灰砖建筑，由北京印染厂为厂里工人的270名儿童开办。但这里的情景与我在中国10多个城市的托儿所、幼儿园的所见所闻大同小异。像许多到中国来的美国访问者一样，我深为中国儿童普遍具有的良好行为惊叹不已。一些西方人将其解释为被动性。中国儿童安静听话，老师说啥就干啥，很少表现出美国儿童所具有的那种爱吵爱嚷，好惹事生非和自私自利的性格。他们既不大哭小叫，也不要脾气，还不吸吮大拇指。而这些忧虑与紧张的典型表现，在西方儿童中屡见不鲜。

在印染厂托儿所，保育员们早已开始教一周岁的幼儿大小便。房间的一角排着一溜白色的搪瓷痰盂。该幼儿园领导说，“幼儿午睡一醒，就把他们放在便盆上。待他们解完大便后再起来。他们如要小便，也会自个儿去解。”

我真不敢相信所听说的介绍。很显然，这种事情我们的女儿萨拉是绝对做不到的。恰在这时，一个年仅14个月的小女孩，穿着印有工厂名字的绿色围裙，蹒跚地离开公用条凳，拿起痰盂坐了下去，十分顺利地完成了她的任务。所有中国儿童的裤后都开了裆，她也不例外，这样可使任务完成得更容易些。

待那位小女孩回到条凳坐下时，几位保育员早已给孩子们喂起午饭来。饭是炒鸡蛋和稀粥。保育员们都坐在条凳前面的矮凳上，每人手里拿着金属杯子和调羹，共三套，一个小孩用一套。也就是说，一个保育员负责给三个小孩喂饭。依次轮流，先给一个小孩喂一调羹饭，然后又给另一个小孩喂。我越看越入迷，竟没有一个小孩吵嚷或是抢先争吃。他们正在学习过集体生活。

一位在北京居住的美国妇女把儿子送到当地一家接收外国儿童的幼儿园。她垂头丧气地听说，她儿子是班上唯一的调皮捣蛋家伙。

这位美国妇女还回忆说，“老师说有来访者的时候，我儿子不但拒绝停止玩玩具，拒绝像其他儿童那样回到座位上去，反而躺在地上，玩得更带劲。看他那样，老师很着急，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中国人诱导孩子循规蹈矩的情形，仍是一个难解的谜，令人好奇不已。西方人自来认为，咄咄逼人和不服管教是孩子的天性。我发现其中的差别在于中国父母总是绞尽脑汁去创造一种同子女的特殊亲密感。而此种亲密感在美国人看来，是在窒息孩子的天性。另外，为了让孩子遵守纪律和自我控制，中国父母们还小心谨慎地限制孩子们那坐立不定的天性。而我们却将这种天性视为独立活动和自我表现的能力。

婴儿出生后，许多中国母亲仍要把他们裹在襁褓之中，双脚双手都被毛毯或棉布捆住，以免胡乱动弹。劳拉·钱德勒是位棕黄色头发的美国人，执教于安徽省省会合肥。她在当地一家医院生下一个女婴后，发现护士们将婴

儿的小手用绳子系在身体的两旁，她们担心如不这样，孩子就会把自己弄醒。一位家住山东的中国人说，她家乡的农民还在按旧风俗办事，将新生婴儿放进一个袋子里，袋子长度齐婴儿的颈部，他们不使用尿布，而是在袋里装上砂，其功用犹如猫窝里的杂草。中国父母带婴儿外出行走，通常是用双手把婴儿抱在怀里，或者系在背上，而不把婴儿放在小车里，在后面推着走。因此，中国儿童总是透过父母的眼睛来观察周围的世界。西方婴儿则不一样，他们对周围环境有自个儿的视界。

中国儿童与父母同住一个房间，甚至还同睡一张床，这一过程长达三、四年。中国朋友看到萨拉独自一人睡在房间里，而且整夜都不惊不醒，莫不惊叹万分。

我们的朋友小苗问：“她怎么能自个儿入睡呢？园园小时候总是在我们床上睡。每个晚上她总要醒五、六次，不是尿尿，就是要吃东西。因此我必须同她在一块儿。”产生这种生活习惯的原因，部分在于住房狭窄和人口拥挤，狭窄和拥挤却产生出一种美国儿童得不到的亲密感。

李苗夫妇一家有次来晚餐，我家的情形惊得他们目瞪口呆。当时，巴巴拉在做饭，我们就让萨拉自个儿在地上玩耍。她正在学走路，咬紧牙关蹒跚地爬呀走呀。

小苗责备说：“不应当把小孩放在地上玩耍。”她把萨拉抱起来，放在自己的膝上，又说：“她会着凉，会弄脏衣服。”这再次部分地证明中国住宅的经济状况，即缺乏室内空调设备，混凝土地上又未铺地毯。没有它们，要保持清洁，不受北京尘土的侵害，绝非易事。

不过，我看得出来，要是别的什么人告诫巴巴拉如何

喂养孩子的话，她一定会怒发冲冠，大动肝火。这次虽不至于，仍不免心情不快。待她结束烹调，已是八点钟。她没有马上摆桌开饭，而是先把萨拉放到床上。然而，萨拉的房间离餐桌至多不过3米之遥，她能听到人们的谈话声，还扶着童床的栏杆站起来，对人们把她抛在一边用呀呀作语表示不满。小苗的脸色当时看起来很不自然。她匆匆咬了几口烤鸡，便不顾巴巴拉的阻止，冲进萨拉的房间去安慰她。巴巴拉于是说，哭叫对孩子没坏处，如果有人不停地抱她起来，她会睡不着的。

小苗则解释说：“孩子哭，我也会哭，而且哭得更厉害。我得到她那儿去。”

那天晚些时候，我驱车送李苗夫妇回家归来听巴巴拉说，园园曾同我们4岁的儿子埃桑在卧室里冲进冲出，还一边大喊大叫，一边抛甩枕头。可李苗夫妇谁也没有申斥过园园，更没惩罚她。这也是中国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亲密感吧。中国人珍爱和睦。而和睦是儒家之道的美德之一。我还注意到，中国人不愿说严厉的话，也不愿意实施体罚。

有一次，我与我的中国助手讨论中国人抚养孩子的方法问题。他说，“打孩子没用，他们还不懂事儿。如果我的孩子调皮，我会想法子教育他。比如说，桌上有个热水瓶，孩子若要爬上去拿，就有可能烫伤自己，或是把水瓶打坏。因此最好是我先拿走水瓶。如果他硬要，我就告诉他，隔壁的小孩都不会这样。”助手一脸的自信认为儿子当然会按他所教去做。这种信念来自中国人对教育的信任。

最初我对这番话还颇怀疑，可是后来在中国呆的时间长了，便愈发意识到，在热爱孩子这一方面，任何国家不能与中国相媲美。汉语“好”一词是个象形文字，左边一女，右边一子。尤其明显的是，自从埃桑和萨拉来北京与我共同生活以后，我在北京饭店餐厅里得到的反应与从前截然不同。一年来，为了获得服务，我一直在同男女服务员们进行斗争。可现在，他们突然毫不迟疑地向我们的餐桌奔来。人人都想同埃桑谈话，想拧一下萨拉的脸蛋。他们说，“那么白，那么胖。”这句话在英文里可说是一句侮辱人的话，但对中国人来说，却是最高的赞美，意即：这孩子身体健康，营养良好。

那天，我们全家首次从香港飞往北京时，埃桑坚持要亲自尝尝中国民航班机的滋味。这是一架苏制伊尔喷气式客机。不久埃桑就到后舱的厕所去，把自己锁在了里面。后来我见所有的旅客都从座位上抬头往后看，才意识到出了事。厕所里传来一阵被隔离层减弱了的哭喊声，像是喊“弗克斯爸爸。”这是埃桑在叫我。原来他把里面很沉重的门闩转动过，外面就开不了门。哪知，坐在我们旁边的一位脸上有雀斑的工程师比我还先从座位上跳将起来，前去搭救。他首先抽出一把铅笔刀来，想法把门锁撬开。但没有奏效，于是便用身体猛撞厕所门，那样子形同电影里的间谍。正在这时，几位空中服务员，甚至还有一位飞行员也很快地走来了。但全都束手无策。经过30分钟的耐心处理，埃桑终于使里面的圆形手柄得以转动，当外面显示器上的符号从“有人”变换成“无人”的时候，他才钻了出来。那位工程师双手将他抱起，好似抱自己的儿子一

般。工程师的座位在我们旁边，在此以前，曾一直不停地拿糕点和苹果逗埃桑。

某些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早已观察到，中国人倾向于纵容孩子，即溺爱孩子。现举两个事实，以为佐证。其一，中国人往往将最好的食品，如牛奶和肉，留给孩子们吃，自己则勒紧裤腰带。其二，中国成年人今天仍穿着文革中的服装，这种服装具有“无产阶级”的淡绿色，它不分男女款式，宽松下垂，可是他们却让孩子们穿上鲜艳的桔黄色、大红色、粉红色服装，就像他们把自己那受到压抑的对时髦和个性的兴趣，全倾注到子女身上一样。文物商店出售的1949年以前制做的刺绣长袍和女式服装，十分讨人喜爱。相比较而言，我们发现目前中国制作的服装中，最漂亮且最适合萨拉的，是一种粉红色带帽子的缎子大褂。

不过，在夸奖子女这方面，中国父母的做法与把孩子捧为掌上明珠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大相径庭。他们评价孩子的品质好，用词是“乖”意即“行为良好”，然而另一层意思则是顺从、不好动和温和。当孩子吵闹得太厉害，或是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父母总是对他们说，“乖点、放乖点，”还使用诸如“嘘嘘”、“真不害羞”、“规矩点”等词语。这种情况，我在台湾和大陆遇到过十多次。相对而言，埃桑却是个“调皮”的孩子。有一次，巴巴拉生了病，我们请阿姨去把埃桑从幼儿园接回来。该幼儿园由菲律宾一位记者的妻子开办。阿姨回到家来，脸色气得发青。她说，埃桑一路上都在骂她，用脚踢她，还不住地哭闹。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阿姨一直都想用手牵他。这对美国孩子来说是一种限制，而对中国人来说，则十分

自然而且非常必要。

在美国，父母们常问孩子，自己能为他们做些什么，而中国父母则不然，常问孩子能为自己做些什么。这是出自子女孝敬老人的陈旧道德观的旧传统，它是中国私人关系的中心。和我相识的一对夫妇两人都是教师，有一个8岁的女儿和一位12岁的儿子。不像美国儿童那样，他们从不叫父母的名，只叫他们的称呼。他俩各有各的家务事：女儿每天早晨去街道牛奶站取奶，儿子则每晚毫无怨言地刷洗碗筷。兄妹俩清晨6时起床，无声无息地穿好衣服，又轻手轻脚地走出房间，把牛奶热上，把西式早餐需要的面包切成片。他们做这一切时，都不会吵醒父母。儿子和女儿共享一间斗室，晚上面对面地坐在两张小书桌旁，借助一盏台灯做他们的功课。我从未见他俩打架或是争吵。显而易见，那种同胞间的竞争和抗衡是不存在的。而埃桑和萨拉却常常表现出你争我夺的好战本能。有一天，教师的儿子回家迟了些，饭已吃罢。他告诉父母说，是因学习，忘了早点回家。当父亲的后来发现他实际上伙同一些朋友翻筋斗去了。于是，他以儿子撒谎为由强迫他跪了一小时之久。就是这样一位先生，对外人却和蔼可亲，待人有礼，一头短发梳得很整洁。

人类学家弗朗西斯·苏早就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儿童走在最后的国家。”父母们可以为所欲为，后代无权干涉。溺婴的情况并不多见，可是在艰难困苦的时期，杀害儿童的父母却很少受到惩罚或者公开谴责。今天，儿童也许不会再陷入那种愚昧的境地，然而令人好奇的是，这里和美国相反，没有关于人工流产问题的公开辨

论。尽管政府开展了一场严厉的计划生育运动，但我所访问过的一些公社卫生所，在一年中做的流产手术多于接生手术。

中国过去很少出版儿科的专业书籍，甚至在今天，我也未在书店里找到一本如何当好父母的书籍。中国没有一种类似斯波克博士或皮亚杰教授撰写的书籍，也没有发行很广的有关儿童如何学习和生活的研究论文。

与此相反，中国人过去受到此类教育的却是子女，三、四岁的儿童就听人们讲述《二十四孝》里面的故事。其中之一说的是，一个男孩为了使父母免遭蚊虫叮咬，竟让蚊虫毫无限制地吸吮自己的鲜血直到蚊虫满意为止。不过，给人印象最深的故事还是为母葬子。

一个姓郭的穷人和他的妻子遇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的老母患病卧床不起，需要药物和营养品，而郭又家境贫寒，无力供养。郭便与妻商量，最后决定将他们3岁的独子杀掉，除此别无它法可以孝敬老母。郭和妻两人都说，“母只有一个，儿可以再生。”于是，夫妇俩来到田里，挖了一个坑，将儿子活埋了。事过不久，他们开始翻地春耕，可挖出的却是黄金。人们都说，他们尊敬老人的精神感动了上帝，黄金便是上帝对他们的报偿。

这类故事现被指责为旧社会的封建残余。然而，中国儿童从小就不是学习用独立的眼光观察世界。不知有益于

否。恰恰在政府办的日托中心，社会伦理和纪律教育抓得最紧，似乎共产党人已完全承认子女应该孝敬老人。一些有工作的母亲，待56天照领薪饷的产假一结束，便把婴儿送到托儿所。在北京印染厂，一周岁以下的儿童被放在喂奶站。此站是一个保暖很差的大房间，挤满了拼在一起的有护栏的童床。我访问的那天，有10个婴儿彼此相隔两英尺，一动不动地躺在塑料床单上。三、四件冬季厚衣服把他们裹得结结实实，使得难以翻身。接待室里，三位母亲正用大奶瓶喂养各自的婴儿。

幼儿园领导解释说，“当妈妈的一天来两次喂孩子，都是工间休息时来。要不然，我们就叫保育员来照料这些孩子。”儿童床上没有玩具，上方也未系着可移动的玩具。更没有迹象显示，保育员们对刺激婴儿的感觉器官或是智力开发有所关心。还说，“如果他们哭，我们就哄他们。”幼儿园领导是一位待人温和的妇女，笑起来喜气洋洋，外面穿蓝色夹克服，里面是绿色毛线衣。她认为，一周岁以下的儿童很被动，无行为能力，不可能学什么东西。

孩子们在幼儿园和托儿所按年龄分班编组，从1岁到5岁共五个年龄，分成五个班，每班一间教室。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每一种活动仍然拥有高度组织，而且我注意到那是由成年人组织的。在3岁孩子的那间教室，老师正弹着小风琴，教全班唱一首新歌。当我走进的时候，全班24个孩子都异口同声地说：“叔叔，早晨好！”就像有人在暗示一般。他们坐在三张矮桌上，没人你推我攘。老师是位身强力壮的女子，刚二十出头。她命令“唱”，于是孩子们就分成男孩和女孩两组唱了起来。

女孩们先唱。

小弟弟，你的小手在哪里？

我的小手在这里，

它们能扛枪，它们能开车，砰、砰、砰！

小妹妹，你的小手在哪里？

我的小手在这里，它们能干活儿。

手绢脏了，它们能洗。

小弟弟，你的脚丫在哪里？

我的脚丫在这里，它们能够踢足球。

小妹妹，你的脚丫在哪里？

我的脚丫在这里，它们能够跳跳舞。

早年，孩子们可能不会唱这种歌，而是唱毛主席的赞歌。现在不太时兴对毛主席的崇拜了，但仍非常强调伦理道德。当然，按西方现行标准来看，是带有某种性别歧视的伦理道德。女孩们头上都扎着天鹅绒蝴蝶结，由耳后的一条塑料带固定在头上。

孩子们的表演可爱迷人，给人以深刻印象。远远不是埃桑能唱会记的。他连《玛丽有只小羊羔》或《静静的夜晚》的第一句歌词都记不住。他不能集中注意力，不能按老师的话去做，而中国儿童则可办到。不过，教室里却没

有任何图书。我对该幼儿园访问的那天，也未看见老师们做出任何努力来鼓励个人表演或即兴演出。唱歌跳舞都是集体活动，只需动用记忆力即可。他们提倡的是一致性和相互配合。

隔壁是4岁幼儿的班级，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艘漂亮的远洋客轮。在大洋里，有绿色的轮船，蓝色的波涛，红色的鱼，轮船桅杆上还飘着一面三角旗。所有学生都在顺从地临摹着轮廓。一些学生画得要熟练一些，但都是依样画葫芦，没什么创新。这又使得埃桑相形见绌了，他画的美术作品是原始的自由式手指画。然而，与美国教师不同的是，中国教师并不把学生的手工作品用来装饰墙壁。老师解释说，“我们不夸赞个别学生的作品。”房间里唯一的装饰是两张浅色的领袖画像，以及一张本班一周的时间安排表，对每次活动都预先作了安排。

我是左撇子，因此非常好奇，想知道幼儿园里是否有左撇子学生。若干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强暴地改变那些不信正道的左撇子。他们说，左手写字不适当。

幼儿园领导回答说，“全幼儿园只有一个左撇子，是个女孩，她非常固执。我们早就要她用右手写字，但这比要用右手吃饭更花时间。”

幼儿园这种一成不变的、经过安排的生活方式，倾向于使儿童们死气沉沉和不富创造力。一些中国父母对此无后顾之忧，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教师就很担心。他两岁的小儿子回到家后，便静悄悄地坐着，一句话也不说。甚至有时连续一个小时，他既不动弹，也不吭声。这位教师说，“我们担心，幼儿园的教育方法是否正破坏着孩子们

的智力。”教师和他妻子都在工作，而且工作的地方离住家要乘1小时的汽车。所以，他们把孩子送进幼儿园。星期一早晨上班之前，他们把孩子送出，要到星期六下午接他时才能相见。在北京的托儿所和幼儿园里，约三分之一的孩子都是这样的寄宿生。

中国父母和教师还发现，在家里养育的儿童与从小就送到托儿所的儿童相比，纪律性要差些，个人主义思想要严重一些。尽管来访的外国人获得的印象也是如此，但是上幼儿园或托儿所的中国儿童毕竟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这个数字大大低于美国。

莲莲是个4岁的女孩，父母系一家工厂的技术员。和他们居住在一起的，有一位老保姆，还有两个在文革中失去家庭的亲戚。所以，莲莲生长在成人无时不在、无微不至的关怀之中。这些成年人包括各式各样的叔叔。嬷嬷和一个保姆。莲莲习惯于同一家人一道吃饭，还加入大人們的谈话，直到母亲叫她别插嘴才住口。她没有学会幼儿园生活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合作技能。于是，当父母的不得不把她送到了工厂幼儿园。初去，她又哭又叫，不让妈妈离开。头几个星期回家吃午饭，她一副不高兴的样子，连饭也不想吃。

一次回家过节，莲莲闹着要去附近一个公园玩。她喜欢坐滑梯，滑梯后面是一长串极有耐心的儿童在不声不响地排着队，也看不出有父母在监管他们。他们爬上梯子，又从滑板上滑下，不说一句话，有时甚至不露一丝笑容。莲莲不愿规规矩矩地排队，而是另寻捷径，直接从滑板上爬上去。这使得母亲怒气冲冲，立刻伸手抓她下来。她便

哭闹了一场。这和美国儿童的行径没什么差别。

中国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走上一条不同于西方人的成熟之路，结果使得向成熟期的转化过程更加缓慢和更少波折。因为他们仍然受到各自那种互相依赖的关系网的约束和支撑，维护自己独立发展的意识和迫切感不强。在传统观念上，中国没有划出青春期这一时间阶段，甚至在今天，中文里也没有这一确切术语。崇拜青春的现象从未在中国发生过。正如精神病学家罗伯特·里夫登所说，“一个人的重要性，不在于青春期，而在于成年期，更主要的是在于他与家庭和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上。中国青年成为成年人，并不是由于他们摆脱了父亲的影响和控制，而是使自己适应了父亲的影响和控制，使自己变成父亲那样的人。”《二十四孝》里的故事全都反对青年人造反。尽管文化大革命鼓励青年人起来造反，尽管许多人目前已对革命理想抱玩世不恭态度，但那种对父母和对长辈的忠诚孝顺之感仍一如既往地强烈。来自纽约的女演员玛莎·丽塔，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过一年英语。她回忆说，当她布置作业叫学生们阅读《吉普赛绅士中的色迷》时，学生们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之中。《吉普赛绅士中的色迷》系J·D·萨林格的获奖作品，描写了美国青少年青春期的骚动情况。

一个学生问道：“既然主人公霍尔顿·科菲尔德被送到最好的学校，他父母又是有钱人，他老师也是个好入，那为什么他要憎恨这一切呢？为什么？”别的学生也问：“为什么美国青年喜欢这本书？为什么这本书被认为是一

部伟大的文学作品？”

丽塔总结说，“学生们不具有青春期时的反抗精神。他们在发现自我和力图与周围环境保持距离方面缺乏强有力的欲望和冲动。”

中国人不管岁数多大，都得听从父母的旨意，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有一位19岁的大生长得天真活泼，善于打破沙锅问到底，还爱好阅读美国小说。据他说，他每个周末都要陪父母去看电影。这种事情如叫美国青年去做的话，定会感到莫大的屈辱。我那位早已被送往农村的年仅20岁的朋友力华，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照料体弱多病的父亲以及弟弟妹妹。我的助手也注意到，她在北京大学念书时的朋友和同窗全都比西方人成熟晚，原因是中国父子关系旷日持久。

汪小姐曾说过：“就经济上、思维上和心理上脱离父母而言，21岁的中国人也许只相当于14岁的美国人。我感到很惊奇，中国朋友若干次问我是否想家，因为他们非常想家。我的室友们家住北京，每个周末都要回家。”汪小姐回忆说，在家乡蒙特利尔的麦克希尔大学念书的时候，“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回家的。”

“这些21岁的人动辄就格格地傻笑，对未来似乎没有考虑，行为上又天真，很富于孩子气。他们常以恶作剧取乐，被送往农村劳动时，互相泼水，彼此藏东西，或从门后突然跳将出来惊吓别人，等等。这些恶作剧在美国只能引起初中生的好奇。”

然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动乱导致了两代人之间的巨大分歧。玲玲是位早熟的16岁高中学生。在我

离开中国前不久，她父母匆忙地把我叫到她们家。玲玲不在家，只见她母亲一副焦虑不安的模样。原来她找到了玲玲一直秘密收藏的日记本，发现女儿与北京大学的一位外国留学生有往来。她担心玲玲不再坚持她那严格的学习计划。

她母亲急速地翻着，嘴里说：“我们对她一点弄不明白。青年人的思想和模仿西方的那套东西对她都有影响。”

“也许我们现在太老了，”她父亲插话说，他一直不吭声地坐在屋角里。“中国已出现了代沟。”

他们想知道作为西方人的我是否能够劝说玲玲把精力集中在学业上。后来，我见到了玲玲。当时她正与外国男朋友溜冰。她身穿一件崭新的紫色针织毛衣，围一条十分般配的围巾，头发剪得很短，一副调皮的样子。她嘴唇上还涂有口红，看起来模样挺漂亮。这是一种时髦的大胆显示。1976年以后，一些妇女才开始私下试着涂脂抹粉。不过，据玲玲说，她在学校却不能这样，因为没有得到校方的认可。

玲玲抗议说，“父母不理解我。我是独生女，他们把我给惯坏了。父母把什么事都替我做完了。说好听一点，就是他们太爱我。公正地说，就是他们坚持要我同他们一天呆到晚，如要出去，就得跟他们一道，否则就不行。出门看电影，如邻座有个男孩，他们就叫我坐在他们中间。

“我想自由自在。可我的行为越天真越傻气，他们就越喜欢。所以，我从不在他们面前表现出我深谙世故和能自己思考问题。”

一位深思熟虑的中国编辑已有两个10多岁的女儿。他

说，女儿们常笑他是老古董，“她们说我是30年代的人。中国正在出现代沟。不过，我认为这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西方的那种生理或文化上的难题。当然，这是文革的恶果，并非是永远的趋势。”他相信，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仍然完好无损。

也许，中国的两代人之间确实在逐步形成鸿沟，可是中国年轻人进入二十几岁年龄时，却并未像美国人和西方人那样，经历各自的危机，或是心灵创伤，或是情绪振奋。他们不具有这样的奢华享受，因为他们的行为受到社会限制，缺乏个人的选择余地和职业流动。选择余地和职业流动是谋求个人充分发展和我行我素的个人生活方式的先决条件，是美国人眼里理所当然的东西。确实，汉语里还没有表达“身份危机”和“生活方式”这两个概念的适当词语。恰恰相反，中国人却倾向于遵循一种小心翼翼的成熟模式，要求青少年不得行为越轨，也不得企求其他途径。按法律规定，中国男子至少得等到22岁以后才能结婚，城市男青年得等到27岁；女子至少得20岁，城市女子得25岁。待合法婚龄一到，所有的中国青年似乎都匆忙在一、两年内了结婚姻大事。

小兰是位科研人员，年龄26岁，笑起来满脸稚气，她与另外三人共住一间宿舍。两年前她就开始住这里，那时只24岁，室友也是同一年龄。她25岁时那三位室友都结了婚，并在第二年又都添了小孩。现在她又有了一批25岁的室友。室友们都交上了男朋友，并计划在短期内就举行婚礼。

小兰很着急，原因有二。其一，是她所在的科研机构里没有适合的男子，而且她发现要找到一个具有同等学历的人非常困难。作为知识分子，她绝不会考虑嫁给一个工人或农民。其二，迫使她结婚的压力非常之大。

一天，我们驱车去北京西北郊区的颐和园。她在途中对我说：“我们单位里有一位话务员，35岁还没有结婚。她住的是一间很小的房子，里面有交换机和一张床。由于这种状况，人们都风言风语地说她，还讥笑她。”

她又说：“在单位上当哑巴，什么活儿都不干，也没有人会笑话你。但如果30岁还没结婚，别人的闲话就来了。”

戴维·埃森伯格毕业于哈佛大学医学院，现在北京中医学院工作。据她说，中国医生常常听到年近30的妇女们抱怨。她们来院就医时，不是说胃病，便是说其他一些常见的失调症状。经医生检查以后，未见任何异常。最后只得听她们自己吐露问题所在；所说的症状都不过是借口而已。原来她们结婚已达一年之久，却仍未怀孕。她们认为按时间计算早该有了。

中国青年在许多生活必需品方面都要依靠父母提供，结果进一步加强了本来已经很密切的亲缘关系。因为住宅短缺严重，新婚夫妇不得不与父母同居一处，直到30多岁方才离开。美国作家西赫在她的畅销书《岁月流逝》中，把美国的这类人划为庸碌之辈，而且评论说，他们“也曾像中产阶级出身的青年那样，尝试过要摆脱家庭的束缚，但稍遇挫折，就丧气灰心。”转而维持对家庭的依附关系。西赫还蔑视地写道，庸碌之辈往往胸无大志。他们一

且结婚，生活的主要内容是遵从他们认为应当遵从的东西。庸碌之辈“宁愿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混日子，也不愿从事一项毕生的创造性事业。”然而中国人却是别无选择。他们往往得指望父母利用关系才能使自己获得工作，而一旦就业以后，要想改变职业，那非得遇上千载难逢的机会不可。再者，是追逐事业，还是当贤妻良母，这并非妇女们遇到的进退两难问题。因为经济原因迫使她们必须工作。

美国有一句古话说：“年轻人，到西部去！”中国没有类似的俗语。中国人乐意固守家园，不愿迁徙他乡。但也有例外，也是唯一的例外，那就是在单位命令的情况下，虽不情愿，也必须舍下家小，远走他乡。美国人所习惯的那种迁徙生活，于中国人非常陌生。曾记得1972年我陪中国新闻代表团旅美之行的情景。看到新泽西大道上奔驰的一辆辆住房拖车，中国记者们大惑不解。他们问，“这些是什么新玩意儿？”当我解释说这些是美国人用来搬家的拖车时，看得出来他们并不相信。

这种职业选择的缺乏尽管会使美国人愤慨万分，却能向中国人提供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此种安全感正是美国无根之民所不具备的。中国人十分习惯于把一切都交给他人决定，如工作，住宅，有时配偶也由他人挑选。所以若是让他们过上美国那种变化无常的生活，当会困惑不安。1980年，中国首批来美进修的两位学者抵达波士顿。他们曾以为哈佛大学会派人来机场迎接，因为外国来宾到中国访问一般都有人接送。哪知机场上一个人影也没有，两人只得想法取到行李，乘一辆出租车到了坎布里奇。到校后

却不知何去何从，弄得他们一筹莫展。驾驶员将他们送到教员俱乐部，让他们在那儿过夜。当该校管理人员叫他们自己去住住房，自己安排课程计划时，他们顿时感到莫大的委屈和悲哀。

到了中年时期，这一倍受限制的流动性又将中国人的人生旅途拨入另一航向。年轻时，他们富于幻想，希望远走高飞，随着体力逐渐衰弱，他们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想入非非。西赫发现在美国，“人到中年期发生的转变，与到青春期的转变一样至关重要，而且从某些方面来说，更令人困苦忧伤。”美国人若意识到自己当不上银行老板，而时光又所剩不多，那他们会痛苦悲哀，意气消沉，以致沉缅于及时行乐，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或追逐权势，附庸风雅。

然而，中国人到了中年期却并不这样。他们几乎不可能放慢追求事业的步伐，或许还会千方百计地在自己的单位营造一块安全的地盘，使自己免受政治运动的危险冲击。他们业已跨越人生的重要分水岭。要是他们在青少年时期未能表现出政治上的积极进步，未加入共青团，他们则会被视为消极落后分子。因而从此一蹶不振，会入不了党，而入党又是通向事业成功的主要途径。另一方面，一个人的升迁主要看他的资历，即他在单位开始工作的时间，不过，如果野心毕露，升迁也会十分无望。

科学院某位工作人员时年40岁，说起话来温柔顺耳，她说：“人们憎恨比自己强的人。这是我们的一份遗产。人们本能地认为人人都应当平等才对。”1957年，她父亲

被划成右派，她因此未能进入大学念书。但1949年以前，父母都在美国传教士开办的学校里受过教育，所以他们便在家里教她英语。“我是个区区打字员，级别最低。但我的英语胜过办公室里任何人。我主动提出做一些所里急需的翻译工作。哪知办公室里有人说我趾高气扬，妄自尊大，还说我应该满足现状。人们总是风言风语地指责我。”

后来她考虑申请调动，但调动就意味着要去单位人事部门。而坐镇该部门的是位党的老干部，从前在军队当过政委。“他们要作调查，会查阅我的档案。我父亲是右派分子的老问题就又会提出来。”因此，她将这一危险的想法放弃了。

中国的中年人还被限制在比西方人慢得多的升迁规章中。四、五十岁的人才爬上成功阶梯的低格和中格，而在西方，他们的同年龄人早已跃居经理阶层的宝座了。当今中国的高级职务，如党、军队、工厂管理部门、科研、医学卫生和艺术等部门的高级职务，几乎都留给了老年退伍军人。他们早在1949年前就已入党，现至少已有六旬高龄，多数人还到了70甚至80岁。

一位55岁左右的报社编辑说：“我的朋友中还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收入低，没人获得重要职务。”他本人每月收入75元，低于许多工人的收入，而且近20年来一直未得到加薪，尽管他工作能力强，富有献身精神并受到同事们的尊敬。原因是报社里他的那位上司是30年代末期在延安入的党，现在虽已年过花甲，仍无退居二线之意。

那位编辑还说：“50年代上大学，然后参加工作的所有中国人都面临着这么一个问题。这批人年富力强，但不

得不接受被给予的低级职务。”

就连那些功成名就的少数中年人也谨小慎微，害怕向前冲得太快，冲得太远。有位女演员长得个子小巧，面部表情丰富，说起话来小手挥舞。她说，自己宁愿与丈夫和两个孩子呆在家里，也不愿意上电视。

中国有一句俗话：“人怕出名，猪怕壮。”

有一位妇女从前当过教师，文革中又蹲过监狱，她担心从前的同事会嫉妒她目前的红运。她说，“将来会出什么事，谁也不清楚。也许会有另一次运动。我现在的座右铭就是不图名也不要钱，只想避免出差错。”她仍旧住在早已住过若干年的那套公寓里，每天都要遇见那些曾使她身陷囹圄的人。

“以前，我打他们身旁走过的时候，决不理他们，他们也不理我。现在我们常常都互相打招呼。不过，我并没有原谅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中国与西方的最大差别还是在于人的老年时期。在美国人看来，老年时期就意味着孤独寂寞的晚年生活：失去活力、收入降低、毫无保障，也许还意味着隐居在太阳城里一间小屋，或者坐在小型疗养所的一张卧榻之上，远离自己的家人。而中国人则不然。他们在晚年时会感到更加心满意足。因为这是人生的天伦之年，会被誉为老寿星。

“老”一词是对男女中国人的尊称。传统上人们认为一个人老态龙钟之时，便是智慧增长之日。孔丘对信徒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老年人愈老，愈能得到全家的尊敬。这就是相互依赖关系网真正带来的益处之所在。中国人将父子关系作为人生旅途中的基本社会关系来保持，其他关系则依附这一关系。他们的家庭关系和住所相对稳定，从不动辄搬家。而美国人搬家之勤，犹如金蝉脱壳。中国人的社会安全感也同样如此。我认识一位45岁的干部，他有两个孩子，全家住在狭窄的中式四合院旧房。小孩想更换住房，搬到一套带厨房和洗手间的现代化公寓里。此处离那位干部的办公室很近。单位也同意安排搬迁。但干部的母亲拒绝乔迁。他母亲是个80岁的怪脾气老太婆，尽管她很少迈出家门，而且在家里也得扶着桌椅才能走动，却习惯于街坊生活，不愿变更环境。这样，儿子也只得遵从母亲的意愿。

对于老人应受尊敬这一问题，中国人远非贬损它，而是强调它。世界上极少数国家的法律才有此规定，孩子必须照顾父母。无疑，中国便是其中之一。中国婚姻法第15条规定，“子女有义务赡养和照顾父母。如果子女未能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父母有权要求孩子支付赡养费。”婚姻法第22条还规定，如下一代直系亲属去世，老人则由第三代直系亲属供养。报纸曾报道说，山东省有三位农民系一对80高龄夫妇的两儿一媳，因不照管老父老母而被判处七年监禁。

人们还制定了慷慨大方的福利计划，向老年人提供经济保障。在城市，男子工作20年以后，可在60岁退休；企业单位的妇女可以50岁退休，事业单位的妇女则要55岁才能退休。退休金是退休前工资的75%，如果是先进生产者和1949年前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干部，退休金则可能是

100%。由于历史原因，50年代开始工作的成年人的收入往往高于最近几年加入劳动大军的青年人的收入。因为在50年代发给的起始工资比今天高。而且在60年代和70年代还有一次全国性工资大冻结。再者，一些退休人员，特别是那些技术员和熟练工人，还可找到第二职业。其结果当然是强烈地刺激全家三代人仍稳固地住在一个屋顶之下。因为城市家庭若由父母、儿子和儿媳组成，父亲退休金将会占到全家收入的一半。这番结论是由黛博拉·戴维斯-弗里德曼作出的，她是耶鲁大学的社会学家，现正撰写一本有关中国照料老年人情况的专著。

中国的年轻人易于怒气冲天，灰心丧气，而老年人则不同，他们真诚地感激共产党为他们带来的一切。任何一个早晨，若是5点30或6时起床，然后前往我们公寓附近的天坛公园，就会看到聚在那里的两三百名男女老人。他们正在打太极拳，脚步缓慢滑动，双手轻轻挥舞。太极拳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健美操。老年人们还不时地停下来与邻居或是同事攀谈。

一天早晨，我去观看他们的表演，遇见一位胡须灰白、前额皱纹很深和令人尊敬的老人。他对我说，“我们非常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今天的年轻人不明白这点，但我们记得解放前的苦日子。那年月，老年人只会饿死。”他回忆说，他亲生父亲是打短工的，年仅32岁就因营养不良和疾病去世。

还有其他一些经济因素使扩大了的家庭聚集在一起。在共产党设计的独特的制度下，工人或行政人员退休时，有权将自己的工作传给儿子或女儿。鉴于当前的失业网

题，这一制度带来了非同小可的利益。据厂方官员说，在拥有36,000名职工的兰州石油化工总厂，每年退休600名工人，他们留下来的工作实际上全由子女顶替。

在中国银行当会计的一位熟人说，他计划利用政府一项新的优惠政策提前退休，即58岁时退休，以便让儿子接替他的工作。他儿子两年前中学毕业，当地劳动局一直未分配工作。会计很担心他会像其他待业青年那样，成为失足青年。这一接班顶替制度与北京的晚婚和独生子女家庭计划相辅相成，基本上能保证做到，如父母按规章制度办事，子女成熟后即可就业。

老年人还有一个有利条件。他们往往是家庭里分有住房的唯一成员。有关部门根本不认为年轻人独家立户的愿望是申请一套新住房的充足理由。房租和食品花费相对来说要低一些，但众目所望的高档消费品，如电视机、手表、自行车等等却昂贵得多，需要几个家庭成员的共同积蓄。中国人把电视机、手表和自行车用来衡量生活水准的高低。老年人另外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当日托中心太远或难以接收孩子时，老年人可照料小孩。

在农村，保持家庭聚合的经济动力更是强健而有力。因为只有少数一些富裕公社制定了老人福利计划，其他老年人必须一如既往地依靠已长大成人的子女赡养。不过，老年人本身仍能起到重要的经济作用。大多数乡村住宅都是私人拥有，而建一座新住宅则要花费几年的共同积蓄。公共托儿设施十分稀少。年满50岁的人可以停止到集体地里干活，这使得男女老人有自由将全部时间用来发展私人副业，如种植自留地，饲养猪和鸡鸭或栽种果树等。对许

多农民来说。这种副业生产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30%以上，而且基本上是现金收入。相对而言，他们在集体田地上的劳动所获却是稻谷和油料。因此，家有老年人是一笔经济财富，而不是负担。

党和政府最高领导层的构成本身，就是中国人尊敬老人传统的光辉典范。政治局常务委员的平均年龄是72岁。邓小平和陈云也许是中国两位最高实权人物，邓小平出生于1904年，陈云生于1900年。据朋友说，陈云多数时间都是在医院里度过。在法律上，对党的高级干部和军队高级军官没有退休要求；他们享有终身职务，如同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中国主要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和演员们于1979年召开全国文代会，有两位代表在会议期间去世。有9名人员当选为各个文化协会的新任领导，其平均年龄是73岁。

在1980年9月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这个巨大的圆形剧场，拥有一万个座位，上下共三层，天花板中央是颗红五星，周围环绕着四个光圈，讲台两侧挂有领袖的巨幅画像，以及一行行红旗。一些代表拄着拐杖蹒跚地步入会场，有些则由护理人员搀扶入座。轮到叶剑英主席讲话时，发言稿的大部分实际上都是由女广播员替他宣读。但是发言稿快读完的时候，被叶剑英接了过去。他说，有几位高龄副总理在本次会议上同意退休，全体代表应向他们表示祝贺。这样就可以提高国家领导机关的效率……他们以身作则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他还说，“我特此提议全体起立，并长时间地热烈鼓掌，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他发言时，多名身穿白色外套的女护理人员和几位男服务员匆忙赶到讲台，助叶剑英一臂之力。还有几位上了年纪的领导人站立起来。叶讲完话以后，由护理人员陪同走下讲台。

然而，中国对老年人的崇拜最终可能会受到现行政策成功的影响。据统计，1949年人均寿命是32岁，而目前已达62岁，因而中国的老年人会越来越多。而且，如果共产党继续执行独生子女计划，那将意味着每个年轻人可能不得不赡养多达四位老人，两位是自己的父母，两位系配偶的父母。许多中国人私下里担心地说这将会是个过于沉重的负担，要减轻负担，只能靠国家推行一个更为庞大、开支更多的社会保险计划。但政府也很难拿出这笔开支。这的确是一个很有可能产生的社会问题。我想应当提请人们注意。

第10章

他的爸爸是将军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

——引自文化大革命赞歌《东方红》

大厅里，几百人坐在本椅上，站在过道里——这是她记忆中的情景。她母亲被人引到前排一个显眼的座位上便于众人观看。军队老资格将领的父亲则被人安置在讲台上。他曾在同国民党打仗和在朝鲜同美国人打仗时英勇负伤。接着，几位佩带红袖章的武装卫兵迫使他双膝跪下，将头低着，又把他的双臂朝上反扭在脑后。这种姿势被红卫兵称为“坐喷气式飞机”，因为受害者的形象如同一架后掠翼飞机。此事发生的时间是文革初期的1967年，她父亲不幸陷入一个受林彪攻击的部队派别中。林彪当时系国防部长和“接班人”。人们指责她父亲是走资派和叛徒。因此，军区司令部组织了这次批判大会。将军13岁的女儿

兵，在一切准备就绪后，被人推上讲台，揭发检举当将军的父亲。按古代孝敬父母的传统来看，要一个中国人谴责其父的行径是违背传统伦理的大逆不道，因而这是对旧时代家长制的公开抵制，是对新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完全皈依。

“现在说起来真使人难以相信，只有在这个制度下生长的人才能弄明白。”兵告诉我。当时我与她在北京的一家餐馆邂逅相遇。按中国人的习俗，我在桌边一个无人的椅子上坐下。

在谈到自己批判父亲的情景时，兵解释说，“那时候我还小，非常幼稚。认为自己是革命的后代，不是父母的后代。”她还认为自己属于毛主席，属于共产主义和新中国，正如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千百万青年人所想的那样。

“父母就是那样把我带大成人的，对我教育很严。我父亲本人就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时出卖了他的亲弟弟。他弟弟曾在私下说过中国对苏联依附太重的话。父亲认为，自己那样做就是忠诚，要把一切献给党嘛。父母觉得革命者不应该表现出个人感情。

“我记得9岁的时候，有一天我感到十分寂寞。父母要工作到很晚时才回来。我想做点儿事情向他们说明我想念他们。所以放学回家以后，我把床被整理好，沏上茶。哪知父亲回来后笑话我。虽然不是恶意的笑，却刺痛了我。从此以后，我下定决心自己也要当个优秀的革命者，决不显示自己的感情。”

兵很会自我约束，把各门功课学得很好。父亲遭受批判时，她首先奋起谴责父亲。“我说过我决不愿意当走资

派的牺牲品。”

在批斗她父亲的群众大会上，一名部队审讯员要求兵将所能回忆起来的父亲罪恶统统汇报。“我说他有时在家吃肉。这种事情像他那样的革命者是决不允许的。”对一个局外人来说，这种指控似乎无足痛痒，与“反革命滔天罪行”毫不相关。但在文革那种专横武断和头脑发热的年代，那却是热情而激进的起诉者们严肃对待的证据。他们鼓励她讲下去。

“我还记得有一次在家里聊天，他说起一件事情，那就是他曾经同连队暂时失去联系。我说其中定有可疑之处。”在压力下，她还讲述父亲如何劝她喝牛奶，以便身体长得又高又结实。“我对他们说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兵并不知道自己的检举揭发究竟有多大意义，但她父亲却在部队的一个拘留中心被监禁了几乎长达10年。直到后来，她才了解到此案事先早有定论。

从那以后到现在，兵已长成一个体态轻盈、年龄二十五、六岁的女子。她那僵直的头发剪得很短，一对眼睛又小又窄，眼角呈三角形，这是西方人看见华人斜视时的称谓。用常规的眼光打量，她并不漂亮，却充满活力，不矫揉造作，说话也很有魅力。这些都有助于她把朋友们迷住。我们每次见面，首先她得涂抹上她所说的“化妆品”，以免别人辨认出来。她外边身穿草绿色军用长大衣，但又不像中国军大衣，上面有兜帽，而且颜色看起来也有些面熟。不过，这种颜色不适合中国。“这是件纪念品，”她一边说，双眼一边向上皱起，眼帘紧闭得只留下一条缝。“朝鲜战场的美军服装，是爸爸带回家的。”她有些亲戚

经常因公出国。通过他们，她搞到一双棕色皮革高统靴，一条绿色灯芯绒紧身裤，一件滑雪衫，全都是洋货。她装扮得很像，足以欺骗北京饭店的守卫。守卫们把她当成华侨而放她进去。

我们第一次见面后几个星期，有一天，她又更加详细地讲解了自己谴责父亲的情况。

“那些日子里，毛主席在我心中真正像个神，”她继续说。文革期间有一种仪式，人人都得遵照执行。家家户户都有一尊毛主席石膏像，全家老少每天都得在他面前鞠躬两次。“人们说那是‘早请示，晚汇报’。”兵还说，这是模仿过去皇帝宫廷里的那套仪式。

“突然有一天早晨，我正对石膏像鞠躬时，仿佛看见他在对我微笑，我真对他生气了。不过，我很快就对这种反应感到毛骨悚然。”

据兵说，干部们当时正在鼓吹一种思想，认为人们的生活取决于一闪念，犹如摄影师的闪光。这种一闪念会在人们心中打下烙印，能区别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

“我真害怕当反革命。他们曾要求我们年轻人，如有任何反革命想想，必须立即报告。我害怕像爸爸那样也被他们弄去批斗，然后关进牢房。我才13岁，又无依无靠。”

“那时候，我们把个人感情深深地压在心里。多少月、多少年来，我根本就与朋友开诚布公地谈过心。”她所住的学校宿舍离父母的住房不远，每天都要同母亲在街上擦肩而过，可是她不能同母亲谈话。真是令人尴尬难堪。她害怕母亲因她出卖父亲而生她的气，整天为此忐忑不安，而且还害怕被人看见和这反革命分子的妻子在一

起。

兵承认，她尽管在控制个人感情方面受过严格的训练，仍不时地思家念亲。“有一次我周末回家，妈妈出去了。但妹妹在家，她才10岁。她说，小兵姐，我们真想念你呀。我受不了，一下就哭起来。”小兵缺乏在西方人看来是理所应当的那种精神支柱，原因有三。其一，她从感情上和政治上割断了同父母的联系；其二，她不敢同朋友交谈；其三，学校里没有咨询人员，也找不到精神病医生。

接下来她又说，“许多星期里，我的整个神经都快崩溃了。每天早晨醒来，就听见喇叭里播放《东方红》，它使我浮想联翩。我请毛主席原谅，我还向他祈祷。我总是尽量地阅读他的著作，以便把我感受到的那种可怕的一闪念抛在脑后。”

“我弄到一张北京地图，上面标出的公共汽车路线我都能背了。7路汽车走这里，8路汽车又行那里，等等。晚上，我把收音机一直开着。只有精力被分散，我才能入睡。”

“我想到从高楼上闭眼往下一跳，就此了结此生。可是如果自杀的话，别人就会说是畏罪，会把这当成你是反革命的证据。”

据她说，她终于忍受不了这种压力，便写了一份情况汇报，递交给了有关领导。兵说，“其实他们对我还蛮不错，因为我太小。他们没有处分我。”处分一词是中国术语，意即惩罚。她又说，“他们只是派来一位姑娘，一天24小时都把我看着。”

然而，兵的问题并未结束。尽管她早已公开谴责了自己的父亲，但在“血统论”的影响下，她仍被学校领导划成了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别人不让她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还把她从该市乒乓球队驱除出去。而她在乒乓球队是颗正在升起的新星。别人还禁止她进入宣读中央文件的会场。

兵回忆说，“后来有一天，他们骂我是反革命，我就再也受不了啦。我从大楼里跑出来，竟不知道该去何处。我茫然无措。”

她来到北京火车站铺有大理石地砖的候车大厅。她在那里坐了整整一下午，接着又是一晚上，到11时，一队民兵走进了车站，来搜捕那些盲流人员。

兵说，“我没带户口簿，他们以为我是妓女，就把我带到隔壁的派出所。他们把我投入地窖，里面还有十几人，都是些小偷，乞丐，还有一个疯老头。他穿得破破烂烂，不停地对自己喊叫。太可怕了！就像走进地狱后又发现自己还活着一样。我才不愿意与其他人坐在一条长凳上哩，他们太脏。所以我在门边站了整整一夜。”

次日凌晨5时，一个守卫人员走来询问她。偶然间，她记起乒乓球队的一位朋友有个亲戚在该派出所工作，便要求见见他。“幸运得很，我回忆出一连串有关那位朋友的事情，她刚去过阿尔巴尼亚，而且还带回来一副太阳镜。那时候，这些都是了不起的东西。”后来，那守卫人员就把她放了。

哪知这一插曲却意味着她只有七年的正规教育结束了。她被学校开除学籍，分到一家工厂工作。据她说，

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工厂党委将全体工人召集到一起观看电视上的悼念活动。“党委书记期望我们都哭，表示悲伤。当时压力很大，我浑身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

到后来，“四人帮”被捕以后，她才了解到一些朋友们干脆把脸对着墙壁，这样谁也看不见。

“四人帮”倒台几个月后，她父亲终于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并得到了平反昭雪。他并不就过去的事情指责兵。全家又重归于好。“他明白那时我很小，而且我做的那种事并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革命。即便如此，干这种事也真是傻透了。这种事我决不会忘记。”

据兵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过一次仪式为她父亲恢复名誉，但她拒绝参加。原因是“太晚了。”一是她父亲早已被弄得名声扫地，挨打受骂，还身陷囹圄达10年之久；二是她本人早已被迫弃学，受到政治上和感情上的孤立。她的理想早已粉碎。

然而，她却却有因祸得福之感。她说，“对于我们这些活过来的人，文革是件好事。我们长了不少见识。我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崇拜其他人了。”文革对千百万中国人来说是分水岭，对小兵亦如此。

兵对与我的相见感到精神紧张，因为她生活在一种被人批评的惶恐中。她说，“在中国，人一生下来，就得学会同惶恐生活。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状况。似乎每双眼睛都监视着你。”我们在一家俄国餐馆午餐。这家餐馆现已成为中苏友好关系时代的遗物。在这儿仍能喝到俄罗斯风味的汤和吃到俄罗斯奶油烤鸡。餐馆旁边就是北京动物园。

窗外是一月份的寒冷天气，地上满是冰块，有一名士兵在站岗。他内衣穿了若干层，使外衣显得鼓鼓囊囊的。我很纳闷，他究竟是在保卫餐馆呢，还是在保卫动物园？据兵说，两者都不是。餐馆后面是一家剧院，而剧院被看成是很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我们这次的约会时间，是她在电话上安排的，约会地点是上次见面时约定的。因此，在电话上她未说自己是谁，也未说地点。尽管中国人同外国人交朋友会遇到许多危险，但兵却那么乐意与我交谈。为什么呢？我很纳闷。我感到其中原因是那种她从童年起就产生出的孤独感。说来也怪，既然她不能信任家庭、朋友和同事，竟不害怕把自己的内心活动告诉给一个外国人。

兵继续谈到她的生活经历。24岁时，她迷上了另一位将军的儿子。她那些朋友们都说他是首要的追逐对象，因他长得一表人材，皮肤光滑洁白，笑起来光彩夺目。加之他又是个才华横溢的大学生，其父系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嫁给这样一个优越家庭，对中国人来说，真是再好不过了。他喜爱打乒乓球，他偶然去看一场比赛，兵的精彩表演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并不认为他会喜欢我，因为我把自己看成是个丑小鸭，不过我还是很高兴。当时我的生活正处于低谷时期。爸爸仍在监狱里，而我又前途无望。”

他开始写信向她求爱，她终于同意和他一道看电影。那天分手时，他吻了她。她不免心中发怵，这对一个中国人来说似乎太早了点。后来才看出他非常好色。不过，在谈到作爱时，兵还用兜圈子的办法把话题岔开。

她说：“他对我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我干那事。而

我又感到欠了他的人情，因为在我处境危险时他一直对我很好，再就是我不能上学，他又帮助我努力自修英语。”一天，他邀请兵到他父亲的住房去。这是一幢宽敞的房屋，由军队分给他父亲的，有花园，还有两个佣人。家里四个长大成人的孩子各有一个房间，其中一个孩子自己还有两个婴儿。另外，还有一间客房，兵将在这里过夜。那天很晚的时候，他以为父母已入梦乡，便将兵叫到自己的房间里去。早些时候，他曾请一位朋友秘密地将他那房间的门锁换了，所以他父母不可能进得去。

哪知，待兵走进之后，刚脱光衣服，他母亲起了疑心，在门上敲了起来。当发现门是闩着的时候，她愈发感到问题严重，就不停地猛烈敲打，最后儿子才不得不把门打开。

兵回忆说，“房间里一条绳子上晾有衣物，我藏在后面，羞愧万分。他母亲假装没看见我，算是留个面子。那真是太可怕了。打那以后，干那事我再也不觉得快活，我索性把双眼闭上。不干它，我照样能活！”

在中国年轻一代改变性爱观念方面，兵和他的经历似乎具有普遍意义。文革以后，他们追求性行为的更加自由化。不过，他们仍得严守秘密，而且还未完全超脱各种限制。

几个月后，兵发现已有孕在身。这种情况很危险，因为他们尚未结婚。兵说，“只要单位风闻我怀孕的事情，那就会身败名裂。人们认为妇女在结婚前都应当是处女。所以这事有可能直接写进我的档案。这样的事出在妇女身上，真是糟透了。”很幸运，他有一个中学同窗在妇产科

医院当护士。

“我们到家去找她，我们什么也没说，她便清楚是怎么回事，只问，‘怀孕几个月了？’”就这么几句话。然后她通过后门在医院里办好手续，在登记簿上记下的是“已婚”二字。这样就没人问这问那，也不会向单位报告。

“他本来应与我同去，但那天他找借口溜了。他说他得去上班。我心里很不安，既然是已婚，那丈夫就应当在医院露露面呀！最初医生还以为我很自私，背着丈夫来做流产。他们问我是否征得丈夫的同意。”

兵被人带到一个房间，里面还有十几位妇女。她一听见叫自己的名字，便穿过大厅进入手术室。她回忆说，

“他们用软管和吸筒把胎儿吸出来。然后把吸出来的一小点的东西拼凑起来，确保里面没有任何残存物，以免引起出血。”接着，他们叫她回到病房，休息半小时再回家。

医院旁边通常都有出租车，这在北京还是中国人能找到出租车的少数几个地方之一。不过，这些车一般都是留给外国人用的，价格太贵，中国人坐不起。可是那天，一辆车也没有。兵只好乘公共汽车回父母家。车上人多，实在拥挤不堪，而路程又达半小时之久。那位护士同学与她一道走到医院大门。

“对不起，我还得留下继续上班，”她对兵说。

“从她眼里的表情可以看出她知道我是多么地孤独。”

“第二天下午他来了。他又想作爱。我说，决不行，我刚做了流产手术，还很痛。但他很有意见，他说，‘我一直从学校骑自行车赶来的’。”

六个月后，兵再次怀孕，他们却仍未结婚。这次兵相信，医院肯定会批评她。所以决定不仅要宣称自己已婚，而且要说已有一个小孩，不想要第二个，响应党的独生子女政策。哪知那位前来检查她的女医生还未做流产手术，即识破她的诡计。那位医生带来三位学医的学生作临床实习。

兵说，“她开始对学生讲起来：瞧瞧她的腹部，可见这部位仍很紧。看看她的乳房也不松垂。她是在撒谎。姑娘快坦白交待吧。”

这次与上次一样也未施用麻醉剂，流产手术后，兵痛得昏了过去。离开医院时，她只得坐在通往底楼的阶梯上，避免再次昏厥。那位医生碰巧打那儿经过，并看见了她。

医生说，“我恨男人。”据兵讲，那位医生其实比她还年轻，可是非常老成持重。她对兵说，“男人带来的痛苦太大了。我把这事看透了，他们却根本不明自己干的事儿。我一辈子也不结婚。”

兵骑自行车来医院，也骑自行车回家。

根据政府计划生育的政策，可以自由采取避孕措施。所以我问她为什么不事先采取避孕办法。兵回答，“去哪里要这东西，很丢人。”据她解释，中国的避孕套分三个尺寸。“必须说要大号、中号或小号。他根本不去，他说那是我的事。”

兵的父母根本没有因兵谴责自己的父亲而惩罚她，他们心里很体谅女儿。可是兵对革命理想所抱的玩世不恭态

度却使他们大感失望。她父亲尽管受到了虐待，但对此仍然坚信不移。

她说，“他是个老古板干部，大公无私，工作积极热情。甚至妈妈也说他的思想还停留在40年代延安时期。虽然有佣人和勤务兵替我们做家务，爸爸饭后总是要起身扫地和刷洗碗碟。别人都可以用他的公车办私事，可他根本不让我们用。他从不带我妈去参加正式宴会品尝美味佳肴，而别的将军现在常常带自己的夫人去。”据她说，她父亲是在苦水中泡大的。祖父是个小商贩，祖母是个烟鬼。当地有一位商人为穷人办起一所免费学校，受了这位商人的恩惠，她父亲才得以上小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校里的一位老师就是个进步分子，于是在30年代初期便带他去参加了红军游击队。

兵说，“爸爸不喜欢今天的青年人。”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全家人在讨论湖南学生举行示威，抗议政府干涉学校试点选举的情形。“爸爸大发雷霆。‘这些年轻人尽惹麻烦，你也同他们在一块吗？’”她引述父亲警告她的话说。

“我说，哪有什么麻烦？学生行动是有益于民主的好事。”

“他气得大跳起来。‘你应该听我的话。我党龄有50年，你妈有40年，加在一块是90年！你必须相信我们对你说的。’”

兵还说，“我再也受不了啦。我就说，‘看看苏联吧，它的历史更长，但现在又是怎么样呢？’在中国，一条代沟正在形成。玩世不恭是我的经历造成的，怪不得

我。我和朋友们一样，什么也不信。前不久，我听别人拿苏联开玩笑，我看也可以用这个玩笑来看中国。笑话说，亚当和夏娃是俄国人，赤身裸体的，只有一个苹果得他们两人分着吃，但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天堂里生活得很幸福，我父母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一点也不懂国情。”

兵的父母还对她决定不要小孩的作法大为不满。她26岁时，终于与那个害了她两次人工流产的男朋友结了婚。父亲通过后门关系使她上了大学，所以她更加感激父亲。她说，“不过，我还是叫他死了那条心吧，我们决不会要小孩的。这是知识分子中的发展趋势。我们的兴趣正在转变。如有了小孩，那什么也别干了。就没钱买收录机这类新玩意儿，没时间和精力继续学业。”她的这番推理是中国新唯物主义的表现，但她的考虑却和西方青年大同小异。西方青年正在采取晚婚和不要小孩的作法。人们更加关心自我，寻求自我实现。据兵说，前不久，一位朋友生下一小男孩，父母用英文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误生”。然而，兵还是清楚自己的立场对父母的伤害。尽管他们是党员，但仍是用传统观念看待问题。儒家思想早期最伟大的阐述者孟子曾说过，不孝有三，无后唯大。

不过，最令她父母震惊的还是得知她最近同另一男人有了来往。此人是她第一个心上人。那是文革期间，他们才十几岁。后来，他卷入了派别武斗，被指责为反革命分子，随后又逃到香港。兵对我说，“我恨他离开自己的祖国，认为他是叛徒，可我也爱他。”7年以后，他突然出差回来，携带着香港护照。而且还来看望过她。“好像7

年的时间根本就不存在，我发现自己对他仍然一往情深。”

更糟糕的是，她与丈夫发生了矛盾。接近30岁的美国妇女也可能碰到这些问题。兵说，“我发现我们成了两条道上跑的车。我开始意识到我想进步，想发展，想继续学业和去美国留学。而他所关心的却是如何做好工作，要我在他的朋友们面前看起来顺眼。”通过他父亲的关系，他在中国民航谋得了一个令人垂涎的职位。“晚上，我上床首先将被窝弄暖和，房间里太冷。……事儿一干完，他就呼呼大睡起来。”他们的爱好兴趣也发生了变化。丈夫喜欢看功夫影片，看布鲁斯·李的表演，这他可以在专门的“内部”影院里看到。兵却喜爱有关妇女问题的书籍。在她学校任教的一位美国教师借给她一本男女平等主义的小说《妇女的房间》。她要丈夫阅读，可他拒绝了。有一次他出差去西欧，她顿时感到“解放了”。“我的功课做得更好，老师给我的分数也高些。连同寝室的同学也注意到我轻松多了。”

随后，那位美国教师又借给她一本西赫的著作《岁月流逝》。“真是意想不到，我确实在经历一次危机，这本书正好向我指出人生的转折点。西赫所称的‘难以逾越的人生30’恰恰适合于我。”在兵的身上有一股永不静止的新活力。这种活力一直受到压抑。现在她感到有必要重新评价和重建自己的生活。据她讲，阅读该书并未使问题得到解决，却帮助她明白了正在发生的事情。

兵当时坐在我公寓里的长沙发椅上。那是元旦前一天的接近黄昏时分，我们一边谈话，铅灰色的冬季天空一边慢慢黯淡起来。我不想起身开灯，以免打断她的思路。外

而是建筑工地上的工人们正在燃放鞭炮，只只飞弹在空中开花，将红红绿绿的闪光投射在房间墙上。早该庆祝庆祝了。

我意识到，兵的经历是1949年以后中国整整一代人的经历。从儿时，她就是毛主席的红小鬼，把一生献给事业；然后文革的经历又使他们理想破灭；现在到了30岁，用中国话来说，她成了一个逍遥派。她和西方妇女一样，也走上了自我发现的道路，对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总要问个为什么。而且就她而言，在这一道路上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孤独的一步。

兵顺着自己的经历的线索进一步回忆说，她男朋友返回北京以后，很快就请她去旅馆共度周末。

“我确实不想与他干那事，可他说走后七年以来，从未考虑过别的女人，连碰也未碰别的女人一下。我对他很抱歉。”

哪知他们上得床来，她发现他是作爱的行家里手，懂得的东西之多，远远胜过于她。“他要求我做的事情，我不愿做，那些事很可怕。我是又惊奇又心烦意乱。我还感到做这事是对丈夫犯罪。我睡不着。清晨一大早我就离开那里往家赶。我哭了，丈夫因而发现定是出了什么差错。我把实话对他讲了。”

据兵说，那事把一切都改变了。“从那以后，他根本不可能再信任我。他并不是个坏人，他是无辜的。不过，我再也不爱他了。”

据她说，她丈夫的第一个反应是他失败了。在他一生中还从未失败过。他害怕人们取笑他。因为这是桩非常丢

脸的事情。他威胁说要去公安局指控她情人犯有通奸罪而将他逮捕起来。通奸在中国是一种要受到惩罚的罪行。他还骂她没有感恩报德之心，骂她没有报答关系户。这些关系户是她陷入政治困境时他全家替她安排的。

兵请求情人离开北京，以免产生麻烦，随后就以为他走了。哪知，一个月后，她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说他明早离开北京，还说永生不会忘记她。她很受感动，决心再冒险作最后一次造访，去向他告别。这是个不可违反的中国风俗习惯。

可是，当她敲他旅馆房门时，发现他正和另一位女人睡在床上。她吃惊，难堪，内心受到了伤害。而他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叫她到楼下餐厅，等一会儿同他俩一道吃早饭。

这次遭遇后，她感到左右为难。一方面，她不能去向丈夫诉说，这样做只会招来他的讥笑。另一方面，每晚他都要弄得她四、五点钟才能入睡。他很想知道她是不是真正爱自己。而她所想的却是入睡，把一切忘掉。他要求得到答复。如她说一个不字，说不爱他，他就会提出离婚。离婚一事将记入档案，也许还会将她获取护照出国留学的机会弄得粉碎。作为一种报复形式，丈夫早已把那事告诉她父母。她父亲劝告说：“离婚妇女抬不起头。人们都把箭对准你的后背，随时可以放。”

我问是否中国妇女也和今天的美国妇女一样，大多正经历这些危机。兵回答，是的。她的两位女朋友就同丈夫发生了同样的问题。

“生活中也有转折点。不同之处是，我们的活动余地

要小得多。我们比美国人更清楚人们对我们的期望。再就是我们的条条框框要严格得多，我们也明白要打破这些条条框框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通常都是得过且过。我们解决不了面临的危机。”

我离开中国时，兵和她丈夫仍在你争我吵。她找不到婚姻咨询人员，得不到精神病医生的帮助，也雇不到律师替她辩护。她使我想起19世纪一本悲剧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兵就像那位女主人公一样，倍受各种社会习俗的禁锢，不能获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因而变得意气消沉、灰心丧气。

离别的那天，她对我说，“我们应该把灯关上过日子。这样就不会把前面的生活道路看得太清楚。”……

第11章

固守家园的亿万农民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论语·子罕篇》

1948年，威廉·亨顿第一次到长弓村时，这个村庄才开始从许多世纪的中世纪般的贫穷和愚昧中苏醒过来。从前，如果收成好，农民得把大部分粮食交给贪婪的地主以偿还债务。如果欠收，一些农民就得卖儿卖女以求生存，其他的农民只好忍受饥饿之苦。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训练的接生婆用土制剪刀剪掉婴孩的脐带，婴孩发出声声惨叫，往往因患破伤风而死去。亨顿作为一个美国作家和农场主，把他在长弓村的所见所闻写进了他那本题名为《翻身》的著作，他不仅记录下农民的这种不幸血泪，也如实地反映了长弓村解放后的革命性的变化。威廉·亨顿于1948年底离开了长弓村时，刚刚开展了一场彻底的土地改革运动。运动中，地主要么被镇压，要么被剥夺了土地占有权，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

1980年，亨顿已63岁，他高个儿，总是乐呵呵的，脸上布满皱纹，一头雪白的头发。他此次重返长弓村一方面继续写作《翻身》的续篇，同时也帮助村民们发展农业机械化。后来他告诉我，这次重返使他仿佛觉得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从长弓村到位于中国西部中心的山西省其他村庄原来只有供骡车行车的小路，现在已被一条沥青公路所代替。这儿原来已有分割成小片的玉米和小米地，现在已有一条纵贯南北的铁路线。附近有一个机车修理车间，一家水泥厂以及有5,000名工人的锯条厂。还有将近三万工人正在建筑一条通向太行山区的从东到西的新铁路，很久以来，由于太行山的隔阻，这一带地区交通闭塞，颇为不便。

长弓村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村庄，而是一个叫做长治的新城市的郊外工业区。长治现在有30万人口，1948年，亨顿第一次到长弓村时，长治还是一个围有城墙的小镇，长弓的农民每周几次到长治赶集。在共产党的治理下，近三十年来，中国农村的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如长弓村以及长治市这样巨大的变化。亨顿把一绺白发向后一抹，带着长者那样的慈祥和为人敬爱的感情说，不过，长弓最显著的变化还是农业生产机械化所取得的新进步。在他的指导下，长弓村进行了一项大胆实验，50名农民被暂时闲置，由12位年轻农民组成一个作业队。他们负责开发一百多亩土地，从耕地、施肥到喷洒化学药剂，下种、收获以及晒干收成物等整个过程全部机械化。在中国的其它地区，机械化比传统的人力耕种需要投入更多的经费，因此，地方官员们持怀疑态度，长弓村的实践却证明地方当

局的这种看法不能成立。

“我们使产量翻了一倍，降低了一半成本，农民的收入已提高到工厂工人的收入水平，”亨顿说，流露出孩子般的笑意。他说这话时，边在我所下榻的旅馆房间里踱着方步，仿佛在丈量另一片即将耕种的土地。从他对长弓村农民所倾注的热情和同情中，我感受到，亨顿曾经在30年代所怀有的那种左倾主义理想，如今在中国的农村中我找到了用武之地。他总是那样随和，乐观，且让人感受到他非凡的才智。他说，就农业机械化而言，长弓每英亩的谷物产量平均为112蒲式耳，远远超出中国的水平，即便在宾夕法尼亚州他的农场里，每英亩产量也只达到89蒲式耳。

第二年春天，亨顿再次回到长弓时，他发现，由于农业机械化的结果，“全村处处都可以看到村民收获的玉米吊在树上，在几乎所有各种各样的平台和木板上。他们从来没有过这样好的收成。长弓是中国少数真正实现全部农业机械化的地区之一。”除此之外，农民还享有其它一些奖金。被新式农业机器所代替的那50位农民已被安置在当地工厂做工。

“令人难以置信，可他们甚至说，玉米吃起来还有甜味，”亨顿继续告诉我，“也许的确如此，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全部使用化学肥料。”以前，农民使用自家的大粪，露天的公共粪坑里的粪便以及猪粪。现在，他们还使用自己开办来的地方小厂里生产的钾肥、磷肥以及氮肥。使用新的肥料也是取得高产的原因之一。

“他们所说的甜玉米同美国的甜玉米并不相同。那种

玉米在美国被用来饲养家畜。”中国人之所以种植这种玉米，据亨顿解释，是因为这种玉米比甜玉米产量高得多，他们得考虑尽可能最大限度地获得高产。像中国其它许多农业地区一样，长弓的一些土地已被新建立的工厂所占。由于和平环境以及生活的安定，长弓的人口增长迅速。1948年，每一千英亩土地，有一千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占有一英亩土地，现在，大约600英亩的土地却要养活2,400人，按每人占有的土地算，只是全国平均数的四分之一。

为了增加更多的收入，现在，长弓村的农民在他们有限的耕地面积上大量种植蔬菜，向附近的工业城市出售。据亨顿回忆，1948年，农民食用的唯一蔬菜是从山里采集的一些野菜。那时候，农民的早饭是玉米馍，午饭主要也是玉米馍，只有在晚饭才吃用麦子做成的面条，如果那年的收成还好的话。现在，几乎每家都饲养了一头猪，有时候能吃到猪肉，这种情况在共产党政权建立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不过，亨顿却发现，就在他最近前去访问期间，地方官员虽然为他指定专人做饭，厨师却仍然不知道怎样烹饪肉菜。这说明，长弓人的饮食仍然图简单方便。

亨顿认为，长弓村今日的变化主要还得益于一位姓王的生产大队长。王39岁，聪明能干，出身于贫农家庭。五十年代，他曾随同一个建筑队在苏联工程师的指导下接受过训练。“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把卷尺，量这量那，而且做笔记，”亨顿说。因此，他干过多种多样的活——焊工，起重机手，电工，技术员，建筑设计员，不断掌握了新的技术。六十年代初期中苏关系破裂之后，王被安排回到长弓村当了一名电工，继而成为生产大队长。

长弓能取得引人注目成就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应该是亨顿本人。由于他的那本有关长弓的著作以及对在中国所怀有的几十年如一日的深厚感情，北京把他看作一位“朋友”，使他有可能会在数年间若干次访问长弓村，这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是罕见的照顾和优惠。他帮助王设计了一个谷物烤干机，用当地的煤作为燃料，还帮助王设计了一个中轴式灌溉系统。依靠同中国领导人的密切联系，他带着王到了山西省省会太原。“我们在当地农机研究所里发现了许多机器，上面的灰尘竟有半指厚，全被我们借用了。”事实上，这些机器一直被扔在一边，谁也没想到去使用它们。

亨顿说，长弓今年的机耕面积将增加一倍，会腾出更多的农民，以充实到长弓村的队办工厂，这将进一步促进全村的经济发展。

亨顿的叙述的确使我入迷。他是一位有幸被中国共产党人给予允诺和机会的西方人，以便细致观察从1949年以前直到如今的中国乡村发展过程。八亿人这个数字占中国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三，他们仍然生活在农村。这个数字之巨大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不过，大多数外国人，甚至许多中国人，对中国农村的情况可说一无所知。我抵达北京以后，不止一次向接待部门提出申请，允许我到某个村庄居住和采访，以便我能更准确地报道农民的情况。我甚至曾经受到一位美籍华人的邀请，这位女士同她丈夫一道在靠近香港的广东省故乡的一个村庄进行了社会学方面的调查工作，已经为时一年。他们在村子里盖了房，欢迎我住

到他们家里。他们还买了一辆小车，可驱车接送，这样，我将不会给地方当局增加麻烦。然而，我的申请被打回来，理由是“不便安排”。似乎中国农民本身存在着某些秘而不宣的事。而政府则千方百计想加以掩盖。

尽管如此，我仍然设法访问了若干公社，时间一般是两到三个小时。这种参观是专门为外国人安排的，地方官员作简短情况介绍，在农民家里作短暂停留。不过，每到之处，当地公社的经济发展都超出了平均水平。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每个农民参加集体劳动所得的平均收入，1980年相当于57美元。但在我访问过的12个公社，每人的最低平均收入是87美元。其中的若干公社则超过200美元，上海附近的一个公社宣称已达到540美元，几乎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0倍。对于习惯于以数万美元来计算工资的西方人，这些数字也许微乎其微，不值一提，但对于中国人却意义重大。这足以说明，我所见到的是中国农村中最富裕的、最繁荣的地区。四分之一不到的中国生产队如我上面提到过的一样，每人的平均收入超过67美元。一半的生产队平均收入约在33美元和67美元之间。剩下的27%的生产队每人平均收入低于33美元。宁夏自治区位于中国西北部，土地贫瘠，该省的泾源县农民的每年平均收入，据共产党理论刊物《红旗》报道，每年只有10美元，居中国各省最后一名。这个数字大大低于北京所规定的最低生活费，即每年收入27美元。

远比这些货币数据更为重要的是，农民从他们的劳动中所获得的粮食数量。因为每到年底，收成之后，就得进行分配，大多数生产队农民都直接以粮食来代替实际收

入。如果生产队有余粮出售给国家，或者有诸如砖瓦窑或果园之类的小工业和副业，农民才可能指望得到现金。因此，北京用来衡量农民收入的货币数字不能说明问题，反而容易引起误解。这是一种基于农业生产的不切合实际的指标。如果生活水平以粮食数量为依据，据北京估计，农民每年至少应该得到330磅的小麦或大米，这意味着每天可产生1,500大卡的热量。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用来测定营养不良的临界标准是1,600大卡，中国农民每天应有的热量显然比上述标准少100大卡。1979年，在香港出版的一家刊物曾报道“有2亿中国农民每年消耗的粮食低于人均330磅。这就是说，他们处于半饥饿的状态。”

这些数据表明，幅员辽阔的中国农村决不处于同一生活水平线上，而是情况千差万别，且差别还相当悬殊。有的正日益富裕，而有的仍贫穷依旧。中国的一些农村，如长弓，已象加利福尼亚大河谷农业社区一样富足，但也有像阿巴拉契亚山区那样的不毛之地。威廉·L·帕里希和马丁·金·怀特1978年发表了他们极有见地的研究著作《当今中国的农村和家庭》。据他们估计，在位于中国南部的广东省，最富裕的五分之一农民人均收入之和占农民总收入的37%，而最贫困的五分之一农民人均收入之和只占农民总收入的9%。以上数据表明，贫富差距比印度、洪都拉斯或者菲律宾的农村稍好，但远比台湾、南朝鲜、或者埃及更甚。生活在公社中的农民不可能保证人人贫富相等。

较为富裕的农村一般是因为自然条件优越，要么是土地平坦而且肥沃，要么位于河谷，水源充足。有的地处城

市周围，农民因而获得了可以谋取更多经济收入的市场，而且农民又能在城市里运回充足的大粪给土地施肥。长弓的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提高也正是依赖于其地利。最穷困的农村多为山区的穷乡僻壤以及中国北部平原，这里经常发生旱灾。也包括中国的西北地区。像延安、井冈山这样的一些老区至今仍然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30年代，正是由于这些地区的落后，羽毛未丰的红军游击队才能在这儿建立根据地。

在美国和欧洲，雨量相对地充沛、稳定，因此，美国人和欧洲人很难理解中国气候的恶劣，会带来怎样毁灭性的后果。1972年，我曾陪同中国新闻记者在美国参观、访问，他们告诉我，令他们最惊奇的景象是，在伊利诺斯州渥太华附近的一个农场，他们看到成百英亩的一片玉米地。农场主是艾德里安·派克，体格健壮、魁伟，喜好交际。我们站立观看已成熟的绿色玉米秆，其高度甚至高出中国记者的头顶，一位中国记者转身向派克发问，神情颇为困惑。

“你怎样灌溉田地？”他说。派克应声回答，十分随和，他唯一依靠的方法是降雨。我留意到出现在中国记者们脸上的那种难以置信的表情。因为对中国农民来说，无论是水稻，小麦、玉米，或棉花的灌溉都离不开灌溉渠，这些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子。

我因为未能获得允许去访问中国农村中经济不太发达地区，只好引用其他人的有关材料。70年代中期，一位在学术界颇有名气、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曾经到河南省的一所五·七干校劳动了若干年，这所干校位于一条河谷。他

说，1975年他正在干校时，曾经发生过一次特大洪灾。中国的报纸对此事从未报道过一字半句，但他从一份内部报告中获知，30万人死于这次洪灾。这位经济学家说，从历史上看，那个地区一直是中国最穷的地区之一，“每年灾害不断，不是旱灾便是洪灾，农民对此记忆犹新。每家每户的房屋都用泥土建成，这样即使房屋被水冲走，也不至于损失很大。”

金山是中国湖南省的一个山村，文化大革命中，我的中国朋友力华曾被送到那儿落户。上小学最近的路也要花去半天时间，农民因此不愿让孩子上学。她告诉我，一直到最近，农民甚至没有见过拖拉机。不久前，生产队长买了第一部手扶拖拉机，虽然大小和功率并不比割草机大，农民们都兴高彩烈，他们叫拖拉机为“铁牛”。但开动使用了一小时后，拖拉机再也无法正常启动，使农民们疑虑丛生，气急败坏。“一些农民甚至动了怒，开始用棍棒猛打拖拉机，”力华说。第二天，从公社来了一位技术员，检查后发现，原来拖拉机的油用完了。

中国人告诉我，在少数省份，一些公社非常穷，以致于在农闲季节，公社竟然大开绿灯，开出大量证明给农民，允许他们去城市乞讨。在宁夏自治区，农民的平均收入每年只有23美元。在县城工作过的一位医生说，几乎是定期地，总有一些要饭的农民到他家乞讨。“他们大多数是妇女和孩子，他们所在的公社给准备了证明，上面写道，准许他们出外乞讨。有这种证明，他们不会被警察抓去或驱逐。他们在家里根本没有足以保证温饱的粮食。我所知道的一些地区，每天每人只能吃到三两粮食。生产队

便把这三两粮食给那些能在田里干活的男人。”

有一次，这位内科医生随医疗队来到宁夏回族居住的一个公社。“老百姓全都躲在屋里，不敢出门。最初我以为他们害怕见人。当我进了屋才发现，他们满脸，甚至全身上下找不到一处干净之地，他们太穷了，只好赤身露体。”

诸如此类的经历使我明白，人们之所以对外国人访问农村十分敏感，正是因为农村的情况既可说明中国革命的胜利，同时也意味着种种悲剧。中国不同于苏联，苏联布尔什维克很快便在城市里取得了胜利。而中国共产党人却组织生活最苦的农民参加游击队和红军，经过漫长岁月的艰苦战斗才夺得了政权。解放后，毛泽东并不否认农村的重要性，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因此强调农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然而，自从1949年以来，在农村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政策上也犯了一些愚蠢的失误。优先发展城市，严重忽视农村经济，使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令人震惊地日益扩大。的确，一些农村地区有引人注目的进步，然而，出乎许多外国人的意料，同城市以及较为发达的一些农村地区相比较，更多的农村地区并不比以前的情况好些，甚至可以说还更为落后。对这些地区来说，革命并没有使它们得到真正的解放。

由于农村的组织机构得到改善，灌溉系统增加，以及更多地使用化肥和良种，过去30年中最显著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成功地把粮食产量翻了一番。但由于同时中国的人口也几乎成倍增长，按人口计算的每人平均占有粮食却仍然处于同样低的水平。据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厄

可拉斯·拉狄的估计，到70年代末的每人平均农业产量，实际上并不比二次世界大战前的30年代早期高。

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也实行了已有极大改进的公共医疗和保险制度。他们广泛地进行了免疫法宣传，说服农民清除房屋周围的垃圾。在50年代还开展了消灭“四害”（即老鼠、苍蝇、蚊子以及吃粮食的麻雀）的群众运动。1949年以前，由于战事不断、盗匪猖狂、饥荒严重以及瘟疫流行，农民的平均寿命只有20到25岁。到70年代中期，据两位美国专家的仔细研究，农民的平均寿命已提高到64岁。因此，自从解放后，中国每年的平均寿命增长率为一年半，比较其他发展中的大国，如印度和巴西，这个数字为最高，只有台湾和斯里兰卡堪与之相比。

婴儿死亡率是判断生活条件已改善的另一有用的指标。1949年前，每1,000名新生婴儿大约有200名死亡。到1955年，死亡数字已降低到每1,000名新生婴儿中只有74名死亡。而到70年代中期，其比例是每1,000名新生婴儿中只有35名或40名死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不过，一旦北京的指示失误，即使是推动了以上进步的同样的纪律和组织才能，也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种被中国共产党人称为“命令主义”的最严重的例子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当时，试图让中国在一夜之间进入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因此，不遗余力地加强公社制度，建立公社食堂，在院子里立起炼钢炉，所有私人财产充公，向农民保证提供食物、衣服，甚至包括理发。“我目睹了群众中所焕发出的巨大能量，”毛泽东在同年9月的一次视察农村之行结束后这样说。“依靠群众的这种热情

和干劲，我们可以完成任何任务。”但继之而带来的灾难从来也未向外界披露。不过，1980年由北京发表的材料表明，在由大跃进所引起的三年粮食匮乏的年代里，比平常多死了1,650万人，极有可能是由于缺乏营养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影响所致。

在这场人为的灾难中，人们不得不停止发展在1958年建立起来的并且达到鼎盛时期的人民公社组织。人民公社应成为当地农村政府的一级行政机构，而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最初的本意。实际上，真正的农业生产单位是生产队，这对于农民是极其自然的事，因为大多数生产队是以1949年以前的村庄为基础组建起来的，是农民通报劳动情况，安排劳动任务的组织机构。眼下，中国有500万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平均有30到50户，约为150人到200人，耕种着15英亩到100英亩的土地。一个生产大队一般有大约450户，约2,000人。全国共有50,000个公社，每个公社平均有16,000人。当然，公社的大小差别很大，依当地的地理条件而定。对大多数农民来说，公社是一个模糊的、没有多少切身关联的组织。公社所在地一般设在能够赶集的乡镇上。在农民们需要看病，而生产队的赤脚医生又无能为力时，他们才到公社去。农民的孩子倘若走运，才能到公社的高中学校读书，或者他们需理发以及请木匠时，也才到公社走一趟。多年以来，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试图赋予公社以更大的权力。他坚持认为，公社比之生产队是更为高级的一种共产主义社会形式。然而，他却未能如愿以偿。现在人们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甚至生产队这种组织形式也似乎过于庞大，不能充分提高劳动效率。他因此

允许一些生产队再划分成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组，以便更有效地从事农业生产。

红军时期的共产党人在农村取得了胜利，50年代的共产党人在发展农业方面也获得了成就，因此当中国人告诉我有关于干部滥用权力的经历时，就不能不使我倍感惊讶。一位美国人同华北平原河南省的一个姑娘结了婚，他对我讲了发生在他妻子家乡的一件往事，上级下令要当地农民在冬季农闲期间平整所有的山坡地。公社党委书记从每家抽出一人组成突击队完成这项任务。开初，他们干得很卖力，搬掉土质极好的土壤表层，放到与之毗连的田地上，然后平整多坡的田地，再搬回表层土覆盖上。可春天即至，十分明显的是，他们不可能按时完成任务，干部命令所有人拼命加速干活。土质好的表层因此被随意翻到下面。

“这意味着连续四年不会丰收，”一位当地农民难过地告诉这位美国人。然后，他盯着我问：“告诉我，在美国，政府怎样组织生产？”当他得到回答说，美国政府从来不予干预农民的事务时，他简直难以置信。

许多年来的这种瞎指挥以及长时期的干旱，导致了粮食严重缺乏，农民不得温饱。因此对干部相当反感。1976年，这位美国人携妻子前往家乡访问时，他们万分惊奇的是竟然从郑州开始就有武装人员陪同。持枪的二位警察乘坐一辆吉普车行驶在他们前面。他们问为什么要派来警察，一位当地干部解释说，几周以前，在公路主干道和通往村子的公路交叉处，土匪们曾经抢劫了一些农民。“不过，现在土匪并不像几年前那样厉害，”这位官员肯定地补充说。

这位美国人发现村子里日子过得最好的是这样一些农民：他们干最苦最重的活，工分挣得最多，每天可以吃上一顿大约只有两英磅麦面做成的食物。一周一次或二次也能吃到一些盐渍蔬菜，或许一个鸡蛋。每月一次他们可以买一小块肥猪肉。美国人同他的妻子在村子住下后，每天早晨，警察用吉普车给他们送来特意准备的食物。作为一种礼仪，美国人的姻亲为地方官员办了一次宴会。警察又送来了格外的食物。餐桌摆在院子里，房屋四周有泥土筑的高墙。

“农民们十分好奇，也确实饥饿难忍，他们爬上墙顶，伸头观看，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在他们看来是可口的食品。”美国人回忆，“餐桌上摆着三碗不同作法的肥猪肉，我根本未动筷，可干部却吃得津津有味，好像猪肉是香蕉片似的。”

最后，也是最好的一道菜是一条鱼。两英里以外便是黄河，附近的许多田地有鱼塘。后来，美国人问农民，他们什么时候吃过鱼。农民们纷纷摇头，回答已经记不清楚。并说：“只有干部可以捉鱼。”

北京的一位搞工程的教授和学院的其他同事一道下放到河南省某地的一所五·七干校劳动，时间是70年代初期。使他难以忘怀的是，农民和公职人员之间存在的悬殊差别。虽说他同其他教师以及行政人员到农村是“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农民住在泥土建成的土墙矮房内，而我们却自己建造有水泥地面的砖房。我们配给肉、食油，但农民却没有。”

“我们到地里劳动时，如果不留下人照看寝室，农民

的孩子便会溜进屋里偷东西。有一次，我把自己的防水长统靴放在窗台上吹干，回来时却发现鞋已不翼而飞。”

他回忆说，收获时节当地成群结队的妇女和孩子会来偷盗五·七干校的粮食。后来，学校奉命解散，教授赶回北京。农民随即闯入干校所在地，拿走了可以带走的任何物品，诸如砖、木板，甚至照明装置。“一排士兵奉命守卫干校，可是他们不敢开枪，无法阻止。”

令人费解的是，共产党未能在农村成功地实现更多平等的另一个原因，恰恰是因为竭力主张平均主义。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70年代早期和中期，曾不遗余力要在农村中根除个体私有制的最后残余。对于农民自留地以及农民所产余粮和自己饲养的猪、鸡之类，不得大力经营和上市出售。说这是资本主义痕迹，听任它的存在会进一步扩大农民收入的差距。不过，事实证明，凡是自留地取消和农村市场关闭的地方，农业生产每况愈下，农民收入急剧减少。平均主义和经济效益并不是一回事。

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坚持“自力更生”带来了不良后果。当时人们主张，每一个省都必须生产出能满足其需要的所有粮食，不能依靠其他地区提供小麦和大米。这是30年代游击战争经验的必然结果。然而，随着60年代中苏冲突的恶化，认为奉行这种政策是减少中国遭致苏联进攻时损失的战略计划的一部分。问题在于，一些地区更适合于畜牧业或种植经济作物，如棉花、甘蔗，尽管可能一直是缺粮区。但是，由于硬性贯彻执行地区自给自足政策，北京贮存的粮食越来越少，运往粮食低产和缺粮区的粮食也大大减少。据拉狄教授估计，到1977年，政府运

往缺粮区的粮食甚至比20年前还少，虽然总产量几乎翻了一倍。拉狄教授举出一例说，湖南省位于中国的中南部，盛产稻米。到70年代末，湖南省分配给每个农民的粮食比宁夏竟多出三分之二。气候干燥、以畜牧为主的宁夏各牧场成了一个尘土飞扬的大盆地。其结果是，从全区范围来看，每人所得粮食平均只有334磅，刚刚超过粮食供给最低标准的330磅。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人们坚持认为粮食生产是农业成功的关键措施，正像苏联把钢铁产量的高低作为工业强大的标志一样。“以粮为纲”，毛泽东始终强调这一点，因此全国各省、区的生产队，甚至包括那些以前大量种植大豆、食油等的生产队也必须改种粮食。拉狄教授的结论是，由于这种政策，这些极有营养价值的食品的人口平均占有量，已从1956年的最高纪录下降了30%到50%，这自然更加剧了农民的饥饿状况。

尽管共产党人的主观愿望是把农村的发展摆在首要地位，但比之农村地区之间的悬殊差别以及共产党在农村政策上的失误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些政策并没有能够缩小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城市和农村的对比触目惊心，它们之间的差别并不始于今日。置身于北京，我所看到的是宽阔的大街，堂而皇之的政府机构以及人群熙攘的商号，这容易使人忘记大多数中国人是怎样生活的。然而我却不能忘记的是，有一次正值春耕时节，我在福建省东南沿海的一个村庄所目睹的情景：天气闷热，绿色的稻田重重叠叠，正午的太阳照耀着明镜般的水田，刚插秧的水田一片碧绿。年轻的农民肩上压着起伏晃动的竹担，竹担两头各挑着一

个盛粪便的木桶。他们在稻田之间狭窄的土堤上行走。一会儿，他们赤着脚下到未插秧的稻田，将粪便倾倒出来。刺鼻的臭味弥漫在周围的空气中，这正是农村最常见的生活，部分肥料取自农民自家的厕所，其余的肥料则来自村里的猪厩。在中国农民的生活中，猪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这可以从中国农民家庭中的年画中看出。在水田里，其他农民正弯下腰，一步一步地向后移动着插秧，这种动作重复得难以计数，可算是世界上人类最大的体力消耗。

四个十多岁的女孩，黑色的并不合身的裤子卷到膝部，正站在木制的脚踏水车上将水提到另一块田里。当我向她们走近，打算相互交谈时，她们向我微笑，甚至笑出声来，但没有一个女孩讲普通话。她们讲的是福建土语，这说明，她们没念过多少书。因为学校里统一使用普通话教学。在我驱车途经福建省的整整一天中，我只看见极少的拖拉机，大多数都用于运输砖块、稻米，或者被捆绑的猪只。耕地仍然是男人的事，他们用水牛。农村的生活节奏远比城市生活慢得多，可劳动却更为艰辛。

对那些习惯于农业机械化概念的美国人来说，他们很难明白中国眼下的农业是何等原始、劳累。邓小平在1978⁸年的一次讲话中透露，中国每个农业人口的年产量平均为2,200磅。邓小平指出，在美国，每个农业工人的年平均产量是110,000磅，相比之下，美国要高出中国“好几十倍”。

我还记得有一次在中国中部的安徽省登黄山时的经历。怪异的山峰、松树、云彩使黄山成为中国人向往的自然奇景之一。自从八世纪伟大诗人李白在诗中描绘了黄山

梦幻般的美色之后，朝拜黄山一直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夙愿。为了方便成千上万前来登山的中国和外国旅游者，政府正在扩建若干峰顶旅馆和餐厅。然而，由于没有公路，所有的水泥、木材，以及建筑材料、部件、设备等等都得用人力运到山顶。我从脚夫身旁走过，他们大多数是不到20岁的男女青年，有的甚至只有十几岁，来自云雾中的黄山脚下各村庄。

我在一处平地停下喘口气，一个15岁的少女从我面前走过。她背上负着八十磅重的粮袋，两条又长又黑的粗辫摆动着。粮袋的重量一定超过了她的体重。额头上冒出颗颗汗珠，她的蓝色土布上衣全湿透了。她说，为了躲过正午的炎热，她在凌晨五点便已动身。

过去，中国农民所必须面临的极不公正的现实是，他们的劳动比土地还不值钱，强壮的体力比肥沃的土地更为低廉。共产党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保持了这个传统。在农村劳动过的朋友们对我说。在计算农业生产的成本时，公社会计没有将人力成本计算在内。

30年代的统计表明，城市与农村的收入之比是二比一，但从朋友们的谈话以及有关数据看，我能肯定，现在城乡收入比率的差距只会更大。由于政府所提供数据的方式，进行确切的比较相当困难。在1980年，不包括被赡养人在内的城市工人年均收入为508美元，农村人口年均收入为57美元。加上自留地种植的蔬菜，养猪、或编织草帽之类的副业收入20美元，总共为77美元。这两种统计数字实际上还应缩减，因为城市职工的收入还得供养大量无收入者。对农村而言，经济学家认为，政府使用粮食

的价格来计算农民收入的方法过高地夸大了农民的实际所得。如果减去这些因素，1980年城市人口人均收入为276美元，农民的年均人平收入大约为58美元，城市收入与农村收入之比是五比一。

然而，城市和农村的真正差别还不仅在于收入的数字。农民的生计仍然操在天气的手里。一旦发生洪灾或旱灾，生产队的收成会减产，农民的收入也必然随之降低。城市工人有固定的工资，工作也得到保障。1981年，国际救济组织官员第一次应北京邀请去调查在中国北部河北省的旱灾以及中国中部湖北省长江流域的一次水灾情况。他们估计，在总共九省的范围内，约有一亿三千万人口缺粮，而且报告说，儿童普遍患有软骨症和贫血病。

在城市，政府提供免费教育、公费医疗、老年退休金以及低房租的住房。据政府的统计，政府花在每个城市人口上述诸方面的开支每年总共有351美元，比城市人口的平均收入高出一倍多。在农村，确实建立了遍及各地的学校和卫生所，但不同于城市的是，生产大队和小队得从自己极其微薄的收入中支出较多的部分，才能使用上述设施。这是因为50年代政府便作出了决定，集中大量国家资金用于建设工业，农村必须支援城市，尽管共产党一再宣布，要重视农业。

据力华回忆，金山的农民得每年花去4美元的学费，以便送孩子进只有一间教室的小学。这是地主从前曾经住过的房屋，如今已摇摇欲坠，破烂不堪，窗户空空，屋墙倾斜。没有书桌，甚至坐凳，学生只好蹲在泥土地面上，要不就自己带坐凳。教师是一位附近农村的女青年，只念

过高小。没有课本，她自己准备的教材则要花去学生大约2美元。这些开支看起来微不足道，然而却占了农民全年收入的四分之一，因而这种高学费使学生的数目锐减。去公社唯一的一所高中，要走四小时，农民的孩子去上学还得为教室和食宿多花去一笔额外的钱。力华所在的生产队有一所由一名赤脚医生或称为初级医护人员负责的初级卫生所，或称为医疗站。按照合作医疗计划，农民每年得付2.67美元。但力华的一家却无权享受这类医疗设施，因为他们被划为地主，如果到卫生所看病，得付全部医药费。农村里没有像城市那样实行国家补贴住房费之类的措施，农民得自己建房。

像金山的这类极其缺乏经费的农村学校简直不能同由国家提供资助的城市学校相比。城市学校的学生因此更容易升入大学。报纸曾经透露，每10个公社只有一个大学教育水平的人，也就是说，每1.6万名农民和农村干部中，大约只有一名具有大学学历。

一位农村党支部书记的女儿进了大学，并分配在北京工作。她告诉我，她所在的农村小学成绩最好的学生是一位农民的儿子。“他聪明极了，”她说。“我已在三年级，因为他的父母很穷，要他一直呆在家里干活，因此他没能读一、二年级。但他跳级到我所在的班上唸书，很快就能读书写字，总是得最高分。”在五年级时，他却不得不辍学了，因为他的父母无法再付学费。

农村不受重视还表现在其它一些方面。根据中国选举法，农村地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数额只是城市的八分之一。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橡皮图

章，尽管如此，农民入党也相当困难，而党是中国权力的核心。有一次，为了进行比较，我留意到中国南部城市福州的一家有836名职工的漆器厂，共有93名共产党员，比例是10名职工中有一名多党员。然而，在该市郊区的葫芦镇生产队，634名成年农民中只有15名党员，平均40人中还不到一名。拉狄教授估计，从1956年到1978年，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每人平均粮食消费量有所减少，在农村降低了5.9%，而在城市却增加了1.5%。这是由于政府重视城市地区的决策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政府对城市所采取的优待政策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是秘密。50年代，北京还没有执行通过户口限制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几百万农民如潮水般涌入城市。中国朋友解释，中国当今最大的划分是把人口分成“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农民属于农村户口，依靠在田地里劳动所得的很不稳定的工分维持生计。但公社一级的基层干部却有令人称羨的“非农业户口”，不管收成如何，领取固定的薪水。对于许多农民来说，最大的愿望是让家中的一个成员去当干部，从而成为非农业人口阶层中的一员，也就会享受各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反过来，政府却采取对策企图阻止这种情况发生。根据中国极其错综复杂的成分划分政策，一个人的阶级成份依父亲而决定，如地主，资本家，贫农等。但是他的户口却随母亲。因为被选拔当干部的男人比女人多得多，干部虽然具有非农业户口，但他们去世后，他们的孩子依然是农民。

脱离农村的另一办法是到城市当一个高级干部家的女佣。兵是一位将军的女儿，她在文化大革命中揭露过父

亲。她说，她家曾经雇了一个18岁的农村姑娘，这位姑娘的家乡也是将军的老家。实际上，姑娘是将军若干年前的一个亲生女儿。姑娘生性腼腆，身板子很结实，到北京以前从来也没有看见过，或听见别人讲过飞机和铁路。她现在的父亲在她来到北京不久便死去，但是父亲在一封信中安慰她：“我虽死而无憾，因为我终于设法使我的一个孩子有了城市户口。”

多数西方汉学家赞赏北京没有遵循斯大林的模式，为了刺激中国的经济增长而牺牲农民的利益。他们还特别注意到，农民应交的公粮一直处于50年代制定的标准上。随着粮食产量的增长，公粮比率实际上已下降，现在大约是占每个生产队年收入的3%到8%。政府要求农民出售给国家更多的余粮，价格由国家另行规定，农村因此可以得到一笔收入。为了给农民以实惠，出售余粮的价格在过去几年里提高了好几倍。

1976年后，北京更为坦率，发表了更多的经济统计数据，允许少数外国专家对公社进行实地研究和调查，政府同农民的关系中一些前所未闻的情况因而被透露出来。这些研究表明，像莫斯科一样，北京有计划地对农村实行了强硬手段，以强化工业化。当然，这些手段往往不易察觉。

拉狄教授作出结论，尽管国家制定的粮食收购价格最近有所增加，中国农民实际上从出售粮食中所得收入在亚洲国家中最低，特别是与他们必须向城市付钱才能得到的工业品的价格相比更是如此。这些工业产品包括拖拉机、化学肥料以及电力。一台小型的12马力的拖拉机，大小如割

草机，国家规定的出售价格是2,000美元；一台中型的75马力的拖拉机售价为12,000美元，这使生产这些产品的工厂获取了高额利润。农民的农业收入同他们必须为购买工业品所支出的收入之间这种价格上的悬殊，实际上极大地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政府之所以对把农产品的价格提高到更为合理的符合实际的标准迟疑不决，是因为这会危及多年来靠固定工资为生的城市居民的利益。而人们一向担心，城市居民更具有敏感性，更难以控制。共产党执政的30年来，供应城市消费者的粮食价格从未上升。我所认识的大多数中国人认为，稳定的粮价是政府取得人民信任的象征，是履行政府神圣职责的一种保证。然而，为了保持粮食出售价格不致于提高，政府不得不为城市居民每年补贴大约46.7亿美元，占1981年政府收入的7%。当然也给予农民补贴，但是即使有这种补贴，多数农民仍感到他们受益甚微。如果他们在农村的自由市场出售粮食，仍能比出售给政府所得到的收入高70%，由此可以知道粮食的实际价值。

由于中国已经开始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农民更多地需要价格高昂的工业品，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这使问题更为严重。在北京附近的河北省，美国学者斯蒂文·巴特勒获准在一个公社生活过一段时期。他发现，农民的用于农业的花费在70年代早期占其总收入的20%到30%，而到1980年，增高到50%。“城市在掠夺农村，”巴特勒说。农业成本增长如此之高，他认为，农民从集体种植的作物中所得到的收入实际上是负数。他们能生活下去所唯一依赖的是搞副业，他们可以种植其它农作物或从事其它收入可观

的劳动。

同时，政府用于农业的投资比西方经济学家估计的要少得多。农业投资依靠两条渠道：一是政府允许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支出集体储备金，另一是国家拨款。最近公布的数据表明，政府允许生产队提留的储备金在1978年达到42亿美元，这是最近一年的可靠数字。虽然这些年来农民的人口已从4亿5千万增加到8亿，但以上数字却相当于1956年；这意味着生产队只能为每个农民积下大约5美元，仅相当于两把锄头的价格，显然这笔钱很难使农业现代化。至于国家的拨款，在有争议的统计数据中，北京未提及用于农业的投资数，不过，拉狄教授估计1978年不到53亿美元。这两笔投资的总数也仅仅73亿美元，因为农业总产值1978年仅为710亿3千万美元，投资的比率约占10%。相形之下，北京1978年用于工业的投资差不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7%。这意味着，工业占用了大量的资金，这种极端悬殊还提醒人们占中国人口80%的8亿人是农民。

现今的中国领导人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扭转这种不平衡。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的地位举足轻重。他说，党中央决心制定新的开放计划以加速农业的发展。会议同意提高农民出售粮食的收购价格，肯定曾经有所争议的自留地和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允许农民有更大的自由来决定他们拥有种植何种作物的权利。1980年，北京走出了更引起争议的一步，允许一些贫困的生产队的农民耕种自己的土地，废除了集体劳动工分制，允许农民获取在定额之外的剩余劳动收入。在许多地区，初步效果极好。在斯蒂文·巴特勒调查研究的河北省的公社，

他发现农民的生活，已经开始了历史性的变化。“他们不再为下一顿饭发愁。”1980年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从50年代的330磅提高到550磅，还不包括从自留地收成的90到100磅。过去，他们种玉米以及红薯，现在他们种麦子，这是从粗粮到细粮的转变。

巴特勒继续写道，“农民第一次开始考虑用自己挣的收入购买消费品，如新房、衣服、手表、自行车。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在当地的信用社存款。生活确实变了样。”

他访问过的公社的多数生产队还购买了黑白电视机，放在门外的金属架上，人人都可以看。“这给农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晚上有事可做了，农民们开心极了。有些较为富裕的农民想自己买电视机，但没有谁愿意带头，因为一旦有电视机，邻居会挤满屋。”一个富有的生产队集体作出决定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等到每一家都有足够的钱来买电视机时便同时行动。按照巴特勒的估计，公社的农民已开始步入了被经济学家称为经济稳定增长的起飞阶段，正如日本、台湾以及南朝鲜的农民已经完成的那样。

不过，尽管巴特勒访问的公社出现了新的繁荣，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却认为，北京在刺激农业的发展方面还走得不够远。政府没有能将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两项保证兑现：降低出售给农民的工业品价格15%，增加国家对农业的投资10%到18%。

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北京准备面临风险让城市的消费者付出更为合理的粮食价格，而只有合理的粮食价格才会真正刺激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除非政府继续在农业上投入更多的资金，每年的农业产量增长率仍将徘徊在2%

到2.5%之间，这虽然超过30年的平均增长率，粮食仍将是中国的一大难题。表明这种困境的是，从70年代末期开始，粮食的进口量已增加，到1980年已高达前所未有的1,370万吨。几乎所有的进口粮食都用于城市居民消费。

如果说过去的路线政策给农村带来了很大麻烦，那么，农民也更具有忍耐性。农民的思想更具有传统色彩，更加固守古老的习俗和生活节奏，也比城市居民更加以家庭为核心。这实际上使农民有一定的自主权，一种同政府疏远，不完全听命于政府的自由。

现在农村的组织形式本身就是人民公社同旧的村庄、家族以及街坊制度之间的妥协。毛泽东一直希望使人民公社成为基本核算单位，即一群人共同劳动而且分享劳动所得。但是，大跃进中使这种组织形式证明行不通，因此，农民接受了生产大队这种组织形式，生产大队以原有的村庄为基础，组成基本的生产单位。这意味着，生产大队的干部是在当地工作的本地人，如果不是本地人，也是农民的兄弟、叔侄一辈的人。由这些拥有血缘关系的人掌权，使中国农民能够接受集体耕种方式，也加强了农民对生产大队公益事业的兴趣。同时，还使农民能对地方官员和政权产生一定的影响，而这对城市居民来说，是无法办到的。

一位快到30岁的妇女，曾被送到四川的一个乡村生活了六年。她回忆这段生活时谈道，农民怎样利用同生产大队领导人的亲戚关系办事。法定年龄规定，男子23岁、女子21岁才可以结婚。尽管有这种限制，每年仍有若干16岁

成17岁的青年男女结婚。

他们必须从生产大队领导那儿持一封介绍信到公社办公室方可办理结婚登记。这位妇女说，“每个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亲戚关系，干部无法拒绝。”这是运用“关系”的又一例。只要同生产队领导或会计有关系，如果生病，也能很容易地获得额外工分，也能轮到购买自行车的排队登记。而在城市，这种权力却掌握在机关、工厂或学校的党委书记手里。这位妇女指出，在城市生活，要想办事需要更多地打算盘、动脑子。

据她回忆，乡村的政治压力较少。多数家庭都属于同一家族，生产大队长往往也是其中的一员。她去那儿的生产大队长，时年49岁，受人尊敬，勤劳肯干，却急于想辞职。他抱怨说是花去了很多时间在生产大队的杂务上，但却没有额外报酬，由于他履行公务，没有时间去种自留地。像全中国所有的生产大队干部一样，他不领取国家的固定薪金，而领取以工分计算的报酬，但还得同农民一样下地劳动。生产大队每年大约开二次具有政治内容的会，而且常常在晚上开，农民在一天的劳动后已疲劳不堪，对这种会十分反感。如果这种会在白天开，农民则要求用工分来补偿他们被占去的时间。

“大多数时间，除非干部宣读北京发下的有关农业方面的文件，农民们毫无兴趣，不知所云。”

农民的婚俗仍然保持着最传统的方式，家庭的古老作用仍然继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1950年制定了婚姻法，他们指望废除出于经济考虑由父母包办的婚姻，主张男女青年自愿结合成婚。然而，1980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提供

的一个关于农村妇女情况的内部调查表明，农村中75%的婚姻仍然并非出自自由选择。这份文件透露，由于大多数农民的全部时间都在他们所在的村子，“能够认识其他村庄的人的机会简直太少。”在只有同一家族的村子，禁止近亲男女结婚，而且农村世袭的观念是，青年男女自己找对象是错误的，必须通过介绍。这份研究报告指出，农村的婚姻有一点是前进了一步，即过去的许多包办婚姻完全是盲目的，在举行婚礼以前，双方甚至从没见过一面。现在，他们可以在村子里的茶馆里或在未来的新郎家中，由介绍人陪同见一面，双方的父母有权拒绝。

在香港寄居的一位年轻人谈到他在广东省的一位叫王国英的表弟至今未结婚。王国英25岁时，父母为他请了一个介绍人，这位介绍人在附近生产队替他物色了一个中意的未婚妻，个子高，身体结实，是一个全劳力，能挣高工分，而且她的家庭出身是贫农，这两个条件极其重要。用老农民的话说“门当户对”。

只有一个条件，她的家庭要求给彩礼1,000元，三分之一用现金，其余用粮食、衣服以及珠宝支付。这笔款相当于王全家两年的收入。经过讨价还价，彩礼有所减少。而当王家从当地信用社借了很大一笔钱，又从亲戚那儿借了些钱时，价钱又提高了。

各种买卖婚姻是婚姻法所禁止的，但是中国朋友告诉我，买卖婚姻在农村却经久不衰。帕里斯和怀特在他们的书中谈到农村的情况时说，新郎家的破费从解放前占全家收入的二分之一，实际上已提高到现在的全年收入。其中一个原因也许是，现在农村妇女比解放前更多地在地劳

动，她们的经济价值已经增加。

这位青年人还谈到，有一次，他们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召集了一次当地干部会议，宣读了有关反对封建买卖婚姻的文件。他本人在当时是生产队主管财务的干部，因此参加了这次会。

“我们都嘲笑党支书，人人都知道他的老婆是花了600元买来的。因此一些人讽刺他说，你得放老婆回家！”

婚姻法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禁止了纳妾这一陋习，但，还没有完全根除。妇联的那份材料披露，人们在19个省区都发现有妇女被拐卖为妾的线索，她们的年龄从14岁到50岁不等。对安徽省的若干县进行详细调查后，研究者们发现，卖到那儿的共有22,339名妇女。奇怪的是其中83%都来自四川。四川由于农村贫困，早就有消息说，是拐卖妇女的活动中心。这份报告没有详尽透露这些妇女是怎样被卖到那儿的，但却说，“好些妇女被强奸后，卖给了强奸者为妻，有的被卖了多次。”

政府也基本上禁止了和尚和道士以及尼姑、算命先生和巫婆的活动。这些人住在农村，每当农村节日或者丧葬出殡之时，便会出来活动。不过，力华曾说，农民们仍在继续暗中进行一些民间宗教活动。她认识我后回金山村，曾找一位瞎眼老人算命。这个算命先生是个驼背，满头白发，快到60岁了，他行踪无定，从这个村庄流浪到另一个村庄，在农民的家门前停下，只要愿意给他饭吃，留他住下。在金山，他很快便以超人的洞察力而远近闻名。有一个家庭，几代都没有男性继承人，刚生下一个男孩，便带着孩子求他算命，算命先生告诉这家人，孩子耳后有一个

连他的母亲也没有留意到的黑点。这意味着，孩子的前途无量。孩子的父母亲喜出望外，给瞎眼算命人8元，相当于他们一家一月的收入。

在城市，由于土地严重缺乏，政府强制推行火葬，成功地使城市居民简化了繁琐的、花费高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若干世纪的葬礼，即按照中国传统的宗教观，祭奠祖先的在天之灵。在农村，也试图推行火葬以节约农田，然而，在农村，农民抵制这些改变。在许多村庄，朋友们告诉我，年满60岁的农民们仍然开始省钱来为他们自己买棺材。多年以来，这一直被认为是正常的天经地义的生命的一环。

北京的一位英语教授曾被下放到中国中部江西省的一个乡村劳动，被指定住在一户农民的仅有一间泥土垒成的小屋里。地面也是土，屋顶下雨时漏水，但这户人家的祖母已经花去60元买了一副质量上乘的樟木棺材。她把棺材放在全家仅有的一间屋子里。祖母死后，她的尸体停放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家人悄悄避开干部而设立的一座佛教祭坛前，足有三天之久。尸体四周放着土质小碗，每只碗上贴着她生前喜欢的食品的名称。在晚上，她的儿子和孙子轮流“守灵”，或站立在尸体前。然后，一天晚上，尸体装入棺材，棺材放在一个锯木架上，按照当地的迷信习俗，她的大儿子得睡在锯木架下。

教授说，如果村里的某人在60岁以前死去，农民会叫他“短命鬼”，而且深信不疑，此人今生或前世一定作了坏事。他的尸体不能放在家里被哀悼。有一次，一位农民

被一辆卡车压死，他的尸体就干脆丢在现场了事。

这个村庄位于狭窄的谷地，周围的山峦长满冷杉树，祖母被埋在一个山坡上。一个熟悉并精通古代“风水”的老年村民在山上选了一个最佳位置作为她的墓址。几十名农民参加了埋葬仪式，近亲身穿白色的孝服和白色的孝帽，白色是死亡的颜色。她死后7天，她的近亲戒吃肉食。她的儿子和女儿也不准洗澡或洗头，长达49天。

按照我们的公历四月初，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清明节”，人们得到亲人的墓前扫墓。我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是，清明这一天我乘车路经福建的农村时所见到的情景。我们通过一座又一座的山坡，惊奇地发现到处都有红色、绿色以及黄色的纸花。这些纸花曾置放在低矮的用砖砌筑起来的墓穴上。在泉州城外，一小群农民正用锄头修治墓场。一个中年妇女，穿着宽松的黑裤子，正俯身在一个圆形的墓上。她刚刚献上一碗熟米饭，此刻正跪下来开始作祈祷，对公路上喧嚣的卡车和公共汽车声全然无动于衷。这是农民顽强表露出来的农村的传统和习俗。

第12章

工人捧着铁饭碗

一位圣人说：“策略失误不可能在棋局中获胜，但是，正确的棋艺却可以挽回败局。”有人问，何为万无一失的办法，他回答：“那就别下棋。”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1979年6月，我在北京住下后不久，取出一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旧北京导游指南，想寻找首都古代城墙的遗迹。除了紫禁城和中南海周围不太长的一段城墙，其余的在50年代已被人推倒，因为城墙妨碍交通，占用了大量地皮。当我沿着北京旧前门漫步时，却发现一段自东向西的城墙遗迹仍然存在，政府最近在城墙旧址建起了长达两英里的十层楼高的淡黄色公寓大楼，这群混凝土建筑总共有40多幢，同大多数中国人的居住的那些表面灰暗、失去光泽、门窗急需修理和油漆的建筑物相比，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新建筑群有大的玻璃窗，小小的阳台，底层作商

店之用。在一个人均居住面积大约只有三平方米的城市，这些宏伟建筑工程极好地说明，政府为解决其众多难题之一的住房紧张问题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不过，当我再往前走，就开始困惑起来。建筑物外面没有孩子玩耍，窗上没有窗帘，外面没有晒衣架，听不到笑声和叫声。显然，公寓里没有人居住。

“这些建筑确实很美。”几天后，当我们沿着公寓群耸立的大道驱车前行，一位出租汽车司机抬头望了望公寓对我说。这些建筑静静地立在那里，就像北京城西北部山上十三陵。“不过，修建这些建筑的人应该处死！”接着，他朝窗外吐了一口唾沫，表明他的愤慨之情。

我从一个在附近一家照像馆工作的性情阴沉的中年男人那里获悉，这些公寓一年前已竣工，然而，被安排到公寓居住的大多数人都拒绝搬迁。他本人曾在其中分配到一套住房，但在他所在的单位要他搬进公寓的通知下达之后，他曾竭力拖延了好几个月。他解释，住进这群公寓的麻烦是，三楼以上的楼层水压不足，厨房里没有煤气管道设施，没有电梯，而且暖气系统失效。他不得不使用一种临时性的装置手工取水，还特别不愿意冬天的来临。公寓的设计本来规定热水由一个水力发电厂供给，但是工厂离公寓太远，水到之后，只有华氏41度，取暖器无法供热。他说，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隶属于不同部门的建筑、安装以及设计单位之间步调不一，互不协作。

“最先到达施工现场的单位只管自己份内的事。”他说，声音突然低下来，以便不被照相馆里的其他人听见。

“于是，一群工人来打基础，立起框架和墙，而这时，自来

水公司还没有来安装水管。谁也不考虑后果，因为没有人能全面负责。”

他从报纸上剪下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批评建筑行业的“无政府主义”。不过，他补充说，报纸没有提及谁该为浪费几百万元而受到惩罚。

在我看来，这群公寓建筑说是中国工业的成就，也是中国工业的失误。1949年以前，中国的工业基础相当薄弱，在上海有少量的纺织厂，在曾被叫做满洲的东北有一些由日本人建立起来的刚刚起步的钢铁工业，铁路网可以说尚未真正形成，只连接主要城市。然而，自从1953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中国的工业生产每年平均增长30%，是世界上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纺织品以及钨生产国，生产收音机数第二大国；煤生产量占世界第三位；钢产量居世界第五位；石油产量位于第十。中国能够制造电子计算机，电子显微镜，核导弹以及喷气式飞机。

这些成就的确引人注目。四年来，我曾从香港定期报道过中国每年底宣称的在钢、石油以及化学肥料的生产增长情况。在我看来，中国工业正稳步前进。但是在我到达中国之后，我才明白，这些官方提供的经济增长情况掩盖了巨大的浪费、决策的严重失误、缺乏效率的经济体制以及官僚主义弊端。中国国民总产值的迅速增长也回避了生活水平的实际降低。事实上，50年代中期以来，平均住房面积已减少，直到1979年之后开始全面调整经济政策之前，消费品和食品的供应没有取得有意义的重大改善。城市职工的实际工资从1965年开始到70年代末一直没有大的

改善。中国工业正像北京的耗费庞大然而无实用价值的公寓建筑工程，表面上看来，政府的确取得了成绩，然而却没有为人民的生活带来实惠。

一位头发已白的稳重的政府经济学家曾就中国经济的失误对我作了解释。他高个子，显得清瘦，庄重，甚至有点儿严峻，总是笔直地站立，彬彬有礼，带有十足的中国上层人士的那种风度和气质。他的措辞相当得体，总是发人深省，严肃而尖锐。他很难微笑，但是对所谈及的问题却很有见地。他认为，中国最令人棘手的问题是50年代早期，中国执行了斯大林加速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尽管后来北京同莫斯科关系决裂，这套苏联的经济体制却仍然被奉为金科玉律。

“这正像人一样，是头重脚轻，”他说。苏联模式主张强制性的高积累、低工资，工业方面成本高，工厂所得利润也因之保持高水平。没有个人所得税，但政府收去了工厂所有利润，以便重新投资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如钢铁工业。中国领导人不无自豪地向外宣称，这些重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比值中所占的比例如何举足轻重。然而，他不满地说，由于没有重视并估量国家用于工业再投资的收益情况，生产浪费、比例失调和效率低下便不可避免地应运而生。利润一向被人认为是一个极其肮脏的资本主义语汇。担心亏本的工厂管理人会被指责为是“利润挂帅”。

“盲目地大建工厂简直成了一股风，”他继续说。在解放后的30年间，中国共建了355,000个工厂，总投资为2,130亿美元，对中国这样一个穷国来说，这是一笔令人

惊异的数字。为了达到目的，政府每年再投资于工业的资金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而1978年，这个比例竟高达36%。相形之下，用于消费的比例少得微乎其微。同美国相比较，1980年美国私人投资占国总产值的6.6%。

然而在北京的这种大上工业的热潮中，投资收益受到严重忽视，致使工业的生产效益大大降低。1957年时，每67美元的固定资产可创23美元利润和税收。到1976年，竟下降到13美元。

70年代末，美国施乐公司派了一位商人到北京，住在北京饭店。他回忆道，他曾经参观过第四机械工业部所属的若干工厂。这些工厂为军事部门生产电子设备。四机部对进口的一种复印机很有兴趣，准备组织仿造。施乐公司工程师们对工厂的研究水平和职工的素质也颇为赞赏。但他们也发现，中国的工厂机器设备过剩，人浮于事，开工率只及20%。

“我所参观过的有家工厂每年只生产100到200台复印机，”这位美国商人说，“类似的工厂在美国每天都能生产100至200台。”

在他访问的那天，美国商人还注意到，许多工人偷懒怠工，一群群地坐在一起抽烟闲聊，或者打牌。正在干活的工人是在替工厂修建一个附属车间。

“我万分惊奇。”商人补充说，“在这个大工厂里，多数工人和机器都闲置着无事可作，可工人数目还正在增加。真不明白干吗还要投资？突然，我豁然开朗。工人们正在建造一个新车间，这是因为工人没有其他事干，工厂领导必须花完全年国家的拨款造车间，不然就得收回上

缴。我问厂长是否这样，他颇为尴尬地承认确实如此。”

“我见到一位腰圆臂阔的工人，手上有道明显的伤疤，他对我谈了工厂里一位工人的情况。那位工人最近在满60岁时退休，工厂为他举行了一场欢送会。但在开始喝啤酒、吃小甜饼的时候，他却哭了起来。“你干吗哭？你现在的日子会更加惬意。”他的同事挖苦他。

“是的，”他回答，“我在这个厂里干了20年，自从工厂建设之初就在厂里，可我在厂里没干过一天活。”其他人明白他话中的意思。工厂现在还正在建设，谈不上开工，因为工厂搞不到它所需要的紧俏建筑材料。他只好每天到厂报个到，然后便参加政治学习，白白浪费时间，打牌、或与朋友聊天吹牛。

这位退休工人的故事其实并不出奇。我所结识的中国人都会津津乐道地告诉我这样类似的故事。一个工厂从未完成基本建设，或者从建成之日便没有使用，因为一些官员贪大求全。在中国最西部的新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当地的一位导游嘲笑说政府白花了1.4亿美元修建炼油厂。该厂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建成，但却没开工生产。新疆有一些中国最有希望的油田，但是所产原油却要通过铁路运输到它东部的兰州炼油厂，如果乌鲁木齐炼油厂开工，兰州炼油厂就将关闭。

与另外两项建筑的损失相比，这种愚蠢行为可说是小巫见大巫。武汉有中国第二大钢铁联合企业，政府又投资500万美元在武汉修建了另一个钢铁厂，还在上海附近的宝山耗费了133亿美元修建了宝山钢铁厂。从日本和西德公司引进的武汉新厂在1978年建成后，按照设计，它

将每年生产300万吨优质钢，然而设计者却忘记考虑电力供应。一旦开工，它所耗去的电力远比湖北周围的全部省份所能提供的电力要多。因此，只好每一周开工生产两天。

比武钢更大的宝山钢铁厂是北京四个现代化计划中的一个项目。宝山钢铁厂运用从日本、西德、以及美国进口的最先进的工艺技术，每年应生产670万吨钢。这个项目是中国引以自豪的典范，说明巨大的人力和革命精神能够创造任何奇迹。人们对此非常重视，首脑们专门乘坐飞机前往上海出席奠基仪式。但是，当我乘车离开上海，沿着宽阔的长江边的泥泞公路到达建筑工地时，只看见极少数的工人，很难听见锤头的撞击声。大梁框架足以容纳两个高炉、一个热轧钢厂、一个冷压钢厂、一个管道厂、炼焦炉、吹风转炉、修理车间，还有一个发电厂正处于不同的未竣工的状态。虽然在我此次访问时，官方未作出任何停工的通知，但整个建筑工程实际上已被搁置。政府最后承认，宝山钢铁工程过于庞大，这个工程项目成为北京1980年和1981年大力紧缩基建项目的牺牲品。1981年的国家预算减少了13.4%，这是里根总统同年所减政府开支的二倍。

在宝山，建筑队的一位副队长承认有一系列失误。日本的高炉已证明太精密先进，中国生产的低质矿根本不适用。因此，北京不得不从澳大利亚购买价格非常高昂的高质矿。炼钢厂址选择在沼泽地，需要打入30万吨钢桩，一些钢桩已经下沉。长江口河床太浅，不能停泊远从澳大利亚运矿石来的10万吨级海轮，所以，中国人只好在130英里远的南部建造一个新港以及贮存设施，以便把矿石转运到

较小的轮船上。所有这些未曾料及的花费意味着巨大的超支。冶金部的一位官员公开承认，宝山工程的实际投资将高达270亿美元，是原来预算的二倍，中国人的国家预算在1981年是650亿美元，而宝山的一个工程占了40%，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我的一位作为经济学家的朋友认为，北京之所以如此强调发展钢铁生产并视之为国家力量的象征，有其历史的原因。“许多中国人认为，正是由于我们的钢铁工业极其薄弱，才导致了在19世纪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他在足以表明他的身份的宽敞的公寓里对我说。“毛泽东本人提出了‘以钢为纲’。可是，他们把这理解为有了重工业，就有了一切。”30多年来，用于重工业的投资占了政府总投资的50%，5%用于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8%用于农业。他还补充说，领导人极大地忽视了其它关键部门，如能源、交通以及房屋建设。“去年，由于许多工厂缺乏足够的电力，我们的工业生产能力损失了25%，不得不承认面临困境。”1980年，石油、煤、天然气的产量实际上降低了2%。因为政府无力投入足够的资金开发新的能源。1981，上述产量又继续下降。

令人感到自相矛盾的是，对这种不可思议的浪费的解释是中央计划失调。我的朋友认为，这是中国吸收苏联模式而产生的又一弊端。他解释，在理论上，中央计划是非常科学的，国家每年为每家工厂下达工厂指标，然后，由国家分配必要的原材料以及工人。工厂管理只需保证完成此规定的每年生产定额。

“正像指挥军队，这是一种命令式的或强制性的经济体制，对于指挥过军队的毛泽东以及他的同事们来说，自然有强烈的吸引力。悲剧在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它确实奏效。”从1953年到1957年，中央正从数十年的内战中喘过气来，共产党人当时富于理想，而且生气勃勃。

“不过，那只是暂时的现象，”他继续说。其弊端在于，中央计划衡量成绩的标准不是看工厂的产品实际上能否卖出或工厂是否能赢得多少利润，而是看工厂是否能按照事先下达的指标生产出一定数量的收音机或拖拉机等。

与中央计划相联系的建厂热势头越来越猛。竟到了迷信的程度。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建议我研究一下汽车制造工业。中国有130个汽车工厂，堪称世界第一。实际上，除西藏以外的28个省、直辖市，都有一个以上的汽车工厂。然而，它们每年总的生产量却仅仅只有20万辆，居世界第20位。

北京有家最大的汽车制造厂生产吉普车，我一直要求访问该厂。12月初，我与该厂联系时，厂里的一位领导深为抱歉，他们不能满足我的要求。他解释说早在9月，该厂已完成了今年的生产指标，从那以后，工厂已停工。工人仍然每天到厂报到，但只是保修机器。或许我得等到明年元月才能前去再访问，因为那时，明年的生产指标才能下达，工厂才能重新开工。

我的好奇心与日俱增。到了元月，我再次提出要求，这一次接待我的是该厂办公室主任。主任从前是部队里的政治委员，额头高，长发整齐地向后梳着。他头戴一顶绿

色军帽，身穿蓝色上装和绿色下装，左胸前的衣袋里别着一支金笔。几条街区以外传来的似乎带有甜味的酒香，在一排排砖结构的厂区上空飘散。

许多零部件正待装配，它们凌乱四散地放在混凝土地面上：油箱、引擎冷却器上的散热栏栅装置，前灯、主动轴等等。两位20岁左右的工人正在把吉普车的金属板放进一个设计能力为1千吨的压力机中，在机器撞击以前，他们急速地抽出双手，机器猛撞在钢板上，就像厨房切割机切下面块一样。正像我在中国其他工厂所注意到的那样，工人没有戴护目镜，没有安全装置。到1958年，这个工厂还是一个小修理厂，文正相说，由于全体职工的齐心协力，才得以扩建发展成大厂。这些年来，他们已自力更生设计建成了简单的汽车装配线以及汽车喷漆和干燥车间。他们生产的吉普车是苏联一种汽车的翻板，仍然保留原样，没有过多的装饰和附加品，呈盒式，四门、草绿色喷漆，有一个如同美国40年代末随处可见的四个气缸的简单引擎。他说，工厂的生产定额在1980年是15,000辆吉普车，全厂共有9,700名工人，平均每人年产不到2辆。我问道，是否可以生产更多？他回答，可以，工厂的设备能力是每年30,000辆。我继续追问，如果工厂在完成定额后，不停工而创造更多的汽车，利润将会更多，不是更好吗？他笑了起来。

“我们不能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我们必须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分配给我们的任务生产。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

国家计划委员会并不授权工厂管理者直接插手出售吉

普车，而是计委签署文件下发给各省的机器设备公司，委托它们处理、分配给工厂或人民公社。但是，买方必须亲自到北京提货，负责将汽车运回。外国的顾客对于这种方式一定大伤脑筋，然而对于那些被指派干这项差事的中国干部来说，这却是一种特殊的待遇，他们到北京的往返路费由国家全部报销。

吉普车的价格并不低，每辆售价相当于9,333美元。以质量而言，按照美国、日本以及欧洲标准已是相当昂贵的了。价格不是由工厂，而是由计划委员会定下的。他估计每辆吉普车的生产成本是6,467美元，可以得到44%的高利润。美国汽车创造厂家生产汽车所得利润仅为15%，甚至凯迪拉克也没有超出25%。但是当我向他祝贺工厂得到这样高的利润时，他又嘲笑我一无所知。作为国家所有制的企业，工厂必须上交利润的95%给国家，只能留取5%，因此，工厂经理或工人并不在乎是否能降低成本或增加利润。

由于批行中央计划体制，小汽车工厂厂长还缺乏西方经理理所当然拥有的权力。他不能雇佣或开除任何一名职工，无权提高职工的工资。他也不能决定购买新机器，也无权设计新型的吉普样式。所有这些权力都操在他之上的行政机构的领导人手里。厂方无权实际上也是低效率的原因之一。

一家大报的一位工业记者曾经对沈阳重型机械厂的经理进行过采访。话题主要涉及他担任现职的苦衷：经理抱怨，为了给这个拥有10,000名职工的单位修建一幢新宿舍，他必须得到11个不同的政府部门同意，而且要盖24

个官方大印。仅在他上任的头3个月，他得看518份政府文件，参加在工厂以外的政府部门的48次会议。首先，主管该厂的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召开一次会议，与此内容相同的会，省上相应部局跟着也召开一次。市级有关部门也效仿中央和省厅的作法召开同样的会。而且每一监督部门会派出五花八门的检查组频繁到厂，如质量检查、财经纪律检查、安全生产检查、计划生育检查等等。一天，一位记者恰好在厂里，七个不同部门的检查组同时来厂，工厂的三个大接待室以至于无法容纳下这么多人。

“每个检查组都强调自己的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厂领导人亲自汇报工作，”记者写道，“他们要求工厂领导调动全厂群众在其主管的工作上‘打一场人民战争的歼灭战’。”这位经理说，问题在于，“婆婆太多”。

约翰·宾多年来一直是普尔曼·克洛格公司驻北京的代表，这家总部设在得克萨斯的公司在中国建设了六个大化学肥料厂。有一次，他与同自己曾经帮助修建过的一家工厂的厂长讨论美国工厂的管理措施。这位中国官员很想知道美国的经理如何提高生产水平。

“我告诉他，我们只需集中精力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约翰·宾说。他高个儿，背微微佝偻，一头沙色的头发，由于热爱中国，他放弃了退休同他的妻子来到中国，住在北京一家旅馆，在那里有一间小办公室。

中国官员看起来若有所思。“我可办不到。”他告诉约翰，“我得花去90%的时间去解决与生产无关的个人纠纷以及政治问题。”

碰巧，我遇见一位美国汽车公司的工程师兼会计师，

这家美国公司生产吉普车，他到北京同首都吉普车工厂商议一项合资企业事宜。按协议条款，美国汽车公司应提供技术改进中国吉普车。中国吉普车过时的引擎只能加少量汽油，因而里程很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气味控制也不符合国际标准。谈判毫无进展地拖了两年多。不过，他们使美国人得到一次不寻常的机会去参观中国工厂。美国工程师告诉我，看到工厂如此过于庞大，而且利用率极低，他们万分震惊，估计这家工厂每年可生产45,000辆吉普车，三倍于现在的产量。

“他们的设备之多足以使用多年，”美国工程师说。

“在机器车间，只需用五台旋床，可却有25台。他们还有各种熔炉和压床，可他们每月只使用一次到两次，用以创造他们并不需要的大量小部件。这实在太不经济。”他说，

“在美国，一个公司会委托某些专门的承包厂家来完成这些工作。”他开玩笑地说，合资企业要赚钱的最佳办法是把这些多余的机器卖给美国的公司。在美国，使用过的机器大有市场。

有两个原因促使这家吉普车工厂需要如此多的机器。在同中国干部交谈之后，这位美国工程师兼会计师推测，一是老一辈共产党人强调自力更生。这可以追溯到游击战争年代。那时，每一个连队不得不自给自足。这正是为什么，不论每一省的人口以及公路网的情况如何，每一个省都有自己的汽车和载重汽车修配厂。不过，还有另一实际理由。这家吉普车工厂已经发现，如果他们不生产所有自己所需的部件，如火花塞上的金属线，而按国家计划由其他工厂供给，就难以按时收货，再加上计划又常常受到各种

干扰，麻烦便会接踵而至。因此，中央各部，每一个省，甚至每一个工厂都各自为阵。有时候，他们彼此就像互相开战的双方，而不是一个统一体制或系统的组成部分。

这家报纸曾报道，在中国西部的陕西省某县，这样的冲突在一个煤矿和一个与之相邻的电厂之间愈演愈烈。

“两家之间只隔着一道墙，而煤矿所生产的全部煤正是为了电厂的消耗之用。”这家报纸说：“按照原来的设计，只需要一条传送带将煤运到电厂。但现在的情况变了。”因为，煤矿的主管部门是煤炭部，而电厂归属电力部领导，彼此拒绝合作。因此，煤最先用卡车运到东边约四英里外的铁路线，然后再装上货车运回电厂。

新疆的乌鲁木齐位于终年积雪的天山和准噶尔沙漠之间的一块绿洲上。我在这儿遇见了一位美国经理，他为专门生产铺设石油管道的大型垫板机的巴贝尔——格林公司推销产品。该公司曾经在一年前向中国石油部出售了价值为十五万美元的机器以及十万美元的零散配件。两台垫板机分配给新疆，帮助建设一条新的石油管道。他乘飞机从北京出发，4个小时后抵达乌鲁木齐，以便了解该公司设备的使用情况。令他惊讶的是，只有一台垫板机被运到了新疆。

“另外一台在哪儿？”他问。新疆自治区石油局的一位干部回答，那台机器不能使用。

“什么原因，出了什么毛病？”美国人询问。

“没有什么毛病，我们只是把这部机器拆开以便正在工作的那部机器能使用它的部件。”中国人解释。

美国人非常困惑不解，“可你们干吗不要求使用已经

花了10万美元买回的那些配件？”他问。

“我们不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中国人回答，“再说，即使我们知道，我们也搞不到手。它们在另一省。”

按照西方管理标准，这种对效率的忽视简直不可思议。虽然现今中国领导人致力改革，推行种种调整经济的措施，并且更加讲究效率。但是，1980年23%的中国国营工厂都严重亏损。尽管工业生产这一年增长了8.4%，国营工厂的总利润却降低了1.3%，由于中国没有实行个人所得税，国内税收的主要来源仅靠工厂利润，因此问题便更为严重。

当我连续四年在香港为《纽约时报》报道北京每年发表的年度经济报告时，有时怀疑政府所提出的数字到底精确到何种程度。与我交换过看法的西方经济学家，有的来自大学，有的来自美国国务院以及中央情报局。他们大都同意中国政府所提供的数据可信。虽然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期间到70年代末期常常并不全面，而且往往用百分比来说明。例如，北京会说，铁路机车已经完成了年度计划，但是这并没有说明实际生产量或者比上一年增加了多少。外国专家认为，中国政府并不是有意说谎，他们只是选择性地发表一些数字。

然而，负责收集、核对来自全国每个工厂、公社生产数据的最高一级机构国家统计局的一位成员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计局的工作人员大多数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因此受到激进分子猛烈的批判。许多统计学家收拾行装被送到农村劳动，办公室工作

人员的数目从200人减少到14人，由他们来收集整理数亿人的材料。他说到1980年，国家统计局才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规模，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为工厂制造出一个汇报生产数据的新型标准程序。每一个工厂必须在每月末上报三天内的统计数据。

我问他，这些报告是否精确？“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我们怀疑许多工厂向上报告的产量是他们应完成的计划产量。”他回答，“但我们无法去进行核对。”国家统计局现在才建立了自己的审计机构。农业数字或许误差最大，他补充说。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带给中国的一个无法估计的损失。

最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的。他们认为，刺激粮食产量增长的最快办法是促使公社只设法提高每英亩的产量。这便引起了全国性的强调提高亩产的狂热病。在我所了解的每一个公社，干部随时都准备好了亩产数据的简单材料。然而这也便利了干部随意篡改数字，往往是少报实际占有土地。他们总是夸大每英亩的收成数据。国家农垦部的一位官员告诉我，许多生产队和公社定期有意识这样弄虚作假，使用地方所提供的数据，北京有关中国可耕地总面积的统计根本不可靠。政府的统计数据说中国的可耕地面积为2亿英亩，然而，美国卫星摄影所提供的数字是3.5亿英亩，两者相差40%。这种肆无忌惮的欺骗，部分说明由于多年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所带来的信仰危机。

最引起争议的是北京所提供的中国人口数字。这像一个对自己体重生性敏感的胖子，中国估计其人口的数字在

外国专家看来常常是似乎太偏低。不过，中国领导人有时却出乎意料地坦率承认，他们自己对人口总数也不甚明了，1972年当时中国经济计划的主要决策人李先念接受一位日本客人的采访，被问及中国人口的数字时，李先念回答，国家计委认为不到7.5亿，粮食部门估计为8亿，商业部门认为是8.3亿。1982年中国全面展开了统计全国人口的工作，使用联合国提供的电子计算机，或许将最后澄清这个难解之谜。

一天早晨，我正同助手阅读中国报纸，数量不下12种。突然他大叫一声“哎呀”，相当于英文中的“我的上帝”。他所读到的那些新闻报道写道：生产队的农民们正在他们公社位于北京郊区的田地里干活。正值冬天，农民们便烧起一堆火取暖，但是当一位农民将一些柴禾扔进旁边的一条河中，河水竟烧了起来，而且迅速烧毁一座小桥及高压线。调查结果表明，河水的表面竟有一层位于河水上游的五家工厂排放出来的石油。

1980年人们终于意识到，中国工业在过去30年来的增长已经导致了严重的污染。中国报纸于是开始揭露这方面的问题。以上只是其中之一例。政府没有向外界公布任何调查结果，空气的污染究竟达到何种程度不得而知。而且，在由共产党掌权的国家，对于导致污染的工厂和汽车，很难在大规模范围内加以制止。不过，冬季住在北京会感受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和巴巴拉搬进外国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居住区的新公寓后几天，我们早晨朝窗外望去，看到的只是一层灰色的厚厚的烟雾，天空呈乳白色，正像在

一场迷茫的大风雪时所看到的那种情景。我们视野所及的城市上空模糊混沌。

美国环境保护机构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了中国。他们证实了我们日益增长的恐惧。代表团中的一位美国人随身携带一个被称为“空气质量显示器”的小仪器，该仪器能测定每百万大气分子中的微粒数目。他告诉一群中国人，安全的指标是25或30。华盛顿最高的指标是50。

然而，当他在北京的一所学校开动仪器，指标数已是120。在长江边的重工业中心武汉，指标数高达最高极限的400，仪器因之发生爆炸而破碎。

许多年来，中国一直坚持说，污染问题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发生，因为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为了榨取最大利润，明目张胆的用有害物质来污染环境，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这是报纸曾经作过的指责。1972年，一个中国代表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会议。这位代表谴责美国以及其他工业国家导致了世界的环境问题，要求这些国家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发展国家“赔偿损失”。不过，毛泽东之后的讲求实际的继承者们极大地意识到生态问题的严重性，1980年颁布实施了中国的第一个环境保护法。然而对于中国应该怎样努力制止污染，北京会觉得是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正如在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的一位主管控制污染的官员所说“生产和保护环境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

他个子不高，精力充沛，热爱专职工作，总是能够滔滔不绝地提供有关数据和事实。他陪同我去观看流经黑龙江省会哈尔滨的松花江。他说：松花江已被污染，所有的

鱼已离开松花江游到别处去了。最近几年来，吃过大量水生食物的渔民现在发现体内含有大量的汞。一些住在松花江下游的农民抱怨经常呕吐，腹泻，胃痛，因为工厂把铬排到江里。这位官员所在单位向若干这样的工厂罚了款，督促各家工厂开始治理被污染的水域，然而要想重新整治已长期被严重污染的松花江也许已经太迟。

一直到本世纪初期，黑龙江的土地还基本未开垦，肥沃的草原广阔浩瀚，四周是长满茂密森林的山峦。对于若干世纪以来，人口一直过多的中国来说，黑龙江是最后的一块边疆。但现在，已像中国其他地区一样，黑龙江平原已有农民居住在他们那围有泥土墙的简易房屋里。森林被大面积地砍伐，被火烧掉，正日益面临根绝的危险。一些中国科学家认为，森林资源的破坏可以解释为什么自从50年代中期以来，全省的降雨量减少了50%。其结果是，仅在过去10年，灌溉黑龙江省大部分的松花江的平均流量已降到一半。且有200多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哈尔滨，松花江江面已大约缩小到原来河床的一半。

“调节地神天神关系的靠一位中间人，那就是植物，它蒸发出水分到空气中形成雨量。”国家农垦部的一位官员陈中说，“但天神是一位商人。除非它有所获，否则它绝不给予。”

靠近海南岛的中国南海的近海石油钻探列为重点工程，它使用一台空气压力钻枪，置入一个井口进行极其精确的钻探实验，以便确定这一区域丰富的石油贮藏中发生地震时的早期资料数据。美国一家大石油公司的一位工程师登上钻井船甲板，他惊奇地发现，中国工人已停止钻

并，因午餐时间已到，他们把机器关上，船上空无一人，大家却去睡午眠，即中国人所说的“休息”。

美国工程师向船长指出，机器工作一天耗资五万美元，而且以技术操作方面而言，终止钻井也十分危险，机器很容易被卡住。因此外国的工人每天24小时换班工作，机器从不休息。“你们不应该停止钻井。”美国人坚持，然而船长无动于衷。

自1949年以来，休息已成为中国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也是一种自我享受的生活习惯。在午休时间，大多数中国人任何事情都可以停下来去睡觉，冬天达二小时，而在夏天达三小时。午餐在官方制定的时间，上午十二点前，早晨和下午还各有所谓的“喝茶”休息时间，可以逛商店、购物，一般持续十五分钟到数小时。我们居住的公寓大楼外面有一个建筑工地，工人们常常躺在沙堆上午睡。我常常乘车从驴车旁边通过，驴车在街道上发出缓慢的得得声，坐在驴车后面的农民正在打盹，我所认识的政府机构的干部在他们各自的办公室里的沙发上午睡。就是在一家著名的报社，一些办公室里还备有供午休的床。当汪小姐在出版社工作时，她的许多同事的铺盖卷放在办公室内的一个架子上。午休一到，他们捡掉办公桌上的书和文件，在桌上铺上毯子，开始午眠。

中国人对休息的嗜好简直达到顶点，甚至连民航航班也不例外。一次，我们乘坐中国民航的一架飞机从广州到以西湖闻名于世的杭州，空中距离相当于从纽约到芝加哥。我们于中午在南昌附近的一个军用机场降落，女乘务员向我们解释正是吃午餐的时间，于是所有乘客来到机场餐厅。

在这几我们吃了煎炸猪肉、辣椒、热汤。但午餐后我们仍然又等了一小时。蓝色的天空晴朗如洗，万里无云，天气对起飞显然毫无影响。我百无聊赖，观看几架银色的米格——17型军用飞机练习起飞和降落。当机务人员最后姗姗来迟时，我向女乘务人员打听飞机起飞时间为何拖延？

“驾驶员得休息。”她回答。

“休息”这一自然的习惯原本适应了古代农民生活劳动的节奏，早起头顶太阳在田地里辛苦干活，于是在中午最热的时候休息一会。但是中国人却对休息如此厚爱，使之成为工业社会时代的一种极不协调的现象。

北京实行了几乎包容一切的福利制度，午休仅是政府带给中国城市职工的行政享受之一，除了公费医疗、免费教育，还有由国家大量补贴的低价住宿。甚至收入最低的工厂工人也会按月领取理发票，洗澡票。许多单位还免费发电影票，妇女还额外付给购买卫生纸的费用。

然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恰恰无视这一制度的核心是终身工作的保证，中国人叫做“铁饭碗”。在中国，一个职工只要不犯严重罪行，如抢劫或杀人，就绝不会被开除。中国西部的兰州有一个中国最大的石油化工厂，共有36000名工人，该厂的一位领导告诉我，他们从未解雇过任何一名工人。每个工人还有权将自己的工作由孩子来顶替，即工作接班制度。

“我们的看法是，解雇工人不是好事，这会给工人的生活带来困难。”告诉我的是厂长办公室代理主任，身材瘦高。“那不是社会主义。解放前，工人受资本家剥削，可以随时被解雇、开除，正像美国现在的情况。终身工作

是革命的最大成就之一。”他继续说，好像是一个西方工会领袖，而不是一位行政官员。

这种说法丝毫不是宣传意义上的夸张。1981年，为了减少国家预算赤字，政府关闭了大约1000家效率很低的工厂。中国朋友告诉我，尽管如此，这些工厂的工人仍然领取工资。有一次，我在北海公园散步，碰见一位拖拉机工厂的年轻工人，他身体健壮，高个儿，脸上有疤痕。他告诉我，他在该厂已工作了四年。厂已被通知停业生产，但他仍然领取固定工资。他说，他现在最关心的是如何安排自由时间。

社会主义也给在城市工作的中国人带来了其它特殊利益。许多人承认他们所在的单位能够供给他们在西方看来是属于个人财产的东西。我到达北京不久，替《纽约时报》所在京办公室雇用了一名小车司机。这十分必要，诸如付支票之类的事在中国必须由本人亲自处理而不是通过邮局。据中国助手的建议，我们向外交人员服务局申请要一名年纪大一些的男人（一般说来，在当时他们比年轻人更为可靠），助手很满意，指定给我的司机从前曾是农民，和蔼可亲，身板结实，不到50岁，方正的下巴，还有点幽默感。他姓石，即石头的石，因为比我年纪大，我称呼他为老石，这种称呼往往表明对方忠厚、坦诚、正直，对他说来的确恰如其分。

然而他的令人喜欢的幽默感在他被雇用后的第一个下雨的上午却突然令我扫兴。难道他有什么心事？我向助手打听，这是与中年中国人交往的常见方式。助手回答，司机兴致不好，因为我没替公用小车买一把伞和热水瓶。

可他自己有一把伞，我说，指着房间角落里正在滴着水滴立放着的一把黑雨伞。不错，助手不耐烦地接过话头，可那是他自己的伞，一旦到办公室上班，不能指望他会使用自己的伞。

这正是中国人所说的报销制度，即“用公家的钱记帐”。那位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揭发批判过她父亲的兵告诉我，她到机场去送别或迎接某单位同志时，她在机场餐厅免费吃一顿饭。“你只需告诉招待员你出公差，他便会记帐。”她对我解释，“然后当你回到所在的单位，你可凭发票收回你支付的钱。”

在中国人看来，这些由国家提供的享受是对持续已久的低水平生活的一种补偿。

“如果你没有太大的野心，或者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在中国生活是很惬意舒适的，就好像生活在一个缓慢移动的传送带上。”北京大学一位早已秃顶的教授说，“什么都替你准备好了，你不用操心，很少有什么压力来催促你。”

不久前，教授的25岁的女儿设法以探望一位舅父的名义到了香港。教授担心女儿会像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那样为香港自由的空气、就业机会以及较高的生活水平等所吸引，而呆在这块英国的殖民地，但是两个月后，她却返回了北京。

“生活太紧张，简直受不了，人人都得拼命干活。”她告诉父亲。

不过，一些中国人却担心，休息这种风气，铁饭碗、以及福利制度已经严重腐蚀了使中国人闻名于世的传统美德，即“吃苦耐劳”。

“城市里的人现在不像他们以前那样认真工作。”一位1949年接受过医学教育的很有事业心的外科医生抱怨。他说，在他工作的医院，许多病人到医院里只是为了得到医生的证明以便不上班在家休息。他们甚至不必亲自到医院，只需到医务室去一趟，便可半天不上班。有些人甚至还装病，把温度计乱弄一气或挤压血压计。

“很容易就看出许多人在装病。”外科医生继续说，“在政府规定的休假日，他们会突然从医院里溜掉。”

我们雇用的阿姨姓王，她很善于养身之道，坚持打太极拳。她已人到中年，体胖，短发，标准的无产阶级发式。王阿姨小学都没念完，可我们很快发现，她具有一种我们喜欢的天生的机智。当巴巴拉第一次吩咐她熨烫我们的一些衣服时，她要求我们将烫衣板放低些，我们于是让她坐下来干。巴巴拉对此很难理解，她从来没有看见任何人像这样熨衣服。

可是王阿姨解释时显得十分高兴，“站着熨衣太累人。”

她接着说，她还需要一块特别大的布以便铺到地板上，因为烫衣板太窄，衣服会掉在地上被弄脏。当然坐着干这种活，她会更省力。整个下午，呵欠不断，王阿姨也只熨了三件衬衣。

由于工人不能被解雇，工人装病偷懒在工厂里已是见惯不惊。同中国企业达成了协议合同的若干外国实业家常常因为中国雇员懒惰而束手无策。我们认识的一家香港大纺织公司的老板，决定利用1979年开始的北京允许外国公司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这一新政策的机会到中国投资。这

项新政策的目的是为国家增加外汇收入，加速改进工艺水平。他事先估计，同就在边境外的香港相比较，中国工人的生产率或许只及他们香港同胞的一半。不过，他很有信心，由于中国工人工资低，他仍然能榨取利润。他说，使他恼怒失望的是，他发现在中国建起的新厂的劳动效率仅仅只是他们在香港的工厂劳动效率的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一次公开报告中指出，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在1958年到1978年期间没有增长。报告承认，这是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灾难性的致命问题。

一位日本商人说，他的公司为中国上海一家工厂提供的新的高级机器以生产黑白电视机。新的设备使工厂极大地提高了生产量，然而中国工人却提出抗议。他们说，由于产量大为提高，新机器不得不使他们紧张地干活，因此要么付给高工资，要么机器就得减速。结果，日本人只好同意更换旧机器。

这并不是说，所有中国人都懒惰成性。曾被下放到农村的力华以及我的其他中国朋友都很正直，具有执着顽强的为达到某一目的的坚定信心和干劲。我也注意到，陪同外国重要人物代表团到中国各地参观的中国官员，以他们过人的精力使外国客人不胜疲惫。不过，具有献身和主动精神的中国人以及认真干活的工人并不多见，至少在城市是如此。

中国某些制度实际上很难促使人们努力工作。对于那些就学于北京大学，希望学有所成的学生来说，图书馆在午饭时间，从上午十一点半到下午二点关闭。下午二点到五点再次开馆，可晚饭时间即五点到七点又关门。在晚上只

有阅览室开放，学生却无法查找书籍。因为职员全都回家了。星期四和星期六下午图书馆也全关闭，学生和职员这时按规定参加政治学习。学生宿舍在晚上十一点统一关灯，如果学生们想再学习一段时间，他们得出外或坐在微弱的路灯下读书。在上海的复旦大学，校方对这种学习方式已加以重视，认为有碍于学生的睡眠，因此干脆连路灯也按时关掉。

懒惰、不务正业、逃避工作这些弊端使北京在理论上很难构想出一种具有内在刺激的工资制度。有人认为群众应该努力工作，不是为了物质利益，而是出于革命热情。因此废除了计件工资制，也取缔了论功行赏的奖金制度。因此，毫不为奇的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当时许多中国人仍虔诚地信仰共产主义，铁路工人和码头装卸工人因为被授予劳动英雄称号，赢得一面红旗会不胜荣幸自豪。但是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后期的20年间，全国的工资仍维持在原有水平，物价也受到小心谨慎的控制。然而，由于多年来从未增加过一次工资，许多中国人滋长了失望情绪，感受到中国经济生活的不景气。

1975年夏，由于发生了若干次罢工，部分原因至少与要求提高工资有关，政府不得不派出10万名正规军去进驻杭州的十八家工厂。毛泽东的继承者现在宣布“大锅饭”政策已经失败，因而重新强调“按劳取酬”。虽然说得并不那么明确，但也承认物质刺激的重要性。北京更为重要的改革是命令工厂管理者开始重新发放奖金。从理论上讲，奖金应该给工作最好的工人，以便更有实效。然而，我访问过20多家工厂，厂方却把奖金发给几乎每一个工人，只

是数量略有差别，实际上成为工人固定收入的一部分。因为平均主义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干部和工人对有差别的工资制度仍难以适应。其结果是，大多数工人依然缺乏应有的劳动热情。

“不管你是否卖力干活，奖金都相同。”乐器厂的一位女工这样说。

她所在车间的七个工人每月都领取6元的奖金，虽然奖金数据说是根据工人的生产量，产品质量，安全指标以及政治学习态度的总估价而确定。“如果你按时报到上班，就可以得到奖金，不过有一个最高标准。”

平均主义倾向由于工资公开领取的方式而加剧。在领工资那天，女工所在车间的工人们到厂办公室领取工资袋，每人的姓名和工资写在工资袋上。因此，每个人都知道他人的工资数目。女工说，即使没有这种方式，也容易知道彼此领到的工资额。因为多年来，工资的增加几乎全是按工龄来决定，或者说论资排辈。“只需要瞧一瞧一个人的面部表情，就可明白他挣了多少工资，”她暗示。

70年代后期，注重实效的中国政府愈来愈认识到，强调重工业以及严格的国家计划已带来低效率和生产浪费。从1979年开始，邓小平作出了一些重大决策，这是自对中国经济体制最大胆的改革。首先是重新调整北京的重点投资计划，政府下令控制重工业的投资，而将更多的资金投入以前忽视了的部门，如能源、交通、房建、消费品以及农业。这种调整也意味着降低国家储蓄和投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将更多的国民收入以较高的工资的方式付给

消费者。邓小平计划的第二部分是打破中央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从东欧一些实施经济改革的国家，如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吸收其灵活的社会主义市场作法。有6000家工厂得到许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允许他们享有一定形式的自主权，在超额完成国家的指标后，可以提留20%的利润。这些工厂的管理者也有权决定将他们多余的收入用于再投资，或是用于新厂建设，设备更新或提高职工的工资。他们甚至还被给予前所未有的权利，即决定某些产品的售价，这本是中央计划经济最神圣的权力。他们还可以改变生产定额，或许还包括招聘或开除一些工人。进行改革试点的一些工厂也不得不负责出售他们的产品，国家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不管他们产品质量如何，都得买下。作为这项改革试点的最后内容，工厂再也不被动地从人民银行领收他们已习惯的每年的流动资金。相反，他们得向银行申请借出必要的贷款，偿还时需付利息。所有这一切都着眼于创造利润。

然而到1981年初，由于经济改革，引起了不可忽视的混乱，北京暂时中止了改革的第二部分内容，即体制改革。政府变得异常不安起来，因为得到自主经营权的工厂往往利用这些权利擅自提高产品价格，而导致了物价上涨。也有的去建设新工厂，使国家预算赤字达到110亿美元。对于在财政方面持保守态度的领导人来说，通货膨胀和预算赤字都是令人可怕的。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北京下令重新加强中央计划控制。

我还从一些中国朋友那儿获悉，改革受到一些工厂管理者和行政官僚的抵制，要改变他们几十年来习以为常的

制度，他们很反感。工厂管理者和工人对于解雇懒惰的或不合格的工人也很不满意，这会打破铁饭碗，而且会在下一个政治运动中成为报复、忌恨等行动的导火线和后遗症。而且还有获取利润的问题，这带有资本主义味道。再说，和仅仅完成国家的生产计划相比，创利很艰难，也有很多麻烦。它要求工厂管理者节制开支，切实保证产品质量，保证产品能售出，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在旧的管理体制下，人们实际所做不多，但面子上却干的很好。

也许四个现代化的真正含义还是邓小平本人在1980年对高级官员的一次重要讲话中阐述得最清楚。邓小平说：

“四个现代化的目的是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这就是小康社会。”邓接着说，使用中国的一个文学词语，意即一个具有较为富裕舒适的生活水平的时代。邓小平的计划留给他的听众的印象一定是谦逊、稳重的。邓小平说这话时肯定知道，香港人平国民收入总产值已超过2000美元，新加坡超过3000美元，中国已远远落后于她的亚洲近邻的后面，这意味着即使到那时，中国还算不上一个真正强大的现代化国家。尽管如此，邓小平的目标仍然不失为宏伟蓝图。中国目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是470美元，中国到那时真能实现邓小平的计划吗？我们热切地期待。

“中国的工业将会继续繁荣，他们倾注了那么多的投资，不可能不继续膨胀。”一位曾在中国帮助建设投资数额达到百万美元的项目的美国工程师说：“不过，工业的增长速度会减慢，发展不平衡，会有比例失调，而且浪费严重。”

他说，他的公司刚刚在中国帮助建成了一个大型化肥工厂。工程师对一切都很满意，厂里也召开了盛大的开工典礼。中国人的卡车排成长队，将第一批生产的化肥运走。

但是第二天，工厂厂长在办公室召见美国工程师，问他能不能立即把生产线关掉，美国人莫名其妙，因为工厂机器一切运转正常。

“是的，”厂长回答，“可我们缺乏足够的卡车，那些卡车来自各县和公社，没法知道它们何时能装载越来越多的肥料。”

美国工程师不知所措。关掉机器只需数小时，然而要重新启动，则需要一周。

第13章

古话说：衙门八字开……

“官僚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肌体内的溃瘍。”

——摘自《红旗》杂志

到中国以前，我怀着一个神秘的愿望：作为一个滑雪爱好者，我希望成为在中国滑雪的第一个外国人。在北京出版的一种有彩色照片的杂志上，我看见过一些照片，中国滑雪运动员正从滑雪跑道滑下，红润的脸上堆满了微笑。我在北京住下后不久，又读到新华通讯社发出的一篇报道说，作为发展中国旅游事业的一部分，中国旅行社决定为外国人开放滑雪胜地。我于是深受鼓舞，因此在到达北京那年12月，我向新闻司提出申请，希望去报道中提到的位于中国最东北的黑龙江省的滑雪场。等了一个月，新闻司回答说，我搞错了，中国没有滑雪场。

我以为，这一定是他们的误会，所以，再次提出申请。

这一次，我在信中附上了滑雪照片以及刊载中国滑雪运动消息的那篇文章。四周后，我又得到回答说，不错，中国有滑雪场，但是所在地区禁止为外国人开放。

我十分扫兴，准备再也不提及此事。但是，几天后，我碰见一位美国公司驻中国办事处的律师，他当时正穿过北京饭店休息室，肩上扛着滑雪用具。他携妻子刚在黑龙江滑雪一周，他们说，还在那儿遇到美国杂志《滑雪》派去的一队新闻记者。

这新的证据使我第三次向新闻司提出申请。又过了若干周，他们最后回答，是的，有一处滑雪山地为外国人开放，但遗憾的是，滑雪季节已过，目前已是三月初，冰雪开始溶化了。他们十分乐意提供方便让我到黑龙江采访其他方面的情况，然而滑雪一事受莫能助。

我决定验证他们的说法是否属实。当我到达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气温是华氏零下5度。当地外事局的一位导游说，滑雪坡上积雪仍很多，驱车前往那里只要4小时。他建议，“你最好带上滑雪用具。”

我已被中国官僚机构愚弄，我明白，我不可能从官方得到为什么不允许我滑雪的坦率答复。早在2,000年前中国的官僚制度便已产生，官僚制度根深蒂固，无所不入。推委责任被发展成了一种“国粹”。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生活在公元前145年到190年，他告诫，在制度决策时千万不可出头露面，否则，会承担责任及后果。在明清两朝皇帝处理国事的紫禁城内一个朱红色的亭子里，蓝色的墙面上高悬着一个用金色书写的大字“无为”——即“什么事也别做。”这是中国道家学说玄妙之所在。同自

然合一的途径是与世无争。这并不意味着全然无所行动，或无所作为，而是说，应顺其自然，做那些合乎自然的事。

“无为亦即有为”，圣人老子就这样说过。道家最喜欢的物质是水，虽然水是所有物质中最柔软的东西，却能够磨蚀最坚硬的物质。为了从北京饭店我的办公室内的喧闹中得到解脱，我喜欢出外闲逛，紫禁城的这个凉亭是我最常去的地方之一。我特别对道家的思想感兴趣，这也许可以解释中国官员为什么办事消极，回避责任，敷衍塞责，以及习惯使用小聪明。

1979年1月，在邓小平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访问美国之行前不久，《时代》杂志曾安排单独访问邓小平。那是一种新闻策略；邓小平抵达华盛顿的当天，《时代》杂志封面上将出现邓小平的大幅照片。《时代》总编辑赫德利·多诺万同该刊香港办事处主任马奇·克拉克一同从纽约乘飞机到了北京。他们住在北京饭店，驱车从饭店到约定上午9时举行会见的人民大会堂只需5分钟。那天早晨8点45分，两人与陪同他们前往会见的一位新闻司官员来到休息厅中负责安排车辆事务的询问台。但是，没有任何一辆出租汽车，当时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正在以怠工形式要求增加工资。克拉克心急如焚，担心迟到，在中国这是不礼貌的行为，特别是要同中国最重要的一位领导人会见，这就更不应迟到。他对官员说，他们是否可以使用停在外面的外交部小车，司机正坐在前座位上无事可做。

“不行，”官员肯定地回答，“根本不可能。”克拉克和多诺万不是国家邀请来访的贵宾，所以不能乘坐政府公车。这一规定，他无权改变。

已到九点，仍然没有任何出租汽车出现。克拉克告诉我，他当时几乎绝望了，但新闻司干部仍然坚持己见。幸好，9点零5分，终于来了一辆出租车，他们匆忙上车向着长安街开去。邓小平站在人民大会堂大理石的台阶上欢迎他，笑容可掬。毫无疑问，他非常清楚该如何对付中国官僚体制。

我发现，官僚作风和官僚意识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俯首可拾，不仅让人倍感沮丧，还衍生出它特有的含义。从前中国人谈话，有一套特别的语汇来表达生活中的痛楚和忧虑，这些词语全部与命运，或者说与难以卜测的自然有关。我在台湾时，如果出现了什么麻烦，朋友们总是说“算了吧”或“没有法子”。共产党掌握政权后，他们企图克服这种消极的失败主义情绪。毛泽东喜欢说，中国已站起来了。我注意到，在北京的人们已停止使用有关命运的词语。相反，他们取而代之以一种新的套语，当提出某个问题时，官员们总是这样回答：“我得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考虑考虑”，“我得向负责同志反映”。还有最普遍的两种回答：“不方便”和“不清楚”。它们都意味着同一含义：什么事也干不成，或无能为力。

“中国的真正弊端并不是人人都在抱怨反感的社会名流和高级干部所享有的特权，”一位敢于讲话、善于言辞的科学家告诉我。“而是官僚的无能。”

为了证实他的观点，科学家提醒我留意一件重大新闻事件，即位于中国北海中的一座石油平台倒塌，船上所有72名人员全部丧生。这个悲剧发生在8个月前，但中国的报纸对此事却只字未提。科学家对这种掩盖真相的行为极为

慷慨，赠送我一个放在他居室里的陶瓷罐，并说揭露事实真相对中国必定有益。

事实正是如此，在我写的报道这次灾难的文章在《纽约时报》发表后几周，《人民日报》登出一篇详细报道。1979年12月25日凌晨3点，中国从日本花去2,500万美元买进的一架石油平台在转移到一个新的钻井区域时倾覆。负责平台转移的船长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营救落入海中的船员，也没有发送遇难信号。事实上，拖延了12小时，石油部才向海军通知这一事件。

当时的石油部长宋振明在向国务院送交的一份官方报告中说，事故的发生是由事先未曾预报的达到11级的强烈风暴所引起的。但是沿海气象记录站的记载却表明，他们当天就正确地预报了将有一场风暴，虽然实际风力不完全与预报相符。据报道，这架石油钻井平台7年前就已从日本买回，但谁也没想到将操作和安全指南翻译出来。石油部的高级官员曾几次前往东京，据说是为了了解如何操作机器，但是他们却没有对船上的工人进行训练。这些工人“教育程度低，技术水平也差，”报纸指出。

事件发生的当月，石油部号召发现新的石油资源以完成每年的指标。为了达到目的，要求在年底前于北海湾地区找到2,000多万吨储量的新油田。因此，在灾难发生的头一天，即12月24日，石油部所属的海洋石油勘探局长命令石油钻井平台转移到一个新地区。暴风即将来临的通知已到达他手中，但他却全然没有引起任何警觉。报道说，他甚至对平台船长提出的三条建议也置之不理。他的理由是，船长应该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即使如

此，如果能及时采取适当的措施，事故也可能避免。但船员不知道，他们应该抛去平台船上的压载水，以便减轻拖曳重量。若能这样，在转移以前便能经受海浪的冲击。结果，当风暴来临，巨大的海浪滚滚卷来，进入平台船舱，导致了平台的沉没。

这场灾难可以说是中国官僚作风的典型一例。他们缺乏工艺技术和管埋素质，目中无人，独断专行，对下属的劝告和建议嗤之以鼻，拉小集团，盲目笃信国家定额，坚持游击作风，坚信只要凭意志，就能克服任何困难。

许多中国人现在指责，这些由官僚主义带来的弊端与中国封建社会有关：热衷于等级制度，屈从于权势，缺乏科学态度，以及大搞裙带关系，任人唯亲。某大报的一位编辑私下对我说，1949年以来，共产党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

“过去我们认为中国要解决的是资本主义，”他说，“实际上，中国还没有资本主义化，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最大的问题是封建主义。”这是用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说中国因袭着历史的重担，而不是如以前所说的，中国是“一张白纸”，可以在上面书写任何东西。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前，我曾作为一名旅游者首次来到中国。一次经历，使我明白了中国人的权力意识是如何根深蒂固。在从香港进入中国边界的铁路车站，迎接我们的中国旅行社的导游说，他已从旅游团成员中选出一位头儿。每天早晨和晚上，头儿的责任是召集我们，看我们是否按时进餐，上公共汽车，反映我们对中国方面的意见和

建议。但是由于弄错了人，他给我们指定的这位头儿是一位18岁的美国高中学生，他不顾母亲的反对到中国来旅游。他说他不喜欢中国。他的名字同当美国外交官的父亲名字相同，中国导游认为由一名高级外交官来担任我们旅游团头儿最适合。然而，不管这位18岁的美国中学生如何几次提出不愿意担任这一“职务”，也不管我们如何要求另找他人，旅行社的这位中国导游坚决拒绝。

“他是你们的头儿，怎么能撤换他？”导游重申。“你们得学会服从领导。我们中国人正是这么做的。”

透过这件使我们西方人感到难以理解的事例，我却发现中国人本能地喜好权力。二千多年的帝王统治历史已在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中积淀了对权势的渴望，期望一个有绝对威信的、近乎神化了的领袖。清王朝灭亡以及1911年废除帝制留下了一段空白，而这正是由毛泽东精明巧妙地来填补的。他造成了对自己的个人迷信，使自己几乎成为一位神。

邓小平曾经宣布，毛泽东把自己神化是错误的，不再允许有任何个人崇拜。不同于毛泽东，人们没有为邓小平塑像，老百姓家中也没张贴他的画像，商店里没有邓的石膏半身像出售。然而，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影响以及中国人对个人崇拜的兴趣仍然并未消除。在对中国中部安徽省的一个山区茶场访问时，我注意到，在烘干茶叶的入口处，一行用红漆书写的大字引人注目：“伟大领袖毛主席1958年9月16日曾来视察。”另外一个金属板上写着：“毛主席在这儿作了伟大指示‘在山区多种茶’。”甚至毛的一般日常言谈，也依然对中国人具有天启般非凡的力量。我参观

了茶场后，党支书把我引到会议室介绍公社的生产数字。门廊上有一题记：“毛主席曾到此会议室视察，对茶叶生产作了指示。”

二十世纪初，具有现代意识的年轻一代中国人曾不遗余力，企图摒弃孝道，视之为过时的道德和阻碍中国进步的桎梏。然而，曾经受到他们唾弃的这些观念至今仍很顽固。忠孝之道、敬奉权势、自我克制等，对于共产主义仍然有用。正如精神病学家罗伯特·利夫顿所说，至少在50年代初期，中国人成了笃信孝道的共产主义者。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这些信仰中的一些受到了无情嘲弄，而代之以玩世不恭、愤世嫉俗。尽管如此，我仍然感觉到，中国远比美国人崇尚忠孝和权威，可说崇拜到了虔诚的程度。

中国革命常常被说成是农村对城市的胜利。这一般是指在乡村组织农民游击队，然后用他们来夺得国民党统治的城市地区的出色战略。但是，我发现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方式具有更深远的意义。这是指1949年进入城市，并且取得了全国的政权后，他们把农民出身的士兵安排到每个机关、工厂、学校以及医院担任各部门的领导。

一个工厂的机床工人，他文静寡言，颧骨突出，皮肤光滑，长着一副好看的白牙齿。他以自己的经历向我谈到他对党员干部的看法。一年多前，他在汽车工厂上班之余，每周六个晚上都要到夜校学习，补习物理、化学和数学。他曾在农村劳动多年，然后被安排到工厂当工人。因此，渴望在教育上进一步提高自己。这是他摆脱工厂枯燥劳动，得到重用提拔的唯一办法。他的这种抱负正像天资

聪明的十六岁高中学生玲玲一样无可非议。一年前，他终于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但工厂不放他去上学。现在，他想通过中国的一种新型的较为普及的电视大学入学考试。这种考试是为像他那样的工人组织的，上午在电视屏幕前上课，下午由指导教师辅导或上课。两年期满，他可以得到文凭，或许重新安排较好的工作，担任技术员或工程师。但他有一个麻烦，他需得到一位党委书记的同意，才能报名参加考试。书记在工厂是真正的第一把手，虽然还有一位主管生产的厂长。正像中国各地一样，党实行了一种平行领导制——在政府，在工业部门，在大学，甚至在部队里，被指派到这些部门的党支书握有绝对的权力。他们又按照等级制，对上级的党书记负责，接受其领导，以便保证党中央的坚强有力的领导。

书记坦率地拒绝了工人的要求。“学习没有用，你所学的对工厂毫无好处。”工人于是又去找党委的其他四名成员，同样也遭到拒绝。他们反对他进一步提高学业似乎同政府的四个现代化步调不一致，对此，我很纳闷。但是，在汪小姐家中的一次聚会上，这位工人告诉我，他非常理解。当时，一些学生和工人由于未能被允许继续完成他们的学业，在北京街头游行。我派汪小姐去采访这一情况。由于她具有中国血统，身穿蓝色服装，像中国人一样，所以她很容易便加入到示威者的行列中去。也就在那儿，她同工人认识，并成了朋友。

工人还解释说，书记出身于贫农家庭，加入了军队，随后同部队进入首都。由于工作表现好，对党忠诚，他逐渐在党内得到提拔，成为解放前只是一个制造人力车的

小车间的这家汽车工厂的领导。书记从未念过书，因此在职工大会上，每当规定由他亲自宣读政府文件时，他只好叫一名年轻干部来代读。书记自然保留着他童年时代农村孩子惯有的那种粗俗习气。有一次，工厂召集大会，向职工发送劳动安全手册，他提醒职工不要将劳动安全手册当作“后门票”使用，这是“便纸”的另一种委婉说法。女职工大为不满，议论纷纷，认为他太没教养。

工厂党委会的其他成员从前作过人力车夫，这是1949年前城市中最下层、最穷困的阶层。他们也不能读书和写字。由于从制造人力车转产汽车之初，他们就一直呆在工厂，因此，对他们自己在厂里的政绩和工厂取得的成就总是沾沾自喜。

“看见我在厂里读书，他们非常恼怒。这不足为怪，因为他们对知识分子的不满和不信任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工人说，“然而，他们又是党的忠实党员。他们对党的指示从不怀疑。在1976年批邓运动中，他们猛烈地攻击邓。1977年邓小平重新复出后，他们却轻而易举地突然转了180度大弯。”

书记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训练，但他却有一癖好，要全厂保持得干干净净。最近，由于直接领导工厂的上级部门要派出检查团到厂视察，他下令全厂停工三天。“我们反复擦同一门窗，简直一尘不染。”工人回忆，书记之所以这样重视工厂的外貌，因为他明白，上一级的干部对生产也一窍不通，只有清洁整齐才能给他们留下最深的印象。

书记担任工厂领导之初，他仍让他的农民妻子住在家

乡的农村。他用厂里的卡车把工厂的木材运到家乡，而且派出一些工人替他家盖了一座新房，工人对此很不满。不过，使人更反感的是，书记通过走后门，把妻子的户口迁移到北京，然后，又在厂里替妻子安排了工作，让妻子和孩子搬进厂里住。虽然厂里规定不为工人提供住房。有一次，他的一个孩子打开锅炉房的一个开关，而当时，一个工人还呆在替锅炉添加煤炭的一架机器里面，由此引起一场严重事故，书记才被迫将家人迁出厂。

工人继续说，书记同工人一道在工厂食堂进餐，这是优良传统。然而书记却沾染了农民的一种陋习，任何人要想受到重用，就得送他一些小礼物，如鱼、鸡、或者水果。在中国传统的春节，这个有400名职工的工厂，就有八十名工人带着礼品到书记家。共产党掌权30年来，它早期的曾给党带来崇高声誉和威信的诚实、朴素以及理想主义已在人们心目中黯淡了。书记的以权谋私，贪图小便宜只不过是表明党风败坏的一例。

对于中国的研究，大多数专家、学者都习惯集中于中国少数几个最高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以及邓小平身上。研究者们感兴趣的是他们的个性、癖好以及他们的政治分歧。但是，我在中国各地访问时，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像上述那位书记这样的具有农民出身背景的党内和政府机构内为数不少的官员的权势。这种农民出身而且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官员在中国相当普遍。《光明日报》的一篇调查研究文章披露，中国工厂的党委书记以及经理具有“技术知识”的只占22%。一则新闻广播承认，在中国北部的河北省，70万名干部中只有22.7万名具有初中或高中

学历。在一次接见中，我曾认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负责医务的官员，他没有接受过专门医务教育。在30年代的红军长征中，只是一个随军军医。我所访问过的若干大学的系总支书记并不是教师，而是以前军队中的政治委员。

纽约市长埃德·科哥到北京同中国首都签署达成缔结姊妹城市的协议时，我有幸能在宴会上坐到三位副市长的旁边。他们都出身于山东省同一县的农民家庭。他们答复我时显得局促犹豫。十多岁时，他们便参加了红军，1949年作为胜利者进入北京城。虽然他们都没有专业知识，但现在分别主管北京的城建、财政以及工业。

青年时代，这批人是革命者，投身于同腐败堕落、失去民心的国民党的斗争。然而，他们一旦大权在握，农村家乡中固有的狭隘、保守、眼光短浅的价值观便在身上故态萌生，于是笃信权势，惧怕变革，沉溺于营造他们舒适的家庭生活，对技术，知识以及西方先进事物的重要性持怀疑态度。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甚至敌视、排斥和反对知识变革。对于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接受过的唯一训练是在军队中进行的。他们所学到的是纪律、命令以及毛泽东思想。因此，毫不足奇的是，正像中国历史上曾经推翻过许多王朝的农民革命一样，一旦取得了政权，他们便重新建立和恢复起旧时代的某些秩序，讲究排场，挥霍浪费，享受特权。他们并不打算建立一个现代国家，中国因此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和损失。

他们乡音未改，举止粗俗。北京和上海教育程度高的本地人往往把这些干部当作乡下人。李苗夫妇二人是我的朋友，他们曾同我谈到一个干部的笑话。

“某县领导在一个村子里宣布，他们已决定组建民兵，而且要发步枪，”李开始叙述他最喜欢讲的一件事。“这在当地是从未有过的大事，农民们非常激动和高兴。但是许多星期过去了，县领导却对这个决定迟疑不定，很难得到统一。

“终于在两天后，一辆吉普车开到村子。一个模样看起来是领导的干部下了车，宣布将召开成立民兵的群众大会。

“在群众大会上，他站起来开始慢吞吞地讲话：‘我——是——县——委——书——记，’群众听见这个职务立即热烈鼓掌。因为，这样一位高级领导亲临村子，实在是莫大的光荣。

“但他又加上半句：‘派——来——的。’”李特别使用味儿很重的湖南口音，因为许多干部都出生于湖南——

“‘我们决定，关于发步枪的事，每个人一支枪……’群众立刻发出热烈的掌声，‘……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们已经统一了意见，每两个人一支枪……，’群众又是一阵掌声，‘……也是不行的。’

“‘因此，我要宣布县委的最后决定，三个人发一支枪。’掌声逐渐增多。‘不过，它们是木制步枪，’这位干部就这样结束了他的重要讲话。”

在任何社会，大学文凭当然并不是担任领导的必要条件。不过，非常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最高一级的领导人中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却微乎其微，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26名成员中，只有方毅一人。方毅主管科技，上过大学，不过他的简历中没有提供在什么大学念书，读了多少年。

中央书记处管理全党党务，由12人组成，分管政府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有18位。他们之中只有5位接受过大学教育。这说明，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与受过高等教育的医生、科学家以及教授在文化水平及素质上差距甚远。许多医生、科学家和教授曾毕业于教会学校，或直接在美国、欧洲以及日本上过大学。

“我们相互间很难找到共同语言，”一位性格内向的物理学家说。不久前，他申请到美国进行高级研究。他所在的研究所所长，本人也是科学家，已同意他的申请。然而申请还得送到研究所的人事处和保卫处，这两个部门的领导干部都是农民出身。他们拒绝了他的申请。物理学家告诉我，由于他在美国学习过二年，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才从美国回国，因此他们一直不信任他。他回国是出于爱国主义。但是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指控为美国特务，并遭到逮捕。后来，得以平反；然而，档案上仍然保留记载。

他的大哥1949年前也曾在美国念书，他认为回国的政治风险太大，因此留在美国，现在已是一名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去年，中国科学院邀请他回国作了一系列的讲座，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我的朋友认为这具有某种讽刺滑稽意味。不过，与其说他感到痛苦，不如说他感到痛心。由于长时期轻视知识分子，已使中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愤慨地说，几代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和人才被白白地浪费了。

“中国未能成为像苏联那样一个科技强国，没有闻名于世界的科学家以及先进的军事武器，其原因是太不信任

知识分子。”他说，“他们出身农家，在山里打游击多年。他们所知道的就是这些。1950年之后，他们本来可以学到某种专门技能。但是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他们没有时间去接受教育。此外，有人公开说，红比专好，即政治上可靠远比受过教育或有专业知识更为重要。

中国人智力聪颖，出现过大学科学家，他补充说，“在美国的杨振宁就是一例。”杨是获得诺贝尔奖的三个美籍华人之一。中国在政府重视而且集中财力人力的少数科学领域取得过成就，特别是物理学方面，能制造核武器以及弹道式导弹。在医学方面，中国医生也在少数领域领先，如烧伤和断手再植。

“不过，我们当中的许多人被荒废了，”他继续说。

“长期强调自力更生。因此，我们花去大量时间生产自己的显微镜，而不是去从事研究和实验。”文化大革命中有四年，他在一个种植玉米的农场劳动。回到研究所之后他发现，从外国获取科学学报被认为是冒政治风险。近10年来，他一直在搞一个课题，可却发现另一个研究所的一位中国物理学家也在搞同样一个课题。“我们不允许互通电话，或写信，据说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以及他的同事们尽力纠正了一些以前的失误。宣布从现在起，知识分子应该被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不是以前那样被划作资产阶级，因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一部分”。1981年，中国科学院通过选举任命卢嘉锡为院长，这说明现在知识分子对他们的科学研究工作有了更多的发言权。我的朋友指出，没有公开宣传的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党中央委员李昌被任命为科学

院党组书记这一关键职务。李昌也是科学院三人最高行政领导之一员。报纸的一项调查披露，中国科学院下属的23个研究所中，只有25%的干部是科学家，其余的是党的行政官员以及监督人员。“为数甚多的大学毕业生按照计划应分配到科学和技术部门，但却被安排当售货员、采购员、打字员、炊事员等等。”报纸的另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些火箭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被分配当了收发员，远距离控制的专业技术人员被指定当了屠宰员，数学专业人员当了面包师。”1981年，在科学院的一次全院会议上，党的新总书记胡耀邦严厉批评党内的许多同志仍然不信任知识分子。干部们认为“知识分子不听话，想得太多，而且总是坚持己见。”

一个闷热的夏日下午，我碰见一位年轻的中国化学工程师，他正在有大理石地面的电报大楼发电报。当时，我恰好正在向纽约发送一则有关我对中国政治局势看法的消息，我们简单而警惕地交谈了一会儿。他问我是否以后能在饭店内我的住处相会。他的叔父是政府高级干部，常常到北京饭店理发，这是一种很少为人所知的范围很小的特权。工程师还说，他同他的叔父一道很容易通过饭店警卫。几天后，他果然来到我的住处，白色衬衫、灰色裤子、塑料凉鞋，这是城市中国人夏天一般的装束。

他很想知道，我是左派还是右派？

我说，用美国的政治术语来判断，我认为我是自由主义者，中间偏左。

“很不好，”他说，显然很失望。“在中国，我们知

识分子不喜欢左派。他们太保守。”

对一个西方人来说，政治上的左派意味着持进步的立场，而右派才是保守分子。工程师对我的解释也颇困窘，不过，他继续阐明他的观点。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把自己称为左派。他们反对个人主义，言论自由，反对民主，他们主张集体行动和闭关锁国。”邓小平执行政策好，更为实际和温和，较多地强调物质利益，更大限度的言论自由，主张对西方有更大的开放，进行贸易接触和文化交流。

他说，像他叔父这样的高级官员对邓小平的改革实验计划颇为不安、紧张，他的政治生涯都是在党内学习种种思想教条中度过的。“我的叔父认为，给予像我这样的科学工作者以权力来领导研究所或者出国，是鼓励无政府主义，助长资本主义影响。”我们同意，对这种干部，保守这个字眼较为适合，意思是抗拒变革，以区别于左派，以免引起外国人误解。

与四川有关系的一位领导人是新总理赵紫阳。1975年，当中国人口最多的有一亿人口的四川省由于尖锐的政治内乱以及严重缺粮，局势很不稳定时，邓小平派赵紫阳到四川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为改变四川的落后经济，贯彻执行邓的一些小范围内的经济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很快受到邓小平的青睐。

到中国几个月后，我同几个中国人交了朋友，意识到，他们在公开场合常常显得愉快、开心，但在私下却爱发牢骚。这并不奇怪，他们是工人，学生，教师，而不是

党员。我好奇的是，在经历了30年的政治运动，派别斗争以及经济的发展和倒退之后，干部对于共产主义有何看法？

就在这时，我认识了一位女士，她坦率，身材苗条，漂亮的圆脸。长着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使人们很难看出她已45岁。10月1日国庆节之夜，我正漫步在长安街上。为了庆祝国庆，在所有主要政府机关的门前，沿着街道悬挂了成串的彩灯。灯光把街道照耀得如同一个游乐园。宽阔的人行道上有成千上万的行人，我仿佛置身于联合国的天地里。突然，我感觉到有谁碰了一下我的手臂，侧头一看，一个妇女满面笑意地望着我。

“你喜欢我们的国庆节？”她问道，这话题既得体，又谨慎。接着她作了自我介绍，她是政府机关干部，想提高英语会话能力。

在我们见面若干次后，我才有了勇气问她是否是共产党员。妇女笑着回答，“这可不是什么秘密。共产党员也是人，他们不是怪物。”然后，她向我提出问题。

“你是否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我从阅读中知道，许多美国新闻记者的真正身份是中央情报局间谍。”我不敢担保，她会相信我所作的否定回答。不过，几个星期以后，她逐渐向我坦露了她入党的历史和她现在的观点。

“年轻时，我是积极分子，我总是自愿干一切事，如果到最后帮助打扫学校宿舍，政治课时主动发言，帮助成绩不好的同学补习功课。发展党员时，首先考虑的就是这些表现。”

“我出身也好，”她说，“我父亲是一个收入不高的

裁缝。这也是党组织确定党员对象的一个条件。”20岁时，她在大学读书，便被接收入党。

“50年代的日子确实让人留恋。我相信党说的一切。我决心努力工作建设祖国。我们都非常爱国，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理应如此。我还记得，当我看见一些外国游客把照相机对准拉人力车的工人时，我十分气愤，那是中国的耻辱！”

这位妇女的个人生活规律仍非常严谨，每天5点半起床，然后到户外作散步运动，接着回家整理她同儿子、丈夫共住一室的小房间。7点半上班，她经常在下午9点或10点时仍在办公室，处理一些额外事务，我每次打电话给她时，总发现她仍在办公室。

文化大革命中，军队接管了她所工作的某部，她被指定为部里的五名领导成员之一，虽然当时她才30出头。她承认，这意味着，她当时是激进派分子，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她乘“直升飞机”被提拔到领导岗位，越过了其他年龄比她大的干部。1970年，当部里的所有干部都下放到农村劳动时，她仍然是部里的一名领导。

“当领导也并不容易，”一天，她告诉我，我们沿着北京西郊的颐和园漫步。“你得为其他人树立榜样，为别人服务。我得在早晨5点起床，当时我们住在乡村，我得叫每一个人到田里干活，我还得整天拉满载着砖头和粮食的拖车。”一天早晨，她太疲倦了，睡意袭来，一只手被脱粒机咬住，几个手指上的肌腱被拉伤。她说，晚上，其他人都休息时，她得去开会，常常开到午夜。“我们复查每个人的材料，决定他们是否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

反革命分子，我们也让人们申诉和检举。”她有一个4岁儿子，然而她的工作时间安排使她不可能亲自照料孩子，她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每周星期天才能去看望他。

她逐渐开始滋长了怀疑情绪。“一些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某一些干部把被指控为反革命的人押进‘牛棚’，慢慢折磨他们以致于死亡。每天，我得同这些干部一同共事，也得解决那些被迫害的干部的家属所提出的问题。”

她自己也惹上麻烦，因为她不同意某人入党。“这位同志不够入党条件，可他非常愤怒，不满，以后竟然背着我就散布谣言，说我同另一位领导有不正常的男女关系。我丈夫为此很不愉快。”

毛泽东去世，邓小平复出后，她所在的部门政治权力重新作了改变。她发现自己所属的一派干部处于不利地位，她被疏远，不受重用和信任，那时，她对政治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兴趣。

“真正的权力是在最上层，离我们太远，我们在会上讨论的压根一点没什么用，”她说，“我习惯于提建议，但他们从来没有听进一句。因此，我不再是积极分子，也不愿意当积极分子。”相反，她开始寻找借口躲避政治学习，或者至少提前溜走。“我总是借口我太忙。如果我无法脱身，我也只是坐在那儿，一言不发地读报纸。”

她也察觉出党内存在着一种同她在50年代所知道的迥然不同的作风和思想。党内的许多人所关心的是通过走后门为自己的家庭谋取特权。她所在的办公室掌握着大量的电影票和戏票，每天都有许多她不认识的人打电话找她要票。“我最后只得把电话放在其他人的办公桌上。在过

去，我们谈到党总是怀着一种近乎神秘的崇敬之情，我们把党说成是组织。如果你是共产党员，你得说过组织生活。但是现在，为国家，为人民牺牲自我利益的思想已经淡漠了。”

春季的某天，她参加了一次会，这个会凡是党员都必须出席，会议拖得很长。会后，她显然神情沮丧。她通常带有的那种微笑消失了，她希望散散步。原来，党中央最近发出了一个最新指示，要加强整顿党的纪律。所有党员都必须书面汇报自己的真实思想，然后由一个调查组逐一进行审查。如果通过这一关，就会发给党员证。这种方式是多年以来的第一次。整党的目的是为了清除那些“不够党员条件”的党员。共产党取得政权的1949年，只有200万党员，现在已有3800万党员，一半是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以后被接收入党的。邓小平想让一些年老体衰的老党员退到第二线，同时清洗那些与“四人帮”有牵连的新党员。整党并不一定是针对这位妇女，但是，她给吓坏了，我们决定最好的办法是现在我们互不见面。

从这位妇女和其他中国人的亲身经历，我明白了，自从50年代以来，许多人对入党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党员不仅是一种荣誉称号，而且是使自己能够生活得更好和更保险的途径。

社会科学学院的一位学者，本人虽然不是党员，对党内出现的这种现象颇为愤懑。

“党赖以生存的原则是大公无私，”他在自己狭窄的位于五楼的住室对我说。“这正是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50年代能大上工业化的原因。这些正是中国人引以自豪的东

西。”他说，党仍然能吸引有能力、有才华的人，但是这些人再也不愿意作出自我牺牲。他的妹妹不久前被接收入党，但却拒绝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西藏去工作。以前谁也不敢这样做。

“在中国，领导人的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光明磊落常常是仁政的基础，”他继续说，为我沏上一杯茶。“正如孔子所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最大的变化正是领导、权威的威信急剧降低。在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中国共产党最为重要而行之有效的措施之一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他调动亿万人民参加群众运动，从消灭苍蝇、麻雀到使用铁锹和手推车建设巨大的水坝。不论是否出于自愿，人人每周，有时甚至每天都参加政治学习，阅读、背诵、牢记最新社论或毛泽东语录。那时，谁也不愿意被认为是消极分子。这甚至迫使对党领导持有不同看法的人也不得不在政治上小心谨慎。“如果你在政治上不积极主动，领导会给穿小鞋，”这位学者说。这话解释过来就是，领导不会让你有好日子过。

然而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多年来的党内派别斗争、政治迫害、谋求特权和政治路线的不稳定使入党愈来愈成为一种为了履行手续而进行的没有实际意义的空洞的形式。

1977年8月，我曾陪同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在中国访问。正当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闭幕的当日，我从香港到达广州。在香港有消息说，由于省委书记们几周以来一直没有在公众面前露面，人们猜测北京正在召开党的

高层领导会议。但是对会议北京并没有作过任何官方宣布，甚至没有宣布会议正在举行。那天下午，广州市民高举着红旗、彩灯，以及大幅标语，上面写着“热烈欢呼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胜利闭幕”。这对我是一条重要新闻，我向中国旅行社安排给我当导游的中国人打听会议作出了什么决议，谁被选进了中央政治局。

“很抱歉，我对会议一无所知，”他说，直盯着我。“没有听到任何通知和宣布。你收听今晚的新闻广播好了。”

我接着又问：“可人们怎么知道会议已召开，为什么他们会那么相信会议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他丝毫不动感情地指着另一面标语，上面写着：“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他说，“我们相信会议取得了伟大胜利，因为中国共产党正如标语上所说，永远伟大、光荣、正确。”

在导游的建议下，我们决定到市中心的一个公园去。当晚，为了庆祝党中央代表大会的召开和结束，一个歌舞团将在那儿演出。正8点，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内新闻节目通过公园内的扬声器播送出来，难以计数的焰火便升上天空，乐队伴着舞蹈者的舞步热烈地奏了起来，很难听到播音员播出的任何一句话。成千上万的人几乎挤满了公园，但似乎没有人在注意倾听来自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报纸在1981年曾提出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这份报纸向全国发行，总数为530万份。该报指责说，这种信仰危机的产生是由于“四人帮”歪曲了马

克思主义，以及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新问题”，这些情况和问题是马克思本人也没有考虑到的。报纸认为，这些问题中，包括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示的那样必定崩溃，为什么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仍然不如资本主义国家富强。这些也正是我所认识的大多数中国人开始感到困惑不解的问题。

党的理论刊物在1980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承认，“党的威信不高，这确实是事实。”文章引用英国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的“权力转化为腐败”的格言，认为也许“一个执政党和一个秘密的或者说非执政党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一个政党取得政权后的危险是什么？这种危险在于如果党的作为轻率、缺乏严明的纪律，党将退化变质。党在取得政权后，不应该命令群众，对群众指手划脚，不应该成为旧社会的独裁者和统治阶级。”这家杂志继续说，“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党似乎希望，这种直言不讳能有助于重新振作已经降低了的威信。1980年和1981年，共产党也采取了若干措施力图恢复早期更为民主的行之有效的作风。北京提出废除干部终身制。终身制曾使那些老一辈革命家得以占据在党、政府或军队中的位置，尽管他们已年老体弱而且不称职。党还制定了从1949年以来的第一个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颁布了解放后的第一部刑法，以便进一步制定一部更为正规的司法制度。党还组建了一个新的领导核心，其中包括胡耀邦担任党主席，赵紫阳出任国务院总理。他们替换了命运不佳的华国锋。华登上党政权力顶峰的依据是毛泽东在去世前曾对他说：“你办事，我放心。”

1980年初，我在四川拜会过赵紫阳。我报道过赵在四川所进行的工业和农业改革，在工业上给工厂更多的自主权，在农业上，则允许农民在耕种作物方面享有更多的发言权。那时，赵紫阳只是四川省的领导，虽然在我到四川以前，北京已有消息说，邓小平要提名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我要求安排一次机会拜访赵紫阳。但是中国的高级官员一般不愿会见长驻中国的外国职业新闻记者，因此，我并没有多大信心。

出乎我的意料，赵不但同意接见我，而且亲自来到我所住的旅馆，并且没有像一般高级官员那样有随从相伴。在外表上，63岁的赵紫阳并不引人注目，他中等身材，头发大都已花白。被提拔到北京后，他开始染发，浅褐色的眼睛，声音平静柔和。不过，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的平易近人，谦逊谨慎；他头脑冷静、思维敏捷，对于曾给中国带来混乱的原因的分析具有说服力。在谈及借鉴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改革经验和对市场作用正进行实验时，他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语‘摸着石头过河’。不管怎么说，得过河。不可能跳过去。有时候，事情没办好，得重新再来。”

中央宣传部的一个调查小组发现，位于广东的华南师范学院，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在上必修课马克思主义时缺席。据一篇文章透露，其余的学生坐在教室里读小说，写信，或者做其他功课的作业。学生们抱怨，由于政策往往根据掌握政权的人变换而改变，学习反而使思想更加混乱。对政治课不感兴趣的另一原因是，许多担任这些课程的教师水平太低。优秀的教师在过去历次运动中被排

济、清算，现在大多数教师不敢担任这些课程。

甚至在领导人中，也有一种怀疑、犹豫的情绪。对中国来说，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很难给我们现有的制度下一个定义。”云南省的一位官员告诉访问那里的美国外交官。“我们还正在进行许多实验和改革。凡是成功的，我们叫做社会主义。凡失败的，我们称为资本主义。”

邓小平本人给马克思主义原理所下的简单定义是“实事求是”。邓补充说，对这个定义的必然阐述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或许，为了使已经降低了威信的马克思主义更有号召力，邓小平重新提出了十九世纪末期具有改革思想的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主张，他们欲使中国现代化而且赶上西方。他们的目标是使中国“富强起来”。在1981年接见罗马尼亚的一个代表团时，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说：“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使国家富强起来！”在内心深处，我所认识的大多数中国人真心拥护共产党的正是这个目标。

最富于爆炸性和最敏感的问题，对党来说，是如何对待党的舵手毛泽东的思想遗产。20多年来，毛泽东为人们所顶礼膜拜。对他的个人崇拜变成了一种庸俗化的宗教。但是许多中国人早就厌倦了不停地进行阶级斗争的号召，谴责他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和灾难。王府井大街是北京最繁华的商业中心，这儿有一家新华书店，书店前门正中的玻璃柜台陈列着出售的毛泽东著作。但是，几次到书店时，我注意到，柜台后面没有营业员，周围也没有一个

顾客。相反，顾客们排队争先购买中国传统古典小说以及学习英语和物理方面的书籍。这两门专业现在中国最为吃香，因为人们认为，学好它们可以得到好的工作，还有可能出国。

一个大学的中年教师告诉我，一天早晨，她非常不满意学生在一次考试中的成绩。她引用毛泽东的一篇有名的文章来批评他们，说明必须发奋刻苦学习。这篇文章提到，一个叫诺尔曼·白求恩的加拿大医生，1938年来到中国，在游击根据地的某红军部队服务，并且以身殉职。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毛泽东这样写道。但是学生们却窃笑她。

“下课后，几个学生来到我处，”她回忆说，“对我说，老师，你刚才引用毛主席语录，你确实太那个了……。接着一下大笑起来。”

在天安门广场中央，耸立着毛泽东的最后安息地——毛泽东纪念堂。纪念堂用白色大理石建成，是一个移植到中国的类似新古典主义建筑式样的殿堂，看起来与其说像中国传统的宫殿，不如说更像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纪念堂仿照紫禁城皇宫深黄色的双层屋顶具有中国风格。纪念堂正面朝北，有违几何学规则，这在一些中国人看来，是不吉利的征兆。四名解放军战士，身穿深绿色的冬季军棉服，头戴五星皮军帽，守卫着入口。也就在这12月的一天，我来到纪念堂瞻仰。毛泽东躺在光洁的黑色大理石镶嵌的室内，遗体安卧在水晶棺内，只能看见他的头部和上半身；其余部分盖着一面中国共产党党旗，红旗上面有黄色的镰刀和斧头。他去世后曾有谣传说，政府为如何保

存好他的遗体碰到麻烦，只好求助于越南人——他们曾经有存放胡志明遗体的经验。

按中国的规定，悼念者只允许集体，而不接待个人。我很想了解有关建筑纪念堂的一些情况，因此向一个卫兵询问。

“我是战士，”他回答，“我不知道。”

然后，我向穿着便服的其他在场者提出同样问题，他们也回答一无所知，对我指着入口处的一个年轻的长辫姑娘，她身穿棉鞋，头上包着一条三色的围巾以抵挡严寒。她是官方派来的接待员，他们对我说。我问：建筑纪念堂花去多少时间，什么时候开放？若干年前，我曾在中国报纸上读到过有关详情，可我此时竟然全忘记了。

“不知道，”她也说，转过身去。

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向导，纪念堂内没有任何文字和展览物来叙述毛泽东的功绩。这个问题太费解，因此，主席不过是另一位死去的先辈，他的功过最好让后人评论。

我离开中国不久，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文件，对毛的一生进行了仔细、谨慎、全面的分析。为了发表这篇长文，用了一年多时间来作准备。对毛的功过分析是温和的，有所保留的。“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文件说，正是毛泽东的领导，中国革命才能在1949年取得胜利。“的确，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犯了严重的错误……，”他更加专断，不民主，甚至听不进去任何反面意见。“但是，如果我们全面地判断他的一生活活动，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远远超过他所犯下的错误。他的功大于过。”

然而，我想知道的是那些曾经忠于毛泽东的老干部如何着想，他们是否为这种结论感到失望沮丧。在我离开中国前的一个晚上，很凑巧，一位朋友约我同毛泽东家庭的一个成员在进晚餐时见面。这位朋友特别提醒我，条件是我同意不公开这位成员的身份，此人的处境目前并不太妙。

这位中年男子有高高的前额，头发向后梳，看起来，显得庄重、成熟。每当他谈到毛泽东，总是用“主席”相称。他说，由于现在人们对毛泽东有许多误解，他愿意同我交谈这个问题。他坚持认为，毛泽东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相反，他心胸宽广、坦诚直率。他喜欢读书——当他到各省视察，最重要的一件事是随身带上大批书籍，他的床总是一半放着待读的书卷。

“举一个例子，”毛泽东的这位亲属说，“甚至到70岁高龄时，他对美国还产生了兴趣，读了许多有关美国的书，终于实现了邀请尼克松访华的计划。”

“现在，许多干部为他们自己谋取特权，但是主席总是十分民主。他生活简朴。有时候，一些人为他做的某些事，他本人根本一无所知。有一次，他到外地视察，人们在主席的花园里修建了一个游泳池。主席喜欢游泳，但他非常愤怒。”

“他告诉自己的孩子，别依靠我，也别依靠别人，要依靠你们自己。他对我们说，他去世后，他的所有存款和所有物品都将留给党和国家。”

“我记得，一次，我到一個公社劳动，”他继续说，用筷子替我夹了几粒花生米。“我回家时，全身脏透了，头发很长，也没刮胡子。我不好意思同家里人一道进餐，但

是主席说，‘好，太好了，你看起来挺好嘛。’”

他接着叙述，的确，正如政府在毛泽东去世后所一再强调的那样，主席同江青的关系并不融洽。作为“四人帮”的魁首，江青已被逮捕。两人之间的矛盾从40年代在延安时便早已开始，他肯定地说，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他们在北京没有像夫妻那样生活在一起。

“主席大部分时间没同她见面。主要原因是主席的工作规律不同于一般人，他习惯在夜晚工作，白天睡眠。每周只有一次一同吃饭，定在星期六晚餐。对主席来说，实际上是早餐。”

“后来他们分居。主席在北京，她就到其他省去。主席到各省视察，她便回到北京。主席看不惯她的唠唠叨叨，不能容忍她的野心。主席在晚年时，有时甚至下令不准她到自己的居室，卫兵不让她进去。”

晚餐结束后，毛的这位亲属希望我能回答他一个问题。他沉思片刻，然后说，为什么同日本相比，中国如此落后？一百多年前，两国的情况差不多。“这是否因为社会主义出了故障？”他问。

这个问题很使我难堪，在毛泽东的一位亲属面前，我不知道怎样解释中国的这种选择。但是，没过一会儿，他本人却作了回答：

“在理论上，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他说，“社会主义要求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但是，在实践上，社会主义却暴露了许多弊端。我们放任权力和官僚主义，使它们的力量越来越大，因而阻碍了个人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中国应该寻求一种方式，将这两种制度结合起

来。”

我问，主席是否也有这种看法？

“主席总是愿意学习的，”他回答。

第14章

卫东的彷徨

胜者为王，败则寇。

——中国古代谚语

八月的一个炎热的日子，卫东从部队请假回家。他同所在团的一名战士到外面去饮了白酒。于是，卫东的战友建议去看一位他所认识的名叫洪的相貌出众的姑娘。

洪有一张标致的瓜子脸蛋，皮肤白皙，水汪汪的大眼睛，一头乌黑发亮的秀发。卫东的朋友说，1967年，像大多数她的高中同窗那样，洪拒绝“自愿”到农村安家落户，便假装生病。自从那以后，她每天都躲在家里，因此，她准在家里。洪的老师曾多次到她家动员，说服她下农村，以便履行爱祖国的义务。但她仍然不从。洪还拒绝了她所在的居民委员会的安排，不愿到当地的一个集体合作洗衣店做工。在洗衣店，得用手工洗衣，经常接触冷水，即使是漫长的北京冬季也如此。

洪对于政府上山下乡的指示，根本不屑一顾。她的父

母亲都是教授，按中国人的话说，是知识分子。父母都出生于富有的商人家庭，1949年以前，在外国教会办的学校里读过书，英语讲得很漂亮。她父母的好几位哥哥和妹妹都在美国和英国的大学里求过学。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没有回国，一直在国外工作。因此，文化大革命一爆发，她的父亲成了重要对象，即如激进分子所指控的那样，是有“海外关系”的资产阶级分子。在中国，仅仅因为在国外有一亲属，就会成为受到怀疑的原因。她父亲所在大学的激进派把父亲打成反革命分子，而且把他送到人们委婉地称为的“学习班”里改造，一去就是两年。学习班不是监狱，不过，他得用全部时间学习毛泽东著作，写交代，坦白所谓的与外国特务有关的活动，一个月只准回家一次。

因此，卫东和他的朋友身穿军服，满脸通红，散发着阵阵酒味，来到洪的住处时，她把两人推了出去。

然而，当洪粗暴地对待他们时，卫东却为她姣好的容貌，她那翘嘴带有的俏皮意味的风韵所迷住了。卫东性格刚毅、果断。事实上，他的父亲出身于贫农家庭，30年代共产党在延安进行游击战争时期，便加入了红军。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创建后，被提拔为海军的一名高级将领。卫东是部队篮球队的明星——一个高，瘦长，结实，手大，具有运动员良好的身体素质，而且长得很帅。他的嗓音浑厚低沉，有一种格外威严的风采。当他说话时，同室的人都得洗耳静听。他的性情也暴躁，甚至狂放。这种特点，使我联想到另一位中国青年约翰·韦恩。后来，我才知道，“公爵”是他最喜欢的电影明星。

当天傍晚，天黑下来之后，卫东一人越过砖墙，从后

窗进入洪的居室。

“干吗你不让我进来？”他直截了当地问。

洪惊慌失措。但是洪的一位上了年纪的邻居是宿舍治安委员会的成员，她正好看见卫东偷偷溜进洪的居室，便立即通知了派出所，几分钟后，警察人员来到洪的家。

“你是谁？”他们开始质问站在面前的高个子士兵。卫东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他们打电话找他父亲核实，终于弄清楚了卫东的家庭背景，将他放走。

次日，卫东又来到洪家表示歉意。但是没见到洪。警察已经将她带走，她母亲很冷淡，没有说明任何原因。在他度假的随后几天，卫东又几次来到洪家，想知道她是否已被放回家，但一直没有见到洪。

一月后，当卫东再一次休假回家时，才知道洪已被正式逮捕。指控她犯罪的理由是，作为一个有“海外关系”嫌疑的知识分子女儿，她试图引诱一位战士，同时又是将军的儿子。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挂帅”的时代，所有的阶级划分观念已被完全颠倒了。

卫东很内疚。他对于自己给洪带来的这些麻烦有一种犯罪感，竭力设法利用他父亲的关系使洪能得到释放。他甚至到北京的一个法庭，承认自己应负全部责任。但是当时警方紧张得无暇顾及。因为正值国防部长林彪暗杀毛泽东未遂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月。公安局最终释放了她。洪后来告诉我，警方提醒她，她所受到的指控并没有了结，只不过是证据不足罢了，此事仍得保留在档案内。

这时，卫东已深深地爱上了她。洪仍然没有工作，卫东请求父亲设法为她安置工作。可是卫东的父母不相信洪

的家庭，坚决反对卫东再同她见面。

“他们说，如果我同她有任何关系，在党的眼里，我会成为不可靠的人。我从小便梦想进军事学院，像我父亲那样当一名军官。我很希望得到提拔重用。”但是，当他继续同洪保持联系时，他所在部队的司令员告诉他，他的服役期已满，得退伍回家。负责为老兵安排工作的部队军官指定他当了一名机修工人。对卫东这样具有高级干部家庭背景以及精力充沛、才干过人的人，这无异于脸面丢尽。

卫东唯一的安慰是他能倾心的美丽姑娘这时也开始爱上了他。他们徒步来到北京西郊的山区野游。只有他们两人，彼此吐露了爱慕之情。不同于许多中国青年，他们没有把婚姻当作致富的手段，也没有为了得到一份较好的工作，就想法与一个有后台、有背景和社会关系广的家庭拉上关系。洪和卫东说，他们的爱情是以感情为基础的。卫东28岁，洪25岁时，他们结合了。在中国，这种婚姻并不寻常，一个是将军的儿子，另一个则是教授的女儿。

我第一次同他们见面是在一位外交官的家里。时值1978年圣诞节，政府不久前放松了限制，实行更为开放的政策，允许中国人和外国人有较多的接触自由。洪所认识的一些外国留学生还邀请她出席一次聚会。不过，她还悲观，担心这种大开放的时期不会持续太久。

“这次机会实在很稀罕，”她在晚宴结束时对我说，“我们以后可能不会再有机会见面。”她给了我她的电话号码，但不管怎么说，这已是很大胆了。为了促进美国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我在北京只待了10天，6个月后，中

国政府允许《纽约时报》在北京设立办公机构，我才得以返回北京，并在中国首都长住下来。我所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洪。接电话的一位妇女，问我是谁。这使我进退两难，我不愿意说出我的真实姓名或《纽约时报》，以免给洪招惹麻烦。因此，我说自己是刚从纽约来的美国学生，希望对方替我接通电话。那妇女马上回答，洪不在家。以后，我又打过几次电话，仍然回答不在。我心想一定不会再见到卫东和洪了。然而，有一天，当我午饭时分走出饭店时，我看见洪和卫东站在人行道上。他们猜出是我挂的电话，鼓起勇气向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打电话询问我的住址，决定在饭店外面等我。

洪向我解释为什么她没有回答我的电话。“电话不在我家，而是在治安委员的家里。他们向警察报告，凡有嫌疑电话都得追究，特别是像你这样的外国人打来的电话。警察直接来问我你是谁。我吓坏了。”只有官员才有自己的电话，她说，所有的公共电话都安在商店、办公室，或与警方有关的人员家里。这实在是控制人最重要途径之一。

他们告诉我，他们现在处境维艰。洪的母亲已为她安排好到美国去看望住在纽约的姨母。姨母希望洪能留在美国上大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更为讲求实际，为了使更多的中国人能接受高等教育，制定了一项新的政策，允许在海外有亲属或有经济资助的中国人出国上大学。这是中国目前的另一个转折，再一次承认教育的重要性，知识分子又重新恢复了他们曾经失掉的地位和尊严。于是，成百上千的中国青年人渴望出国，在国外上大学。

这对洪来说，当然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但是，她却举棋不定。她承认，她母亲还怀有另一个目的。“她不喜欢卫东。事实上，她恨他，”洪说。和卫东的父母亲一样，洪的父母也反对他们的结合。他们不喜欢干部，特别是高干子弟。洪接着说，她母亲有意把他们拆散。

后来，当我见到洪的母亲——一位身体瘦小，保养得很好和感情容易冲动的中年妇人时，我才明白了她母亲坚持要洪出国的原因。她回忆说，“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学校的红卫兵来到我们家，搜查了整整一天，他们把我们的家俱，我的珠宝首饰、所有的书籍以及唱片全带走了，许多东西是从国外带回的。只给我们留下一套衣服。他们强迫我们把书和唱片搬到院子里。然后，他们放火烧学校，火持续了三天。”

“太不公道的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最重要的书籍和唱片被运到了北京各地的仓库。在那儿，高干子弟按每一磅1角5分钱买了回去，不是每本书，每张唱片，而是每一磅！”

“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中国人对生活抱有极大的幻想。我们相信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能把中国变成繁荣富强的国家。人们富于理想主义，任劳任怨，努力工作。他们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要了解中国的现状就必须明白这一事实。有的干部只热衷于如何保持自己的权利，工厂工人干活不积极，年轻人失掉了整整10年的上学机会，没有工作。人们变得自私了。”

洪母亲的言词愈来愈尖锐。“中国当今最严重的问题

是没有公共道德准则。孔子的伦理观被摧毁了。而现在，共产主义道德也变得淡漠。”

虽然，她因卫东的父亲身居军事要职而讨厌卫东，我却发现她并没有意识她同卫东其实有许多相似之处。文化大革命也使卫东变得牢骚满腹，甚至可以说玩世不恭，他渴望成为解放军军官的梦想也由于他对洪的爱而破碎了。他在生活中的地位现在也仅是个机修工。卫东对自己的前途感到失望，像他那样的一代中国人也无不感到前途渺茫。

“年轻人现在缺乏明确的生活目的。我们只好混下去，”卫东说，使用了一句中国口头常用语，意思是每天混时间。“如果让他们干一件事，他们会做，但他们不使劲，可以说是三心二意。”不同于洪，他在生活中的唯一消遣是去看美国或西方电影。因他父亲的关系，他仍然能去看“内部”影片。

我谈到许多美国年轻人也有迷惘、也有异化感，物资极大丰富，能享受到现代生活所能给予的一切，如小汽车、彩色电视、舒适的住房。但这也使美国年轻人丧失了对生活的责任感和目的感，没有什么力量驱使他们在生活中朝前看。

“对于中国人，情况大不相同，”卫东接过话题说，“在我们的生活道路上，总有什么东西横在我们面前，阻碍我们，使我们无法通过。”一天晚上，他说，在他看来，中国最大的出路在于同苏联打一次大仗，重新开始一切。

这种观点出自一位老将军儿子之口实在令我惊诧。他

的父亲有何看法？我问。

“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共产党员，不过，他现在也变得沉默寡言，”卫东回答，“我回到家，我们很少交谈。我父亲什么也不告诉我。对他来说，说出他心中对现状的真实看法很危险。”

卫东的父亲能够享有许多难以估量的特权。不久前，他的父亲已搬到专门为高级将领新修的一幢十分宽敞的住所，把自己原来住过的舒适的旧套间让给了卫东——两间卧室，一间起居室，一间盥洗室和厨房，比分配给城市居民的住房更宽敞、更舒适。但如是为了分配到一般城市居民所住的那种小住房，洪和卫东首先得向市房管局提出申请，再等3到5年的时间。在一面墙上，挂着带有黑框的周恩来肖像。周恩来是中国人心目中洁白无瑕的英雄，一个温和，多谋远虑，有儒家风度的共产党人。在一个书架上，立着维纳斯·德·米洛的半身石膏胸像，外面罩着一层透明塑料纸，以防灰尘。卫东是业余艺术爱好者。他亲手画的、富于想象风格的洪的肖像，以及父亲的肖像一齐挂在另两面墙上。双人床上放着理查德·尼克松的《我的六次危机》中文译本。此书是用他父亲的特供证在专门为高级干部开设的书店买来的。书箱里还有其它书籍，如菲兹杰拉德的《伟大的盖茨比》，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中国古典小说等。如果考虑到中国的政治麻烦以及书籍的匮乏，洪和卫东的私人藏书应该说是相当可观的了。

卫东具有领导才干。如果他没有受到当局的怀疑，他或许会在现行制度的仕途上一帆风顺，青云直上。每当我在晚上来到他的住室时，总会看见，早已有三到四位朋友

在那儿，像他一样的年轻，大约30岁，是其他将军的儿子，曾同他一块儿长大、一块儿上学。他们喜欢听卫东聊天。一个冬日的夜晚，其中的一位来客个子不高，脸上还有孩子气，平头，身穿绿色的军上装。卫东毫不迟疑地向我介绍，这位平头年轻人是北京某重点大学团委书记。他负责在学生中发展新党员，并确保加强学习纪律。他是否也像卫东一样玩世不恭？

平头年轻人也笑起来。“让我来告诉你我怎样入的党。我当时在部队，转业复员时，安排工作的一位领导干部告诉我，如果入了党，能更容易分配到一份好工作。眼下，一些党员甚至也得不到满意的工作，所以，如果不是党员，情况会更糟。”

“现在入党的人仍然多吗？”我问，“是的，一些人仍想入党，不过，他们入党的动机不纯。我们说这些人进了组织，但思想并没有入党。他们入党的目的是想得到物质方面的实惠。能够真正起作用的人却不愿入党。最困难的是，人们总是说，请你发表自己的意见，然而，一旦你真正知无不言，说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你会招惹麻烦。”

一个冬日夜晚，卫东的门上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卫东一开门，只见一位脸上有痘痕的身材魁伟的年轻人，身穿一件灰色大衣，一条褐色的围巾围着脖颈。他手拿一捆纸卷。卫东向我介绍，来人绰号“大中国”。纸卷一打开，里面是一幅明代的风景画。大中国说，他受一位“老人”的委托将这幅画卖出去。老人的真实姓名他不愿说出。他也没有提供更多的情况。因为按照中国法律，所有艺术品和古董必须通过国家管理部门出售。这样，政府能

够从中获取利润，大中国是一个搞秘密转手买卖的中间人。

卫东叫来客中的一位女朋友把画展开，他从远处打量着这幅画。“戴上手套，别留下指印，”他吩咐。此画约5码长，用柔和清淡的绿色和棕色十分细致地勾画出山峦、河流以及亭阁。卫东仔细观看画的风格，画家的签名，以及盖在画上的若干个红色印章，然后，对大家说，这是一幅16世纪原作。

要价多少？他问大中国。回答是5千元。“请你关照，老兄，”卫东抱歉地说。这是讨价的信号。结果，他们终于以4千元成交。

我不敢相信卫东会考虑买下这幅画。他每月工资48元“价很高，”卫东说，“在国家商店，他们出售给外国人至少要三万元。可这不是我买，替我父亲买的。”

1949年，卫东的父亲随部队进驻城市后，便开始收藏艺术品，而且，他还没收了若干富有家庭的收藏品。卫东理直气壮地说，这些艺术品在父亲手里更为安全，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不敢闯进他家毁掉这些名画。

“中国的真正权力掌握在军队。”卫东不无自豪地说。我从其他中国人那儿也听到过这样的话。

然而，在中国，甚至将领们的工资也不算太高。据我所知，最高收入是每月400元。不错，卫东同意我的看法。但是他说，我忽略了他父亲所得到的其他不需由本人开支的实惠：免费的住房、一辆小车、开车司机、勤务员、公务员，以及由部队农场提供的食品。他父亲的全部收入几乎都存入了银行。“在当今中国，人们想要的不是钱，而

是权力。”仅仅依靠金钱并不能买到这些特权和实惠。

几个月后，由于洪已有孕在身，卫东漫无目的，缓慢的生活节奏开始有了变化。我第一次知道这种改变是当我路过他们家门，顺便去看望他们时，看见洪的膝头上趴着一只带有虎纹的小猫。

“卫东给我的，我可以学学怎样带婴孩，”洪坦率地对我说，脸上洋溢着微笑。在某种程度上，这件事本身也表明卫东孩子般的、任性胆大的气质。在中国城市，养猫和狗都是非法的，因为它们耗费粮食，而且政府认为它们传播细菌和疾病。

“有一只猫比狗更安全些，”卫东说，“它们呆在家里，外人看不见。狗会跑到外面。政府不能容忍的是，让外国人知道政府的法令并没有被遵守。”

不过，卫东变得更加成熟，更加深沉了。自从因为与洪的交往、恋爱、婚姻而使自己梦想成为一名军官的愿望破灭之后，他第一次开始考虑自己的前程。这一次，他得依靠自己的家庭背景。由于父亲的周旋，他在一家外贸公司谋到了一个低级职员的位置。

洪说，“他现在思虑的全是与工作有关的事。他早早就起床上班，在公司呆到晚上才回家。再没有时间看电影。”

然而，令人厌烦不满的是，卫东现在甚至考虑入党。“如果我是党员，我会提升得快一些，能得到一点额外收入，我们的家庭会过得好一些，”卫东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梳理着自己的短头发。“我并不是不关心中国往何

处去，我非常关心，正像我年轻时曾是积极分子那样关心国家的前途。然而，我现在明白了党也就是这么一个组织。”他想入党也的确并非易事，不过，情况比他70年代初期因为与洪的关系而不得不复员退伍时要宽松得多。而且，他还指望他的父亲以及他在单位的许多朋友也会为他入党助一臂之力。

洪不同意他的打算。“我是知识分子。我一向讨厌政治。政治总是一样，自从儒家学说产生以后一直如此，只不过是為了操纵、统治人民而已。”她的肚子已微微凸出，穿着丈夫的一件又大又旧的军上装。当时还没有现成出售的，专为孕妇准备的服装。

洪曾经到处搜寻有关养育孩子的书籍，但是在政府的书店里一本也未找到。在中国，儿童教育学只是在不久前才被承认是医学的一个分支。大多数家庭一般是依靠从祖辈一直传下来的民间学问。不过，洪却从洪父亲所在学院的图书馆里借了一本，作者恰好是一位美国医师，她向我打听，这位斯帕克博士在美国是否有名？

他们的孩子出生后，我去看望这个有了一位新成员的家庭，带着一盒美国方便纸尿布，这种尿布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卫东雇了一位阿姨，每月酬金20元。阿姨的份内活儿是照管婴孩。

洪现在注意打扮起来，除了画眉，嘴唇上还涂着浅浅的口红，对于中国的年轻妇女来说，这是当时逐渐开放所带来的又一变化。洪为能够作母亲不胜欣喜。在婴孩未出生时，他们亲笔写了一份保证书，只生一个孩子。这是中国政府旨在2000年前把中国的出生率降到零而发动的一场

新运动的部分措施。洪说，“居民委员会和我们的工作单位向我们施加压力。他们常常到家里找我们谈这件事。我们实在不能拒绝。”孩子生下竟是女孩，卫东为此非常失望。像大多数中国人他也想要男孩。不过，为了让他们履行自己的保证，洪因此得到她工作的中央某部的许可，享受产假半年。洪在部里的职务是翻译。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呆在家里无事可做，父母便教她学习英语，现在终于派上了用场。

现在，洪却不愿再回部里工作。“如果允许，产假结束后，我愿意留在家里，好好当母亲。”这种表露，我从许多中国妇女那儿也听到过。中国妇女不同于美国妇女，她们面临着另一种现实，她们不能在事业和家庭两者之间作一选择。按照法律，她们得工作。

洪也把自己的头发剪短，像许多中国妇女还烫了发。洪解释说，“我希望留长发，但是卫东要我烫成卷发。他说，这种式样看起来更有现代意味。”在书架的底层，我注意到，有一套塑料卷发夹，这东西曾经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装饰品，现在确实说明了中国形势的变化。

由于希望在事业上取得进展，卫东对于我们之间的约会变得小心谨慎起来。当我邀请他到我们公寓来吃晚餐，他还事先打电话给一位在公安局工作的朋友，了解我的名字是否被列入受到警察监视的名单中。“我们关系亲密，无话不谈，我能向他打听我想知道的一切事，”卫东说。我曾经被列在这份名单上，可现在已解除怀疑，卫东没有进一步说明其中原委，不过，我仍然很高兴地知道我会安

然无恙。

我们在电话上约定一块儿进餐。当我打电话到他的新办公室，接电话的是另一个人。顿时，我犹豫不决起来。接着，我听见对方用惯常的语气问：“你哪儿？”

“我是卫东的朋友，在城外打电话，”我回答，竭力抑制住我由于不安而变得颤抖的声音。

我听见他大声朝办公室外喊叫：“你山东来的一位朋友打电话找你。”我全然放下心来，同时受宠若惊。我被当成了一个中国人。可卫东后来取笑我说，山东口音是中国最难听的口音之一。

那天晚上，卫东和洪来到我的公寓，卫东同埃桑玩开枪游戏，他藏在沙发后，对着一面墙佯装射击。“长大，你要当一名战士，”卫东怀旧似地说，似乎在重温自己已经失落的梦想。

卫东告诉我，市城建局正在强行要求他从他父亲让给他的公寓里搬出。“住在附近的人一直在发牢骚，他们说，我们三个人就住这么宽敞的房屋，而他们一家五、六口人只住一间屋。他们说，我能住进去只是因为我是高干的儿子。不过，我决不搬出。他们什么都能干得出来，他们也许将会把我们给赶出去！”听他的口气，我能感受到他还是那么固执，满不在乎。不过，他确实又显得很认真。

结果，市政府限定他们在10天内搬走。如果到时候不搬走，政府将强行驱走他们。在到期的那一天，卫东没有上班，呆在家里。他请来了十多个朋友。“一个个身强力壮，可不是好惹的，是我所能物色到的最不容易对付的小

伙子。”

按原定时刻，来自市城建局的一辆大卡车开到卫东住房门前，随车有一名干部。但是这位官员并不想动武，只好将车开走。对我来说，这件事无疑使我懂得了一些道理。中国政府总是依靠说理来对付它的公民，并认为，这是最民主，最有效的方式。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威信降低，人们对党的信任感也丧失，这便常常导致了政府工作的无能，于是，一个强调权威集中的国家出现了权威集中的危机。

“老百姓说，我们这些高干子弟享有许多特权，我们又臭又硬，”卫东说，“可我们没别的地方可搬啦。我总不能让一家人受冻。”

第15章

有一位雕刻家

政治家憎恨作家，因为作家播下反抗的种子。政治家所梦想的是能阻止人们思想，所以，他总是指责作家搅乱了他的秩序。

——鲁迅

雕刻家的单间居室位于一幢没有电梯设备的公寓四楼，地板上到处散着土屑片，这清楚地表明他所从事的职业是雕刻。为了便于雕刻，他坐在搭在两个锯木架上的木板上，这样晚上还可以当床。他的工具很简单：只有一二把雕刻刀和他自己设计的凿钻。他的陋室宽2公尺，长3公尺，光线总是很暗，唯一的小窗似乎透不进阳光。因此，他工作时全靠天花板悬挂下来的吊在一根铁丝上的40瓦灯泡照明。居室外面有一个小阳台，放着几棵白菜，一只碗里装着上一餐留下的少许剩饭。可以看出在北京漫长而寒冷的冬季，这个小阳台成了他的冰箱。

然而，雕刻家经过深思熟虑而创作的具有深刻、辛辣意味的雕刻作品却几乎堆满了整个房间。它们要么靠墙壁而放，一直高过他的头顶，要么被塞到书架上，或放置在角落里。正是这些作品使他在许多中国年轻人的心目中，成了一位印象派主要人物。他的书架上放着一个雕刻头像，面目粗糙变形、古怪，题为“沉默”。一只瞎眼周围的几何图形般的雕刻痕迹分外鲜明，“瞧，他只能用一只眼看问题。”我有一次到他的居室时，他这样对我解释。那头像的鼻子没有能嗅味和呼吸的鼻孔，嘴里还塞有一个圆筒，这表现的是不能讲话。“看到他，你会联想起那些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坏干部，他象征着我们无法说出真心话。”雕刻家欣赏着他的作品说。旁边书架上则放着讽刺江青的半身雕塑胸像，这是他用上街拾到的一支木头玩具枪雕成的。枪柄雕刻成类似妇女的裙子，枪管成了她的手臂的延伸部分，江青喜欢用枪管代替棍棒打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他嘲弄地说。

雕刻家身材不高，脸上总是挂着惹人喜欢的微笑。他很有礼貌，语言温和低沉，几乎近于耳语，相貌平平常常，使人难以相信就是他在自己的雕塑作品中爆发出如此强烈的内心愤懑。为了捕捉他谈话中的含意，我得格外专心致志。

在他那张既能坐着工作，又能当睡觉用的木板下面藏着他最称心如意的作品。那是曾在文革中被千千万万人崇拜的毛泽东头部雕像。不过，经他的双手巧妙塑造的头像被赋予了面容特征。雕像面目酷似已故的毛泽东，简直达到了惊人的逼真程度，这一点没有谁会有所怀疑。按照现

代西方的审美标准来看，他的雕塑谈不上精心，细腻，倒显得非常的粗糙简单。我以后才知道，他只是从1978年才开始从事雕塑。然而，他的作品却富于感召力，相当动人。表现了他的确不乏才气。

雕刻家之所以秘密地把毛泽东雕像藏起来，是因为他忧心忡忡，不知道人们会对他采取何种行动。在别人看来，他不但在自己的雕塑作品中流露了对党的吹毛求疵和不恭不敬，而且他根本就算不上是艺术家。按照规定，中国的艺术家应该属于国家的某个艺术团体，即国营单位，如北京画院或北京作家协会。一般说来，年龄高低和艺术生涯长短是进入这些单位的重要条件，现有的人员大多是1949年以前卓有成果的艺术家的。年轻一些的艺术家的，除了少数例外，得进国家艺术学院，坚持正规的学习，通过艺术专业课程的考试，才有资格成为艺术单位成员。这种官方承认具有一大好处：这些艺术家们像政府的其它雇员一样，领取固定薪金，并由艺术团体提供住房。他们用不着担心生计。但这些官方艺术家们却必须在艺术学院或公社以及工厂的艺术学习班任教。也有的制作装饰饭店、旅馆的美术图案或挥笔创作，再将作品交由国家的特别商店以高价出售给外国人，赚取硬通货。

他们也被要求服从党制定的艺术标准。1942年，毛泽东本人就文学艺术问题作了一系列的报告，详尽阐明了党的观点和要求。“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平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毛泽东声明“在现在的社会上，一切文化和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并解释说：在中国，艺

术家和作家必须为工农服务。“我们的文学艺术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就是说，艺术家必须接受再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也不例外。”毛泽东不满意的是那种不歌颂理想和劳动人民，反而专门挑剔毛病的艺术。“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的吗？”

问题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艺术家怎样才能创作党所希望的新型革命艺术？共产党人不喜欢中国传统的水墨风景画，视它们为封建主义的古董和糟粕。但是，他们也谴责西方绘画，认为自1890年以来的欧洲和美国绘画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他们厌恶抽象派，认为抽象派艺术内容空洞，没有意义，宣传中立主义思潮。因而中国解放后出生的一代艺术家发现，最安全的一种选择是：创作陈腐的通俗画，画面上的中国士兵红光满面，健康活泼，而且总是面带笑容；另一种选择是绘制风格陈旧的山水画面：有山有水，云雾缭绕，鲜花盛开，拖拉机手正在田野上操作机器，在远处，还可看见水电站或高压电网。这就使中国伟大的艺术传统丧失了生机。

但是，年轻雕刻家的实践却与这种艺术家的追求分道扬镳。他没有上过官方的艺术学院，他的本职工作是广播电台的一位剧本作者，雕塑只不过是他的个人爱好。1979年初，为文学艺术实行的较为灵活自由的政策所鼓舞，他和22位业余美术家决定举办个人画展。这无疑是一次大胆的行动。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来，艺术展览几乎完全中止。自从1949年以来，还没有谁能在未得到官方文化部门

许可的情况下，敢于公开展出自己的作品。但是，虽然他们的申请被拒绝，他和朋友们却不变初衷。他们在九月的两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在北京美术馆外展出了150幅自己的绘画和雕塑作品。这受到了警察干扰，他们冲进展览场地，企图没收参展作品，理由是“破坏社会秩序”。然而，使这些自称“新星”画派的年轻艺术家们喜出望外的是，北京美术馆有一位他们的同情者，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好心人在警察企图抢走参展作品之前，帮助他们将作品转移到了馆内。

他不知道是谁在背后支持他的，但他猜测一定是某位有较高地位的同情者。不过，在同文化部交涉了两个月后，他和他的同伴们终于获准在柴禁城后面的北海公园举行正式展出。雕刻家欣喜若狂。借给他们作为展出的场地是从前清朝时代的一处美丽庭院。周围的池塘已经结冰。院内有几座凉亭，壁柱上刻画有红绿蓝三色飞龙和嬉戏玩耍的花猫，各亭之间的过道彼此相通，过道之上还有遮掩。时令已到十月末，气温下降到零度，从西伯利亚侵袭过来的北风使天气更为严寒，参展作品排列的地方没有一处生火。尽管如此，每天仍然有成千上万的观众冒着刺骨的北风来观看展览。

我到达时，雕刻家正坐在池边的栏杆上。天空澄澈湛蓝，正午的太阳投射到冰上的反光使人感到少许温暖。他显然为这突然降临的新的成功倍感欣然。他的大胆的雕塑不同寻常，很快激起了强烈反响。当我向参展作品走近时，一位身穿手工缝制的黑色外套、围着黑色围巾的中年男子正好在他面前停下，请求亲笔签名留念。好像是在为

他自己冒昧打扰他而深感歉意，他解释，“我以前也喜欢艺术，曾因为我的画被打成反革命，在监狱里蹲了整整三年。”

按照中国传统的方式，展览会在入场处准备有一本意见本，参观者可以在上面留下自己的观感。这次展出包括被官方称为没落颓废的各种风格的艺术画：法国印象派画作临摹，抽象派油画，还有少量裸体作品。然而，只有他的古怪而非凡的雕塑最受参观者赞赏，可以说独占鳌头。许多中国年轻人站在展台旁边，毫无顾忌地喧嚷着在意见本上写下自己的感受。

“我们敬佩你的勇敢。”一位参观者用清秀工整的毛笔书法写道，“同你相比，中国的职业雕塑家全是行尸走肉。”另一名写道：“中国人难道已变得麻木？”“不！我已经看到，中国人的精神仍然充满生机。这是我解放以来看到的最好的一次艺术展览。”然而，主要报纸对这次展览索性只字不提。

展出的雕塑中，有一件黑褐色的展品看起来是一位非洲人，面形被扭曲，嘴唇呈惊恐状，两只手臂向身体侧面举起，一只手握着一本塑料封面的小红书。文化大革命中，成百万的红卫兵曾背诵、朗读这本小红书，并放在胸前，成为他们每时每刻的护身符。塑像的另一只手握着一把小刀，象征着红卫兵运动的毁灭性作用。雕塑的题目是“高举”——文革中的群众大会上总是高呼“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显然，题目正是这句口号的缩写。

这件独到的雕塑，取自雕刻家本人的经历。1967年，

刚从高中毕业的他成了一位目空一切、自以为是的红卫兵，参与了在他的家乡天津清洗一个罗马天主教堂的革命行动。“我烧掉了教堂里的绘画，把塑像砸得粉碎。”他回忆这段经历时，仍然坐在池塘边的栏杆上。他的蓬松的长发在一顶灰色的工人帽下向外膨胀。“我当时相信，毛主席就是大救星。”

他出生于1949年，也就在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对我说，他的父亲是一位党员作家，为了庆祝共产党夺取全国的胜利，父亲给他取名“克平”，意思是“攻克北平”。他的母亲也是一位共产党员，部队文工团的一位女演员。他的哥哥是海军战士。全家住在光线充足的公寓里，他有自己的一间小房间，既是书房，又是卧室，墙上还挂着父母与毛泽东、周恩来的合影。照片中有一张引起我的兴趣，是他的妹妹坐在一只划艇的前面，手托着下巴，短裙下露出双腿，顽皮天真地对着镜头。这使我想起了40年代奶酪饼盒上的快照摄影。

雕刻家正像许多同时代的中国青年那样，经历了从狂想到失望，以至于怀疑的思想发展进程。他目睹过红卫兵伙伴之间无休止的派性斗争、武斗、打人、焚烧书籍和艺术画，被逮捕监禁，终于开始怀疑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接着，他的思想又发生了根本转变，按照最高指示，得让他们在贫下中农中继续接受再教育，因此他被送到严寒的黑龙江，一个国营农场劳动。

“太可怕了，比地狱还糟，”他回忆说。“我们十人住一间小屋，拥挤着睡在一张床上，就像干柿树叶那样，身上还长满虱子，”他说下去，嘟着嘴唇，手却伸进蓝色

的滑雪衣内层，仿佛要搜寻出一只想象中的虱子来。正是在农场，他的绝望有增无减。

喜欢雕塑对他来说是一件意外的事。他厌烦自己的编剧工作。一天，他拾到一张破木椅上落下的木片，“我不知道如何雕刻，不过，作为一个剧本写作者，我深受法国荒诞派戏剧，特别是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和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的影响，我决心试试用木头来表现荒诞派戏剧的艺术风格。”

寻找用于雕刻的木头是棘手的事。中国人口众多，森林在几世纪里毁损严重，木材因此奇缺。在北京，木材不出售给个人，甚至也不能用特别票证购买，但中国走后门成风，王克平开始经常到一个供应居民烧饭用木柴的小工厂蹭跬。

“他们的工作是把废旧的木坨劈开，以便居民引火之用。不过，有时木头太硬或太大，工人不愿使劲，便让这些木头堆到一边，”王告诉我：“我同他们交上朋友，同他们聊天。每当我到这家厂时，我送他们一些礼品，如瓶酒、香烟、电影票等。于是，他们开始让我把木头带走。”这种交易自然划算。木头扭曲、多结而且粗糙，不过这反而有益于他雕刻出凌乱的、被视为异端的作品。

他的父母最初反对他雕刻。作为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被他的离经叛道的艺术创作吓坏了。“他们说我浪费时间，会惹上麻烦。”他告诉我。他的作品展出后，父母得到观众的赞美之词之后才明白，儿子并没有失去理智。“他们不会在口头上说，但他们暗中为我感到自豪。”我想，尽管展出获得成功，但雕刻家却不能不感受到政治上的无

形压力。他断言，一旦稍有不慎，就会招致官方采取行动。所以我们总是提前约会，寻找不致引起官方怀疑的理由。我刚从香港回到北京，给他带了两大本西方现代雕塑的书。在展出时，我非常惊讶地发现，他几乎不知道这样一些西方与世界艺术界人人皆知的雕刻大师：亨特·摩尔、布兰库斯和贾戈麦谛。他所知道的近代西方雕刻家是罗丹。罗丹的“现实主义”作品在中国人看来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在中国的艺术著作中得到介绍。像中国其他的作家和艺术家一样，他对二十世纪其他的雕刻家非常隔膜。为了亲自把这两本书交给他，我不得不事先给他寄去一封短函，以补他居室没有电话之不便。接着他在一处公用电话间给我挂来电话，没有讲出他的身份，我们约定在上次见面的凉亭碰头。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在电话中没有提到具体地点。

为了尽可能不引人注意，我们从凉亭来到一处假山的背面，在石山园林见面，然后绕着小池塘漫步。在帝王时代，皇帝和他的妃子们一定在这里消遣过。土堆便是他们想象的大山，而池塘则是大海。正午，北京冬日的阳光一片灰濛，远处有滑冰者们在公园内封冻的湖面上穿梭溜行。

雕刻家最先注意到情况不妙。“警察！”他脱口而出，头微微向右边倾斜。果然，两个警察站在一个人造小山顶上，两位穿着深蓝色的民警制服，帽檐上戴有五角红星。他是否想离开？我问。可他回答：不！

两位警察，一个细高个儿，另一位矮小肥胖，从小山顶向我们坐着的石凳走来。凳上坐着雕刻家，我，还有汪

小姐。凛冽的寒风和刺骨的寒冷已使我难以招架，然而警察的到来更使我全身打颤。他们正好在我们前面走过，目光向我们两人扫来。我害怕，我们会被当作间谍逮捕。我的脚边是乘坐法国航空公司班机时送的旅行包，虽然里面只装着那两本书，但在他们的眼里，这必定是我们进行犯罪的证据。然而他们没有停下询问我们。两位警察却在我们的石凳上坐下，恰好把我们夹在中间，我能听到他们的呼吸声。

我感到恐惧，但雕刻家仍很镇静。他不满意文化控制，而且为摆脱这种束缚而斗争。他同我扯到现代艺术话题，足以表现出他作为艺术家的聪明和机智，还提到欧洲和美国的一些著名博物馆。二十分钟后，两位警察起身离开，没有同我们说一句话。

离开公园时，我看见两位警察站在公园的入口附近的小货摊前。货摊主人是一位中年妇女，专售棉衣，也代售公园门票。我明白是她向警察报告说公园里有中国人和外国人正在约会。

我对雕刻家说可以搭我们的小车，以便甩掉警察。警察似乎没有小车，我们可以让他在远离警察的地方下车，但他婉言谢绝。

“如果他们想抓你，你休想溜掉。”他说。

“他们有什么理由随便抓人？”我问。

“目前同外国人交往是最不能容忍的罪过之一。”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的作品展出之后，公安局的几位人员曾到他家，质问他为什么要同外国记者交往。“他们告诉我以后不准再同外国记者接触，还要我明白这种行为

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下场。”

在雕刻家看来，或者据我看，他敢于继续自己的艺术追求的原因是：“我们的新领导人现在经济方面的理论思想非常鲜明，但是他们在文学艺术方面仍不明确。”在另一次约会时，他说：“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害怕西方的影响，认为西方文化对中国有害无益，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人们长期以来与外界隔绝，他们中的许多人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是，生活水平一旦提高，文学和艺术不可能不受到外界冲击和影响。发展艺术、繁荣艺术最好的办法是：官方根本不要干预。”

我不知道他是否非常明智和清醒。中国的宏伟规划是四个现代化，四个方面是工业、农业、科学和国防。所有这四个方面都是物质利益，没有提及政治、社会生活、空闲娱乐或者文化方面的现代化。这并不是一个巧合。“四个现代化”这个字眼恰好反映了领导人的兴趣和关注之所在。

在1979年初，邓小平成功地访问美国期间，一天晚上，他应邀出席在华盛顿新落成的国家艺术画廊侧面大厅举行的一次庆祝会。这种高耸式的建筑由当代世界最优秀的华裔艺术大师、出生于上海的贝聿铭先生设计。（为什么中国国土上能产生自己的具有国际声誉的当代艺术家？雕刻家有一次曾这样反问自己。他的看法是，不在于种族因素，而是由于政府的横加干预。）个子不高的贝聿铭先生兴致勃勃，急于要领着邓小平参观这座建筑。但令东道主不胜惊异的是，邓小平在发表完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后，

取消了参观建筑的计划。我当时站在新闻司一位官员身边，他五十余岁，曾在美国教会学校受过教育，能讲一口流利的美国英语。他给外国人的印象是全盘西方化。我于是问他，对于贝聿铭先生的建筑设计有何看法？

官员没有立即回答，他承认没有仔细观看过。我接着又追问，他最后才说：“太奇特了，如果这就是现代派建筑，我们中国不需要这种现代化。”

共产党对于西方的有所选择的兴趣并不是新鲜事。这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当时的第一批中国改革家们在西方工业化强国的侵略面前，试图使古老的中华帝国现代化，曾为此思考过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他们的主张可以概括成“西学中用，中学为主”。这就是说，中国应该引进西方的科学和技术、西方的机器和军舰，但是保留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传统。现今的中国领导人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很难懂得工业化必将产生自己特有的新型价值观念。

因此北京却试图把自己隔绝起来，以抵制二十世纪的这些主要文化潮流的冲击：无标题音乐、现代舞蹈、意识流小说和抽象派艺术。若干美国和欧洲交响乐团在访问中国时，被要求不准演出20世纪音乐。1981年，北京态度鲜明地要求1949年以来在中国举行的首次美国艺术展览会换掉13幅抽象派绘画。只是在最后一分钟，由于美国官员坚持说，如果这些画被取走，美国将取消整个艺术展览，而且中止执行当年的中美文化交流协定，北京才改变态度，作了让步。即使到了这种关头，为了挽回面子以示抗议，中国人推迟了开幕式达12小时之久，妨碍了美国司法部长沃伦·E·伯格的致辞。伯格飞到中国，部分原因是为主

持展览会开幕式。中国人所反对展出的抽象派油画作品中，杰克逊·波洛克的《抽象第十号》以及弗郎兹·克莱因和海伦·弗郎肯沙勒的作品。

雕刻家本人也吃过这种教条主义的苦头。有一次，他曾同北京画院的一位官员交谈过，希望成为其中之成员。他们说，如果他决意同他那荒诞古怪的艺术决裂，可以接受他的请求。

“他们告诫我，工农兵不理解我的艺术。因此，我不可能为群众服务。”他叙述，“他们指责我是西方文化的仆从。我则回答，他们并不是工农兵，怎么能知道群众真正要求什么样的艺术呢？”

在同官方的一场类似猫和老鼠的周旋中，他并非单枪匹马。为了追求一种新的文化表现形式，使之不在破土之前就被窒息，他赢得了其他艺术家和作家们间接的或秘密的支持。他曾向我介绍过其中的一位画家。此人是高个子，沉默寡言，额头宽阔，仪表堂堂，他的职业是工人，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绘画，他曾去中国西南的中老边境体验生活。那儿有热带性的气候，雨量充沛，森林茂密，崇山峻岭中有河谷地带，显得青翠碧绿。当地居民系少数民族傣族，与泰国人有血缘关系。对他来说，那次西南边境之行仿佛就像当年高更到了南太平洋的塔希堤岛。那片原始土地的神秘和富饶激起了他的想象力。他将热带雨林中见到的色彩，赋予自己的油画作品，描出鲜亮的蓝色基调。他在我面前打开了长卷画幅：人们正在举行一种古老的仪式，妇女个个身材苗条，双乳全裸，长长的黑发披散到腰间，印花布的裹裙下窄小的臀部线条格外分明。他的作品

中的人物大都以森林为背景，画面还表现出腿部特长，躯体狭小的巨鹤，这些特征似乎同妇女的体态相映成趣。

他的作品融合了中国和西方的表现风格。中国画式的水墨色彩、西方的透视角度，使我爱不释手。我问他是否打算出售这些画作？他说：他曾经带着一幅画到离北京饭店不远的王府井大街上的荣宝斋。这家商店以高昂的价格向外国人出售近代中国艺术品，但却使他非常失望。“没有人懂。”商店雇员告诉他，“应该画山水画。”

还有一次，我认识了一位工艺设计师，他希望能成为诗人。他设法搞到了一件旧皮夹克穿上，长发超过耳朵至直领口。这种装束在中国算是大逆不道的反抗行为，使人觉得放荡不羁。不过，他的诗就内容的豪放和不规则的随意性而言，更是远远离开了党的文化政策所能接受的标准。因此，他很难得到一份从事写作的专业工作，只能在工厂就职。他属于一个非官方的自称为“颓废派”的团体。一天晚上，竟情不自禁地朗读了自己题为《疯狗》的诗：

经受了无休止的残酷生涯，
我认为自己不配叫做人。
我仿佛成了一条疯狗，
漫无目的地在人生的舞台上东游西荡。
我并不真正是一只疯狗，
如果我真正是，在绝望中我肯定会狗急跳墙，
可我只能 在绝望中忍耐一切。
如果我真是一只疯狗，

我会挣脱这条看不见的锁链；
我会毫不迟疑地，
放弃我这所谓的人的生活。

尽管雕刻家在艺术追求上碰到接踵而来的麻烦，他却认为比之西方的一些艺术家，他的处境还好得多。按照中国作法，他有自己的固定工作，因而能领取足以维持生计的工资。他说：更令人满意的是，每月5号，他只到单位报到，就能领取当月薪金。

“长期不上班是否会招惹麻烦？”我问。

“没关系。”他狡黠地对我微微一笑。“他们不会开除你，这是我们的优越性之一。”

他所在科室共有五名脚本作者。他们按规定应为夜晚的电视节目写出可放两个小时的脚本，但没有一个人上班。“事实上，我被认为是写得最多的一位。”他继续说：

“去年，我至少写成了一个脚本，可他们有的二十年中没有写出一个电视或广播剧脚本来。他们同主管领导人关系好，根本用不着担心。”

“不过，他们也不会用你写的脚本。在政治上，这些剧本不保险。”雕刻家补充说。“领导情愿用报纸或杂志上刊出的小说、故事等。这样做，他们安全。他们没有采用我写的任何一个字。我交出手稿后，得由十个干部审查。一个审完，交给下一个，再交给下一个，直至十个干部全部看过一遍。”

在我看来，他希望建立木刻雕塑中的荒诞派的构想来自于他本人在单位办公室里的感受。政府一方面引以自

豪，因为能保证每个职工都有事情做，这自然同资本主义的腐朽制度有着天壤之别。但这种制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领导人根本不过问办公室和办事机构中发生的事，不论你来上班与否，做事与否。

雕刻家对我的认真一笑置之。他显然自有道理。“再说，如果我去上班，也无法工作，因为没有办公室。”他表情显得轻松自在。“广播电台早就缺房，因此，领导把我们的办公室设在一间宿舍里，我的直接领导干脆叫我在家里办公。”

他所说的这种情况同工人分配到工厂所遇到的情况并没有什么不同。一些工厂由于建设周期推迟，长期不能开工。有的工厂被上级下令关闭，因为缺电和原材料。他们都同样领取工资，没有谁抱怨没活干，是政府的政策使他们心满意足。

在我离开北京以前不久的1980年秋，中国最受欢迎的电影演员赵丹去逝。赵丹从三十年代以来，在六十多部电影中出任了角色。中国人喜欢将他同克拉克·格布尔相比。赵丹也是党员，为了表明对他的尊重，甚至党的领导人也赞扬他。邓小平、赵紫阳等众多领导人都曾到医院探望他。也许，由于党的高级领导人的光临和关怀的鼓舞，赵丹勇气倍增，在临终前的病床上，亲笔写下一份给党的建议书，呼吁放松对文学艺术的控制。

“党应该领导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决定农业和工业政策，”他写道，“党用不着告诉我们如何种田，如何生产车床，如何剪裁衣裤，如何炒菜。他们干吗要指示作家如

何写作、演员如何表演呢？文学艺术是作家和艺术家自己的事。如果党对文学艺术控制过严，文学和艺术必将没有希望，他们也将一事无成。”

对中国来说，这些肺腑之言的确令人欣喜。更使人吃惊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了该信的全文，仿佛意味着党的认可和赞许。几天后，我最后一次到雕刻家住处，对他说：赵丹的呼吁书必定会使他大受鼓舞，可他却不以为然地对我扫了一眼。目光严峻足以令人生畏，就像教师指责学生忘掉了功课一般。我是否还知道些什么？他问我，接着告诉我上面对赵丹的文章非常反感。《人民日报》发表了赵丹的文章，现在，这家报纸的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编辑已被要求进行自我批评。雕刻家认为，党对文艺的政策将更加严厉。

我启程离开北京前，年轻雕刻家赠送我一件礼物。这是一只清代古瓶，呈黄色和玫瑰色，饰以龙和花纹。然而瓶面华丽的彩釉已经消褪，露出被刮去的痕迹，瓶颈处还缺了一小片。他告诉我，那是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废旧物件中搜寻到的。

“我知道，这是一只破花瓶，”他说，用中国人表达礼貌的特有方式，双手将古瓶交给我，“就把它看成是我们文化坎坷艰难的象征吧！”

第16章

情报·交流·小道消息

我们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觉悟，他们竟喜欢那些很荒诞的主张，以为我们生活的时代必须要那些吹毛求疵的报刊杂志才行。

——毛泽东

西方人阅读党报上刊载的各种文章，有时总是感到茫然。他们对这一套新闻系统如何起作用这一点，理解得似乎很不正确。我逐渐认识到这一点。因为这里有一条与新闻工具分离的、半公开的消息传播带，这个传播带把从不全国公开新闻报刊、广播电视上透露的有关政治局内部工作情况、有关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有关外交事务的确实状况等等，准确地传播开去。事实上，中国人至少对北京发生的事情常常了解得很清楚，同美国人了解华盛顿的政治内幕不相上下。

中国比较喜欢从各种不同的渠道获得消息。因为，这样更能够体现消息是权力，是构成人们意识的权力这一种

信仰。由于过去靠几十年的游击战术，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胜利，中国对于那种在秘密环境下求得生存这一点坚信不疑。所以，不管一则消息多么无关紧要，中国在透露时，总是十分小心的。

在赵紫阳将受到提升的消息在全国流传开来的时候，正逢纽约市长访问北京，旨在同中国首都建立姊妹城市。这次来访只不过是商业广告的花招而已，并不是正式的外交事务。纽约市长自己也承认，他到北京来部分是因为他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度假，而他又十分想来看看中国。但是，为了按照双方的议定书条文办事，中国人为市长在人民大会堂安排了一次接见。像其他贵宾一样，一名党的副主席接见他。“我向他提些什么问题呢？”市长问我和其他陪同他的记者。“当时正在北京流传说，党中央正在召开一次重要会议——有几个中国人都告诉过我这个消息，在人民大会堂外还可以看到好几部有陪同的红旗牌小轿车。为什么不向副主席问一问，他们开会讨论什么呢？”我建议说。“真是个好主意！”市长回答。第二天，当他走进人民大会堂亮锃锃的大理石厅堂时，市长提出了这个问题。

“没有开会呀，”副主席简短地回答说，这事再也无法讨论下去。

三天之后，报纸报道说，确实召开了一周的党中央会议，而且还对若干重要决定进行了投票。一个是为刘少奇平反昭雪。另一个决定是提升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务委员。副主席对市长的回答使人误解，这反映了中美两国政治家明显的区别。双方都把新闻的价值看作是一种工具，但

是，美国人提供新闻，使自己处在公众的监督之下，而中国人往往不这样。

中国千方百计地把政府的工作当作秘密。1980年，北京有针对性地重新颁布了于1951年第一次公布的严厉的《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这个暂行条例详细罗列了15个方面必须保密的内容：一切有关军事的事项及国防事项、外交事项、公安及国家财政、经济计划；而且还有文化教育、卫生医药、民族事务，有关仓库，甚至有关气象测报的内容等。条例在第二条内列出了第十六款，包括“一切未经决定或虽经决定尚未公布的国家事务”。另外，本条第十七款进一步把条例规定范围扩大到“其他一切应该保守秘密的国家事务”。报刊、广播电台“均不得涉及国家机密”，条例警告说，而且要接受政府的审查。“于付印前，须由主管领导作保密审查。”为了确保无人误解这一法令的意旨，报纸在公布了这个条例条文的同时，发表了一篇社论。“在国内外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我们的敌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偷取我们的情报，”社论指出。

“国内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以及国际上的霸权主义者和其他反动派，无时无刻不在窥视我们的机密。”

我的朋友兵告诉我说，在法令重新公布后不久，她所在学校组织了一次政治学习，学习和讨论《条例》。负责她所在小组的干部总结说，只有在报纸上刊载过的事，人们可以自由讨论。用这一种方法，可以保证什么事情不是机密。

“那么，我的名字怎么样呢？”有一个学生尖刻地问

道。“我的名字从未上过报纸。这也是国家机密吗？”

这种对机密的不正常崇拜表明了中国人可以不了解日常新闻也能生活，而西方人认为日常新闻必不可少。我每到一个新城市，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一份地图，以便熟悉道路。我在北京时，买了一张三色的市区街道和交通地图。这是政府用中文印刷发行的。但是，我的朋友李苗夫妇笑我说，这张地图并不很精确。有些街道的拐角处及街道长短，以及有些重要办公大楼的地址都是不正确的。这可使我想起了1972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我陪同中国第一批新闻记者到美国各地参观。我们第一天下午乘小车来到新泽西州的税收关卡处加汽油。三个中国人在加油站四周闲逛。其中一人看到了地图路标架子。他仔细地把一张新泽西州地图展开来，尽力做出随随便便的样子。然后问道，这地图是否要卖？我解释说，地图是免费供应的，你要多少张都行。这三个中国人犹豫了一分钟，然后扑向了地图架。每个州的地图他们都各拿了几份，其中有纽约州、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的地图。那以后，每当我们停车加油时，这些记者都准备了一个书包似的东西，把地图塞满在包里。

在中国，有些很普通的东西，象电话簿，也是非常神秘的。我1979年第一次到北京时，外国人能够买到的仅有的电话簿，是朱丽·蒙洛整理出版的红皮小册子，要25美元。她费尽心地把外国大使馆、新闻记者、饭店、旅馆，以及政府的主要外贸公司的电话号码列在一起，以满足在北京的西方居住者进行交往的需要。在我到了北京半年之后，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还有一个中文的电话簿，

但是那对外国人是保密的。总共有190页，我的朋友说，是机关单位通过邮局订购的，个人不能够去买。有一天，我的朋友特意从她的机关里把那本鲜桔红色封面的电话簿带出来让我看。那电话簿是四年前的1975年出版的，再也没有重新出版。封底上是11个用大字列出的重要电话号码，当中包括匪警电话、消防电话、长话台，以及时间和气象问询台。

然而，奇怪的是这个电话簿有许多空白处。所有列出的电话号码都是机关单位、工厂学校等的电话，没有个人的电话号码。的确，中国人的私人家里没多少人有电话，但是这本电话簿上不搜集私人电话号码使我明白了，中国人如果把每天带在身上的私人电话小本丢失的话，为什么会总是那么忧心忡忡的。政府的电话簿上，有九个“爱国党派”的电话号码，但是没有标明哪个电话号码是哪一个党派的。我的朋友估计说，这是为了不让人们同这些组织取得联系的手段。

1980年，为了努力地打开开放之门，或许是为了在商业上同朱丽·蒙洛那一本电话小册子相竞争，政府第一次公开发行了公用电话簿。大约30页的电话簿上都是公用电话号码，但电话簿上并没有列出私人电话号码或私人住址。电话簿的第一个电话号码是人大常委会，然后是相比之下权力较低的机构，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共中央的电话号码在“党政团体”的标题之下。可是，对这个国家最有重要性的、最有权力的机构，电话簿上却只列出了两个电话号码——一个是群众上诉接待中心的号码，另一个是中央统战部的号码。

后来在1980年晚些时候，我发现了中央各部委的电话号码都要严加保密。当时，华国锋突然辞去了党中央主席的报道正开始传开。有几个星期，政府本身也有些混乱。我向外交部新闻司的官方发言人打电话时，问他们谁是党中央主席，回答我的干部说道：“不知道。”我没有找到确切的回答，于是，我就努力想找寻其他的官方途径，因为他们可能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很亲密，也许，他们会让南斯拉夫共产党知道像更换党中央主席这样的重要事件吧。所以，我叫自己的助手给中央外联部挂电话，这个部是专同外国共产党联系的。助手在到《纽约时报》办公室来之前，曾经在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馆工作，我相信他知道该大使馆的电话号码。但是，他拒绝告诉我。“这个号码不对外，”他说。

像中国的其他东西一样，新闻并不是金钱，而是各种联系。一个人的官阶越高，他了解的消息就越多；新闻也像消费品一样，是按照官阶分配的。原则是，让干部们消息灵通，可不能污损群众的大脑。

这种秘密网络的核心是一整套分门别类的文件。每一个党政军部门，包括人大常委会和各个不同的部，都要发行自己的文件。但是，由于来源不同，最重要的文件是党中央发出的。这是毛泽东权力的重要一环，因为他过去总是先读一下，然后同意每一份党中央文件之后，才能够发出。党中央文件用于各种不同的目的，中国人告诉我说。文件可能是传达权威性的指示，要求不折不扣地加以执行；也可能是对一个实验性政策要求展开讨论的布置——

他们常常在国内某一特别地区先行试验后，才推广到全国；也可能只是为了让干部们了解北京发生了什么事。党中央文件，并不是通过邮局发送的，而是通过特别的途径。每一份文件都有编号，以防遗漏。每一份文件还注明有三种保密程度之一。这三种保密度分别是秘密、机密和绝密。绝密文件阅读之后必须交还。文件的顶部注明了该文件在一个省或一个机关内的流通范围。1949年以后，尽管北京的权力有很大改变，但是，有关文件的一切体系则大半没有变。

在北京的许多上层机构里，都有一间文件室。文件室内，有政治历史清白的干部详读这些指示。党中央的指示也要在“传达”会上宣读。通常，这种过程分为几个步骤。第一步，首先对干部宣读文件原文；而后，如果文件不是十分保密的话，就把文件内容在工厂、学校、机关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会上，向“群众”公布。在这一步传达之后，有关文件的内容才开始在报纸上披露出来。有政治嫌疑的人，不能参加文件传达会。经常与外国人接触的中国人，象大使馆和外国新闻机构的翻译，或者中国旅行社的导游员等，也不能参加文件传达会。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偶然地把国家机密泄漏出去。

我认识的一位在广播电台工作的精力充沛、活泼好动的妇女被告知说，她不能再去听中央文件的传达了，因为她同广播电台雇用的一名欧洲籍职员过于友好了。这位欧洲籍职员是来帮助这个电台的外语播音的。她感到十分沮丧，她知道，这意味着她在政治上遇到了麻烦。这样一来，就使她不能得知最有趣的消息了。

为了补充完善这种文件流通的分级体系，还有一整套“内部”印刷发行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比公开的新闻工具提供更多更详细的新闻。这种内部报告有四种。中国朋友告诉我说，发行流通面越窄、层次越高的那种印刷品，所提供的内容越完善、越客观，也越有趣。内部发行面最宽的出版物，是有一页书桌大小的报纸，叫《参考消息》。《参考消息》上刊载的文章都是外国通讯社有关国际事务的文章和驻北京的西方记者有关中国国内发展的文章摘要的重印。《参考消息》的发行量超过了一千万份，几乎是党报《人民日报》发行量的两倍。这就可以看出中国读者对这两份报纸重视评价的情况了。中国人宣称：《参考消息》是世界上阅读面最广的报纸。

我发现，《参考消息》使中国人了解的外部世界比外国人能够感觉的更多。1971年，北京由于美国的反对而被排出在联合国之外达22年后，重新恢复了进入联合国的席位。这条消息中国人在当天的《参考消息》上就了解到了，当时，《人民日报》还没有刊载。在“水门事件”暴露后的危机之中，尼克松总统每天都要受到攻击。《人民日报》因为尼克松重新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把他看作是中国的“朋友”，所以在这份党报上没有提及水门危机。但是，《参考消息》却让公众了解了水门危机，我的朋友回忆说。

中国人都可以只花五角钱（0.33美元）就订阅一个月的《参考消息》。但是，虽然《参考消息》的内容大都是外国人写的文章，可是在北京的外国人却不能够合法地买到或读到它。通常，我到北京饭店三楼服务台去取洗烫好

的衣物，或者去买一杯冷饮时，柜台上的服务员都会全神贯注地盯着当天的《参考消息》看。可是，一旦他们意识到我在场，他们会很快地把《参考消息》放到其他报纸的下边，叫人看不见。对这份报纸如此保密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新华社发行的《参考消息》使用了西方和日本通讯社和报社的材料，而又没有付给他们使用的费用，这样是违背国际版权的。另外还有一个理由，是因为北京领导人有时也应用该报来传播他们不想通过政府的新闻机构刊载的消息。我在1980年早些时候曾报道说，赵紫阳可能会取代华国锋出任总理。《参考消息》在头一版转载了这条报道的摘录，我的朋友卫东告诉我道，并给我看那一份《参考消息》。在《参考消息》上转载的消息，对政治很敏感的中国人来说，是提供了一条线索的。新华社的一位编辑后来开玩笑地告诉我说，中国新闻界人士把这种使用外国记者的报道来谈及中国事务的做法，叫做“出口转内销”。

比《参考消息》高一层次的内部发行物叫《参考资料》。《参考资料》上登载的外国新闻文章摘要内容丰富、详实，每天印刷两次。通常，上午版有100页，下午版50页。只有单位的党员干部可以阅读《参考资料》。个人不能订阅。《参考资料》印刷的汉字很大，是专为帮助视力衰弱干部们阅读的。

“太厚了，不可能全读。如果你一定要读完所有内容，你就别想再干工作。”卫东说。现在，他也成了一位干部，可以经常在政治学习会上带一本去读，以避免会议的枯燥乏味。

在更高一个层次，范围更窄的发行物叫做《内参》。

这是对12级（相当于副部长）以上的干部发行的。每一个部都要有自己的《内参》条目，做为所负责范围的不光彩的报道，比如农业、工业、铁道、犯罪等各个方面。但读者最多的《内参》，则是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出版的。我在人民日报社内长长的走廊里穿过，在新华社宽大的四合院里漫步之时，常常不知道这两大新闻机构里的工作人员在做什么。《人民日报》有600名记者，每天发行仅有八版的报纸（《纽约时报》共有475名编辑人员，每天平均发行80多页的报纸）；新华社在北京总部有3,000名记者和编辑，全国有6,000名，而每天只发布几千字的消息。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告诉我，答案在于当中的许多人去负责《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的工作去了，而那些最信得过的记者和编者，被安排为《内参》工作。为《内参》工作的人们可以尽力地发挥作为记者的才能，因为他们有权调查那些在公开新闻工具中很少提及的敏感的问题，比如官场的营私舞弊、罢工、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摩擦、农村的饥饿情况、公安的暴行，以及妇女的不平等待遇等问题。

“解放前，中国有一种说法，说记者是未加冕的国王，”一位记者朋友补充说。“现在可并不如此了。可是，如果一个《人民日报》或新华社的记者在一个工厂出现的话，厂党委书记就不得不客客气气、配合帮助的。不然的话，他知道他可能会遇到麻烦。”

他例举了一个刊登在《内参》上的一则报道，题目为“目前新闻”。文中谈到了河南省某个县委领导，在贯彻政府的计划生育指示中工作不力、十分松散。后来，当地

干部发现已经有3,000名超出当年生育计划分配名额的妇女怀孕之后，突然发动了“清理肚子”的运动。所有3,000名妇女都必须立即进行堕胎手术，其中包括一名已经怀孕近九个月的妇女。有些妇女逃出去躲藏起来，当干部前来找寻她们时，邻里四周的小孩自己组织起来，成为反政府的“民兵”，向怀孕妇女提出警报，并帮助她们逃跑。“这是令人震惊的事，就像我们同日本人的战斗一样，所不同的仅仅是共产党人成了敌人。”记者说道。

我获知的最后一种特别文摘叫做《新闻简讯》，这是专为党中央委员和各大军区的指挥员阅读的。《新闻简讯》为他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国内国际新闻概要，就像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每天早晨为他提供的“新闻简要”一样。

然而，如果说共产党人周密细致地创造了这一整套按照官阶来分配新闻的方法的话，那么，更加引起我好奇的是中国人民如何聪明地通过不胫而走的小道消息广泛传播，而渗透了解了这套方法。中国人正像应用他们的关系进行后门交易，以获得一套更好的房间或者一个更令人垂涎的工作那样，他们可以通过拜访自己一圈子内的亲属、朋友和同事，来了解党中央的文件或者政治局的策略。社会科学院的一位戴着眼镜的秃顶的学者，带着一种自满的胜利者的神态回忆说，他是在1976年10月7日，星期四，也就是“四人帮”被拘捕的绝密事件后不到24小时，就知道了江青和她的同党被逮捕的消息的。他有一个在北京某特别军队医院工作的侄女，这所医院专门收治高级将领。她刚一听到一个病人透露的这条令人惊讶的消息后，就立即

跑去告诉了这位学者。政府是在一周之后才公开证实了逮捕“四人帮”这件事的。凡是召开政治局会议，这位学者补充说道，他都能够阅读到朋友借给他的这次会议的日程安排、日常活动的简报，也能够读到真实文件的副本。

文化大革命之后，随着纪律的涣散，少数高级干部的子女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变得臭名昭著。我十分有趣地注意到了报纸上、广播中经常抱怨他们过余饶舌的情况。报纸曾大加指责地说，有些人因为受到自由主义的影响，自命为消息灵通人士，总喜欢四处传播谣言。有些人让自己的家庭成员、让自己的儿女随意阅读文件，并且向他们透露国家机密。这些高级干部的子女又把这些机密讲给朋友听。结果，最近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党的机密竟然是从党外再返回党内，国家机密则是从国外返销国内。

1980年1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对20,000名官员做了一次重要讲话，提出要禁止张贴大字报、小字报。第二天，我便从一名记者那里知道了此事。他父亲参加了那个会议，回家之后告诉了他会议的内容。当时，我到中国才只有半年，对这些消息的可靠程度仍不敢轻信。在越南战争期间，我曾在越南南方当了两年的新闻记者。在那里，我开始对道听途说的谣传缺乏信任了。我逐渐领悟，在中国，小道消息往往十分准确，这不能不说非常怪诞。后来，邓小平讲话的摘选见诸报纸之后，其内容与人们告诉我的内容完全相符。这种不胫而走的消息如此可靠的理由，有些中国朋友说，是因为这些消息完全是以政府的秘密新闻交流网络为基础，而不是以公开的新闻工具为基础。

许多中国人都认为，新闻记者理所当然的是政府的服务员。所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1979年第一次向华盛顿派驻首批记者时，他们以官方的护照旅行，并居住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内，就像其他的政府官员一样。我遇见的中国人多半以为我居住在美国驻华使馆内，我告诉他们说，我在北京饭店内登记了一个房间时，他们感到十分困惑不解。“可你为什么不住在大使馆呢，那里的设备要好一些呀？”他们要问我，因为他们不相信我解释所说的《纽约时报》不属于美国政府的一部分。

某报社的一名高级编辑毫不掩饰地说，正规的新闻界应该在中国起到政治目的的作用。在阳光明媚的一个初秋的上半，树叶当时正由绿色开始变成褐色，我来到在北京饭店出来的拐角处的，一幢老式暗黄色五层钢筋水泥建筑的《人民日报》社总部做正式采访。一名解放军卫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站在通向正门的阶梯旁。正门里面的建筑同美国报纸的总部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对比。大楼里没有一间宽大的新闻编写室，没有拥挤的办公桌，没有成群的记者，没有许多打字机，没有电子计算机终端，也没有繁忙的嗡嗡声响，没有大声喊叫“要副本”的声音。整幢大楼十分安静，节奏缓慢、步履拖沓。那里的空间都被分隔成为许多没有挂牌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还关着。

“《人民日报》是我们党的喉舌，”一位负责人解释说。虽然他是一位曾经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看上去倒很年轻，胖胖的，皮肤红润、满头青丝。负责人简洁地把该报的宗旨讲了出来，“它是用来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的。”

对一个西方读者来说，这种规定令人枯燥乏味。报道中不可能有新鲜活泼的有关国家领导人如何生活的内容，没有耸人听闻的谋杀事件，没有最新服装款式的特写或者性欲趋势的报道，报纸上没有沐浴的美人儿，也少有教你如何装饰家庭或烹饪佳肴的小窍门。有些令人尴尬的题目被遗忘了。1976年，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把工业城市唐山夷为平地，并且严重波及了北京和天津，这是最近几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可是新闻界没有详细报道。一直到了两年之后，报纸才在第四版下方的一个小框栏内，披露了那次地震中有242,000人死亡，164,000人负重伤。而当时，报纸却自以为是，言过其实地、大吹大擂地为大庆油田那些在摄氏零度以下工作的模范工人，或南方达到和超过谷物生产产量指标的农民写那些毫无止境的长篇累牍的文章。其结果，是一幅中国永不停止地向着光明的前途奋进的图画。然而，由于大多数中国人对于像就业、通货膨胀和政治迫害等问题十分敏感，当时的新闻媒介却加剧了人们普遍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增加了人们信任的差距，而没有对社会主义有所改革。

我认识的一位年轻记者，他的父亲是一个干部，私下里抱怨说，所有的文章都要由编委来写。如果安排他去报道，比如说，邓小平会见一位美国参议员的外事活动，那么，他写完了该报道的初稿之后，要交给另外一名记者。那名记者在认真核实了事实之后，常常重写一遍，以便使措辞等方面涉及政治的细微差异能够正确无误。然后，这篇报道又需交给他们这一个部门的编辑，编辑又要把这一

篇报道读过、修改过之后，再送交负责当天报纸出版发行的副总编。在这篇报道上还要附一份逐级写稿、修改的过程记录表，每一个记者和编辑，只要写过或修改过这篇报道的，都必须签名，然后才送去付印。从理论上讲，这是为了落实每个人都负了责任的；可实际上，如果出现了什么错误的话，这正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良好方法，因为这一来该受指责的绝不是一个人。

我的朋友对新闻报道等缺乏时间意识、缺乏及时性的现象很沮丧。“我们所写的大多数报道都不印日期，”在我们一块儿长途驱车到北京郊外去时他对我说。“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写好的报道都存放起来，如果哪一天我们机关里的人都去参加政治大会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存放起来的文章刊登在报纸上。”每天的傍晚早些时候，这正是西方报社里最繁忙的时刻，我漫步走过报社的办公楼外，发现所有的电灯都灭了，大门关上，这令我十分惊讶。“大家都忙着在5点30分就回家了，”我的朋友说。

“我们通常在上午准备第二天的内容，因为我们不怎么登载现场及时报道。有时出现了什么大事，比如一个领导人讲话或者出来会见谁，我们要花去两三天时间才能让报道登报。”这种懒散的节奏又因为该报的发行制度增强了。中国的报纸不是由送报小孩送到读者手里——这可是私人企业的痕迹——而是通过邮局送出的。邮局常常在上午10:00之后，才把当天的报纸送到，若要早饭时间阅读的话，就为时太晚了。不过，正好可以及时用来消磨在办公室里的上班时间。

我遇到的另一位年轻记者在一家英文月刊工作。她讲

述了该杂志总编的故事。总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65岁的妇女，一张平常普通的脸、个子不高，头发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她曾经在战争年代的延安窑洞指挥部里工作过。她对记者的职责要求得特别严格。“所有一切报道，都必须来自国家的报纸、杂志，来自政府的广播，来自领导人的讲话，”她对手下的工作人员提醒道。“凡是党没有说过的，我们决不印！”

总编独自为杂志分排每一个报道。这本杂志是专为国外读者编辑发行，以宣传在共产主义下中国妇女所取得的成就。每当别人写好一篇文章之后，她都要阅读，进行修改，然后送到英文部去翻译。英文译文稿写好之后，她又要阅读、修改，然后才送去付印。记者们开玩笑地把她叫做“马克思主义老太太”，部分是出于尊敬。因为他们知道，她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老干部——她拒绝使用单位的小汽车，总是去挤公共汽车；她丈夫是一家很大的出版社的领导人，她和丈夫发誓要把他们积蓄的所有钱都交给党，决不留给自己的小孩。可是，她那种过于挑剔的编辑态度却使该杂志的更为精力旺盛的工作人员十分恼火。有一次，人们写好并译完了一篇有关罗马尼亚妇女代表团到长城游览的报道。她发现报道中有这样一个句子，“只要我们站在长城之上，我们就像女英雄一样。”总编很不高兴。她给该杂志的英文专家打了个电话，这位专家是从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毕业的一位60岁的学者。

“你必须把‘像……一样’这个词省略了，”她严厉地说。“你应该牢记的是，罗马尼亚共产党是我们的兄弟党，他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不能够低估他们的英

雄气概，而去追求资产阶级的爱好。所以，你要改成这样才行，‘只要我们站在长城之上，我们就是女英雄’。”

然而，尽管一些报刊以其毫无价值的浮夸作品和令人昏昏欲睡的内容而著称，可是，如果人们仔细阅读，经常可以从中发现北京的政治变动的很有价值的东西。不过，它们总是隐藏得模糊不清的，就像侦探小说中的线索一样。1975年，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中国的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清洗出去之后，又第一次公开亮相。他的复出是以欢迎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为标记的。当时，邓小平参加了这个宴会。在报道这次欢迎宴会时，报纸仅仅是把邓小平的名字排列在其他客人的名单之中，没有加任何评论。看起来，好像文化大革命从未发生过似的。

与许多西方人士的认识恰恰相反，报纸也为读者向政府提出意见和申诉提供安全保障。这些提出的意见和申诉就是致编者的信件。这可还是一件重要的工作。比如人民日报社平均每天要收到2,000封群众来信。该报专门分出80人的工作人员——叫做“群众工作部”——来处理这些信件。有些信件给登载在报纸上，其他的信件就分别送到读者抱怨事项的政府所在部去，还有些信件都分门别类地印成简报，送往国务院和党中央。据说，读者提出最多的批评意见是关于通货膨胀和贪污腐化的。其他西方报纸，像《纽约时报》，只是把读者来信选登就算完事了。《人民日报》却不同，它常常要安排一名记者去核实调查这些抱怨。

负责人告诉我：“比如说，在昨天的报纸上，河北省

的一位干部写来一封信，批评省委在公共的植树节活动中铺张浪费。问题在于，省上领导只参加了两个小时的劳动，却动用了100部小汽车。这完全是挥霍浪费。我们同该省林业厅取得了联系，因为植树节种树活动是由林业厅负责安排。要求他们能够答复这封信。他们写信来说，他们劳动得很认真，共植树达2,000亩。实际上，这需要这一批干部用整整一年的时间才能做到。所以，他们的答复很糟糕，在撒谎。我们已经印出了这两封信，我们还要继续追究这件事。”

十分明显，这些信件使北京对于广大公众的意见和看法掌握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温度计。不过，到底这些信件有多大的影响，则是另一个问题。我在采访的时候，我同那些新近到来的美国记者一样，想要新华社为《纽约时报》办公室解决一台电报打字机，可是却遇到了麻烦。我们都再三地向新华社提出申请，还向新闻司提出申请，也向电子工业部提出过申请。可是各个部门都声称对此事不负责任，还让我们去找其他部门。没有电报打字机，我们就不得不等上24小时，通过新华社，取到前一天的新闻报道打印稿。这就使我们在同其他驻华通讯社和报纸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事每天都烦扰着我们，可是谁也不向我们解释，我们为什么不能搞到一台电报打字机。后来我给《人民日报》写一封信，他们保证印在特别新闻简要上，再送给中央。可是，我们仍然又等了一年，才拿到电报打字机。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报刊界已经采取了好几步措施来改善报道的份量，并努力增强其可靠性。我在北京

期间，《人民日报》有几次承认说，他们发表了一些不真实、使人误入歧途的报道。比如曾有一篇报道谈到了江苏省一个公社的农民据说发现了一种从麦草里生产人工象牙的事。报纸承认说，事实上，农民们只是在瓶子里做了几次试验而已。另有一次，《人民日报》更加严肃地在头版头条中承认说，因为在1958年刊登了一些幼稚的共产主义文章，而驱使了毁灭性的大跃进运动开展起来；又因为‘冤枉’了许多好干部，而延续了文化大革命。我认识的好几位中国朋友都对《人民日报》新近的诚意投以信任票。

现在，报刊还发表了更多的调查文章。中国的记者过去一直在写这种文章，只不过，过去仅仅是刊载在为高级干部阅读的发行量很小的“内部参考”上面。其中透露的最为震惊的消息有工业事故方面的报道，这种文章过去的报刊是避而不谈的。因为中国正式称呼叫做工人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只有资本家才会在工厂中很危险的情况下，剥削他们的工人。报纸还报道过这样一件事。吉林省一个煤矿的党的负责人，在1979年后半年发现，他们要完成年生产指标的话，当年还差10万多吨煤。为了补齐差距，他们在矿工中召开一系列的“誓师大会”，给矿工发大量的奖金，开始了他们叫做夺取“高产量的战斗”，向一个尚未开采的非常危险的矿井开发。这个矿的煤气检查人员和副总工程师很快就提出了异议，因为那里有愈加增强的煤气出现。然而，他们的警告被置之不理，这位副总工程师还以逃避责任受到批评。几天之后，那座矿井爆炸，52名矿工丧生，6名矿工受重伤。

这些调查类型的文章常常都有一个模式。我注意到，它们都仅仅集中于调查单个的工厂、单个的领导、或者单个的部。迄今还没有文章涉及在中国的全国煤矿工人中存在的黑肺病，不过，我遇到的一位在煤城工作的医生说，这是地方性疾病，使许多老矿工受到了伤害。这些调查性报道文章的用意并不是非难党的领导之英明，而在于表明它关心并驾驭着整个形势。这种披露一些小错误的做法，只是为了证明党在尽自己的责任。

中国是在1958年建立第一座电视台的。到1979年，全国的十亿人口中，只有不到五百万台电视机。可是现在，中国猛然同美国和日本一样，变得对电视机着了迷的样子，至少在城市里是这样，因为现在电视主要集中在城市。当北京电视台第一次播放美国电视节目——一套轻松的科幻连续片《从大西洋来的人》时，许多人都呆在家里，在星期六晚上看这部电视连续片。平时的星期六，人们通常拥挤在电影院里，这时，电影院都空荡无人，北京的犯罪人数也减少了，这是一位电视台的记者告诉我的。我感到很好奇的是，共产党人为什么选择这样一套不合适的电视节目作为正式首次播放的外国连续片呢。这一套美国电视连续片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社会寓意，它表现了美国人的生活富裕，他们在冒险性强又富有魅力的环境中生活的。丝毫也没有要劝阻人们去羡慕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的意思，这位记者解释道，原因是政府的电视台经费很少，而且只播放很少的广告节目，《从大西洋来的人》这一套电视连续片是中国能够从好莱坞买到的最便宜的电视

连续片了。

中国的电视节目充满了惊人之举。1980年政府采取慷慨的一步，增加十分钟的国际新闻节目。这十分钟的国际新闻节目是从英国的维兹电视和美国的美国广播公司通过卫星挑选转播，在每天晚上半小时的“新闻联播”节目里播出。过去的新闻节目，主要是从报纸的报道中整理出来的内容，再加自己制作的那些关于机器生产中的最新产品报道的令人毫无兴趣的短片。现在，在生动的彩色画面上，人们不需要经过什么审查，就可以看到教皇的非洲之行，看到罗纳德·里根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也可以看到意大利的政治恐怖主义分子的活动，甚至还可以看到在美国北卡罗莱纳举行的赛车比赛，以及在夏威夷海湾举行的冲浪比赛。中国人在30年时间里，几乎同外面世界完全隔离，现在可以享用这丰富的、异国他乡的、而又令人不知所措的图像。我似乎这样看的，电视对中国来说有许多非本意所致的副作用。可对于人们来说，它可能是很有用的新型宣传工具。然而，电视也有可能打破老一套的战略体系中对消息的分配供给制；电视使中国人更清楚地了解到，中国与美国、与西方、以及日本相比，其政治和经济的差距有多大；它反过来又会刺激更多的商品消费，特别是电视机的消费。1981年，中国国内的工厂提高了电视机的生产产量，达到二百五十万台，同时，政府还从日本进口了一百万台。这两个数字是仅仅三年前的销售数字的十倍。

电视也为中国培养出了一批名人。其中之一就是每周三个上午在首都的三个频道之一的北京教育电视台讲授英

语的一位瘦削、迷人的教师。在中国，电视英语课程被看作是最受欢迎的节目。电视英语课程的主持人是郑培蒂，北京大学的女教授。她在经过了苦楚辛酸的经历折磨之后，成为了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一个亲戚在30年代曾与江青相识，被投入了监囚所。

“现在，不管我走到哪里，人们都会把我认了出来，”女教授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两只小手放在大腿上。“我一上公共汽车，哪怕车上十分拥挤，都有人站起来给我让座。人们常常围住我，要我给他们签名。”她平均每周末从崇拜者那里收到30封信。她丈夫忙得不可开交地从邮局运回她收到的各种包裹：从黑龙江省寄来的100斤重的土豆，南方寄来的大袋大米，浙江寄来的一篮子桔子，那是中国最好的，还有许多包名茶。“人们真太好了，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知道你在北京买不到桔子’。”可不幸的是，她开玩笑地补充道，“出售猪肉的人不学英语，他总是很粗鲁，老给我割很肥的肉。”

女教授还参加编写了一本最畅销书——一本已经卖出了1,600,000册的英语课本，如果不是中国严重缺少纸张，印数还会增加。中国的纸张紧缺限制了所有书刊报纸的印刷。为了同过去的平均主义原则相一致，女教授每月除去在北京大学领取的60元工资之外，在电视台每讲一小时的课，仅能得到一元五角。而且，她参加编写的书，她并没有获得版税收入。然而，她在精神和情感上获得了报偿。一位在中苏边境的士兵在他那边远的地方买不到女教授编写的英语教材，她把自己的一本签名之后给这个士兵寄去。这位士兵万分高兴地在回信中写道：“明天，我们将

举行步枪射击比赛，我将要向天空鸣枪，向您致敬。”尽管几十年来，中国人不得不一直忍受着骚乱和穷困的折磨，但是，正是这些诚实可亲的话语使中国人看上去和善温厚。

如果说电视对政府在消息控制体制上有打破的威胁，那么，中国的图书馆却还像过去一样，保留这种原有的形式。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建筑座落在北京大学绿树成荫的校园里，新颖别致、十分动人。这是一幢现代化的钢筋水泥和玻璃的建筑，门前有一尊三层楼高的汉白玉雕刻的毛主席塑像守卫着，这是文化大革命留下来的最后的残存。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3,000,000卷，是中国藏书第二的图书馆，仅次于在紫禁城附近的北京图书馆。可是，图书馆内却没有中心卡片目录。我后来在参观图书馆时发现，每个分部都在馆内迷宫般的走廊中和小房间里分散存放有卡片目录，可是大多数都没有标示。这样分门别类有着一个目的。学生可以只是在自己的所学专业范围内借书。数学系的学生不能到英文分部里去借书，甚至不能借莎士比亚的剧本或马克·吐温的小说。尽管历史专业的学生可能需要阅读有关柏拉图或孔夫子的书，但却不能到哲学分部去借。另外，还有其他一些诡辩的花招阻止人们借书。我在历史分部内查找托洛斯基的条目时，发现其卡片上写道，请查列夫·布隆斯坦，即托洛斯基的原名。我又查布隆斯坦的卡片时，上写请试查托洛斯基条目。一位30岁左右专攻图书馆科学的学生后来说道，这是故意搞的鬼把戏，因为我们仍旧崇拜斯大林，而把托洛斯基看成是脱党变节分

子。

你查到了想借出书的书号之后，你就把它拿到主要取书柜台前。这间吵吵嚷嚷的屋子里挤满了索书的学生，他们大声地向很少的几个图书管理员喊叫着，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这些图书管理员身穿长长的哗叽罩衫，以防止灰尘。图书馆的书库除了少数有特权的教授和图书馆科学专业的学生以外，不对外开放。所以，学生们只好完全依赖这些图书管理员，只得象哀求者一样。

“至少有半数的次数，他们拿到你写的纸条，走进书库，只走了几步之后，还没有走过狭长的通道，就在纸条上划道道，‘没有’。”一位学习图书馆科学的学生讲道。有一个问题，她又补充道，“是因为这些图书管理员过去都是农民或工人，只受过小学教育。在文革期间，大学都停办了，有些教学大楼竟建起了工厂。1972年，学校重新开办时，工厂就关闭了，工人们可以选择转到图书馆去工作。这可是个轻活。”

安杰拉·齐托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成绩优秀的研究生，她当时正在写有关中国哲学的博士论文。她回忆起同一个图书管理员争吵的事。齐托向图书管理员要求借《礼记》，这是中国的古典名著，就像西方的《旧约》一样。可是那个身穿蓝色补丁裤子和已经褪色的长袖衫的年轻女图书管理员却说，图书馆内没有这本书。根本就不存在。齐托给惹恼了，她问这位管理员：知道这本书讲什么吗？不知道，这位管理员脾气暴躁地说，她不知道，也不关心。这就是文革中鼓励的那种对学问的鄙夷。毛泽东曾说，书读得越多，人变得越蠢。

尽管如此，齐托和其他一些学生告诉我，北京大学图书馆还属于全国最好的。本科学生每人有五张借书卡，也就是说，他们随时都可以借读五本书。在我参观的其他大学，比如云南大学里，学生每学期只能借三本书。在上海师范学院，每个学生一学期可以借六本书，但其中有两本必须是马克思、列宁的著作或有马列有关的书。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几个阅览室，有1,000个座位。可麻烦的是，全校共有8,000名学生。因为学生都挤在学生寝室里居住，每间房内住4-12人，分上下铺，要在寝室房间里学习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抢占阅览室里的座位就十分困难。学生们常常在早晨6:30就在图书馆门前排队，等到7:30开门去占座位。

为了进一步限制那些可能毒害青年思想的东西，在我参观的所有图书馆内，外文期刊、词典、百科全书等都存放在参考室里，供教师和研究生参考阅读。有一次，我同一个美国政府代表团到上海师范学院去参观，他们把我们引到图书馆外文部的参考室里参观。那里的情景同任何美国大学图书馆的一样——有好几十个本科学生正在忙着翻阅《时代周刊》杂志、《纽约人》杂志，忙着翻阅《世界报》和《纽约时报》。我看见他们在那里觉得很惊讶，于是我向一个正在翻阅《纽约时报》的矮个子、不修边幅的男生问道，你是不是经常来阅读这里的报刊。

“喔，不，”他小声回答道。“这个阅览室是专门为教师开的。今天他们叫我们来是因为你们要来参观。”

然而，许多图书馆里最糟糕的问题，学生们对我说，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由于大学关闭，整个教育系统

遭到攻击，大多数图书馆都只得停止购买书籍期刊。这种情况从1966年一直延续到70年代晚期。在有些大学，比如上海的复旦大学，红卫兵任意破坏图书，他们把书烧掉或者扔到学校的各个角落。“我们的书目卡片都完好无缺，”复旦大学的一名图书馆馆员痛苦地说，“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大部分书在哪里。”1980年，北京文化古迹整理办事处报道说，他们把文化大革命中非法没收的、重达314吨的210万册中国古代图书退还给了原来的私人拥有者。这些图书同其他数百万册图书一道，被当做“旧文化”，而用车运到造纸厂、垃圾收集中心，和城市周围的仓库里。文化古籍整理办事处透露说，仅在一个造纸厂里，就发现了2,000吨的很有价值的图书正被化成纸浆。要阻止这样大规模的损失，已为时过晚。

中国的科学发展也因一些不必要的保密和有些负责干部的无知，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中国的科学家告诉我说，只有在很少的地方，他们才能够真正摆脱政治的干扰，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出来，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探讨，如像中国生产出洲际导弹的西安城外的很大的火箭和喷气战斗机中心那样。就连这个中心也面临很大的困难。一个来自该火箭中心的物理学家对一个美国外交官说，这个中心的研究人员很难得了解中国国内其他地方的科研情况，因为政府不准许科学家们把自己的发现结果发表在学术刊物上，不准许他们相互通信，也不准许他们一起开讨论会。“清华大学的某个教授也许已经发现了一种重要的合金冶炼技术，这种冶炼技术指导下生产出的合金

也许能够适用于制造我们战斗机的高级水准的机身。可是，如果我们找到了这种发现，算我们还走运，”这位物理学家惋惜地说。

还有一个古怪的事，竟然有一位美籍华人科学家牛满江博士曾一时操纵了中国的生物学界，很像特罗菲姆·李森科在斯大林时代和赫鲁晓夫时代曾操纵了苏联的生物学界。正如李森科所宣称的那样，从环境中获得的特征可以在进化过程中遗传下去，同当代孟德尔的遗传学的发现结果截然相反，牛满江让中国领导人相信，他可以在生物工程学的复杂形式中，通过使用核糖核酸来改变生物特征。牛满江是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的一位鲜为人知的教授，他对金鱼所做的实验大多受到美国科学家社会的怀疑。后来，他在尼克松首次访华后，于1972年来到中国。然而，牛满江按照传统的中国方式，谨慎细心地同北京的官员建立起关系。他又一鼓作气地在中国的实验室里干了六个月，赢得了爱国科学家的荣誉。他还帮助获得了在纽约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赠送的大笔款项，在北京建立了一所新的生物开发研究所。牛满江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还在于中国遗传学研究所的领导曾经在50年代早期由苏联人培训，他们直至今日还受到李森科的影响，因为他们60年代和70年代都与外界的科学发展割断了交往。所以，他们在政治上对牛满江的理论倍加欢迎。牛满江在做金鱼实验时坚信，通过给金鱼卵注射核糖核酸，就不仅可能改变金鱼的生物特征，而且可能改变它们后代的生物特征。牛满江声称，他能够取得这样的成果，是因为注射进去的核糖核酸影响了金鱼的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脱氧核糖核

酸包含了生命的遗传信息的主要物质基础。) 做为他的科研成果创造的一个奇迹是, 同他一道工作的其他中国生物学家说, 通过把大豆里的核糖核酸注射到水稻的子房内, 就可以用大豆的蛋白成分培植出水稻来。中国的新闻界大张旗鼓地宣传这种可以解决世界粮食问题的发现。

为了推广他的发现结果, 牛满江于1980年在北京帮助组织召开了一次研讨核糖核酸的国际性会议。可是, 同我谈过话的美国科学家后来说, 他们看到牛满江和他的追随者们的结果时感到震惊。沃尔特·吉尔伯特是哈佛大学微生物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他说, 牛的工作带有“炼丹术”的味。

“我们阅读他们的论文时发现, 他们的实验是在毫无控制下进行的, 并不是按照人们宣称的那样进行的。” 吉尔伯特说。他推测道, 要么是牛和他的追随者们故意对这些数据做错误的解释, 要么是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工作十分草率。

如果牛满江的研究结果是正确的, 吉尔伯特补充道, 那就将推翻当代生物学的最基本理论之一, 该理论认为, 决定生命形式的是脱氧核糖核酸, 而不是核糖核酸。脱氧核糖核酸在合成为核糖核酸之后才又合成为蛋白质。吉尔伯特说, 他遇到的几个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的中国生物学家来找到他, 感谢他和其他美国科学家公开向牛满江开战。他们解释说, 由于牛满江的政治立场, 他们不敢去挑战。而且, 中国科学院还命令了许多中国生物学家去协助他进行实验。

有些美国人知道北京对消息控制得很严密，他们多次问我，中国政府是否要审查我从北京发出的新闻专电。答案是否定的。新闻司从来没有公开干扰我写的东西；不管时间有多晚，电报室的工作人员和国际长话话务员都万无一失地与我合作，及时发出了我写的报道。我深深地感谢他们！

因为中国的审查制度更加周到、更加全面深入；不仅仅只是大叫大嚷地审查一个外国记者的稿件，所以，我的答案也是否定的。这种审查制度设计得十分周全、包罗万象，以至于它可以抹掉生活中的事实。

我第一次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在1980年。当时，中国的新闻界突然发现，全国长期树立的农业样板单位大寨，竟然是一个欺骗，一个虚假的宣传。从1963年毛泽东首先把大寨列为至高无尚的样板，以他那极端的智慧宣称：“农业学大寨”。以后，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朝圣者汇集到了山西省一个只有83户人家、250英亩乱石丛生、贫瘠不毛的生产大队去参观、学习。在全国上下，中国的农民都尽职尽责地把“农业学大寨”五个字，用很大的汉字写在可以找到的每一堵墙上。大寨当时对中国来说就同苹果馅饼和母爱对美国一样——这是最为神圣、最为美好的标志，也就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共同生活。大寨的农民甚至把自留地都自愿地交给了集体。难怪中国的报纸都数以千次地颂扬它。

由于毛泽东对大寨的评语，华国锋也固执地坚持学习大寨，并号召全国都要模仿大寨的榜样。大寨过去的党支部书记，是当时变成了政治局委员的农民陈永贵。后来，

报纸承认说，大寨并不单独依赖自己的努力才把荒山改为梯田、才挖掘成灌溉水渠的。事实上，大寨接受了政府的数以百万元的补贴，得到了成营成团的部队劳动力的帮助。大寨不断上升的粮食生产数字也是假的，是当地政府搞的假。大寨的实际产量已经逐年下降。不仅如此，那位头上老是用方格子毛巾裹头的农民政治局委员陈永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把不少的人迫害至死，他的儿子是骄横的小坏蛋，无所不为，道德败坏。现在，所有那些成百上千万的“农业学大寨”的标语，都必须给刷掉。

这种包罗万象的审查制度和做法是一种不能停留的工作，要求对细节有无休止地注意。在天安门广场一侧的历史博物馆内，曾举行过一次周恩来生平图片展览。其中有一张照片是党的领导人在1976年1月参加周恩来追悼会上的记录。在肃穆站立的哀悼者里，有四处空白了。我猜测到，那里过去原本是“四人帮”站的位置。中国观众也注意到了这些空白，你很容易看出这一点，因为照片外边罩着的玻璃上有人留下的指纹，这里是他们对朋友指点那些消失的人物的痕迹。

在中国，博物馆也有它的难题，所以常常都关着门。到上海时，我每次都想着能够进入那座精美的黑砖大院——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曾经在那里召开过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想去参观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鲁迅的旧居。这两处现在都成为公共博物馆了。可是，每次我到了那里都发现不开放。在北京时，幸好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的访问，我随同他们代表团一起进入了军事博物馆，我们进去时，博物馆的两个侧厅只打开了一个，是纪念1949年前

的红军那部分展厅。另外一侧的展厅是记录1949年以来人民解放军历史的部分，有朝鲜战争、中印边界之战和中越边界之战的内容，这一部分没有限制，可以自由参观。为什么会有区别呢？我问我们的向导，这是一个身穿草绿色军服、十分优雅的妇女——她的颧骨高高的、有一双很大的杏眼，又粗又短的辫子，还有一个调皮而上翘的鼻子。

“对有些事情，我们还没有得出定论哩，”她正言回答道。如果翻译过来，意思就是，还很难决定如何评价林彪。林彪是过去的国防部长，1971年曾试图要暗杀毛泽东。

对于这些事情，不管是披露大寨的弄虚作假，还是关闭博物馆，真正引人注目的是对于各种新闻工具的垄断。这使中国人很难去思考发生的事情。人民习惯了这种无休止的政治变化，渐渐变得漠不关心。

“我们这个民族，政府不仅控制了现在，而且还控制了过去，”我的朋友兵明智地说。她的外国教师新近给了她一本乔治·奥威尔的论文集《回顾西班牙战争》，她从中选了一段，认为适合于中国的情况——“如果领导人说，什么什么事‘决没有发生过’——那么，这事就没有发生。如果他说，二加二等于五，那好，二加二就等于五。这种状况比炸弹可怕得多。”

第17章

密不可宣的种种机密

在中国安顿的第一天，我打了一次电话。我明白了，打电话需要特别技巧：不在于如何拨电话号码，而在于如何从你要找的人那里明白其意思。我刚到北京，就给外交人员服务局办公室打了个电话，想为《纽约时报》雇一个中国助理。下面是打电话的经过：

“喂，服务局办公室吗？”

“不清楚，”一个不确定的声音答道。

“有人知道你那里是人事办公室吗？”我又问了一遍。

“他们都逃去了，”那人回答。“你有什么事？”

“我是《纽约时报》新来的记者，想要雇一个助理，我同谁联系好呢？”

“不清楚，”回答说，又一次回避我。

“我可以约定在什么时候到你们那里，谈谈我要雇助理的事吗？”我换了一种方式问道。

“请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吧。”

“会有人给我回电话吗？”我问道。这时，我的希望开始落空了。

“不大清楚。”说了这话，对方便挂上了。

这是我第一次领教中国人保密安全的国民性。我明白了，打电话的第一条规则是，别提供消息，这可能涉及国家秘密，给你带来麻烦。这对于靠地下游击队夺取政权的共产党人来说，原本的确很有利的。可是，这种情况扩展到人们打电话时不愿说明自己的身份，也不愿泄漏任何事实时，就不免常会闹笑话了。中国人打电话时，答话的一方总是以“喂”开始。这个字可以用于各种目的、各种场合，不带任何感情。即使你给一个办公室打电话，比如外交部新闻司吧，或打给政府发言人吧，对方拿起听筒后，决不会说：“这里是新闻司。”要猜测电话拨得对不对，全靠打电话人自己了。

更令人困惑的是，打电话的人们大多数都不首先通报自己是谁。他们不说“我是老王”，或者“这是社科院”，而只是说“喂”。打电话的双方都不知道在同谁讲话，除非有一方放下心来讲出自己的单位或姓名。这种拖延常常要浪费好几分钟。一位深感恼火的美国商人告诉我，他在一天下午曾决定玩一种游戏。他坐在电话机旁，随便地拨电话号码，并只与对方说“喂”。然后记下对方答语也只讲“喂”的倒底有多少。他记下的回答“喂”的最高次数达84次。

这种保密的情况还用于许多建筑庭院。紫禁城附近有一处高高红墙围起来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办公的场所，这就是中南海。可它的门前没有任何标

记。在北京西郊的中央党校的蟹黄色建筑楼外，也没有任何招牌。我在上海时注意到，甚至在那幢哥特式建筑的锦江饭店这个已经住满了外国游客的地方门外，也没有一点标志。如果你不知道这幢建筑到底作何用，这不关你的事。

在中国各地的大部分办公地点、工厂、学校，甚至连住宅楼，都有围墙围住，有人员把守。在新近粉刷、高墙围住的《人民日报》社的门前，站着两个实枪荷弹的人民解放军的士兵。每个进出的人都必须出示该报社发给的特别工作证。现在，在《纽约时报》办事处的门口，也站着穿制服的卫兵。这可能是60年代政治动乱时用炸弹威胁的结果吧。在中国，保证安全的理由截然不同。我问过一位高个子、憔悴的编辑，为什么他们需要这么多的保护。他回答说：“因为这是中国最秘密的地方。我们处理的大多数消息都是保密的。”

北京饭店没有围墙，但它却拥有居住在饭店旁的兵营里的一个连的守卫人员。星期日的早晨6点，他们常常把我吵醒。他们在那里练习正步走，或者在我的房间面对的一个狭窄的小胡同里操练武术。50至60人齐声吆喝“杀”，一面齐步向前走，这对睡眠可没有什么好处。汪小姐搬进她的新公寓时，她的几位中国朋友都很喜欢。他们兴高采烈的，因为没有围墙、也没有门卫。这就是说，他们可以无须登记、也无须说明自己是谁就可以来看望她了。她希望永远这样，她问房屋负责人，是否打算要建围墙。

“别担心，”他答道，误解了她的意思。“待院子里的另外两幢高楼建成后，我们就会筑围墙了，还要设门卫

的。一定会很安全。”

我常常在新华社通讯社发布了白天的新闻之后，午夜时分到电报室去给我的报纸发送消息。后来我发现，这种保密的激情有时反而会成为一种危险。在夜间晚些时候，北京饭店的工作人员不仅要锁闭各种消防设备，要逐渐关上一楼的8部电梯，而且在一段时间里还要设棚封住唯一的上楼通道。我始终不知道为什么，可是他们却干得特别小心。上楼梯的通道都拴上了绳子，楼梯前还堆满了桌椅。如果有人混过了大街上的部队巡逻，又溜过了门口公安局的警卫的话，楼梯口的屏障可是非官方所设，不许外人进入的。然而，发生了火灾怎么办呢？我有几次去看电影、看文艺节目时都中途退场。我发现所有的影院、剧院门都从外面上了门闩。有一次，我向一位守卫人员讲这不行，他告诉我说，这是为了避免那些要有票的人闯进来。

我把这些过份小心的事讲给大学的一位教授听时，他放声笑了起来。他约我一同在长安街散步至英里，到旧紫禁城的西侧城墙。那里延绵数百码，是一幢宫殿似的三层楼房子。我的伙伴让我再仔细看看这幢房子。我发现，凡是面对着党和政府首脑机关中南海的那些窗户仅仅是做得像窗户样的。这一整幢建筑其实是一个屏风似的门面。教授说，1973年，当17层的北京饭店快要完工之时，公安局的人十分惊讶地发现，房客只要往西看，就能够越过紫禁城，用高倍望远镜仔细看到中南海内的秘密休息厅。当时，毛泽东的特别警卫团叫做8341部队的领导想出了一个主意，建一座安全屏风似的假宫殿。“真是无礼之至，”教授痛心地说，“花了几百万元来修建这个假东西，而卫星早

可以从天空中看到地面，并拍下照片了。这表明，我们有些领导人的消息有多么灵通！”

然而，这种谨慎防范只不过是整个全方位的控制机制的外部表现而已。控制机制就像集成块上的微型线路模式，十分严密。那些访问过中国的外国人，包括曾到过其他共产党国家旅游的人，在离开中国时，常会骄傲地声称，他们可以在无人跟随的情况下，到任何喜欢去的地方：可以去看看深宅老巷、看看居民的住房。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毕竟不是警察国家。可是，一个自1949年以前就一直居住在美国人却对这些人的天真无知嗤之以鼻。他解释说，这种控制系统是换了种方式在起作用，即从内部起作用。因为政府组织起来的社会，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一个经济的系统，还是一个安全防范的系统。这个社会是建立在三种相互重叠、相互加强的成分之上的，即“单位”，或者叫工作地点，街道委员会，还有组织政治学习的“小组”。那位美侨老居民说：“这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机构。它就像雷达系统一样，不管你在哪里，都能把你找到。”

我在扬子江畔烟雾缭绕的工业城市武汉访问期间，曾去拜访过在华中师范学院搞研究的美国学者。令我吃惊的是，学院门口竟没有值班室，也没有门卫（北京以外的保安制度常常要松懈一些）。于是，我叫出租车径自开进校园，开到美国学者迈克尔·加西特居住的山上的一幢砖砌建筑前停下。

我刚到了几分钟，就听见有电话铃响。我听见一个妇

女高声问道：“喂，有外国人来看你吗？”她并没有说自己是誰。加西特给予了肯定答复之后，她还进一步盘问道：

“他是美国记者吗？我们需要知道。”

这是周太太，加西特说，是研究辛亥革命的专家。他听得出她的声音。她是学院里的安全干事，负责注意他。并没有人公开跟踪我，可她的消息还是挺灵。那个学院的每一个人，属于那个单位的任何人，只要看见校园里有陌生人，看到我进了校园，都要向保卫处报告。

加西特已经习惯了这种一直监视他的日常活动的事。

“如果我进城买东西，第二天周太太就会对我说，‘我想你进过城吧。我想你去过百货商店了。我想你买了两件衬衣吧’。”

正如前文谈到的，每一个在机关、工厂、学校、或公社的中国人，都属于某一单位。虽说单位只是一个人工作的地点，它可还负责为一个人提供住房，为他的小孩提供受教育的学校，如果有人生病还有医疗所，并且还发给粮票、油票、肥皂票。中国人在结婚前，必须要获得本单位的同意；如果夫妻俩要离婚，也必须先征得本单位的同意。

在每个单位的人事部门，都对它的每个职工保存有一个封闭的保密的档案材料。档案里不仅仅有个人自传一类的正常材料——如他的学历和工作经历——，还有过去曾经受过的政治上的指控，还有党组织对个人的评价，比如是积极分子，还是可疑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档案里还有一个人的阶级背景和自他以上三代人的历史，也就是说，他的祖父、他的父亲过去是地主、资本家，还是贫农或者工人。

“你的档案是严格保密的，只有干部知道里面装有什么。”一个三十出头沉默寡言的电工师说。“你本人永远也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他是一个红卫兵，他还是被当成国民党特务，关了两年监狱。“另一个红卫兵组织里的人肯定控告过我，可是我永远也查不出是谁控告的，控告了什么，”他接着说。

“任何人在交换居住城市，或者变换工作之前，”他补充说道，“你必须持有一封本单位的信，证明你的档案已经发送到你的新单位去了。你的单位还控制着你旅游的权力。如果一个中国人要离开他的城市或村子一天以上，就必须征得本单位的同意，就像西方国家的士兵要拿到通行证一样。他必须提出具体的理由才能请假，诸如父亲或母亲患病。中国每年正规的节假日只有国家规定的6天。为了加强这种限制，一段时间在通往一些大城市的交通要道，常设岗检查，可以拦住没有证明的人。如果谁要到旅馆住宿，他必须先出示所在单位的证明信。登记之后，他的姓名还要送往当地派出所。”

外国人想了解这个制度加在中国人身上的控制有多少，将是十分困难的。一个在北京大学的美国研究生讲了一件事，她说这事使她终于明白了这种控制。她刚从美国中西部自己的学校里来到这里后，对校园里原始的居住条件感到震惊——这里的自来水每天只供应两个小时，油腻难吃的食物，等等。于是，她给在美国的丈夫写了一封描绘自己生活的生动的信。她交信之后几个小时，负责管理留学生的训导就敲响了她的房门。

“我可以同你谈谈吗？”他客气地请求道。“你在中

国有什么困难吗？”然后，他逐字地引用她信上的话同她谈。

过了不久，她认识的另一位美国学生收到了一封在美国的女朋友的来信。信件完好，只是最后一页上写的是丹麦语。训导可干了件错事了。“打那以后，我明白了单位的真正含义，”这位美国妇女说。“它就像一张网，你别想逃离。”

朋友告诉我说，公安局在邮局设有自己的人员检查信件。中国1954年通过的宪法保证“通信私有”，可连这一条款，也在1975年和1978年修订宪法时删除了。我从中国国内收到的所有信件，都在信的一角开了个小口子。一个有经验的专家可以用一个圆的东西，像圆规什么的，把信内装的东西检查出来，我的朋友这样补充道。

大学里的单位还有另一个作用，叫“阶级监视”，即有一个党员负责政治上的秩序和纪律。70年代中期，汪小姐在北大读书时，这种监视的任务就派给了她历史系班上一个接近30岁的农民学生。他一张方脸，整齐洁白的牙齿；剪个平头，穿得干干净净的。他使汪小姐想起中国电影里那种扮演青年英雄的影星。潘庆德同她们一起在班上呆了整整三年，与学生一起去上课，并在一个宿舍居住，不过他自己有间房间。汪小姐班上的一些同学喜欢同她一道练习英语。可她后来得知，农民同学曾警告他们说，“我不反对学英语，但我们在学校里的主要任务是搞阶级斗争。”当时，汪小姐承认说，她还把他看作班上党的负责人而尊敬他，并把自己与诺曼·舒尔曼的浪漫史讲了。舒尔曼是自1965年以后居住在北京的美国人。她不知道的是

由于她是个海外华侨，又经常在政治集会上直言不讳地发表意见，他还怀疑她是个“秘密特务”哩。每一次舒尔曼去汪小姐处之后，他都要汪小姐的同寝室同学向他汇报，并把得到的消息转告舒尔曼的单位，想拆散他俩的关系。后来，汪小姐和舒尔曼准备结婚时，她把参加婚礼的请帖委托农民同学送给她的同学。可是班上一个人也没有来，这使她感到很伤心。四年之后，她的一位朋友才告诉她，他根本就没有散发汪小姐委托的请帖。

如果说单位对中国人在工作地点行使了控制权力的话，那么，街道委员会则是政府提供的一个看管他们在家活动的机构。在我的朋友洪和卫东居住的钢筋建筑的五层楼房里，街道委员会的代表是一个50多岁、胖胖的文盲妇女，姓马。她丈夫在1949年前曾是一家餐厅的穷招待。马太太并不是党员，但她精力充沛、精明能干。她通过给碰巧在大楼前停下来休息或办事的警察送茶递烟，谨慎地开辟了与他们的良好关系。终于，在大楼每年举行一次的成年人大会上，马太太被派出所，即最基层的政府机构，推荐为街道委员会成员的官方候选人。卫东讲道，投票并不保密，人人都知道要他们选谁。马太太获得了所有选票。

结果，马太太既是大楼看管人、治安的报信人，又是社会服务人员和公用大厅的老板。街道委员会的权力并没有写进法律条文，因为委员会被认为是“群众”的代表，而不是警方的代表，然而，这只不过使他们更有权势了，卫东这样说。

“他们手里最可怕的权力，是他们可以随时搜查你的

屋子，”卫东讲道。“警察还须有一份搜查证，可是街道委员会的干部却能随心所欲地进来就是。”通常街道委员会会有三、四个象马太太一样的中年妇女。她们可以在半夜之后，当洪和卫东都上床睡觉之后，根本不敲门就闯了进来。“他们的借口是到这里来查我们的户口，”即家庭登记证。街道委员会总是查那些从农村到北京来非法居住的人员；查这个家庭来的亲戚，或者送到乡下定居又溜回首都的年轻人。“我把户口拿给她们看，可她们总是东看西看，把屋内打量个遍。”

“如果我们有朋友来过夜，甚至来吃晚饭，马太太也可能走进来，问他们是谁。”洪插进来说道。“真令人感到羞辱。如果你不合作，她可以去叫警察，警察来后又会同样的问题。”一旦洪和卫东晚上很晚吵架的话，马太太在第二天便会叫住他们，责怪他们没有把家庭问题处理好。“没有你清静的时候，就连睡眠时间她也在注意你，”洪抱怨说。“我们就像被关着的动物一样。”

马太太还特别注意居民的清洁卫生，并不时地指责洪没有洗碗，或没有扫地。每当冬季时分，黄昏到得很早，马太太和其他街道委员会的干部常常躲在没有光亮的大楼入口处，查看有没有陌生人。这些，对我习惯于夜间拜访他们的人来说，增添了一种不受欢迎的冒险滋味。有一个晚上，我正穿过一片黑暗的田野向他们家走去时，有两个身穿蓝色工装的青年男人上前打招呼。他们想知道我的单位，问我在那个地区做什么事。我杜撰说，我是外籍教师，去几个学生家里。卫东解释说，他们都是城市地方民兵，另一个保安网络的成员。

街道委员会的干部并没有固定的薪水，但是，那些想同他们搞好关系的居民总会给他们送鲜肉、蔬菜和米一类的薄礼。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职位使他们处于对自己的家庭和朋友有所帮助的有利位置。因为街道上向城市劳动部门推荐待业青年去工作，需要街道委员会通过，向地方房管部门提出谁家急需新房也是街道委员会的事。

“只要看看谁家的小孩从乡下回城最早，并找到了好工作，你就会知道谁家是谁街道委员会的人。”卫东说道。

最近几年，街道委员会又增添了一种很不平常的权力——决定街道委员会管辖范围之内，哪些育龄夫妻可以生孩子。这种特权是政府开展的新的严厉的计划生育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运动鼓励每对夫妻只生一个小孩，达到在2000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为零这一目标。在这个运动指引下，每个省、每个城市都给每年出生的婴儿数规定了一定比例指标，街道委员会就可以决定谁家可以使用指标。

“我们优先照顾没有小孩的夫妻，”田太太说。田太太是我认识的另一位精力充沛的中年妇女，也是街道委员会的成员。她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她说她帮助一些待业青年组织起来做鞋帮。她还肯定地说，大楼里没有小孩的老年人，每月都能领到少量的福利金。可是她对计划生育的态度却十分坚定：

“如果夫妻俩已经有了一个小孩，我们就告诉他们，至少等4年再生，最好，不再要小孩。如果夫妻俩已经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小孩，我们便告诉他们别再要了。”

“对那些同意只生一个小孩的夫妻，我们有一些奖励

的。比如，每月给夫妻俩分别奖励5元钱（即3.30美元），一直到小孩年满14岁为止；优先照顾小孩入学读书，并且在理论上，允许三口之家分到四口之家大小的房子。”

田太太对她们街道委员会如何管理这一工作很坦率。

“我们派一个人来注意每个妇女的月经周期。如果有人过了周期没来月经，而且又没有指定可以生小孩，我们就叫她去做人工流产。对这个问题是不允许自由主义的。”

这项严厉的措施是中国历史上最坚决强硬的人口计划。理由是中国的人口增长数字令人灰心丧气。在公元2世纪，中国第一次进行人口普查时，只有59,686,680人，到1840年，是412,000,000人，到1949年，有540,000,000人。这就是说，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中国用约两千年时间，人口才到达第一个5亿。可是在过去30年里的共产党统治下，人口几乎翻倍到10亿。而这个国家只不过比美国稍稍大一点。在50年代早些时候，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曾警告说，中国的人口增长太快，将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增长。但由于他这种鲁莽的行为是对马克思关于人越多生产越发达理论的挑战，他遭到了攻击，并被撤掉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直到1979年，他98岁高龄时，才给他平反，并重新命名为北大的名誉校长。1949年以后出生的人数很多，北京的人士认为每年有两千万人达到结婚年龄。也就是说，即使每对夫妻只生一个小孩，到本世纪末，中国的人口也仍旧将达到12亿。到下个世纪，政府指望能减少7亿人口，然后再逐步放宽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政府的统计数字表明，子宫避孕器具是计划生育中最常使用的方法，占避孕方式总数的50%。绝育手术是

第二种常用方法，占总数的30%。全国的妇女绝育人数是男子人数的10倍，虽然男子绝育手术要简单些。中国还生产出一系列自己的口服避孕药，其中包括一种广为宣传的含棉籽油和棉子酚的男性避孕药。男性避孕药是通过观察各种复杂的症状，包括不育和心律不齐的症状后研制出来的。这些症状在中国北方河南省的种棉农民身上表现很突出。

北京从不透露每年堕胎的数字，但在我访问过的许多公社里，堕胎数字大于生育数字。自从北京于70年代早期第一次正式进行计划生育运动以来，人口增长的比例，特别在城市里，已经大幅度下降了。1971年，每年人口增长率是2.34%，到1980年，全国人口增长率降到了1.2%。然而，这仍旧没有达到政府指定的年出生增长率不超过1%的指标。问题的症结在于，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是否会接受只生一个小孩的要求。他们从亲身经历知道，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下，家庭越大，挣得的收入就越多。我在上海附近的西红生产大队参观时，曾看到政府用于扫除这些抵抗的方法。在大队卫生所的墙上，张贴出清楚表明每个农村干部如何响应这一运动的大张粉色报表。在这个大队的29名干部中（其中有27名男子），有10人进行了男扎手术。有14名干部或他们的妻子服有口服避孕药。其余的5人中，有3人还不够中国规定的结婚年龄，有1人还没有小孩，另1人是顽固的代表。他已经有3个小孩，可仍旧不想采取措施。难道这些干部对自己私下的性方面的决定公布出来不感到尴尬吗？我询问了这个大队的队长。“一点也不，”他回答道，并很老练地笑了笑。

我乘火车从上海到北京时，同一个矮壮的女列车长在一节车厢，她努力使我感到乘车舒适，努力让我与其他中国人分开。乘车的当晚，我便产生了以上的想法。火车于上午6:10到达北京，我很不喜欢到站这么早。可是在凌晨4:35时，这位同志就用钥匙打开了我的包厢门，吹起了起床号。

“该起床了，”她愉快地说，一下把包厢里的电灯摞亮了。“洗脸吧。”这明摆着是命令。可当我看了一下手表，知道还有一个半小时才会到达目的地，我那疲倦的身体很想再睡一会儿，于是我就关上了灯。

十分钟之后，她看到我没起床，又折了回来。她门也不敲就打开了，又摞亮了电灯。“最好快点儿。去盥洗间吧！”她大声叫道。

为什么要现在去呢？我一面揉眼睛，一面问她。还不到五点哩，我们还有一个多小时。“在五点半钟火车接近北京时我们就要锁上盥洗间了，”她回答道，使我毫无退缩的余地。“这是你的衣服。”她把我的衬衣、裤子和羊毛衫都从我原来放在的上铺上取了下来。

这一次我服从了她，踉踉跄跄地上盥洗间去，可是门已经锁上。她随后跑过来，打开了门。

“我们锁上门是不让隔壁车厢的人使用，”她解释说。隔壁车厢是“硬卧”，人们都挤在烟雾迷漫的沿走道排列的三层硬木板床上。我定的是“软卧”，由四个人分享一个包间。这里有丝绒窗帘和很厚的床垫，这是专供相当一级干部和外国人坐车用的。

我洗刷、修面完毕后，回到我那更加宽裕的包间。这时车上的喇叭响了，奏起了激动人心的乐曲。

“早晨好，”我头顶上的一个黑色的圆匣子里传出了一个明亮悦耳的女声。“今天是星期二。我们现在开始播音。我们的火车很快就要到达终点，我们的列车员为了卫生的目的正在清理车厢。大家都上盥洗间去，刷刷牙，折叠好被子。”

广播员既是一个音乐节目主持人，又是一个新闻发布官。接着，她开始念当天早晨的新闻和政治评论，摘自报纸的社论，号召大家努力地去提高粮食产量。“我们要永远记住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以粮为纲’的话，”她吟诵道。我通常是喜欢听新闻的，因为这是我的职业。可是天还很早，我到处找按钮想关掉这声音。找来找去发现没有开关。广播员讲完新闻之后，又开始背诵当天从北京开出的火车车次和时间安排，这对要转车的乘客很有好处。一直列出二十多次列车。然后，她还告诉乘客，下火车后怎样出站台，出车站，还告诉他们每一路公共汽车的起点站。

她那天早晨念出的所有统计数字中，有一个数字她没有讲，可不知怎么跳进了我的脑海里。我1975年第一次到香港工作时，曾读到新华通讯社的一篇文章。文章报道说，中国的农村有一亿零六百万个喇叭。这些喇叭把中国70%的农村家庭连在一起，直接收听政府的指示。文章没有透露城市里有多少喇叭，不过可以肯定，再多加几百万也不夸张。从我去坐过的农民家庭看来，一天里的喇叭开始播音时，很少的喇叭有开关让听者有权去关掉它。中国是一个具有上亿被动听众的国家。

汉学家们普遍认为，人们已经把现代极权主义技术，比如喇叭网络，与趋向顺从的中国传统结合了起来。一再重复的解释使他们失去了力量，这种情况当然是太糟了。因为这种形式仍然是窥视北京的控制机器如何起作用的很强的洞察力。对于“顺从”这个词，中国人理解并不十分准确，因为它只是指一个人干别人要你干的事，表明他懂得人际关系和“礼”，即旧式礼节和常规的法律。在西方，我们崇尚个人；而在中国，一致性则要求社会的认可。中国的言辞里有许多这样的警句：“树大招风”；“石头大招水冲。”……人们就是在这种教育下培养长大的，让人们别展示才华。我们应该成为“圆滑的鹅卵石”。人们应该学会“八面玲珑”的本事，就是说不得罪任何一方。你讲的话要模棱两可。

正是这种毫无生气的情况，正是这种要求持平和一致性的倾向，常常使外国人认为中国人不可捉摸、难以了解。我记得在1972年8月一个闷热的下午，我陪同一个中国记者小组在美国参观的情形。当时我们在州际公路上停车加油时，汽车就停在加油泵前。这三位中国记者说他们要到附近的霍华德·约翰逊餐厅去买冰淇淋卷。一刻钟后，他们仍没有出来。我便进去看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正在同一位女侍者争论着什么。他们要冰淇淋卷，而女侍者指着她身后的小黑板，问他们想要哪种，上面有很多种。他们却不能够表达个人的爱好。“什么味的都行，只要都一样就是了，”有一个记者最后说道。

中国哲学中最大的问题从来就不是辩明真理是什么，或者好与坏的区别，而是统治者如何能明智地控制，如何

保证人民生活和谐，接受一致性的原则。对孔子来说，答案须在教育里找寻——他相信，人人都可以在伦理学校里脱俗信儒。他教授学生：“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人们精明地应用了这一传统，努力改变这个国民的思想，造就一个“社会主义新人”。他们的武器就是政治学习。政治学习成了他们控制机器的另一个部分。人们借用了列宁关于微小而组织严密的党的细胞的观点，在40年代初期的延安窑洞的指挥部里，就开始制定了如何教育那些数以万计的团结在他们周围的不同的人们，包括年轻的民族主义学生，老年知识分子，不识字的贫农，以及过去的军阀和国民党官兵。当时，每人被编进小组，十人一组最佳。接着是几个月中集中的“思想改造”。首先是学习指定的党的文件，然后是对各自以往的态度和行为进行相互批评，最后每个人要一再写出自己的表白，直到被党组织所接受，以获得再生。这种过程同宗教上的皈依相似，像我们自己的复活集会，不过还增加了个人隔离、心理治疗、个人罪过感的控制等等，常常还真令人感到惶恐。

然而，在我于70年代末期到达中国时，在经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后，政治学习变得不那么激烈，常常成为空洞的形式了。正像精神病理学家罗伯特·利弗顿在1961年他的书中对思想改造所评论的那样，它将呈递减律的变化。“一再去改造同一个人更可能增加他的敌对感……，而不会使他消除‘不正确的’思想。”利弗顿得出结论说，在真诚的热情和高压措施之间的平衡，将逐渐趋向于后者。

在兵就读的北京一所大学里，现在学生每周只有两小

时的政治学习时间。学习通常是在星期六下午以班上分成的固定小组为单位学习。“理论上我们要政治学习，”一个天气暖和的中午，我同兵一同吃午饭时，她告诉我说，

“不过，实际上许多学生不再去参加政治学习，或者就打扫寝室卫生。如果不得不去学习的话，有些人就干脆织毛衣混时间。”只有在传达新的重要文件时，人们才感兴趣；兵补充说道，因为文件上可能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新闻，而报纸上如果要刊载的话，也一定是很久以后的事。

每学期末，所有学生都仍然要求写一份“总结”，即个人行为报告。“过去，你必须诚实地写出你的内心思想。据说每个人都有三个层次的思想。第一层是你为自己考虑的，即日常的感受。第二层是你只对最亲密的朋友讲的。第三层则是你自己隐藏起来的，你的无意识。这正是你需要报告的。”

“同样，还要求你严格对待自己，要求讲述你的挫折和失败，”兵继续说。“这是对毛主席是否忠诚的表现，是自愿的、真诚的事。可是现在，人们只是说谎话，或者强调他们的成就。”

“比如上学期，我写道：‘我一直刻苦学习毛泽东思想。’这当然不够真实。接着我又写道，‘我十分积极地参加了政治学习。’这也不是真实的。最后我写道：‘我的文化学习非常刻苦。’这才是真实情况。”

“你必须当着小组的同学朗读你的总结。其他同学必须在党员老师的引导下对总结加以评论。过去，其他人会对你很苛刻，现在可不了。人们担心，如果他们讲出来，在下次运动中你会找其他事攻击他们。这就是我们从文化

大革命中取得的教训。”

如果学生犯了错误，仍然要他写一份自我批评。不过这更多地是用于惩罚，而不是当作改变罪人的努力，这同过去不同。“有一次，我把学院的校徽丢了，我必须写一份说明，说我如何不爱惜它，因为不是学生的人就可以混进校园里了，”兵说。说完之后，她拿起我借给她的琼·迪德昂的《白色纪念册》，说道，“我要去革命了。”我怀疑她是去参加星期六下午的政治学习了。

在管理人民的所有例子中，最令我感到恼火的，要算随便便像例行公事似地让丈夫和妻子两地分居，在国内不同的地点工作。（也许这是因为我在北京的很多时间，都没与家庭同住的缘故吧。）香港左翼杂志《晨明》曾经做过一次估计：中国有八百万人因为工作关系而被迫夫妻分居两地。其中有两百万是干部，其他六百万是普通工人和职员。官方没有任何解释，只是劳动部门为了国家的方便，如此分派人们的工作而已。

孙是一个瘦高个，戴一副眼镜，约四十五岁左右，他头发稀疏、眼角有一种忧虑的神色。我初次见到他时，还以为他是个单身汉哩。他单身居住在某科学研究所的单位宿舍里，只有一张单人床和装很少东西的箱子。多数日子，他都在研究所的食堂里吃饭。过了很久，孙才透露自己实际上是结了婚的。很多年前，在50年代末期，他同妻子一起在北京的清华大学读书。他们相爱了，毕业时结了婚。他们总共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月。然后，国家劳动部门把他分到了北京，把他妻子分到了上海。容不得他们任何

中辩。他每年有三个星期去看她，通常是春节期间。因为他们有三天假期，再把分居两地的探亲假两周加起来就是了。

即使他妻子在九年前生了一个女孩时，政府也不宽容他。他们属于不同的单位，各自的单位都不放他们走，因为，孙感觉到，官僚主义和嫉妒的原因。他的妻子因为在1975年当着办公室其他人的面指责过江青，就带来了麻烦。她被遣送到上海郊区一个村子里。1979年，她恢复了原工作，但仍旧被要求在那村子里干农活，栽秧种田、抚养女儿。

到了晚上，孙有时就同他宿舍外的邻居小孩一起玩。把他们抱到自己的大腿上，或者同大一些的小孩玩踢球。

“我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夜晚他说，“而且还过分居生活。我女儿只知道我每年去看望她们一次，给她带些礼物。一个人到底要活多久呵？”

除去孙和他妻子这种因为大学毕业分配工作而分居两地的人之外，还有许多原本农村人，因为丈夫变成国家干部，或者上调城里工作而分居两地的人。因为政府严格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就不让他们把妻子带进城来。

有时，当我在北京王府井大街散步，或在火车站外什么地方，或在北京大学校园附近的电话线杆处，都会看到人们手写的纸条。纸条上方是两条水平的箭头线。这些纸条都要求调换分居两地的夫妻的工作和住房。

“我家住北京，可我在天津的一家国营工厂工作，”北京饭店附近的一根电话线柱上的纸条上写道。“我已得到厂领导允许调回北京。希望回天津的同志如果愿意在酒

厂工作，请同我联系。”下面写着此人的姓名和所在厂的电话号码。

政府在解决夫妻分居两地的问题上十分迟缓。这比单纯官僚主义的死板更使我吃惊。这里有一种冷漠的成分在里边，很像人们对任何与性有关的东西的态度，似乎人只要为了革命而没有爱情也能生活。我在香港工作期间，曾雇用过一个漂亮的英籍华人女郎琳·柯克帕特里克做我的助手。她同她的丈夫安德鲁曾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过两年。虽然当时他们已经结过婚，可学校却不许他们同居，并给他们分别安排到拥挤的宿舍居住。有一个在上海的英国商人同意他们在他的房间里一起居住，这位商人却遭到当地公安部门的指责。

虽然中国的警察部门具有很大的权力，可是，我感到非常吃惊的是，许多中国人对北京街头身穿制服执勤的警察的态度都是漠不关心。尽管政府已经努力叫人们遵守交通规则，比如分出了自行车专用道，为小车和行人都竖有指示路标，但是，中国的城市交通阻塞都很混乱。行人过街时根本不看是红灯还是绿灯信号；骑自行车的人突然毫无事先说明地穿过汽车道；汽车则是谁的喇叭响、谁开得快、谁就先到前面。有好几次，我都十分恐惧地狠踏刹车，以避免撞到因风雪或风沙而从拥挤的街上向后退的行人。这种情况使中国人同很守规则的日本人相比迥然不同。在东京，人们只有在街灯变绿后才走下街沿。

我有一次在冬天的一个寒冷的下午驱车回北京饭店途中，看到一个站在岗台上的警察，正在大喝一个骑自行车骑

过十字路口的妇女。他喝斥她，因为她明显地违犯交通规则，但她不予理睬。于是，警察从岗台上走下来，抓住自行车后边的行李架，一下把她摔下自行车，摔到了街沿边。这妇女给激怒了。她从地上跳起来，向他肩膀上打去，然后又打他的胸口，接着把他那顶蓝布大檐帽扔到了街对边。他反过来抓住她的手臂，大步流星地把她推到了街道转弯处的一个漆成白色的警察站。这妇女很穷，接近四十岁，两眼疲倦、皮肤粗糙。我注意到，她身穿很旧的灯芯绒上衣，肥大的蓝布长裤，戴着缝补过的薄手套，一双布鞋又旧又薄，无法抵御当时的寒冷。几个警察很快跑了过来，扣押了她的自行车，叫她到附近的派出所去接受询问。

“你们把车锁了，我怎么去呢？”她抗议道。这时，周围聚拢了几百名围观者。北京的电影和戏剧都不多，票又很不容易搞到，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几乎都有人围观，特别是有人同警察扯打的事。一个十几岁的男孩走到那妇女面前，不理睬警察。他对那妇女说，“喂，骑我的车去派出所吧。”他的这种举动，正是文化大革命造成人们对威望不大崇敬的又一个迹象。

然而，尽管偶尔也有这种勇敢的举动，但是这种管理方式无所不在，使人们感到的心理压力非常大，引起的精神紧张情绪是大多数西方人难以想象的。“人们一直在紧张情绪里生活，”一个自尊且寡言少语的工程师说道。“你总是担心你认识的人会背叛你，”他解释说，某个你单位的人，你所在街道委员会的人，或者某个政治学习小组里

的人。

这种压力又随着多年来的各种政治运动不断变化，以及随着广泛的政治迫害而有增无减，这位工程师补充说。为了尽可能地减少麻烦，他说，他遵循一条主要是谨慎的方针——决不与本站的人谈个人私事。“因为，等下一次运动开始时，领导会在你们单位召开批评会，人们将被迫说出他们知道你的事，不管他们喜不喜欢你，都会的。所以，我同本单位以外的人交朋友。”

这位工程师和他的妻子都抱怨自己患有“神经衰弱”症。也就是西方人认为的神经紧张、精神压抑、情绪不安。我后来发现，有许多中国朋友都谈到有“神经衰弱”。与我谈过自己性生活的那位女记者也说，她一直患有头疼和失眠症。她说，她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总是感到周身困乏。我们一块外出吃饭时，她说没有食欲，只吃了很少。小苗也说有头疼症，不好安睡。根据她丈夫李的说法，她经常脾气暴躁，心绪不安。他同我单独在一块时，他诊断她的问题是“神经衰弱”。我认识的其他一些中国人患有神经性痉挛。我那非常认真的助手习惯于不停地摆脚。每当我向他提出一个难答的问题，或者叫他去给一个政府机关打一个使他不自在的电话，他腿摆动的程度明显增大。当然，有些美国人也患神经性痉挛，不过，在我碰到的中国人中有我助手这种习惯的人数之多，令我吃惊。

戴维·埃森伯格是哈佛医学院毕业的美国医生，他当时在北京中医学院搞科研。他说，当中国人知道他是内科医生时，都马上告诉他自己患有神经紧张的症状。埃森伯格医生讲道，在他去上海以南的杭州市度假期间，他曾去

一个小店买点心。

站柜台的青年人同我交谈了一会儿。当他得知我是医生后，说他患神经衰弱已经有一年了。“我去看过中医，也去看过西医。可我还是夜不能眠。我整天都感到疲倦不堪，感到十分紧张，心情烦躁。请给我点药吧。”

埃森伯格医生有二十七岁，说话温和。他问他的个人生活是否有不顺心的事。结果这个站柜台的小伙子一年前才来杭州，远离他的家。“我已经有一年没有见到家里人，我连女朋友也见不到了。我不喜欢这个工作，”他对埃森伯格医生说。“过去，我也想学英语。可是来了文化大革命，我只得退学。在这里卖点心，有什么前途呢？”

埃森伯格自己对于从偶遇的人们中得出结论十分谨慎。可是后来，他十分惊奇地发现，在他到中医医院的针灸室去观察的一个月里（他是第一个获准在这家医院工作的美国人），他见到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病人都抱怨有神经紧张症。

“病人们自己相信这种病纯粹是身体原因。”埃森伯格医生说道。他感到，这部分原因是就传统上讲，中国人认为身体疾病比精神疾病更容易被社会接受。即使在家里承认有精神疾病，中国人也长期感受到了创伤。然而，中国医生也鼓励这种解释，因为他们不接受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所以，不注意调查病人的情感背景。

政府在对待精神健康问题上采取小心翼翼的政策。同我交谈过的几位中国医生都说，上面有人坚持认为精神疾病没有生物学基础，所以是社会或思想毛病引起的结果，这些毛病当然应该克服。1957年，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仍

旧很亲密，中国还受到苏联知识分子的强烈影响时，政府就把心理学这一门学科废除了，把心理学标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许多留学西方后回国的中国心理学家都去参加体力劳动。这是一位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过博士学位的心理学家告诉我的。精神病理学家不在其内，但是，中国大部分的医学院校停止教授这些课程。

然而，埃森伯格医生在针灸室工作时，决定搞一个试验。对头疼症、失眠症和周身无力症，中国医生都给病人进行针灸治疗。埃森伯格大夫却去询问病人，看他们是否有影响其病情症状的情感问题。

“一个年轻小伙子回答说没有，他没有什么个人问题。不过，几天前，他的未婚妻被两个歹徒杀死了，”埃森伯格回忆说。其他有些病人因为高考落榜而灰心丧气，另一些病人由于同单位的顶头上司有矛盾而心绪不佳。还有一位男子患有紧张症。他像周身失去知觉似地既不能讲话也不能移动身体。埃森伯格询问陪同他到这里来的病人的历史，结果他刚过了九年的禁闭生活，刚出狱的。

埃森伯格大夫特别记得一个45岁过于肥胖的妇女。她进医院时喘息急促、汗流不停。她身穿很短的裤子，一件灰色羊毛衫竟长出两英寸。她说自己患有癌病。

“看吧，我的嘴都是歪的，”她呻吟起来。中国医生在给她诊治时，埃森伯格大夫注意到她的牙齿咬得很奇怪，嘴唇稍稍有些向右边扭曲。这妇女谈话或吸烟时，嘴又恢复了正常；而当她一言不发坐着时，嘴又歪向一边，就像一位喜剧演员的怪脸似的。

“过去15年里，我一直神经紧张，都是‘四人帮’引

起的，”这妇女说。“能给我扎针吗？”

中国医生在给她扎针时，埃森伯格大夫就询问她的个人生活。1965年，她生了第四个孩子。打那年起，她就没有工作了，她说，因为要在家照看小孩，忙不过来。对中国妇女来说，这种不工作的现象还很少见。1966年，她丈夫被遣送到农村去当一个电焊工，同家里分开了。她丈夫在几个月前才回家的。回城以后，他又找不到工作。

“我那两个大孩子真是捣蛋鬼，”这妇女继续讲。“两人都没有工作。我过去希望他们能上大学，可他们只会打架、找麻烦，”她痛苦地说道。可是，当埃森伯格大夫问她，这些困难同她的疾病之间是否有关系时，她回答说，“我看不出有什么关系。”

直到现在，中国的精神病院也象它的核试验场地一样，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没有迹象表明，中国也象苏联人使用精神病院对待惹麻烦的持不同政见者那样做，不过偶尔也有报道说，文革中的一些政治犯被关在精神病院里。当时红卫兵偶然发现，胡风的一些追随者被关在精神病院里达几年之久了。我在北京期间，曾看过一场叫《柳暗花明》的电影。电影讲的是农村里激进的年轻人同老干部之间的冲突。那位支持老干部的女主角，就被一个诡计多端的极左分子关进了精神病院，捆在病床上。这个恶棍的行为，在观众里却没有引起什么反应。这可能意味着他们熟悉这种事。

中国人告诉我说，现在中国精神病院的主要问题是数量太少。一个解放前出身在殷实家庭的工程师告诉我，他弟弟因为1958年被分配到山区一所学校教书而患了慢性精

神压抑症，不能继续教书了。他的弟弟又没有体力干农活，只好私自搬回城市同他年老的母亲一起生活。他的病情变得越来越糟，但是精神病院却拒绝给他治疗。病院已经人满为患，他弟弟的病情还不算很严重。这所医院只接收患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他只不过是精神压抑症，是神经质的，而不是严重的精神病患者。最后，这位工程师讲，他不得不走后门，通过一个他认识的为政治局委员治病的大夫，把他弟弟送进了医院。

我同当时美国的卫生、教育、福利部长约瑟夫·A·卡利法诺一起，参观过上海的精神病院。该医院建在市郊，一幢令人愉快的长方形三层钢筋水泥建筑物座落在一座花园四周。参观团里的美国医生认为，该医院的设备和治疗条件同美国大多数公立医院相比，都要胜过一筹。他们对中国医务人员也使用许多新近研制出的疗效很强的镇静药和其他西方最近几十年生产出来的药物表示很大兴趣。不过，他们还是注意到了该医院与美国医院的主要不同之处。夏征宜院长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曾在美国受过培训。他证实说，医院每天住院治疗的1,000名病人和500名门诊病人中，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这是精神病中最严重的。

我们一面谈一面沿着空间很高的走廊走去。夏医生坚持说，中国根本没有像西方存在的那种广泛普遍的精神压抑问题和其他神经质的问题。“中国同美国相比，精神疾病要低得多，”他声明。而在中国，他说，只有大约百分之七的人患精神病。而在美国，根据全国精神疾病研究所的统计，占人口百分之十五的人患有可以诊断确定的精

神疾病。

在我离开中国以前，我曾遇到一个接近六十岁的女心理学家。她在丢掉了20多年的专长之后，于1978年又允许继续教授她的专业。她的书在好几年前就付之一炬，但是她的精神仍很年轻，可以说是精神焕发。她对中国的心理学发展，表现出很强烈的兴趣。

你是同意夏医生讲的中国人没有患抑郁症的呢，还是已经注意到许多中国人都在抱怨神经紧张呢？我这样问她。她那双黑眼睛凝视了我好一会儿，我不禁怀疑自己是否侵入了禁区。然而，她展开了十分热烈的议论：

“我们在经历了过去十几年的灾难之后，人们都感到压抑，”她说，两眼闪着亮光。“压抑和不安都是我们的心理创伤。我每天都在为此事担心。”

第18章

西部劳改营

“这种斗争……是独特的中国式创造，这种创造把威胁恫吓、贬抑屈辱，以及把人搞得精疲力竭结合起来。简言之，这是一场由许多人、有时上千人对一个人的智力上的围攻，受害者即使有理，也没有反击防卫的力量。”

——鲍若望：《毛泽东的囚徒》

事情开始时非常简单。我随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率领的代表团在上海参观，这是1949年以来美国最高级军事代表团访华。外交部新闻司的人员想要落实的是，在布朗经上海离开中国后，我们常驻北京的新闻记者要回北京。他们非常细心，十分注意细节安排。在访问结束前几天，新闻司干部问我怎样安排回北京？这位干部表情愉快、一脸稚气、肤色较深。他说他可以帮我买票回京，在中国，飞机和火车票常常是几周前就预定的，这当然是很大的帮助了。我说，我想乘火车，但我客气地拒绝了他的

帮助，因为我想秘密地去看望在上海的几个朋友，又不知道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找到他们、同他们见面。我们到达上海后，碰巧遇见一个朋友，我就去买了访问团离沪两天后回京的车票。

可是那天下午，我买到车票后几个小时，正坐在旅馆的大木桌前，忙着为《纽约时报》写一篇布朗访华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的文章，上海市政府的两位官员敲开了我的房门。他们说，根据我向新闻司干部的要求，他们已经为我买到了火车票，现在前来要车票钱。

我这时候犯了个大错，我按照自己的观念毫不让步。也许因为我正忙着写文章，又接近晚饭时间了，我像一个愚顽者似地拒不付钱。我说我没有请任何人帮我买票。他们很有礼貌地回答说，情况知道得十分清楚，是我要求他们买票的。不过，如果我不要车票，可以付退票费六元（即四美元）。我还是拒绝了。我觉得自己没有订购的东西是不应付钱的。

那天晚上，我刚吃完晚饭回到房间，一个陪同代表团的军队外事局的官员走了进来。他方脸、平头，站得笔直，看得出非常生气。

“你为什么不付钱？”他问道，脸都红了。我解释说，我决没有要求买票。

“你要求过的，”他说，并把我往昔的朋友叫到我房间来与我对质。“你必须承认错误，”他们同声向我嚷道。我的错误？听到这句话，我终于认识到形势的严重性。我开始感觉到自己被他的朋友、同事们团团围住，不断地批判你，直到你最终无奈地搞糊涂了，或吓坏了，

只得承认不管指控他的什么事。我听说过的真正的斗争会，不管在什么地方举行，总要延续二至三小时，或者几天，甚至几个星期。我的处境当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确有许多方面是相似的。

新闻司干部变得不再是过去那样和和气气的。尽管他是深色皮肤，脸也气得通红，而且他戴上了一副居高临下的面罩。

“你在抵赖事实，”他教训我道。“我有证据。我对我们的谈话和你打的所有电话都有记录。事实你抵赖不了！”至少我明白了，我的电话都被窃听了。

“先生，这似乎是一场误会，”我回答说，努力控制自己不发火，找到一种和解的办法。

“中国不存在误会，是你错！”他叫喊起来。十分明白，我不能够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可我仍旧不明白，除了完全认错外就别无他法了？

“先生，有时候，美国人和中国人办事是不同的，”我换了一种方式。“在美国，人们必须自己买票，政府不给我们买。”

“问题是，你不尊敬中国！”那位干部重新攻击起来。“布朗部长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十分重要的访问，这是为了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你不想让自己的错误危害这种关系吧？”他问我。确实，访问很有意义。布朗透露说，卡特政府准备对中国出售非杀伤性的美国军火。他借势使我产生有罪感，这是批斗会上的常用方式。

军队干部脱掉了草绿色军服，也加入了攻击。“你最不守规矩，”他咬牙切齿地说，使用了一个通常矛盾尖锐

的词。“在同行的40个记者中，只有你给我们找麻烦！”这是批斗会上的另一种标准方式，即孤立受害者。

然后，他们开始追溯历史，这是中国询问者的最后武器。“你一来中国就态度很不好。你第一次来北京就给新闻司惹了麻烦。”

我知道这确切指的是什么，那是1977年的访问中的一件事。可是他当时不在中国国内，他在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工作。他肯定是读过有关我的档案材料。中国人什么也不会扔掉，破衣碎布不会扔掉，扭曲的废铁不会扔掉，各种纸屑也不会扔掉，特别是过去事情的记录就更不会扔掉！当时的事情是这样，当时我正要去给纽约发一篇文章，但我发现新闻司发给我的记者证上列出的登记地址有错。错误是由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粗心大意造成的，他们告诉中国的地址有误。国务院没有把纽约《纽约时报》的电传号码列上，而是只提供了我在香港的电报挂号。我当时向陪同我的新闻司官员指出错误时，他十分气愤。

“不会出错！”他毫无条件地声明道。“你这个帝国主义者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国人民。”一个美国外交官承认说，这是美国国务院的错，我们在《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新闻周刊》记者的记者证上也发现有同样的错误。可他还是心里愤愤的。

当这位干部说到我过去违反规定的事时，我意识到自己要失败了。“先生，我会很高兴地付票钱的，这是件小事。”我努力想重新修好。可是这不够，必须彻底承认错误才行。中国人非常拘泥于形式。既然政府认为一个人有罪，他就必须承认，以便明白表示伸张了正义。

“我不会要你的钱，”他满脸鄙夷地说。“你必须向我们上海的主人道歉，把钱付给他们。他们才是你得罪的人。”

这时，争论已经持续了几个小时，已经是午夜之后了。那两位下午来找过我的上海官员早已在旅馆的另一层楼的住房里睡着了。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愿意作何选择，是继续睡觉呢，还是听我半夜三更去道歉。可我们还是一起大步走到楼下他们的房间处，把他们叫醒了。等到他们穿好衣服，我交了钱，也道了歉。

“你应该从这件事中总结教训，端正端正态度！”我正动身回房间时，新闻司干部还责备我说。我感到精疲力竭、气急败坏，感到惊恐万状。

后来我认识到，这只不过是一件小事。我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但这事使我更好地明白了我的中国熟人们告诉过我的经历真正的批斗会是什么滋味。在过去，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经历过这种被压得粉碎的、深受屈辱和恫吓的事，以便能清理革命队伍。这些人中当然有过去的地主和资本家，而且还有教授、记者、律师等叫做右派的人，有宗教人士，甚至还有参加了错误的政治派别的工人、农民和学生。

罗，个子不高、圆脸、高嗓子、35岁的老红卫兵，剪着一头波浪形发式。他回忆了过去有两年所经历的盘问，多半是审问式的。审问是在江西省的边远山区里公安部特意修建的监狱里进行的。罗单身一人被监禁在一间矮小的泥墙茅屋里，房间里站着一名守卫、门外还有一人把守。

即使在晚上，电灯也彻夜亮着，以便能监视他的行动。罗不准与守卫人员谈话，也不准与监狱里的其他人员交谈。所以在那整整的两年里，他说，他听到的都是审问者问话和其他人在批斗会上对他的叫嚷。

罗被指控为一个极端分子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夺了外交部的权。他并不否认参加了那一次接管，但他声明说，他的组织是听江青的直接命令而干的。在罗被拘捕的1972年，江青很有实权。不过，当时毛泽东的继承人兼国防部长的林彪，在企图杀死毛主席未遂，乘飞机坠毁刚死不久。公安部想要罗承认，其实是林彪下的命令占领外交部。公安部当时正在编辑材料，为中央指责林彪使用。

罗在监狱里所呆的两年中，审问者始终是那四个人——两个公安部的、两个外交部保安处的。他们在他被捕之后，随他一道坐火车从北京去江西。

“他们每天都是从八点钟开始，到中午12点，然后从下午两点到五点，晚上又从八点到十点的审问，”罗回忆说。“他们肚子饿了时从不审问，”他笑着加上一句道。我是在乘车途经广州时，暂停在广州遇见罗的。他在广州的一家小饭店里喝着啤酒给我讲他的经历。罗不动情感地讲述着他的经历。中国人非常严肃、不易激动。罗象许多我认识的中国人那样，能够理解他的灾难的恐怖。

“审问很不公正，”罗回忆道。“他们想强迫我承认根本没有的事。他们想要我根据他们写的事件经过来写一份自白。不愿意干没什么好处。只要我拒绝他们，他们就召集监狱里的其他人开我的批斗会。”

“有时候，他们就在猪圈里开批斗会，”罗继续讲道。守卫人员把他推倒在猪群中间。“他们强迫我跪在肮脏的地上，到处是猪粪。他们把我的头按倒在地，我的鼻子都接触到了猪粪。不许你抬起头。反动分子不能是骄傲的样子。公安部审问者问我，“是谁命令你占领外交部的？”我回答是江青，他们每个人都跳起来咆哮，“你诬蔑！”其他有些囚犯不得不打我，向我吐唾沫。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守卫人员就会责怪他们态度不端正，也把他们拉来批斗。

“实际上，我还算幸运。他们没有毒打过我。为了让你承认，他们喜欢使用心理压力。”但是，罗回忆说，他参加过一次批斗会。会上，囚犯们毒打了一个拒不认罪的过去华侨委员会的干部。“我们向他拳打脚踢，他后来吐血，过了几天就死了。”他说道。

罗在监狱里时，他还叙述道：有三个犯人自杀了。“他们不能忍受那种压力和屈辱。一个人用一种草割断了脉搏；另一个割断了喉咙；第三个是上吊自杀的。他们总是通过高音喇叭宣布这些事。监狱负责人说，“他们是害怕罪行暴露才死的。”当时，罗很想知道，他的父母是否因自己而受到牵连。可是，他从未收到过家里的任何邮件。直到他被释放出来后，他才得知，所有他父母的信件都被监狱退了回去。

由于审问一拖再拖，公安部的人向罗保证说，如果他承认是听林彪的指示办的话，他们就马上放他。但是，他拒绝了。最后，他们帮他写了一份自白。

“我们必须排练一次。首先，我要背熟所写的内容，

以便我在开批斗会时不出差错。他们告诉我“这句话一定要讲得很痛苦。说这一段时必须动感情。”他们在有些地方写上了“停止”的字样，以便其他犯人讲话；他们在其他一些地方写上“口号”的字样，以便让他们对我喊口号。后来，我不记得后文写的是什么。守卫人员说我想掩盖事实；实际上我确实忘了。最终，他们还是把写好的东西拿给我，我就读起来。”

“我第一次开批斗会时，站了一刻钟就四肢麻木了。我真吓得要死。可是后来，我就习惯了。我低着头，我谁也看不见，只能听到一片噪音和叫喊声。”

终于有一天，守卫人员告诉他，说他被释放了。“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告诉我说，“你是人民的敌人，但你认错的态度还算好。”

我在北京居住的20个月里，所遇见的中国人几乎都讲到过政治迫害的事，有些人比罗的经历更糟。我认识的许多中国人都对身体和心理攻击感到恐惧，对普遍的不公正现象感到害怕。力华在六岁时就被逐出了北京，她亲眼看见母亲被人打死；兵在13岁时就被强迫声讨自己的父亲；洪则因为一个将军有位喝得醉眼惺忪的儿子喜欢上了她被投入了监狱。在合肥市为马里兰州州长哈里·休斯举行的宴会上，我坐在一个个子矮小的女记者身边。她整个体格娇小，理着短发，脸上还看不出皱纹，她老是不停地像姑娘似地微笑，让她看上去比50岁的年龄年轻得多。同过去没有见过面的中国官员在正式宴会上谈话，常常都较拘谨。为了保险起见，我先问起她丈夫在干什么。

“我丈夫死了，是四人帮害死的。”她很随便地回答，嘴角似乎一直没有离开过笑容。这对中国人来说非常普遍，只是就事论事而已，只会使外国人感到吃惊。

美国有一位女商人准备安排一个中国音乐戏剧代表团小组访美。她请了我和北京爱乐乐团的一名女钢琴家一道在北京饭店吃午饭。这位中国音乐家十分忧愁，脸拉得很长，吃饭时很久没有讲话。文化大革命以前，她解释说，她丈夫是该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

“可是有一天，他出了差错，”她用单调的口气说。

“文革中，大街小巷都成了一片红海洋。所有的商店都插上了红旗，橱窗里装满了红宝书。我丈夫当时同一个朋友一起去买东西。我丈夫说，真弄不清楚哪一家是饭店、哪一家是理发店。”他那位朋友后来告了密，警察把他抓走了。

“我想去见他，并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警察却说，‘没什么好问的’，”钢琴家继续讲道。“你丈夫是个反革命。你应该与他离婚。如果你不在你俩之间划清界线的話，那么，你可能是他的同谋。”我没有其他选择。通常要离婚很不容易，但是，我的单位很快就同意了。”结果，她丈夫在监狱里呆了十年。他获释之后，不想再同她复婚。

在饭厅的另一张餐桌上，我看到中国的第一号钢琴家刘诗昆。他个子很高、十分瘦削，剪着平头，戴着一副黑色玳瑁眼镜。刘可以自由进出北京饭店，因为他同叶剑英元帅的女儿结了婚。在文化大革命中（从1966年到1969年），刘原来是一个很激进的红卫兵组织领袖。后来，他

在与另一个造反派组织的纠纷中受到牵连。他们故意折断了他的手指，指责肖邦、莫扎特、贝多芬的钢琴曲，毕竟是资产阶级艺术。然后，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刘被关进监狱达九年。他唯一能够练习指法的方式是在扁担上练习，一个音乐家这样告诉我。在1976年打倒了“四人帮”之后，刘才重新开始自己的音乐生涯。

文化大革命中迫害人们的规模，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统计数字。自从打倒“四人帮”之后，各大报纸成了取之不尽的消息来源地。由于警方和红卫兵组织都没有准确地记录他们逮捕、折磨或处死了到底有多少人，所以统计数字也只能是估计的。《人民日报》曾经计算说，文革中有一亿人——即当时中国人里的九分之一，受到了影响。法新社在北京的记者，是我知道的记者中消息最灵通、工作最努力的。他们在1979年报道，可靠的中国消息来源人士透露，文化革命的后果使400,000人死亡。在去福建参观期间，福建省一位副省长告诉我们一行新闻记者道，他在文革中工作过的山区，两百万人口中有1,700人被打死或者自杀。如果他工作过的山区这一数字是中国的平均数的话，那就表明，文革中的死亡人数全国共有850,000人。1980年，邓小平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说，文革之后，我们已经为2,900,000人平了反。而且，“当时更多受迫害的人没有立案。”报纸在一篇文章里宣布，在被指控为反革命分子的人中，有百分之九十是错误指控。

在官方起草的指控“四人帮”成员和林彪集团成员的长达两万字的公诉书里说，他们应该对被冤枉受迫害的75,000人负责。其中有34,380人被迫害致死，包括过去北

京和上海的六名市长、副市长。公诉书里提到的一起案件中，内蒙古自治区的346,000名干部和群众被错误地指控为参加了一个秘密党派；其中有16,222人被处死。在审判“四人帮”期间，中新社透露说，过去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于1966年8月下旬至9月期间，在北京掀起了一次恐怖的浪潮。在40天时间里，“有1,700人被打死，33,600户人家被抄被抢，还有85,000人被赶出首都。”类似的数字还有许多。指控“四人帮”的公诉书中还写道，他们迫害了教育部系统的142,000名干部和教师，迫害了科学院系统的53,000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还迫害了中国医科院校中674名教授中的500人，其中有些人受迫害而死。

对“四人帮”审判的本身就为那个恐怖时代提供了文字证据。高等特别法庭的公诉人还让法庭听证了对一个67岁高龄教授审讯迫害期间，所录制的20盘磁带的一部分。这位教授当时正身患肝癌，但仍遭逮捕，因为他在1949年以前曾在现已关闭的辅仁天主教会大学授课。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文革中是被迫害的主要目标。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曾经在辅仁大学读书。公诉人讲，教授当时根本不认识王小姐。但是江青组织了一个“特别小组”，搜集材料证明她是“美国特务”，江青还要求这个“特别小组”要从教授那里榨出证据。虽然教授被限制在一张病床上，不得不靠静脉注射来维持生命，可是在他被捕的27天里，竟被审讯了21次。最后一次审讯长达15小时。审讯之后，他便死了。

“审判大厅里的旁听者们对迫害老教授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反应强烈，他们在听到审讯老教授的录音时不禁噁

啣大哭，”中新社报道说。（当时外国记者不许进入审判大厅。）“当病人挣扎着要从病床上坐起来，又被强迫睡下去，他们命令教授吃药，并对他叫嚷，‘讲大声点，快’，人们听到垂死的人含糊的回答的时候，不禁声泪俱下、痛苦欲绝。”江青根据这位教授自白中的只言片语，草拟了一份报告，把王光美女士定为二战期间美国战略服务处的“特务”。他们用这一罪名拘捕了王光美和刘少奇。

其实，追溯起来，政治迫害远在文化革命以前就已经开始。根据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手中的资料表明，1955—1956年之间的“肃反”运动中调查了四百万人。在“百花齐放”实验之后，开展了1957—1958年的反右运动。近百万学生、教师、科学家、作家、律师、医生等中国知识分子，被送到农村去干活或关进了监狱。仅在1978年，即“四人帮”被打倒后的第三年，就从监狱里放出了最后大约110,000名右派分子，这是一个曾被关进监狱的人告诉我的。还有很多人死在监狱里了，一位北京的“囚犯”告诉我说。

这些早期运动都是针对特定的阶层，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人都成了潜在的目标，因为党本身都成了它的主席攻击的对象，全国都处于狂乱的内战状态。往往很微小的错误都会引起拘捕、关监或受辱。

一个科学家讲了一个他认为是文革期间最为可笑地滥施法纪的事。由于禁止出版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书籍，于是出现了许多很受人消遣娱乐的地下小说。其中一些是对当时痛苦经历的自传性严肃作品；其他也有连续的侦探故

事或口头流传的色情浪漫史。其中有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叫《梅花党传说》。讲的是科学院系统内用了20年时间破获国民党特务案的事。国民党特务的头目是一个科学家。

事有巧合，我认识的熟人说，在长春光学仪器研究所内确实有一个与传说中同名同姓的科学家。这是中国第一流的研究所，曾在50年代研制出中国第一架电子显微镜，也是国防工业科研的中心。可是文革当中激进分子认定故事中的人物不是传说，而是真实生活中的科学家，结果，所内的166名科学家被当作特务遭到逮捕，同时还逮捕了当地的会计人员、警察、工人，甚至医护人员等。后来，中新社虽然没有说到该事件的背景，但却说这个研究所“实行了法西斯专政”。“被逮捕的人中有的被打死，有的自杀身亡”。科学家们被诬蔑为“猪、狗和黑心烂肺的牛鬼蛇神”。当时指控这些人是特务的根据是：他们家里要么有收音机，要么有照像机，要么会讲外语。真是荒唐之极！

对许多中国人来讲，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迫害比早期运动中的迫害更令人感到恐怖可怕是因为它涉及了所有的人——不仅涉及个人，还涉及整个家庭。它使每个办公室、每个工厂和学校都分成了不同派别，有些派别在15年后仍旧争吵不休。北京大学一位英语教师在文革中也深受其害。

“像我们中国人说的，我的家庭背景十分复杂，”她自嘲地笑了笑对我说。她有个舅舅是台湾国防部的工作人员；另一个亲戚是30年代在上海的左翼电影制片人。这位制片人曾介绍江青入了党，并与江青有风流韵事。“他什

么都会，跳舞、骑马、打猎，什么都会，他们在一起生活，”她在北京大学读本科时，曾在一次闲聊中在同寝室的同学中提到过她家与江青的这种关系。她于1962年毕业，留校任教。这事好像就算过去了。

但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这位教师所在的派别与学校有名的极左分子聂元梓为首的派别相互对立。聂元梓是哲学系的一位女干部。聂写出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学校领导搞修正主义。毛泽东命令《人民日报》刊载了这张大字报。红卫兵找寻各种借口攻击女教师的派别，她回忆说。她过去寝室里的一个同学向人告了她。对激进分子来说，她的亲戚与江青的风流韵事是对中国领导人的恶毒攻击。因而她被拘捕起来，关进了“牛棚”。实际上是一间又旧又小的单层教室，建筑四周都围上了电网。

“我那个房间里共有20名囚犯，在整个建筑内有约200名犯人，”女教师说。“大部分是非常有名的老教授和各个系的党总支书记。我在那里很不自在。”象罗一样，女教师也是个老红卫兵，讲述她自己的经历时总是减低了实际上她感觉到的恐惧。

“实际上，我还算幸运，”她说，“我只是在被关押的当天挨过打。他们要我承认我说过的事只是谣传而已，可是我说那是事实。于是，他们说进行诬蔑，就打了我。”在关押的其他大部分时间，她都用来背诵毛主席语录。

“每天早晨，他们要进屋来强迫我们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按照语录本的顺序背诵，比如第35页第1段。我很年轻，记忆力又好，所以我背诵得很好。我还小心地注意

埋着头：有些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老教授，他们的中文不很好。他们背浦不好，让那些红卫兵很不高兴。所以红卫兵用橡皮鞭、木板、自行车链条等打他们。有一个教授每天都挨打，后来被打死了。”

女教师在1967年被逮捕时，刚生下一个男孩才一个月，仍在给他喂奶。“那些红卫兵说我不能再见小孩了，就给我打针断奶。”

她的哥哥是个农业机械工程师，几经周折来看望她。哥哥抱怨说，妹妹受的是非人的对待。于是他也被关了起来。

这时，女教师的母亲还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她接到红卫兵的通知去看望她的女儿之后，来到那里，结果也被关在那一座建筑里。那些激进分子说她女儿把一切都承认了，骗她写一份他家与江青关系的自白。用女教师的话说，她母亲是一个“傲慢的老式知识分子”。她母亲被送回自己的机关以后，就开始接受“群众监督”，扫地、清洗厕所达一年之久。

女教师的父亲也没有逃出罗网。由于他是十分著名的建筑工程师，也受到软禁。他的司机回忆说，因为他有一次在小车里说，外国的罐头开刀比中国的好。

当时，女教师的丈夫在遥远的西藏，爱莫能助。他参军后被分配到了西藏，为1962年中印边界之战中俘虏的印度士兵当英语翻译。在妻子被捕两年之后，他才有探亲假回去看她。

“红卫兵不让他进入关押我们的地方，”她回忆道。“但是他穿上军装后就走了进来。当时因为林彪的原因，军

人享受较多的特殊权力。”他进去后找到了她。可当时有个红卫兵怀疑他来干什么，他拿出一本部队里新近印刷发行的毛主席语录。他把语录本交给妻子后大声说道，“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这本语录。”

1971年，女教师才终于被释放出来。但她仍然要接受“监督”，并强迫她居住在一家政治上可靠的教授家里。“当时那个时代非常奇怪，”她与我一起坐在北京饭店的自助餐厅里时对我说。“我的朋友都不知道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因为红卫兵不准我说发生了什么事。”

今天，那些曾经关押过她的干部和教师都仍然在北京大学工作。她不得不每天都与他们共事，女教师学会了隐藏自己的感情。她的报复真是微不足道。她和丈夫在几年前生下一个女孩时，为这女孩取了娜这个名字，意为“沉默少言”。

参观中国的机关、工厂、学校的外国人，多半都不知道这些派别分歧多么顽固，也不知道这种个人恩怨在日常生活中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1977年，我第一次到中国时也显得十分无知。我在广州的一家餐馆里吃完饭之后，我要求结账。我用了一个在中文课本里学到的标准词语，并在台湾听人们用过的词语“算账”。梳辫子的女侍者气愤地盯了我好一会儿，然后大声喝斥道：

“我们中国不再用那个词了。”

我后来才理解，她的意思是说，同朋友和同事算账已经成为国家的严重问题，所以这个词用起来就叫人处境尴尬了。

当时，许多中国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骇世瞩目的大恐

怖中也没有幸免。文化大革命中，当邓小平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第一次清洗后，他被遣送到江西省的一所小工厂当工人，中国人这样告诉我。解职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秘密送到开封。他一直被关押在那里，直到悲惨地死去。中国通讯社已经报道说，他的两个孩子在关押和强迫批斗之后伤残瘫痪而死。刘的遗孀王光美是一位老练、有才华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妇女，她当时被关押在中国最秘密的秦城监狱里。这所监狱座落在北京郊区，地处过去慈禧太后十分喜欢的绿树成荫的温泉疗养地附近，毫不引人注目。那里曾经关押了文革中的大约近百名被清洗的中国领导人，包括现今的一些政治局委员。每个人都关在一个房间里，不准与其他任何人交谈；有的犯人甚至十年时间没有交谈过了。在“四人帮”倒台之前，这里实际上没有释放过一个人。囚犯的家属也不知道这地方在哪里；严禁参观；守卫人员只知道囚犯的编号，从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

至今，新闻界还没有提到过秦城监狱的名字，但是中新社确实承认说，北京城外有一所特别监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所监狱内有34名高级干部被摧残至死，20名成为残废，60多名神经失常。

秦城监狱有一整套独特的规定。要求里边的犯人必须面对屋门睡觉，以便守卫人员监视。如果各房间里的人睡觉时转过身去，守卫人员就把他唤醒。班禅喇嘛由于十多年来一直向一侧睡眠，耳朵肿胀感染。一次，当他熟睡时几个守卫人员把他唤醒，他狂怒地要卡死他们。只有这时，才让他翻个身睡觉。体罚是经常的事，犯人只能吃个

事他，不驯服的犯人就给带上手铐脚镣，这样他们走不了多久就四肢麻木。在“四人帮”被逮捕后的1978年，王光美女士终于不加解释地放了出来。这时，她的头发已经开始脱落，背也显得驼了，手和脚都麻木了，她的好朋友这样告诉我。

秦城监狱里曾关押了一个非常聪明和具有创新精神的女戏剧导演孙维世。孙的父亲是30年代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活动家，不幸被杀。周恩来收养了她。到底为什么逮捕她至今不明——也许因为江青自认为是中国戏剧界的权威，对孙有专业上的嫉妒。孙于1968年3月被投进秦城监狱，经过反复折磨后于第二年10月死去。周恩来得知她已经死了后，要求验尸。但当他派往监狱的医务人员到达的时候，尸体已经火化，连骨灰也找不到了。所有料理她后事的守卫人员都已换到其他地方。告诉我这一消息的人是孙的朋友、美国人西德尼·里滕伯格，他也曾在秦城监狱里坐监。西德尼很好社交，讨人喜欢。他原来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人，于1945年随美军来华当翻译。他在经济大萧条年代曾在美国帮助组织南部棉纺织工人。由于他对中国共产党人十分同情，他决定在1949年后仍留在中国——属于仅有的大约十几个人之一。他的中文讲得十分流利，天性热情大方，他十分精明能干，深谙在中国“关系”的重要作用。他能够在中国的官场和这一小群不驯的外国人之间穿梭往来，难能可贵。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西德尼平时的热情和过分左倾给他带来了麻烦。他被指控攻击领袖，在监狱里从1968年呆到1978年。

秦城现在仍然存在，中国朋友说。今天里边最重要的

囚犯是江青。

中国现今领导人经过多年流放和监禁，在“四人帮”被打倒后重新当权。他们十分明白，要竭力阻止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重演！他们也知道，过去十年中的政治迫害动摇了人们对共产党的普遍信任。所以，他们优先采取的一个步骤就是建立较公正的司法系统，或者叫做“恢复社会主义法制”。1979年，中国颁布了自1949年以来的第一部刑法。刑法保证了要公开审理案件，严禁法庭使用强制手段获得证据，被告有找寻律师的权利——律师这个职业是1958年取消的——，刑法还严格规定了公安机关拘捕嫌疑犯人到送交法庭审判的时间。现在，中国仅有约2,000名律师人员可以出庭辩护，他们被叫做“国家司法工作人员”，必须“保护国家的利益”。

对江青等“四人帮”和林彪手下的五个将领的审判，成为新的司法体系的展示。这场举世瞩目的审判开始时，中国人就像美国人参加总统选举一样激动万分。

李苗夫妇对我说：“中国老百姓十分憎恨江青，江青的骄横无恃，她对文化的全面独裁，以及她严禁广大群众享乐、而自己过着非常特殊的生活：有私人别墅、可以随时看嘉宝演出的影片，以及大小柜子里装满的西方款式的衣裙等等，使许多中国人都对她发自内心的憎恨。”然而，对李和其他中国人看来，这次审判又像一次批斗会似的，是他们熟悉而且希望终结的一种受到控制的形式。

李在我们离开时说道，“人们先审判了她。如果江青当了权，她一定会同样地把其他人投入监狱！”我驾车回

家时一直想着李讲的话。

判决最后宣布之后——因为政治局要用时间讨论，延迟了一个月——几乎出现了令人泄气的转变。江青和张春桥拒绝坦白，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以观后效。这种缓期两年执行的死刑是中国的创造。其他八名被告分别判为16年至终身监禁不等的徒刑。有的中国人认为这种判决是公正的，而且现在应该是驱散文化大革命阴霾的时候了。可是我认识的一些中国人却咕咕噜噜地不满意；对江青、张春桥被判死缓不解恨。

我1980年在布告上看到和从朋友那里听到的大约60名被判死刑的犯人，对他们的用刑严厉。其中大多数是因为杀人或强奸罪，有些要轻微点。比如北京的一位银行出纳员因为贪污了125,000元，即83,000美元而判死刑；在哈尔滨市的有位19岁的年轻人因为在公共汽车上抢劫乘客，又袭击追捕他的警察而处死刑。实际所判死刑的数字毫无疑问地要高得多。我在厦门参观时，曾看到几张相同的布告，宣判一个41岁的码头工人死刑。因为他的朋友拒绝用船把他载到厦门港外的一个仍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小岛，于是用菜刀向他的朋友砍了43刀。

这些宣布的死刑，是北京为了阻止人们感到文革之后上升的犯罪高潮而做出的努力。人们也许没有注意，中国人总是小心翼翼地给自行车上锁，在建筑四周围墙上安有玻璃块，楼房的底楼窗口都安有铁条。如果说这个国家最近几年里犯罪率的上升程度同美国的有些大城市，比如纽约、亚特兰大或休斯顿一样严重，那也未免言过其实。

不过，有的中国人竟然如此目中无人地蔑视警察，让我非常吃惊。在一个冬天的夜晚，有位21岁的无业青年盗窃了北京最大的百货商店价值10,000元（6,670美元）的照像机、计算机和现金。在同一个冬天，两个蒙面男人抢劫了北京市中区的一家人民银行，他们用自制的手枪打死了出纳员；另外还有一人企图从空无一人的紫禁城里偷窃16世纪的一个15磅重的金子国家封印，他触到了电子报警器，被抓获了。政府没有像公布粮食生产和钢铁生产那样，公布全国的犯罪数字。不过，中国的最高检察长确实透露说，在1980年的上半年，警方拘捕了84,000名犯罪分子，其中有半数以上是‘严重犯罪分子’，很可能指杀人和强奸犯人。

检察长还说，全国白领阶层的犯罪率有所增加。在这一年的头六个月，他说，警方已经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发现了10,000宗贪污腐化案件。但是，他承认道，“涉及国家机关的案件的处理，仍然有很大的阻力。”

这个问题，一位深思熟虑的历史学家说，是普遍存在的。解放以来，党的干部中有的逐渐放松了革命纪律性，更关心自己的舒适享乐。他们结成了一个关系网，难以打破。他列举了一件涉及军队高级干部的丑闻，说，这个指挥员，主要负责对苏联的防卫，竟盗用了34,000,000元（23,000,000美元）为当地干部修建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的64幢楼房，其中包括奢侈豪华的俱乐部、戏院、客厅和办公楼。可老百姓的住房却十分紧张。后来，人们怨声载道，政府和中央军委委员会派出一个特别小组到旅大调查。结果他并没有受到拘捕，也没有带上法庭，他受到的处罚只是撤销职务。

削减工资而已。甚至连党籍也仍旧保留。只有官级较低的六个干部受到拘捕，当然都与盗用公款有关。

然而，在我听到的同类事情之中，最令人感到恐怖的是劳改营里不公正的惩罚行为。第一个亲口告诉我劳改营的生活的是一位70岁的老头儿。他满头白发、驼背。我通过一个熟人见到他时，他的身体十分虚弱，皮肤苍老发白，奇怪地有些透明，好像你可以直接看到他的骨头似的。他的手指扭曲、没有血色，有的手指短了一截。原来，他刚从一个煤矿里释放出来。他在过去的21年里，在这个煤矿里用手挖那些黑色的岩石。这不是一个普通煤矿，而是四周装有电网的劳动改造营地，共有10,000人。

这老人干活的煤矿是中国境内数以百计的这种劳改营地之一。这些营地是普通人犯法后被关押的地方，象盗窃犯、政治犯、过去的国民党军人，以及宗教领袖等都关押在此。每座城市还有其他监狱、有少教所和拘留所。但是，中国犯罪分子中的80%都在劳改营地里，报纸在很少谈及的这一话题中的一篇文章里透露。

这位老人的罪名是“美国特务”。在他的学生时代，他曾在美国参加过长老会研讨会。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他回到了中国。他是出自爱国主义的动机回国的，他坐在儿子的那间小盒子似的屋子里说。在1957年，当时鼓励人们在百花齐放运动中对党提意见。他建议说，北京应该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他在邻里们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说，尽管爆发过朝鲜战争，美国人仍喜欢中国。他声称，美国作为盟友比苏联更可靠——当时中国人把苏联叫做

“老大哥”。可是过了几个月，突然转变了方向，发动了反右派运动。这位牧师受到逮捕，被关在一间四英尺见方的小屋里。他既不能站也不能睡。就是说，身体永远也得不到休息。他在其后的18个月里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再三反复地书写自白，监禁人员叫它为“自传”。最后，警方终于通知要审判时，他感到总算可以有判决了。

“法庭上有两个警察盘问我，另外还有一个穿警察制服的妇女，他们把这妇女叫做法官，”这位牧师说道。“我承认说曾讲过赞成中美改善关系的话，但我不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我说，他们对我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他们只是蔑视地嘲笑我。他们不需要证明，他们说。我是在美国接受的指示，他们很明显不能到那里去找材料。”

在听证会上对他宣读的判决是十年徒刑。他有上诉的权利，法官对他说道。但他上诉之后，刑期增加了一倍。警方说，他提出上诉就证明了他仍无悔改之意。对西方人来说，就这个牧师的审讯和判决只不过是法律程序的一个不太高明表演。

他被送进的这所煤矿劳改营地里，囚犯们每天从早晨六点到下午六点不停地干活，每周七天。每两周有一天时间进行政治学习。他在那里的头几年里，囚犯的食物供给以他们每天挖出的煤的多少为依据。刚进煤矿的人每月是35磅食物的供应，只够维持生命。“我们比中国的正规工厂和煤矿里的任何人都干活卖力，”牧师回忆道。“如果你停下手中的活即使一分钟，去吸烟或休息一下身子，你当天的食品供给很可能就不够。在我进煤矿的最初几个月里，我的两手变得血糊糊的，腰背和手臂一直疼痛不已，

而那里没有医疗保护。”早饭是几个玉米窝窝头，或玉米糊糊，午饭有菜汤或者稀饭，晚饭时的玉米窝窝头要多一些。囚犯们每月吃两次肉食，都是小块的肥肉。由于这是他们能够接受的仅有的动物蛋白和脂肪，于是狼吞虎咽地吃这些肥肉。在60年代里，牧师回忆说，守卫人员要囚犯们自己去计算自己的产量和食品供应，这使得囚犯们彼此相争。后来又放宽了，除去单独隔离的囚犯之外，其他人都供应一样可怜的食物。

尽管他经历了这一切苦难，牧师讲述其经历时并没有什么怨恨，几乎有一种对劳动营地的超脱的感觉。

“我能够活下来，”他说，“是由于我坚信上帝，由于我非常随和的性情。我尽力不为自己感到遗憾。”

不过，牧师讲述的经过仍有省略的部分。在他被释放时，他的儿子去接他——他身体太弱了，不能独自回家。他儿子为父亲买了一只手表当作礼物。当时在中国手表还是奢侈品，可是牧师不愿意戴上。“他说，这使他想起了过去多次戴过的手铐，”他的儿子告诉我。

每个城市和省分都有自己的劳改营地。北京公安局在市郊东部有一处很大的劳改营地，叫清河农场。那里有大约20,000到30,000名囚犯。另外还有好些劳改工厂，比如新兴首都铸造厂，新兴首都砖瓦厂，新兴首都钢厂，以及新兴首都橡胶厂等等。

这些劳改工厂中最不平常的事，几个过去的囚犯说，是不同于正规的民用工厂和农场。民用工厂和农场管理混乱，经营赤字，而劳改工厂全都赢利。

中国最大的劳改营地建立在人口稀疏的地区，那里同

苏联的劳改营地一样。囚犯们在那里伐木，清理沼泽，耕种处女地，或者修公路，建铁路。一个地处中苏边境不远处的东北兴凯湖附近的劳改营地，曾经有40,000囚犯。冬天，营地里的气温在华氏零下40度；夏天，营地里大个的黑苍蝇和蚊虫为害。在边远地区的营地的纪律比北京周围地区的营地纪律松散一些，一个释放出来的囚犯说。因为犯人被遣送到离家越远的地方，他们回家的希望就越小，遵守规章制度的刺激性就越少。允许呆在首都附近的监狱里，要算是一种优待了，他说，犯人也表现得更好一些。在兴凯湖，他补充说，有几个犯人逃过边境线，到达了苏联的领土。但是，苏联不要他们，并用粗麻布口袋套着把他们送了回来。

宁夏以西的青海省几乎没有树木，是一片十分寒冷的高原草原，盐湖、雪山到处可见。曾经在那里呆过的中国人回忆说，青海风大，荒凉寂寞，那里可以听见狼嚎，可以看到游动牧民的骆驼棚车队。那里也是最大的劳改营地。1980年以前，青海省都不对外国人开放。去过西宁的一批澳大利亚新闻记者注意到，在从飞机场进入西宁市区的途中，有延绵一英里的泥墙围住的监狱。当晚，当地一位负责人为澳大利亚参观者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但是，当记者问道这个地区有多少劳改营地时，他尴尬地结束了招待会。

“谁也不愿意到青海去，都是送去的，”丹尼尔·凯里说道。他是一个美国传教士医生和一位中国护士所生的儿子，他同父母一起在青海的劳改营地里呆了20年，“那些营地像一个隔离区，像中国的西伯利亚，时常都可以看

勤劳改人员。”凯里回忆说。他被怀疑企图逃到澳门去，在1958年他17岁时被拘捕的。他相信，政府对他很生气，因为他拒绝放弃其美国国籍为中国宣传机构工作。从来没有人审讯他，也无人判决他。

凯里在青海被送到西宁西南边的一个营地里。这个营地很大，“即使乘一辆马车，你一天也跑不遍”。这个叫做坦格木的营地，他估计有500平方英里的面积。在这个区域内，有九个分支营地，每个分支营地下面还有分散在山间的小块盆地内的小营地。在盆地内可以种庄稼。“每个分支营地都有自己的泥砖墙，”凯里说道。他很瘦削、严肃，长得很像中国人，眉毛很黑。“有些墙非常高大，就像中世纪的要塞一样，底部有10英尺厚，有20英尺高。”要逃跑是毫无希望的。要坐车到最近的小镇上也需要三个小时。周围地区是一片干沼泽地，那里唯一的居民是地鼠。有时，也有囚犯企图逃跑。

“几天之后，便有牧羊人走过，报告说在树林里看见一具尸体。”凯里回忆说，“然后，守卫人员就骑马出去，把尸体运回来。”

1959年，凯里同广东省的1,800名犯人一起被送到了青海。但由于大跃进之后的粮食奇缺，他们这一批人于1962年再次转移地方时，就只有400人活了下来。其余的人都饿死了，凯里说道。他则因为父母懂医的原故，派到大本营的医院里工作。后来，凯里又四次被送到北京附近的劳改营地。到了1978年12月，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凯里才获得释放。碰巧，我从香港进入中国时，也是通过中国边境的铁路桥，步行进入深圳的。只不过方向相反罢

了。凯里现在居住在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兰菲尔德。

最近几年，劳改营地里的犯人总数已经有了下降，因为过去的最大两批犯人中有的死了，其余的在70年代后期释放了。他们是1949年前的国民党军队的官员和警察，还有1957年被逮捕的右派分子。但是文革后产生的不少玩世不恭的年轻人也因犯罪被关进了劳改营地。我在北京时，某报纸报道说，有个年轻妇女，在天安门前欺骗过往行人，用没有装胶卷的照相机给付了照相费的人照相。她被判了三年徒刑。一个被当做右派逮捕的教师，曾被送到新疆南部的一个劳改营地去。他回忆说，在1978年的某一天，那里所有20,000名犯人都一起平了反。在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看到另一批有差不多人数的年轻囚犯被卡车和吉普车上荷枪实弹的军人押着去他们刚刚离开的地方。

许多劳改营地里的犯人都没有再回家，即使他们服完了刑期之后，也仍旧在原地呆下来。凯里和其他中国人说。他们呆下来后，当作“长期劳动就业人员”。与过去不同的是，他们可以定期领工资，并允许结婚、建立家庭。

“在我们的社会，许多犯人不敢面对回家的现实，”一位过去在宁夏的工程师说道。“这会永远装入你的档案。你找不到一个好的工作，找妻子也很有麻烦。”在营地，他补充说道，这些人至少还有朋友，有的还学了一门技术，可以维持生活。“对有些其他的人来说，守卫人员就告诉你，你的妻子已经与你离了婚，或者告诉你，你回家去，她们不给你房子住。所以，你别无选择。”

一个过去的红卫兵说，他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过激行为，被流放到那里去服苦役。在这个破旧的城镇里，有

个鞋帽厂，厂里的所有工人，都是获释后的犯人。

“你只要看他们的眼睛，就可以辨认出来，”他解释说。“你感觉到，他们不再有什么信心留下。他们与你谈话时，总是低着头。”

在听取所有这一切关于劳改营地、关于批斗会和政治迫害的叙述中，我感到最为吃惊的是：这对中国来说，这一切是多么巨大的浪费呵！

我认识的一位美国外交官在成都遇见了一位29岁的男人。他是在川西北的一所劳改营地里呆了11年以后，最近才获释出狱的。他的错误是，在他还是十几岁的小孩时，曾用毛泽东的姓名各说了一句双关语。有个朋友向警察告密，便把他手脚绑住送进了劳改营地。最初三年里，守卫人员每天都打他。这男人还伸出胳膊，向这位外交官出示他手上的伤疤。后来，允许他去挖沟渠。每个月，他挖沟渠可以得到2元（1.33美元）的报酬。他用这钱买纸张、邮票，给家里写信。他在劳改营地里度过的整整11年时间里，一直不准许他的家里人前来看他。

突然有一天，同他被逮捕时一样令人不知所措，警方告诉他，他被释放了。警方给了他一份证书，说他无罪。他回到家后，城市劳动部门拒绝帮助他找个工作。他被错误地送去劳改，似乎并不是他们的责任呵。他还遇到了一个楚楚动人的年轻女子，但当地发现了他过去的历史之后，就不再来看他了。

“我没有什么前途，”他简单地说。“如果像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中国也没有前途。”

第19章

人们盼望法制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

我第一次注意到高比尔是因为他那一口带有鼻音的平淡的美国中西部的口音。我们俩在从北京至上海的中国民航飞机上，坐在相邻的座位。我像往常一样，总是喜欢同火车上、飞机里，或者饭店内与我邻坐的中国人交谈。我希望能够打破中国人为了保卫自己而设置的与外国人保持一定距离的看不见的秘密界线。可十之八九，我都不成功。每次谈话的开头就断断续续，很难继续下去。

但是比尔却不需要任何鼓励（他喜欢别人称他美国化的名）。他举止文雅、谦虚，十分友好。他个子很高、腰

背挺得笔直，有一双像伐木工人一样的大手，四四方方的下巴，刚劲有力，满头银发，给人一种长辈之感。他的两眼热情并动人心弦。我并没有问起他，他就告诉我说，他出生在密执安州的安阿伯，当时是1923年，他父亲在密执安大学学习工程学。后来，全家搬回了上海，他父亲成为上海有名的教授。比尔23岁时，他去美国哈佛医学院读书，专攻外科。1949年，他决定回到祖国，“帮助建设中国”，他回忆说。

可惜，比尔已经没有再从事外科专业了，他毫无矫揉造作地说。他并没有流露出怨恨或者痛苦的表情。所以，我在以后的几个月，到上海去看望了他许多次，才弄明白怎么回事。我每次去上海，都要到他家里去。上海的人口，据政府估计有11,400,000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他终于向我透露道，他所在的这所城市大医院里的年轻医生和工作人员中的红卫兵贴出了大字报，指责他是“美国秘密特务”。“他们说，我是为你们效劳的特务，这真是荒唐，”比尔讲述到，似乎在嘲讽自己的记忆。红卫兵仅有的证据，是他那份哈佛医学院的学位证书。这份证书在红卫兵抄家时没收了。另外他的几个大箱子上还贴有几个标签，上面有USA（美国）三个字母。“那是他们仅仅能够认识的英文——USA三个字母，”比尔补充说。

“我想，我太西方化了，太直率了。于是，他们贴出大字报后，我也贴出了自己的大字报予以回击。我要他们找出真实证据，证明我是特务。”

这种防御毫无意义，恰恰增加了他们对他的怀疑。这

些年轻的左倾医生和工作人员，同市政府的激进分子一起干。他们很快就控制了这所医院，撤掉了比尔的医院副院长兼外科主任的职务。他们还让他接受“群众监督”。就是说，把他关在医院的一个房间里，不准他同他的妻子进行交谈。白天，还必须干医院里的杂活，擦地板、清洗厕所。也不再允许他治疗病人。在他这样干低贱活时，他看到越来越多的老同事，那些受过最良好培训的，最有能力的医生，也受到了攻击。他们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当做反动分子、或者被当作“牛鬼蛇神、残渣余孽”。

“我们对他们如何对待我们变得十分敏感，”比尔回忆说。“只要他们不杀了你，那事情还不算坏。我们可以从他们分配你去干的活的不同，看出区别来。如果他们一直让你去扫地，那么，你很安全。可是，一旦他们经常改变你干的活，比如，叫你先去干码头装卸工的活，然后又叫你去擦高楼外侧的玻璃窗，那你就知道有麻烦了。”

这一段时间，尽管大部分时间里不准他与外界有联系，他还是听到了一些有关他父母的谣传。他听见，他的父亲被当作美国特务逮捕了，因为他在美国呆了许多年。他还听说母亲也受到了拘捕。可是，谁也不能准确地告诉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都避开他所提出的问题。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逮捕了四人帮，他才知道事情的一些经过。他父亲当时有70岁，一直被关在他所在的大学教学楼的地下室。他过去教过的学生和他的同事中变成左派的在地下室里每天盘问他，一直盘问了五个月。只要他不承认强加给他的罪名，他们就打他。他们把他打得很重，后来就死了。比尔的母亲也是被打死的，可是，他永远查不

出到底是谁干的。尽管人们表示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从未组织人员进行调查。比尔认为，他母亲的死将永远是一个谜了。

“我自己却很幸运，我的遭遇比其他人的要好些，”他习惯地并不自怜地说道。“我总算还活着。”听他叙述这些事，我不竟毛骨悚然，噤若寒蝉。在某个方面来讲，比尔、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像所有遭到大迫害的人们一样，统统因为他们的背景而惨遭迫害。不是因为他们犯有危害中国的罪行，而是因为他们曾经在美国生活过、学习过。

比尔继续讲道，过了两年的“监督”生活之后，最后通知他说，证据不够，不能拘捕他，也不能给他定罪。但是，如果让他在上海呆下去将太危险了。所以，决定把他们流放到新疆去。他到那里去当赤脚医生，为一个公社里的维吾尔人看病。这是激进分子能够为他找到的最低贱、最无尊严的工作。他到那里去给人们阿斯匹林，去接生，也为跌打损伤的病人进行治疗。

“我很愿意去，我喜欢与农民打交道，我认为自己能有所作为，”比尔告诉我说。他同妻子为我准备了熏鸭和红烧鲢鱼，我们一面吃、一面听他讲。“至少，他们允许我带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去。”

然而，那里的困难令人恐惧。维吾尔人生活在沙漠的边缘，那里的水供应不足。“维吾尔人穷得可怕，可他们还非常自豪，和汉族人有矛盾。”比尔叙述道。“我最初在村子里建起医疗站时，农民们都躲藏在家里。”维吾尔人对汉人使用他们留下的水井十分敏感。

“在我那个村子里，他们不准汉人靠近他们的井边。他们认为汉人很脏，他们自己倒很干净。汉人打水后，就把水桶放到地上；而维吾尔人打水后，则把水桶挂在墙上挂的钩子上，这样水桶底部就不会沾上泥，所以再用水桶打水时，就不会脏了水。”

“当然，吹风时，从沙漠上吹来的风沙总会吹到水井里去。但是，你到他们的村子里去之后，你必须等在那里，等到他们为你打水，不然的话，就会发生殴打事件。”

比尔有许多空闲时间，他利用空闲时间自愿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去讲讲基本卫生常识。他这样做是他那典型的慷慨本性决定的。“这都是非常简单的事。我做给他们看如何刷牙，教他们别用他人的手巾擤鼻涕，别用脏布擦眼睛。”教他们别用不干净的布擦眼睛是为了尽力地控制当地结膜炎的传播。这种病在当地传染很快，甚至导致瞎眼。“对我来说，作为一个有技术的外科医生，来教授小学生的公共卫生常识，不能说不是浪费。但是，我最少也还是在贡献吧。”

有一天，他和他的妻子，还有村子里的所有村民都被叫去参加群众审判会。几个治安人员把一个穆斯林教派的人推倒在大约1,000人前面的大院子里。

“有一个警察念了一份公文，指控这个阿訇煽动对政府的反叛行为，”比尔说道。“但是，这并不真正是一次审判。他们只是宣读了指控，然后宣读了给这人的定罪，立刻就当着我们的面把他拘捕了。这整个事件还不到十分钟就完结了。”

这件事之后，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紧张

了。可是几天之后，比尔去井边打水时，村民们对他说，“你随时都可以来打水。”就这样，他变成了他们的朋友。

1972年，比尔在那里当了三年赤脚医生之后，自治区政府把比尔调动到一个大型新兴工业城市去工作。他被安排在当地医院里。这所医院有80张床位，60名医生，比尔回忆说，所有医生都像他一样，受过医学教育，由于政治原因，从沿海的大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流放到那里去的。“有那样多的医生在这所医院里，我每个月只能轮到做三至四次手术，像阑尾切割，缝补兔唇，或者为工厂事故中受伤的人动手术。我其余的时间都浪费掉了。对我们大家来说，对中国来说，这都是十分可怕的浪费啊！”

比尔很有演奏小提琴的天才。他第一次遇见他未来的妻子时，他在上海一个交响乐团里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她则在合唱团。但是，红卫兵抄他在上海的家时，把美国造的小提琴砸了个粉碎，并把他们十分珍爱的所有唱片，包括巴哈、莫扎特和贝多芬等音乐大师们的唱片，都打坏了。新疆没有小提琴卖，比尔就去买了一架手风琴。但十分不幸的是，当地的商店里货物供应很少，他们买不到如何拉手风琴的说明书。他只好花了好几年，自己摸索着学着拉手风琴。

他们的小孩还可以在当地学校去读书，现在已经初中毕业了。由于新疆获得的政府开支没有北京和上海多，那里没有高中。他们的儿子被分配到山区的一个道班去当了护路工人，他们的女儿做了农民。比尔担心，他们可能不

会再继承家里的传统，做知识分子了。这对他将是严重的打击。根据政府的规定，中国的每个家庭里，有权在身边保留一个小孩。这个规定是为了缓和让城市青年到农村定居的决定而做出的。但是这条规定，还不适用于受怀疑的反革命分子，像比尔这种被社会遗弃的人。

“他们并没有把我们的孩子夺走，这样说就太不客气了，”他同平常一样拘谨地说。“他们只是让孩子在另一个地方而已。因为我们被看成对孩子的影响不好。”

他每月只能见到一次儿子。他每月要回家来洗个澡，换换衣服，再吃一顿美餐。他总是十分劳累，不愿意讲话，就只是瘫在床上休息。比尔的女儿回家的次数更少，她每年一次两星期的探亲假。然而，十分奇怪的是，比尔在新疆的整个时间里，他原来上海的医院每月继续给他发放工资120元（80美元）。这份月工资相当于那个地区的维吾尔农民三年的收入。“中国人的等级意识很强，”比尔解释道。“他们可能认为你是反动派而攻击你，可是，他们不会碰一下你的级别、或与这个级别相应的工资。”

1976年以后，比尔希望能够回上海去。他已经浪费了太多光阴了，他想“重新拿起手术刀”。他所在的上海那所医院的老党委书记坐了整整七天的火车，从上海来新疆看他，这第一次大大鼓舞了他。这位党委书记过去是一个农民，曾参加过长征，并没有受过医学教育。但是，这人十分和善，他知道比尔是多么好的一个外科医生。

“他告诉我说，邓小平已经宣布了，知识分子现在已真正成为了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成为工人阶级的成员，不

再是过去所说的资产阶级。所以，如果我要回去，事情会好起来的！”比尔告诉我说。“他这样一说，我真感到受宠若惊。”

于是，比尔自己回到上海，亲眼去看看。“可真像一桶凉水倒在了我的头上，”比尔说道。他看到医院里有他过去的朋友上班了。那些年纪大的医生要他回去，可是许多年轻的左倾医生和左倾干部现在正坐在主要椅子上，不要他回去。他们担心，他回去后会同他们“算账”；他们也知道，比尔的外科技术比他们高超得多，他回去后，他们就可能失去工作。其中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读过卫校的，但是，当时的学生都投身于政治之中，很难称得上是合格的医生。“他们只擅长喊口号，其他什么也不会，”比尔断言道。中国失去了整整一代医生，这对中国要普及医疗卫生的计划，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现在，比尔面临着一次困难的决定。“我对回到原来的医院去工作十分担忧。重新干外科这一行，有我自己负责的病室，那当然是很好的事。但是，这就意味着，我要其他医生都听我的，还需要一个秘书。我必须要了解以往各个派别之间的关系，还有了解与这些派别联系的所有人事关系。还需要做出行政决定，这可能会引起许许多多的冲突。”

于是，在反复思考之后，比尔决定，按照他的说法“离开火线，到第二线去工作”。他把自己精通的英语，用来翻译英文医学杂志和医学课本。这些杂志和课本在医院的图书馆里存放了许多。这许多年来，医院不停地置身于政治斗争之中，医生们对外边世界医学学科的巨大进展，比

如细胞解剖、心脏移植、电子计算机的使用、以及生物工程学等方面的巨大发展不甚了解，图书馆里的英文杂志和课本已经积满了灰尘。过去，像比尔这样老一代的医生，都懂一门外语，可以靠自己阅读外语资料。可是，年轻医生们却只懂中文。

“这项工作很安全，”比尔解释自己的决定道。“用这种方法，我可以说自己并没有写错什么东西。全都是杂志上写着的，而且，是你们向国外征订的。”

对这一决定，他几乎有些后悔。当时，新疆的那一个市已经把他看作是难能可贵的财产了。他竭尽全力，花了半年的时间进行申请、提出恳求，最后还使用了后门关系，才获准离开新疆。可是，要重操外科旧业，障碍就十分巨大了。所以，他先倾向于留下来。按照中国的说法，这并不是什么胆怯退缩。

“我现在已经50多岁了。（我见到他时，他已经57岁了。）这所医院将是我的残生将要工作的地方。我经不起再出什么差错了，不能像上一次那样。在中国，你可不能够任意改换工作呀！”

比尔也承认说，这种接受责任的迟疑态度、这种不断遭受连续政治运动冲击的现象，挫伤了中国科学和医学的发展。也曾经在国外留学，成为文化大革命牺牲者的另一位比尔熟悉的医生，被任命为该医院的院长。可是，他却拒绝了。“干院长工作的话，他不得不每天都要对人员作出决定。有些人会很不高兴，很生气，并伺机报复的。谁也无法知道，下一个运动什么时候会来，但肯定会来的。这已经成了他们的基因，他们改变不了的！”

比尔还将他周围的那些玩世不恭、保守消极、心胸狭窄的现象与50年代早期的那种愉快、乐观、以及理想主义气十足的日子进行对比。

“当时，我并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却相信他们。我看到了国民党有多么腐败，看到了共产党进入上海之后，如何扭转了局面。他们在一夜之间，就扫除了腐败现象，根除了娼妓。他们为人民找到了工作，帮助穷人。当时，他们清正廉洁，平等待人，中国充满了希望。”

“你当时不在这里，”他对我说，“你很难想象中国到底穷到了什么地步，很难想象有些人过的是什么日子。我记得，我有一天早晨乘人力车去上学。车夫病得非常严重，身体十分虚弱。我下午回家时，他已经倒在街上死了。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乘坐过人力车。”

他们住在一间很小的单间住房里，这是比尔和他妻子从新疆回来后居住的地方。找房子一直是十分严重的问题。他们自己的住房在几年前就被没收了，医院现在还没有房子能够分给他们居住。于是，按照中国很好的习惯，高太太的弟弟是一直住在上海的，他邀请比尔和妻子同他们夫妇俩居住一块。这间住房只有10英尺宽、12英尺长，只能摆下一张双人床，所以他们轮流睡在这张床上。比如，第一天，比尔和他妻子睡在床上，高太太的弟弟俩就在水泥地板上铺一块蓆子睡觉；第二天晚上，他们就相互换一下。由于他们与隔壁一家人共同分享一间厨房和一个很小的厕所，就使得他们的房间更加显小了。两家相隔之物，只是一张蓝色的布帘。在房间里说话，隔壁一家人可以听

得清清楚楚。比尔唯一的一件奢侈品，是一台日本产的小型电冰箱。这是1949年到美国去的比尔的一个侄儿在几个月前回中国参观时送给他的。不论我什么时候到他那里，他都在小冰箱内准备了一小瓶冰啤酒，或者一些中国产的冰淇淋。他记得在美国时美国人喜欢什么，不管他的环境是多么不好，他待客时总是十分亲切大方。

比尔继续讲道：1952年出现了问题的最初前兆。当时，叫医院里所有的医生去学习，进行思想改造。这是为了要把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的思想都改造过来，使他们个人有转变。每一个人的改造都是中国社会全面改造的一部分。就像过去的社会弊病必须根除一样，知识分子也必须清理个人的罪过，以便投身于这场伟大的复兴运动之中。对像比尔这样的医生和科学家来说，这是最紧急的工作任务；他的才能是“群众”急需的，但是，他的阶级背景对他的危害非常之大，他必须要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后，才能为他们服务。

对比尔来说，他在思想改造的班上消耗了六个月痛苦的日子。“负责我们这个小组的干部总是说，我们的任务是要帮助老医生，帮助他们认错，进行自我批评。他们被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毒害最深。”

“这对我来说，非常艰难。我当时还很年轻，有的老医生是我的朋友和老师。我对他们十分尊敬。我是受儒家的教育长大的，我对老年人和老师都非常敬重。”

这个班上最后的规定最为糟糕。比尔必须写出自己的悔过书，首先分析他的阶级根源，追查三代人的历史，然后声讨自己的父亲。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测验，看他是否真

正地转变成共产主义信仰。

比尔写了一份攻击自己父亲的东西，批判他卑躬屈膝地崇尚美国，批判他喜欢吃西餐的资产阶级习惯。可这些都并不真实。比尔坚持这样写，是迫于压力，歪曲事实的。“思想改造是一次欺骗行为，并不起什么作用，”比尔观察道。“你在要结束时，总是装模作样的，并非真心地讲出自己想的是什么。”这为今天中国的许多问题打下了基础，他相信，包括玩世不恭、欺骗他人，以及依靠后门关系办事等这一切问题。

“由于这一切思想改造和批判会议，你甚至不敢把头脑里担心的事告诉妻子知道。因为如果下一次运动来临的话，干部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她，要她帮助你认错。所以，我们把真话都藏在心里。”

在我们谈话当中，一个大耳朵、剪小平头的10岁小男孩来敲门。他通知说，街道委员会那天晚上七点半将在下边的大院子里召开大会，要每一家派一位代表参加。我担心，可能有人看到我走进这幢建筑，可能给姓高的一家带来麻烦，但他们笑了起来，叫我放心。到了晚上七点半，没有一个人到院子里开会。有一个中年妇女，站在院子中央，大声喊道，“街道委员会要开会了，大家快一点。”

高太太身材娇小、文文静静的，一双眼睛忧虑不安。她拿起一张同小孩玩的玩具椅子一样大小的凳子，下楼去参加露天会。可是过了一刻钟，她就回来了。“没有人来，要八点半钟再去。”她告诉大家说。

八点半时，她又下去了。我从他家居住的三楼窗口往下望，看到下面院子里有好多人。一个戴眼镜的矮胖的老太

太正在读一份文件。高太太回家后，我问她下面读的是什么文件，心想是新的党中央的什么重要政治新闻。“我不知道讲的什么，”她回答说。“那地方的小孩太多了，他们又打又跑又闹，听不清楚到底读了什么。”

这又是一种文化大革命过分损伤人们的结果。在这许多年里，要人们去参加的会数也数不清，要装得非常积极的样子，要作出各种认错的行为。现在他们不理睬了。

在我最后一次去上海时，我向比尔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由于过去30年里的各种运动和迫害，特别是最大的一次——文化大革命，中国是否有许多人加重了担忧、压抑和精神疾病呢？中国人又怎么能够经受住所有这些紧张心理呢？

“这是我们医生之间经常谈论的问题，”比尔回答说。“但是，迄今还没有做出任何科学研究，这个问题太敏感了。1957年，他们禁止了整个心理学这一门学科，当时说，要解决精神有毛病的人的问题，所有需要做的就是叫他们学习毛泽东著作。这真是胡说八道。”

然而，比尔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观察，他有自己的一种看法。“恰恰与你估计的相反，文化大革命中，精神疾病患者的人数并没有什么增加，”他说。“人们要么痛苦之极，自杀了，要么活了下来。这正像我听说过的二次大战中关进集中营的犹太人的事一样。一旦他们开始攻击你的话，你只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全都是安排好了的。所以，主要的是要努力活下来。”

“在中国，你还必须要考虑你的家庭，”比尔继续深

一步地讨论下去。“人们都知道，我不得不保护好使我能生存的家庭。”

他的有些医生同事选择了自杀，比尔回忆道。文化大革命中，他那一所医院里有300多人自杀，其中有20多名医生。“可是，如果一个人自杀了，这对他的家庭就更糟。他们自然而然地就认为你有罪。这是十分可怕的。他们也会举行一次仪式，不过不是哀悼死者，而是正式地宣判他有罪。”

然而，最奇怪的是，“四人帮”被拘捕之后，那种紧张的心情增加了，比尔补充说。“到那个时候，紧张情绪才表现出来。”他有几个朋友真感太高兴了，他们到外面去喝了过多的烈酒，结果患了脑溢血。另外有个人大笑过余，结果成了歇斯底里，几个星期也止不住笑。比尔的妻子也有一个月没有讲话；她不敢相信激进分子当真被抓了起来。

比尔和妻子俩在上海又定居下来后，尽量恢复过去的的生活。他们家里所有可以值得记忆的东西——他们的影集、来往信件、大学同学录等等——都被当年的红卫兵付之一炬。但是，他们的朋友送了他们一份礼物。他们收集了尽力留下的比尔、比尔妻子、比尔父母过去的照片，并把它们另外装钉成一册。甚至还找到了一张婴儿时的比尔坐在他父亲大腿上、在安阿伯的一幢房子前拍的照片，照片已经开始褪色了。他的父亲坐得笔直，头发从中间分开，梳得很整齐，身穿一件老式的硬直高领衣服，衣领已经擦到了他的下巴。

比尔在芝加哥的侄儿已经安排好了要比尔的女儿到美国去，并出钱让她去那里的英语进修学校学习。由于现在比尔已经合法地又回到上海居住，并没有受到政治阴云的笼罩，她女儿下乡落户的那个公社也同意让她离开。我给她写了一封介绍信，介绍她去找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让他们帮助她获得入美签证。

比尔的女儿到达芝加哥之后几个星期，比尔收到了她从美国寄来的第一封信。他真是欣喜若狂。信是用英文写的。“她离开中国时，连一个英语单词也不会说，”他说。

“她在信中写的英文句子真可以说是错误百出，可毕竟那是英文呀！”高家的下一代终于生存下来了，比尔的女儿正在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用中国的说法，掌握一门外语，接受了高等教育，而不是当一个农民。对比尔来讲，这就是成功之路。

第20章

必然要走下去

邓小平1979年历史性的访美之行，是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首次访美。当时在北京，一群高级干部和军队将领正在出席宴会，先品尝了松脆的海蜇丝，又端上青椒对虾片、北京烤鸭、芝麻面卷和平锅烙饼。几杯茅台酒下肚，干部们的话也多起来。在他们欢宴的机关餐厅室内摆放着电视机，饭后大家都兴致勃勃地围过来观看由美国电视系统转播的邓小平美国之行场面。屏幕上出现邓小平参观位于佐治亚州的福特轿车装配厂的自动化流水线，正以每小时50辆的生产速度运转，还有邓小平下榻的亚特兰大桃树广场旅馆那73层高的大楼和全套玻璃电梯。

干部们为中美双边关系最近取得的巨大突破欢欣鼓舞，两国的外交关系在一个月前终于正常化了。但随着他们继续观看屏幕上的彩色图象，心中又不免为中国目前的经济落后状况感到不安。多少年来，由于坚持要自力更

生，加上大搞以文化大革命为高潮的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中国与西方世界完全割断了联系，以致于许多中国人无法明白自己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多大的技术差距。

最后，当电视已经停止转播邓的访问时，其中一位干部转而询问众人：“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呢？这不是浪费了30年时光吗？”

参加宴会的干部中有卫东的父亲，我对此事的了解就是后来听卫东讲的。据卫东说，这种见解确实不同寻常。这些人都是延安时代过来的老干部、老将军，有的甚至是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他们充满了几十年南征北战的自豪和骄傲。他们击败了日本侵略者，打垮了国民党人，在朝鲜抗击了美国人的推进，顶住了苏联60年代初撤走援助和专家的高压。他们在50年代掀起了中国的工业化过程，爆炸了氢弹，发射了洲际导弹，难道这一切还不算真正成功吗？

这个问题在我被派驻中国的1979和1980年间成为许多中国人的热门话题。那时离“四人帮”垮台、文化大革命结束仅仅几年光阴，人们思想上易于反思内省和自我怀疑。不少高级干部和同情中国的外国友人自然都会说，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面貌和人民生活比起军阀横行、日本侵略和国民党腐败统治时期已经大为改观。但仅仅这样说仍是不够的，这样说忽略了中国人口的65%是解放后出生的中、青、少年这一客观现实。全国有六亿五千万人出生在新中国，他们对旧社会的苦难没有亲身体验，他们耳闻目睹的是共产党人近年来的工作失误，他们所能回忆的是政治运动的喧嚣和经济发展的停滞。我也觉得只将中国的现在与1949年以前相比有些使人委屈和羞辱。因为这意味着中

国无法同邻近的台湾、南朝鲜和日本相比，既无力夺取台湾和南朝鲜那样的经济成就，更不能获得日本那样的政治民主和经济繁荣。某些同情中国的外国人也将中国与印度相比，指出前者在医疗卫生、成人识字、平均寿命和环境卫生有了明显的进步。但印度除了英·甘地下台期间以外，一直保持了政治上的自由，没有公安部门的四处活动，没有街道委员会的严厉管理，没有劳改营的到处存在，没有因为人们仅是知识分子或有地主亲戚就受到迫害，也没有图书馆的毁灭和大学的荒废。而且，印度毕竟属于不同的文化结构，它只能与同一文化渊源的巴基斯坦、缅甸、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相比较。这就正如中国只能与和自己有相同的文化观念和社会组织的朝鲜、日本、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相比较一样。

最使我那些中国朋友们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台湾的经济模式。台湾的1,800万人口大都来自中国大陆，又是为曾在中国大陆遭到惨败的政府所治理。随着中国对外部世界的逐步开放，我的熟人们现在已经明白台湾的每年人均收入已近2,000美元，且岛上95%的人家拥有电视机，越来越多的人还拥有自己的私人轿车。当然，台湾并非民主的堡垒，国民党人拥有自己令人畏惧的秘密警察组织。但也应当看到，台湾的确在热心地从事竞争性的地方选举，岛上公民外出观光和留学也相当自由。

卫东和他的妻子有天晚上来我家吃饭时说：“我们这些年轻人就是想弄个明白，为什么国家不能搞得那么好？”

尽管中国的年轻人们有一种政治冷漠和玩世不恭的情

绪，尽管党内纪律松弛、党风不正，尽管中国社会也产生了犯罪、失业和通货膨胀现象，我个人丝毫不认为这些因素会危及共产党的统治。他们庞大的控制机器、由单位形成的各种组织、无处不在的街道委员会，以及坚持不懈的政治学习，均一仍其旧。仅举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我的看法。而且，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经历过外国入侵、饥荒匪患和经济崩溃的痛苦折磨，即使共产党人也花了30年时间，才消除了这一切，赢得了革命胜利。

虽然中国的现状具有上述不能令人满意之处，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却强烈地感到急需和平安宁的环境。用理查德·尼克松的话说：绝大多数中国人默默无言期望的莫过于政局稳定和经济繁荣，这也正是邓小平本人的衷心希望。人们或许会在私下里抱怨住房紧张、设施陈旧、物价上涨、教育和就业机会缺乏，以及政治上的骚扰，但他们无疑会承认，目前的制度是人们所能期望中的最好制度！几乎根本没有人愿意再回到文化大革命那种大规模的浩劫和灾难之中！而且人们十分担心，要是邓小平的领导和规划不能得以维护和实现，将只能回复到以前的时代去。

上海某大学一位30岁的英文教师说：“无论哪个中国人都希望别再搞政治运动了。我想，就是造反派东山再起，他们也难以再煽起运动来。人民群众对那种运动简直烦透了！”这位教师行动敏捷、长相出众，瞪着两只好看的杏眼，烫了一头卷发，身上穿着十分考究的衣裙。她用一句话总结了自己的感受：“对于我和周围的朋友们来说，动乱这东西我们反对！”她仍然坚持说决心继续与政府合作，只希望会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她看来，中国

若需进行任何进一步的革命，那只能是经济上的改革，压根谈不上政治动乱。

至于中国经济的未来成效如何，或许将取决于以下四个因素。首先是政府能否有效地刹住人口增长趋势？即便所有中国人都严格执行政府的独生子女计划，到本世纪末全国人口仍将达到12亿之巨。这就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像这样一个拥有12亿人口，且其中近10亿为农民，国土面积只和美国相近，可耕地只占国土面积十分之一的大国，能否在填饱肚子之后有更大的作为？如果政府要创造经济奇迹，就必须克服不情愿情绪，将大规模的投资转移到农业生产上，提高农产品价格，削减农业生产资料的售价。第三，共产党人有必要整顿自己的官僚机器，及其产生根源——中国人对等级制度的传统爱好。在1979和1980年，邓小平积极推进进步的改革方案，试图重整工业管理体制，但由于遇到党内的反对而不得不暂时搁置一边。看来他还必须把这种改革进行下去。第四，政府需得做大量工作以重新赢得年轻一代的信任，30岁以下的年轻人毕竟占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这意味着政府的资金将不得不大量投入教育战线，同时还得积极提拔年轻人、积极提倡增加他们的工资，扩大像电视机、录音机这样的消费物品生产。如果政府不能克服许多年轻人中存在的消极情绪和懒散作风，不能向他们提供各种新的刺激，工厂的生产率难以有多大提高，社会治安和控制犯罪将是令人头疼的问题。

10年后的中国将会是什么样的国家？中国能否会像邓

小平及其同事们希望的那样创造出经济奇迹，成为台湾或南朝鲜模式的再版和放大？社会科学院一位经济学家对此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最有可能的趋势是，中国内部各地区持续的不平衡发展，诸如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拥有坚实的工业基础和大量的训练有素的人员，将会异军突起；与此相应，靠近城市的乡村地区因为土地肥沃、雨量充沛，也会大踏步发展。至于边远城市和偏远乡村，只能落于队伍之后，亦步亦趋地向前迈进，贫困是无法避免的。

外国人易于为中国的现象所迷惑，只看到辽阔国土上人们的服饰统一，看不到各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殊不知根据政府的统计，上海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1,600美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倍，几近台湾的业绩。上海占全国工业产值的八分之一，全国出口创汇的四分之一，中央政府收入的六分之一。

如果考虑到自1949年以来，共产党政府还有目的地将积聚在沿海老城市里的工业迁入不发达的内地，上海的经济成就就更加令人鼓舞。从1953年开始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铺开了156个大型工业项目，其中没有一个放在上海。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上海工业与华中地区的湖北省相比，少获相当于106亿美元的政府投资。然而靠了熟练的管理技能和受过教育的工人，上海工业仍蓬勃发展起来，相形之下湖北省倒显得势力单薄。到1980年，湖北全省工业固定资产比上海多出9.33亿美元，但产值却只占上海工业的三分之一。上海的经济成就之突出，还在于30年来是在各种困难中创造的。全市人口从500万增长到了

现在的1,140万，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已达10万之惊人巨数！为东京人口密度的四倍多，纽约人口密度的十倍多。我听上海市政府一位官员说，上海31年来从未执行过全面的城市发展规划。在市区不少地方，住房、排污和交通已处于灾难性状况。

然而上海就如纽约和东京那样，因为人口拥挤、环境竞争，人们更焕发出活力、精力和毅力，以争取事业成功；上海的餐馆不同于北京和其它城市，昼夜营业，提供24小时服务；上海妇女名声特佳，居全国爱好穿着之冠。如果在全市繁华大街南京路土漫步，很容易获得这一印象。

我初到这座大城市是由中旅社一位女翻译当导游，她自我表白说：“我们特别注重外表穿着。而北京人关心的只是他们的大白菜和白馒头。”我仔细看，只见她戴着粉红色的太阳镜，下身穿着紧身毛料裙，嘴唇抹得十分鲜艳。

另一次到上海，我去上海体育馆那能容纳18,000人的大厅内观看了一场篮球比赛。比赛在四川省队和美国大学明星队之间举行，观众们最初热情地为自己的同胞加油鼓劲。到半场结束时，眼见美国队以61比30领先，观众们开始嘲笑四川队了。我身后坐着的一位身穿旧军服、40出头的矮胖男人直唠叨：“不就是四川来的吗，能打出啥水平？”看到四川队前锋陡然失了一个易取之球，旁边一个男人更大声地骂起来：“四川人啥都不能干，简直是些乡巴佬！”他那句话是中国人时常用来辱骂或挖苦眼界不开阔的乡下人的。

如果人们在过去30年内就能意识到这种地区差别，那就早已对中国的经济发挥巨大影响了。因为毛泽东的继承者们现在已经公开宣布，他们要将宝贵的资金集中投到像上海这样的快速发展地区，以便迅速产生收益。这种理论认为，先进地区的经济发展成果将会渗入到落后的城乡地区，而落后的城乡地区无论怎样使劲，也只能是稳步低速的增长。

社科院那位经济学家解释说：“我们过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搞共同富裕，让大伙儿都来吃大锅饭，结果人们的生产热情和效率被平均主义窒息了。现在好了，有的人可以先富起来，我们想让他们富起来后再带动其他。”

尽管邓小平一心致力于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离开中国时却不免有些失望，不知中国能否在文化和政治自由方面采取比毛泽东更加灵活自由的对策。回到美国仅仅只有几个月，我的担心就不幸为军队报纸上的文章印证了。文章激烈抨击了由著名军队作家白桦创作的电影《苦恋》。白桦虽也是40年代入伍的人民解放军老战士，但他却旗帜鲜明地主张给予艺术家和作家们更大的创作自由。他写的电影剧本主要讲述一位1949年后返回中国的画家生平。画家充满了爱国热情，一心回到新中国参加建设，不料却在文革中因为海外关系受到残酷迫害，最后被迫到芦苇丛中避难，以生鱼水草为生。1976年激进派垮台后，画家却不幸倒毙在冰天雪地之中，整个尸体形成一个大大的问号。画家在生命垂危之际一语道出了他的观点：“我热爱自己的祖国，是祖国不爱我呀！”他的这种困境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我的朋友高比尔医生就属于其中

之一。然而就是这样一种经历最终触怒了这份军队报纸，文章指责白桦攻击共产党的领导。于是作家还被迫作了自我批评。除此之外，新任党的主席胡耀邦也于1981年9月发表讲话，言下之意是要收缩曾于1978到1980年期间实验性推行的较为自由的文学艺术政策。他公开宣布，党决不能容忍那种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表示怀疑、暴露社会阴暗面的有害作品。

“我们应该积极地批评和抵制这类作品，也要积极地抵制它们对群众，特别是没有生活经验的青年读者的危害。有的同志做得很好，写了不少好作品。”他这当然指的是颂扬社会主义的，但接下来又警告说，“对那些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我们党心怀不满的作者，”党不会熟视无睹。

1976年推翻激进派后人们所说的百花齐放局面受到相当多人的期待。

我还记得朋友兵曾经说过的一番话，看来她不幸言中了。她当时说：“你们外国人根本不了解中国，你们太一本正经地看待我们政治上的争吵了。有人不相信民主，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的年轻一代在想些什么。”这已是足够清醒的认识，然而兵还有更深的见解。“真的，中国和苏联并没有差别，我们只是比苏联人笑得更多而已，因此中国人看上去更讨人喜欢。”据她看，中国的共产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的差别仅在于，我们较多地谈到革命和平均主义，而这一切表面东西到现在已经大多放弃了。

然而中国与苏联之间毕竟还有至关重要的区别。中国

尽管拥有450万军队，拥有核武器和洲际弹道导弹，仍算不上超级大国。北京在影响国际事件的发展和越出国界实施权威方面的能力是有限的。中国之所以在我们的想象中占有很大的份量，是因为它拥有庞大的人口，而不是出自军事实力和外交影响。因为，中国海、陆、空三军的武器装备很大程度上是苏联30年前设计的老式型号，而且，中国的军事战略理论基本上仍坚持在中国国土上展开以人民战争为主的战略防御，而并非任何越出国界的先发制人的进攻性打击。令人惊奇的是，政府并不急于要改善军事装备的技术水平。在四个现代化规划中，国防现代化位居最末，而且实际上，从1979年到1981年的国防开支已经削减三分之一，即从147亿美元降到100亿美元的水平。从这些情况下，北京与其说是全球大国，不如说是地区性大国。

中国军事力量的出击能力有限，已为最近几年未能挫败苏联在全球各地的干涉活动所证明。几年来，苏联人先后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阿富汗用兵。鉴于中国十几年来对外政策的主旨在于对付所意识到的苏联全球性扩张的威胁，如此无力对莫斯科的动向作出积极反应，不能不使北京领导人们感到痛心。而中国人特别觉得窘困的，还有未能防止越南在莫斯科支持下实现其霸占老挝和柬埔寨的梦想。至于说到欧洲，中国的势力和影响就显得更加微小了。周恩来曾对南斯拉夫记者说过：“远水救不了近火。”

不过对美国而言，中国仍然是颇有争议的重要外交政策问题。尼克松总统1972年的中国之行和卡特总统1978年底与北京关系的正常化为新型的双边关系奠定了基础，结

秉了几十年的敌对状态。这种关系又为后来签定的一系列双边协定所进一步加强，如令人棘手的相互冻款索付协议、两国通航、海运协定、出售谷物协议和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协定。然而尽管有这些进展，中美两国仍然面临着各自的抉择，要么是竞争对手，要么是亲密朋友，要么是军事盟友。两国之间仍然存在着两大悬而未决的基本问题：台湾问题和中美军事合作问题。这些问题的迟迟未决使中美关系显得十分脆弱和裹足不前，这是绝大多数西方人不易理解的。

七十年代之所以能够稳步实现双边关系的正常化，是因为北京和华盛顿都从权宜角度同意将台湾问题搁置一边。就美国而言，华盛顿一方面作出让步，承认北京的立场，宣布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坚持保留“维持与台湾人民之间的文化、商业及其它非官方关系”的权利，并且宣称将“持续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相应地，北京也放弃了长期以来所持的对国民党人的好战立场，已经停止呼喊“解放台湾”的口号，而代之以主动提出若干旨在最终实现大陆与台湾之间统一的具体建议，在理论上允诺台湾可以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可以保持自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甚至可以保持自己的军队。共产党人还主动邀请蒋介石之子蒋经国总统访问大陆、共商统一大计。

然而，北京和华盛顿的所有这些互相调和的举动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僵局。就台湾而言，现有的1,800万人口分为两大部分，其中一部份为1949年随国民党逃难该岛，其余的系海峡对岸福建省的昔日移民

后代，很显然他们的确担心统一会使台湾失去较高的生活水平。至于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则对所有的大陆政府都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鉴于国民党人业已取得较为优异的经济成就，本应该主动邀请共产党人来岛参观和视察自己的发展模式。然而不幸的是恰恰相反，蒋经国总统在北京的呼唤下疑心日重、戒备更严。尽管他本人的权力不成问题，毕竟已经72岁，又患有糖尿病，似乎难以再活10年光阴。他在执政期间，曾有意识地防范任何铁腕人物产生，以接替他的职位，因而他以后的逝世也许会酿成一段时期的不稳定。这将会使北京感到神经紧张，因为共产党人担心，台湾本地人一旦执政，将会致力于通过自己的政府最终使台湾永久脱离大陆。

台湾问题的存在，为里根总统持续摊出了微妙的麻烦问题，特别是美国对国民党人的武器出售问题。里根总统在大选活动中发表的亲台湾言论已使北京感到不快，他们对里根行径的怀疑已经导致中国对美国持强硬态度。里根行政当局1982年元月决定售与台湾F-5-E喷气式战斗机进一步激怒了北京，他们明确宣布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而与此同时，台湾还倍感失望，抱怨美国拒绝了他们购买更加新型和先进的战斗机的要求。北京高级官员已经警告美国，如果不事先与中国磋商任何对台军售方案，那将面临正常外交关系的降格。

从长远来看，台湾问题缺乏清楚明了的解决办法。出于实用目的与北京和台北都保持密切关系的国家中，没有哪一国能充当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调解人，美国不能，日本也不能。目前，台湾和大陆之间的间接贸易正在日益发

展，中转途径是香港和日本，每年贸易额已达2亿美元。然而除非台湾岛上的人们根本改变观念，这场政治僵局将会旷日持久、一仍其旧。鉴于台湾问题是有关北京的民族感情和民族精神的大事，又是有关美国人对昔日的盟友是否忠诚的考验，那就有可能成为埋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的潜在定时炸弹。

中美关系中另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双方情愿多大程度上将目前的相互谅解推进到军事联盟。从60年代末期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1969年的中苏边界战争开始，中国为着战略和安全的原因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中国最近已经表现出有意于购买美国武器，若能购进防空导弹和反坦克导弹之类武器，将会迅速增强他们对付俄国进攻的防御能力。不过到目前为止，北京实际上还没有购买任何美国武器。其中原因也许有金钱问题，中国的外汇收入额太小。另外就是北京担心，一旦购进美制武器装备，将会陷于被迫同意美国向台湾出售更多武器的境地。至于美国方面，对这个问题也持相当的保留态度。如果向中国出售致命武器，是能够增强北京、因而也是美国防御俄国人的能力，还是更可能激怒苏联？能否保证中国人有朝一日不会将美制武器转而对准台湾或者美国？然而要是中国极力要购买美国武器，华盛顿能否做到既拒绝北京的要求，又不损害双边关系？北京与莫斯科之间发生争吵的原因之一，中国人认为苏联人极力鼓动起中国对苏联所抱希望，又不愿满足这种希望。

但对普通中国人来说，他们对西方的兴趣与战略和外

交问题并无多大关系。我遇到的许多中国人，不论其考虑是否欠妥，总是孜孜以求出国留学或定居，即使那些日常生活已经相当固定的老年人也不例外。离开中国前几天，我应邀和李苗夫妇吃最后一顿饭。小苗在饭桌前显得坐立不安，似乎颇有一番心事。当最后碗筷已经收拾停当、小桌已经折叠起来放到屋角之后，她对我说有点私事需要商量，请我到他们女儿园园的房间。在微弱的25瓦灯泡照耀下，在缺乏暖气的一月的刺骨寒冷中，小苗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我想到美国去，我想再学点东西，”她说这话，两眼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知道小苗已经40岁，只比我小一岁，不禁为她的生活抱负和奋斗精神感到万分惊喜。

“我想把园园也带去，好让她在美国上学，这样所受的教育会好一些。我啥都能干，就是当佣人也行啊。”说到这里，小苗的语气已经变得非常急促：“我决不怕劳累，也不娇贵，我的身体很好，能吃苦”。

我于是问，她走了丈夫怎么办？李早已悄悄进来了，坐在园园的小床上。

“他没事，”小苗这样一说，李不断地点头。“我已经把啥都给他安排好了。以后他要想来，我可以来接他，我想图个发展，在中国没这种机会。将来是什么样，很难预料。”我明白她这话的意思是说会发生动乱。我也看到，她早已很动感情，两眼含着泪水，脸颊上挂着泪珠。

小苗又问我，是否能够帮助想点办法？是否能够帮助她联系一户需要佣人的美国人？一听这话，我的确感到难以开口。踌躇了好一会，我才答应让我试试看。那晚离开他

们家之后，我开车经过他们公寓楼前矗立着的毛主席塑像，看到他高瞻远瞩地注视着前方，我心中不免感慨万千。

也许这件事实际上并不奇怪。毛泽东之所以要在1920年代初期转向共产主义，是因为1917年俄国革命胜利后，人们似乎都认为这是迅速拯救西方的灵丹妙药。几十年以后的今天，中国人又开始了新的探索，探索能使中国“富强”的新途径。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美国似乎是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或至少是最有吸引力的定居之地。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曾在天安门广场上矗立30年之久，1980年却被下令取掉，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马克思和恩格斯长着大胡子和高鼻子，在中国人看来总不是那么和谐、亲近。我倒似乎觉得，中国正在以许多个世纪以前消化佛教的方式来吸收和革新共产主义。

在最后离开中国之前，我似乎有一种形势正在发生变化的预感。我首次进入中国是1976年4月，和其他游客一道从香港坐英国列车到罗湖下车，然后携带行李走过铁路桥进入中国边防检查站深圳。在我们耗费一个多小时办理入境和海关手续的那座破旧、潮湿的大厅内，悬挂着红旗和毛主席画像，还有《东方红》的嘈杂歌声从十几个喇叭中传出，吵得人心烦意乱。人们能找到的唯一可以转移注意力的地方，是报架上过期的《北京周报》和《中国画报》，全是宣传性的中国英文杂志。由于中国当时不能，或许是不愿意协调好来往列车衔接时间，使我们从香港到北京足足花了两天时间，因为在广州住了一夜。这段路程

只相当于从波多黎各到纽约，本只要坐3个小时飞机就能抵达。

但是，当我最后于1981年离开北京回美国的时候，中国民航和泛美航空公司早已相互开辟从中国首都到旧金山和纽约的直通航线。而北京机场的入境和海关手续已非常简洁明了；且与官方检验台遥遥相对的，是一排崭新耀眼的铝框玻柜，这是美国人在全球各地机场开设的又一家免税商店分号。柜台中摆满了法国香水、苏格兰威士忌、瑞士手表和金笔，还有夏威夷所产的包装华丽的巧克力，柜台外拥着一群群的日本游客。整座候机大厅再也听不到宣传性广播。这同我初进中国相比，时间上的差距不过只有5年，思想观念和经济发展的变化却胜过一个世纪，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如此。

中国是否真在飞速向前发展，以图弥补过去蹉跎岁月造成的损失和浩劫中破灭的人生追求和幻想？坐在中国民航波音—747客机上准备横渡太平洋时，我注意到身旁坐着一位年近30、脸色红润、表情严肃的中国女子。她有一张宽脸和两条短辫，下穿皱巴宽松的黄色毛料裤子，上着蓝色毛式服装，内衬绿色格花衬衫。她的双脚放在几只草编篮子上，显然那是她的部分行李。这女子像是头一次乘机，因为空姐宣布大家应拴好安全带时，她丝毫没有反应。这使我寻到了一个与她交谈的机会，于是主动做给她看，该如何将安全带两头扣在一起。但她只敷衍了一句“谢谢”，再也没有多话。

然而，当客机冲出跑道，她的性情立刻大变。我见她转过脸来笑容满面地说：“我到美国去，到芝加哥读书，

我姑妈住在那儿。”随着她注视着窗外淡黄色的华北平原大地在机后迅速退去，变得越来越小，又加上一句：“我不会回来了。”她这话好像也是对身后的这片大地说的，这不能不让我好奇，她为啥会有这种决断？

“全是因为我爸爸，”她解释说。据她介绍，父亲曾就学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工程学博士，1949年后满怀爱国热情回到中国。听到这儿，我几乎都能猜出下面的经历是怎么回事了。

“我们全家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的日子过得很幸福，我爸的工资很高，有325元，比一般人高多了。科学院给我们家分了好大一套房子，住起来很安逸。我爸还到苏联和东德去过几次，人们说他是学术权威。”

“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爸糟了，说是在美国念过书，就被打成了反革命。他们把我爸关起来，身体拖垮了，还得了心脏病。我妈也被关进了牛棚。”此词是指她父母工作单位私设的监狱。造反派们还抄了她家，将一家人撵了出去，也不准她再上学，当时她才上小学六年级。上不成学，她倒也分配了工作，在一家棉纺厂当工人，一干就是10年。看来这些可怕的经历已经动摇了她对共产党人的信任，当然，对中国还是热爱的。

“我在祖国长到了26岁，不论将来到哪儿，我都是个中国人，”姑娘这样对我说。我问她，要是将来在美国永久定居，是否打算和美国人结婚呢？“不，我决不会嫁给美国人，我是中国人。”这就是她的回答。

“我很爱自己的祖国，但尽管如此，我不会再犯我爸那种错误。他把自己一生给荒废了。”

在我看来，姑娘的经历总结出了中国浩劫、动乱的悲剧所在：由于政治狂热的错误引导，人民的一切殷切期望、冲天干劲、聪明才智和美好理想都被蹉跎一空、荒废殆尽。鉴于人们已经对自己的工作失去了兴趣，或者像这位姑娘那样急着离开故土，恰是共产党人振作起来赢回人民大众信任的时候了！否则，将面临中国人力资源的巨大丧失。

客机飞临黄海上空，年轻姑娘轻声作出自己的判断：
“要是中国打开大门，大家都会走……”

我想，这一切不会是真的，因为中国毕竟是中国，华夏之邦，文明古国，它从长长的道路上走过来，必然要在长长的道路上走下去……